1988年美国畅销书

大 国 的 兴 衰

〔美〕保罗·肯尼迪 著
蒋葆英 等译

中 国 经 济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专攻国际模式与战略历史的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时，向当今世界推出了这部囊括了五个世纪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的历史论证书。它一出版，即成为了1988年美国的畅销书。此书以1500年为起点，以2000年告结束，综述了英、法、西班牙等国的盛衰兴亡的历史，刻意论说了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势力与策略、经济资源与发展、军事力量与抗衡这样一个世界多极时代的形成及其称雄局势。

著者的长篇理论，以它特有的极为生动、精彩的语言，富有吸引力和启发力的珍贵史实，无不触动当今全球中的大国、强国的首脑们的神经，开阔各国的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的思路。全书内容丰富，史料价值大；追忆历史，耐人寻味；展望未来，引人遐想。它不仅值得我国领袖人物、各界领导干部一读，也值得我国大专院校师生作为教学的辅助教材。

责任编辑：栾建民
封面设计：白长江

大 国 的 兴 衰
[美]保罗·肯尼迪著
蒋葆英　等译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21 4/32印张　524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7-5017-0161-X/F·206
定价：6.60元

译 者 的 话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是一本畅销于美国，并引起激烈争论的书。这本书从战略的角度，以 500 年的世界政治史为背景，着重地探讨了经济与军事的关系以及它们对国家兴衰的影响。在总结了 500 年大国兴盛与衰落的历史经验之后，作者又为我们描绘了未来 21 世纪世界格局的前景。

在我们能够把这本书献给广大读者之前，该书的其他版本已行销于市了。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完成了我们的译本，因为这样严肃、缜密、字斟句酌讲述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著作并不多。仅就作者做了 83 页脚注、引证了将近 1400 种资料这一点来说，就使我们不能不以作学问的态度认真地做好翻译工作。

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读到这本书。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国也是书中列为重点讨论的国家之一。保罗·肯尼迪作为一位外国人，他是怎样把我国从人均生活水平到国力、民心与美、苏相比较，他又是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的改革并预测其前景的呢？在对中国文化的反思热潮中，他作为一位局外人，又是如何评价 500 年中国文化、经济、军事和政治对其由东方帝国位置上跌落下来的影响呢？作者的论述对我们有许多的启示。作者对日本、西欧这些曾经敬仰过东方帝国的国家如何从弱小而变得富强进行了分析，对照这些国家走过的道路，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不少有益的经验，使我们避免重复别人犯过的错误。未来 21 世纪谁将称霸于世？是美国、苏联、日本、中国，还是西欧？世界格局将如何演变，我们中国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每一位关心中国之命运、世界之前途的人，都可以看看这本书作出的答案。

本书序言和结尾由毛天祜译；第一、二、三、四章由黄海元译；第五、六章由张延泉译；第七、八章由蒋葆英、张延泉、毛

天祐、张抒文译。序言、第一、七、八章及结尾由蒋葆英校译；第二章由刘道义校译；第三、四章由关仪校译；第五章由国杰校译。

最后，我们向在翻译期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咨询、指导和帮助的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社科院美国所、日本所，外交部西欧问题专家，人民日报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有关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译　者

1988年12月26日

序　言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近代”——即文艺复兴之后——的民族大国和国际大国。它力求探索并解释自西欧“新君主国”形成和跨海洋的全球国家体系开始后500年来各大国之间相对的兴衰。本书必然大量涉及战争，特别是各大国联合进行的、对国际秩序具有很大影响的那些大规模的持久战，但并不完全是一部军事史。本书也探索公元1500年以来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但也不是，至少不直接是一部经济史。国际体系中的各领先国家都力图增进其财富和实力以达到（或保持）富强的地位，而本书所集中研究的，就是在此过程中经济和战略之间的**相互作用**。

因此，本书副标题中所提到的“军事冲突”，总是从“经济变化”的角度来加以研究的。在这个时期中，某一大国的胜利或另一大国的失败，通常是其武装部队长期战斗的结果，但也不仅如此，它还取决于战时国家生产性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率的高低，从更深一层的背景来看，也取决于该国在实际冲突发生前的几十年间，同其他领先国家**比较**而言的经济上的兴衰情况。因此，本书认为，研究和平时期大国地位如何逐步变化，同研究它在战时如何作战是同样重要的。

上述论点将在本书正文中详尽分析，现可简要概括如下：

在世界事务中，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主要因为各国的增长速度不平衡，以及技术上和组织上的突破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具有更大优势。例如，公元1500年以后装备火炮的远洋帆船的出现和大西洋贸易的兴起，并非对所有欧洲国家同样有利——它对某些国家的促进远比对其他一些国家为大。同样，后来的蒸汽动力和它所依赖的煤炭和金属资源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某些国家的相对实力，从而也就降低了其他国家的相对实

力。一旦生产能力增加了，国家也就自然能较容易地担负起平时支付大规模军备、战时维持和供应庞大陆海军的重担了。这种说法听起来很象是露骨的重商主义，但财富永远是加强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获取并保护财富又往往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过多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用于创造财富，那么，从长远看，就很可能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或发动耗资巨大的战争——那么它就会冒这样的危险：为此耗费的巨资可能超过对外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如这个国家已进入经济相对衰退时期，其困境将更为严重。16 世纪西欧进步以来，大国体系中各领先国家——即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帝国和当今的美国等——的勃兴而后又衰落的历史说明，从长远看，生产能力获取收入的能力同军事力量两者之间有很重要的相互关系。

本书各章对“大国兴衰”的论述可简要概述如下：第一章通过研究公元 1500 年前后的世界并分析当时各个“权力中心”——明代中国、奥斯曼帝国及其在印度的穆斯林支脉莫卧儿帝国、莫斯科大公国、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以及中西欧诸国——的长处和弱点，为后面各章提供了背景。中西欧地区必然会超过所有其他地区这一点在 16 世纪初还根本看不出来。当时某些东方帝国虽看来比欧洲更威严、更有组织，却都深受中央集权制度之害，这种制度强求统一的信仰与实践，不仅信奉统一的官方国教，而且在诸如商业活动和武器发展领域内也都如此。由于欧洲没有任何这类最高权威，各王国和城邦彼此争战，这就促使他们不断追求军事进步。军事进步又与在竞争的、企业化的环境中被推到显著地位的技术和商业新发展相互作用，并卓有成效。欧洲社会实行变革的障碍较少，所以经济增长始终螺旋式上升，军事效能增强，这一切后来就使它们领先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地区。

技术改革和军事竞争这一动力推动着欧洲沿着它一贯的你争

我夺的多元化道路向前发展，但仍然有这样的可能性：竞争中某一国家获得足够资源以超过其他国家，从而称霸欧洲大陆。公元1500年后约150年间，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王朝宗教联盟，看来正是形成了这样的威胁，而其他主要欧洲国家则力图遏制"哈布斯堡称霸"。第二章的整个篇幅都用以论述此事。这一章和全书一样，是从影响整个西方社会的较广泛的经济和技术改革的角度，对每一个领先强国的长处和弱点作比较分析，以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这个时期许多战争所带来的后果。这一章的主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们虽然拥有巨大资源，但在多次冲突中不断地过分扩张，他们的经济基础日益削弱，军事上也就头重脚轻了。其他欧洲大国在这些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虽也遭受很大损伤，但却能设法——虽然很勉强——使它们的物质资源和军事力量之间保持平衡，比它们的哈布斯堡敌人略胜一筹。

第三章所论述的1600年至1815年间的大国之争，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一个大集团同它的许多敌对国之间的争斗。在这个复杂的时期里，某些从前的大国，如西班牙和荷兰，降为二流国家，与此同时，五个主要国家却逐渐崭露头角（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它们控制18世纪欧洲的外交和战争，参加一系列长期的联盟战争，其中又穿插了各种迅速变化的结盟。在这个时代里，法国先是在路易十四后又在拿破仑统治下，比以前或以后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控制欧洲，但它的努力总是受挫，最终遭到其他大国的联合阻挠。到了18世纪初，用以维持陆军正规部队和国家海军舰队的费用已十分惊人，所以，凡是能建立一个先进的银行和信贷系统的国家（如英国）就能在许多方面比经济上落后的对手占有优势。但是，地理位置决定列强在许多不断变化的竞争中的命运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两个"侧翼"国家俄国和英国，到1815年已成为重要得多的国家了。这两个国家能插手中西欧的斗争，而它们本身由于地理位

置的掩护而不受斗争的干扰。18 世纪开始以来，两国在确保大陆均势的同时，已扩张到欧洲以外的世界。最后，在 18 世纪后期，英国进行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增强了英国的力量，使它既能到海外建立殖民地，又能挫败拿破仑称霸欧洲的野心。

1815 年后整整一个世纪中，对比之下引人注目的是，没有发生持久的联盟战争。出现了战略上的均势，在这“欧洲大协作”中，所有领先强国都支持这一均势，任何国家都不能也不愿去觊觎霸权。1815 年后的几十年里，政府首先关心的是国内的不稳定因素，以及（如俄国和美国）在它们的大陆进一步扩展版图。这种相对稳定的国际形势使英帝国在海军、殖民和商业方面作为全球强国上升到了顶峰，同时由于相互影响，也有利于以蒸汽为动力的工业生产。不过，到了 19 世纪后半期，工业化已普及到其他一些地区，国际力量平衡已从老的领先国家转而倾向那些既拥有资源又具有组织力量来开发新的生产资料和技术的国家了。这个时代的少数几场大规模战争——某种程度上的克里米亚战争，特别是美国国内战争和普法战争——已使某些社会遭到失败，其原因在于它们未能实现军事系统的现代化，缺乏广泛基础的工业基本设施来支持其庞大的军队和制造昂贵而又复杂的武器，而武器现在正在改变着战争的性质。

因此，20 世纪到来时，由于各国技术改革的速度和增长率的不平衡，国际体系比 50 年前更加动荡，更加复杂。首先，这表现在 1880 年后世界列强为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获得更多的殖民地展开了疯狂的角逐，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获利，一方面是害怕自己被排挤掉。其次，在陆地和海洋不断加强军备竞赛，各国政府为了寻求可能发生的未来的战争中的伙伴，甚至在和平时期建立固定的军事同盟。不过，1914 年前的一个时期内，除了频繁的殖民争端和多一次的国际危机，根据每 10 年估计一次的经济力量指数表明，全球均势将发生更重大的变动——

即三个世纪以来曾经基本上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将被超越。传统的欧洲大国如法国和奥—匈，又如新联合起来的大国意大利，虽然竭尽全力，但仍然在竞争中落伍了。对比之下，庞大的横跨整个大陆的国家美国和俄国跻身前列，尽管这个沙皇国家很是无能。在西欧国家中，可能只有德国才有力量挤入未来世界列强的一流联盟。另一方面，日本渴望称霸东亚，但不拟逾越这一地区。这一切变化必然向英帝国提出许多的最终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英帝国现已感到维护其全球利益比半个世纪前要艰难得多了。

虽然，1900 年以后 50 年来的主要发展情况可以视为两极世界的到来，其后果是"中等"强国（如第五章和第六章的标题所示）遇到危机，但是这整个体系的转变决不是风平浪静的。相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血醒的大规模战斗中，工业生产组织和国家效益对于战争结局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德意志帝国对迅速现代化但还落后的沙皇俄国占了某种优势。德国虽然在东线获胜，但几个月后却发现自己在西线面临着失败，而它的同盟国在意大利、巴尔干和近东战场上也同样地溃败了。后来由于美国在军事上特别是在经济上增加了援助，西方盟国最后才有资源去压倒它的敌对联盟。但这是一场使所有原参战国都精疲力尽的斗争。奥—匈消失了，俄国发生了革命，德国战败，而法国、意大利、甚至英国自己虽然获胜，但也损失惨重。唯一例外的是日本，当然还有美国，前者进一步增强了在太平洋的地位，后者到 1918 年已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最强的大国。

美国在 1919 年后迅速退出国外事务，俄国在布尔什维克制度下也同样实行了孤立主义，使得这一时期国际关系格局与基本经济现实脱节的现象也许比书中涉及的 5 个世纪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突出。英国和法国虽然削弱了，但仍然处于外交舞台的中心，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它们的地位开始受到了军国主义

化的、要求修改历史的修正派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的挑战。德国处心积虑要争夺欧洲霸权的地位，其迫切程度比1914年时更甚。但当时的背景是，美国仍远为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而斯大林的俄国则正在很快地变成一个工业超级大国。结果，修正派"中等"强国所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它们不想被两个大陆巨人超过的话，就必须很快进行扩张。而其他中等地位强国所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击退德国和日本的挑战，它们自已也多半会同时遭到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其胜败兴亡，但基本上证实了中等强国对衰落的恐惧。轴心国在战争初期虽获得辉煌的胜利，但最终却不能克服生产资源的不平衡状态，这种状态远比1914～1918年战争时更甚。但在它们自身被优势力量征服以前，却得以使法国衰微，使英国无可挽回地遭到削弱。到1943年，几十年前预测的两极世界终于到来，而军事均势又一次同世界经济资源的布局趋于一致。

本书最后两章研究的是两极世界的时代。两极世界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思想体系上似乎的确存在，在政治方面则反映在冷战的多次危机之中。美国和苏联作为它们这个等级的大国，其地位也似乎由于核武器和远程运载系统的出现而加强了，这意味着当前的战略和外交景况已与1900年全然不同，更不用说1800年了。

但大国的兴衰过程并未中止，也就是说，增长率和技术改革的差异导致全球经济均势的变动，而这些变动又反过来逐渐冲击政治和军事均势的这一过程并未中止。20世纪60年代过去了，进入了70年代和80年代，整个这一时期，美国和苏联在军事上处于领先地位。它们双方都从两极的而又往往是绝然对立的角度来解释国际问题，正因如此，它们的对抗驱使它们投入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之中，任何其他强国都无力与之匹敌。不过就在这几十年里，全球的生产均势发生了空前快速的变化。第三世界在制

造业产量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在 1945 年后的 10 年中曾一直处于低落状态，但在此之后就稳步增大了。欧洲已从战时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并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形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向前跃进，其速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日本战后的经济增长十分突出，根据某些计算，它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最近已超过苏联。相比之下，美国和苏联的增长率却都变得较为迟缓，60 年代以来，它们在全球生产和财富中所占的比重已显著缩小。因此，若仅从经济指数来衡量的话，如不算其他较小的国家，显然现在又一次出现了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如果说本书是论述战略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那么这样做是合适的：用最后的（虽然必定是推测性的）一章来探讨大国目前军事均势和生产均势之间出现的不协调现象，并指出当今五大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中国、日本、欧洲经济共同体、苏联和美国——在尽力解决如何把国家手段同国家目的联系起来的这一自古以来的老问题时所面临的难题和良机。大国兴衰的历史决不会到此结束。

既然本书研究范围是如此广泛，显然它将被各种不同的人抱着各种不同的目的来阅读。某些读者将在其中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对过去 5 个世纪以来的大国政治，对各领先国家的相对地位如何受到经济和技术变化的影响，对战略和经济之间无论是在平时或在战争考验中的不断的相互作用，进行概括的但又适当详尽的评述。本书顾名思义，不涉及小强国，（一般地）也不涉及小规模的双边战争。同样由于书名限定，本书有大量以欧洲为中心的篇幅，特别是中间各章，既要研究这类论题，这样做也是很自然的。

对另外一些读者，特别是那些现在热衷于对“世界体系”或对不断发生的战争类型制定一般规律的政治科学家们来说，这部作品也许就不如他们的愿了。为避免误解，在这里必须说明，本书

并不涉及这类问题：如认为大规模的（或"有组织的"）战争可同康德拉蒂也夫的经济升降周期相联系的理论。此外，关于战争的**原因**的一般性理论，以及战争是否会由大国的"兴"或"衰"而引起，也并不是本书的中心。本书也并不论述关于帝国的理论，及帝国统治是如何实行的（如迈克尔·多伊尔最近出版的《帝国》一书中所论述的），或帝国对国家力量是否有利的问题。最后，本书也并不提出任何一般性理论来探讨什么类型的社会以及社会的和政府的组织在战时获取资源方面最为有效。

另一方面，本书却显然为那些想要作出这类判断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本书中所以有如此大量的附注，其原因之一就是向那些对诸如筹集战争资财感兴趣的读者指出更详尽的资料来源）。但是，历史学家——同政治科学家相反——在处理一般性理论方面遇到的问题的态度是，过去年代里的证据几乎总是五花八门，不能就此作出"硬性"的科学结论。譬如，某些战争（如1939年）确实与决策者害怕总的势力均衡发生变动有关，但在解释1776年开始的（美国革命战争）或1792年（法国大革命）或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斗争方面，这一点就没有多大用处了。同样，人们可以指出1914年的奥—匈是一个"衰落"的大国触发一场大战的很好的例子，但理论家们仍然可以举例说明当时那些"勃兴"的大国德国和俄国，也同样起过关键性作用。又如，帝国扩张是否到头来得益，或帝国的统治是否受一种可测定的"实力与所处距离"的比例关系影响，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一般性理论——从现有的互相矛盾的证据来看——也同样很可能得到无意义的答案：有时"是"，有时"否"。

不过，如果人们撇开**先验的**理论而只是看看500年来"大国的兴衰"的历史纪录，那就显然可以得出某些一般正确的结论。但应始终承认可以有个别例外。例如，可以看得出，在一段时间之内总的经济和生产均势发生的变动同各个强国在国际体系中所

占的地位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在这方面，从16世纪以来贸易流向从地中海移至大西洋和西北欧，或1890年以后的几十年里世界制造业生产的重新分配已从西欧转移，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经济的变动预告了新的大国的兴起，而这些新的大国终将有一天对军事和领土秩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正因如此，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的全球生产均势朝有利于"环太平洋"方面转移，已不仅仅是经济学家才感兴趣的问题了。

同样，历史的纪录也表明，**从长远来看**，某一大国在经济上的兴衰同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强国（或世界帝国）的兴衰之间有很清楚的联系。这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有两个相关联的事实作为其依据。第一个事实是，为支持大规模的军事编制必须有经济资源。第二个事实是，就国际体系而言，财富和实力始终都是**相关**的，而且也应该如此看。300年前，德国的重商主义作家冯·豪尼克评论说：

> 一个国家今天是否强大和富有，并不取决于它拥有的实力和财富是否多或是否安全，而主要取决于它的邻国比它拥有的是多还是少。

在后面的几章里，多次证实了这一见解的正确性。荷兰在18世纪中期，从**绝对**意义上来说，是比100年前更富有了，但在18世纪它已远不是一个大国了，因为邻国法国和英国已有"更多的……"了（也就是说，更多的实力和财富）。1914年的法国，绝对地说，比1850年时更为强大，但并不能感到什么欣慰，因为比它强大得多的德国超过了它。今天英国拥有的财富比它在维多利亚中期处于顶峰时的财富多得多了，它在军事方面也比那时拥有强大得多的武器，但这也无济于事，因为它在世界产值方面所占的比重已从25%缩减至约3%。如果一个国家有"更多的……"，那么情况就很好，如果有"较少的……"，那么就有问题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相对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上升或下降是**同步**进行的。本书所举的大多数历史上的例子，都表明在一个国家的相对经济力量的轨线同它的军事和地区影响的轨线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时间滞差”。其原因又是不难理解的。一个在经济上扩张的强国——19 世纪 60 年代的英国、19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今天的日本——都是宁愿变得更加富有，而不愿在军备上耗费巨资的。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后，两者孰应优先，就可能完全颠倒过来。早期的经济扩张带来了海外义务（依赖国外市场和原料，军事同盟，可能还有基地和殖民地）。其他的敌对强国现在经济上扩张的速度更快，并认为该轮到它们把影响扩展到国外去了。世界成为一个加剧竞争的场所，市场股票下跌。悲观主义的观察家谈到了衰退，爱国主义的政治家则呼吁“复兴”。

在这种更为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大国往往发现自己同两代人以前的时期不同了，它把**更多的**钱花在国防上，可是还是发现世界的环境没有以前安全——仅因为其他强国发展得更快，比自己更强大了。西班牙帝国在动荡不安的 17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里，与 16 世纪 80 年代在卡斯蒂里领导下经济更为昌盛的时期相比，它花在军事上的钱要多得多。1910 年爱德华时代，英国的国防费用比 1865 年帕默斯顿逝世时（当时的英国经济相对来说处于顶峰）要大得多，但是后一时期（即 1910）的英国人感到更安全了吗？后面将要谈到，今天的美国和苏联也似乎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处于相对衰落状态的大国本能地作出反应，把钱更多地花在“安全”上，从而将用于“投资”的潜在资源调拨出来，以缓解它们的长期困境。

从本书提供的 500 年纪录里还可以得出另一个一般性结论：为争夺欧洲或世界霸权而发动的**大规模联合战争**的最后结局同各方能动员的生产资源的数量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相互关系。反对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18 世纪的大决斗——如

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以及本世纪的两次大战都说明了这一问题。一场旷日持久的残酷的战争最终将测试出联盟各方的相对能力。某一方是否"多一些……"或"少一些……"，这一点战斗越持久就越显得重要。

不过，人们在作这些综合归纳时，是可以不陷入赤裸裸的经济决定论中去的。本书虽然对探索过去500年来世界事务的"大趋势"始终抱有兴趣，但却并不论证经济决定一切，或经济是一切国家成败的唯一原因。有许许多多的证据说明还有其他的东西：地理、军事组织、民族精神、结盟体制以及许多其他因素都能影响国家体系中各成员国的相对力量。如18世纪的联合省是欧洲最富有的地区，而俄罗斯则是最贫穷的地区——但是荷兰衰落了，俄国却勃兴了。个人的罪孽（如希特勒）和十分激烈的战场角逐（无论是16世纪的西班牙联队或本世纪的德国步兵所进行的）也颇足以说明个别成败的缘由。但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国（往往是联合的）战争中，胜利常常由生产基础更为发达的一方获得，或者，如西班牙舰长们常说的，谁有最后的埃斯库多①，谁就能得到胜利，这似乎是无可争辩的。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将进一步证实这虽属讥诮、但基本上是正确的判断。正是因为过去500年来领先国家的实力地位同它们相对的经济地位紧密平行，所以似乎就值得一问：今日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趋势对当前的势力均衡意味着什么？这并不否认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类是处在一种可以限制（同时也可以促进）可能出现的事物的历史环境中来创造历史的。

本书的一个早期样板就是1833年著名普鲁士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关于"大国"的一篇论文。他在文中考察了西班牙衰落后国际力量平衡的起伏，试图指明为什么某些国家勃兴至国

① 埃斯库多：货币名。——译者注。

势鼎盛而后又衰败了。兰克在其论文的结束部分分析了他当时的世界，以及在拿破仑战争后法国争霸失败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他思索了各大国的“前景”，也从历史研究转向了推测未来的捉模不定的世界。

写一篇关于“大国”的论文是一回事，写一本书来进行论述又是另一回事了。我原来的意图是出版一本简明的“论文式”的书，首先假定读者已经知道（不论多么模糊地知道）增长率变化的背景详情，或某一大国所面临的特殊地理战略问题。但当我把本书前几章送出征求意见或对其中某些主题进行试讲时，就越来越清楚我这个假设是不正确的。绝大多数读者和听众所需要的是**更多的**详情，**更多的**背景介绍，因为现在根本没有一部作品来讲述经济的和战略的力量平衡的变迁历程。正因为经济历史学家和军事历史学家都没有着手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所以它也就被忽视了。如果说本书正文中和文后附注中丰富的详尽材料有什么用处的话，那就是能填补大国兴衰史中的那块重要的空白。

目　　录

第三编　当代和未来世界的战略和经济

第一编

前工业世界的战略和经济



第一章　西方世界的兴起

欧洲人在公元 1500 年——许多学者将其作为中古与近代的分界线——绝对看不出他们的大陆会称雄于世界。当时对东方伟大文明的了解是零星的，往往有很多误解，因为他们的了解仅凭游客复述的无中生有的故事。尽管如此，人们对东方帝国普通的印象相当准确——这些帝国土地广阔，拥有惊人的财富和庞大的军队；初步的认识是，东方社会看来必定比西欧的民族和国家得天独厚。的确，纵观欧洲与其他重要的文化和经济活动中心，显然欧洲相对弱点多，长处少。当初欧洲既不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地区，也不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印度和中国对这两方面的地位感到自豪。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欧洲"大陆"地势不利，北部和西部濒临冰川与水域，东部无屏障，屡遭来自陆地的侵犯，南面则易受战略包围。公元 1500 年及其前后一段长时间内，这些都不是抽象的思考。西班牙最后一个伊斯兰教区域格拉那达王国仅仅在 8 年前才败在斐迪南和伊萨伯拉的军队手里，这意味着地区性战役结束，还不是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祖穆罕默德的军队之间更大规模斗争的结束。西方大部分国家对 1453 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心有余悸，因为这一事件意味深长，绝不标志奥斯曼土耳其人进犯的极限。到该世纪末，他们已攻占希腊和爱奥尼亚群岛、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大部分地区。16 世纪 20 年代情况更加恶化，可怕的土耳其军队向布达佩斯和维也纳逼近。在南部，奥斯曼战船袭击意大利港口。教皇不禁担心，罗马不久将遭受与君士坦丁堡同样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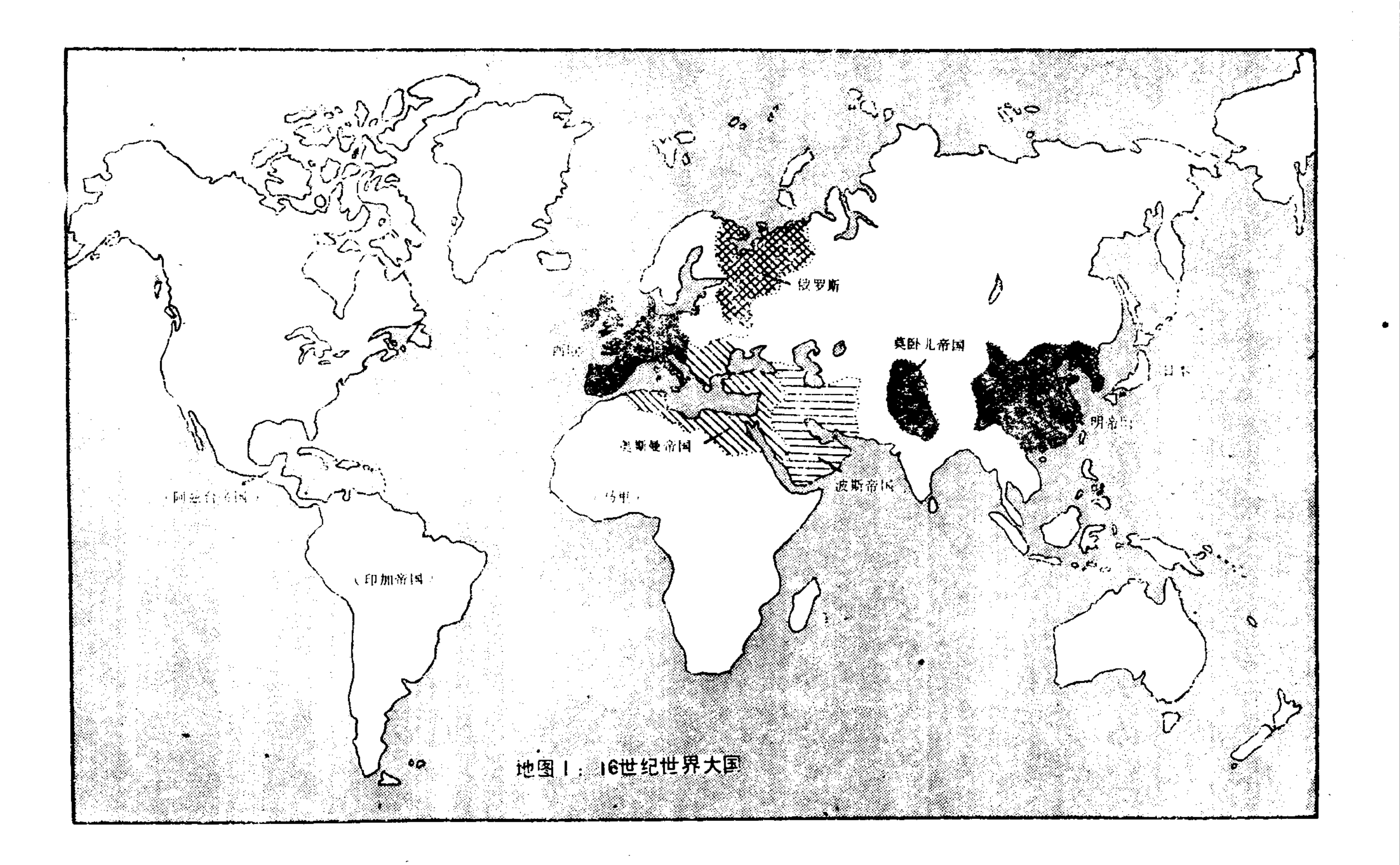
这些威胁看来是穆罕默德二世苏丹及其继承人执行的整个宏伟战略的一部分，对此欧洲人的反应是断断续续的、零散的。欧洲与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不同，与莫卧儿人不久后在印度建立

的统治也不同，从来没有过各部分共同拥戴一个世俗领袖或宗教领袖的统一欧洲。与此相反，欧洲是各种小王国、公国、边境贵族领地和城邦的大杂烩。但西方也有较强大的君主国兴起，著名的如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不过没有一个国家能摆脱国内紧张关系，而在反对伊斯兰国家的斗争中又彼此将对方看作对手，而不是盟国。

同亚洲的伟大文明比较的话，也不能说欧洲在文化、数学、工程学或航海和其他技术领域占据优势。欧洲很大一部分文化和科学遗产是从伊斯兰国家“借来”的，同穆斯林社会通过几个世纪的相互贸易、征服和殖民从中国“借来”一样。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到15世纪末，欧洲在商业上和技术上加快了发展；也许最公正的评价是，当时各主要世界文明中心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有的在某方面比较先进，而在另方面又落后一点。在技术上，从而也在军事上，奥斯曼帝国、明代中国、稍后莫卧儿人统治的北印度和欧洲各国及其俄国人支族都远远超过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分散的社会。虽然这一切说明公元1500年的欧洲称得上最重要的文化权力中心之一，但当时毫无迹象表明欧洲有朝一日登峰造极。因此，在研究欧洲兴起的原因之前，需要考察与之竞争的国家的强项与弱点。

一、明 代 中 国

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在15世纪时，中国人口众多，有1～1.3亿，而当时欧洲的人口为5000～5500万，它的文化灿烂辉煌，平原土地肥沃，灌溉发达，与11世纪开凿的蔚为壮观的运河系统相连，并形成了一个由受过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管理的统一的等级制政府，这一切使中国社会发达具有一种内聚力，以致外国来客



地图1：16世纪世界大国

羡慕不已。中国文明曾受蒙古游牧部落的严重破坏，并在忽必烈汗入侵之后受其统治。但是，中国一贯能改造征服者，而不是被征服者同化。1368 年明朝重新统一帝国并最后打败蒙古人时，大部分旧秩序和专门知识都保存了下来。

尊重"西方"科学的读者必定认为，技术上的早熟是中国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中国很早就有大型藏书楼。11 世纪已出现活字印刷，不久大量书籍流传于世。开凿运河和人口增长促使贸易和工业都很发达。中国的城市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分布很广。纸币早已加快了商业流通和市场发展。到 11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华北已有规模很大的炼铁工业，年产量约 12.5 万吨，主要供军队和政府使用，例如，一支 100 多万人的军队就是一个铁制品的大市场。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生产数字远远超过 700 年后产业革命早期英国的铁产量！中国也许还是最早发明真正黑色火药的国家，14 世纪后期明朝曾用大炮推翻蒙古的统治。

中国有了文化和技术的进步，于是将其注意力转向海外探险和海外贸易，这是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磁罗盘是中国人的另一项发明。他们有些平底帆船同西班牙后来的大型帆船一般大。与东印度群岛和太平洋诸岛的贸易可能与往返于沙漠的商队进行的贸易一样有利可图。早在几十年前，即 13 世纪 60 年代，在长江进行过水战，忽必烈汗为了征服宋朝的船只被迫建立由战船组成的大船队，在这些战船上装有投弹机。14 世纪初期，沿海谷物贸易迅速发展。据有关记载，1420 年明代海军拥用 1350 艘战船，其中包括 400 个大型浮动要塞和 250 艘远程巡航船只。这支力量不包括许多私人经营的船只，后者比起海军，不免相形见绌。但这些私营船只当时已与朝鲜、日本、东南亚、乃至东非进行贸易往来，中国政府通过对这类海上贸易征税，还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最著名的官方海外探险是1405年至1433年间海军将领郑和的七次远渡重洋。他的船队有时由数百艘船只和数万人组成，出访了从马六甲和锡兰到红海口桑给巴尔的许多港口。沿途对俯首听命的地方统治者赐了礼品，另一方面强迫桀骜不驯的当地头领向北京称臣。有一艘从东非返回的船只带回长颈鹿供中国皇帝玩赏，另有一艘船把愚蠢到竟敢无视天子至高无上权力的锡兰酋长押回（但是应该特别提到，中国人从不抢劫或屠杀，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侵略印度洋的其他欧洲人显然不同）。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向我们提供的关于郑和所率船队的规模、实力和适航能力来看，其中几艘运载金银财宝的大船长约400英尺，排水量超过1500吨，这些船只完全可以绕过非洲航行，并"发现"葡萄牙，而其发现时间比航海家亨利真正开始向休达以南进行探险早好几十年。

但1433年中国的探险是最后一次远航，3年以后，皇帝下令禁止建造远洋船只，此后又下敕命禁止保留超过两根以上桅杆的帆船。从此船员只得在大运河的小船上当雇工。郑和的大战船因搁置而烂掉。尽管有各种机会与海外交际，但中国决定对世界不予理睬。

中国作出这种决定，肯定出于某种似乎有理的战略原因。帝国北部边界一再受到蒙古人的压力，将军事力量集中到这个力量薄弱的地区或许是明智的。在这种情况下，再维持一支庞大的海军是耗费巨大的奢侈，但无论如何中国试图南下向安南（越南）扩张并未奏效，而且代价高昂。然而此时对上述战略理由是否正确和有效还没有重新予以考虑，后来削减海军的危害日益突出：在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海岸线乃至长江沿岸城市遭到日本海盗攻击，但仍没有认真振兴帝国的海军，甚至葡萄牙船只一再出

没于中国近海，也未能促使政府进行反省。[1] 朝廷官吏认为，只需要地面防御就够了，因为中国臣民进行的一切海上贸易不是早被禁止了吗？

因此，除经费和其他阻碍因素之外，中国倒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完全是儒家官吏的保守思想作祟，这种保守思想到了明代因对蒙古人过去强加给他们的变化的憎恨而愈益严重。在这种"复旧"的气氛中，整个上层官吏关心的是维持和恢复旧秩序，而不是在向海外扩张和进行海外贸易的基础上创造更加灿烂的未来。根据儒家思想，战争未来是可悲的事，只是由于担心遭受野蛮攻击和发生内部叛乱才需要武装部队。朝廷官吏嫌弃陆军（及海军），同时对商人也抱猜疑。积累私人资本，贱买贵卖，新富商贾摆阔气、讲排场，所有这一切冒犯了达官贵人，几乎也同样引起劳苦民众的不满。朝廷官吏虽无意中止整个市场经济，但往往对个别商人横加干预，没收其财产或禁止营业。官吏把臣民进行对外贸易看得过于可疑，只是因为这些活动他们控制不了而已。

这种对商业和私人资本的厌恶，与上述技术巨大成就并不矛盾。明代修复长城、开凿运河系统、兴建炼铁厂、建立御用海军是为了国家强盛，因为官吏进谏皇上，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不过这些事业刚一开始，就被忽视。运河听任损坏，军队经常缺少新装备，天文钟（约建于公元1090年）置之不顾，炼铁厂渐被废弃。抑制经济增长的做法还不止此。印刷仅限于经典书籍，而不是广泛传播实际知识，更很少用以进行社会批评。纸币的使用被中断。中国城市从来不容许拥有西方城市的自治权；中国人没有"自治市自由民"含义下的一切权利。皇宫迁移时，京都

①在16世纪90年代的一段短时间内，有所恢复的中国沿海舰队曾帮助高丽人抵抗了日本人的两次入侵企图；但此后即使明代海军这一残留部队也一蹶不振。

也随之变迁。商人和企业家得不到官方支持就无法兴旺发达；即使发了财的人也宁将财富用于购置地产和兴办教育，而不投资发展早期工业。同样禁止海外贸易和海洋捕鱼，使经济持续增长失去了又一个潜在的促进因素；此后几世纪中在官方控制下（无疑存在逃避关税问题），与葡萄牙和荷兰开展过奢侈品方面的对外贸易。

因此，明代中国与400年前的宋代相比，活力和进取心都大大减退。明代时期农业技术确有改进，但不久，即使农业精耕细作，利用边沿土地，也难以赶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当时只有马尔萨斯提出的瘟疫、洪水和战争等人类难以制服的灾害才阻止了人口的增长。甚至1644年后富有朝气的满族人取代了明朝，也未能阻止中国逐步相对衰落的趋势。

最后，用下面的一个细节来总结这段历史。在1736年，正当美国科尔布鲁克德尔的亚伯拉罕·达贝炼铁厂开始迅速发展时，河南和河北的鼓风炉和炼焦炉却全部被废弃了。这就是说中国的鼓风炉和炼焦炉早在征服者——英国威廉一世于黑斯廷斯登陆之前就已经非常出色了。然而此刻它们竟要等到20世纪到来才能恢复生产。

二、穆斯林世界

欧洲首批海员于16世纪初访问中国，他们虽对中国的版图、人口和财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可能已觉察到，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国家。对于奥斯曼帝国，则肯定不能下这种论断，当时奥斯曼帝国正处于扩张中期，越来越接近信奉基督教的地区，对后者造成很大威胁。实际上，从历史和地理的宏观角度看，完全可以说，穆斯林国家在16世纪已成为世界事务中发展最快的力量。不仅奥斯曼土耳其人向西推进，而且波斯的萨

非王朝尤其在伊斯迈尔一世（1500～1524年）和阿巴斯一世（1587～1629年）统治时期，重振国力，繁荣经济和崇尚文化；一系列强大的穆斯林汗国仍然控制着由喀什和吐鲁番到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这与博尔努、索科多和廷巴克图等一系列西非伊斯兰国家并无不同；爪哇的印度教帝国在16世纪初被穆斯林部队推翻；喀布尔国王巴卑尔从西北部经由征服者之路进入印度，于1526年建立莫卧儿帝国。虽然最初巴卑尔对印度的统治并不稳定，但巴卑尔的孙子亚格伯（1556～1605年）成功地将这一统治巩固下来，他创建了西起俾路支东到孟加拉的北印度帝国。在整个17世纪期间，亚格伯的继承者进一步向南进击信奉印度教的马拉塔人，这时正值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海路入侵印度半岛，当然其气势小得多。除上述伊斯兰教发展中的非宗教性事迹外，还应指出非洲和东印度群岛穆斯林信徒数量大增，基督教传教团罗致的教徒人数实无法与之比拟。

对近代初期欧洲最大的穆斯林挑战当然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更确切地说，是其可怕的军队和当时最精锐的攻城炮车。到16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版图已从克里米亚（在此侵扰热那亚商埠）和爱琴海（在此毁灭威尼斯帝国）伸展到列旺。[①] 到1516年，奥斯曼的军队已占领大马士革，次年进入埃及，用土耳其的火炮粉碎了埃及马穆鲁克部队，封锁了东印度群岛的香料之路，向尼罗河推进，通过红海到达印度洋，并在此对葡萄牙人的入侵展开了反击战。如果说这一系列行动叫伊比利亚船员惊惶失措，那么比起东欧、南欧的王室和臣民在土耳其军队面前的胆战心惊，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了。土耳其人已经占有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并在渥来基亚和黑海沿岸占统治地位；但向埃及和阿拉伯南进后，苏里曼苏丹（1520～1566年）统治时期又重新对欧洲施

①列旺（Levant）：地中海东部及爱琴海沿海诸国和岛屿。——译者注。

加压力。这些年来基督教国家的最大东方堡垒匈牙利再也无法抵挡土耳其优势大军，于1526年摩哈赤战役之后遭受蹂躏。这一年，正巧巴卑尔在帕尼伯特取得胜利，从而建立印度莫卧儿帝国。是否整个欧洲很快将走北印度的道路呢？到1529年，土耳其人围困了维也纳，因此在一些人看来，上述结局似乎完全可能。而实际上，战线在北匈牙利稳住了，神圣罗马帝国也保留下来了；但此后土耳其人仍然是经常的危险，并施加不容忽视的军事压力。迟至1683年，他们还再次包围维也纳。

奥斯曼在扩充海军力量方面同样是十分令人吃惊的。同中国的忽必烈汗相似，土耳其人发展海军的目的仅在于减少一个四面环海的敌人要塞，即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苏丹为了支援1453年的进攻曾用大型战船和数百艘小船封锁君士坦丁堡。此后，在横渡黑海作战，南进叙利亚和埃及，以及为控制爱琴群岛、罗得岛、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岛，在与威尼斯的一系列冲突中，都使用了强大的战船队。总之，在16世纪初期的几十年中，威尼斯、热那亚和哈布斯堡的船队都避免与奥斯曼的海军接近；但到16世纪中叶，穆斯林海军在北非沿海一带十分活跃，袭击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利阿利群岛，并于1570～1571年占领了塞浦路斯，最终在勒班陀战役中受挫。

当然，奥斯曼帝国不仅仅是军事机器。征战胜利的奥斯曼上层杰出人物（与中国的满族人一样）在一个比罗马帝国面积更大并拥有大量臣民的地区确立了**法定**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的统一。公元1500年前的几百年中，伊斯兰世界一直在文化和技术上超过欧洲。它的城市很大，具有良好的照明和排水设施，其中有些城市设有大学、图书馆和美丽壮观的清真寺。在数学、制图学、医学以及科学和工业的很多方面（磨坊、铸炮、灯塔、养马）都处于领先地位。奥斯曼从巴尔干基督教青年中招募未来土耳其士兵的制度，造就了一支富有献身精神的统一的部队。奥斯曼采取

种族宽容政策使很多有才华的希腊人、犹太人和异教徒为苏丹效劳，例如，围攻君士坦丁堡时穆罕默德的一位主要铸炮人就是匈牙利人。在苏里曼一世卓有成效的领导下，官僚机构精明强干，管理着 1400 万臣民，而当时西班牙有 500 万居民，英格兰只有 250 万居民。君士坦丁堡在其全盛时期比任何欧洲城市都大，1600 年拥有 50 多万居民。

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也犹豫不前，转向国内，失去了称霸世界的机会，这一点变得明朗化，只是在惊人相似的明代衰落后一个世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土耳其人早期胜利的必然结果，因为奥斯曼军队虽管理有方，或可保持漫长的边界，但如不耗费大量人力和金钱，似难进一步扩张；而奥斯曼帝国与后来的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帝国主义不同，经济收益不大。到 16 世纪后半期，已有迹象表明，奥斯曼帝国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在中欧驻扎了大批军队，在地中海进行耗资巨大的海战，派遣部队到北非、爱琴海、塞浦路斯和红海作战，增援部队以坚守克里米亚抗击新兴的俄国。即使在近东，也没有平静的侧翼，其原因是伊斯兰世界发生灾难性的宗教分裂，先以伊拉克，后又以波斯为基地的什叶派对占优势的逊尼派的习俗和教义提出挑战。有时宗教斗争形势与当时德国的相似，苏丹只有用武力镇压什叶派异教徒才能保持其统治地位。但是在边界的另一边，波斯的什叶派王国在阿巴斯大帝的统治下，已准备好与欧洲国家联盟共同对付奥斯曼，正象法国和“异教徒”土耳其人合作反对神圣罗马帝国一样。面临众多对手，奥斯曼帝国需要卓越的领袖人物以保持国家的发展，但 1566 年以后，接连由 13 个无能的苏丹执政。

但外来敌人和个人过失还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奥斯曼帝国与明代中国相似，日益深受其整个制度之害，如中央集权、专制，对进取精神、不同政见和商业采取严厉的正统观念态度等等。一位昏庸的苏丹可以使奥斯曼帝国瘫痪，而一位教皇或神圣罗马帝

国皇帝对整个欧洲绝对办不到这一点。奥斯曼各级官僚机构无上级明确指示时，态度僵硬，思想保守，抵制变革，扼杀创新。1550年后，没有再扩张领土，也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战利品，加上物价大幅度上涨，大为不满的土耳其士兵转而对内掠夺。商人和企业家（几乎都是外国人），过去受到鼓励，现在发现要缴纳无法预测的税收，甚至被没收全部财产。税收不断增高，破坏了商业，减少了城镇人口。受害最大的可能是农民，他们的土地和牲畜遭到士兵劫掠。随着形势恶化，文官也开始掠夺、受贿和没收财物。在与波斯的斗争期间，战争的耗费和丧失同亚洲的贸易，使政府拼命搜索新的财政收入，结果，给予肆无忌惮的包税人更大的权力。

很显然，官方对什叶派宗教挑战作出了强烈反应，表明将对一切形式的自由思想采取强硬态度。印刷机由于可能传播危险观点而被禁止使用。经济观念仍是原始的：希望进口西方产品，但禁止出口；支持行会阻挠革新和“资本主义”生产者的成长；宗教界对商人的抨击加剧。土耳其人藐视欧洲人的观念和实践，因此拒绝采用控制瘟疫的新方法，结果全体居民严重遭到恶性传染病的侵害。一队土耳其士兵在1580年将一个国家天文台毁掉，他们断定是天文台带来了流行病，其蒙昧无知确实令人吃惊。事实上，军队已成为保守主义的堡垒。尽管他们也注意到欧洲军队的新式武器，并且有时吃过苦头，但在使自己现代化上行动缓慢。他们没有用轻型铁铸火炮取代笨重的火炮。勒班陀海战失败后，也没有建造欧洲式的大型船只，在南方，穆斯林舰队仅受命停泊在红海和波斯湾风平浪静的水域中，因而不必仿效建造葡萄牙型远洋船只。作出这些决定，也许有其技术原因，但文化和技术上的保守主义思想也起了一定作用（相比之下，巴巴利[1]时出时

[1]巴巴利（Barbarg）：埃及以西的北非伊斯兰教地区。——译者注。

没的海盗却很快采用了护卫船式战船)。

莫卧儿帝国的保守主义与上述保守主义的情况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帝国版图扩至极点，某些帝王具有军事天才，宫廷富丽堂皇，奢侈品制作手艺高强，甚至有较完善的银行和信贷网，但是，这个帝国体系的核心部分是脆弱的。一小撮南征北战的穆斯林达官显贵高踞于主要信奉印度教的广大贫穷农民之上。城镇商人众多，市场活跃，信奉印度教的经商家庭对生产、贸易和信贷所持态度可称得上韦伯新教伦理的典范。但是这里描绘的准备经济“起飞”的企业社会在成为英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之前，印度生活中同时存在许多固有的、阻碍前进的因素的阴暗面。印度教禁忌极其严格，不利于现代化：禁止杀害啮齿动物和昆虫，因而大量粮食被糟蹋；处理垃圾和粪便的社会习俗造成长期不卫生的环境，成为淋巴腺鼠疫的滋生地；种姓等级制度扼杀人们的进取精神，灌输尊崇礼仪的思想；限制市场发展；婆罗门祭司能对印度地方统治者施加影响，说明蒙昧主义对最高层也起作用。这里存在着进行任何重大变革的根深蒂固的社会阻力。难怪很多英国人，从最初掠夺印度，后来试图根据功利主义原则统治印度，到最终离去时仍感到这个国家对他们来说是个不解之谜。

但是莫卧儿帝国的统治与印度文官的行政不可同日而语。华丽的宫廷是挥霍浪费的中心，其挥霍规模连凡尔赛的太阳王或许也认为过分。数以千计的奴仆和食客、价值连城的衣饰和珠宝、后宫和动物园、大批的卫士，要支付这笔巨额费用，只有靠建立系统的国家机器进行掠夺。税务官为了要向其主子交付规定数额的款项，残酷地剥削农民和商人，不管收成和贸易好坏，钱款务必到手。除非造反，否则对于这种劫掠没有任何法规和其他东西可以制止，无怪乎人们将征税叫做作“吃”税。为了每年的这笔巨额进贡，人民几乎一无所得。交通设施毫无改进，一旦发生饥

荒、水灾和瘟疫，没有任何援救机构，而这些灾害自然是经常发生的。这一切使明代在对比之下显得宽厚，几乎是进步的了。从表面上看，莫卧儿帝国衰落，是因为它越来越难以维持同南方的马拉特、北方的阿富汗以及最后同东印度公司的对抗。实际上，它的衰落，内因大大多于外因。

三、两位难能取胜的赛手——日本和俄国

16 世纪还有两个国家，就其版图和人口而言，虽然远远不可与明代中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相提并论，但迹象表明，它们在政治上日益巩固，经济上不断发展。在远东，日本在其邻邦大国——中国开始衰退之时，正举步朝前迈进。地理位置赋予日本一笔重要的战略财富（英国也是这样），因为岛国地位可保护日本不受来自陆路的入侵，而中国不具备这种条件。日本岛国与亚洲大陆之间并非完全隔绝，日本许多文化和宗教是从更古老的文明借鉴而来。中国由统一的官僚机构治理，而日本的权力则掌握在以氏族为基础的封建领主手中，天皇只是虚有其表。14 世纪的中央集权统治被氏族之间的持续争斗所取代，情况与苏格兰的氏族冲突类似。这对商船和商人并非理想的环境，但不致妨碍大量的经济活动。除在陆地争斗外，企业家还同武将、军事冒险者进行海上争夺，各方都想从东亚海上贸易中渔利。日本海盗沿中国和朝鲜海岸进行掠夺；同时其他日本人则愿寻找机会与来自西方的葡萄牙和荷兰客商交换货物。基督教传教团和欧洲商品打进日本社会比渗入远离世界、自给自足的明帝国容易得多。

这种骚乱但富有生气的局面不久由于越来越多地使用欧洲进口的军火而发生变化。与世界其他地方相似，权力集中到拥有财力，从而占有配备滑膛枪的大部队，特别是占有火炮的某些个人

或集团手中。最后，日本由武将丰臣秀吉巩固了政权，他曾两次企图征服朝鲜，但壮志未酬，均告失败，卒于1598年，以后内乱再度威胁日本。但不到几年，一切权力落到德川家康及德川氏族幕府将军们手中，这时中央集权的军事统治不会被动摇了。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的日本，在很多方面具有上一世纪西方兴起的"新君主制"的特点。主要区别于幕府放弃海外扩张，实际上是放弃与外部世界的一切实质联系。1636年，停止建造远洋船只，并禁止日本臣民在公海航行；与欧洲的贸易仅限于经许可停靠长崎港出岛的荷兰船只，其他船只均被撞翻击沉。以前，在幕府的指使下，实际上残酷地杀害了所有外国的和本地的基督教徒。采取这些严厉措施的主要动机，显然是德川氏族决心使其统治不受挑战，而外国人和基督教徒被看作是潜在的颠覆分子。出于同一原因，对待其他封建领主也是一样，要求他们每年有半年时间留在京都，另外半年可允许住在本人领地，但其家属必须留在江户（东京），实际上作为人质。

这种强制的统一没有阻碍经济发展，同时也没有妨碍取得卓越的艺术成就。全国实现和平对贸易有利，城镇和总人口都增加了，日益扩大使用现金支付，使商人和银行家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但日本从不允许银行家象意大利、尼德兰和英国的银行家那样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崭露头角。显然，日本人不可能学到和采用其他国家新的技术和工业成就。德川幕府和明代中国一样，蓄意选择与世隔绝的政策，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例外。这样做，也许并没有妨碍日本国内的经济活动，但对加强日本的相对国力确实有害。领主属下的武士过着墨守礼仪和令人厌倦的生活，因为他们既不屑经商，又被禁止旅行，除典礼以外不准炫耀武器。整个军事系统停滞不前达两个世纪，因此，当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率领著名的"黑船"舰队抵达日本时，胆战心惊的日本政府别无对策，只有满足美国关于提供煤和其他便利的要求。

俄国在政治统一和发展的初期阶段，某些方面看来也与日本相似。俄罗斯帝国地理上远离西方，这一方面因交通不发达，另一方面与立陶宛、波兰、瑞典和奥斯曼帝国周期性的冲突阻断了原有的通路，尽管这样，它仍然深受欧洲传统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俄罗斯正教的影响。此外，俄国从西方获得滑膛枪和火炮，最终解决了亚洲平原易遭骑兵攻击的困难。莫斯科利用这些新武器确立了“火药帝国”的地位，并向外扩张。瑞典人和波兰人也拥有这类武器，因此难以西进，但利用这一军事技术优势向南部、东部的部落和汗国进行殖民扩张则容易得多。例如，到1556年，俄国军队已抵达里海。随着军事扩张，出现了一批探险家和拓荒者，他们不断向乌拉尔东部进发，越过西伯利亚，并在1638年前实际上已到达太平洋沿岸，所到之处有时竟比军事扩张还远。俄罗斯帝国虽经艰辛赢得对蒙古骑兵的军事优势，但帝国的发展并非容易，或者说并非必然。被征服的民族越多，发生内部冲突和叛乱的可能性越大。伊凡四世（雷帝）清除很多贵族后，对贵族仍难以驾驭，克里米亚的鞑靼汗国始终是一个强敌；鞑靼的部队于1571年劫掠莫斯科，在18世纪末以前一直保持独立。西部的挑战威胁更大，例如，1608年至1613年期间，波兰人曾占领莫斯科。

俄国更大的弱点是，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仿效西方，但仍然技术落后，经济不发达。除部分归因于山地气候悬殊、相距遥远、交通不便外，还存在一些严重的社会弊端：沙皇的军事专制主义，正教对教育的垄断，官僚机构贪污受贿、缺乏预见，以及建立农奴制，使农业处于封建和停滞不前的状态。尽管俄国相对落后，尽管遭受挫折，但它继续向外扩张，在新领土上驻扎军队，并强制推行其压迫俄国人俯首听命的专制统治。俄国一方面从欧洲吸取不少东西，以便拥有保护政权的武装实力，另一方面，坚决抵制一切西方社会和政治的“现代化”文明。例如，把住在俄国

的外国人与本地人隔开，以防止外国人起颠覆作用。与本章谈到的其他专制国家不同，沙皇帝国会设法生存下去，而且俄国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但在1500年，甚至迟至1650年，许多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几乎都没有看出这一点，也许他们对俄国统治者的了解同对传说中的普勒斯特·约翰[1]的了解差不多。

四、欧洲的奇迹

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使欧洲在商业上和军事上一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什么这一势不可挡的过程发生在欧亚大陆西部居住分散、比较质朴的民族之中？这是一个几世纪以来一直引起很多学者和观察家思索的问题，以下各段能作的只是将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概括一下。不管这样的概括会多么粗略，但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揭示了贯穿本书论点的主要线索：社会存在着一种动力，它主要受经济和技术进步驱使，虽然也总是同社会结构、地理以及偶然事件等其他变化相互影响；为了了解世界政治进程，必然重视物质因素和长期因素，而不是注意人物的更换或外交和政治一时的变化；强国是相对的事物，它只能在对各种不同国家和社会进行经常比较之中显示和衡量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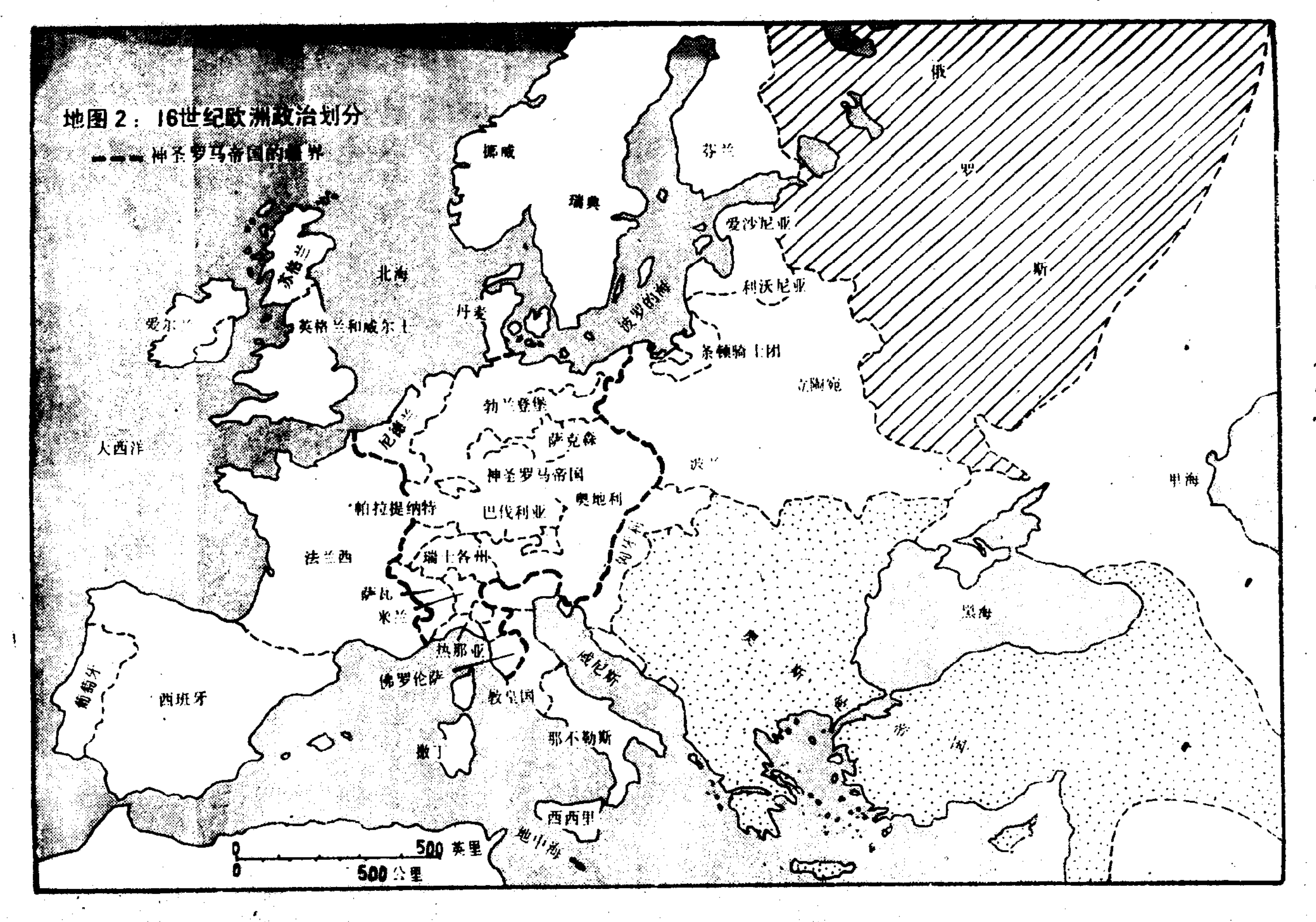
从16世纪世界"大国中心"地图（见图1和图2）可立即看到欧洲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不是一种偶然的或短暂的事态，与中国在一个帝国解体之后和下一个朝代重新掌握中央集权之前所出现的短期分裂不同。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罗马曾作过最大努力，但无法征服莱茵河和多瑙河

[1] 普勒斯特·约翰（Prester·John）：传说中的中世纪基督教国王和牧师，据说曾统治过远东和埃塞俄比亚。——译者注。

以北更北更远的地方；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中，主要政权单位一直很小，并且是地方性的，而相比之下基督教及其文化却在稳步扩展。欧洲偶尔出现的权力集中，如西方的查理帝国或东方的基辅罗斯公国，都不过是短时的，结果都以统治者更迭、内部叛乱或外敌入侵而告终。

欧洲的这种政治多样化，主要归因于地理特点。欧洲没有广袤的平原，以便骑兵帝国迅速实现其统治；也没有广阔和富饶的流域，如恒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黄河和长江等流域，可为勤劳并易被征服的农民大众提供粮食。欧洲的地形支离破碎，山脉和大片森林把分散在流域的人口中心分隔开来；欧洲的气候，南北之间与东西之间差别很大。这一切必然带来很多重大影响。首先，即使力量强、决心大的军阀也难以建立全面统治，同时外来力量，如蒙古游牧部落，窜犯大陆的可能性也大为减少。相反，欧洲复杂的地形孕育了分散的政权，并使它能够继续存在，罗马陷落之后，各地的王国、边境贵族领地、高地氏族、低地城镇联邦星罗棋布，组成一幅大杂烩似的欧洲政治地图。地图上的图形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可有不同，但始终不能用同一种颜色来表示一个统一的帝国。

欧洲气候不同，因此产品不同，适宜于产品交换。随着市场关系的发展，产品通过河流或相邻的两个定居地之间开辟的林中道路进行运输。这类商业最重要的特点也许主要是买卖大宗产品，如木材、粮食、酒、羊毛、青鱼等，是为了满足15世纪欧洲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而不象东方商队那样，运输奢侈品。地理因素在这方面又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水上运输商品要节省得多，而且欧洲有很多可通航的河流。四周环海，进一步促进了重要的造船业的发展，到中世纪末期，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间的海上贸易十分兴旺。可以想象，这类贸易会因战争而部分中断，并受欠收和天灾等地区性灾害的影响；但总的说来，


地图2：16世纪欧洲政治划分
神圣罗马帝国的疆界
挪威
瑞典
芬兰
俄
罗
斯
爱沙尼亚
利沃尼亚
波罗的海
条顿骑士团
立陶宛
北海
苏格兰
英格兰和威尔士
丹麦
爱尔兰
大西洋
尼德兰
勃兰登堡
萨克森
神圣罗马帝国
奥地利
巴伐利亚
帕拉提纳特
法兰西
瑞士各州
萨瓦
米兰
热那亚
佛罗伦萨
教皇国
威尼斯
那不勒斯
西西里
撒丁
地中海
西班牙
葡萄牙
黑海
里海
500 英里
500 公里



贸易继续扩大，使欧洲进一步繁荣，物品更加丰富，结果形成了新的财富中心，如汉萨同盟或意大利诸城市。定期的长途商品交换，反过来促进了国际范围内汇票、信贷制度和银行业的发展。商业信贷和后来的保险单的存在本身表明了经济状况的基本**可预测性**，这是以前世界任何地区的私商难能具备的条件。

此外，由于大部分贸易需通过北海和比斯开湾波涛汹涌的海面运输，同时远洋捕鱼已成为营养和财富的重要来源，造船厂只好建造能运载大量货物和在遇到海上风险能有动力的坚固的（即使速度较慢，外观不够精致的）船只，在此期间，虽改进了帆、桅杆和艉舵，提高了船只的机动能力，但北海的"小船"及其后取代它们的船舶，看上去都不如定期往返于东地中海和印度洋沿岸的轻型船，但下面我们将看到，从长远观点来看，它们有很明显的优点。

商业、商人、港口和市场分散地、尤其是不受监督地自由发展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经济发展。这并不是说，市场力量的兴起没有使许多掌权者感到不安。封建贵族怀疑城镇是异己的中心和农奴的庇护所，经常试图剥夺其特权。同别的地方一样，商人不时遭到劫掠，商品被盗，财产充公。罗马教皇对高利贷的表态，在很多方面可从中国儒教对渔利的中间人和放债人的厌恶声中找到共鸣。但基本事实是，欧洲没有一个可以有效地阻止种种商业发展的统一政权；没有一个中央政府能通过改变发展重点促使某一特定工业兴起或衰落；没有曾严重阻碍莫卧儿帝国经济发展的税收人员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系统的、普遍的掠夺。举一个具体而明显的例子，欧洲在基督教改革运动那种政治分裂的环境中，很难想象每个人都承认教皇 1494 年将海外世界划归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更难想象，一道禁止海外贸易的命令（类似明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所颁布的）会产生什么效果。

事实是，即使有人在掠夺和驱逐商人，欧洲总还有些诸候和地方王公愿意容忍商人及其做法。据资料记载，受压迫的犹太商人、破产的佛拉芒纺织工人、受迫害的胡格诺派教徒带着自己的专长，迁往他乡。一位莱茵兰的男爵对过往商旅征税过重，就会发现商路改到别处去，他的收入化为乌有。一位君主若要赖债，再次受到战争威胁并急需资金装备部队和舰队时，要借款就极其困难了。银行家、军火商和工匠都是重要的，而不是无足轻重的社会成员。欧洲大多数政权与市场经济逐步地、不同程度地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国内秩序和非任意独断的法律制度（甚至对外国人也不例外），并通过税收获得日益增长的贸易利润的一部分。早在亚当·斯密提出他的正确论断之前，西欧某些社会的统治者就已意识到，“将一个国家从最低的野蛮状态发展到最高的繁盛水平，除了和平、放宽税收和宽容、公正的行政以外，别的什么都不需要了……”。一些缺乏洞察力的领导人——西班牙的卡斯提尔国王或偶尔某位法国波旁王朝国王——实际上往往是杀鸡取卵，其结果财富减少，军事力量随之削弱，这一点，除了最迟钝的人，大家很快都明白了。

也许唯一能促使欧洲实现中央集权的因素是，一个国家在火器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以致所有敌手都被压垮或慑服。在15世纪时，大陆人口从经历黑死病后得到恢复，意大利文艺复兴蓬勃开展，欧洲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步伐加快，因此这决不是不可能的。如上所述，在从1450年到1600年这段相当长的时期中，“火药帝国”在别的地方已经建立。俄罗斯、德川幕府的日本以及印度和莫卧儿帝国都是说明领袖如何获得和利用火器、火炮，强迫所有对手就范，从而建立大国的很好的例子。

再者，鉴于在中世纪末期和近代初期，新的作战技术经常出现在欧洲，而不是其他地方，所以不难相信，武器技术突破可使某个国家压倒其对手。已有迹象表明，军事力量越来越集中。意

大利弩手队（必要时由长矛兵保护）的出现宣告了骑士及其训练不良的封建随从的时代的结束；而且显然只有象威尼斯和米兰等较富有的国家才养得起由著名雇佣兵队长指挥的新军队。到公元1500年左右，法国和英国的国王垄断了国内的火炮，因而必要时，可以打垮即便是掩蔽在城堡高墙之下的非常强大的臣属。难道这种趋势最终不会导致更大规模的超越国界乃至横垮整个欧洲的军事垄断吗？这谅必是公元1550年左右很多人看到查理五世皇帝大量集中土地和军队时提出的一个问题。

下一章将充分论述哈布斯堡统治欧洲的具体企图及其失败。这里仅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不可能强行统一欧洲大陆的一般性理由。存在多个经济和军事实力中心仍然是根本的原因。没有一个意大利城邦，可以在不受其他城邦为保持力量平衡进行干预的情况下加强自己；没有一个"新君主制"可以在不刺激对手寻求补偿的情况下增加自己的领地。到宗教改革真正地、顺利地进行时，除传统的均势竞争外，又增加了宗教对立，因而实现政治集权的前景更加渺茫。然而真正的原因还要更深刻一些；毕竟日本、印度和其他国家显然也有竞争对手，敌对集团之间也彼此怀恨，但并没有妨碍最终实现统一。欧洲的不同之处在于每支竞争力量都有机会获得新的军事技术，因此从来没有一个权力中心占有决定性优势。例如，瑞士军队和其他雇佣军可为任何付款的人效劳。没有生产弩的中心或生产火炮的中心——包括早期青铜火炮及后来造价较低的铁铸火炮；这类武器是在靠近英格兰威尔地带的矿床、中欧、马拉加、米兰、列日和后来的瑞典等各个地方制造的。同样，造船技术从波罗的海普及到黑海各个港口，使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垄断制海权，这又有助于制止征服和消灭海洋彼岸对手的武器生产中心。

因而，说欧洲分散的国家体系是实现集权制的最大障碍，确非赘言。因为当时存在很多竞争的政治实体，它们多数拥有或能

够买到军事手段以维护其独立，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统治大陆方面获得突破。

欧洲国家相互竞争的影响，似乎只能说明欧洲不存在统一的“火药帝国”的原因；乍看起来还没有指明欧洲之所以稳步上升到世界领先地位的理由。如果公元1500年新君主国家部署它们的部队抗衡苏丹的大军和明帝国密集的部队，难道不是显得太弱了吗？16世纪初，是这样的，甚至17世纪在某些方面还是这样的；但是到后一时期，军事力量对比迅速朝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为了说明这种变化，必须再次指出欧洲权力分散的特点。首先是，在城邦之间，其后在较大的王国之间形成了原始形式的军备竞赛。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其社会经济根源。既然意大利抗争双方的军队不再由封建骑士及其侍从组成，而由商人出钱和城市行政长官监管的矛兵、弩兵和（侧翼）骑兵组成，那么城市自然要求索回花钱的代价，尽管雇佣兵队长千方百计使自己不成为累赘；换句话说，城市需要能迅速致胜的武器和技术，以便减少战争费用。同样，当15世纪末法国国王有了自己直接控制和支付军饷的“国家”军队时，他们也急于想看到这支力量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因此，这种自由市场制度不仅迫使很多雇佣兵队长竞相承揽合同，而且促使工匠和发明家改进产品，以便得到新的订货。15世纪初，虽然从弩和甲胄的生产中已经可以看出武器在不断发展，但对火药武器进行广泛试验还是此后50年的事情。这里值得回顾的是，在最初使用火炮时，西方和亚洲的火炮设计和效能几乎没有区别。锻铁制造的巨大炮管发射石球，发出轰隆巨响，看上去显然很不错，并起了作用；土耳其人在1457年轰击君士坦丁堡城墙用的就是这种火炮。看来，只有欧洲存在不断改进火炮的动力，改进的方面有：火药药柱，青铜和锡合金铸造保持原有功率但尺寸小得多的火炮，炮筒和炮弹的形状和结构，炮架和

炮车。所有这一切极大地增强了火炮的威力和机动性，使这些武器拥有者具有攻克最强大的堡垒的手段，这和1494年，法国一支装备令人生畏的青铜火炮入侵意大利时，意大利城邦大惊失色的情况一样。因此，毫不奇怪，当时要求发明家和有学识的人设计出能对付这些火炮的某种武器（所以那时达·芬奇的草稿簿上画有机枪、简单的坦克和蒸汽动力火炮的草图，是不足为奇的）。

这并不是说，其他文明国家没有改进早期的原始武器；有些国家改进了武器，一般按欧洲武器仿造，或说服欧洲来访者（如访华的耶稣会会员）转让技术。但由于明代政府有了火炮垄断权，而穷追猛赶的俄国、日本和印度莫卧儿帝国不久也获得了火炮垄断权，他们既然已建立了权威，改进武器的积极性就少得多了。中国人和日本人闭关自守，不重视发展武器生产。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士兵墨守传统作战方式，对火炮不感兴趣，后来已为时太晚，无法赶上欧洲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俄国和莫卧儿军队指挥官面临的是不发达民族，所以没有改进武器的迫切要求，何况他们拥有的武器已足以吓倒敌人。欧洲在兴旺的军火贸易的推动下，正如在一般经济领域一样，在军事技术这个特定领域也取得了压倒其他文明国家和权力中心的有决定意义的领先地位。

这里还要谈一下武器不断发展带来的另外两个后果。一是确保了欧洲政治的多元化，二是欧洲最终夺得了制海权。前者很简单，只需要概括地谈一下。法国1494年入侵意大利后的25年中，甚至1494年以前在某些方面，意大利就有人已发现在城墙以内建起土木工事可大大削弱炮击的效果：炮弹打到坚实的土堆上时，失去对外墙的破坏性冲击力。如果在这类土木工事前面再建深壕（后来又造了一系列更好的设防棱堡，滑膛炮和火炮可从棱堡发射交叉火力），它们就会构成围攻步兵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样一来，就恢复了意大利城邦的安全，或者说至少恢复了

那些尚未落入外国征服者之手、具有建造和守卫这种要塞的大量人力的城邦的安全。不久马耳他和北匈牙利的基督教驻军发现，这些土木工事对积极抵御土耳其人的军队有利。尤其是，这种土木工事使欧洲的一个气势汹汹的大国无法轻而易举地征服起义者和竞争者，对尼德兰起义持久的围攻战证明了这一点。望而生畏的西班牙步兵大军如果遇到敌人拥有可供退却的严加设防的基地，那么它在开阔战地取得的胜利就不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了。日本德川幕府或印度的亚格伯利用火药取得权力的事件没有在西方重演，西方的特点仍然是政治多元化及其致命的伴生物——军备竞赛。

海上"火药革命"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同样令人吃惊的是，中世纪末期欧洲西北部、伊斯兰世界和远东在造船和海军力量方面，情况不相上下。如果说郑和伟大的远航以及土耳其舰队在黑海和东地中海的迅速发展，给予公元1400年和1450年左右的观察家一种预感的话，那么这就是航海发展的未来是属于这两个国家的。人们认为，上述三个地区在制图学、天文学以及指南针、观象仪和象限仪等仪表的运用方面也没有什么差别。差别在于**持续组织**航海事业，或者如琼斯教授所说："世界其他地方的水手，如波利尼西亚船员，可能航程很远，但欧洲在合理改革航行和在航程范围内开发资源的能力比别人（伊比利亚人）要强多了。"葡萄牙人系统地收集地理数据，热那亚商界一再乐于对大西洋航海探险提供资金，以期最终能补偿在黑海贸易的损失，再往北，纽芬兰鳕鱼渔场改进捕鱼方法，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有持续海外发展的意图，而其他社会当时没有这方面的迹象。

也许当时最重要的"合理化"改革是不断改进船舶的武器装备。在海战努力仿效地面作战的时期，帆船上设置火炮是必然的发展；正如中世纪的城堡在城墙和楼塔上配备弓箭手以驱除围攻的军队一样，热那亚、威尼斯和阿拉贡的大批商船雇用弩手，船

头船尾设置了“城堡”，以防范地中海穆斯林海盗的攻击。这可能使船员蒙受严重损失，因为如果海盗决心袭击，这样做未必足以拯救已停航的商船。而在船员们发现陆上火炮设计已取得进展时(这里指新式青铜火炮体积小，威力大，对炮手的危险比锻铁火炮小)，可以预计，这类武器将在船上装备。何况当时中国和西方的战舰早已安装了弹射器、投石机和其他各种火箭投射器。火炮虽不象过去那样易于爆炸，对船员的危险也减少了，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在火药效益高的情况下，后坐力可能很大，如果不加限制，后坐力可将炮后推，越过甲板；此外，这些武器仍很笨重，如果在船上（尤其在炮台上）装备过多，船会失去平衡。这就是坚固的、全天候圆脊三桅大帆船的优点所在，它使地中海、波罗的海和黑海内河航行的细长划桨平底帆船以及阿拉伯独桅三角帆船，乃至中国平底帆船都黯然失色。它可在任何情况下发射较大的舷炮而保持稳定，尽管有时也出现事故；但是一旦人们认识到，把这类武器安装在船中间而不是炮台上可使炮床安全得多时，这些轻快帆船和大帆船的潜力就很大了。相比之下，轻型船有两个缺点，即运载火炮的能力差，和更容易遭受炮弹的攻击。

必须强调“潜力”一词，因为进化到装备火炮的远航帆船，有一个缓慢而不平衡的发展过程。曾经建造过一些混合式船只，有的装有许多桅杆、火炮和多排船桨。16 世纪在英吉利海峡仍可看平底大帆船。再者，当时很多人主张在地中海和黑海继续部署这种船；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它的速度较快，在沿海水域机动性强，因此便于沿海与地面作战配合，对土耳其人来说，可克服航程短、在波涛汹涌的海面无法发挥作用的不足。

同样，我们不能想象，当葡萄牙的第一批船只刚绕过好望角，西方统治的时代便无可争议地开始了。历史学家所说的“达·伽马时代”和“哥伦布时代”——即在公元 1500 年以后欧洲称霸的三四百年——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葡萄牙探险者或可于

15世纪90年代到达印度海岸，但他们的船只还太小(一般只有300吨)，而且不是所有船只武器装备精良，所以当然不能与一个世纪后行驶在这些水域中的强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相比。实际上，葡萄牙人不能长期插足红海，而只是偶尔停留，他们也无法在中国得到许多立足点；到了16世纪末，在一次阿拉伯的反击中他们失去了一些东非的停泊地。

如果设想，非欧洲大国一看到西方的扩张主义，简直就象一叠纸牌一样倒下，那也是错误的。这种情况确曾于西班牙冒险家在墨西哥、秘鲁和西半球的其他不发达社会登陆时出现过。在其他地区，情况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中国政府主动放弃海上贸易，它对贸易是否落入蛮族之手却不关心；甚至葡萄牙于1557年在澳门建立了半官方商埠，而当地丝绸商人和共谋的地方官吏谅必有利可图，似乎这也没有打乱北京安之若素的态度。至于日本人，则粗暴得多。当葡萄牙人于1640年派遣一个使团到日本抗议驱逐外国人时，几乎所有使团成员都被杀掉；里斯本无法进行报复。最后，奥斯曼海军坚守东地中海，其陆军对中欧仍构成重大威胁。实际上，在16世纪，"对多数欧洲政治家来说，丧失匈牙利远比在东方建立工厂重要得多，而维也纳受到威胁也比他们自己在亚丁、果阿和马六甲进行挑战更值得重视；只有濒临大西洋的政府，及其后来的历史学家才不顾这一事实。"

然而，即使作了这些保留，毫无疑义，武装远航帆船的发展意味着欧洲的世界地位大大提高了一步。有了这些船只，西方的海军大国就取得了控制海洋商路和慑服所有易受海军攻击的社会的有利地位。葡萄牙及其穆斯林敌人在印度洋上最初的几次重大冲突，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达·伽马和阿布奎基在航海日记和报告中追溯历史无疑有些夸大，但他们描述了葡萄牙的战舰在马拉巴尔沿海、霍尔木兹和马六甲停泊地与阿拉伯的遭遇战中怎样所向披靡，炸毁密集的独桅三角帆船和其他轻型船只，给人一种

印象，好象天兵天将降临到不幸的对手头上。葡萄牙船员采用"决不上船、只用炮攻"的新战术，他们在海上确实无往而不胜。陆地上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在亚丁、吉达、果阿和其他地方的激烈战斗(有时遭到失败)说明了这一点。然而这些西方入侵者行动坚决而残暴，到16世纪中叶，他们已经开辟了从几内亚湾到南中国海的一系列要塞。葡萄牙人虽然从来垄断不了东印度群岛的香料贸易——其中大部分继续经传统渠道运往威尼斯——但毫无疑问，他们垄断了相当一部分香料贸易，并由于早期在争夺帝国地位中领先而获得很大利润。

事实证明，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在西半球广袤的土地上迅速建立帝国，自然获利更大。西班牙远征军从早期建立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古巴殖民地出发，向大陆推进，于16世纪20年代征服墨西哥，30年代征服秘鲁。在几十年内，它的领地从南部的普拉特河扩展到北部的格兰德河。西班牙大帆船往返于西海岸，同来自菲律宾群岛装有中国丝绸以换取秘鲁白银的船只联系。西班牙人在他们的"西半球"建立帝国政府，建筑教堂，经营牧场和采矿，明确表示，他们要在这里扎根。征服者开发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利用当地大量劳动力，把糖、胭脂红、兽皮和其他物品源源运送回国。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把玻利维亚的波托西矿山的白银运回国内，这个矿山是一个多世纪中世界最大的唯一的银矿。这一切导致"跨越大西洋的贸易迅速增长，1510年至1550年期间贸易额增长了7倍，1550年至1610年期间又增长了2倍"。

因此，所有上述迹象表明，帝国主义企图使其殖民统治永久化。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险家的行动与郑和率船队短暂出访不同，它象征着殖民者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平衡的决心。他们利用船上的火炮和肩负滑膛枪的士兵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回顾这段历史，不免令人费解，为什么象葡萄牙这样一个人口和资源有限的国家

竟能伸手如此之长，并攫取如此之多。如上所述，欧洲取得了军事优势和海军优势，在此特定条件下，做到这一点并非决不可能。既已做到，那么帝国获得的显著利益以及企图获取更大利益的欲望就更加速了扩张的进程。

关于“欧洲的扩张”的论述，迄今还有一些因素未被重视或仅简略提及。例如，对个人的作用方面未曾进行分析，然而——正如在一切重大努力中——这方面的大量事实也充分显示了个人作用：象航海家亨利等人士的促进；造船工匠、武器制造者和学者们的创造性；商人的进取精神；尤其是，那些参加远航的人们，一路经受汪洋大海、恶劣气候、荒芜地区和凶恶敌手等各种考验的真正勇气。出于形形色色的复杂动机——个人利益、为国争光、宗教狂热，也许还有冒险意识——人们甘冒风险，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关于欧洲征服者施加于非洲、亚洲和美洲受害者的恐怖残暴行径，也没有细述。如果说，本书对上述特点也论述不多的话，那是因为当时的许多社会为把世界变成自己的盘中餐，吹捧一些敢冒风险的亡命之徒或集团。欧洲的船长、船员和探险家的卓越贡献在于，他们拥有实现其抱负的船只和火力，在于他们来自竞争、冒险和企业家精神盛行的政治环境。

欧洲扩张得到的收益是广泛和持久的，而最重要的益处是有助于加速发展已经存在的社会动力。虽然主要目的在于获取黄金、白银、贵金属和香料这些确属重要的贵重物品，但也不应忽视由于欧洲船员突破海洋边界后而涌入欧洲港口的各种不大引人注目的物品的价值。到达纽芬兰渔场，带来了显然取之不尽的食物供应，而且大西洋还提供了照明、润滑和其他用途所必需的鲸鱼油和海豹油。糖、靛蓝、烟草、米、毛皮、木材以及马铃薯和玉米等新作物，都增加了欧洲大陆总的财富和福利；当然后来还不断输入了大量的粮食、肉类和棉花。人们无需先考察后来19

世纪的世界经济，就可以了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发现在几十年内对增强欧洲西部的繁荣和实力的日益增长的重大作用。诸如渔业等大行业，需雇佣大量人力进行捕捞和销售，因此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经济。同时这一切极大地刺激了欧洲造船工业的发展，把大量手工匠、供应厂商、商人和承保人都吸引到伦敦、布里斯托尔、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许多港口周围。最终结果是很大一部分西欧人，而不仅是少数达官显贵，对海外贸易成果产生了持久的物质兴趣。

如在上述商品单上再增加俄国为向大陆扩展的贸易，运进欧洲的毛皮、皮革、木材、麻、盐和粮食，那么学者就有理由把这种现象称做“现代世界体系”的开端。开始时，扩张都是单独进行的，后来不断发展为一个连锁整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用几内亚海岸的黄金和秘鲁的白银支付来自东方的香料和丝绸；俄国靠冷杉和木材购买英国铁炮；波罗的海的粮食经过阿姆斯特丹运到地中海。这一切构成一种持续的相互作用——即欧洲每进一步扩张，会带来新发现，也因而带来贸易机会，结果收益增加，这又刺激再度扩张。不过这个发展过程并不一定能顺利进行，往往一场欧洲大战或国内纷乱可大大减少海外活动。但殖民强国几乎从不放弃其猎获物，而且过不了多久，又会开始一轮新的扩张和探险高潮。如果已确立的帝国不利用其地位，那么别的国家终究也会要取而代之。

归根结底，动力经久不衰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欧洲国家各种对抗已很尖锐，正在超出欧洲范围进入大洋波岸的半球。西班牙和葡萄牙虽力图保持罗马教皇确定的对外部世界的垄断权，但已完全做不到了，尤其在人们认识到从欧洲到中国不存在任何东北通道或西北通道后，情况更是如此。到 16 世纪 60 年代时，荷兰、法国和英国的船只已冒险横渡大西洋，稍后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英国的纺织品贸易下降和尼德兰起义加快了这一过程。在

王室和贵族的庇护下，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大商人的资助下，以及在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中迸发的宗教和民族主义狂热的促使下，新的贸易和掠夺性远征从欧洲西北部出发，以获得一份赃物。这里蕴藏着获得荣誉和财富、打击对手、增加祖国资源以及将新的热忱变为真正信仰的前景，哪里还能提出反对意见来制止这种冒险呢？

这种商业和殖民竞争日益加剧的积极方面是，与此同时，科学和技术知识不断发展。这一时期的许多成就无疑是军备竞赛和争夺海外贸易的副产品，但其最终益处胜过了不光彩的起源。经过改进的制图法、领航表、望远镜、气压计、背测杆和常平环罗盘等新式仪器，以及改善了的造船方法，都有助于使海上航行成为比较可靠的航行方式。新的庄稼和植物不仅使营养更加丰富，而且还促进了植物学和农业科学。冶金技术以及实际上整个炼铁工业迅速发展，深层开采技术同样发展很快。天文学、医学、物理学和工程学也因经济步伐加快和科学价值提高而受益。勇于探究真理的智者在进行更广泛的观察和更大量的实验；印刷机除印刷本国语的圣经和政治论著外，还传播上述研究结果。这种知识爆炸的累积效果，巩固了欧洲的技术优势，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欧洲的军事优势。到16世纪末，甚至强大的奥斯曼民族，或至少他们的前线士兵和船员，都感受到这方面的某些影响。对于其他更不活跃的社会，其影响则尤为严重。亚洲某些国家是否奋起直追，主动进行商业和工业革命而不受干扰，很值得怀疑；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即在比较先进的欧洲国家已占领世界强国阶梯所有顶上的梯级的情况下，其他社会要再攀登上去将是极其困难的。

这种困难是综合性的，看来可以说其原因在于登上阶梯将不仅要涉及获得欧洲的设备甚至欧洲的技术，而且要全面借鉴西方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普遍特征。这意味着建立市场经济，如果这种市场经济还没有达到亚当·斯密所要求的程度，至少应使商

人和企业家始终不受威胁、妨碍和掠夺。这还意味着存在权力中心的多元化，如有可能，各中心有其自身的经济基础，以便杜绝那种强行建立东方式专制制度的中央集权的可能性，而建立起进步的(尽管混乱，有时还野蛮)、刺激竞争的各种前景。广而言之，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僵化，意味着文化上和思想上也不存在正统观念——这就是探究、争论和实验的自由，是对可能改进的信念，是重视实践而不是抽象理论，是奉行理性主义，蔑视达官贵人的法规、教义和传统民俗。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影响许多积极因素，而是减少阻止经济增长和政治多样性的障碍。欧洲的最大优势是它较少其他文明社会的缺点。

对此，虽无法证明，但可设想，上述各种普遍特征都是通过某一内在逻辑相互联系的，而所有特征都是必不可少的。它是经济的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以及学术自由的结合，尽管其中每一因素较之后来时期很不成熟，这些因素在经常的相互作用中创造了“欧洲的奇迹”。既然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似乎可以假定，只要全部照搬其组成成分，就可在别的地方产生同样结果。鉴于明代中国、中东和亚洲的穆斯林帝国或上述任何其他社会都不具备欧洲那种重要成分的结合，当欧洲发展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时，这些国家看来仍停滞不前。

第二章　哈布斯堡王朝争夺霸权（1519～1659年）

到16世纪时，欧洲的权力斗争也有助于欧洲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兴起，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然而，这时仍然无法断定参与竞争的欧洲国家中有哪一个能积累足够的资源以便超过其他国家，并占据主导地位。在公元150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在欧洲大陆范围由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和奥地利成员统治的王国、公国和辖区可能成为欧洲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主要势力。本章的主要内容是论述这类长期斗争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组成的同盟最终打败哈布斯堡王朝的野心等情况。到1659年，当西班牙在缔结《比利牛斯和约》[1]中终于承认失败时，欧洲政治的**多元性**（其中有5～6个大国和很多小国）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至于哪一个主要国家将从大国格局的进一步变化中受益，这个问题可以留到下一章说明；到17世纪中叶时，至少有一点很清楚，这就是，任何一个王朝的军事集团都无法成为欧洲的霸主，在过去数十年间种种场合中出现的情况可能就是如此。

因此，作为体现这一个半世纪的特点的争夺欧洲霸权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战役，与公元1500年以前的战争在程度上和类型上都有区别。打乱欧洲以前100年的宁静的斗争是**局部性**的斗争；在意大利的各城邦之间的冲突，英国王权和法国王权的对抗，条顿骑士团[2]与立陶宛和波兰进行的战争都是典型的例

---

[1] 比利牛斯和约（The Treaty of the Pyrenees）：结束法国和西班牙战争（1635～1659年）的条约。——译者注。

[2] 条顿骑士团：十字军东侵期间，为保卫地中海东海岸的十字军国家，于1198年在巴勒斯坦建立的宗教性封建军事组织。——译者注。

了。可是到了16世纪期间，这些在欧洲进行的传统的地区性斗争，要么成为当时规模大得多的欧洲大陆霸权之争的一部分，要么就淹没在霸权的斗争之中显得无足轻重。

一、斗争的意义和年表

尽管总可以找到一些具体原因来说明为什么某个具体国家参加这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但造成欧洲的紧张局势及欧战的地理范围发生的变化的主要有两个更一般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出现了1517年由马丁·路德[1]个人反动教皇特权而引起的宗教改革运动，[2]这场宗教改革运动很快在欧洲大陆的王朝之间的传统对抗中增加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新因素。由于某些具体社会经济学方面的原因，新教徒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及以反对异教的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形式出现的对立面，也往往将欧洲南部与北部分开，将蒸蒸日上的以城市为基础的中产阶级与封建阶层分开。当然，这种组成联盟的总的情况也有很多例外。而基本特点是"基督教国家"已四分五裂，欧洲大陆当时有很多个人卷入关于教义方面的跨国斗争。只有在17世纪中叶，当他们在过多的和无效的宗教战争面前向后退缩时，人们才总的说来承认（尽管很勉强）欧洲的忏悔性分裂。

造成公元1500年以后战争出现了广泛得多和彼此休戚相关的格局的第二个原因是，出现哈布斯堡王朝的结合，构成一大片领土，这片领土从直布罗陀向匈牙利伸展，从西西里向阿姆斯特

---

[1]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译者注。

[2] 宗教改革运动：16世纪欧洲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社会改革运动。——译者注。

丹伸展，其版图超过了700年[1]前查理曼统治时期以来欧洲曾出现过的一切版图。哈布斯堡王朝的发源地是奥地利，其统治者设法让自己定期当选罗马神圣帝国的皇帝，自从中世纪以来，这一头衔的实权大大减少，但仍然是那些渴望在德意志事务中和欧洲一般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诸侯的争夺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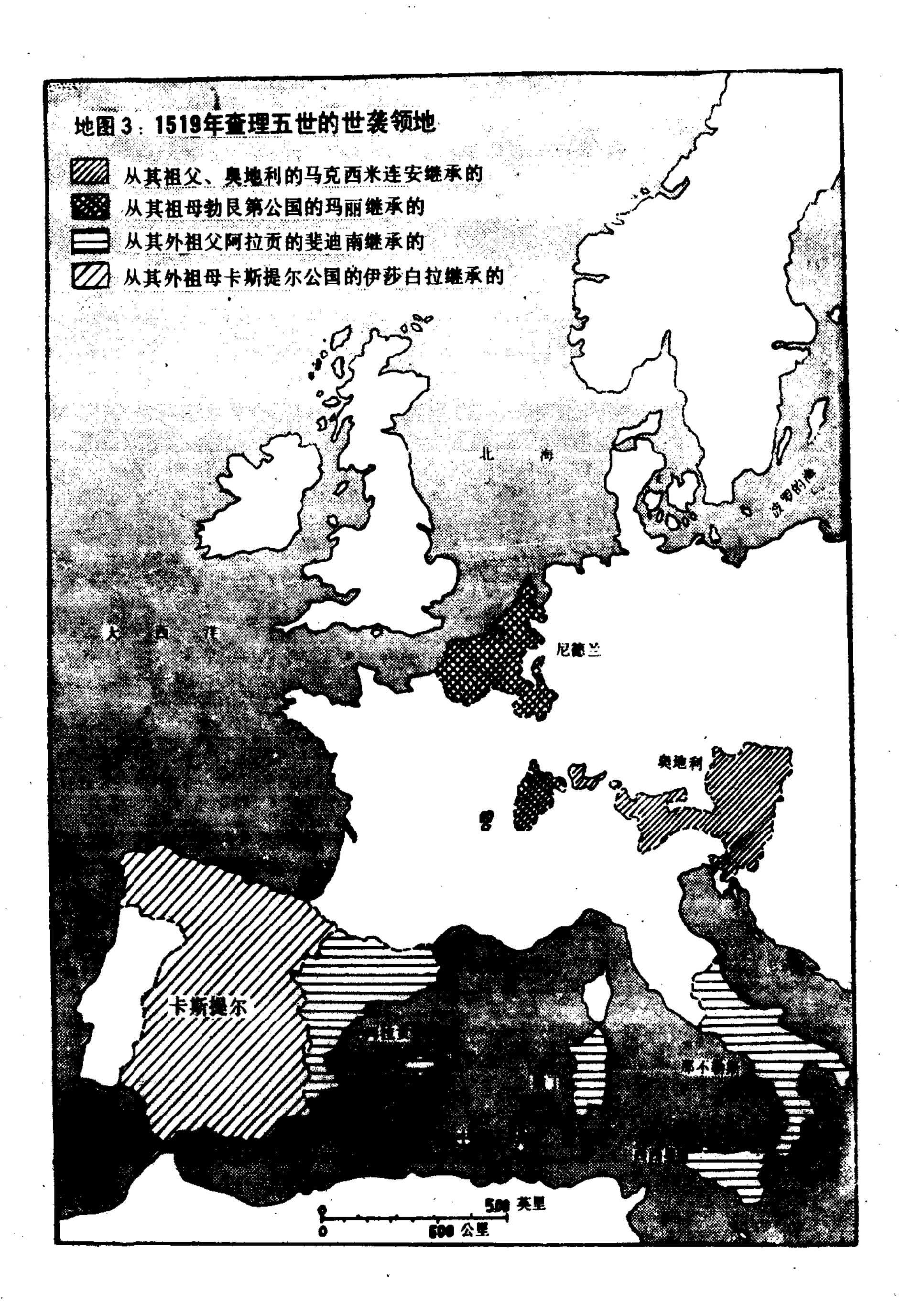
实际上，哈布斯堡王朝通过姻亲和继承等办法空前地扩大了自身的领土。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安一世[2]于1477年采取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富饶的勃艮第公国的世袭领地以及勃艮第的属地尼德兰[3]。另一块领土是在1515年达成联姻协定后得到的，从而又增加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等重要领土；尽管匈牙利不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范围内，且拥有很多的自由权，但使哈布斯堡王朝增加了一大块横跨中欧的陆地。而马克西米连安一世的王朝结合中最富有深远意义的是其子腓力与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和皇后伊莎白拉之女胡安娜的联姻。而斐迪南和伊莎白拉自身早先的结合得到了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等领地（其中包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所有这些联姻协定的"剩余财产继承人"是腓力和胡安娜的长子查理。查理生于1500年，15岁时成为勃艮第公国的公爵，一年后成为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尔后于1519继承其祖父马克西米连安一世的王位，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的世袭领地的统治者。只是几年以后到1526年无嗣的匈牙利国王路易在与土耳其的摩哈赤战役中战死之后，查理才获得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位。此后，作为查理五世皇帝，直到他于1555～1556年退位时，一直是所有四种继承权的化身（见地图3）。

---

[1] Charlemagne，即查理大帝，统治期间，法兰克王国扩张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译者注

[2] 马克西米连安一世（Maximilian Ⅰ，1493～1519）：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08～1519年在位。

[3] 14世纪被勃艮第公爵兼并。——译者注。


地图3：1519年查理五世的世袭领地
从其祖父、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安继承的
从其祖母勃艮第公国的玛丽继承的
从其外祖父阿拉贡的斐迪南继承的
从其外祖母卡斯提尔公国的伊莎白拉继承的
北 海
波罗的海
大 西 洋
尼德兰
奥地利
卡斯提尔
0
500 英里
0
公里



这些领地性质各异而且分散（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可以使人们意识到，哈布斯堡的最高统治权与亚洲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绝对不能相提并论，即使在16世纪20年代，查理就将奥地利世袭领地以及新获得的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朝政大权和君权让给其弟斐迪南。这就承认了，远在查理自身退位之前，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继承权不可能由同一个人有效地管理。尽管这样，其他诸候和公国并不是这样看待哈布斯堡这种强有力的权力集中的。对法国的瓦罗亚王朝[1]的国王来说（这些国王是在巩固他们自身的内部权力后就位的，他们急于将这种权力扩展到富饶的意大利半岛），查理五世的领地似乎包围法国的公国，而且可以几乎毫不夸张地说，在以后的200年间，法国的主要目标是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的影响。同样，那些为反对皇帝在德国本身拥有任何实权而进行长期斗争的德国的诸侯和选帝侯，当他们看到查理五世的地位得到许多其他地方的支持，从而使他当时得到资源以贯彻自己的主张时，都不由得感到惊恐。很多教皇也讨厌哈布斯堡王朝这样集中权力，即使为了对付土耳其人、路德教徒和其他敌人，往往需要集中权力。

在欧洲的公国体制普遍存在对抗的情况下，哈布斯堡王朝不可能不受到挑战。使发生冲突的潜力变为严酷的和长期的现实，则是这种冲突与宗教改革运动产生的宗教之争的结合。因为事实上，在这一个半世纪中，哈布斯堡王朝的最杰出的和最强有力的皇帝查理五世本人和他的继承者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以及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1556～1598年）和腓力四世（1621～1665年），在保卫天主教的教义中态度也很强硬。因此，将强权政治与这个时期给欧洲大陆带来灾难的欧洲对抗中的宗教派别分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正如当时任何人都能意识到的那样，

[1] 瓦罗亚（Valois）：法国封建王朝（1328～1589年）。——译者注。

如果查理五世在16世纪40年代能成功地制服德意志的新教诸侯的话，不仅会是天主教信仰的胜利，而且也将是哈布斯堡影响的胜利。而腓力二世在1556年以后平息尼德兰的宗教纷乱中所作的努力就产生了同样的效果。而就这一点而言，1588年派遣西班牙舰队进犯英国，也产生了这样的作用。总之，当时国家间的对抗和王朝间的对抗与宗教狂热结合在一起，这种宗教狂热促使本可以相互妥协的人们继续搏斗。

即使这样，选用"哈布斯堡王朝争夺霸权"这一标题来叙述从1519年查理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身份即位到1659年西班牙签订《比利牛斯和约》承认失败这段时间的事件，显得有点儿勉强。很显然，他们的敌人确实相信，哈布斯堡历代皇帝决心进行专制统治。因此，伊丽莎白时代的作者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在1595年把"西班牙的野心和压迫行为"描绘得很可怕：

> "法国被打倒，……葡萄牙被篡权，……向北海沿岸的低地国家[1]开战，……当时企图对阿拉贡王国进行类似的活动，……贫穷的印度人从自由民沦为奴隶。"

尽管当时哈布斯堡有些大臣有时谈论"世界君主国"，但他们没有拿破仑和希特勒那样的统治欧洲的明确计划。哈布斯堡王朝的有些婚姻和王位继承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充其量是有人授意的，但不足以证明有扩充版图的长期计划。例如，在法国频繁侵犯意大利北部等某些例子中，哈布斯堡统治者与其说激怒他人，不如说被他人激怒。16世纪40年代以后，在地中海地区，东山再起的伊斯兰教的作战行动使西班牙部队和帝国的部队一再处于防御地位。

尽管这样，事实仍然是，如果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达到了

---

1 The Low Countries：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译者注。

他们全部有限的地区性目标，即使达到他们的防御性目标时，欧洲的控制权实际上是属于他们的。奥斯曼帝国本来是可以沿着北非海岸被击退和撵出东地中海水域的。在德国境内，异教就会遭到镇压。尼德兰起义就会被粉碎。友好的政权便可以在法国和英国继续保留。斯堪的纳维亚、波兰、俄罗斯和仍然由奥斯曼统治的领地就不会纳入哈布斯堡的管理权限和势力范围，而与此同时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就不会取得胜利。尽管欧洲当时还未达到明代中国那样的统一，由马德里和维也纳这两个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心同意的政治原则和宗教原则是可以大大削弱长期以来构成欧洲大陆的最主要的特点——多元化的。

这一个半世纪的战争年表可在与本书类似的分析著作中进行简要的总结。比各种战役（帕维亚和吕岑战役等）的名称和结局远能引起现代读者注意的也许是连篇累牍的争端冲突。反对土耳其的斗争继续了几十年；西班牙企图镇压尼德兰起义的战争从16世纪60年代延续到1648年（其中只有短暂的间歇），有些论著称其为“八十年战争”；从1618年开始到1648年缔结《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结束的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与敌对公国的一系列同盟之间的对抗的多方面的大规模冲突，一直被称为“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显然非常强调不同国家的年复一年、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承担战争负担的相对能力。恰恰是这个时期的“军事革命”改变了作战的性质，而且战争耗费的费用比历来高得多这一事实，使得战争的物质基础和财力基础的重要性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里简要地说明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这种变化的主要特点。但即使在简要介绍这些事件之前也需要明白，从投入的费用和人力来看，16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的军事冲突，与17世纪30年代的军事冲突相比，看来规模很小。

首先介绍的一系列重要战争主要在意大利进行，意大利的富裕的和易受攻击的城邦对法国的一些君主有诱惑力，使他们早在

1494 年就入侵了意大利，而且同样可以预料，这些城邦组成了各种敌对大国的同盟（西班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甚至还有英国）迫使法国撤出意大利。在 1519 年，当查理五世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由他统一继承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领地和奥地利领地这一消息传来时，西班牙和法国仍在为法国声称有权得到米兰而争吵不休。法国的主要对手查理五世集这样多的称号于一身促使野心勃勃的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1515～1547 年）不仅在意大利本身，还在沿着勃艮第、南尼德兰和西班牙的边界煽动一系列的对抗。法兰西斯一世亲自率兵入侵意大利以失败告终，并在帕维亚战役（1525 年）中被俘。而在以后的 4 年内，这位法国国王再次率军入侵意大利，又被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打败。尽管根据 1529 年的《康布雷和约》，法兰西斯再一次放弃了对意大利的要求，但是为了争夺这些领地，他在 16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仍与查理五世不断交战。

在当时法国和哈布斯堡领地的力量对比不平衡的情况下，对查理五世来说，不断阻止法国的扩张企图也许不太困难。可是，因为查理五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象其前任一样，还有很多别的敌人，因此这项任务就变得更加艰巨。其中最强大的敌人是土耳其人，他们的版图在 16 世纪 20 年代时不仅扩展到匈牙利平原（并于 1529 年包围维也纳），而且在海上对意大利构成威胁，此外，还与北非的巴巴利海岸地区的海盗船串通一气，骚扰西班牙自身的海岸。而且使这一形势越发严重的因素是，在这几十年里，奥斯曼的苏丹和法兰西斯一世暗中结成的非神圣的反哈布斯堡同盟：实际上在 1542 年，法国和奥斯曼的舰队联合起来对尼斯发起攻击。

查理五世面临的另一个严重困难是在德国，德国被宗教改革运动搞得四分五裂。路德在德国对旧制度的挑战，当时得到由新教各诸侯国组成的同盟的支持。从查理五世遇到的其他问题可以

看出，查理五世在16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不能集中精力对付路德在德国的挑战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当他集中精力对付路德的挑战时，最初他相当成功，尤其是在1547年的缪尔贝格战役中打败了主要的新教诸侯的军队。但是哈布斯堡权力和皇权的任何增强总是使查理五世的敌人吃惊，因此德国北部的诸侯、土其人、法国的亨利二世（1547～1559年），甚至罗马教皇都努力削弱他的地位。到1552年，法军已进入德意志，支持新教国家，这些国家因而能抵制帝王的中央集权倾向。《奥格斯堡宗教和约》（1555年）、《卡托·堪布雷奇和约》（1559年）确认了这一点，前一个和约使德意志的宗教战争暂告一段落，后一个和约使法国和西班牙的冲突告终。查理五世本人退位本身也确认了这一点——1555年由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一世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55～1564年）和在1556年由查理五世之子腓力二世（1556～1598年）继承西班牙国王。如果说在这个时期之后，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旁支仍保持密切的关系，那么当时的情况，正如历史学家马玛泰所说："此后，哈布斯堡王朝像披着帝国战袍的双头黑鹰，在维也纳和马德里分别有一个头遥望东方和西方。"

在斐迪南一世及其继承者马克西米连安二世（哈布斯堡王朝皇帝，1564～1576年）统治下的东方旁支得到相对和平（1566～1567年间土耳其的一次进攻除外），而在西班牙的腓力二世统治下的西方旁支却运气不佳。巴巴利沿岸的海盗船攻击葡萄牙和卡斯提尔的海岸，而且继他们之后，土耳其人恢复了其争夺地中海地区的斗争。结果，西班牙一再与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进行一些新的重大的战争，其中有1560年的向吉尔巴岛的远征，1564年的马耳他激战，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和在突尼斯的激战，直到1581年停战。而实际上，在同一时期，腓力在宗教上排斥异己和增加税收的政策激起了哈布斯堡王朝所辖的尼德兰的不满，终于酿成公开的起义。到了16世纪中叶西班牙王权在那里日趋衰

败，针对这种局面一支由西班牙将领阿尔巴公爵率领的部队被派往北方，强制推行军事专制统治，结果激起荷兰的四面环海的有防御力的荷兰省和泽兰省的全面反抗，而且使英国、法国和北德意志对西班牙的意图也感到恐慌。当1580年腓力二世以其侨民和舰队并吞毗邻的葡萄牙时，英国人更加不安。然而，同哈斯堡王朝的所有其他的维护（或扩大）自己权力的企图一样，可以预料到的结果是他们的很多对手感到不得不干预，以免力量均势变得更加混乱。到16世纪80年代时，原先存在的荷兰新教徒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地区性反抗，发展成新的国际斗争。在尼德兰本身，包围和反包围的战争在继续，但未产生引人注目的后果。在英吉利海峡彼岸的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已制止了危及其统治的任何内部（得到西班牙或教皇支持）的威胁，并从军事上援助荷兰起义者。在法国，君主制的削弱已导致爆发激烈的宗教内战，得到西班牙支持的天主教联盟与其对手，即得到伊丽莎白和荷兰人支持的法国胡格诺派[1]，为争夺霸权而斗争。在海上，荷兰和英国的私掠船中断了西班牙通往尼德兰的供应通路，并使战火扩大到西非和加勒比海。

在斗争的某些阶段，尤其在16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看上去似乎强大的西班牙攻势要获得胜利。例如，1590年9月，西班牙军队在朗格多克和布列塔尼作战，杰出将领帕尔马公爵率领的另一支军队由北向巴黎进发。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压力下，反西班牙的部队仍固守阵地。对法国王位提出要求，而自身有超凡魅力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那瓦尔的）亨利采取了十分灵活的态度。他放弃新教信仰，改信天主教，使更多的人支持他的要求，而且后来领导越来越多的法国人民反对入侵的西班牙人和

[1] 胡格诺派：法文Huguenots的音译，一般认为出自德文Eidgenossen，意为“结盟者”。系16至18世纪时法国新教徒的称呼。——译者注。

声名狼藉的天主教联盟。到了 1598 年，双方签订《维尔芬和约》——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殁于这一年——马德里同意放弃对法国的一切干涉。那个时期，伊丽莎白统治的英国也很太平。1588 年西班牙进攻英国时的无敌舰队和西班牙后来的两次入侵企图，都遭到了惨重失败。这同西班牙力图利用在爱尔兰举行的天主教叛乱一样，由于伊丽莎白的军队一再坚决镇压，叛军被征服了。腓力二世和伊丽莎白均卒于 1604 年，西班牙和英国在这一年达成和解。马德里和荷兰起义者媾和到 1609 年停战又用了 5 年时间；而早在这以前，无论从海上进攻或者通过（纳索的）摩里斯[1] 率领的战斗力很强的荷兰部队牢牢掌握的陆上（和水上）防御，西班牙的军事力量都已显然不足以击败尼德兰。法国、英国和荷兰的联省共和国这三个国家都有力量在今后对哈布斯堡王朝提出挑战，而这三国的继续存在再次表明，公元 1600 年的欧洲将要由很多国家组成，而不是由一国称霸。

1618 年以后出现了震撼这个时期的欧洲的第三次战争热潮，这些战争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在 16 世纪末，德意志免去了一场需要付出全部力量的忏悔斗争，而这不过是因为鲁道尔夫二世[2] 的权力在削弱，也由于他比较明智，同时还因为土耳其重新在多瑙河流域构成了威胁（1593～1606 年）。在德意志表面统一的后面，敌对的天主教力量和新教力量正在谋划巩固自身的地位和削弱对手的地位。17 世纪开始时，德意志的福音派新教会联盟（1608 年成立）和天主教联盟（1609 年成立）之间的对抗加剧。再者，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大力支持其在奥地利的贵族，而且由于福音派新教会联盟的首领、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四世与

---

①摩里斯（Maurice of Nassau，1567～1625年）：联省共和国的执政和统帅。——译者注。

②鲁道尔夫二世（Rudolf Ⅱ，1576～1612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英国和尼德兰都有联系，看来欧洲多数国家都井然有序地等待他们之间的政治和宗教对立的最终解决。

新教的波希米亚领地于1618年反对新的天主教统治者斐迪南二世（神圣罗马帝国哈普斯堡王朝皇帝，1619～1637年在位）的起义又燃起了一系列激烈的斗争之火，即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在这场战争的早期阶段，在斯帕诺拉将军率领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的大力支援下，皇帝的军队战事进展。但是，结果是宗教和世俗力量一起卷入这场冲突，再次渴望向相反的方向调整力量对比。到1621年，荷兰人在结束了与西班牙于1609年所达成的停战协议，进入莱茵兰地区与斯帕诺拉的军队抗衡。1626年，丹麦军队在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率领下从北部侵犯德国。法国有影响的政治家、枢机主教黎塞留不管到哪里，只要可能就设法给哈布斯堡王朝制造麻烦。但所有这些外交上或军事上的对抗都不很成功。到17世纪20年代末，斐迪南皇帝得力的华伦斯坦统帅似乎在德意志，乃至北到波罗的海沿岸就要推行全面的中央集权制度。

但是这样迅速地积聚帝国的力量只能促使哈布斯堡王朝的很多敌人进行更激烈的反抗。在17世纪30年代初，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敌人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引人注目的和有影响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多夫斯二世（1611～1632年），他的训练有素的军队于1630年进入了北德意志，翌年南下德意志莱茵兰地区和巴伐利亚。尽管古斯塔夫本人于1632年在吕岑战役中受伤阵亡，但这决没有减少瑞典对德国，或者实际上对战争的各个方面的重大影响。相反，到1634年，在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1621～1665年）及其有才干的老首相奥里瓦列斯伯爵–公爵统治下的西班牙人决定比以前更彻底地援助其在奥地利的贵族，但是，强大的西班牙军队在其将领枢机主教–亲王的率领下出兵进入德意志的莱茵兰地区，反过来又迫使黎塞留决定法国直接进行干预，并于

1635 年命令部队越过各边界。多年来，法国早已是反哈布斯堡王朝同盟的不露声色的、间接的盟主，资助所有与帝王的部队和西班牙部队作战的力量。当时冲突已经公开，各同盟开始动员更多的部队、武器和资金。措辞相应变得更加强硬。奥里瓦列斯在 1635 年计划翌年第三次入侵法国时写道："要么同归于尽，要么卡斯提尔在世界上称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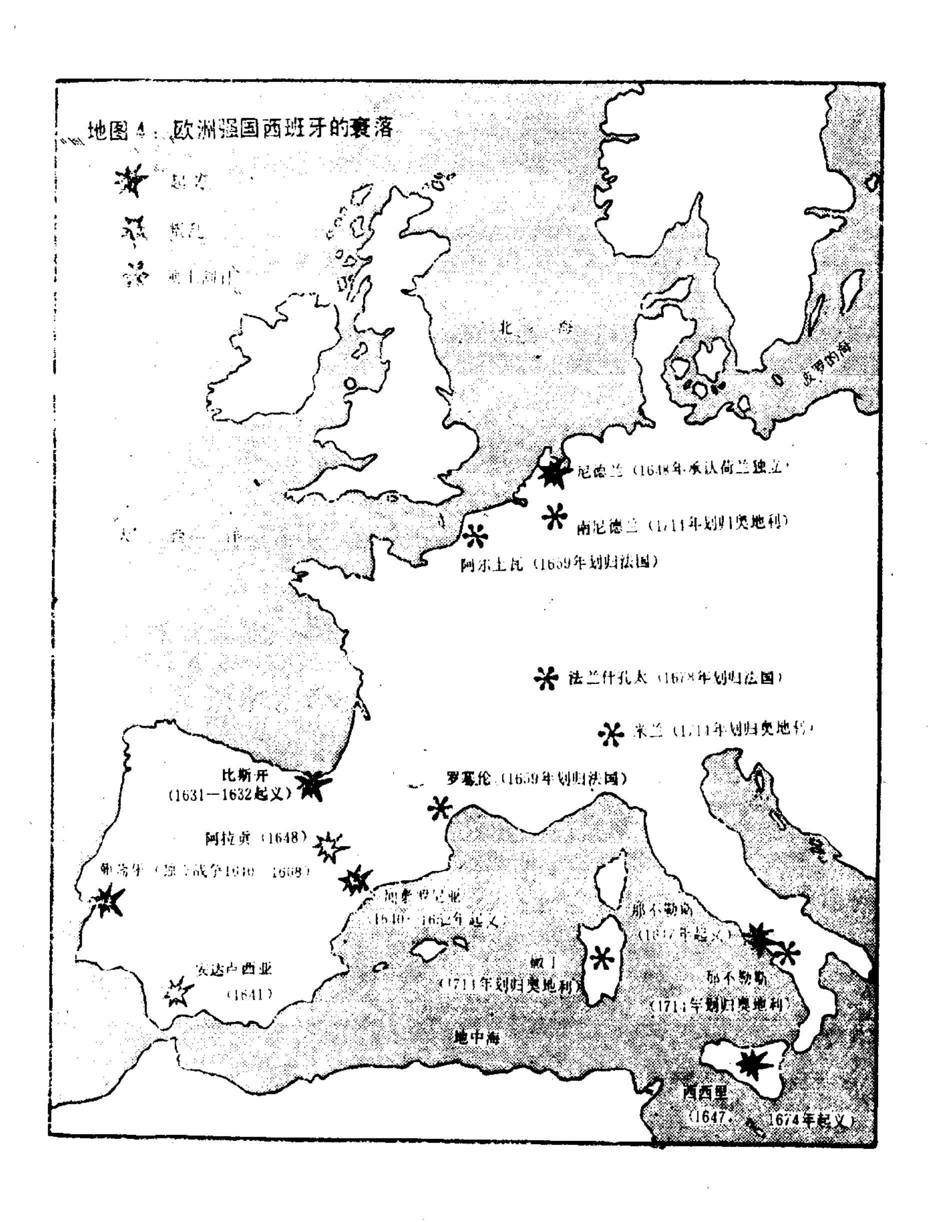
可是，征服象法国那样大的地区，哈布斯堡军队的军事能力是难以达到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曾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逼近巴黎，但很快就难以往前推进跨越欧洲。瑞典和德国的军队在北部攻击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荷兰人和法国人对西属尼德兰展开"钳形攻势"。再者，1640 年葡萄牙人起义促使西班牙将部队和资源从北欧持续不断地转移到靠近本国的地区，尽管这些部队和资源对于实现伊利比亚半岛的统一来说还很不够。实际上，与法国积极支持的西班牙东部的加泰隆人的叛乱同时，西班牙的中心地带在 17 世纪 40 年代初期，存在着瓦解的危险。荷兰的海上远征队在国外袭击巴西、安哥拉和锡兰，将冲突变为有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首次全球性战争。如果说，荷兰的海上远征队的行动使尼德兰受益的话，那么当时多数的其他交战国却承受着长期沉重的军事负担。17 世纪 40 年代比起 30 年代军队的规模逐渐减小。政府的财政困难更加严重，人民忍无可忍；他们的抗议行动日益激烈。而在这场斗争中，因参战国彼此联系很紧，因此，任何一国都难以脱身。如果德意志的很多新教诸侯确信瑞典军队也想停战回国的话，他们肯定会退出战斗的。奥里瓦列斯和西班牙的其他政治家本来是可以与法国媾和的，但是法国不愿意抛弃荷兰。在各条战线，战役在继续进行，而同时各层次都在进行秘密谈判。各大国都用再打一次胜仗就会得到对自己在全面和解中提出的要求的支持这一想法来自我安慰。

因此，结束三十年战争仍然是茫无头绪。西班牙于 1648 年

初突然与荷兰人媾和，最终承认荷兰完全独立；但是这样一来，使法国失去了一个盟国，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又继续了下去。后来在 1648 年缔结《威斯特发里亚和约》时最终使德国恢复和平，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得以退出这场冲突，于是这场冲突完全成为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斗争。各领地和诸侯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也受到一定的损失），《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的本质是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内的宗教和政治平衡的，因此确认了对王权的种种限制。这样一来，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完全成了国家之间的对抗，而与宗教无关，继黎塞留之后任法国首相的马萨林在 1655 年与克伦威尔统治的信奉基督教的英国结盟，以打击西班牙人，终于使之同意媾和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比利牛斯和约》（1659 年）的条件并不特别苛刻，但法国通过迫使西班牙与其头号敌人达成协议则表明，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称霸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那时对法国腓力四世的政府来说，作为"战争目标"留下的全部问题是保持伊比利亚半岛的统一，而当 1668 年正式承认葡萄牙独立时，甚至连这个目标也不得不放弃。因此，欧洲大陆继续保持 1519 年查理五世即位时的各自为政的局面，尽管西班牙本身到 17 世纪末的国内又出现一些起义，并失去领地（见地图 4）——可以说，为其原来战略扩张付出了代价。

二、哈布斯堡集团的强项和弱项

哈布斯堡王朝为什么失败？这个问题很大，而且这个过程很长，因此没有必要从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的疯狂性，或者从西班牙王国腓力三世的无能去寻找个人的原因。而且当人们考虑到当时许多法国和英国国王的失败，以及德国某些诸侯的贪污受贿或愚蠢无能时，就很难断言哈布斯堡王朝及其大臣的缺点特别突出了。当人们在研究哈布斯堡王朝拼命地



地图4：欧洲强国西班牙的衰落
北海
波罗的海
尼德兰（1648年承认荷兰独立）
南尼德兰（1711年划归奥地利）
阿尔土瓦（1659年划归法国）
法兰什孔太（1678年划归法国）
米兰（1711年划归奥地利）
罗塞伦（1659年划归法国）
比斯开
（1631—1632起义）
阿拉贡（1648）
安达卢西亚
（1641）
那不勒斯
（1647年起义）
撒丁
（1711年划归奥地利）
那不勒斯
（1711年划归奥地利）
地中海
西西里
（1647、1674年起义）



集重要权力于一身时，看来这越发是一个难解之谜：

> 查理五世继承卡斯提尔、阿拉贡、勃艮第和奥地利等四个主要王朝的王权和他的王室后来得到的波希米亚、匈牙利和葡萄牙的王权甚至一度也得到过英国的王权，而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西班牙征服和开发了新世界。这一切使哈布斯堡王朝拥有富庶的资源，其他欧洲国家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在可以得到的统计数字中存在很多差距和不精确的问题，人们不应过分依赖当时的人口统计数字。但完全可以假定，近代早期的欧洲，约有 1/4 的人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领土生活。而这个粗略的人口总数① 与上述地区的财富相比，不那么重要，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了大量的财富。

哈布斯堡王朝的财政看来有 5 个主要来源和很多的次要来源。其中以西班牙的卡斯提尔遗产为最重要，因为卡斯提尔由王朝直接统治，而且由议会和教会定期向王权交纳各种税收（如销售税、宗教财产"十字军"税等）。此外，欧洲还有两个最富庶的贸易地区，即意大利的城邦和北海沿岸的低地国家，这两个地区可从其商业财富和流动资金中提供比较大量的资金。第 4 个财政来源是从美洲帝国得到的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笔收入越来越重要。美洲的银矿和金矿这个"王室的第五财源"，加上新世界的销售税、关税和教会征税，不仅直接地而且间接地给西班牙国王提供了额外的收入，美洲的财富则落入西班牙人、佛拉芒人或意大利人等个人手中，帮助这些个人和公司支付越来越重的国家税收，而且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一俟运银的船队到达，国王总可以向银行大量借款，以期清偿债务。哈布斯堡领地没有一些主要

---

①在公元1600年，据粗略的估计，欧洲约有1.05亿人口，哈布斯堡王朝约有2500 万人口。

的银庄和商号，即设在南德、意大利的某些城邦以及安特卫普那些钱庄和商号，可以看作又一个有利条件，并可当作第5个主要财源。得到这笔收入，比得到德意志的收入容易。而在德意志，在帝国的国会中有其代表的诸侯和自由市，只是在土耳其人大兵压境时才投票同意将钱交给国王。

而在这个已结束封建制度的时期，既不能再指望骑士团承担个人的兵役（至少在多数国家如此），也不能指望沿海城镇提供一艘船只，而对参战的任何国家来说，拥有现金和可靠的信贷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通过直接支付（或者承付），才能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调拨必要的船只和海军补给品以及武器和食品，以供给一支准备参战的舰队；只有经常地提供给养和薪给，才能使部队避免兵变，并使部队全力对付敌人。此外尽管这个时期"民族国家"概念在西欧受到重视，各国政府却都非常依赖外国雇佣军来扩充自己的实力。在这方面哈布斯堡王朝又一次得益，因为他们不仅在西班牙和德国而且在意大利和北海地区低地国家也很容易补充兵员；例如，著名的佛兰德斯军队由6个民族组成，他们相当地忠于天主教教主，但仍然需要固定工资。就海军而言，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了一支颇为壮观的作战舰队：例如，在腓力二世执政晚期，地中海的军舰、热那亚和那不勒斯的大帆船以及葡萄牙的舰队可以增援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舰队。

在这140年间，哈布斯堡王朝拥有的最大军事优势可能是由西班牙人训练的步兵。想象中的社会结构和气候使卡斯提尔成为补充兵员的理想场所。林奇指出，在那里，"当兵不仅对上流社会人士，而且对所有的人都成为一种时髦的和有利可图的职业"。此外，"大将军"科尔多瓦在16世纪初已着手改变步兵编制，此后到三十年战争中途，西班牙的**步兵团**是欧洲战场上战斗力最强的作战单位。这些合成部队最多有3000名长矛兵、刀剑兵和火绳枪兵，并受过相互支援的训练；西班牙军队清除了无数的敌人，

而使法国骑兵和瑞士长矛兵方阵的声望和战斗力大大下降。到1634年的内德林根战役，枢机主教-亲王的步兵抵住了强大的瑞典军队的15次进攻，尔后像威灵顿的部队在滑铁卢战场上那样，为打垮敌人坚定地向前推进。1634年，西班牙人尽管在洛可瓦会战中被法军包围，仍拚死战斗。西班牙军队确实是哈布斯堡这座大厦的有力支柱之一。很重要的一点是，西班牙这个大国只是到17世纪中叶才明显崩溃，当时，西班牙军队主要由德国、意大利和爱尔兰的雇佣兵组成，卡斯提尔士兵少得多。

西班牙-奥地利王朝的同盟，尽管拥有这些优势，但决不可能取胜。尽管当时人们看起来，这个同盟拥有大量的财政资源和军事资源，但绝对满足不了需要。这本身是一个重大的缺陷，造成这个缺陷有3个方面的因素，在整个时期，这3个因素互相制约，而且从广义上说，这3个因素为研究武装冲突提供了重要的教训。

其中，第一个因素，上面已简要地谈到，这就是现代初期的欧洲的“军事革命”，这就是说，在16世纪20年代以后的大致150年中发生的战争，其规模、费用和编制都大幅度地增加。这种变化本身是战术、政治和人口统计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造成的。骑兵在战场上的优势先后遇到瑞士长矛兵以及身带长矛、短剑、石弓和火绳枪的士兵的混合部队的打击，这意味着这支军队的数量最大和最重要的部分是当时的步兵。意大利人足迹的发展和上一章谈到的城市要塞和堡垒组成的复杂系统进一步充实了这个结论。给这类防御系统配备人员，或者围攻这类系统需要大量的部队。当然，组织能力很强的指挥员在重大战役中会成功地运用数量众多的骑兵和炮兵，但这两个兵种远没有步兵那样普遍。那时，各国不削减骑兵力量但是将军队中的步兵比例明显增加，装备和供应步兵的费用较低，尤其在欧洲人口增加之后，可招募大量的步兵。当然，所有这一切使政府在编制建制上承受沉重的

负担，但并没有大到必然压垮西方的“新君主制”的官僚政治的程度。这与军队数量剧增未必使将领无法执行任务一样，只要这位将领率领的部队指挥结构完善，而且部队训练有素的话，任务照样可以完成。

西班牙帝国的军队也许提供了实际行动中“军事革命”的最好的例子。正如西班牙帝国的历史学家指出的，“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在1529年以前的法国和西班牙争夺意大利的斗争中，“一个国家能部署3万多名作战成员”。

> *从1536到1537年，查理五世仅在伦巴第一地就动员了6万人，为了保卫其新近征服的米兰，和为了侵犯法国的普罗旺斯。1552年，查理五世在意大利、德国、尼德兰、西班牙，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等各条战线上同时进攻出击，在德国和尼德兰招募了10.9万人，在伦巴第招募了2.4万余人，而在西西里、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招募的人数还要多。这位国王谅必当时掌握并资助15万人。人数继续趋于增加。在1574年，仅西班牙的佛兰德斯军队就有8.6万人，而仅半个世纪以后，到了1625年，腓力四世可以自豪地宣布，由其指挥的军队不少于30万人。在所有这些军队中，人数真正增加的是步兵，尤其是长矛兵。*

陆地上出现的变化与海洋上出现的变化基本上类似。海上贸易，尤其是海洋彼岸的贸易的发展，在英吉利海峡、印度洋，或西班牙的美因河附近海上的敌对舰队之间的对抗，巴巴利海盗船和奥斯曼的舰队造成的威胁，所有这一切与造船新技术互相影响，结果战舰越来越大，船上的军事装备越来越好。这个时期，在战舰和商船之间没有严格的分界线；实际上，所有较大的商船都装有火炮，以击退海盗和其他掠夺者。但当时存在一种建立皇家海军的趋势，因此帝王至少拥有很多的常备战舰，到战争时可

以以此为核心组织起武装商船、三桅军舰和小帆船，建成庞大的舰队。英国的亨利八世大力支持这项计划，而查理五世企图征用其西班牙和意大利领地的私人大型帆船和划船，而不是建立自己的海军。腓力二世在地中海承受的压力比在大西洋大得多，因而不能那样自在，他必须组织和资助一项在巴塞罗那、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建造大型划船的庞大计划；到 1574 年，在他的支持下共制造了大型帆船 146 艘，这个数量约比 12 年前多两倍。以后 10 年在大西洋爆发的战争需要在那里作出更大的努力；需要用远洋战舰保护通往西印度群岛之路和（在 1580 年葡萄牙被并吞[1]之后）通往东方之路，以保护西班牙的海岸线不受英国的袭击，并最后将入侵的军队运往不列颠群岛。在 1604 年英国和西班牙媾和之后，西班牙仍然需要用庞大的舰队来对付荷兰人对公海的攻击，并与佛兰德斯保持联系。而且在几十年间，这些战舰军事装备日益增多，而且价格日益昂贵。

战争费用的不断上升暴露了哈布斯堡体制的真正弱点。在公元 1500 年到 1630 年期间，在通货膨胀的刺激下，食品价格增长 5 倍，工业产品的价格增长 3 倍，通货膨胀使政府的财政受到很大的打击；而且这种打击由于陆军和海军的规模一再翻番而变得更加严重。结果，哈布斯堡王朝几乎不断为提高偿债能力而斗争。查理五世在 16 世纪 40 年代经历了与阿尔及尔、法国和德国的新教徒对抗的数次战役之后发现，他的经常性收入加上额外收入不可能与支出平衡，而他已以他的收入向银行家作了几年以后的抵押。只有通过没收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和搜掠西班牙的现金等极其严厉的措施，才能筹集到支持与新教诸侯进行的战争费用。在 1552 年的梅斯的一场战役中，查理五世就花费了 250 万杜卡

①1581年葡萄牙议会同意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兼任葡萄牙国王，称费利佩一世，允诺葡萄牙保留自治权。——译者注。

特①，这笔费用约为这位帝王从南北美洲得到的正常收入的 10 倍。难怪他不得不一再借新债，但条件总是更加苛刻；随着国王的信用下跌，银行家收取的利率不断上升，因此多数经常性收入被用来支付以往债务的利息。当查理退位时，他给腓力二世留下约 2000 万杜卡特的债务。

腓力还继承了与法国的战争状态，而这场战争的费用如此之大，以致于到 1557 年时，西班牙国王只好宣布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富格尔家族② 等大银行也只得让步。而法国在同年被迫承认破产，这成了双方同意在 1559 年在卡托·堪布雷奇议和的主要原因。这对腓力是个小小的安慰，因为当时腓力要立即对付土耳其这一强大的敌人。长达 20 年的地中海战争，与格拉那达的摩尔人的战役，以及在尼德兰、法国北部和英吉利海峡的彼此相联的军事行动，迫使国王搜寻各种收入的来源。查理五世在执政期间，其收入增加了两倍，而腓力二世在 1556～1573 年期间就使收入翻了一番，到他结束统治时，收入又增加了一倍多。

然而，腓力二世的支出比收入大得多。据估计，在 1571 年的勒班陀战役中，基督教舰队和士兵每年给养高到 400 多万杜卡特，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由威尼斯和罗马教皇分担。到 16 世纪 70 年代时，付给佛兰德斯军队的费用已经很大，而且几乎总是过期付给，这反过来又会引起部队兵变，腓力于 1575 年对热那亚的一些银行家暂停付款后，这种情况尤为突出。源源不断来自美洲矿山的收入大得多（到 16 世纪 80 年代时，约为 200 万杜卡特，而 40 年前只有 1／10），在财政上和信用上暂时帮了国王的忙；但是 1588 年的舰队花费了 1000 万杜卡特，而其悲惨的结局

---

①杜卡特（Ducat）：硬币名，多为金质，也有银质。——译者注。

②富格尔家族（Fngpers）：15至17世纪，德意志最大的工商业和高利贷家族。——译者注。

不仅是海军力量的失败而且是财政上的一场灾难。到 1596 年，在流动贷款汇率高达惊人的地步之后，腓力又一次债台高筑。在二年后腓力去世时，他的债务高达 1 亿杜卡特，这笔债务的利息约占其总收入的 2／3。尽管后来很快与法国和英国媾和，与荷兰进行的战争一直持续到 1609 年停战为止。西班牙军队兵变和在 1607 年国王进一步丧失偿还债务能力提前促成了停战。

在后来出现和平的几年间，西班牙政府的开支没有明显减少。除了需要大量付息，在地中海地区仍存在紧张状态（还需要有一项建造沿海设防阵地的雄伟计划），而且辽阔的西班牙帝国仍受到私掠船的劫掠（这需要投入大量的防务费用，加强在公海和菲律宾群岛及加勒比海的舰队）。1610 年以后在欧洲存在的武装停火状态很难使西班牙的高傲的领导人想到削减武器开支。因而在 1618 年爆发三十年战争是将冷战变为热战，并将越来越多的西班牙军队和费用送往佛兰德斯和德国。令人感到兴趣的是，哈布斯堡王朝早期在欧洲所获得的胜利，和这一时期成功地保卫南北美洲，都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同时期来自新世界的白银大量增加而得到援助。同样，在 1626 年以后，财政收入的减少，翌年的宣告破产以及荷兰在 1628 年抢劫运银船队的巨大成功（使西班牙及其居民损失 1000 万杜卡特），使得战争暂时停止。而尽管与皇帝结盟，德国的收入仍无法（华伦斯泰的短暂控制时期除外）弥补西班牙的费用的不足。

因而，这就是西班牙后来 30 年应付战争的模式。通过凑集新贷款，征得新税收和利用从南北美洲得到的横财，可以支持像枢机主教-亲王 1634～1635 年干预德国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但是难以承担的战争费用最后总是耗尽这些短期的收入，而且在此后的几年内，财政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糕。到 17 世纪 40 年代，由于加泰罗尼亚农民起义和葡萄牙起义的结果，以及美洲财富的大量减少，收入不可避免地长期缓慢地下降。一个国家，

尽管可以提供数量可观的兵员，但它在政府的指导下，开支总是比正常收入高出2到3倍，那么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西班牙和奥地利失败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应该从以上论述中看得很清楚：哈布斯堡王朝的确要做的事太多，与其作战的敌人太多，要保卫的战线太多。西班牙部队在战斗中表现很勇敢，但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也无济于事，即这些部队必须分散部署在本国的要塞、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新世界以及尼德兰。与三个世纪以后的大英帝国相似，哈布斯堡集团是非常分散的领地的联合体，一种政治王朝的力作。它的存在需要大量的、源源不断的物质力量和创造才能。因此，哈布斯堡集团成为历史上实行对外扩张战略的最好示例之一；因为占有这样多的领土的代价是树敌很多，而这个负担也需要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负担。

与此有关的是哈布斯堡战争年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欧洲在这个时期的冲突肯定很频繁，而战争的消耗是所有社会的沉重负担。而法国、英国、乃至奥斯曼帝国等很多国家都曾有过相当一段和平和恢复的时间。而哈布斯堡王朝，尤其是西班牙的命运则是将一场与某个敌人对抗的斗争立即转变为与另一敌人对抗的新的冲突；继与法国媾和之后又与土耳其人开战；实现地中海停火之后接着在大西洋出现持久的冲突，以及为争夺欧洲的西北部而进行的战争。有时更糟糕，西班牙帝国同时在三条战线上作战，而且西班牙的敌人有意在外交上和商业上（即使不是军事上）相互帮助，用当代人的话来说，西班牙就象一头掉进陷井的大熊，它比任何攻击它的狗都强大，但绝对不可能对付所有的对手，而且在斗争的过程中逐渐精疲力竭。

而哈布斯堡王朝怎么能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呢？历史学家指出，应缓慢耗散能量，并提出查理五世及其继承者应当明确规定一系列的防御重点。而这意味着，一部分地区可以动用资金，可是是哪些地区呢？

通过回顾，人们可能会说，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尤其是斐迪南二世，如果在德意志北部不推行反宗教改革运动，也许更明智些，因为这场运动得不偿失。而哈布斯堡王朝皇帝本来仍然需要在德意志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以制止诸侯的排他主义、法国的谋反和瑞典的野心；只要土耳其人反对离维也纳只有150英里的匈牙利，哈布斯王朝的武装力量就不可能减少。对西班牙政府来说，它本来是可以不假借法国人或路德教徒之手，也不假借土耳其人之手，而使其奥地利的贵族让位的，由于这样做对西班牙在欧洲的地位也许会产生某些后果。而这样的分析反过来似乎不适用。在1556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退位以后，哈布斯堡帝国总觉得不一定要帮助马德里在西欧和海外所进行的一些战争；但是，西班牙意识到要下更大的赌注，答应对哈布斯堡帝国效忠。这种感情上的距离和承担义务的诺言所产生的长期效果是很有趣的。到17世纪中叶时哈布斯堡的西班牙未能实现其在欧洲的目标，这显然与其内部问题以及经济的相对衰退有关；它在所有各方面都过于紧张，当时它内部确实很虚弱。而另一方面，以哈布斯堡的奥地利为例，尽管它未能打败德国的新教，但它确实巩固了王朝拥有的领地（奥地利、波希米亚等）的权力，以致于哈布斯堡帝国以这样的大片的领土为基础，并利用后来创建的职业常备军，在西班牙正在进入一个更加急剧衰退的情况下，能在17世纪的后几十年间再次以欧洲大国的面目出现。而到那个时期，奥地利的恢复几乎不可能会使马德里的政治家感到，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向别处寻找盟国。

不难看出，对西班牙来说，为什么新世界的领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区。这些领地在一个多世纪中，使西班牙的财富及其军事力量得到经常的补充，而没有这种补充，哈布斯堡的力量是不可能在这么大的范围内保持住的。即使当英国和荷兰攻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帝国需要不断增加海外舰队和要塞的费用时，西

班牙国王仍然从这些领地中直接和间接地得到大量的收益，放弃这些财富是不可思议的。

因而需要考虑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的领地。在这两个领地中，撤出意大利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在16世纪的前50年，法国人会在那里填补大国真空，利用意大利的财富达到自身的目的，而对哈布斯堡王朝不利。在16世纪的后50年，在面临奥斯曼帝国向西扩张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说，意大利是确保西班牙自身安全的外部堡垒，姑且不论西班牙的声誉受挫，以及由于土耳其人攻击西西里、那不勒斯和罗马，基督教遭受的打击，意大利这个堡垒的失守，本来会构成战略上的重大挫折。因而西班牙那时本该在加强沿海要塞和舰队方面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而这总而言之会耗费腓力二世统治初期几十年更多的军备预算。因此，将这些现役部队投入地中海中部地区的积极防御有着重大的军事意义，因为这样可以使土耳其敌军始终隔开一段距离；而这样做还有一个优点，这就是这类战争的费用可以由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的领地和教皇分担，而且有时还可由威尼斯分担。撤离这条战线毫无好处，还会带来很多潜在的危险。

那么，如果排除这种可能性，尼德兰就成了可以减少哈布斯堡王朝的损失的唯一地区。在与荷兰人对抗的“八十年战争”期间，由于需要克服地形方面的困难和加强防御工事，佛兰德斯军队的费用毕竟很惊人，而且大大超出其他战线的费用。甚至在三十年战争最激烈的时刻，用于佛兰德斯要塞的费用比用于派往德国的军队的费用，高出4至5倍。西班牙的一位参议员评论说：“尼德兰的战争是君主制的总崩溃。”实际上，在1566年至1654年期间，西班牙拨给尼德兰的军事财政部的费用至少为2.18亿杜卡特，这笔费用比国王从东印度群岛得到的收入总数（1.21亿杜卡特）高得多。从战略上看，守卫佛兰德斯的难度也大得多：海路往往由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控制。1639年荷兰海

军将领特朗帕粉粹运载增援部队的一支西班牙舰队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从伦巴第经过瑞士的谷地或萨瓦和法兰什孔太，顺法国的东部战线而上到莱茵河下游地区的“西班牙之路”也有很多很容易遭受攻击的交通枢纽。不停地设法控制在这样长的交通线路的尽头的200万不唯命是从的尼德兰人，而且以这样惊人的代价是否真正值得？正如承受过重的征税负担的卡斯提尔议会的一些议员私下所说，为什么不让谋反者在其异端邪说中烂掉呢？要使他们知道，会受到上天的惩罚，而且西班牙不必再承受这个负担。

这里谈到的反对帝国从那个战区撤出的理由是不会使那些对浪费资源不满的人信服的，但这些理由似乎也还讲得通。首先，如果西班牙不再占有佛兰德斯，那么它会落到法国或联省共和国的手中，从而加强了哈布斯堡王朝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力量和声誉；正是这样的念头会使西班牙政策的指导者感到厌恶，在他们看来，“名声”比什么都重要。第二，腓力四世及其谋臣提出的论点是，这个地区的对抗至少消除了一些更加敏感的地区的敌对力量：“尽管我们在尼德兰进行的战争耗尽了我们的财富，并迫使我们负债，它也使我们的敌人将注意力转向这些地点，因此，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肯定会在西班牙或靠近西班牙的其他地方进行战争。”最后，出现“多米诺理论”现象——如果失去尼德兰，那么也会失去哈布斯堡王朝在德国、法兰什孔太等较小领地，也许乃至意大利的事业。当然，这些是一些假定的说法；然而有趣的是，马德里的政治家及西班牙在布鲁塞尔的军队指挥官认为，存在一个战略上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如果其中某个部分失效，这个整体就会垮掉：

> 最初的和最大的危险（这是对关键的*1635*年的解释）是那些威胁伦巴第、尼德兰和德意志的事件。这三个地区中任何一个地区的失败，对于君主制来说都是致

命的，以致于如果在那些部分的失败是重大的，那么这个君主制的其他部分就会崩溃；因为继德国之后有意大利和尼德兰，继尼德兰之后有美洲，继伦巴第之后会有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而且不可能守住其中的任何一个。

西班牙国王接受了这种分析，全力投入一场大范围的消耗战，一直持续到取得最后胜利，或者实现和解，或者整个体系精疲力尽。

也许这足以表明，持续战争的费用和不放弃这4条战线中的任何一条的决心，不管怎样肯定都会对西班牙帝国实现自己的野心不利。而有证据表明，还有第三个有关原因，即尤其是西班牙政府未能最有效地动员可用资源，而且由于经济措施不当，结果加速了自身力量的削弱。

尽管外国人总将查理五世或腓力二世统治的西班牙帝国看作是统一的，纪律严明的，但实际上，它是各领地的一个联合体。各领地都有自身的特权，并为自身的特点而感到骄傲。当时并没有中央集权政府（更不用说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了），而帝王本人是唯一的真正的连杆。不存在能激发统一感的机构，而统治者永远不能在全国视察，这就使国王很难在他统治的某个领地筹集资金而为了在别的领地作战。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纳税人是乐于资助建立一支舰队与土耳其人对抗的，但他们对资助西班牙在尼德兰的斗争的想法非常不满；葡萄牙人很注意树立支持新世界防务的意识，而对在德意志的战争毫无热情。这种严重的地方主义是小心翼翼地守住自己财权而形成的，并且是保护这种财权的反映。例如，在西西里，议会反抗哈布斯堡早期增加税收的举动，并在1516年和1517年起来反抗西班牙总督；西西里很贫穷，陷入无政府状态，并拥有议会，不太可能为全面捍卫哈布斯堡的利益提供大量帮助。在那不勒斯王国和新获得的米兰，由于受到来自马德里筹集新财源的压力，对西班牙行政官的立法障碍比较

少。因此，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这两个地方可以提供相当大的财政援助；但是，实际上，保留米兰的斗争和反抗土耳其人的战争表明，往往出现相反的趋势。西班牙为了坚守其在地中海的“堡垒”，不得不拨给意大利数百万杜卡特，以补充那里筹集到的资金。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再次改变了这种模式，在意大利征收的税收有助于支付在德意志和尼德兰的战争费用；在1519～1659年这段时间里，总的说来，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很难相信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的领地对共同基金的捐赠会大大超过其用于自身防御的费用。

当然，尼德兰使帝国的一般收入更加严重地外流。在查理五世统治早期，议会规定征收的税额越来越多，尽管每次总是在税收数量上讨价还价，议会总要坚持承认对他们的特权。到这位帝王的统治晚期，人们对西班牙经常征收意大利和德意志战争的特殊补助金感到气愤，这与宗教不满和商业上的困难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情绪。到1565年，北海沿岸的低地国家的国债达到1000万佛罗林，债务偿还费用加上正常行政管理费的总额超过收入，因此，西班牙必须补偿赤字。以后10年间，由于马德里管理不善，这些地方的不满终于爆发成了公开的反抗，这时尼德兰耗费了帝国的大量资源，佛兰德斯军队的6.5万余人的开支占西班牙政府几十年间的总开支的1/4。

西班牙未能动员资源，这是最惨痛的失败，而西班牙国王的财权实际上非常有限。阿拉贡国王统治的3个地区（即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都有自身的法律和税制，因而它们拥有相当多的自治权。实际上，这位帝王的唯一有保证的收入来自王室的财产；得到其他补助金的机会很少，而且很困难。例如，腓力四世等孤注一掷的统治者在1640年设法让加泰罗尼亚负担派到那里守卫西班牙的边缘地区的部队的费用，而这一切激起了一

场有名的持续了较长时间的起义。葡萄牙，尽管1580年开始被接管，而这种状况持续到1640年起义为止，但在财政问题上完全自主，并没有给哈布斯堡总的事业经常纳贡。因而卡斯提尔在西班牙税制中成了真正的“奶牛”，尽管这里的巴斯克各省都免税。在卡斯提尔议会有很多席位的拥有地产的缙绅，通常都对他们免税的税款征收投赞成票。再者诸如作为经常收入的什一税（一种10%的营业税）和关税，以及劳务税（议会的拨款）、小什一税（一种食品税，也由议会拨给）和作为主要额外收入的教会的各种拨款，所有这些税收征收对象往往是贸易、货物交换和穷人，因而造成越来越多的贫困和不满，而且造成人口减少（移民所致）。

在美洲的白银流入，促使西班牙国王的收入进一步大幅度增加之前（这个时期大致从16世纪6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后期），哈布斯堡进行战争的力量主要依靠卡斯提尔的农民和商人；而且即使在战争最激烈时，来自新世界财源的王室收入大约只占从卡斯提尔及其600万人中得到的收入的1/4到1/3。除非这个王国的税收负担更合理地分担和确实由哈布斯堡王朝的所有领地分担，而且等到实现了这一点之时，实际上这笔收入肯定很小，在这个基础上不足以维持当时的惊人的军事开支。

造成这种经费不足局面，是为榨取卡斯提尔的纳税人而采取的倒行逆施的经济措施。这个王国当时的社会风气从来就不鼓励贸易，而在16世纪初期，这个国家比较繁荣，以人口日益增加和拥有某些重要工业而自豪。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出现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的多次战争促使西班牙社会中的宗教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发展，而削弱了商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存在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令人觉得，得到教会的采邑或购买少数贵族的特权是明智的。例如，当时的军火工业长期缺乏熟练的技工，而且行会妨碍

了劳力流动和就业的灵活性。麦斯塔[1]的特权甚至妨碍了农业的发展，麦斯塔是著名的牧羊主行会组织，他们的牲畜可在全国的广阔范围放牧；随着西班牙16世纪的前50年的人口增长，其结果是造成谷物进口需要量增加。既然麦斯塔为取得放牧权而支付的费用进了王室的金库，而且废止这种做法会激怒国王的一些强有力的支持者，因而不存在改变这种做法的前景。最后，尽管有一些明显的例外（羊毛行业的商人、金融家西蒙·罗易兹、塞维利亚附近地区），卡斯提尔的经济，总的说来也严重地依赖于进口外国产品和非西班牙人，尤其是热那亚、葡萄牙和佛兰德斯的企业家提供的劳务。甚至在处于战争状态时，这一经济还依赖于荷兰人；"到1640年，西班牙港口的商品有3/4用荷兰的船只运送"，这对这个国家的最大的敌人有利。难怪西班牙经常处在贸易不平衡的状态中，只有在对美洲的黄金和白银进行转口贸易后，才能扭转这种不平衡。

因此，这笔140年的战争的惊人费用由一个经济上缺乏准备的社会来承担。鉴于无法最有效地增加收入，哈布斯堡的统治者采取各种办法，这些办法在短期内容易凑效，而从国家的长远利益来看，是灾难性的。他们不断千方百计地增加税收，但这些税收很少落到那些能轻易地承担这笔费用的人身上，而且往往对商业发展不利。政府变卖各种特权、专利权和荣誉拼命捞取现金。政府逐渐出现财政赤字，其原因一部分是以支付卡斯提尔以后收得的税金或从美洲获得的财富向银行家大量借债，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出售政府的**有息债券**。这进而又吸引了那些在其他情况下也许在商业和工业上投放的资金。而当时总是以得过且过的方式实行政府的债务政策，既不考虑慎重地加以限制，也没有中央银行可以据理力争的控制手段。因此，即使到查理五世的统治后期，

[1] 麦斯塔（Mesta）：经营养羊业的贵族特殊团体。——译者注。

政府的收入早在数年前就预先抵押了出去；在1543年，经常收入的65%用来支付已发行的债券的利息。国王的“普通”收入转让得越多，政府就越是拼命地搜刮额外收入和新税收。例如，银币一再用铜币① 降低成色。有时，政府完全没收从美洲来的原应给平民的白银，并且强迫他们收下债券作为补偿；如上面提到的，在其他情况下，西班牙国王推迟付息时间，并宣布暂时破产。即使后一项行动不一定使金融商号本身倒闭，但肯定会降低以后马德里的信用程度。

即使在那些年代冲击卡斯提尔经济的某些因素不是人为的，但由于人们的荒唐做法，它们的冲击力更大。在17世纪初前后，造成大部分乡村地区人口减少的瘟疫是无法预测的，其他原因还有昂贵的租金、麦斯塔行动、兵役，而这些因素当时对农业已有不利影响。美洲白银的流动注定会产生经济问题（尤其是价格膨胀），当时的社会都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当时在西班牙普遍存在的情况意味着，这一现象使从事生产的阶级遭到的损害比不从事生产的阶级更严重，白银往往很快从塞维利亚流进外国银行家和军需品商人手中，而国王利用某种不利于建立“健全的财政”的方式，榨取这些跨大西洋的新财源。据说，贵重金属从西印度群岛流向西班牙，结果好似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此，西班牙衰退的根源是，未能认识保持一个强大的军事机器的经济基础的重要性。西班牙一再采取错误的措施：先后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与国外的大学中断联系；政府指示比斯开的造船厂集中力量建造大型军舰，不让建造更有用的小商船；出售专卖权，限制了贸易的发展；对出口羊毛制品征收重税，结果使西班牙在国外市场丧失竞争能力；在西班牙各王国之间的内部关税壁垒，对商业不利，而且使价格上涨。这些措施仅仅是不明智

①铜币：即古铜币。——译者注。

决策的一部分，从长远看，这些决策使西班牙给自身确定的在欧洲（和欧洲以外）的事务中发挥重大军事作用的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尽管西班牙力量的削弱到17世纪40年代以后才表现出来，而造成这种力量削弱的原因则在几十年前就已存在了。

三、国际比较

上述哈布斯堡王朝的失败（强调这一点很重要）是**相对的**失败。如果论述这个问题不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有关经历联系起来研究，那么做出的分析就不会全面。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战争是16世纪的国家面临的最严重的考验”。军事技术的变革使军队的规模扩大，而且几乎同时引起海上大规模冲突不断发展，结果给西方有条理的社会带来了新的巨大压力。各交战国都要学会建立令人满意的管理结构，以迎接“军事革命”；而同样重要的是要设法用新的方法来支付战争的盘旋上升的费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及其臣民由于其军队长期进行战争而受到异乎寻常的严峻考验；但是，正如表1所示，对规模较大的军事力量进行监督和给予资助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其中有很多国家资源比西班牙少得多。这些国家是怎样经受这场考验的呢？

表1　1470～1660年的军队人数的增长

（单位：人）

时　间	西班牙	联省共和国	法　国	英　国	瑞　典
15世纪70年代	20 000		40 000	25 000	
16世纪50年代	150 000		50 000	20 000	
16世纪90年代	200 000	20 000	80 000	30 000	15 000
17世纪30年代	300 000	50 000	150 000		45 000
17世纪50年代	100 000		100 000	70 000	70 000

这里未列出奥斯曼帝国这个与哈布斯堡王朝对抗的最顽固的和威胁性最强的敌人，主要原因是上一章已经谈到过奥斯曼帝国的强项和弱项；这里值得回顾一下土耳其的统治者必须解决的很多问题和缺陷（例如，战略上过分向外扩张、未能有效地发掘资源、为了维护宗教的正统观念或军事声誉而压制商业上的企业家精神），这些情况与使腓力二世及其继承者为难的情况类似。这里也没有列出俄国和普鲁士，因为这两个国家当时尚未确立其在欧洲政治活动中的大国地位；而波兰—立陶宛尽管领土广袤，但因受到种族差异和封建制度束缚的过多制约（农奴制度、落后的经济、普选产生的君主制，“贵族统治的无政府状态，使它成为政治无能的代名词”），结果自身不能迅速变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而下面将研究的国家是法国、英国和瑞典等“新君主制”，以及联省“资产阶级共和国”。

因为法国这个国家最终取代了西班牙而成为最大的军事强国。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当然要着力论述法国的很多长处，然而过早谈论法国的显赫时期是不对的；在本章涉及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的实力看上去——实际上也确实比南方邻国弱。在百年战争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与英格兰、勃艮第以及布列塔尼相对的国王的领地的巩固、不向议会申请即可直接征税（尤其是人头税）的习惯、新的国务大臣的扎实的管理工作、一支配有强有力的炮兵纵列的“王室”军队，所有这一切使法国似乎成为一个成功的、统一的、摆脱封建制度的君主制。这个结构显然很脆弱，这一点不久便暴露无遗。意大利的几次战争，除了一再表明法国在这个半岛增加自身的影响方面所作的努力（当时甚至还与威尼斯或土耳其人联合）是短命的；损失惨重，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昂贵：不仅哈布斯堡王朝，而且法国国王都不得不在关系重大的1557年宣布破产。远在这次战争失败之前，尽管一直在增加人头税以及盐税和关税等间接税，法国的君主制早就采取向金融家大量借债

(利率高达 10～16%）和卖官鬻爵等靠不住的权宜之计。更糟的是，在法国，而不是在西班牙或英国，宗教斗争和豪门贵族的野心交织在一起，爆发了长期的流血内战。当时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算不上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到了 1560 年以后，扬言要成为欧洲新的战斗中心，其命运也许与尼德兰和德国一样，沿着宗教边界长期形成分裂局面。

只是在亨利（那瓦里的）继承法国王位称亨利四世（1589～1610 年），并采取对内妥协、对外与西班牙抗衡的军事行动等政策之后，情况才有好转；亨利四世于 1598 年与马德里媾和，给法国继续保持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由于内战、掠夺、物价昂贵、通商和农业中断，国家十分衰弱，而且财政制度遭到破坏。到 1596 年，国债几乎达到 3 亿里佛尔，而当年的收入为 300 万里佛尔，其中的 4／5 已经转让和抵押。此后的一段很长时间内，法国一直在努力恢复元气。而法国的自然资源相当丰富。其人口约 1600 万，是西班牙的两倍，英国的 4 倍。法国在城市化、商业和财政等方面也许不如尼德兰、意大利北部和伦敦地区先进，但法国的农业实行多种经营，发展很健康，粮食一般自给有余。法国的潜在财富在 17 世纪初期已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当时亨利四世的大臣苏利（1560～1641 年）主管经济和国家财政，撇开**官职税**（指出卖世袭官职和向世袭官职收税）不说，苏利并没有采取新的财政手段，当时他采取的行动有，检查税捐稽征机构、清洗了数以千计的非法要求免税的人、收回王室领地的收入、重新商定国债的利率。在公元 1600 年以后的几年内，国家预算恢复平衡。此外，苏利在路易十四世的大臣（财政总监）柯尔培尔之前，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想方设法支持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例如，减少**人头税**、建造桥梁、修建道路、开凿运河、促进货物运输、鼓励纺织品生产、建立皇家工厂生产奢侈品以取代进口等。并非所有这些措施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但与腓力三世执政的西班牙相比，效果是显著的。

如果亨利四世在1610年未遭暗杀，这方面的振兴工作能否继续下去是很难说的。而有一点是无疑的，即如果领导不力，任何“新君主制”都不可能很好地运行，而在亨利四世被刺死到黎塞留在17世纪30年代巩固王权这段时间内，法国奉行的国内政策、胡格诺派的不满、贵族热衷于施展阴谋诡计，这些因素使法国作为欧洲大国发挥作用的能力再度削弱。此外，到法国最后公开参加三十年战争时，法国并不像有些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那样是一个统一的、欣欣向荣的国家，而仍是一个许多旧病缠身的国家，贵族仍然热衷于施展阴谋诡计，而且在1648～1653年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农民起义、城市失业工人起义和胡格诺派起义，加上地方官吏妨碍议会议事，使政府无法很好地行使独权；经济上，由于受到人口普遍下降、气候恶劣、农业歉收、瘟疫流行（当时似乎使欧洲很多国家陷入困境）等因素的影响，很难拿出钱来打一场大仗。

因此，从1635年起，法国必须用种种方法增加税收：加快出卖官职；早先减收的人头税数额的年收益率到1643年翻了一番。即使这样，仍然支付不了反哈布斯堡王朝战争的费用，其中包括维持一支15万人的军队的直接军事负担和对盟国的资助费用。1643年，法国在洛可瓦击败西班牙取得重大军事胜利，这一年的政府开支比当年收入几乎超支1倍，黎塞留的继承者马萨林不得不更肆无忌惮地出卖政府官职，并对人头税加紧控制，这两项措施都很不得人心。1648年的起义，从争取豁免税款反对马萨林采取新的财政措施开始，这种纷乱很快导致政府的赊账损失和被迫宣布破产，这些事件的发生决非是偶然的。

因此，在1648年缔结《威斯特发里亚和约》之后的法国和西班牙继续进行的11年战争里，两位对手好像是被打得头昏眼花的拳击手，在几乎筋疲力尽的情况下互相抓住对方不放，任何

一方都无法将另一方置于死地，这两个国家都爆发了国内起义，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厌恶战争，国家财政濒于崩溃。在恩格海姆和蒂雷纳等将领和勒泰利埃等军事改革家的领导下，法国军队逐渐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而由黎塞留首相建立起来的法国海军力量则由于陆战的需要而迅速瓦解；国家仍然需要一个稳固的经济基础。使法国感到幸运的是英国在克伦威尔的领导下加强了军事力量，并决定参与这场冲突，从而使法、西两国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最后出现了对陷入困境的西班牙不利的局面。后来缔结的《比利牛斯和约》与其说是法国强大的象征，倒不如说对外扩张的南部邻国西班牙实力相对下降的标志，因为在这以前西班牙一直是以顽强的斗志战斗的。

也就是说，欧洲各国既有优势也有劣势，而真正的需要是防止后者压倒前者。这一点对西部和北部的“侧翼”英国和瑞典等国也是适用的：英国和瑞典在多次关键时期介入帮助阻止了哈布斯堡王朝的野心。实际情况不完全这样，例如，几乎不是英国在这140年的时间里，随时准备介入一场大陆的冲突，而且充满信心。英国在“玫瑰战争”后恢复战争创伤的关键是亨利七世全力以赴稳定国内秩序节俭财政，至少在1492年与法国媾和之后是这样。都铎王朝的首任君主削减自身的开支以清偿债务，总的说来是鼓励发展羊毛贸易、渔业和商业，他通过这些措施，为遭到内战和纷乱破坏的英国提供了急需的喘息机会。农业的自然生产率、北海沿岸地区的低地国家兴旺的纺织品贸易、越来越多地使用近海富饶的渔场，以及沿海贸易的全面活跃，在其他方面发挥了作用。在国家财政方面，国王收回王室领地、没收王权的背叛者和反抗者的领地、从日益增长的贸易中得到关税、从皇室法庭[1]和其他法庭得到的收益，所有这一切使英国的财政实现了

---

[1] 皇室法庭：15～17世纪英国最高司法机构。——译者注。

良性平衡。

而政治稳定和财政稳定与权力未必是一码事。与法国和西班牙的远为多得多的人口相比，英格兰和威尔士的300～400万人口似乎并不多。英国的财政机构和商业的基础结构与意大利、南德、北海沿岸地区的低地国家的财政机构和商业的基础结构相比还比较原始，尽管在“都铎王朝世纪”时期，工业有很大的发展。在军事水平方面，差距还要大得多。亨利七世每当觉得有把握得到王位时，就早早将自己的军队解散，并禁止大地主拥有私人军队（只有少数的例外）；且撇开英国国王的“卫士”和某些卫戍部队不论，在这个时期英国没有正规的常备军，而当时法国和哈布斯堡朝在意大利进行的战争正在改变军事冲突的性质和规模。因此与都铎王朝统治时期早期那样，这类部队的装备仍然是传统武器（长弓、钩矛），并以传统的方式招募士兵（郡的民团、志愿“士兵”等）。但是这种落后状态未能阻止亨利七世的继承者亨利八世与苏格兰人作战，也未能制止亨利八世先后在1513年和1522～1523年间对法国进行干预，因为英国国王可以从德国雇佣到大量的“现代”部队——长矛兵、火绳枪兵、重装备骑兵。

如果英国早先在法国的作战或后来在1528年和1544年的2次入侵不是以军事上的重大损失告终——如果他们确实一再强迫法国国王收买英国的令人不安的袭击者——他们在财政上肯定会出现毁灭性的后果。例如，在财政部1513年的70万英镑的总开支中，有63.2万英镑用于士兵的薪俸、装备、舰艇和其他军事开支。亨利七世积累的储蓄不久都被他的野心勃勃的嗣子花光了，亨利八世的权臣沃尔西当时用强制借款，“捐款和其他专断措施筹集资金，到处激起了不满情绪。只是在托马斯·克伦威尔于16世纪30年代袭击教会的领地的情况下，财务状况才有松动；实际上，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使王室的收入增加了1倍，而且允许将大量费用用在防御性军事项目上——沿英吉利海峡的地区和

苏格兰边界修筑堡垒、为皇家海军建造新的大型舰只、镇压爱尔兰人民起义等。16 世纪 40 年代的对法国和苏格兰的战争带来了沉重灾难，耗费了 213.5 万英镑。这笔巨额费用约为国王正常收入的 10 倍。这种情况迫使国王的大臣们不择手段地捞取钱财：以低价变卖宗教的财产、以捏造的罪名没收贵族的财产、多次强制性借款、大量降低铸币的成色、最后求助于富格尔银行家和其他的外国银行家。因此，1550 年解决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矛盾是解救濒于破产的政府的一项备受欢迎的举动。

因此，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 16 世纪前期，英国的权力确实受到限制。当时英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比较单一的国家，尽管在一些边界地区和爱尔兰远不是这样，这些地区总是分散王室的资源和注意力。主要由于亨利八世的重视，英国的防御力量很强，建造了一些新式的要塞、火炮、造船厂、可观的军火工业和装备精良的海军。但是，英国在军事上的落后表现在军队的素质差，而且英国的财政拿不出钱来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 1558 年伊丽莎白一世就任都铎王朝女王时，她慎重地承认这些局限性，而且避开这些困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 1570 年以后的几年，反宗教改革运动进入高潮，西班牙部队在西属尼德兰十分活跃，形势危急，伊丽莎白一世完成自己的任务难度很大。既然在伊丽莎白一世执政的英国，实力根本无法与欧洲的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相比，她便设法通过外交手段保持英国的独立，而且即使在英国与西班牙的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仍设法让反对腓力二世的“冷战”在海上进行，这样做至少可节省财力，而且有时还有利可图。尽管在 16 世纪 70 年代要拿出钱来确保英国的苏格兰和爱尔兰侧翼的安全以及援助荷兰革命，伊丽莎白和她的大臣们在她执政的最初 25 年里，成功地增加了大量的盈余——这正合适，因为在 1585 年决定在伊丽莎白的朝臣和将军莱斯特的率领下派远征队向尼德兰远征时，女王非常需要一笔“战争专款”。

1585年以后，英国与西班牙发生的冲突对伊丽莎白政府提出了战略上和财政上的要求。在考虑英国最好应采用什么战略时，霍金斯、雷利、德雷克等海军将领和其他人都敦促女王执行下述政策，即阻止西班牙的白银贸易、袭击敌人的沿海地区和殖民地，而且利用海上力量的优势进行作战总的说来费用较低——这在理论上是一种有吸引力的主张，尽管这种主张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实施。但是还需要向尼德兰和法国北部派出部队以援助他们与西班牙军队的作战——采纳这项战略并非出于对荷兰的起义者或法国的新教徒有什么厚爱，而是完全出乎伊丽莎白一语点破的原因，即“法国的末日来临之时，也是英国灭亡的前夜”。因此，在需要进行主动干预的情况下，保持欧洲的平衡至关重要；英国的这项“对大陆承担的义务”至少以个人的形式持续到17世纪初期，因为在1594年远征军并入联省共和国军队时，英国还有很多部队留在欧洲大陆。

在制止腓力二世实现陆上计划和从海上对腓力二世统治的帝国进行骚扰时，英国在保持欧洲政治的多元化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可是向国外派出8000人是很沉重的负担。在1586年，花在尼德兰上的费用共计10万英镑，1587年为17.5万英镑，分别约为各年总支出的一半；在西班牙向英国派出无敌舰队的1588年，向英国舰队的拨款超过15万英镑。因此，在16世纪80年代后期，伊丽莎白每年的开支为16世纪80年代初期的2至3倍。在以后的10年间，女王的开支每年超过35万英镑，爱尔兰战役爆发后，女王统治时期最后4年的年度开支费用平均为50多万英镑。正象要从变卖王室领地和专卖权等其他来源筹集资金那样，政府别无选择，只好一再召开下议院会议，请求额外拨款。英国政府得到了这笔拨款（总额约200万英镑），既没宣布破产，也没有扣发部队薪俸，这一切都证明了女王和她的议员们很老练又很明智；而战争岁月是对整个政体的考验，遗留下的债

务让斯图亚特王室的詹姆士一世国王偿还，使詹姆士一世及其继承者依赖于一个多疑的下议院和一个谨慎小心的伦敦金融市场。

本文受篇幅限制不能论述国王和议会之间不断激化的冲突，这类冲突在 1603 年以后的 40 年间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财政起核心作用。英国军队在 17 世纪 20 年代欧洲的重大战争中偶尔进行的不适当的干预，尽管所需费用极其昂贵，但对 30 年战争的进程几乎毫无影响。这个时期英国的人口、贸易、海外殖民地和一般财富都有增加，但如果国内没有和睦融洽的环境，所有这些方面都不能确保国家实力有一个可靠的基础；在建舰税等税收问题上的争论——这类税收从理论上说本来可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实际上，很快使国王和议会陷入一场内战，这场内战在 17 世纪 4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成了使英国在欧洲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遭到削弱的一个因素。英国振兴国力之后，在 1652 年至 1654 年的一场激烈的贸易战中向荷兰人提出挑战，这场贸易战，无论各交战国怀有什么目的，对欧洲的整个力量对比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17 世纪 50 年代在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国，与过去的任何一届政府相比，能够更成功地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他率领的在内战时期出现的新模范军至少缩小了英国军队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历来存在的差距。英国的军队是一支按拿骚的莫里斯和古斯塔夫·阿多夫所确定的新的原则进行组织和训练的，它经受过多年冲突的锻炼、纪律严明、（通常）得到固定薪俸，英国的军队在欧洲的较量中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英国在 1658 年的杜内斯的战斗中打败西班牙军队证明了这一点。再者，共和制的海军甚至可能是那个时代比较先进的。在下议院的支持下（因为下议院总的说来已宣布在内战期间反对查理一世），这支舰队在 17 世纪 40 年代末重振雄风：其拥有的船只从 1649 年的 39 艘增加到 1651 年的 80 艘，规模扩大了 1 倍多，工资和条件得到了改善，

造船厂和后勤支援有了改进，而所有这些项目所需费用一般由下议院投票决定，而下议院认为利益和权力是密切联系的。这种说法也是站得住脚的，因为海军在与荷兰进行的第一次战役中拥有一支由特罗帕和德鲁特率领的力量都同样强的部队，这两位将领与布雷克和蒙克一样出色。1655年以后英国海军同西班牙帝国交战，旗开得胜是毫不奇怪的：占领阿加底亚（新斯科舍），继西班牙在伊斯帕尼奥拉岛遭到惨败之后，夺取了牙买加；于1656年夺取了西班牙的运送贵重货物的船队；在1657年封锁加地斯，并摧毁西班牙在圣克鲁斯的商船队。

英国的这些举动终于使欧洲力量平衡的杠杆出现倾斜，迫使西班牙于1659年结束了与法国的战争，如果不是国内吃紧，是不会出现这种局面的。在1655年之后的数年，西班牙的有利可图的贸易落到了中立的荷兰手里，而在沿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航路上，敌人的私掠船从英国的商船上掠夺大量财富。尤其是资助一支7万人的陆军和一支庞大的海军耗费极大；据估计，1657年时英国政府的总支出为287.8万英镑，其中有190多万英镑用于陆军，74.2万英镑用于海军。横征暴敛空前严重，即使这样仍然不能满足政府需要，政府开支比爆发英国革命之前的查理一世统治时期的无法容忍的水平还高出3倍。债务不断增加，拖欠士兵和船员的薪俸。英国与西班牙的这几年战争无疑使公众越来越厌恶克伦威尔的统治，结果商人阶层的大部分人都祈求和平。当然还不致出现这种情况，即这场冲突使英国完全崩溃——尽管如果英国象西班牙那样长期参与大国之间的斗争无疑是会出现这种结局的。英国的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的增长，加上从殖民地和航运得到的收益，开始奠定了稳固的经济基础；一旦爆发另一场战争，伦敦政府可以依赖这个基础；恰恰由于英国——和尼德兰的联省共和国一起——在这之前已发展了有效的市场经济，取得了实现人口增长与生活水平相应提高的罕见的伟绩。尽管这样，一

方面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和海军力量，另一方面要鼓励增加国家财富保持这二者之间的平衡仍然很重要。到摄政时期结束时，这种平衡变得很不稳定。

如果把英国和“侧翼”国家瑞典这两个国家的兴起发展情况比较一下，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国家事务的管理本领方面的重要教训。在整个16世纪期间，北部王国的前景似乎很糟。瑞典受到吕贝克，尤其是丹麦的包围而无法自由出入西欧，而在东侧与俄国进行一系列的斗争，而且一再为同波兰之间的关系伤脑筋，它仅仅为了保存自己就需要做大量工作；瑞典在1611～1613年间与丹麦的战争中遭到惨败，给人的暗示是，瑞典的结局是衰退，而不是发展。此外，瑞典在立宪问题上，而不是在宗教问题上，出现了内部分裂，其结果是加强了贵族的特权。而瑞典的最严重的弱点是其经济基础薄弱。瑞典的大部分领土是北极的不毛之地或者森林。瑞典约有90万人口，其中95%是农民，他们分散经营，基本上自给自足；而芬兰约有125万人口，比意大利的很多城邦的人口少。瑞典当时几乎没有城镇和工业；很难发现“中产阶级”，交换货物和劳务仍然是主要的交换方式。因此在年轻的古斯塔夫·阿多夫于1611年继承王位时，从经济上和军事上看，瑞典完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

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促使瑞典从上述看来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的基础上迅速地发展起来。外部因素指外国的一些企业家，尤其是荷兰人、德国人和华隆人；瑞典的木材、铁矿和铜矿等原料丰富，瑞典对他们来说是有发展前途的“不发达”国家。在这些外国企业家中，最有名的是路易·德·吉尔，他不仅把成品卖给瑞典人，还从瑞典人那儿买进矿石；他在这段时间里还建立锯木厂、铸造厂和其他工厂，向国王放债，吸引瑞典参加到主要在阿姆斯特丹的基础上建立的商业“世界体系”中。不久瑞典成为欧洲最大的铁和铜的生产国，这些产品的出口增加了外汇收入，这些外汇

很快可用来负担发展武装部队的费用。瑞典在军火生产上成为自给自足的国家，这是难得的成就，而这一成就也应归功于外国的投资和技术转让。

内部因素是人们熟悉的，指古斯塔夫·阿多夫及其助手倡导的一系列改革。这个时期除了某些方面，在法庭、国库、税制、平衡法院的集中管理、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效能和效率都有所提高。引导贵族不分宗派担任国家公职。确保了宗教团结。看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正常运行。古斯塔夫在这些扎实的基础上可以建设一支瑞典海军，保护沿海地区不受丹麦和波兰等敌国的袭击，保证瑞典海军在波罗的海航道上的安全。不管怎样，国王的声誉首先是靠他那伟大的军事改革：用征兵方式扩充国家的常备军，用新的战术训练部队，提高骑兵的素质，采用机动性强的轻型炮兵部队，最后一点是，军队将领注意严明纪律、鼓舞士气。古斯塔夫在1630年夏天进入德国北部援助新教徒的事业时，他率领的部队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欧洲冲突的规模比以前与瑞典邻国进行的局部战争的规模大得多，费用昂贵得多。到1630年末，古斯塔夫率领4.2万人；1年后人数增加1倍；在吕岑的决定性的战斗中，他的部队几乎膨胀到了15万人。瑞典部队在所有重大战斗中组织精锐部队，而且用这些部队守卫战略要塞，但部队人数还不足以组成一支那样规模庞大的军队；“瑞典”军队共有15万人，实际上其中4/5是外国雇佣兵，有苏格兰人、英国人和德国人，雇佣兵的费用惊人。即使是17世纪20年代反波兰的斗争就已造成了瑞典的公共财政拮据，而对德之战的消耗则大得多。可是，瑞典人显然是设法让其他国家承担这笔费用。众所周知，外国，尤其是法国提供补贴，但这些补贴只能支付其中的部分费用。补贴的真正来源是德国本身：各个王侯的领地、自由城市，凡是对瑞典友好的，必须对这一事业

作出贡献；凡是对瑞典敌视的，必须拿出赎金以免遭到掠夺。此外，这支由瑞典人率领的庞大军队在驻扎地强征营房和粮秣。国王的副手瓦伦斯泰确实已经完善了这一套体系，他用强索"贡献"政策资助了一支兵员超过 10 万人的帝国军队；但是这里要提出的是，给这支曾在 1630～1648 年制止哈布斯堡的进攻中作出贡献的庞大的军队提供资助的**并非**瑞典人。就在签订《威斯特发里约和约》的那个月，瑞典军队当时正在波希米亚掠夺；瑞典军队只是在得到大量"补偿"时才撤出，这样说是完全恰当的。

尽管这是瑞典人取得的一项引人注目的成就，但从很多方面给人这样一种假象，即瑞典军队确实屹立在欧洲。瑞典的庞大的战争机器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带有**寄生性**；瑞典在德国的军队为了生存不得不掠夺——否则这支军队会哗变，给德国人带来更严重的危害。瑞典人本身当然必须负担保卫本国、海军和在德国以外的其他地区作战的部队的费用；这样一来象其他国家那样，使政府的财政拮据，结果不顾一切地将王室的领地和收入变卖给贵族，从而使长期的收入减少。三十年战争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农民被迫承担特别沉重的税收。再者，瑞典由于在军事上取得成功，结果在跨波罗的海地区得到爱沙尼亚、立窝尼亚、不来梅、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领地，这无疑使商业和财政受益，但为了在和平时期保持这些领地或在战争时期保护这些领地不受忌妒心强烈的敌人的侵犯，瑞典负担的费用比 17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在德国的重大战役中花费的费用高得多。

甚至在 1648 年以后，瑞典还打算保留庞大的力量（但仅仅在地区范围）。在查理十世（1654～1660 年）和查理十一世（1660～1697 年）统治时期，瑞典在波罗的海堪称实力最雄厚，当时瑞典在波罗的海地区成功地击退了丹麦人的进攻，在与波兰、俄国和新兴的普鲁士强国的对抗中泰然自若。在查理十一世执政时期，瑞典力图建立专制王朝，增加王室财源，因而在平时

可能保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在瑞典慢慢从一流强国走下坡路时，这些措施增强了瑞典的实力。用罗伯特教授的话来说：

> “瑞典在一代人①的时间里，陶醉在胜利之中，并且为获得战利品而得意忘形：查理十一世沉缅于优逸自在的生活，制订并实施与其资源和实际利益相称的政策，准备提高地位和尊严，以后成为第二流的大国。”

这些成就不算很小，但在较大的欧洲范围内其影响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在波罗的海地区对瑞典与丹麦、波兰和勃兰登堡同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平衡范围。在17世纪后半叶法国人、荷兰人乃至英国人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用补贴和外交干预的方法以及在1644年和1659年的荷兰人的舰队来影响和“控制”力量的平衡。最后一点，尽管在这场重要的外交角逐中，决不能将瑞典称做“傀儡”国家，但瑞典与西方的一些新兴国家相比，在经济上仍然是侏儒，而且往往依赖于这些国家提供的补贴。在公元1700年前后，瑞典的对外贸易在联省共和国或英国的对外贸易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瑞典的国家开支也许只有法国的国家开支的1/5。瑞典的物质基础不雄厚，而且不可能得到海外殖民地，尽管社会秩序和政府管理的稳定局面令人羡慕，但在军事上几乎没有机会达到古斯塔夫·阿多夫曾经有过的短暂的优势。在以后的几十年间，经常将国内的发展工作停下来，纯粹是为了设法阻止普鲁士在南部和俄国在东部的推进。

最后谈一下荷兰的情况，这个时期的荷兰与瑞典形成鲜明对照。荷兰是在革命的混乱情况下诞生的，当时7个不同的省被不规则的边界线与哈布斯堡帝国拥有的尼德兰的其他地区隔开，尼德兰的人口和领土有限，它仅仅是广袤的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在几乎一个世纪里，成为欧洲内外的一个强国。荷兰与其他

---

①约30年。——译者注。

国家不同（尽管与意大利的前身威尼斯并无不同），它是一个具有政府的寡头政治形式的共和国；荷兰的最明显的特点是，将其实力基础牢固地建立在贸易、工业和财政领域。荷兰至少在防御方面确实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军事强国；荷兰一直拥有一支最有影响的海军力量，只是到了17世纪，英国后来居上，使荷兰相形见绌。荷兰武装力量在上述各方面的表现是荷兰加强实力和影响的结果，而不是其本质。

当然，情况未必都是这样，7000来名荷兰起义者在起义早期在欧洲事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几十年里，荷兰确实根本不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国家，只是到17世纪初才以某种方式确定了边界。所谓的尼德兰革命开始时断断续续，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社会集团和地区互相斗争，与哈布斯堡统治者时而对抗，时而妥协；在16世纪80年代当帕尔马公爵出色地执行为西班牙恢复失地的政策时，有好几次似乎就要获得成功，要不是英国和其他新教国家提供补贴和军事援助，从英国进口大量枪炮和西班牙军队经常被牵制在法国，起义本来是可以平息的。但由于尼德兰的港口和船坞几乎都被起义者控制，西班牙无法得到制海权，这时帕尔马只能缓慢地展开陆地包围战，而每当他奉命率领部队进入法国时，他总是发现自己失去猛烈进攻的机会。

到16世纪90年代时，联省共和国继续存在，而且事实上重新征服了以前在东部失去的大多数省和城镇。当时联省共和国的军队训练有素，由拿骚的莫里斯率领；莫里斯采用新战术，善于利用水上的地形，成了当时最著名的船长之一。将这支部队叫做荷兰军队是不恰当的，因为在公元1600年时，这支部队包括43个连的英国人、32个连的法国人、20个连的苏格兰人、11个连的华隆人和9个连的德国人，只有17个连的荷兰人。尽管这支军队由很多民族组成，规模庞大（但决不是缺乏代表性的部队），莫里斯还是将这支部队建设成一支有凝聚力的、划一的整

体。他做到这样无疑得到荷兰政府提供的财力援助；正象政府为保持其庞大的海军不断提供薪饷那样，莫里斯率领的军队得到的薪饷通常高于欧洲的多数其他军队。

夸大荷兰共和国的财富和财政的稳定性，或者认为荷兰发现能轻而易举地承担长期冲突（尤其在冲突的早期阶段）的费用，那是不明智的。在联省共和国的东部和南部地区，战争造成惨重破坏，贸易损失严重，人口大量减少。即使是经济繁荣的荷兰省也承担沉重的税收负担；在1579年，荷兰省必须负担96万佛罗林的战争费用，1599年的战争费用约为550万佛罗林。到17世纪初期，与西班牙作战的费用每年上升到1000万佛罗林，很多人不知道在不造成财力拮据的前提下这场战争能打多久。使荷兰人感到幸运的是西班牙的经济——及其负担佛兰德尔叛变军队的费用的能力——承受更大的压力，因此最后迫使马德里同意在1609年停火。

然而如果这场冲突考验了荷兰的资源力量，它并没将其资源耗尽；事实上，从16世纪90年代起，荷兰的经济发展很快，为当时政府——象所有交战国不得不求助于金融市场奠定了稳固的“信贷”基础。荷兰经济繁荣有一个明显的原因，这就是在摆脱哈布斯堡统治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与更加强烈的企业家的开拓精神相互影响。除了人数自然增长外，还有来自南方和欧洲很多其他地方的数以万计（也许数十万计）的难民。在这些移民中，似乎有很多熟练工人、教师、手艺人和资本家，这些人作出很多贡献。公元1576年，西班牙部队掠夺安特卫普，因而使阿姆斯特丹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国际贸易系统，而荷兰人确实也利用了能促进商业发展的每个机会。荷兰支配丰富的鲱鱼贸易，填海造田，增加了国家的财源。荷兰利用庞大的商船队，尤其是**三桅小商船**（结构简单而坚固耐用的货船），到公元1600年时，承担了欧洲的大量运输业务：荷兰船只沿着所有水路运输木材、谷物、纺织

品、食盐和鲱鱼。使荷兰的英国盟国以及很多的荷兰喀尔文派教徒反感的是，阿姆斯特丹的生意人为了盈利不惜风险将上述货物运送给荷兰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西班牙。在荷兰国内，大量进口原料，尔后由阿姆斯特丹、德尔夫特、莱顿等地的各种行业“加工”。“糖的提炼、熔化、蒸馏、酿造、截断烟草、搓丝和陶器、玻璃、军火生产、印刷、造纸”成为荷兰的主要工业。这样，到1622年，荷兰拥有67万人口，其中约56%在中等城镇生活，这一事实就不会使人奇怪了。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看来比荷兰落后。

从荷兰的经济看，还有两方面的因素增强了其军事力量。第一个因素是荷兰向外发展。尽管这种贸易与欧洲水域的比较低级的，但规模较大的贸易不能相比，但它从某个方面进一步增加了荷兰的资源。在1598年至1605年期间，平均每年有25艘船只驶往西非、20艘船只驶往巴西、10艘船只驶往东印度群岛、150艘船只驶往加勒比海。1605年在安汶岛和1607年在德那地建立拥有主权的殖民地；在印度洋周围、在亚马孙河河口附近和1609年在日本建立工厂和贸易站。与英国一样，当时联省共和国由于经济平衡从地中海慢慢转向大西洋领域而受益，这种变化是公元1500年至1700年这段漫长岁月里的主要趋势之一；这种情况起先对葡萄牙和西班牙有利，后来促使社会更好地准备，从全球贸易中取得效益。

第二个特点是阿姆斯特丹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也是联省共和国作为欧洲的货物装运国、交易国、商品经销国的必然结果。荷兰的金融家和机构提供的业务项目（受理贴现存款、货币划拨、贷记和交换汇票，流动贷款），与威尼斯和热那亚已确定的做法没有差别；但荷兰的做法反映出联省共和国的贸易财富，这种贸易的规模更大，而且更可靠——因为主要投资者是政府的一部分，而且希望让偿付能力强的货币、有担保

的债权、定期偿还担保的债务等原则付诸实施。采取上述做法后，政府贷款通常有可用资金，从而使荷兰共和国与其对手相比，具有无法估量的优点；而且既然由于荷兰迅速偿还债务，使信用率很稳定，因此荷兰与其他政府相比，能得到低息借款——这在17世纪乃至任何时候确实都是一大优点。

在1621年与西班牙恢复战争状态之后，筹款能力高低无疑是更加重要的因素，因为武装部队的费用逐渐上升，从1622年的1340万佛罗林上升到1640年的1880万佛罗林。即使对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数字，而对荷兰来说尤其突出，因为直接遭受损失或改成中立国家经营贸易，危及了荷兰的海外贸易。因此从政治上看，利用公债筹集战争的相当一大部分的费用是比较容易的。尽管这样做会使官方的债务大幅度增加，1651年时荷兰省的债务为1.53亿佛罗林——国家拥有经济实力，并注意偿还利息，这说明信用制度决不会垮台。这说明了即使是富裕的国家遇到这样的军事开支也会畏缩不前的。这还证实了这样一种说法，即只要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国家财力是否雄厚，荷兰总是有可能超过其他国家的。

四、战争、财力和民族国

这里我们总结一下本章的主要结论。公元1450年以后进行的战争，与“民族国的诞生”关系很密切。在15世纪后期和17世纪后期这段时间内，多数欧洲国家通常在帝王（也有个别地方是在地方诸侯或者一个重商的寡头政治集团）的统治下，出现了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而且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地采用国家征税方法，并由一个官僚机构组织实施。这个官僚机构与那个现存的认为国王应“生活自理”和国家军队的费用由封建课税负担的官僚机构相比，组织方式远为完善。

欧洲民族国的发展有各种原因。经济发展已经削弱了大部分的封建旧秩序，而不同的社会集团必须通过一些更新的契约和责任形式来建立相互之间的关系。在统治者的宗教选择的基础上区分基督教国家的宗教改革运动将民政和宗教权结合为一体，因而使建立在国家基础上的世俗主义进一步发展。拉丁文的衰落，以及政治家、律师、官员和诗人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国语言，更加强化了这种世俗化的趋势。改进交通和通讯设备，更广泛地进行货物交换、发明印刷术、海上的发现，所有这一切不仅加深了对其他民族的了解，还加深了对语言、爱好、文化习惯和宗教等差异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难怪当时很多哲学家和其他作者认为，民族国是尊重公民要求的社会的自然形式，也是最好的形式，因此这种国家的权力应当加强，其利益应当受到保护，而这些国家无论采取什么具体的立宪形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为国家的共同利益和谐地工作。

但是战争和战争的后果比哲理方面的考虑及社会缓慢发展的趋势对"国家建设"所施加的压力紧迫得多，连续性也强得多。欧洲很多王朝凭借军事力量可以使自己高于其统治地区的很多显赫权贵，并确保政治上的一致性和权威性（虽然不时向贵族让步）。军事因素——更确切说是地理战略因素——有助于形成这些新兴的民族国的领土边界。频繁的战争至少以一种消极的方式使人产生国家意识，例如英国人学会憎恨西班牙人，瑞典人学会憎恨丹麦人，荷兰起义者学会憎恨他们的从前的哈布斯堡君主。最重要的战争——特别是那些有利于步兵和钱的设防阵地以及舰队发展的新技术——迫使交战国耗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金钱，迫使这些国家从总收入努力中寻求相应的数量。在军事冲突受到重视之前，关于政府支出全面增长的议论，关于开辟税收的新组织，或者关于改变近代早期欧洲的君主和平民之间的关系等一切议论都失之为空泛议论。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英国的最后几

年，或者在腓力二世统治的西班牙，政府全部开支的3/4用于战争，或偿付以前的战争债务。发展军事力量和海军力量未必总是新的民族国**存在的理由**，但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对这些新国家来说，肯定是耗资最多，而且是最紧迫的任务。

但如果假定，在16世纪和17世纪增加税收、支援军队、装备舰队、下达指示和指导军事战役等职能，是以类似1944年诺曼底入侵的方式实施的，那就错了。正象上述分析指出的那样，近代早期的欧洲的战争机器是笨重的，而且效能很差。在这个时期，军队的建立和管理难度惊人：部队是乌合之众、雇佣兵可能背叛、供应不足、运输紧张、武器不标准，凡此种种使多数指挥官感到毫无办法。即使能拨给足够的军事费用用于在下达部队以前，其中一大笔也会被贪污和浪费掉。

因此，对国家来说，武装部队并不是可以预测的可靠工具。由于供应匮乏，或者更严重的是拖欠薪饷，大批人员失控的现象一再发生。在1572年至1607年期间，佛兰德斯的军队的叛变次数不少于46次；象瑞典在德国的军队，或者克伦威尔率领的新模范军都是很庞大的部队，这些部队的叛变也时有发生，尽管叛变次数没有佛兰德斯的军队那样多。法国首相黎塞留在他留给后世的《**政治遗嘱**》中辛酸地谈到：

> “从历史上看，军队被匮乏和混乱搞垮的例子比军队被敌军搞垮的例子多得多；而我亲眼目睹，在我执政时期，当时从事的一切事业是如何仅仅由于这个原因而存在缺陷的。”

军队的薪金和供应问题在各方面影响部队的战斗力：有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指出，古斯塔夫·阿多夫在德国的非常出色的机动灵活作战方案，不是按照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战略规划要求制订的，这场战斗不过反映了古斯塔夫迫切为他的庞大的部队寻找粮秣。远在拿破仑提出著名的格言之前，指挥员们就知道，部队填

饱了肚子才能前进。

而这些物质方面的制约因素对国家同样产生作用，在筹集战争费用时尤为突出。在这个时期，还没有一个国家（无论这个国家怎样繁荣）能立即支付长期冲突的巨额费用；无论征收什么新的税款，在政府收入和支出之间总存在缺口，这个缺口只能通过贷款来弥合——要么向富格尔等私人银行家贷款，要么后来通过正式组织的公债金融市场交易。可是，战争费用的不断上升一再使统治者拖欠债务、降低铸币成色、或者采取他的非常措施，这些措施只能带来暂时的效益，而对长远却很不利。近代初期的一些国家的政府，正象它们的指挥官拼命设法让部队粮秣充足服从调遣那样，热衷于过只顾眼前不顾未来的朝不保夕的生活。在这个时期，统治者及其官员不得已开展的近乎经常性的工作是，强迫平民增加赋税、强迫富豪和教会“捐助”、与银行家和军火商讨价还价、抢劫运送财宝的外国船只，与很多债权国保持距离。

因此，本章的论点**不是**说哈布斯堡王朝完全实现不了其他国家那样的伟大业绩。这里为进行对比所列的论据并无惊人之处；成败之间的差别很小。所有国家，甚至连联省共和国也由于不断将资源消耗在军事和海战中而感到压力沉重。所有国家都遇到财政困难、部队叛变、供应不足、国内反对增加税收等问题。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遇到的情况相似，这个时期连续不断的战争，几乎把交战国弄得山穷水尽。到三十年战争的最后10年，引人注目的是任何一个盟国的作战部队的规模都不如古斯塔夫和华伦斯泰率领的部队，因为各方都已财尽力竭。而且双方力量悬殊不大，反哈布斯堡力量的胜利不过是相对而言的。比起哈布斯堡，他们好不容易才算最后在物质基础和军事力量之间较好地保持了平衡。至少有些胜利者发现，需要谨慎地利用国家财源，在长期冲突中对此不可漫不经心。不管怎样勉强，到头来他们终于承认，贸易商、制造厂商和农民与骑兵军官和长矛兵同样重要。而

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是有限的，他们比起敌对国处理经济较好的程度来也不大。用后来的威灵顿公爵的话来说：“胜利是千钧一发的险事。”多数重要的力量较量都是如此。

第三章 财政、地理和一系列战争的胜利(1660～1815年)

欧洲列强当然没有因为签署《比利牛斯和约》而结束对抗，或者放弃通过战争解决对抗的习惯。而在166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出现的国际斗争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与前一百年的国际斗争不同；因此，这些变化反映出国际政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660年以后的大国舞台上最重要的特点是欧洲国家已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多极**体系，每一个大国都越来越多地趋于根据“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跨国的宗教事业决定战争或和平。这确实不是瞬间的或绝对的转变：在1660年以前，欧洲国家在采取行动时，一定会考虑他们自身的非宗教利益，而宗教偏见使18世纪的很多国际争端进一步加剧。尽管这样，1519～1659年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即：以奥地利—西班牙为轴心的哈布斯堡帝国同新教国家同盟以及法国的战争此时已经消失，被松散的短期多变的联盟所代替。某次战争中敌对的国家往往在下次战争中结为同盟，这些国家在决策时侧重于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实政治**，而不是坚定的宗教信仰。

对这个多变的多极系统来说，外交和战争上的无穷变幻是很自然的，这种情况是各个时代屡见不鲜的事情，某些国家兴起，而另一些国家衰落；使得多极系统更加复杂。在1660～1661年路易十四掌握大权至1815年拿破仑·波拿巴在滑铁卢战败后投降的一个半世纪的国际对抗中，以前的一些主要国家（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尼德兰和瑞典）沦为二流国家，波兰也变得悄然无声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多方调整其世袭领地的疆域和结构，勉强保持了一流大国的地位；在德国北部，勃兰登堡—普鲁

士为取得这一地位从几乎无望的起点急起直追。在西部，法国为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自1660年以后迅速扩充军事力量。这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正如半个世纪以前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事力量一样，占据着压倒的优势。法国在西欧和中欧称霸受到遏制是在一系列的长期战争（1689～1697年；1702～1714年；1739～1748年；1756～1763年）中，由法国的海上邻国和陆上邻国联合与之对抗才实现的；拿破仑时期，经过改造的法国军队，取得了高卢战争中的一系列军事胜利，仅因其他四个大国联合起来才以失败告终。即使在1815年战败时，法国仍然是欧洲的主要国家之一。因此，进入18世纪时，在以欧洲为核心的范围内逐渐出现一个大致的三方平衡关系，西边有法国，东边有普鲁士的两个德意志国家以及哈布斯堡帝国。

而在这一个世纪里，在欧洲的侧翼，乃至更边远的地区，大国的格局的确出现了重大的调整。某些西欧国家不断地将其位于热带地区（尤其是在印度、东印度群岛、南非和遥远的澳大利亚）的一些不稳定的小块飞地变为大得多的领地。其中开拓殖民地最成功的国家是英国，英国在1688年由威廉和玛丽取代詹姆士二世之后实现了国内“稳定”，作为欧洲最大的海上帝国充分发挥了伊丽莎白时期的潜力。即使到18世纪70年代，拥有强大的防御力量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的美国从这些殖民地中独立出来，英国再也无法控制富庶的北美殖民地了，但这也仅是暂时地阻止了英国在全球的影响的增长。18世纪俄国越过亚洲大草原一直向东和向南扩张。尽管英国和俄国分别位于欧洲的西部和东部边缘，但这两个国家都对欧洲中部的命运颇感兴趣——因为英国与汉诺威王朝有联系（1714年乔治一世即位之后）而干预德国的事务；俄国则决心在决定邻国波兰的命运中拥有主要的发言权。更广义而言，伦敦政府和圣彼得堡政府希望欧洲大陆出现均势，而且为了得到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平衡而情愿干预再三。换句话

说，欧洲国家正出现由5个大国组成的格局，它们是法国、哈布斯堡帝国、普鲁士、英国和俄国，此外还有萨瓦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如西班牙等正在衰落的一些国家。显然它们具有不同的实力，尤其是这5个国家，为什么能留在国家的“主要同盟”中（或者加入该同盟）呢？单纯从军事上进行解释不会失之偏颇。例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时期大国兴衰的主要原因为军事技术和海军技术的变革，这些技术也许对有些国家较为有利，而对其他国家则未必。[1] 当然，武器有许多小的改进：战场上使用燧发枪（带环刺刀），不再有矛兵；尤其是18世纪60年代期间，法国的格里博瓦尔发明新式火炮后，火炮的机动性大大加强；海军用的通称臼炮的短而粗的近程火炮（苏格兰的卡伦公司在18世纪70年代末最早制造）加强了军舰的破坏力。战术思想也有改进。从有关背景看，由于人口和农业产量稳步增加，因而可以组织员额大得多的部队单位（师、军），到18世纪末，依靠富饶的农田，部队的食物较易解决。不妨说，尽管威灵顿在1815年率领的军队与马博罗在1710年率领的军队无重大区别，纳尔逊率领的舰队与对手路易十四的战舰相比，技术上也先进不了多少。

实际上，由于各国的行动都加强了，因此18世纪期间在陆军和海军方面出现的最重大的变化也许是在**编制**方面。说明这种变化的真实例子是路易十四（1661～1715年）统治下的法国，当时柯尔培尔、勒泰利埃等大臣决心加强国王在国内的权力，及国王在国外的更大荣誉。组建法国国防部，设立监督官检查部队的财政、供应和编制，身为总监的马蒂耐制订了加强部队训练和纪律的新标准；设立兵营、医院、练兵场、各种地面补给站，以维持国王的庞大部队，加之，在海上建立集中领导的大型舰队——所有这一切迫使不

[1] 例如，1860年以后出现蒸汽驱动的战舰对英国有利（英国有大量的煤），而对法国则未必有利（法国几乎没有煤）。

甘落后的其他国家纷纷仿效。由国家垄断并使其官僚化的军事力量显然是“建国伟业”的核心部分；这是一个互惠的过程，因为加强国家权力和增加国家资源本身使武装部队拥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在一个世纪以前通常是不存在的。不仅建立了“职业性”、“常备”军和“皇家”海军，而且建立了军事学院、兵营和舰船修理厂等相当发达的基础设施，并由专业人员进行管理。权力是指国家权力，无论它表现为东欧开明的专制政府、英国的议会监督、或者后来革命的法国出现的煽动性力量。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可以很快仿效这种编制上的改进（最突出的例子是彼得大帝在1698年后的20年里改造了俄国的军队），而这些措施本身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继续维持其大国地位。

在解释1660～1815年间大国的相对地位时，财政和地理这两个因素比任何单纯的军事发展要重要得多。这两个因素通常相互影响，把它们放在一起考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了解那个时期多次战争的、乍一看却扑朔迷离、不明就里的成败得失。

一、财政革命

上一章已谈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公贵族已经认识到财政的重要，也认识到给国家创收的经济基础的重要性。18世纪拥有庞大的陆军部队和海军舰队并维护旧制的君主制的兴起，的确要求政府发展经济，设立金融机构来筹集和管理有关资金。再者，英法之间1689年至1815年期间所进行的7次重大战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都是旷日持久的。因此胜利属于大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英国和法国通常都拥有同盟国，所以胜利属于大国同盟体，因为同盟体维持信贷和持续提供给养的能力更强。这些战争实际上是同盟之间的战争，而使战争持续时间更长，因为资源逐渐枯竭的交战国可向实力雄厚的盟国申请贷款和要求支援以维

持战斗。在这类耗资巨大的冲突中，交战各方极端需要的是——借用一句古老的格言——“钱、钱、更多的钱”。恰恰是这种对资金的迫切需要，构成了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所谓“财政革命”的背景，某些西欧国家为了承担其战争费用，逐步发展了一种比较完善的银行制度和信贷制度。

出现财政革命确实有其第二个原因，即非军事原因。这就是硬币长期短缺，1693年在葡属巴西发现金矿以前的年月里尤为突出。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与东方的贸易量增加，为了弥补贸易不平衡，越来越多的白银外流，因而各地的零售商和承销商都抱怨硬币短缺。此外，欧洲贸易的不断增加，尤其是布料和船上用品等基本产品的贸易量稳步上升，加之中世纪欧洲的季节性集市被永久性的交易中心所取代，导致了财务结算的规律性和可预测性的增加，带来了大量使用汇票和信用票据的结果。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以及伦敦、里昂、法兰克福和其他城市都有大量的放债人、商品经销商、金匠（这些人经常放债）、证券经纪人和持有越来越多的联合股份公司股票的股东。这些个人和金融商号采用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已经出现的银行业务，而且稳定地建立了一套国家信贷和国际信贷体系，以支撑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

而在欧洲，给“财政革命”以最大和最持久的维系是战争。如果说，腓力二世执政时期和拿破仑执政时期在财政负担上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不同，那么这种差距显然是够大的了。16世纪的一场战争，费用为数百万英镑；到17世纪末已上升到**数千万**英镑；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主要作战部队的费用有时**一年**达到1亿英镑。从经济角度看，大国之间的这些长期而频繁的冲突对西方的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到底是促进，还是阻滞，是永远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其很大程度取决于人们是设法评估一个国家的**绝对**增长呢，还是一个国家在长期冲突前后的**相对**繁荣和实力？有一点很清楚，这就是，即使是18世纪那些最繁荣和最“现

代的"国家，其正常收入也不能即刻支付这一时期的战争费用。即使设有征税的机构，税收的大量增加肯定会引起国内动荡，而这是所有政权都担心的——这一点在当时遇到外来敌人挑战时尤为突出。

因此，政府能给战争提供足够资金的唯一办法是借债，其做法有销售债券、卖官鬻爵、或更有利的是出售可流通的付息长期公债券。在确信有资金流入的情况下，官员们可授权向军队的承包商、给养供应商、造船厂商和武装部队本身付款。这种筹集大量资金同时又花费很大的双轨制，在很多方面起着风箱的作用，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和民族国自身的发展。

无论所有这一切对后人来说是多么地顺理成章，应着重指出的是，这种体制的成功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建立高效率的筹款机构；保持政府在金融市场上的"信誉"。不奇怪，在这两个方面联省共和国起示范作用，因为商人是政府的一部分，他们希望看到管理国家事务，是按照股份公司的公正的财政原则进行。因此，荷兰的议会能有效地定期为政府开支征税，可将利率定得很低，因而能减少应偿债务，这种做法是合适的。这种做法，由于阿姆斯特丹城开展了许多金融活动而得到明显的充实，不久就使联省共和国在清算债券、兑换货币、提供信贷等方面赢得了国际声誉，自然形成了一种结构、一种气氛，在这种结构和这种气氛中，长期国债被视为普通而正常的。阿姆斯特丹城异常成功地成为荷兰"剩余资本"中心，因而能很快在外国公司的股份中占有股份，而最重要的是能随时，尤其是在战时，订购外国政府的所有各种流动贷款。

这些活动对联省共和国经济的影响不在此赘述。尽管这是很清楚的，如果没有繁荣的商业和生产基地作基础，阿姆斯特丹是不会成为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的。此外，结局也许是不利的，这是因为从政府贷款中得到的固定收入使联省共和国越来越远离生

产经济而蜕变为**食利者**经济，到18世纪末时，联省共和国的银行家不大愿意为大型工业企业的资本承担风险；由于筹措债款轻而易举，结果使荷兰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由于这些债务是用营业税来偿还的，所以使工资和价格上涨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我们所讨论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订购**外国**政府的贷款时，荷兰极少考虑客户的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而更关心客户的财政是否稳定可靠。因此，可以把为俄国、西班牙、奥地利、波兰和瑞典等欧洲国家确定的贷款条件作为衡量这些国家各自经济潜力的一个标准，他们向银行家提供的抵押品，和他们偿还利息和保险费的记录，归根结底，看作他们在参加一场大国间的战争之后成功地振兴国家的前景。因此，18世纪末波兰政府的股份暴跌，而奥地利的信贷在几十年间的雄厚实力令人瞩目——但往往被人们忽视——与波兰形成鲜明对比，这两种情况分别是这两个国家的相对持久力的反映。

能说明金融力量和强权政治之间的重要关系的最好例子是这个时期的两个最强大的对手英国和法国。既然这两个国家的冲突结果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平衡，因此值得比较详细地研究他们的经验。以前有这样一种看法，即18世纪的英国显示出顽强而坚定的商业和工业实力的发展、不可动摇的财政信用和灵活向上的社会结构——而相比之下法国则坚持**旧制**，从其基础看，军事上妄自尊大是靠不住的一堆散沙，经济落后，而且执行僵化的等级制度——看来法国难以再维持下去。法国的税制在某些方面递减的幅度没有英国的那样大。而且18世纪的法国经济在某些方面出现向工业革命“腾飞”的迹象，尽管法国在煤等重要产品方面储量有限。法国的军火生产规模可观，法国拥有很多熟练的工匠，而且某些企业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法国与其邻近的岛国相比，人口多得多，农业粗放得多，而且富裕得多；法国政府的收入以及法国军队的规模使西欧任何对手都相形见绌；法国拥有中央集权

下的统制经济政权，与英国的西敏寺奉行的以政党为基础的政治相比，似乎有较好的内聚力和可预测性。因此，在18世纪时，英国人在注视英吉利海峡彼岸时，对自身的相对弱点比对自身优势更为了解。

尽管这样，英国的体制在财政领域拥有的重大优点加强了英国战时的力量，也保证了英国在和平时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尽管英国执行的一般税制的递减幅度确实比法国的大——就是说英国更多地依赖于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英国的这些特点看来很少引起公众不满。例如，法国有大量的赋税承包人、税务官和其他经纪人，而英国就没有；英国的很多税是“无形的”(对少数的几种基本产品征收营业税)，或者说看来对外国人不利(关税)；英国不征收国内捐税，而法国征收这类捐税使商人不快，抑制了国内商业的发展；英国征收土地税——18世纪大部分岁月的主要直接税——不承认存在特殊的例外，而且对社会大部分成员来说是“无形的”；这些形形色色的税收由一个民选的议会进行讨论和授权，这种议会尽管有种种缺点，但看来比法国执行的旧制有着更广泛的代表性。很重要的一点是，甚至到1700年时，英国的人均收入已略高于法国，此外，这个岛国的居民都乐于而且有能力承担较高的税收，这完全不令人感到意外。最后可以表明——尽管较难用统计数字证明——在英国，直接税的负担比较轻，这种情况不仅使社会富裕人士节省开支的倾向进一步发展（因而在平时可以积累投资资本），而且在战时可大量储备应纳税财产（当时为适应国家应急状态的需要，提高土地税，并在1799年开始征收直接所得税）。因此，到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尽管人口不到法国的一半，按绝对值计算，从税收中得到的年收入首次超过人口比它多的法国。

无论这方面的成就多么显著，而其重要性与英国和法国的国家信贷制之间的重大差别相比，显得逊色。因为事实上，在18

世纪大多数冲突中，为维持战时追加费用而筹措的额外资金几乎有3／4来自贷款。英国在这方面拥有的优势比其他国家更有决定意义。首先，逐步形成一种体制结构，可以有效地筹措长期贷款，并同时安排定期偿还应收债务利息（和本息）。1694年创办英格兰银行（最初作为战争的一项应急措施），稍晚一些时候定期发行国债，与此同时证券交易盛行、“乡村银行”增加，从而加快向政府和企业家提供可用资金。以各种形式增加货币发行量，而又不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信誉损失，这在铸币短缺时期有很多优点。如果不是各届议会有权征收附加税使国家债务有保证的话，如果没有从财政大臣沃波尔到小皮特领导的财政部的努力工作使银行家和公众相信，而他们也受到公共财政公正原则和“节俭”的政府的激励的话，如果商业和工业的稳步发展以及在其中的某些行业中的显著发展未能造成关税收入和货物税收入同步增长的话，那么，财务变革本身几乎是不会成功的。在英国皇家海军保护国家的海外贸易，并抑制敌人的贸易的情况下，即使爆发战争也未能阻止上述几个方面的发展。恰恰是在这些可靠的基础上建立了英国的“信誉”，尽管早期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政治上遭到强烈反对以及象著名的1720年的“南海泡沫”① 遭到失败一样，财政上几乎陷入灾难。英国历史学家指出，“尽管英国在处理公共财政中还存在各种缺点”，“而在该世纪的其他时间里，英国与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相比，更加公道，而且效率更高”。

采取上述措施后，结果不仅利率稳步下降②，而且英国政府发行的债券越来越吸引外国投资者，尤其是荷兰投资者，在阿姆

---

①南海泡沫：英国殖民公司南海公司在南美进行股票投机的骗局。——译者注。

②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39～1747年）时，政府能以3～4%的利率借入大量资金，其利率为马博罗（Marlborough）执政时期利率的一半。

斯特丹市场上定期进行证券交易因而成为英国和荷兰之间的商业和财政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两国经济都产生影响。从强权政治的角度看，它的价值在于采用了一种方式能保证联省共和国的资源不断支援英国的战争努力，这种支援即使在反对法国的斗争中，荷兰由同盟关系改为令人不安的中立态度后也没有减弱。只是在美国革命战争时期——引人注目的是，就在这场冲突中，英国在军事、海军、外交和贸易等方面的弱点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因此英国的信誉降到最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荷兰的资金流动才趋于枯竭，尽管这时伦敦打算提供较高的利率。而到1780年，荷兰人在战争中支持法国，英国政府发现，英国自身的经济实力以及国内可用的资本出现的情况是，即英国的公债几乎完全可以由国内投资者认购。

英国筹措战时公债的能力（公债数额很大，但结果取得成功）可归纳为表2。

表2　1688～1815年英国的战时支出和收入

(单位：英磅)

年　　份	支出总额	收入总额	用公债弥补的差额	公债占支出的百分比（%）
1688～1697	49320145	32766754	16553391	33.6
1702～1713	93644560	64239477	29405083	31.4
1739～1748	95628159	65903964	29724195	31.1
1756～1763	160573366	100555123	60018243	37.4
1776～1783	236462689	141902620	94560069	39.9
1793～1815	1657854518	1217556439	440298079	26.6
总　　计	2293483437	1622924377	670559060	33.3

而从战略上看，从这些数字可得出下述结论，即这样一来，英国就能够做到“战争费用支出与其税收收入完全不相称，而且

在其与法国和法国的盟国的斗争中，在船舶和人员数量上留有决定意义的余地，而如果没有这些船舶和人员。那么以前投入的资源也许会徒劳无功”。尽管在整个18世纪，英国很多评论家对英国大量筹措公债及其可能的后果表示忧虑，而事实仍然是（用贝克莱[1]主教的话来说），信贷是“英国超过法国的重要优势”。最后，国家开支的大量增加，尤其是英国海军部的合同对铁、木材、布匹以及其他物品的长期大量需求，因而形成一种“反馈回路”，有助于英国发展工业生产和促进技术上的一系列突破，这样一来，英国又多了一项超过法国的优势。

法国人为什么不针对英国人的这些传统做法采取对应措施呢？现在对这个问题就容易看清楚了。首先，法国没有适用的公共财务制度。从中世纪起，法国君主制的财务经营活动是由一系列的机构进行“管理”的，这些机构是市政府、教会、省议会和越来越多的赋税承包人，这些机构征收税款，对王室的收入专卖权进行监督，这些机构同时还根据从这些财务经营活动中得到的预期收入向法国政府预付资金（利率相当高）。这种财务经营活动的收受贿赂行为不仅在征收烟草税和盐税的一般赋税承包人中存在，而且在负责征收**人头税**等直接税的教堂收款员、地区收款人和总负责人等人员中也存在。各下层组织将“截留部分”中饱后，再将税款送交上一级组织；各下层组织人员首先还按照得到官爵付出的费用的5%收取利息；而且很多职务更高的官员被控告直接向政府承包商交费，或者不是先将其收入交给国库，而是先作为工资进行截留。这些人也向王室放债收取利息。

这类不严肃而又混乱的征税机构本来是腐败的，多数纳税人的钱最后进了个人的腰包。有时，尤其是战后对财务经营人员进

[1] 贝克莱（Berkeley，1685～1753）：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传教士。——译者注。

行的调查表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被劝诱缴纳“补偿费”，或者同意降低利率；但这些措施仅仅是姿态而已。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真正的被告”是“税制本身”。由于效率很低，由此造成的又一后果是，至少在18世纪70年代，法国财政总监内克（1732～1804年）进行改革之前，总的说来还没有国家会计制度；收支的年度结算以及赤字问题很少有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只要君主制能筹集资金以满足军队和宫廷的直接需要，那么国债的不断增加就几乎没有什么了不起。

尽管更早一些时候，斯图亚特王朝也有这类不负责任的现象，但实际上到18世纪时，英国逐渐形成了一种由议会监督公共财政的形式，这种财政管理形式使英国在争夺盟主地位的斗争中拥有很大优势。看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支出和国债增加不损害（而事实上也许还增加了）英国在商业上和工业上的投资，而看来法国早已鼓励剩余资金持有者购买官爵或年金享受权，而不是鼓励在商业上投资，这在当时已是普遍现象。有时还确实设法向法国提供一家国家银行，以便能适当地管理债务，并提供低息贷款；而这类计划往往遭到与现有体制有利害关系的人的抵制。因此，法国政府的金融政策，如果确实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总是小本经营之举。

法国的商业发展在很多方面受到损害。例如，应当指出，象拉罗歇尔这样的法国港口与利物浦或格拉斯哥等英国港口相比，装卸条件较差。所有这三个港口都准备利用18世纪迅速发展的“大西洋经济”，而拉罗歇尔港特别适合于与西非和西印度群岛进行三角贸易。可惜法国港口本来在商业上很有发展前途，一再遭到王室的掠夺，王室“对财政需要贪得无厌，一刻也没有放松过索取新的数额更大的收入”。“对商业征收的”大量的“沉重的、不公平的和反复无常的直接税和间接税”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卖官鬻爵限制了地方资本在贸易上的投资，而且这些贪官污吏横征暴

敛使这种趋势更加严重；垄断性的公司限制了自由企业的发展。再者，尽管王室在18世纪60年代强迫拉罗舍尔市居民建造一家大型的造价昂贵的兵工厂（占用了该市的全部收入），而当战争爆发时，王室不提供任何一点报酬。因为法国政府往往将注意力放在军事目标上，而不是放在海上目标上，与占优势的英国皇家海军经常发生冲突，这对拉罗舍尔港口来说是一场灾难，在港口停泊的船只遭到掠夺，法国赖以创收的贩卖奴隶的活动被迫中断，法国在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等地的海外市场只得关闭——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海上保险费用迅速增长和征收紧急税的情况下发生的。法国受到决定性的打击，还表现在法国政府往往感到被迫让其海外殖民地开拓者在战时与中立国航运业进行贸易，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到缔结和约时，恢复这些市场更加困难。而相比之下，在整个18世纪期间，英国在大西洋地区的经济稳定发展，而且甚至在战时尽管受到法国私掠船的攻击，也有可能从政府的一些政策中受益，这些政策体现了利润与权力、贸易与优势是不可分的。

法国财政不成熟的最糟结局是，在战争期间，法国发展军事力量和海军力量的势头在很多方面都减退了。由于法国的体制不仅效率很差，而且不可靠，因此（譬如）获得海军补给品需要较长的时间，而法国海军合同的承包商与英国海军或荷兰海军的合同的承包商相比，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费用。对法国君主制来说，战时筹措大笔款项总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即使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时，由于愈来愈多地利用荷兰的资金来解决法国货币长期升值、法国拒绝偿付部分债务、法国对短期票据持有者和长期票据持有者任意采取损害他们利益的行动，所有这一切促使银行家要求——而且促使处于绝境的法国国家同意——使利

率远远高出向英国和欧洲其他很多政府支付的利率①。即使法国愿意以高息举债，波旁王朝仍未得到在长期战争中维持全面军事努力所需的费用。

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岁月最能说明法国的这种相对弱点。这场战争对英国人来说是一场很难引以为荣的冲突，英国失去了最大的殖民地，国债上升到约2.2亿英镑；而既然这笔费用主要是以仅仅3%的利率借来的，每年偿还金额总数仅有733万英镑。而对法国来说，战争的实际损耗要少得多；法国毕竟是在财政总监内克努力平衡预算之后，中途介入冲突的，而且这一次法国不需要部署一支庞大的军队。尽管这样，法国政府在这场战争中至少花费了10亿里佛尔，实际上所有这些费用都是用流动贷款支付的，而流动贷款的利率至少比英国政府所得贷款利率高一倍。在这两个国家中，偿付债务的费用都占国家岁出的一半，而在1783年以后，英国立即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偿债基金是一种统一收入基金，改进的公共会计），以稳定这个总额，并提高其信誉——这一项措施也许是小皮特的最重大的成就。而法国的情况则相反，大量的新贷款每年流入，因为"正常"收入甚至与和平时期的开支都决不可能相称；随着每年赤字不断增加，政府的信用进一步降低。

令人吃惊的统计结果是，到18世纪80年代末，法国的国债也许与英国的国债几乎不分伯仲，都约为2.15亿英镑，但法国每年付息1400万英镑，几乎比英国多一倍。更糟的是，以后各届财政总监征收新税的努力遭到公众的强烈反对。归根结底是卡隆提出的税收改革导致建立贵族院，采取抵制议会的措施、国库中止付款，尔后在1789年（1614年以后是首次）召集议会，促

①路易十四执政早期，法国能以较低利息借债，利率低于斯图亚特王朝，乃至威廉三世执政时期的借债利息。

使法国旧制的最后垮台。在国家破产和革命之间显然确有联系，在以后出现的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政府进一步增加纸币发行（其数额为 1789 年 1 亿里佛尔，1790 年 2 亿里佛尔），这种纸币被立宪议会采取的权宜办法（没收教会领地，再根据立宪议会对价值的估计发行货币）所取代。所有这一切导致通货膨胀更加严重，而 1792 年关于参战的决定只能使通货膨胀越发严重。后来由于国库本身进行管理改革，和革命政权决定搞清事实真相，结果确实稳定地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官僚性质收税结构，与英国和其他国家当时的结构类似，而延续到 1815 年的国内骚动和过分向外扩张使法国经济进一步衰退并落后于其主要对手。

增加收入以支付现有——还有以前的——战争费用这个问题是所有政权及其政治家全力解决的问题。即使在和平时期，维持武装部队的费用占国家支出的 40～50%；在战时，国家支出大得多，维持武装部队的费用占国家支出的 80%乃至 90%！因此，任何国家不管拥有什么政体，在整个欧洲，专制独裁帝国、君主立宪制以及资产阶级共和国都面临同样的困难。在每一回合的战斗之后（尤其是 1714 年和 1763 年之后），多数国家极其迫切地需要喘息，从经济衰竭中复苏，设法消除往往由于战争和增加税收造成的国内不满；而欧洲的国家体制具有竞争的、利己主义的性质，这意味着**长期的**和平是异乎寻常的，也意味着再用几年时间为下次战争作准备。而如果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这三个欧洲最富裕的民族几乎承担不了财政负担的话，那么贫困得多的其他民族又怎么能够承担呢？

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是这些民族也承担不了。尽管连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从经营得法的皇室广大领地和专卖权得到大部分收入，在不求助于以下三种“特殊”收入来源的情况下也满足不了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的大量需要，这三种收入来源是：降低铸币成色、掠夺萨克森和梅克伦堡；1757 年之

后，从其较富裕的盟国英国得到可观的补贴。对效率更差和更加分散的哈布斯堡帝国来说，承担战争费用问题很严重；而且很难相信，俄国或西班牙的情况会更好些，在俄国和西班牙，除了对农民和尚不发达的中产阶级进一步榨取外，筹集资金的前景渺茫。在这样多的旧制社会阶层（例如匈牙利的贵族、西班牙的教会）要求免税的情况下，即使提出精心筹划的间接税、降低货币成色和印刷纸币等措施也几乎很难维持和平时期苦心经营的军队和宫廷；而且由于战争爆发，结果采取了防范国家紧急状况的特殊财政措施，而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西欧的金融市场，或者更理想的是，利用伦敦、阿姆斯特丹或巴黎提供直接补贴以招募雇佣军和购买补给品。也许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公贵族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口号，叫"不要钱，不要瑞士人"，但即使在腓特烈时代和拿破仑时代，这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生活现实。

但这并不是说，在18世纪的一系列战争中，财政因素总是决定国家的命运。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但仅仅这一点不能使作为一个主要强国的联省共和国免于消亡；反之，俄国在经济上落后，而且政府相对地缺少资金，但是，俄国在欧洲事务中的影响和势力不断增长。为了说明这种表面上的矛盾现象，需要同样注意第二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即地理因素对国家战略的影响。

二、地缘政治学

因为在整个18世纪，欧洲的强权政治本身具有必然竞争的性质，而且盟国的关系反复无常，敌对国家在各项重要冲突中遇到的情况往往截然相反，运气时好时坏。秘密协议和"外交革命"使强国的联合关系不断变化，结果欧洲的军事平衡和海军平衡经常变化。这样一来当然要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善

于折冲搏俎，更不用说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了，而这一点也说明地理因素很重要。这里说的地理因素，不仅是指某国的气候、原料、农业生产率和利用贸易通路等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对国家整个繁荣来说都很重要——而且也指在这一系列的多边战争中，战略地位这个重要问题。某个特定的国家能否集中力量在一条战线上作战，或者必须在多条战线上作战？这个国家与弱国或强国是否有共同边界？这个国家主要是一个陆军强国、海军强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种类型的国家有何利弊？如果这个国家想摆脱中欧的某次大战，能否容易实现？它能否从海外得到其他资源？

联省共和国在这个时期的命运是说明地理对政治的影响的一个范例。在17世纪初，联省共和国有很多国内因素利于国家的发展，这些因素是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治军有方、海军强大；从地理上看，并无不利条件。反之，联省共和国的江河溪流构成了抵御西班牙部队的障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加上联省共和国在北海地区的地位，使其很容易进出青鱼资源丰富的渔场。而在一个世纪以后，荷兰却与很多对手争夺本来属于自己的利益。克伦威尔执政的英国和柯尔培尔执政的法国执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对荷兰的商业和海运业不利。由于特隆帕和德鲁泰尔等指挥官拥有卓越的战术才能，荷兰商人在荷兰与英国进行海战期间必须经受英吉利海峡航道的严峻考验，或者绕道苏格兰（这条航路距离较长，而且风暴更多），苏格兰与其青鱼渔场一样，在北海地区容易遭受攻击；经常刮西风，因而战斗对英国海军将领有利；荷兰近海水浅，限制了荷兰战舰的吃水深度，归根结底限制了荷兰战舰的尺寸和威力。荷兰在波罗的海的转口贸易是促进荷兰早期繁荣的重要基础之一，这种贸易在瑞典人和地区其他对手的干扰下有所削弱，这种情况与荷兰同南北美洲和东印度群岛的贸易越来越多地遭到英国海军力量的干扰一样。尽管荷兰人通过向受威

胁地区派出庞大的作战舰队可以暂时表明自身的立场，而对远离荷兰海域易受攻击的利益却无法永久地保持下去。

从17世纪60年代末起，荷兰动辄遭到来自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的陆上威胁，使荷兰的上述困境更加严重。既然这种危险比一个世纪前西班牙造成的威胁还要严重，荷兰人被迫扩充自己的军队（到1693年，荷兰军队有9.3万余人），并动用更多的兵力守卫南部边界的要塞。荷兰耗费的精力表现在两个方面：荷兰将其大量资金用到军费支出上，结果战争债务螺旋上升、偿付利息、增加营业税、实行高工资，从而削弱了国家商业的长期竞争能力；而且在战争期间使人民的生命蒙受严重损失，令人费解的是，当时人口一直停留在200万左右。因此，在1702～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一系列势均力敌的激烈战斗中，由马博罗造成的重大损失当然惊人，马博罗同意英国—荷兰联军伤亡惨重地从正面攻击法军。

威廉二世在1689年加强同英国联盟拯救了联省共和国，但同时也是促使作为独立的大国的联省共和国的地位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情况与200年后的情况又何其相似：对于马博罗的远亲温斯顿·丘吉尔领导下为救亡而战斗的英帝国来说，租借法案以及同美国联盟既是一种援助，也是促使英帝国削弱的因素。荷兰人在1688年至1748年与法国进行的各种战争中资源不足，这意味着荷兰人要将国防支出的3/4用于军事，因而忽视了海军的发展——而英国人增加了用于航海和殖民地的份额，并因而得到越来越大的商业利益。总的说来，由于伦敦和布里斯托的商人迅速增加，阿姆斯特丹的商人遭受损失。由于英国人在战时经常阻止与法国的一切贸易，因而荷兰遭受的损失越发严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荷兰人愿意保持这种有利的联系，这也反映出联省共和国在这个时期参与和依赖对外贸易和外来资金的程度，而英国经济相对说来仍然是自足经济。即使到联省共和国在七年战

争中转为中立时，上述局面对荷兰没有什么帮助，因为骄横不可一世的英国皇家海军拒不接受“航运自由，货物免税”的原则，决心阻止法国在中立的基础上进行海外贸易。在美国独立战争早期，英国和荷兰在1758～1759年就这个问题一再进行外交争吵，最终在1780年以后发展成为公开的敌对状态，这一结局无助于英国或联省共和国的海运贸易。到爆发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斗争时，荷兰人发现自身夹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处境日益困难，由于普遍拒付债款而受到损害，此外还出现国内分裂，在一场既无法避免又无法利用的国际争夺中，丧失殖民地和海外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财务专长和依靠“剩余资本”是完全不够的。

与上述情况大致类似，尽管在18世纪期间，法国在更大的规模上受到两种混合力量的损害，其一是将精力转向大陆目标，其二是将精力转向实现海上霸权和开拓殖民地的野心上。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在战略上的这种矛盾心理并不那么明显。法国的实力仍牢固地建立在其固有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法国拥有广袤和相对划一的领土，农业自给自足，人口约2000万，因而路易十四在1666年可将军队从1659年的3万人增加到1666年的9.7万人，到1710年扩大到可观的35万人。太阳王外交政策的目标也是以陆地为基础的传统目标，即进一步削弱哈布斯堡的地位，其措施是在南部与西班牙对抗，在东部和北部与法兰斯、孔德、洛林、阿尔萨斯、卢森堡和南尼德兰等西班牙–哈布斯堡和德国的一系列的容易遭受攻击的领土对抗。在西班牙财尽力竭、奥地利人被土耳其的威胁分散注意力、英国人最初持中立或友好态度的情况下，在20年的时间里路易在外交上取得成功；但法国人在提出要求时妄自尊大，使其他强国感到不安。

对法国来说，主要的战略问题是，尽管防御力量很雄厚，但法国不那么适于开展征服他国的决定性战役：法国在每个方向上

都存在地理障碍，很多大国眼下又提出的权利要求和利益等。例如，对哈布斯堡王朝占据的南尼德兰进行攻击，免不了要通过布满森林和水网的土地上进行艰巨战斗，而且不仅促使哈布斯堡王朝各国作出反应，还促使联省共和国和英国作出反应。法国进入德国的军事活动也很困难：虽然突破边界线比较容易，但交通通信线却要长得多，而且会再次遇到奥地利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尤其在 1714 年汉诺威王位继承战争之后）和普鲁士人必然组成的联盟。即使到 18 世纪中期，法国乐于物色强大的德意志伙伴，即奥地利或普鲁士时，任何这类联盟的自然结果是另一个德意志强国成为对立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努力得到英国和俄国的支持以抵消法国的野心。

再者，与海军强国进行的每次战争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法国对（欧洲）大陆的精力和注意力，因此打好陆战也不太可能。由于法国对于在佛兰德斯、德国和意大利北部作战，还是在英吉利海峡、西印度群岛、下加拿大（魁北克的旧称）和印度洋作战犹豫不决，结果法国战略一再“两头落空”，失去良机。尽管法国连续几届政府从来不愿意在财务上无保留地去与皇家海军争夺优势[1]，还是将钱用在加强海军建设上——而如果法国仅仅是一个陆军强国，这些钱本来是可以用来加强陆军建设的。只是在 1778～1783 年的战争中，法国通过支持西半球美洲殖民地的起义者和避免采取进犯德国的任何措施，法国才设法让英国对手丢脸。法国在所有战争中从来没有战略上集中力量的奢望，并因而受到损害。

[1] 例如，在1689～1697年和1702～1714年的一系列冲突中，法国的开支总额不到 10%用于海军、57～65%用于陆军（英国的开支总额有 35%用于海军、40%用于陆军）。在 1760 年，法国海军得到的经费只有陆军的 1／4。即使经费在需要时可以提供，但法国的地理位置意味着，在战时，法国往往很难从波罗的海得到海军补给品和将海军舰队组织得井然有序。

总之，维持旧制的法国从其版图、人口和财富来看，始终还是欧洲最大的国家；但是法国的版图或其组织效能还不足以成为“超级大国”，再加上受到陆地的限制和海上的牵制，法国无法战胜其他国家为对付法国的野心时必然结成的联盟。法国的行动进一步确定了而不是打乱了欧洲强国的多元性。只是在法国国民的注意力由于爆发大革命而发生变化，而且后来被拿破仑出色地利用时，法国才能暂时将其想法强加于大陆。但是尽管法国取得短暂的成功，但任何军事天才也不能确保法国永久控制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更不用说俄国和英国了。

法国在各条战线上必须对付地缘战略学上潜在的敌人，这并不是法国才有的，这一点即使由于法国一再对外侵略，而且很长时间方向又不明确，因而形势变得更糟的情况下，也不例外。这个时期德意志的两个强国，即哈布斯堡帝国和勃兰登堡-普鲁士，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原因，也注定要设法解决同样的问题。对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来说，这决不是新鲜事。他们统治的形状别扭的一些领土集合体（奥地利、波希米亚、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匈牙利、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和1714年以后还有尼德兰（见地图5）以及其他强国与这些领土的关系中的地位，需要在外交上和军事上施展可怕的欺骗手法，而其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持继承权；而增加继承权需要天才或好运气，也许两者都需要。

因此，尽管1663～1664年、1683～1699年、1716～1718年、1737～1739年、1788～1791年的与土耳其人进行的战争表明，总的说来，哈布斯堡军队增强了在巴尔干各国中的地位，与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进行的这场斗争在上述各段时间消耗了维也纳的大部分精力。例如，在土耳其的军队于1683年即将打进奥地利帝国首都的情况下，尽管就在这一年，面临路易十四策划的阿尔萨斯和卢森堡“合并”的挑衅行为，利奥波德一世仍决心对法国保持中立。在九年战争（1689～1697年）和后来的西班牙王

位继承战争（1702～1713 年）期间，奥地利的矛盾心理不那么明显，因为当时维也纳已成为规模很大的反法同盟的一部分；但即使在那时，奥地利的矛盾心理也没有完全消失。18 世纪的多次战争看来仍然更加多变，后果更加无法预测，这归因于保护哈布斯堡在欧洲的总利益和在普鲁士兴起之后具体保护哈布斯堡王朝在德国的利益。至少从 1740 年普鲁士占领西里西亚省起，维也纳在执行外交和军事政策时总要密切地注视着柏林。这样一来，哈布斯堡的外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煞费苦心：牵制德国内部新兴的普鲁士，奥地利人需要西部的法国提供援助，而需要东部的俄国更经常地提供援助；但法国靠不住，还时常（例如 1744～1748 年）需要英国和奥地利组成的同盟来牵制法国。再者，俄国的稳步发展是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沙皇的扩张主义对奥斯曼帝国构成威胁，维也纳希望得到的巴尔干各国又被奥斯曼帝国抓住不放时，这一点尤其突出。最后，当拿破仑帝国主义对欧洲所有其他强国的独立地位提出挑战时，哈布斯堡帝国除了参加可利用的一切同盟与法国争夺霸权外，别无其他选择。

奥地利的弱点，从 18 世纪初联合起来与路易十四进行的战争，以及在波拿巴即将复灭时，与波拿巴进行的战争中也许不太容易看清楚，而从两场战争期间的一系列冲突中看，就比较清楚。在 1740 年以后与普鲁士进行的长期斗争特别说明问题：这场斗争表明，就这个时期在哈布斯堡领地进行的军事、财政和管理等方面的所有改革而言，维也纳无法战胜另一个比它小的德意志国家。这个德意志国家在军队、财政收入、官僚统治等方面效率高得多。再者，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法国、英国和俄国等非德意志强国不希望奥地利消灭普鲁士，也不希望普鲁士消灭奥地利。在更大的欧洲范围内，哈布斯堡帝国已成为一个**勉强够格**的一流强国，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 1918 年。它肯定不会象西班牙和瑞典那样从名单中消失，而且它也避免波兰那样的结局；但

因为哈布斯堡权力分散、有各种种族，而且经济落后，因此维也纳后来的一些政府将哈布斯堡变为欧洲最强大国家的企图都一一落空。尽管这样，作出哈布斯堡王朝将衰落的预测是危险的。正如奥尔温·赫夫汤所说，“在有些人看来，奥地利帝国坚持不懈地拒绝动辄就分裂”，这说明了它的潜在实力。在一项又一项的改革（**恢复**）之后，往往灾难接踵而来，这些所谓**恢复**表明，奥地利帝国的资源十分雄厚，即使这些恢复还表明，维也纳在获得这些资源的过程中总是遇到很大困难。研究哈布斯堡王朝衰落的各历史学家对1792～1815年的近14年中，哈布斯堡在军事上与法国帝国主义的精锐部队进行对抗，这种对抗非常顽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地缘战略学的角度看，普鲁士的情况与奥地利非常相似，尽管国内情况有相当大的区别。普鲁士迅速上升为德意志北部的最强大的王国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这里无须赘述：勃兰登堡大公腓特烈·威廉（1640～1688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年）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三位领导人的组织天才和军事天才、容克贵族担任军官的普鲁士军队的战斗力很强，国家应征税资源的4／5用于这支军队；财政（相对）稳定，财政建立在广大的王室领地的基础上，并鼓励贸易和工业发展；乐于使用外籍军人和外国企业家；普鲁士的著名官员由国防专员公署领导。普鲁士兴起的同时，恰好瑞典解体、动乱迭起和衰弱的波兰王国瓦解以及在18世纪的最初几十年的多次战争和哈布斯堡帝国的王位继承捉摸不定的变化给维也纳带来混乱。如果普鲁士的帝王利用他们的机会，那么事实是，这些机会都可以利用。再者，在填补1770年以后在欧洲中部和北部出现的“权力真空”的过程中，普鲁士政府也从它对其他大国的立场中受益。俄国自身的兴起有助于迷惑（或削弱）瑞典、波兰和奥斯曼帝国。法国远在欧洲西部。因而通常不很危

险；实际上，法国有时可成为对抗奥地利的有用的盟国。如果，从另一方面说，法国积极向前推进到德国境内，那么法国很可能遭到哈布斯堡部队、汉诺威（因而还有英国）、也许还有荷兰人以及普鲁士的反对。最后，如果这种同盟失败，那么普鲁士与巴黎媾和比与其他国家媾和容易；对柏林来说，反法同盟有时有用，但并非绝对必要。

在这种外交上和地理上有利的情况下，普鲁士早期的一些国王在策略上运用得很得当。尤其是，得到西里西亚（有人称其为东部的工业区），使普鲁士的军事经济能力大大增强。可是普鲁士在欧洲事务中的实际权力有限，版图和人口也有限，所有这一切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都无情地暴露出来，外交环境不再那么有利，而且腓特烈大帝强大的邻国决心惩罚他的狡诈行为。只是普鲁士国王及其训练有素的部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加上敌人不协调，因而帮了忙，腓特烈才得以在这种十分危险的“包围”中避免失败。这场战争在人力和物资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随着普鲁士军队从18世纪70年代起不断僵化，柏林经受不了俄国后来施加的外交压力，更不用说拿破仑在1806年的大胆攻击了。即使沙恩荷尔斯特、格奈森瑙和其他军事改革家后来领导的改革也无法掩盖普鲁士从1813～1815年在实力基础方面仍然不足。当时从军事上看，普鲁士与俄国相比黯然失色；普鲁士严重依赖向反法同盟提供主要经费的美国补贴；普鲁士仍然无法单独与法国抗衡。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统治的王国与奥地利一样，是大国中实力最弱的国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进行工业变革和军事变革。

相比之下，俄国和美国这两个比较遥远的国家相对说来不容易受到攻击，而且不存在战略上的矛盾心理问题，18世纪时曾使欧洲中部国家十分为难。这两个未来的超级大国当然存在需要密切注视的“易受攻击的边界”；而当美国穿过阿勒格尼和大平原

进行扩张和俄国穿过大草原进行扩张时，他们都没有遇到危及他们国内基地的军事上先进的对手。因此，他们在各自与西欧打交道时，具有“前线”比较单一的优点。他们能对人们确认的某些大国进行挑战，或者至少使这些国家分散精力，与此同时，由于这两个国家都远离欧洲的主要作战地区，因而他们不容易受到攻击。

当然，在论述1660年到1815年这段漫长时期，重要的是强调，将这段时间末期和初期相比，美国和俄国的影响更加明显。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欧洲所管辖的“美洲”仅仅是一系列孤立的沿海居民点，而在彼得大帝（1689～1752年）统治之前的俄罗斯几乎同样偏僻，甚至更加落后；从商业上看，各自都是“不发达”，是木材、大麻和其他原料的生产国、英国和联省共和国产品的购买国。美洲大陆在这段时间里主要是一个争夺的目标，还不是一种力量因素。改变这种局面的事件是英国在七年战争结束（1763年）时取得势不可挡的胜利，将法国赶出加拿大和新斯科舍，将西班牙赶出西佛罗里达。美洲殖民者在不受外来威胁（这种威胁曾造成效忠于英国国会的局面）的情况下，能坚持与英国仅仅保持名义上的联系时，而在帝国政府改变主意，不同意这样做时可进行起义。再者，到1776年，北美洲的殖民地有了很大发展：200万人口每30年翻一番，人口向西繁衍、经济繁荣、粮食和很多其他商品实现自给。正如英国人在以后7年中发现的那样，这意味着仅仅通过海上作战实际上无法对起义的各州实施攻击，而从3000英里外的本土调遣陆军则费用过于昂贵，因而不可能征服它们。

在这段时间里，存在独立的美国，对世界列强的格局变化来说，有两个重大结果。一个结果是，从1783年起，在欧洲以外存在一个生产、财富和军事力量（这是最根本的）的中心，这个中心将以某些方式对全球的力量均势产生长远影响，而中国和印

度等欧洲以外的经济上正在衰退的其他国家是不能以这类方式产生这类影响的。到 18 世纪中期，美洲殖民地在海上贸易格局中已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工业化最初开始出现徘徊不前的局面。根据某些材料，在 1776 年，这个新兴国家的生铁和铁条的产量超过全英国的总产量；而且此后工业产值增加近 50 倍，因此到 1830 年，美国在世界发达国家中成为名列第六的工业国。假定美国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甚至在 18 世纪 90 年代，有些观察家就预测，美国在下个世纪中将发挥重大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第二个结果是，更快地被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意识到，英国在欧洲政治中作为一个"侧翼"强国的作用，由于在英国的大西洋前线出现一个潜在敌对的国家而受到影响，这个国家对英属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等领地构成威胁。当然，这不是一成不变的问题，而且美国与英国确实相距很远，加上美国坚持孤立主义，这一切意味着，伦敦不必象维也纳对待土耳其人或后来的俄国人那样认真地对待美国人。尽管这样，1779～1783 年和 1812～1814 年的战争过程非常清楚地表明，如果在英国的背后存在一个敌对的美国，那么对英国来说，全力以赴地参加欧洲的斗争，困难有多大。

沙皇俄国的兴起对国际均势有更直接的影响。俄军在波尔塔瓦战役（1709 年）中重创瑞典军，促使列强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偏僻而且有点野蛮的莫斯科大公国一心想在欧洲事务中起作用。随着第一个野心勃勃的沙皇彼得大帝迅速建立一支海军以补充其在波罗的海的一些新据点（卡累利阿、爱沙尼亚、立窝尼亚），瑞典人不久请求英国的皇家海军进行援助，以免被这个东方巨人占领。可是实际上，由于俄国的兴起，受损失最严重的是波兰人和土耳其人，叶卡特琳娜女皇到 1796 年去世之前，这个疆土辽阔的帝国又增加了 2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俄国军事力量对西方的入侵看来甚至给人更深刻的印象。在七年战争期间，俄

国的部队十分残忍，但又顽强得令人吃惊，俄国在1760年暂时占领柏林，所有这一切使德意志国王腓特烈一世对其邻国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40年以后，在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1798～1802年）期间，俄国部队在苏沃洛夫将军率领下，在意大利和阿尔卑斯战役中都勇敢善战；第二次反法同盟在远离俄国的地区作战，这次作战是1812年至1814年期间俄国军事力量无情地从莫斯科向巴黎推进的一种预兆。

到18世纪时，很难确切衡量俄国是几流国家。俄国军队的兵员往往超过法国；俄国在纺织品和铁等重要产品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对俄国的任何对手来说，俄国至少是一个从西部极难征服，也许是无法征服的国家；俄国拥有"火药帝国"的地位，因此它能打败东方的游牧部落，而且因而得到更多的人力、原料和可耕地等资源，这样一来又增强了它在大国中的地位。这个国家在政府的指导下，显然决心用一切办法实现现代化，尽管这项政策的速度和成绩往往言过其实。落后迹象依然在多方面存在：贫困和残忍程度令人震惊、人均收入极低、交通通信设施差、气候恶劣、技术和教育停滞不前，更不用说罗曼诺夫王朝种种反动而有害的特点了。即使是令人生畏的叶卡特琳娜在经济和财政方面也没有造就什么令人瞩目的业绩。

还有，在18世纪时，欧洲的军事结构和技术相对稳定，这样俄国就可以（通过借鉴外国的专业知识）赶上并超过一些资源较少的国家；这种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只是到了下个世纪工业革命改变战争规模和速度时才真正消失。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时间里，尽管存在上述缺陷，俄国军队有时可能是一支难以对付的进攻力量。这个国家将那么多的财力（也许占国家财力的3/4）用于军事，而一般军人都能坚忍不拔地经受那么多的艰难困苦，因此俄国军队可进行一系列的远距离作战，这是18世纪多数国家的军队所做不到的。俄国的后勤基础（骑兵素质差、供

应系统效率低、军官无能）往往不足以维持大规模的独立作战，这是事实——1813～1814 年向法国推进时曾穿过“友好的”地区并得到英国的大量补贴，而这些不常见的作战行动，即使在七年战争以前也足以使俄国赢得非同小可的声誉，并在欧洲的一些会议中取得主要地位。从大战略的角度看，俄国是在欧洲平衡中能起作用的另一个强国，因而大大有助于迫使法国在这个时期控制欧洲的种种努力以失败告终。

尽管这样，恰恰是托克威尔[1]等 18 世纪初的作家在谈到遥远的将来时说，看来，俄国和美国“由于上帝决心要支配半个世界的命运而变得引人注目”。在 1660 年和 1815 年期间，是英国这个海洋国家，而不是欧洲大陆的其他大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把法国最终撵出了首屈一指的大国地位。地理因素也在这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不是唯一的作用）。马汉[2]在几乎一个世纪以前（1890 年）在其撰写的题为《海军大国对历史的影响》经典著作中对英国地理位置的优势作了如下论述：

> “……如果一个国家的位置既不是被迫在陆地保卫本国，又不是被诱使利用陆地设法扩充领土，与以大陆作为部分边界的民族相比，这个国家可通过将其目标集中地指向海洋而取得优势。”

当然，马汉的论述提出了很多的其它假设。其一是假定英国政府不会在其侧翼上分散注意力，这一点在 1707 年征服爱尔兰并颁布《与苏格兰合并法案》后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值得指出，后来法国人有时设法沿着塞尔特边缘故意给英国制造难堪，对此伦敦确实是非常认真对待的。爱尔兰人起义就在英国本土附

---

[1] 托克威尔（de Tocqueville）：法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译者注。

[2] 马汉（Mahan）：美国海军军官及历史学家，被西方公认为研讨海军战略问题的权威。——译者注。

近，与英属美洲殖民地的起义者造成的战略困难不同，对英国人来说，英国这种易受攻击的局面幸好从来未被敌人真正利用过。

在马汉论述中的第二点假设是，假定英国在海战和海上力量方面优于与它抗衡的陆地国家。这是所谓的“海军第一主义者”战略学派的根深蒂固的信念，这种想法看来在公元1500年以后的经济和政治趋势中有着充分的理由。商船的主要航线不断地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以及在西印度群岛、北美洲、印度次大陆和远东的殖民地和商业企业中能得到的巨大收益，当然对一个位于欧洲大陆西侧附近的国家有利。这肯定也需要政府了解海上贸易的重要性，并承担庞大的战舰舰队的费用。根据上述先决条件，看来到18世纪时，英国的政治名流已发现确保国家财富的能力不断增长的治国良方。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加速了英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给英国财政部提供了资金，而且对殖民地来说是生命线。这些殖民地不仅为英国产品提供了市场，而且还提供很多原料，其中有宝贵的糖、烟草和白布，还有日益重要的北美洲的海军补给品。而英国皇家海军保证在和平时期尊重英国商人和在战时保护他们的贸易，并得到更多的殖民地，这样在政治和经济上对国家有利。因而贸易、殖民地和海军构成了“有效的三角关系”，互相起作用，从长远看，这对英国有利。

对英国的兴起这样进行解释有的是对的，但并非都对。马汉的著述和很多重商主义者的著述相类似，往往强调英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性，而不太重视国内生产，尤其是夸大了“殖民地”贸易的重要性。在整个18世纪，农业仍然是英国财富的基础，而出口(在18世纪80年代之前，出口占国民收入总值的比例也许不到10%）往往遇到外国的激烈竞争，而且遇到关税问题，而这些关税是任何海军强国也无法补偿的。海军第一主义的观点往往还倾向于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与波罗的海、德国和地中海地

区的国家的贸易尽管增长速度不如白糖、香料和奴隶等项贸易那样快，仍然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1]；因此，正象1806～1812年的一些事件表明的那样，法国在欧洲强国中长期占据优势，可给英国的制造业以可怕的打击。在这些情况下与欧洲强权政治疏远开来，在经济上也许是愚蠢的。

在英国的大战略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大陆”因素,这一因素被密切注视西印度群岛、加拿大和印度的人们所忽视。在英国与荷兰的1652～1654年、1665～1667年以及1672～1674年的斗争中进行纯粹的海战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这两个海军强国的贸易竞争是这种对抗的基础。在1688年的奥仑治的威廉得到英国王位的“光荣革命”之后，战略形势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在1689年和1815年期间爆发的七次战争中，对英国的利益提出挑战的国家是法国这个基本上**以陆地为基础**的国家。法国确实可以在西半球、印度洋、埃及和其它地区进行战斗；但是这些战役尽管对伦敦和利物浦的商人来说很重要，但对英国的国家安全从未构成直接威胁。英国兴起的条件只能是法国有希望在军事上战胜荷兰人、汉诺威人和普鲁士人，因而法国在欧洲的西部和中部长期拥有巨大优势，时间之长足以能削弱英国制海权赖以维持的造船资源。因此，它不仅是威廉三世个人与联省共和国的联合，或者后来与汉诺威的联系，后者促使英国连续几届政府在这几十年间在军事上对欧洲大陆进行干预。而且还有针对伊丽莎白一世害怕西班牙提出的令人信服的论点，即在欧洲**内部**，应当给法国的敌人以援助，以遏制波旁王朝（和拿破仑）的野心，从而确保了英国自身的长期利益。根据这个观点，“海军”战略和“大

[1] 更不用说英国皇家海军和商船队所依赖的波罗的海地区的海军补给品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了。这种依赖性反映在英国经常向波罗的海地区派遣舰队上，其目的是为了保持力量均势以及木材和桅杆的自由通过。

陆"战略是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对立的关系。

1742年，纽卡斯尔公国的君主对这种战略考虑的本质作了如下的很好的描述：

> 当法国在陆地上无所畏惧时，他们就将在海洋方面超过我们。我总是坚持认为，我们的海军应当保护欧洲大陆上的盟国，因此，法国的费用增加，我们就能够保持海上优势。

英国对愿意"使法国的费用增加"的国家给予支持有两种主要形式。第一种形式是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即通过在法国周围进行袭击以分散法军的注意力，或者派遣更多的远征军与能同英国结盟的国家一起作战。袭击战略看起来花钱较省，而且颇得某些大臣的厚爱，但这种战略效果往往无关重要，而且有时以灾难告终（1809年向荷兰的瓦克蓝岛远征就是这种情况）。从人力和经费的角度看，装备一支大陆的军队支出的费用更多，但也很可能有助于保持欧洲的平衡，马博罗和惠灵顿领导的一些战役也证明了这一点。

英国进行援助的第二种形式是提供财政援助，即直接招募黑森雇佣军和其他雇佣军同法国作战，或者向盟国提供补贴。例如，从1757年到1760年，腓特烈大帝每年得到英国提供的67.5万英镑的巨额补贴；在拿破仑战争的结束阶段，英国的资金流转比例大得多（例如，仅1813年，即向各盟国提供1100万英镑，在这场战争中总共提供6500万英镑）。但是所有这一切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英国扩大了贸易和商业（尤其是能盈利的海外市场），因而政府能征收空前数额的贷款和税款，才使国家不至于破产。因此，在欧洲内部使"法国增加开支"是很费钱的事，但这样做往往能确保法国无法发动一场阻止海上贸易的战役，也无法动辄以侵犯英国本土相威胁而在欧洲大陆占支配地位，这样伦敦又可以给战争和英国的盟国提供补贴。地理优势和经济利益这样

结合在一起，使英国能出色地实行两面战略："一方面面向欧洲大陆调整均势，另一方面向着海洋，以增强英国的海上优势。"

只有在人们了解上述因素和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之后，才能够充分了解关于欧洲列强在这个时期的人口以及军事和海军实力增长的统计数字（见表3—5）。

表3　1700～1800年列强的人口

（单位：万人）

国别＼年份	1700年	1750年	1800年
不列颠群岛	900	1050	1600
法国	1900	2150	2800
哈布斯堡帝国	800	1800	2800
普鲁士	200	600	950
俄国	1750	2000	3700
西班牙	600	900	1100
瑞典		170	230
联省共和国	180	190	200
美国	—	200	400

熟悉这些统计数字的读者会发现，必须十分小心地对待这些粗略的数字。人口总数，尤其是在早期，人口总数完全是推测数字（以俄国为例，误差可能为数百万人）。军队的规模波动很大，军队的规模取决于所选年份是取某些具体战争的起始时间、中间阶段，还是结束时间；军队总数往往包括大量的雇佣军，而在拿破仑的军队中甚至还包括勉强合作的盟国。部署的舰艇数量既不表明舰艇的战备情况，也未必表明有多少受过正规训练的人员在这些舰艇上服役。再者，统计数字未考虑指挥才干或航海技术、称职或失职、民族精神的振奋和消沉。即使这样，看来上述

表 4 列强军队的规模（1690~1814 年）

（单位：人）

国别＼年份	1690 年	1710 年	1756／1660 年	1778 年	1789 年	1812／1814 年
英国	70000	75000	200000		40000	250000
法国	400000	350000	330000	170000	180000	600000
哈布斯堡帝国	50000	100000	200000	200000	300000	250000
普鲁士	30000	39000	195000	160000	190000	270000
俄国	170000	220000	330000		300000	500000
西班牙		30000			50000	
瑞典		110000				
联省共和国	73000	130000	40000			
美国	—	—	—	35000	—	—

表 5 列强海军的规模（1679~1815 年）

（单位：服役舰只数）

国别＼年份	1689 年	1739 年	1756 年	1779 年	1790 年	1815 年
英国	100	124	105	90	195	214
丹麦	29	—	—	—	38	—
法国	120	50	70	63	81	80
俄国	—	30	—	40	67	40
西班牙	—	34	—	48	72	25
瑞典	40	—	—		27	—
联省共和国	66	49	—	20	44	—

数字至少大致反映出当时强权政治的主要趋势：从人口和军事

看，法国领先，而俄国日益领先；英国的海军强国地位通常不受挑战；普鲁士超过西班牙、瑞典和联省共和国；法国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拥有庞大的军队时期，几乎在欧洲占支配地位，而该世纪的任何其他时间无法与这个时期相比。

人们通过大国在这150年间的斗争中的财政因素和地理因素可以知道，对于上述3张表格提供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推敲。例如，联省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军队规模迅速下降，而在战争财力方面没有这种情况，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决定性的作用。美国（独立战争）的非军事性质使人们未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可以在战略上造成相当大的混乱。这些数字还对英国的军事贡献有所保留，因为英国在1813～1814年也许向10万人的反法同盟部队（在1813年为45万人！）提供补贴，保证14万名英国陆军以及海军人员的供应；反之，如果人们仅仅考虑军队的规模，那么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的真正实力也许言过其实，这种实力是根据多数战争期间得到的补贴确定的。如上所述，法国的庞大的军队由于财力不足和存在地缘战略学方面的障碍，因此战斗力较差，而俄国军队的战斗力由于经济落后和距离确实遥远，而下降。在我们更加详细地研究战争本身时，我们应当知道这些强国各自的实力和弱点。

三、各次战争的胜利（1660～1763年）

1661年3月，路易十四亲政，全面控制法国政府，欧洲形势对于决心强加于欧洲的国王特别有利。在欧洲南部，西班牙试图重新得到葡萄牙而搞得精疲力尽。在英吉利海峡的彼岸，在查理二世统治下已恢复专制统治的君主政体正在试图站稳脚根，而在英国商界，对荷兰有很强的妒忌心。在欧洲北部，新近的一场战争已削弱了丹麦和瑞典的力量。在德国，新教诸侯以怀疑的态

度提防哈布斯堡改善其地位的新企图，而位于维也纳的（奥地利）帝国政府在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遇到相当多的问题，而且稍晚一些时候，还遇到奥斯曼重振力量的问题。波兰在努力抵御瑞典和莫斯科大公国掠夺者的过程中，国力已经衰弱。因此，法国外交，在继承黎塞留的优良传统的情况下，可以很容易地利用这些环境让葡萄牙人和西班牙抗衡，让马扎儿人、土耳其人和德意志的诸侯与奥地利抗衡，让英国人与荷兰人抗衡，而另一方面，法国通过1663年与瑞士的一些州签订重要条约，加强法国自身的地理（和军队补充）地位。所有这一切使路易十四有足够的时间巩固自己的君主专制政体，消除从内部进行挑战的危险，在以前的一个世纪中，这种挑战曾使法国政府苦恼。更重要的是，这一切使柯尔培尔、勒泰利埃和其他主要大臣有机会彻底检查政府管理，而在期待太阳王追求荣誉时，法国将大量资金用于陆军和海军。

因此，对路易来说，在其统治的早期阶段，试图"修整"法国边界实在太容易了，而且到1665年（第二次英荷战争）英荷关系恶化成为公开的敌对状态时，这一点更加突出。法国尽管保证支持联省共和国，但在海战中实际上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而准备侵略南部的尼德兰，尼德兰当时仍由国力已削弱的西班牙占有。当法国人最终于1667年5月侵占尼德兰时，一个又一个城市很快落入他们手中。下面再举一下早先谈过的这个时期的外交关系迅速变化的例子。英国人和荷兰人，都对这场于他们双方都不利的战争感到厌倦，而且慑于法国的野心，于7月在荷兰的布雷达媾和，而在瑞典的参加下，设法"调解"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争端，以限制路易的军事胜利。1668年的《亚琛条约》做到了这一点，但付出的代价是使法国国王大发雷霆，并下定决心要向联省共和国报复，他认为，联省共和国是实现其野心的主要障碍。在以后的几年间，当柯尔培尔对荷兰进行关税战时，法国陆军和

海军得到进一步发展。法国通过秘密外交，诱使英国和瑞典放弃与联省共和国的同盟，并解除奥地利人和德意志各诸侯国的疑虑。到 1672 年，法国的战争机器，得到英国从海上提供的援助，就准备实施打击了。

尽管是伦敦首先对联省共和国宣战，英国在 1672～1674 年间对荷兰的第 3 次战争中表现令人沮丧。这里不再多说由于在海战中，荷兰海军将领德鲁泰尔英明指挥下的海军使英国受挫，在地面作战中又一无所获，查理二世主持的英国政府因而受到国内越来越多的批评：政治上实行欺骗和财政管理不善都证据确凿，人们对与法国这样专制的天主教国家结盟十分反感，因而战争不得人心，迫使政府于 1674 年退出战争。这令人想到，在后来的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下，英国的政治、财政和政府管理基础仍然是多么不成熟和不可靠。而伦敦改变政策有着重要的国际意义，因为这部分地反映出路易十四的野心使整个欧洲都普遍震惊。过了一年，荷兰通过外交活动和提供补贴，找到了很多愿意尽力反对法国的盟国。德意志的公国、勃兰登堡（它在 1675 年在费尔贝林打败法国的唯一盟国瑞典）、丹麦、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帝国都卷入这个问题。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个国家同盟已强大到足以打垮法国；其中多数国家的军队规模较小，而且在自身的侧翼上分心；反法同盟的核心仍然是在（奥伦治的）威廉新总督领导下的联省共和国。在北部遇到水路障碍，而法军在莱茵河西部地区与各种敌人对阵的战线容易遭受攻击，这一切意味着，路易本人将无利可图。在海上也存在类似的僵局：法国海军控制了地中海，荷兰和丹麦的舰队占有波罗的海，在西印度群岛，任何一方都不能取胜。法国和荷兰的商业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严重影响，而使英国等中立国家间接受益。到 1678 年，阿姆斯特丹的商界催促荷兰政府与法国单独媾和，而这又意味着德意志的各邦（他们依赖荷兰提供的补贴）无法继续独立作战。

尽管1678～1679年的《尼曼根和约》使公开战争告一段落，但是路易十四显然要修正法国的北部边界，他自称是"欧洲的仲裁人"，而他在平时仍保持一支有20万人的军队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使德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都感到不安。这并不意味着会立即重新开战。荷兰商人乐于在和平时期开展贸易；德意志诸侯则与英国的查理二世类似，接受补贴与巴黎合作；哈布斯堡王朝正在与土耳其人拼死作战。当西班牙在1683年努力保护其在卢森堡的领地不受法国攻击时，它必须孤军作战，而且必然遭受失败。

而从1685年起，形势开始对法国不利。迫害胡格诺派教徒使信奉新教的欧洲震惊。过了两年，土耳其人一败涂地，并被赶出维也纳；利奥波德皇帝提高了威信和军事实力，终于将注意力转向西方。到1688年9月，怀有野心的法国国王决定侵犯德国，最终将这场欧洲的"冷战"变为热战。法国的行动不仅促使它在欧洲大陆的敌人宣战，而且也使（奥伦治的）威廉有机会悄悄越过英吉利海峡，取代失去权威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

因此，到1689年末，法国孤军作战，面对联省共和国、英国、哈布斯堡帝国、西班牙、萨瓦和德意志的主要各邦。这实际上是不象看来令人吃惊的一种组合，而大同盟的"中坚力量"确实由英国和荷兰的部队与德意志的各邦组成。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但他们有充分的决心、财力、军队和舰队与太阳王执政的法国抗衡。要是再早10年，路易可能会取胜，而到此时，柯尔培尔已死去，法国的财政和贸易远不能令人满意，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尽管数量惊人，但其装备不适于持久远征。迅速打败反法同盟中的一个主要国家可打破僵局，但应当从何处突破？路易是否敢于采取大胆措施？有3年时间，他举棋不定；到1692年他终于集结一支2.4万人的部队进犯英吉利海峡彼岸，"海洋强国"确实太强大，在巴夫勒尔—拉霍格打败了法国的战舰

和平底船。

从 1692 年起，这场海上冲突成了一场缓慢的、互相破坏对方贸易的折磨人的战争。法国政府采取一项袭击贸易的战略，在减少对作战舰队拨款的同时，鼓励法国的私掠船掠夺英国和荷兰的商船队。另一方面反法同盟的海军实行贸易封锁，因而使荷兰人放弃与敌人通商的习惯，对法国的经济施加强大压力。但任何一项措施都未能使对方屈服；每项措施都加重了战争的经济负担，因而战争在商人和农民中不得人心，农业一再歉收而使农民遭受损失。地面作战攻打要塞和跨越河流也需要耗费大量资金，同样是一场长期斗争；沃邦[1]构筑的要塞使法国实际上坚不可摧，而同类障碍物使法国也无法轻而易举地攻进荷兰或巴列丁奈特[2]。各方作战兵力共有 25 万人，即使对这些富国来说，费用也高得惊人。在欧洲以外地区（西印度群岛、纽芬兰、本迪治里）也有一系列的战役，但其中任何一场战役都不算重大，都不足以改变欧洲大陆或海洋的基本平衡。因此，到 1696 年，英国托利党的农村贵族和阿姆斯特丹的市民都埋怨征税过重，而法国又遇到饥荒，因此，威廉和路易有足够的理由决定妥协。

因此，《利斯维克和约》[3]（1697 年签订），尽管确认路易早先得到的边界地区的领土，但总的说来是恢复原状。尽管这样，1689～1697 年的九年战争的结果并非象现代评论家所说的无足轻重。法国的野心肯定在地面战争中受挫，而海军力量在海战中逐步削弱。1688 年的"光荣革命"[4]已受到确认。英国已得到爱

---

[1] 巴列丁奈特（Palatinate）：德国莱茵河西岸一地区，昔日为德意志帝国内的诸侯国。——译者注。

[2] 沃邦（Vauban，1633～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以构筑堡垒和指挥围城战著称。——译者注。

[3] The Treaty of Ryswiek：在今荷兰海牙市郊。——译者注。

[4] 英国国会推翻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的政变。——译者注。

尔兰这个侧翼，加强了自身的金融机构，改组了陆军和海军。英国、荷兰和德国形成了不让法国介入佛兰德斯和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的传统作法。欧洲的政治多元化尽管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再次坚持了下来。

多数国家出现厌倦战争的心情，此时似乎不太可能再次爆发军事冲突。而当确认路易的孙子于 1700 年继承西班牙王位时，太阳王认为这是加强法国力量的极好机会。太阳王不与他的潜在对手妥协，并以其孙子的名义迅速占领南尼德兰，并为法国商人在西班牙在西半球的广大辖区内取得商业专有特许权。他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使英国和荷兰非常震惊，因而于 1701 年与奥地利义结成反法同盟。为制止路易的野心而斗争，这就是所谓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在兵力和征税资源方面总体平衡，这再次表明，某同盟可使另一同盟受到严重损害，但无法占压倒优势。在某些方面，路易比在 1689～1697 年的九年战争中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西班牙人很容易利用路易之孙、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波旁王朝的一些公国”在很多战区合作；法国财政从进口西班牙的白银中明显受益。再者，有一个时期，法国在军事上拥有约 50 万军队。然而，奥地利人在其巴尔干侧翼遇到的困难较少，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比上一次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最重要的是，态度坚决的英国政府以向德国盟国一支力量很强大的舰队和异乎寻常地向卓越的马博罗将军率领下的欧洲大陆上的一支庞大的陆军提供大量补贴的方式，投入大量的国家资源。马博罗将军率领的人数为 4 万至 7 万人的英国军队和雇佣军与荷兰的人数为 10 万多人的精锐军队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的人数与此相当的军队合作，要挫败路易称霸欧洲的企图。

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法大同盟可将其意志强加于法国或西班牙。除这两个王国外，形势确实对反法同盟的国家有利。马博罗

将军于1704年在布蓝赫姆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使法国和巴伐利亚的联军受到严重损失，并使奥地利消除法国的入侵威胁。后来1706年的拉米伊之战后，英国和荷兰的军队获得了南尼德兰的大部分地区，而1708年的奥德纳德之战对法国是无情的打击，法国在那里从此失去优势。

在1704年的不分胜负的马拉加战役之后，由于在海上再无敌手，因此英国皇家海军和正在走下坡路的荷兰海军可以显示出海军优势力量的机动灵活。葡萄牙这个新盟国可以从海上得到支持，而里斯本提供了舰队前进基地，巴西则提供了黄金来源。部队可以派往西半球去攻击法国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的领地，而主力舰队可以奇袭西班牙的运送金块的船队。夺取直布罗陀海峡不仅使皇家海军拥有一个基地可以控制出海口，并将法国和西班牙的基地与其舰队分开。英国的舰队保证了英国能攻占米诺卡岛和撒丁；这支舰队保护了萨瓦和意大利的海岸不受法国的攻击；当反法同盟继续采取攻势时，这支舰队带领帝国的军队进犯西班牙，并提供有关供应，此外还支援部队袭击土伦。

反法同盟的海军力量在总体上占优势，但无法制止法国继续破坏贸易的行为，而到1708年，英国皇家海军不得不建立运输系统，以减少商船队的损失。正如英国的护卫舰无法使法国的私掠船悄悄进出敦刻尔克或纪龙德一样，他们也无法进行商业封锁，因为这意味着必须沿着法国和西班牙的整个海岸线巡逻；在情况严峻的1709年冬天，即使扣押法国近海的运粮船也未能使路易统治的基本自给的帝国屈服。

反法同盟具有能够伤害对方，但无法摧毁对方的能力，这在与法国和西班牙进行的战役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到1709年，反法同盟的侵略军在短暂占领马德里后撤出，因为西班牙军队不断加强攻击，无法坚守。在法国北部，英国和荷兰联军再也无法取得象布蓝海姆战役那样的胜利。再者，到1701年，托利党的内

阁在威斯敏斯特执政，该内阁渴望媾和，以确保英国的海上利益和帝国的利益，并减少英国在欧洲大陆战争中耗费的费用。最后，原先被选为反法同盟的获得西班牙王位的候选人的查理大公，突然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而使他的合作者丧失了让他同时控制西班牙的热情。英国于1712年初单方面不履行战争义务，后来荷兰仿效英国，乃至渴望成为西班牙的"卡洛斯三世"的查理皇帝在又一年的毫无所获的战役之后，也承认需要和平。

1713年签订的《乌得勒支和约》和1714年签订的《拉斯达特和约》规定了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和平条款。从总的解决方案看，英国无疑是最大的受惠国。尽管英国已得到直布罗陀、米诺卡岛、新斯科舍、纽芬兰、赫德森湾，以及在西班牙所管辖的新大陆贸易特许权，英国并没有忽视欧洲的力量平衡。实际上，由11个独立的条约组成的整体，构成了1713～1714年的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令人满意地和比较完善地增强了平衡。法国和西班牙王国将永久地保持分裂，并正式承认新教徒在英国的王位继承权。哈布斯堡王朝，虽在西班牙遭到失败，但得到了南尼德兰和米兰（因而可继续阻遏法国）以及那不勒斯和撒丁。荷兰保持了独立，而联省共和国则再也不是难对付的海军强国和贸易强国，而且不得不将更多的力量用于守卫南部边界。尤其是，路易十四实行王朝统治和扩充领土的野心遭到最后的、决定性的挫折，而且法国必须承担战争的惊人费用，负担沉重，战争费用和战争的其他后果，使法国政府的债务增加7倍。从力量均势看，陆军力量无疑是平衡的。而英国的海军力量没有受到挑战。难怪在1714年乔治一世即位时，辉格党[1]党员都官复原

[1] 辉格党（Whig，1679～1682）：在议会中形成的党派，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大商业、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译者注

职，他们渴望保持乌得勒支和约的解决方案，而且在英国的头号敌人路易翌年去世时，甚至同意让法国也参加协商。

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中出现的在西欧国家中权力的再分配，其程度不象东欧出现的变化那样激烈。东欧的边界往往比西欧的边界更易变动，大片陆地由管辖边疆地区的贵族、克罗地亚的非正规军和哥萨克军队控制，而不是由开明国王的职业军队管理。即使在民族国家之间交战时，他们的战役往往涉及很大的范围，而且动用非正规部队、轻骑兵等以实施某些重大的战略打击。这个地区的战役与低地国家的战役不同，其成败涉及大量的领土转移，而且突出了令人瞩目的强国兴衰。例如土耳其人对维也纳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威胁，很快遭到失败，并开始衰落，前后只有几十年时间。奥地利、德国和波兰的部队最初作出明显的反应不仅使奥地利帝国的城市在 1683 年免遭土耳其军队的包围，而且迫使已增加成员国的神圣同盟[1]耗费巨额军费。在 1687 年的霍马克斯附近的重大战役以后，土耳其军队在匈牙利平原遭到毁灭性打击；如果说，由于 1689～1697 年的九年战争期间一再请求德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与法国对抗而使战线稳定下来的话，那么土耳其军队 1691 年在扎兰凯门和 1697 年在曾塔的再次失败证实了这种趋势。如果哈布斯堡王朝能将其人力物力集中在巴尔干战线上，而且拥有若干象欧仁王子那样有卓越才能的将领，那么对待土耳其的进攻，就不会是仅仅泰然处之而已。尽管当时哈布斯堡王朝未能象西方的君主政体那样有效地将其各种领地组织起来，但它无疑会成为欧洲的未来大国之一。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瑞典很不幸运。当年轻的查理十二世于 1697 年继承瑞典王位时，某些邻国的掠夺本性蠢蠢欲动；丹麦、波兰和俄国都想得到瑞典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土，并商定于

---

1 拿破仑帝国瓦解后欧洲各国君主组成的反动同盟。——译者注。

1699年秋联合起来对付瑞典。当战斗开始时，瑞典显然寡不敌众，而由于瑞典数量可观的军队、有着卓越的军事才干的国王以及英国和荷兰在海军力量上提供的支援而大大得到弥补。在这三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查理可对哥本哈根构成威胁，并迫使丹麦人于1700年8月退出战争，在这之后，他将军队运往波罗的海彼岸，3个月后取得大败俄国人的纳尔瓦大捷。战斗大捷和连续征服使查理十分振奋，以后几年他占领波兰并攻占萨克森。

历史学家在明智地回顾历史后指出，查理十二世只注意波兰和萨克森是他的失着，此举使他的注意力不再放在俄国彼得大帝在纳尔瓦失利之后强行在俄国进行的改革上。彼得大帝得到很多外国顾问的帮助，并乐于在广泛借鉴西方军事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庞大的陆军和海军，其干劲不亚于将原来的沼泽地建设成圣彼得堡。到1708年，查理用4万人的部队与彼得大帝作战时，可能已为时太晚。尽管总的说来，瑞典军队在战斗中表现得相当出色，但仍受到惨重损失，已绝对无法打垮俄军主力，此外，瑞军被后勤保障不力拖住了后腿，而当查理的部队向南进发，进入乌克兰并渡过1708～1709年的严冬时，这类困难就越发严重，当最后于1709年7月在波尔塔瓦爆发重大战役时，俄国军队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而且有很强的防御能力。波尔塔瓦战役不仅歼灭了瑞军，查理后来逃往土耳其领土并长期在那里流亡，这样给邻近瑞典的敌国创造了机会。到查理最后于1715年12月返回瑞典时，瑞典所有波罗的海两岸的领土都已丧失，部分芬兰领土落入俄国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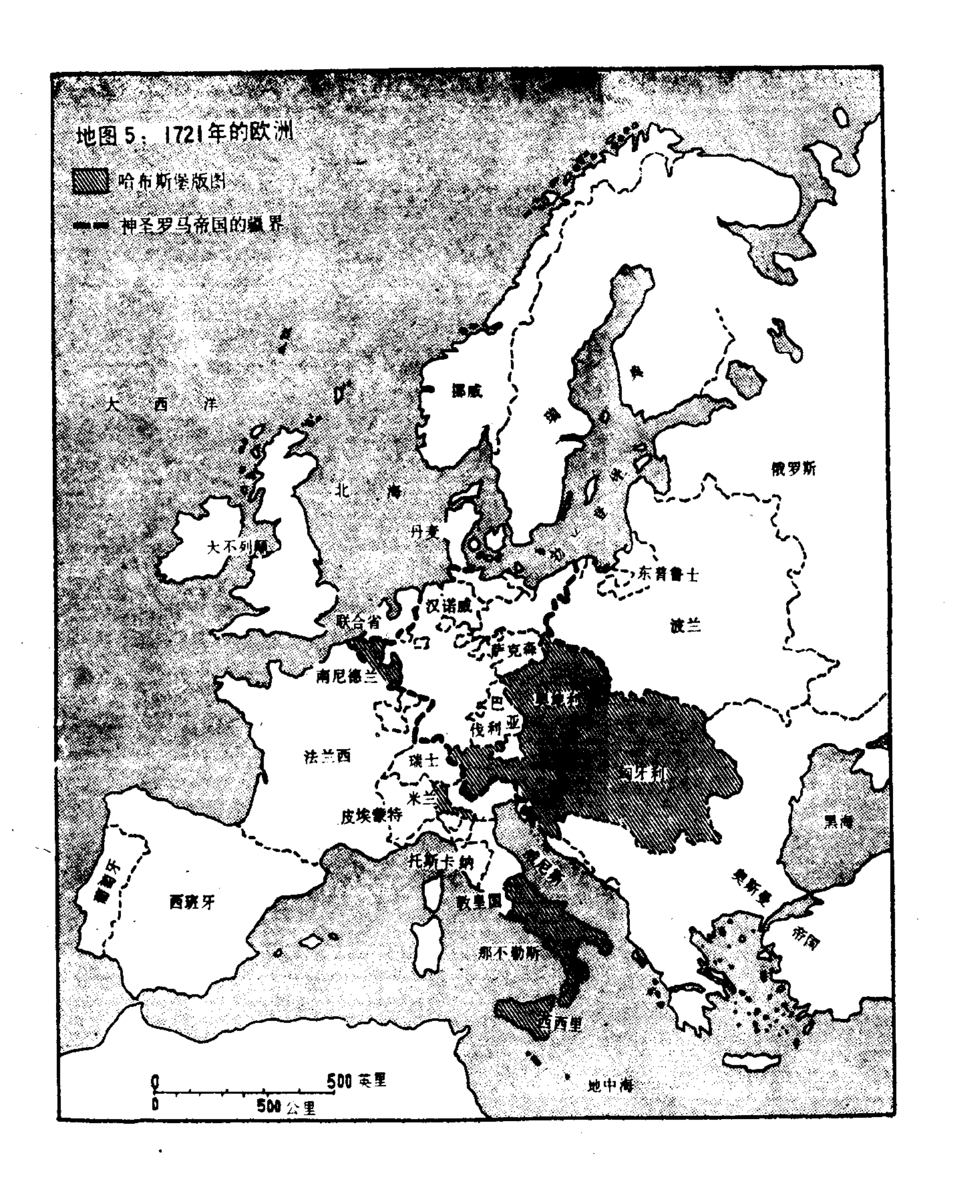
在此后数年的战争中（查理十二世在1718年出征丹麦时阵亡），精疲力尽和孤军作战的瑞典终于在1721年的《尼斯达特和约》中割让在波罗的海的大部分领土。当时瑞典沦为二流国家，而俄国升为一流强国。彼得接受了大将军称号，这确实是为了显示1721年战胜瑞典的胜利。尽管沙皇的舰队后来衰落，以及俄

国的经济很落后，俄国已清楚地表明，它与法国和英国一样，“有实力象大国一样独立行动，而不依赖于外界援助”。用德海恩的话来说，在东欧和西欧一样“在中心有抵销权力集中的一种平衡力”。

英国和法国在1715年以后持续了将近20年的缓和，是欧洲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总体平衡的保证。尤其是法国，需要在战后恢复，这场战争使其对外贸易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使国债增加，而仅仅国债付息一项就相当于国家正常岁入。再者，伦敦和巴黎的君主政体丝毫不担心自身的王位继承,反对改变现状的任何企图，而且发现多种合作对双方有利。例如，英法两国于1719年出兵阻止西班牙在意大利实行扩张主义政策。而到18世纪30年代，国际关系的格局再度发生变化。此时，法国对于同英国保持联系不再感兴趣，而是指望恢复其往昔欧洲盟主的地位。当时，法国的王位继承很顺利，而且多年的和平促进了繁荣，此外还导致海外贸易大大发展，这对其他海军强国来说是一场挑战。当法国在福列利首相掌权时期，迅速改善了与西班牙的关系并扩大在东欧的外交活动时，由谨小慎微实行孤立主义政策的沃尔波尔执政的英国，却尽量不参与欧洲大陆事务。甚至当法国于1733年进攻奥地利的领地洛林和米兰，以及法国入侵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时，英国也没有作出反应。由于得不到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的沃尔波尔和惊恐不安的荷兰人的任何支持，维也纳不得不于1738年与巴黎谈判以取得妥协的和平。法国在西欧取得军事上和外交上的胜利，与西班牙结为同盟，得到联省共和国的尊重，瑞典，乃至奥地利都日益听从法国的意见；所有这一切都使法国得到路易十四执政几十年以来未曾得到过的声誉。这一点在翌年变得更加明显：法国展开外交活动，议定结束奥地利和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1735～1739年），将东方的两个君主国攫取的很多领土归还土耳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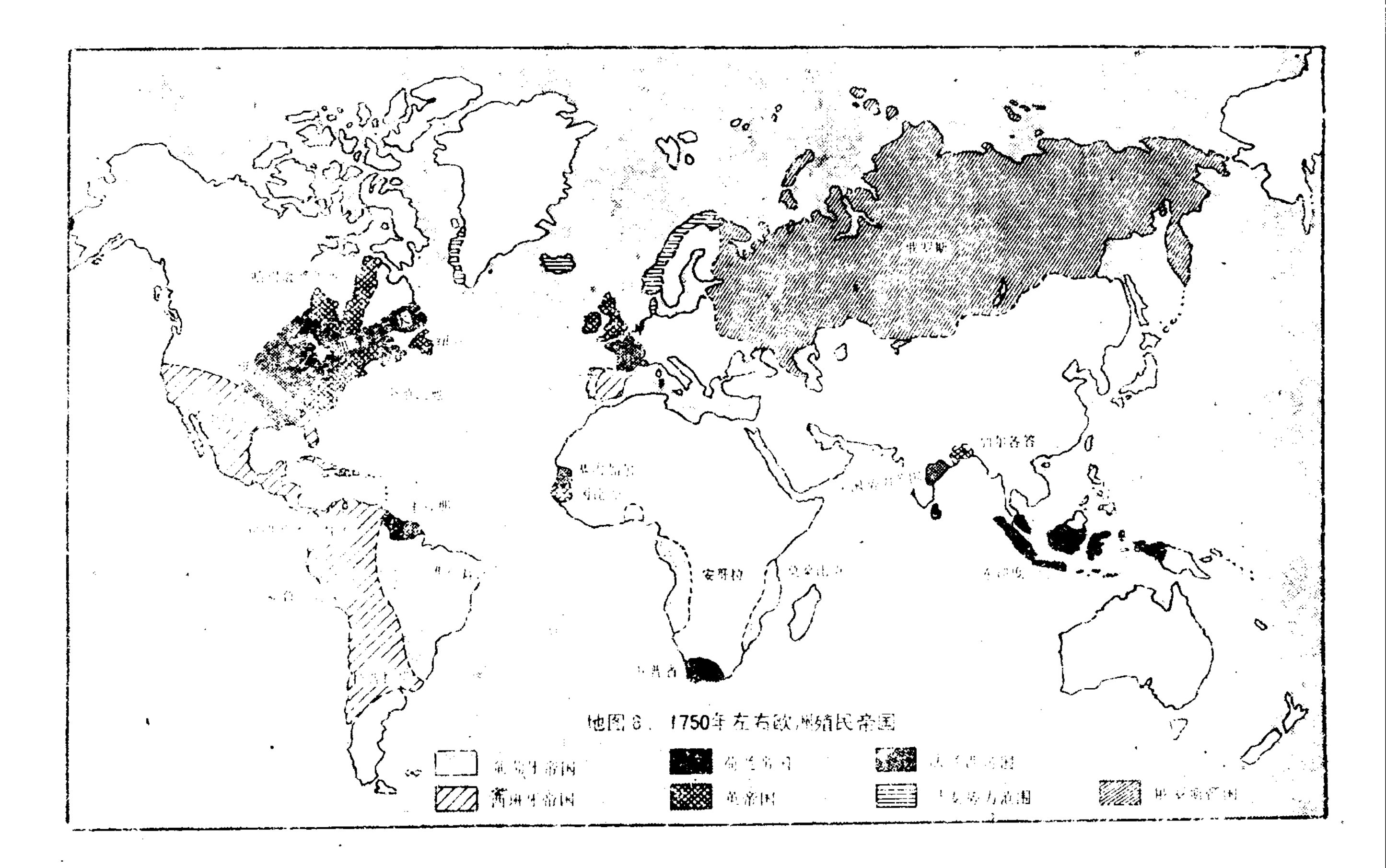
地图5：1721年的欧洲

的标准衡量，这是很费钱的打仗方式，很多英国人对税收日益增加和使国债增加到3倍不满；而这样一来，逐步迫使财尽力竭的法国同意妥协媾和。

前面谈到的地理和财政这两个关键性因素，终于迫使英国和法国政府于1748年签订《亚琛和约》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当时，法军已绝对控制了荷兰人；而这样做能否弥补受到严密封锁的法国海上贸易或者丧失的主要殖民地呢？反之，在法国征服低地国家的情况下，英国夺取圣劳伦斯的路易斯堡，和英国海军在安森和霍克的领导下打胜仗又有什么用处？结果，外交谈判为全面恢复原状作出安排，而腓特烈征服西里西亚则是重要的例外。当时和更早些时候，据认为《亚琛和约》的性质更多是停战，而非持久解决的办法，这样一来，玛丽亚·特丽莎渴望对普鲁士进行报复，而法国不知道怎样在海上和陆地上取胜，英国则急于确保下次在欧洲大陆的战争中和在海上与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都能大胜其主要敌人。

18世纪50年代初时，在北美洲的殖民地中，英国和法国的殖民者在当地（各自得到印第安人和某些守备部队的支持）一再发生冲突，即使"停火"一词也用得不当。英法本国政府对北美洲殖民地的部队几乎控制不了，自从这两国"爱国的游说议员"迫切要求支持各自的殖民者，并且明确支持一种观点，说正在进行一场十分重要的斗争，不仅指争夺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谷地区的斗争，也指争夺加拿大、加勒比海、印度的斗争，总之争夺欧洲以外世界所有地区的斗争。到1755年英法双方都派遣增援部队，并使各自的海军进入战备状态，其他国家则开始作出调整适应再次爆发英法冲突的前景。西班牙和联省共和国当时已完全沦为二流国家，担心自身会被西方的这两个大国挤垮，中立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尽管要商人象荷兰人那样经商确有困难。

而对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等东方君主政体来说，回避18



地图6. 1750年左右欧洲殖民帝国



世纪 50 年代中叶的英法战争是不可能的。首要原因是，尽管有些法国人主张，战斗应当在海上和殖民地进行，巴黎当然倾向于通过汉诺威这个战略上的薄弱环节来打击英国。而这样做不仅使德意志的各诸侯国吃惊，也迫使英国寻求和资助军事盟国，以牵制欧洲大陆上的法国人。第二个原因是更重要的：奥地利人决心从普鲁士手中收复西里西亚；在俄国女皇伊丽莎白[1]统治下的俄国人也伺机惩罚骄横无礼、野心勃勃的腓特烈，这些强国都集结了数量可观的军队（普鲁士有 15 万余人，奥地利有将近 20 万人，俄国大约有 33 万人），并考虑选择时机出击；但所有这一切需要西方提供补贴以便使他们的军队保持那样大的规模。最后一个原因是，在这些进行争夺的东方国家中，如果一方在巴黎或伦敦寻求“合作者”，而另一方只好加入与此对立的一方。这是合乎逻辑的。

因此，从战略上看，1756 年的著名的“外交革命”看来是仅仅将纸牌再洗一遍。法国将其原来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分歧放到一边，与奥地利和俄国一起与普鲁士作战，而柏林则取代维也纳成为伦敦的欧洲盟国。乍一看，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的同盟看来是较好的安排。从军事上看，这个同盟的规模显然较大，到 1557 年时，腓特烈已丧失其早先得到的全部领土，坎伯兰公爵率领的英德联军已经投降，使汉诺威和普鲁士本身的前途未卜。米诺卡岛已落入法国人手中，而在较远的战区，法国及其天然盟国也各有收获。从当时看，推翻《乌得勒支和约》而奥地利推翻《亚琛和约》都是显然可能的。

结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是，英国和普鲁士的联合，在领导能力、财政持久以及军事和海军经验丰富三个重要方面都

①伊丽莎白（1707～1762）：1741～1762年为俄国女皇，彼得大帝之女。——译者注。

仍占优势。腓特烈利用普鲁士的全部国力去争取胜利，在战场上有出色的指挥才干，这是没有疑问的。同时也要高度评价皮特，他毕竟不是独裁的君主，而仅仅是必须与那些棘手和妒忌心强的同事，与态度反复无常的公众以及新国王要妥善相处，而且是实行高效能大战略的政治家代表，衡量这方面效能所用标准不仅仅是占领多少盛产白糖的岛屿；或者推翻多少得到法国支持的大富翁，因为无论这些殖民地的收益怎样有价值，在敌人占领汉诺威和消灭普鲁士的情况下，都只能是暂时的。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正确方法，正如皮特逐步意识到的那样，是用"大陆的"政策来补充得人心的"海洋"战略，向腓特烈的部队提供大量补贴，承担进驻德国的数量可观的"观察部队"的费用，以保护汉诺威，并帮助牵制法国。

而实行这样一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有足够的资源经受长年的战争考验。腓特烈及其收税官想方设法在普鲁士筹集资金，而普鲁士的能力与英国的相比，则相形见绌，英国在战争最激烈时期拥有一支由120多艘现役舰艇组成的舰队，列入发饷名单的军人有20余万人（其中包括德国的雇佣兵），此外，英国还给普鲁士提供补贴。实际上，七年战争耗费了英国国库1.6亿多英镑，其中从金融市场筹集到6000万英镑（占37%）。国债继续这样大幅度增加使皮特的同事们震惊，而且导致他在1761年10月下台，尽管这样，英国的海外贸易仍每年增加，关税收入提高和促进了繁荣。有很好的例子能说明将收益转化为力量，以及利用英国的海军力量（例如在西印度群岛的海军力量）来保护国家的收益。英国驻普鲁士大使接到的通知说，"在我们当好军人之前，必须当好商人……贸易和海军力量互相依赖，而且……本国的真正财富取决于本国的贸易。"相比之下，所有其他交战国的经济在这次战争中都遭受严重损失，即使在法国内部，首相舒瓦瑟尔也沮丧地承认：

从欧洲的现状看，殖民地、贸易、还有海军力量，必然决定了欧洲大陆的力量均势。奥地利皇族、俄国、普鲁士国王仅仅是二流力量，所有这些力量都无法参战，除非他们得到贸易强国的补贴。

至少在早期遭受挫折之后，英国和普鲁士同盟表现出军事和海军方面具有丰富经验，以下述方式产生影响。在海上，安森领导的一支庞大海军不断封锁法国的大西洋港口，控制土伦兵力绰绰有余，并恢复在地中海地区的海上优势。当舰队确实在拉各斯附近的卡塔赫纳，而且在霍克利用无法匹敌的排炮追击康弗兰斯的舰队，并将其撵进基布隆湾时，再次证明了英国在海上技术上拥有优势。而且当时无论在什么气候条件下都坚持这项封锁政策，加上分遣舰队得到后勤系统的全面保障供给，不仅阻止法国的大部分海上贸易，因而保护英国的贸易及其领土安全，而且也阻止法国向西印度群岛、加拿大和印度派遣足够数量的增援部队。在创造奇迹的1759年，法国的殖民地在大陆彼岸就落入英国人手中，这对英德联军在明登战胜法军两个军的重大胜利是锦上添花。西班牙于1762年愚蠢地参战时，它在加勒比海和菲律宾群岛的殖民地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勃兰登堡王室已经看到在创造"奇迹"中自己也有份，而且在罗斯巴赫和吕岑的战役中，腓特烈不仅分别摧毁了法国和奥地利的各一支军队，而且挫败了这两个国家进犯德国北部的渴望；在腓特烈于1760年在列格尼兹和托尔高再次袭击奥地利人时，维也纳实际上已一败涂地。尽管这样，所有这些战役的沉重代价逐渐削弱了普鲁士的力量（仅仅1759年，军队损失6万人），而且事实证明，俄国这个敌人极难对付，其部分原因是俄国女皇伊丽莎白憎恨腓特烈，但主要原因是与俄军的每次遭遇战都非常惨烈。随着其他交战国试探调整步调，渴望与英国政府达成协议的法国当时也打算媾和，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认为自身仍有足够

的实力牵制奥地利人和俄国人（他们一直到俄国女皇伊丽莎白于1762年去世时不再受牵制）。此后，新沙皇彼得[1]迅速退出战争，奥地利或法国除了指望在恢复战前欧洲状态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解决外，无法指望有更好的办法，而这对那些设法搞垮普鲁士的国家来说，实际上意味着失败。

在1762～1763年的解决方案中，最明显的受惠国又是英国。甚至将以前夺取的各种领土退还法国和西班牙以后，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和西非还取得进展，实际上已消除法国对印度的影响，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时在大部分北美洲大陆上占优势。因此，英国可利用的陆地，其范围和潜在财富远远超出洛林、西里西亚以及欧洲大陆上激战的其他地区。此外，这有助于牵制法国在欧洲的政治和军事野心，因而使力量总体保持平衡。相比之下，法国不仅严重丧失海外殖民地，而且在欧洲遭到失败（这与1748年的情况不同）；法国在军事上的表现平平，而这实际上说明，重心已从西欧向东转移，在1772年首次瓜分波兰时，总的说来已不考虑法国的愿望。所有这一切对英国利益集团正中下怀，他们对英国能在欧洲以外称雄感到满意，而且不急于承担大陆的义务。

四、赢得1763～1815年的一系列战争

在英法之间的下一阶段的斗争之前，足足有10多年的"喘息时间"各种迹象预示着英国会走好运。七年战争使大国的课税机构和社会结构过于紧张，因而多数领导人都反对采取大胆的外交政策；当时往往反省和改革成风。普鲁士为战争付出的代价（50

---

①彼得三世：1762年为俄国沙皇遭暗杀后，由其妻叶卡德琳娜二世继位。——译者注。

万人死亡，其中军人 18 万）使腓特烈震惊，他宁愿更平静地生活。尽管已经损失了 30 万人，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本身的战绩并不差；但是，整个政府系统显然需要变革，这样做无疑会引起一些地方的不满（尤其是匈牙利人），而且使匈牙利女王玛丽亚·特丽莎的大臣们大加关注，在俄国，叶卡德琳娜二世必须设法进行立法和行政改革，并镇压普加乔夫起义（1773～1775年）。这未能阻止俄国进一步向南方扩张和设法削弱波兰的独立地位；而人们将这些事件列为地方问题，他们与欧洲强国间的重大组合有很大差别，在七年战争期间，欧洲强国都全神贯注地对待大国间的组合问题。当时与西方君主政体的联系不那么重要。

在英国和法国，处理好国内事务成了核心问题。这两个国家的国债惊人增长，结果需要寻找新的财源和设法进行行政管理改革，因而引起争论，而英国乔治三世和反对党之间以及法国国王和议会之间本来关系就已经紧张，这样一来，无异于在这种紧张关系上火上加油。只解决国内问题的做法必然使英国的欧洲政策与皮特执政时期相比，偶然性和内向的趋势更加突出，而且在征税以及实施《贸易与航海法》方面与美洲殖民主义者的争论进一步激化，使这种趋势更加严重。而就法国来说。国内问题不能完全压倒外交政策问题。实际上，舒瓦瑟尔及其继承者，为 1763 年的失败而痛心，正设法加强法国今后在世界中的地位。尽管当时迫切需要节省开支，法国海军仍不断发展；法国还进一步巩固了与西班牙签订的“家族协定”。舒尔瑟尔积极鼓励西班牙在 1770 年的争夺福克兰群岛中与英国抗衡，而路易则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在那个地点进行大国间的战争，对财政来说是一场灾难。尽管这样，法国的政策仍然是反英色彩很鲜明，对英国在海外可能遇到的问题必加以利用。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伦敦与美洲殖民主义者的争论升级为公开的战争，这时英国的地位在很多方面，比在 1739 年或 1756 年

时虚弱得多。造成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领导人的个性。无论是诺思[①]、谢尔本或任何其他政治家都不具备领导国家的才能，也提不出战略性强的宏图大略。乔治三世本人的参与、在美洲殖民主义者的功过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使政治派别间的摩擦加剧，造成国家分裂。此外，经济和海军，这两个英国实力的支柱遭到削弱。出口，从七年战争的兴旺时期之后陷入停滞状态。实际上在整个18世纪70年代都在下降，其部分原因是殖民主义者进行抵制，而且还由于与法国、西班牙和尼德兰的冲突日益加剧。在恢复和平的15年间，英国皇家海军基本上变弱，有些海军旗舰军官都经验不足，就象不够尺寸的木材用来建造现役舰艇。1778年法国参战时，英国决定放弃（对法国的）严密封锁战略，此举本来可以使英国船只避免损失，但是，实际上是拱手交出海上霸权：向直布罗陀、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沿海地区派遣救援远征队实际上不能取代对法国西部通路的有效控制，这条通路本来完全可以阻止敌人向遥远的战区派遣舰队。由于罗德尼在圣岛的胜利以及1782年豪对直布罗陀的救援，英国海军才恢复实力，海上优势重新得到确认，美洲的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

即使海军采用更精良的装备，治国更加有方，1776～1783年的战争仍存在两个战略问题，这在18世纪英国参加的所有其他战争完全不存在。第一个问题是，当美洲的起义已如燎原之势，镇压起义需要由英国部队在离本土3000英里外的地方打一场大规模的**大陆**战争。这与英国早先的愿望相反，仅仅有海军优势并不能使基本自给的殖民者屈服（尽管利用海军优势可以使来自欧洲的武器和兵员减少）。征服并占有美洲的所有领土，对拿破仑的强大陆军来说就是一项困难的任务，更不用说英国人在18世纪70年代率领的部队了。距离遥远，因而延误交通通信联

①诺思（North）：英国政治家，1770～1782年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系，这一切不仅对于从伦敦，乃至从纽约下达关于战争的有关战略方面的指示增加障碍，而且使后勤问题更加严重："英国在美洲的部队需要的每块饼干、每名士兵和每粒子弹都要越过3000英里的海洋运送。"尽管英国国防部作出了重大改进，运输能力严重不足和装备采购方面的困难实在太大。再者，殖民地军民异常分散，因此占领城市或大城镇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在正规军占领争夺中的领土时，英国的权力才能生效；而一旦撤走正规军时，起义者就宣布战胜了亲英分子。如果说在20年前，英国用5万名士兵，在**殖民地的大力支持下**，能征服法属加拿大的话，那么此刻重新实行帝国统治又需要多少人呢？是15万人，还是25万人？一位历史学家说，"恢复英国在美洲的权威很可能是一个不能用军事力量解决的问题，不管这种手段运用得多么完善。"

在大战略方面第2个未曾有过的困难是，英国孤军作战，那些愿意削弱法国的欧洲伙伴无法提供援助。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交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1762年以后，英国与普鲁士的关系破裂，他们傲慢地对待西班牙。粗暴地对待丹麦和联省共和国等中立国家的航运，他们得不到俄国人的支持，当时，英国人为所有这一切付出代价。因此，伦敦发现自身在欧洲不仅没有朋友，而且到1780年面临十分可疑的《武装中立联盟》(由俄国、丹麦和葡萄牙组成）和抱敌对态度的联省共和国，而英国在与美洲的起义者以及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的交锋中，战线已经过长。所有这些不只是英国在外交上无能。如上所述，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东欧君主政体的利益已稍稍与西欧君主政体的利益有所分开，并将注意力集中到波兰的未来、巴伐利亚的王位继承以及处理与土耳其人的关系上。法国人的企图是要象路易十四执政时期那样，成为"欧洲的仲裁者"，因而两者利益分开本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在七年战争以后，法军相对削弱，而且法国不参与东欧的政治事务，这一切意味着，英国的原有盟

国不象伦敦那样严重关注1779年以后的法国企图，在叶卡德琳娜二世统治下的俄国人对法国人也许最同情，即使他们也抱不介入态度，除非确实出现能彻底消灭英国的前景。

最后一个重要事实是，这一次法国采纳了舒瓦瑟尔的原来论点，而且拒绝了诱使它袭击汉诺威或对荷兰进行威胁。这场与英国的战争，其范围只限在海外进行，因此造成英国传统战略的“大陆”部分和“海洋”部分脱节。法国是破天荒地首次将其资源集中用于海战和殖民地战争。

结果很明显，而且与英国孤立主义者的论点无法区分，即这类冲突，由于不受大陆盟国和陆地战役的妨碍，因此对英国这个岛国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在七年战争期间，每年拨给法国海军的费用只有3000万里佛尔，相当于每年拨给法国陆军费用的1/4，而且仅仅相当于每年拨给皇家海军费用的1/5。从18世纪70年代中期起，法国海军的预算不断增加；到1780年，法国海军预算共约有1.5亿里佛尔，而到1782年达到惊人的2亿里佛尔。在法国参战时，法国拥有52艘现役舰艇，其中很多舰艇比英国的同类舰艇大，舰艇的数量很快增加到66艘。此外，还有西班牙的58艘现役舰艇，而在1780年时，加上荷兰的现役舰艇数量近20艘。英国皇家海军与其他任何一个海军对手相比仍占优势（英国皇家海军在1778年有66艘现役舰艇，在1779年有90艘），尽管如此，英国发现本国舰艇在数量上一再被别国超过。1779年，英国海军甚至失去了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看来法国和西班牙很可能入侵；1781年，格雷夫斯率领的舰队和德·格拉斯率领的舰队在切萨皮克湾附近海面上发生遭遇战时，法国军舰在数量上占优势，阻止了英国舰队前进，而且因而促使柯恩瓦利在约克敦投降，最终结束了美洲战争。甚至当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扩大，而其敌人的舰艇数量减少时（1782年时，有关各国的现役舰艇的数量是，英国94艘，法国73艘，西班牙

54 艘，联省共和国 19 艘)，双方的差距仍然很小，因而不足以完成以下所有需要完成的任务：保护北大西洋的运输，定期救援直布罗陀，保护波罗的海出口，向印度洋派出分遣舰队和支持加勒比海地区的军事行动。英国的海军力量是一支暂时起作用的地区性力量，而不是象以前的战争中那样，是占压倒优势的力量。法军不在欧洲作战这一事实，与岛国居民的条件不适宜有很大关系。

到 1782 年，维持如此庞大的海军造成经济紧张，因而对法国经济来说是一次打击，并迫使法国开始节省开支。当时更难得到海军补给品，水手短缺现象也十分严重。此外，法国有些大臣担心，战争过份地将注意力和资源转移到欧洲以外地区。因而使法国无法在欧洲大陆中起任何作用。由于有这种政治上的考虑，而且担心英国同美洲居民也许很快能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因而促使巴黎希望早日结束战争。从经济上看，与法国结盟的荷兰和西班牙等国都处于困境。尽管这样，英国拥有较强的财政持久力，从 1782 年起，出口量明显增加，皇家海军不断加强，在美洲眼看要丧失的情况下所有这一切都未能使战争避免失败，而且都未能说服国内的政治派别对战争继续给予支持。尽管英国在 1783 年的《凡尔赛和约》中作出让步（让出米诺卡、佛罗里达、多巴哥)，几乎不会使 1763 年帝国得到的总收益出现逆转，但法国可以宣布，它对建立独立的美国以及对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遭到的打击，感到十分满意。在巴黎看来，被七年战争搞乱的战略平衡，当时已明显恢复，尽管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而在东欧，相比之下，在 1763 年以后的几十年间，3 个主要君主政体的活动并没有使战略平衡发生很大变化。这主要归因于这种战略平衡的关系有其三角的性质：无论是柏林、维也纳(维也纳尤为突出)、乃至更加固执的圣彼得堡都不愿意刺激其他两国参加与自己敌对的同盟，或者卷入七年战争的任何方面。普

鲁士反对奥地利扩张性质的短暂的、十分谨慎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 年）完全证实当时普遍存在避免在大国间的斗争中耗费资金的愿望。因此，进一步夺取领土只能以外交“交易”的结果这种形式出现；这种外交交易是以较弱国家作为牺牲品，其中最突出的是波兰，波兰在 1772～1773 年，1793 年和 1795 年中陆续被瓜分。到以后阶段，波兰的命运日益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即叶卡德琳娜二世决心粉碎华沙的“雅各宾派”，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想在东欧补偿其在西欧与法国作战的失败；但是即使这种对法国大革命表现出来的新的关切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三个东欧君主政体在这个时期的充满敌意，不愿意妥协的政策。

在这种三角关系具有上述地理和外交范围的条件下，难怪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相比，俄国的地位继续改善。尽管俄国落后，但它远不象其西部邻国那样容易受到攻击，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西部邻国都努力与强大的叶卡德琳娜和解。这个事实以及俄国历来自称在波兰具有影响，这样一来，在瓜分波兰时，这个不幸的国家的最大一部分势必落入圣彼得堡手中。再者，俄国南部有一个不设防的“容易入侵”边界，因此在 18 世纪 70 年代初期，取得重大进展，土耳其成了牺牲品；在 1783 年正式并吞了克里米亚；1792 年沿黑海的北部沿岸得到新的猎物。所有这一切证明，奥斯曼帝国的战斗力已下降，而且使奥地利、普鲁士以及积极设法挫败俄国扩张主义的几乎所有其他国家暗中担心（1788 年的瑞典、1791 年在小皮特统治下的英国）。但由于维也纳和柏林渴望同圣彼得堡保持友好以及西方强国过份分散注意力，因而无法在东欧发挥持久的和有效的作用，结果沙皇帝国发展很快。

因此，在 1792 年以前的 10 年中，国际关系的结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能对俄国有重大影响。在主要强国之间偶而出现的争吵是一些不相关的事态，而且看来对力量的总体平衡不构成威胁。

如果说波兰和奥斯曼帝国的未来需要东方的大国全神贯注地对待，那么按照惯例在低地国家和“敌对的贸易帝国”的命运上展开的种种活动则分散了西方强国的注意力。英国和西班牙在诺克塔松达的冲突（1790 年）使这两个国家濒临战争的边缘，这种情况持续到西班牙被迫让步。1783 年以后，英国和法国，由于双方都精疲力尽，因而两者的关系更加缓和，但是他们之间在贸易上的敌对状态继续迅速发展。他们互相猜疑，这一点也在 1787～1788 年的尼德兰的内部危机中很快表现出来，亲法的“爱国者”政党在小皮特的坚持要求下被普鲁士军队剥夺权力。

皮特十分活跃的外交，不仅反映出皮特本人的个性，也反映出在强国行列中，英国自 1783 年失败以后已在很大程度上全面恢复。丧失美洲并不危及英国的跨大西洋贸易；实际上，向美国的出口发展得很迅速，这个市场和印度的市场加在一起比法国曾经领先的市场大得多。在 1782～1788 年的 6 年间，英国的海上运输增加了 1 倍多。产业革命正在进行，这是在国内外消费需求的激发下和在大量新发明的推动下发展的；而且英国农业的生产力赶上了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要。皮特的财政改革加强了国家的财政，恢复了国家的信用，而且一直在发展海军上大量投资，英国的海军，数量上可观，而且训练有素。英国政府在这些扎实工作的基础上，认为当国家利益需要时，英国可在国外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从整体看，白厅和威斯敏斯特的政治领导人并没有设想过在不久的将来，在欧洲会爆发一场大国间的战争。

欧洲为什么不会对一场全面冲突感到不安，最明显的原因是由于法国的情况在恶化。在 1783 年取得胜利之后的若干年里，法国的外交地位看来比任何时候都好；国内经济以及与西印度群岛和列凡特的对外贸易正在迅速发展。尽管这样，1778～1783 年战争的巨额费用——高于法国前三次战争费用总和——国家财政改革失败与政治上的日益不满、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以及社会弊

端交织在一起，使旧制发生动摇。从 1787 年起，随着国内危机进一步加剧，看来法国在对外事务中，更难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尼德兰在外交上失败，主要是因为法国政府承认，它根本就无法承担对英国和普鲁士的战争费用，而在诺克塔松达的战斗中不再支持西班牙，这归因于法国议会对路易十六有权宣战提出异议。这一切使人们认识到，法国不会很快推翻欧洲的整个“旧秩序”。

因此，在 20 多年间，耗费了欧洲大多数国家力量的冲突进程开始放慢，并出现不平衡的发展。在巴士底要塞失守以后的年代里，法国人只关心国内斗争；而且尽管法国采取越来越偏激的政策使有些外国政府感到不安，但后来在巴黎和各省出现的骚乱表明，法国在欧洲的强权政治中已不太重要。正因为这样，皮特在 1792 年 2 月设法削减英国的军费开支，而在东方，三个大的君主政体则对瓜分波兰十分感兴趣。只是谣言盛传逃亡者阴谋恢复君主政体，还谣传法国的革命者打算在边界上采取更激烈的政策，这时外来事件和国内事件才升级为战争。反法同盟的军队越过法国边界时动作迟缓和犹豫不决，这表明他们对这场争夺准备不足，这样一来，革命者就可以声称在瓦尔密突然爆发的遭遇战（1792 年 9 月）之后取胜。翌年，法军的胜利似乎对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低地国家和意大利才构成威胁，而且处决路易十六表明巴黎新政权是激进的共和政体，这场斗争才呈现出整个战略和思想范畴。以英国和俄国为首的许多国家，其中包括法国的所有邻国都加入了普鲁士和哈布斯堡王朝这两个原先的交战国。

尽管通过回顾历史很容易看出，第一次反法同盟（1793～1795 年）为什么失败得这样惨重，结果使当时的人们十分震惊和严重不满；总之，这次战争与以往任何战争相比，力量更加悬殊。在整个事件中，法国大革命这个极大的推动力导致采取十分严厉的措施：大量集结和动员国家的所有可依法占有的资源用于打击法国的敌人。再者，正如很多作者已指出的那样，在 1789

年以前的20～30年间，出现了法军在编制体制、人员规划、火炮、战役战术等方面进行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法国大革命的成就是扫除了贵族为新概念设置的障碍，而且让改革者在战争爆发时有机会（和一批人的影响）将他们的想法变为现实。在国内战线上所用的“总体战”方法和在战场上采用的较新的战术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法国人新释放出来的鼓动能量，就好象反法同盟的军队谨小慎微、半心半意的举动，是旧秩序的习惯的象征。法国利用一支人数约有65万人（1793年7月的数字）的军队，在革命热忱的激发下，愿意为长途行军和采取进攻性的战术承担风险，很快跨越邻国的领土，这意味着，从此时起，维持这支庞大军队的费用基本上落在国外居民的头上。这样一来，法国经济可取得一定程度的恢复。

因此，试图挫败这种扩张主义的任何强国，必须想出适当的方法来遏制战争的新破坏形式。这并不是无法实现的任务。法军在其早期将领迪穆里埃领导下的作战行动，乃至拿破仑领导的规模大得多和复杂得多的战役暴露了法军在编制和训练方面的缺陷以及供应和交通通信方面的弱点，而这些缺陷和弱点可以被训练有素的敌人充分利用。但这样的敌人又在何方？不仅仅是反法同盟老态龙钟的将领们和配备大量辎重、行动缓慢的部队在战术上不足以匹敌法国的大批散兵和神出鬼没的纵队。真正的要害是，法国的敌人也不明确要承担什么必要的政治义务，更不明确战略意图。很显然，没有什么卓越的政治思想可以激发旧制度下士兵和百姓的斗志；他们中间的很多人确实被令人兴奋的革命思想所吸引，而且只是到这以后很晚的时间，当拿破仑率领的军队将“解放”变为征服和掠夺时，才可利用当地的爱国主义来挫败法国的霸权。

再者，在这场战争的早期，反法同盟的极其少数的成员国认真对待法国的威胁。反法同盟各成员国未能在目标和战略总体上

取得一致意见。反法同盟的团结靠不住，这一点表现在反法同盟越来越多地要求英国提供补贴，而不表现在别的方面。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战争早期，与瓜分波兰发生在同一时间，而且由于瓜分波兰事件的缘故而不引人注目。尽管俄国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尖刻的指责，但她更关心的是扼杀波兰的独立，而不是向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派兵。这样一来，焦虑不安的普鲁士政府由于早先参加过西部的战役已不再抱幻想，便将越来越多的部队从莱茵河调到维斯杜拉河，因而又迫使奥地利在其北部边界保持 6 万人,以防范俄国和普鲁士向波兰的其余领土挺进。当 1795 年出现第三次,亦即最后一次瓜分时，显而易见对正在拼死奋斗的法国来说，波兰与其他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国家相比，是一个更有用的盟国。此时，普鲁士已要求实现和平，而且让法国得到莱茵河左岸，这样一来，德意志就陷入不稳定的中立状态，因而法国可将其注意力转向别处；德意志的多数较小诸侯国都仿效普鲁士；尼德兰已被占领，而且改名为巴塔维亚共和国；西班牙也退出反法同盟，参加早先与法国结成的反英联盟。

这样一来，只剩下在 1796 年初被拿破仑征服的撒丁—皮埃蒙特；被撵出意大利、大部分领土被迫缔结《康波福米奥和约》(1797 年 10 月）的命运不佳的哈布斯堡帝国；还有英国。尽管小皮特想仿效父亲老皮特，制止法国的扩张主义，但英国政府也未能以必要的决心和明确的战略意图参战。1793～1795 年被派到约克公爵统治下的佛兰德斯和荷兰的远征军在与法军的对抗中既无实力，又无经验，其幸存者最终经不来梅回国。再者，正如以往和这之后经常出现过的那样，邓达斯和皮特等大臣们宁肯采用“英国的作战方式”，即进行殖民地战争，海上封锁和袭击敌人的海岸，而不肯采用任何大规模的大陆作战方式。在英国皇家海军占压倒优势，而法国海军陷入分裂的情况下，这种作战方式看来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又容易实现的抉择。但是英国部队在

1793～1796 年的西印度群岛的作战中因疾病流行而蒙受损失，这意味着，伦敦必须为其战略转变付出极大的代价：4 万人死亡，另有 4 万人无法继续服役，这个数字高出西班牙在伊伯利亚半岛战争中的伤亡总人数，而且这些战役至少耗费 1600 万英镑。但很难断定，英国能否不断加强其对欧洲以外战区的统治，或者说英国在敦刻尔克和土伦周围地区的作战能否抵消法国在欧洲的力量不断增长。最后一点，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了保持作战部队而要求增加的补贴金额高得惊人，而且无法提供。换言之，英国的战略不仅无效，而且费钱，到 1797 年由于英格兰银行暂停偿还现金，以及海军在斯皮特黑德和诺尔河发生兵变，使英国整个体系的基础（至少暂时地）动摇。在这个困难时期，精疲力尽的奥地利人要求实现和平，并加入承认法国在西欧享有优势的国家行列。

如果英国无法打败法国，那么法国革命政府也无法破坏敌人的海上优势。早先法国曾打算进犯爱尔兰，并袭击英格兰的西海岸，但收效甚微，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气候和当地的防御能力强。尽管 1797 年暂停偿付现金曾使人们一度大为惊讶，但是英国的信用制度仍然是稳定的。西班牙和尼德兰参战并站在法国一边，结果是西班牙舰队在圣文森特角附近海面遭到惨败（1797 年 2 月），而荷兰人在坎佩当（1797 年 10 月）遭到沉重打击。法国的新盟国也只好忍受在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科伦坡、马六甲和好望角等殖民地的日益严重的损失，而所有这些殖民地为英国的外贸提供了新的市场，并为英国的海军分遣舰队提供新的基地。皮特和他的大臣们不愿意为了实现和平而向法国政府付出法国索取的高昂代价，他们决心继续战斗，于是开始征收所得税，并借贷新债，以偿付已发展成一场恶斗（法军沿着英吉利海峡沿岸集结）的战争费用以及为确保国家生存和帝国安全所需的费用。

这就是法国和英国在以后20来年的战争中遇到的主要战略困境。象鲸鱼和大象那样，双方都是所在领域的最庞大的动物。但是英国控制海上航线无法摧毁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而拿破仑拥有的军事优势也无法使这个岛国的居民投降。再者，由于法国夺取邻国领土，并对邻国进行政治恐吓，因此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在英国仍保持独立（但提供补贴、弹药、乃至部队）的情况下，欧洲大陆的其它强国能否永久地接受法国的霸主地位，巴黎政府对这一点肯定是没有把握的。这显然也是拿破仑的看法，他在1797年说："让我们集中力量发展我们的海军，并集中力量摧毁英国。此举成功之日，也是我们在欧洲称雄之时。"但法国达到这个目标只能争取在海上和贸易上与英国抗衡的战略成功，因为仅有陆战胜利是不够的，正如英国需要通过直接干预和保护盟国来对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称霸提出挑战一样，因为英国皇家海军仅能取得海上优势也是不够的。只要某交战国在陆地上占优势，而另一交战国在海洋上占优势，则各方都感到受威胁和不安全；而且各方因此到处设法寻找新的方法和盟国，藉以改变力量对比。

拿破仑企图改变这种力量平衡，这堪称特有的大胆和冒险之举：利用1798年夏天英国在地中海地区的软弱地位，拿破仑用一支拥有3.1万人的部队入侵埃及，因而可以控制列凡特、奥斯曼帝国和通往印度的航路。几乎也在这个时候，法国人派往爱尔兰的另一支远征军使英国人分散了注意力，其中对英国的每次进攻如果取得完满成功的话，对于英国摇摇欲坠的地位来说本来可以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打击。但是法国对爱尔兰的入侵，规模很小，而且为时已晚，再者，到9月初法军已被包围，而在那时，欧洲各国都已经知道纳尔逊在阿布基尔打败法国舰队，以及后来拿破仑在埃及被"囚禁"。正如巴黎已经估计到的那样，这类挫折对于所有不顾法国不满而放弃中立地位，并参加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1798～1800年）的国家来说，是一种鼓舞。除了葡萄牙

和那不勒斯等小国以外，俄国、奥地利和土耳其当时都站在英国一边，集结他们的军队，与英国商洽提供财政补贴问题。法国则由于丧失米诺卡和马耳他，在瑞典和意大利被奥地利—俄国联军打败，加上拿破仑亲自出兵也未能在列凡特取胜，因而看来陷入严重困境。

第二次反法同盟和第一次一样，是建立在摇摇欲坠的政治基础和战略基础上的。普鲁士未参加同盟，引人注目，因此无法开辟德国北部战线。那不勒斯国王未作好准备，在发动的战役中惨败，派往荷兰的英国—俄国远征军由于准备不充分，结果未能唤起民众，最后不得不撤出。英国政府根本未能认识到，大陆作战需要更加切合实际，也没有意识到，建立一支庞大的陆军在财政上和政治上遇到的困难，因此他们依赖于"袭击"敌人海岸线的传统政策；但是，他们对贝尔当岛、费罗尔、加的斯和其他地方的小规模攻击对实现战略目的来说无济于事。更糟糕的是，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在保卫瑞典的战斗中未能合作，俄国人被迫穿过山地东撤；而且沙皇对盟国不再抱有幻想，十分怀疑英国的政策，愿意同早已从埃及潜回法国的拿破仑谈判。俄国撤出后，奥地利先后在马伦戈和霍希斯泰特，两次战役都在1800年6月），6个月后又在霍因林登对付法军来势凶猛的全力进攻，迫使维也纳再次求和。普鲁士和丹麦则利用这些事件造成的转机，占领汉诺威，而且由于西班牙进犯葡萄牙，1801年时，英国实际上象3年前那样已经孤立。在欧洲北部，俄国、丹麦、瑞典和普鲁士在新的《武装中立联盟》中已经联合起来。

而在海上战役和欧洲以外地区的战役中，英国的战绩再度表现出色。已从法军手中夺取马耳他。因而皇家海军有了重要的战略基地。丹麦舰队是武装中立联盟的第一线舰队，在哥本哈根海域被击败，这个中立联盟是为了不让英国人在波罗的海地区进行贸易而新建立的（尽管在海战之前几天，沙皇保罗被杀害，已表

明这种联盟寿终正寝)。1801年3月，英国的一支远征军在亚历山大打败法军，这一战役后来导致法军全部撤出埃及。还有英国派往印度的部队在迈索尔推翻得到法国人支持的铁普苏丹，而且在北部继续扩大战果。法国、荷兰和瑞典在西印度群岛的领地都落入英国手中。

到1801年，英国在欧洲大陆由于没有一个坚定的盟国，而且英法之间的战役没有明确的结果，因而英国的很多政治家都考虑媾和；在商界的催促下，这种情绪更加强烈，当时商界主要是地中海的贸易，其次是波罗的海的贸易都蒙受损失。皮特因天主教解放问题而辞职，从而加快了转向谈判的进程。拿破仑经过再三考虑，认为转入和平时期不会有什么损失：法国将继续强化对卫星国的影响，而英国在这些地区则绝不可能得到以前那样的贸易和外交特权；分散在各个港口的法国海军则可以集结和加强；在下一回合的战争打起来之前，法国的经济可以休养生息。这样一来，当人们发现，法国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这场斗争时，英国的观点稳步地却向另一方向转变，英国的观点是，在缔结《亚眠和约》(1802年3月)时，对政府不作过多的批评。当时，不准许英国参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贸易。严正警告英国不准干预荷兰、瑞士和意大利的事务。从马斯喀特，到西印度群岛，从土耳其到皮埃蒙特，都有法国施展阴谋和进行侵略的报告。这些连同证明法国拥有大规模建造舰艇计划的证据促使阿丁顿执政的英国政府拒绝交回马耳他，而且在1803年5月，将一场冷战变为热战。

在1689年至1815年期间，英法之间进行了七次重大战争，其中最后一次持续了12年，而这对双方都是最严峻的考验。与以往一样，交战各方都有不同的优势和弱点。尽管舰队有所裁减，战争爆发时，皇家海军仍处于很强的地位。英国强大的海军分遣舰队封锁法国的港口，这是英国有计划地重新占领法国海外

殖民地及其卫星国。英国在占领特拉法加之前已占领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圣卢西亚岛、多巴哥和荷属几内亚，并在印度进一步取得进展；1806年，好望角失守；1807年，库拉索岛和丹麦所属的西印度群岛失守；1808年，摩鹿加群岛的很多岛屿失守；1809年，卡宴、法属几内亚、圣多明戈、塞内加尔和马提尼克岛失守；1810年，瓜德罗普岛、毛里求斯、安汶岛和班达失守；1811年，爪哇失守。这些情况对欧洲的平衡也没有直接影响，但它对英国在海外的优势确实是一种加强，并使英国通过传统渠道无法进入安特卫普和里窝那的产品找到了“出口”；甚至在出现这种事态的早期阶段，现实迫使拿破仑不得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真地考虑入侵英国南部。法国在布洛涅附近集结了陆军精锐，而刚毅坚定的皮特于1804年再次出任首相，双方都期待着最后一场决战。

实际上，1805年至1808年的海战和陆战，尽管其中包含多次有名的战役，也再次暴露了制约战争的战略条件。当时法军至少比英军多2倍，而且战斗经验丰富得多，但是法军能安全地登陆英国之前，需要掌握制海权。从舰艇数量看，法国海军很可观(约有70艘现役舰艇)，这是拿破仑所能调动的兵力；而到1804年底，当西班牙参战时，西班牙海军（有20多艘现役舰艇）加强了法国的兵力。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分散在6个港口，这两支舰队如果不冒险与规模大得多、作战经验丰富的皇家海军进行遭遇战，是无法实现会合的。法西舰队于1805年10月在特拉法加遭到惨败以最有讽刺意味的方式说明了对阵的海军双方在质量上的差距。如果这场引人注目的胜利能保住不列颠群岛的话，也削弱不了拿破仑在陆地上的地位。由于这个原因，皮特努力诱使俄国和奥地利参加第三次反法同盟，这两国参加反法战争人员每10万人可得补贴175万英镑。即使在特拉法加战役之前，拿破仑的军队迅速从布洛涅向多瑙河上游迅速推进，在乌尔姆歼灭奥

军，然后挥师向东，于12月在奥斯特利茨打垮8.5万人的奥-俄联军。由于沮丧的维也纳第3次乞求和平，法国人可以再次宣称已经控制了意大利半岛，并迫使那儿的英俄军队仓皇撤退。

无论英国遭受这些重大打击的消息是否构成皮特于1806年初的死因，但这些消息再次表明，搞垮象拿破仑那样的军事天才确实很难。实际上，以后几年出现了法国在欧洲占优势的局面(见地图7)。普鲁士早先退出反法同盟，使该同盟遭到削弱；它又于1806年10月匆忙对法宣战，当月即遭惨败。而俄国庞大而顽强的军队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俄国在经过多次战役后也在弗里德兰（1807年6月）遭到惨败。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后，普鲁士已变为实质上的一个卫星国，俄国由于同意停止与英国通商和最终参加法国的同盟，而轻易地摆脱了困境。随着德国南部以及西部大部分地区并入莱茵联盟、波兰西部变为华沙大公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低地国家屈从，以及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当时在葡萄牙和瑞典之间已没有一个独立国家，而对英国来说，再也没有一个盟国。因而法国能有机会最有力地搞垮“小店主之国”①其手段是，禁止英国向欧洲出口，损害英国的经济，同时囤积木材、桅杆和造船用的其它资源，不向英国皇家海军提供。在进行直接攻击之前，本来可以间接地削弱英国的力量。英国为发展其出口行业一直依赖欧洲市场，为发展其舰队而历来依赖波罗的海的桅杆和达尔马提亚的橡木，因而面临的威胁很大。最后，伦敦由于出口收入减少，向盟国提供补贴和采购本国远征军物资所需的通货大为匮乏。

因此，在这场战争中，经济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与战略交织在一起。在英法争夺霸权的这个中心舞台上，拿破仑颁布柏林米兰法令禁止与英国通商（1806～1807年）以及法

①小店主之国（Nation of shop Keeper）：对英国的蔑称。——译者注。

国于1812年撤出莫斯科的这段时间里，这两个敌对体系的相对优势是值得认真分析的。在双方都想从经济上搞垮另一方的情况下，任何重大的缺陷迟早会暴露，而且产生强权政治的严重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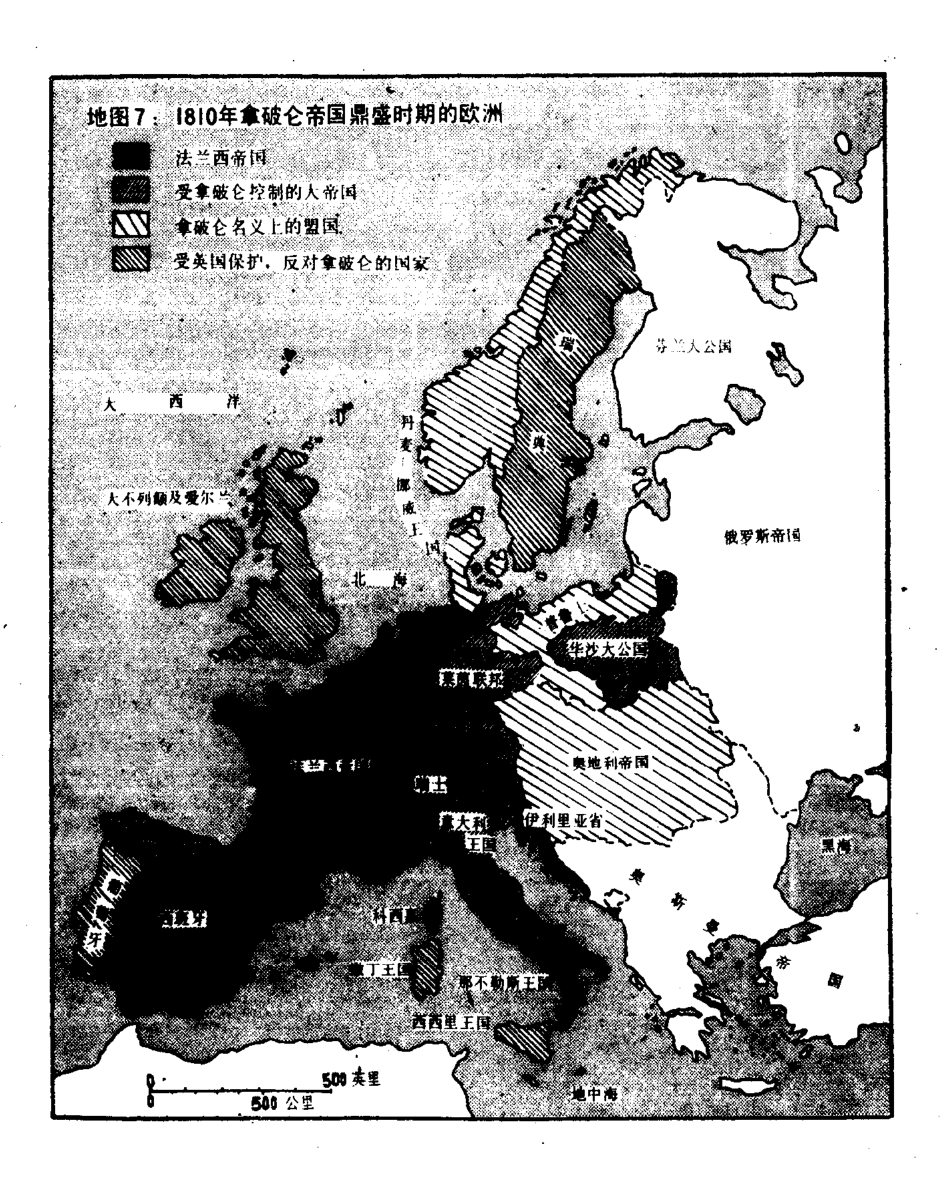
英国无疑异乎寻常地依赖对外贸易，因而很容易受到拿破仑为禁止贸易而实行"大陆封锁体系"① 的破坏。法国及其比较顺从的卫星国（例如，丹麦）先后在1808年和1811～1812年间进行的贸易战，使英国的出口贸易出现危机。仓库中堆积了生产厂的大量存货，殖民地的产品挤满伦敦码头。城镇的失业人口和乡村的动乱使商人更加担心，也促使经济学家谋求和平；国债的惊人增长出现类似结果，在1811年以后与美国的关系恶化而且对美国这个重要市场的出口额下降时，面临的经济压力看来几乎无法承受。

实际上，英国承受得了这种经济压力，其主要原因是，英国面临的压力并没有自始至终完全起作用。西班牙反对法国称霸的这场革命缓和了英国1808年的经济危机，这种情况正如俄国断绝与拿破仑的关系缓和了1811～1812年的衰退，使英国的货物可以大量进入波罗的海和欧洲北部一样。再者，在整个这段时间里，英国的大量产品和殖民地的转口商品偷运到大陆，取得巨额利润，而且往往得到当地受贿官员的默许；被禁运的物品从赫尔戈兰迂回到达萨洛尼卡急需这种物品的买主手中，这种情况与1812年英美战争期间，有关商品在加拿大和新英格兰之间旅行一样。最后，与未受大陆封锁体系和美洲的"不来往"政策的损害的亚洲、非洲、西印度群岛和拉丁美洲（尽管西班牙在当地的总督作出全部努力）和近东等地区的贸易的大幅度增加才使英国的出口

①大陆封锁体系（Continental system）：拿破仑一世在1806～1812年间实行的反英经济封锁政策体系。——译者注。

经济得以维持下来。尽管英国的贸易在某些市场、某些时候遭到严重破坏，但总的趋势很清楚；英国产品的出口总额 1794～1796 年为 2170 万英镑，1804～1806 年为 3750 万英镑，到 1814～1816 年间上升为 4440 万英镑。

英国经济在面临外来压力的情况下没有崩溃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英国当时正积极参与产业革命，这使拿破仑感到遗憾。这两个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显然以很多特有的方式在交互起作用：政府的军火订货促进了铁、钢、煤和木材的贸易，国家的巨额开支(估计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9%）影响了金融活动，新的出口市场促进了有些工厂的生产，这种情况恰巧与法国的"反封锁"抑制了这些工厂的生产一样。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时期的战争到底怎样影响英国整个经济的增长？这是一个很复杂并存在争论的问题，有待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现在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早先关于英国工业化在这几十年中迅速发展的看法是言过其实。而有一点很清楚，即整个这段时间，经济确有发展。生铁产量在 1788 年只有 6.8 万吨，到 1806 年已猛增到 24.4 万吨，而在 1811 年增加到 32.5 万吨。棉纺工业，在战前实际上是一种新兴产业，以后的 20 年里取得惊人发展，占用了更多的机器、蒸汽动力、煤和劳动力；到 1815 年，棉产品已成为英国的最大的出口产品。大批新建的码头、内陆、运河、公路和铁路线改善了交通状况，并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如果没有这场反对法国的军事斗争和海上斗争，本来也许会更加"繁荣"，事实依然是，英国的生产率和财富仍然增长很快，而且能承担皮特及其继承者为偿付战争费用而加重的负担。例如，关税和国内货物税收入从 1793 年的 1350 万英镑猛增到 1815 年的 4480 万英镑，而新的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年收益就从 1799 年的 167 万英镑猛增到战争最后一年的 1460 万英镑。实际上，从 1793 年到 1815 年期间，英国政府的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总收入高达 12.17 亿英镑，并向金融市场借



地图7：1810年拿破仑帝国鼎盛时期的欧洲



债4.4亿英镑，而未丧失其信誉，这使财政上较保守的拿破仑感到惊讶。在战争的最后关键性几年，政府每年借债超过了2500万英镑，因而使政府拥有决定性的额外储备量。确实，英国人的纳税额确实远远超出18世纪的官僚可想象的限度，国债几乎增加2倍；但是创造的新财富使这类负担比较容易承受，从而英国尽管国家较小和人口较少，但比堂堂的拿破仑帝国却更能忍受战争的代价。

法国在1789年至1815年期间的经济状况及其维持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更难阐明的问题，旧制度的崩溃和后来出现的混乱无疑暂时减少了法国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群众对大革命倾注热情和动员国家资源以对付外来敌人因而导致火炮、轻武器和其他武器装备产量大量增产，这相应地促进了钢铁和纺织品贸易。此外，废除了旧秩序在经济方面的某些障碍，如征收国内关税，而拿破仑亲自主持的法律改革和行政管理改革有助于实现现代化的前景。即使后来的执政府①和帝国导致恢复君主政体的很多特点（例如，依赖私人银行家），但这并未遏制经济的稳步增长,而促进经济增长的自然因素是,人口增长、国家开支的刺激，加强关税保护与采用某些新技术。

尽管这样，法国经济的增长率无疑比英国的低得多。造成这种局面的最深刻的原因是农业这个迄今最大的生产部门变化甚微：因为由农民取代庄园主本身并不是一场农业的革命；而且诸如发展甜菜（以取代英国殖民地的蔗糖）等得到广泛称赞的政策只取得有限的结果。交通状况很差，这意味着农民仍然束缚在当地的市场上，也没有积极促进创造发明。在新兴工业部门同样存在这类保守想法，例如生产新机械和钢铁的大型企业则是例外，

---

① Consulate：1799～1804年间拿破仑统治早期的共和制政府。——译者注。

但不全都如此。法国确实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其中很多受到战争和英国海上封锁的畸形影响。因此，棉纺工业从大陆封锁体系中受益，不会受到英国优势的竞争，中立国或卫星国的竞争不值一提，这些国家的产品由于法国征收高关税而无法进口；而且由于法国加强国内市场又进一步受益。因为拿破仑征服接壤邻国使“法国人”的数量从 1789 年的 2500 万人增加到 1810 年的 4400 万人。而这方面的优势被原棉短缺和价格昂贵以及慢条斯理地引进英国的新技术所抵消。总的说来，战后法国工业显然处于**缺乏竞争力**的状态，因为法国采取防范外国对手的保护性做法。

进行海上封锁产生的影响是使法国经济更加内向。法国的大西洋部分，在 18 世纪是增长最快的地区（英国也是这样），也是实现工业化的潜在的主要因素，却日益被英国皇家海军分隔开来。尤其是，丧失圣多明戈是对法国的大西洋贸易的重大打击。法国的其它海外殖民地和投资也已经丧失，而且在 1806 年以后，甚至不准法国利用中立船只进行贸易。博尔多受到严重损害。使法国盈利的南特奴隶贸易一无所获。从 1789 年至 1813 年期间，甚至马赛地区的工业产量下降了 3／4，而内地和意大利北部的贸易伙伴可供选择。相比之下，法国的北部和东部地区，例如阿尔萨斯进行陆上贸易则比较安全。即使这些地区以及诸如葡萄酒厂厂主和纺织厂厂主等人在受保护的环境中受益，但对法国经济的**总体**影响则非常令人不满意。法国经济由于在大西洋部分出现“非工业化”，而且与外界大部分地区分隔开来,因而转向国内农民、小城镇的商业及其局部的、缺乏竞争力和规模较小的行业。

在这种经济上守旧，而且明显落后的情况下，法国几十年来资助列强战争的能力更加不比寻常。从 18 世纪 90 年代初期到中期这段时间里，能动员民众是一个明显的理由，但这对拿破仑时代仍无法解释清楚当时必须负担一支超过 50 万人的常备军费用

(也许每年需要增加15万名新兵)。军费支出在1807年时至少已花费4.62亿法郎，到1813年猛增到8.17亿法郎。难怪正常收入绝对无法补偿这样大的支出。征收直接税在国内不得人心，因而无法大量征收，这就是拿破仑恢复旧制的烟草税、盐税和其他税收的主要原因；但是无论是间接税还是各种印花税和关税都无法制止年度赤字达到数亿法郎，设立法兰西银行以及各种其它金融手段和机构可使国家实行隐蔽的纸币政策，因而可利用赊账方法而避免陷入经济困境，尽管皇帝声称反对举债。但是即使采取这些措施仍然不够。亏空只能在别处填补。

拿破仑的帝国主义，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极大程度上的话），是靠掠夺来补偿的。这个掠夺过程开始是从国内没收和变卖已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的财产。当保卫这场革命的各次战役使法军进入邻国时，看来很自然的就由其它国家的人民来承担这场斗争的费用。直截了当地说，是用战争支持战争。拿破仑不仅偿付了战争的巨额军费开支，而且实际上还给法国和他本人带来好处。他没收战败国王室和领主的财产，直接获得敌人的军队、兵营、博物馆和国库的战利品；勒索用现金和实物支付的战争赔款；向卫星国派出军队，并要卫星国提供分遣部队。这个特殊领域的主管官员在法国的这段鼎盛时期获得的总金额十分令人瞩目，而且在某些方面，连纳粹德国在二次大战期间掠夺卫星国及被其征服的敌国都无法与之相比。例如，普鲁士在耶拿之战之后被迫交纳3.11亿法郎的罚金，这笔罚金相当于法国政府的经常收入的一半。哈布斯堡帝国在每次战败后，被迫割让领土和交纳大笔战争赔款。意大利在1805年至1812年期间，征收的税金约有一半交给法国。上述做法有两个优点，既可使法国庞大的军队大部分在国外，而且法国的纳税人可不承担战争的全部费用。只要这支军队在其卓越将领的率领下继续连战连捷的话，看来这个体系是不会受损害的。因此，难怪法国皇帝坚持认为：

> 我的权力取决于我的光荣，而我的光荣取决于我已经赢得的胜利。如果我不把权力寄托在新的光荣和新的胜利上，我的权力就会衰退。征服使我有今天，只有征服我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

那么，怎样才能打垮拿破仑呢？光靠英国一个国家是不行的，因为英国的兵力不足。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对法国进行攻击，总是注定要失败。普鲁士于1806年不合时宜地参战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当时普鲁士未能阻止遭到失败的奥地利于1809年初与法国再次交战；尽管奥地利精神饱满地参加埃肯米尔和阿斯佩恩战役，但在瓦格拉姆再次失利，迫使维也纳向法国及其盟国求和并割让领土。再者，在拿破仑进入西班牙镇压那里的起义之后不久，法国就战胜奥地利。因此，看来无论哪里有人反对皇帝，会很快遭到镇压。尽管在海上，英国象攻击哥本哈根（1807年8月）那样，无情地打击真正的和潜在的敌人，他们依然会将其军事资源消耗在对意大利南部附近地区的小规模袭击上，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次不适当的攻击上，以及在1809年夏天在瓦尔切伦遭到惨重失败的作战上。

而恰恰是在拿破仑的体系看来无敌于天下之时，这个帝国的大厦首次开始出现重大裂痕。尽管法国在军事上接连取得胜利，但法国在这些战役中的死伤人数也很高，在埃劳和弗里德兰，分别损失1.5万人和1.2万人，在巴伊伦死亡和投降人数为2.3万人，在阿斯佩恩，死伤惨重，达4.4万人，在瓦加拉姆死伤3万人。富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在减少，至少除了警卫部队以外是这样；例如，在1809年兵员为14.8万人的德国军队中（警卫部队除外），有4.7万人是未成年的新兵。尽管拿破仑的军队和希特勒的军队一样，有很多人来自被征服领土和卫星国，但是法国的人力储备显然在减少；而沙皇仍然拥有无法预计的大量人力储备，而且甚至在瓦加拉拇战役之后，顽强而显然不满的奥地利人

拥有一支非常可观的"即将成型的军队"，所有这一切在不远的将来都富有意义。

再者，拿破仑在1808年末攻进西班牙，并没有象他主观想象那样，"决定了"战役的胜负。拿破仑在击溃西班牙正规军的过程中，无意之中启发当地百姓学会了游击战，而这是更难镇压下去的，此外，法军的后勤问题又严重恶化。由于从当地居民中得不到粮食，法军主要依赖其靠不住的补给线。再者，拿破仑先开辟西班牙战场，继而又开辟葡萄牙战场的过程中，无意之中却选择少数地区中的一个，可以劝诱当时仍然谨小慎微的英国人承担义务，英国起先是试探性的，可是当后来他们看到威灵顿怎样利用当地的同情、半岛的地形、制海权以及最后尤其是日益职业化的军队遏制和削弱法国的锐气时，他们的信心日益增强。当马赛那[1]率领的法军于1810～1811年向里斯本进军失败时，有2.5万人伤亡，这是"西班牙溃疡"不能刺破的最早迹象，即使在这之前已将约30万名法军派往比利牛斯以南也不例外。

西班牙的商业，除了削弱法国以外，同时也从战略上和贸易上减轻英国承受的压力。在以前的多数英法战争中，西班牙毕竟是站在法国一边的，而这样不仅对直布罗陀来说造成面向内陆的威胁，而且对英国的海上优势来说，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的形式造成面向海洋的威胁，也影响伊比利亚半岛、拉丁美洲和地中海总的出口市场。一个友好的，而不是敌对的西班牙，意味着消除所有这些压力。当兰开夏和英格兰中部的产品回到传统市场时，大陆封锁体系对英国贸易的损害便大大减轻；到1810年，英国的出口额猛增到创纪录的4800万英镑（1808年为3700万英镑）。尽管仅仅是暂时地减轻英国承受的压力，而且由于封锁波罗的海以及英美在征用和封锁上争论不休而变得日益不引人注

[1] 马赛那（Massena，1758～1817）：拿破仑麾下大将。——译者注。

意，但是减轻的压力还是有意义的。它是对拿破仑在欧洲大陆以外的主要敌人的一个支持，而且恰好在这个时间欧洲大陆突然爆发起义。

实际上，拿破仑在欧洲的基础是很矛盾的。无论在法国本身爆发的这场大革命有什么利弊，一个宣布自由、博爱、平等的国家是由皇帝领导的，这位皇帝征服外国的居民、向外国派驻军队、没收他们的货物、使他们的贸易陷于混乱、索取大量的赔款和税金、征募他们的年轻人入伍。当时还可以感到人们对实行大陆封锁体系后所强加的控制日益不满，因为不仅是南特和博尔多，而且阿姆斯特丹、汉堡和的里雅斯特都由于拿破仑开展的对英经济战而受到损害。很少象西班牙人那样公开武装起义，或象俄国人在 1810 年 12 月决定退出灾难性的大陆封锁体系。而当拿破仑的陆军精锐在莫斯科的战役中溃败时，以及西班牙军队被迫退回比利牛斯时，摆脱法国霸权的机会终于到来。普鲁士人、俄国人、瑞典人、奥地利人和其他国家当时需要的是现货供应步枪、靴子和被服，更不用说经费了，而这些都已由英国人向葡萄牙和西班牙盟国提供。因此，一方面，不列颠群岛为了确保安全及其相对繁荣，而另一方面法国的统治具有过分向外扩张和日益贪婪的性质，最后两者交互作用并开始促使拿破仑帝国的崩溃。

对经济和地缘政治学等因素所作的这种全面的分析，势必会贬低这段历史中更多的个人方面，例如，拿破仑本人日益昏庸和自欺欺人。这种分析也许会存在到战争的最后一年，对性质很不稳定的军事平衡还是强调不够，因为法国人甚至拥有建设一支庞大的海军所需要的资源，如果他们真要这么做的话。英国的出口经济只是到 1812 年时才受到最严峻的考验；爆发莱比锡战役（1813 年 10 月）时，拿破仑好象能打败东部的敌人并从而有希望瓦解反法同盟。

尽管这样，法国的“过份扩张”此时已极端严重，反映了拿破

仑本人狂妄自信，而且任何重大挫折肯定会影响这个体系的其它部分，这完全是由于，为了修复已被摧毁的战线，这些部分不得不消耗部队的力量。到1811年，法军在西班牙约有35.3万人，而且正如威灵顿所说，他们只要没有部队驻扎，就没有权威；确保交通线路畅通消耗了他们的大部分力量，而且很容易遭到英国—葡萄牙—西班牙向前推进时的攻击。翌年拿破仑决定削弱俄国的独立地位时，从西班牙只能抽出2.7万人参加向莫斯科的进军。在法国陆军精锐的60多万人中，其中只有27万人是法国人，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也有27万人。再者，既然拥有法国"国籍"的人包括被并吞领土的比利时人、荷兰人和很多意大利人，在法国1789年以前国界内招募的部队在俄国的战役中无疑是少数。这在战斗初期法军连续取胜阶段也许无关紧要，可是在退却阶段却是重要因素，人们拼命逃避恶劣的天气、野蛮的哥萨克和返回本国。

在俄国的战役中法国陆军精锐的死伤很多：也许有27万人死亡，20万人被俘，损失约1000门火炮和20万匹战马。正是东部战线，而不是别的因素，使法军的士气下降。尽管这样，很重要的一点是应该理解，从1813年起，东欧的战役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战役是怎样相互影响，而最终造成法国衰落的：因为那时，俄国军队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而且俄国的将领们几乎毫无热情）穿过德国去追击法国人；英国人则或多或少被美洲战争分散了注意力；在1813年夏初，拿破仑已招募到一支14.5万人的部队，因而他能在萨克森坚守阵地和谈判停火。尽管普鲁士见风转舵，已转向俄国，而且梅特涅[1]以奥地利的一支25万人的军队相威胁，其东部的强国则仍然处于分裂和难以捉摸的状态。威灵顿率领的部队已在维多利亚（1813年6月）打垮约瑟夫·波

[1] 梅特涅（Metternich）：奥地利外交大臣和首相。——译者注。

拿巴[1]率领的军队，而且将其赶回比利牛斯。因此，这个消息十分重要，在鼓舞奥地利人宣战并与俄国、瑞典和普鲁士等的军队联合，以便将法国人撵出德国。后来10月份莱比锡之战的规模对英军来说心中无数，反法同盟的36.5万人的军队在4天的战斗中击溃19.5万人的法军；前者在经济上得到英国提供的大量补贴，以及12.5万支滑膛枪，218门火炮和很多其他装备。

法国在莱比锡溃败又鼓舞了在比利牛斯以北的威灵顿将军向巴荣纳和图卢兹推进。当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大举越过莱茵河，而且哥萨克人入侵荷兰时，拿破仑于1814年初运用出色的战术指挥了法国东北部的保卫战；但是拿破仑军队的实力消耗很大，而且军队中的新兵过多。再者，法国百姓的态度是，既然战斗在本国进行，因而（正如威灵顿将军预料的那样）就不那么热心。由于英国强烈要求将法国的版图恢复原状，而且在3月9日签订的《肖蒙条约》中允诺再提供500万英镑的补贴，反法同盟成员国的政府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对法国一直施加压力。到1814年3月30日，甚至连拿破仑的元帅们也觉得压力太大，又过了一周，皇帝宣布退位。

1812～1814年的英美战争与这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相比，只是战略上的侧面事件。从经济上看，如果这场战争与大陆封锁体系崩溃不是同时发生，如果严重依赖英美贸易的新英格兰各州对这场战争不表示冷淡（而且经常保持中立）的话，那么这场战争本来是会对英国利益的危害要严重得多。美国部队早先宣布的“向加拿大进军”很快不再提了，英美双方在陆地上和海洋上尽管分别袭击约克（多伦多）和华盛顿，而且都只用一艘船护航而引人注目，双方都表明能给对方造成损害，但无法打败对方。尤其

---

[1] 约瑟夫·波拿巴（Joseph · Bonaparte）：法国任命的那不勒斯、西班牙国王。拿破仑一世之长兄。——译者注。

对英国人来说，这表明了美洲贸易的重要性，而且还表明，在欧洲战区十分需要武装部队之时，很难在海外保持庞大的陆军和海军。与在印度的情况一样，横跨大洋的领地和贸易既加强了英国的大国地位，也使英国在战略上实行分散。

拿破仑在 1815 年 3 月至 6 月的最后一战，尽管肯定不是一件侧面事件，但从战略上看，是给欧洲大战作了脚注。拿破仑突然从流放地潜回法国，使胜利者中断了关于波兰、萨克森和其它国家未来的争吵，但未能使反法同盟动摇。仓促组成的法国部队在滑铁卢即使未被威灵顿和布吕歇尔[①]打败，那么法军也很难抵抗得住其他已经转向比利时的部队，而且法国在这之后在经济上怎么可能维持一场长期的战争。尽管这样，拿破仑的最后一次胆大妄为，却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得以加强，而且用事实证明，今后需要用一系列的强大的"缓冲国"来包围法国。这也表明，普鲁士在耶拿之战以后，在军事上得到恢复，因而部分地重新调整了东欧的平衡。这样一来，迫使在维也纳开会的所有强国放弃他们的分歧，以便实现能尊重均势原则的和平。在长达 20 年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一百多年大国之间紧张和冲突之后，欧洲各国最终按确保大体平衡的方针形成国家间的格局。

1815 年签订的维也纳和约，正如普鲁士人以前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未能将法国瓜分。这一和约确实以大量的领土单位包围路易十八的版图，北部有尼德兰王国，东南部有扩大的撒丁王国（皮埃蒙特），在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有普鲁士；而列强则保证西班牙在其回归波旁王朝后的完整统一。在更东部地区胜利者经过激烈争吵之后也贯彻均势原则。由于奥地利的反对，普鲁士未能并吞萨克森，而作为补偿接受波森和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类似

---

①布吕歇尔（Blücher）：普鲁士元帅。——译者注。

情况是奥地利得到意大利以及德国东南部的部分地区作为补偿，因为事实上，普鲁士只保留了波兰的加里西亚地区。俄国在瓜分波兰领土中提出应得到最大一份的要求最后不得不给予满足，而在1815年初英法奥联盟警告说他们反对任意决定萨克森的未来，甚至俄国都感到相当震惊，后来很快就放弃对峙。看来，任何一个强国都再不能象拿破仑那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欧洲的其他国家。1793～1815年的一系列事件也根本未能使一些主要国家的利己主义销声匿迹，但是“遏制和互惠补偿”这两条不可分割的原则则意味着，谁也不能单方面称霸欧洲；而且即使领土的小规模变动也要得到欧洲协同体的多数成员国同意。

就欧洲“五国联盟”的所有谈论来说，重要的是，五个大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已与1750年，乃至1789年的关系不同。尽管俄国取得发展，但公平地说，在拿破仑垮台之后，欧洲的陆上力量大体平衡，另一方面，海上力量发展不平衡，英国的海军基本上占垄断地位，这种状况使英国经济上超过其所有对手的领先地位又得以加强，而经济上领先又加强了海上的垄断地位。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印度，这是不断推行军事扩张主义和进行掠夺的结果，因此，战争和谋求利润相互作用，使次大陆于18世纪末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同样，夺取圣多明戈（在法国大革命前，圣多明戈承担法国的殖民地贸易的3／4，很令人注目）的结果，到18世纪90年代末，已成为英国商品的重要市场和英国转口贸易商品的重要来源。此外，不仅在北美洲、西印度群岛、拉丁美洲、印度和远东的海外殖民地的发展超过欧洲的殖民地，而且这类长途贸易通常盈利更多，还进一步促进航运、商品交易、海上保险、票据结算和银行业务的发展，从而增强了伦敦成为世界新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尽管近来有些论著怀疑英国18世纪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海外扩张无疑可以使英国利用其敌人所没有的大量新财富，这仍然是事实。由于到

1815年已控制欧洲的多数殖民地，控制了海上航路和盈利的转口贸易。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比其它社会遥遥领先，因此，英国当时成为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下一章还要谈），随着英国在世界的贸易结构中发展成为"超优经济"，英国变得更加富裕。皮特和卡斯尔雷[1]大力坚持的平衡原则，只用于处理欧洲的领土安排，而不在殖民地和商业方面。

这一点几乎丝毫未使19世纪初明智的观察家们感到惊讶。拿破仑尽管本人曾提出过宏伟的设想，但常常被英国制约——当时，英国不易受到攻击，海上占有优势，已经建立银行和信用制度——，而且渴望英国彻底变为废墟。这种嫉妒和厌恶的情绪无疑存在，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目睹英国垄断世界的其他国家的人也有类似情绪，只是没有那么严重罢了。1812年，当法国陆军精锐被撵出俄国时，俄国将领库图佐夫[2]由于怀疑全面摧毁拿破仑的想法是否明智，希望俄国军队停止向西推进，他说的话不仅仅是为他自己辩护，因为"继承权不会属于俄国和欧洲大陆任何国家，而是属于现已得到制海权的强国，而它一旦称霸，令人难以容忍。"在当时的最后岁月，必然出现下述结局，即拿破仑过份自信和拒绝妥协，势必不仅自己垮台，而且使他头号敌人取得辉煌胜利。另一位对更广泛问题有见解的将军格纳森瑙[3]不无讽刺地总结道：

> 英国承担的义务不如这位暴君（拿破仑）那样繁重。正是拿破仑造成的这些事件使英国变得更加强大、繁荣，集聚大量财富。英国成了海上的霸主，而且无论在海上称霸还是在世界贸易方面都不怕任何一个对手。

---

①卡斯尔雷（Castlereagh）：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

②库图佐夫（Kutusov）：俄国元帅，俄军总指挥。——译者注。

③格纳森瑙（Gneisenau）：德国军事家，普鲁士元帅。——译者注。



第二编
工业时代的战略和经济



第四章　工业化和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1815～1885年)

在拿破仑垮台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际体系的发展具有一系列异乎寻常的特点，其中有些仅仅是暂时性的，而另外一些则是近代持久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先是稳定的、随后（19世纪40年代以后）则是惊人的发展，这种全球经济吸引越来越多的地区参加以西欧、尤其是以英国为中心的跨洋和跨洲的贸易和金融网络。随着英国这几十年在经济上称霸，出现了运输和通信系统的大规模改进，工业技术越来越快地从一个地区向另一地区转移，工业生产大量增加，从而促进了开辟新的农业用地和原料来源。取消关税壁垒和其他重商主义措施，以及关于自由贸易和国际协调思想的广泛传播，意味着新的国际秩序已经出现，这种新秩序与18世纪时大国之间纷争不已的情况显然不同。1793～1815年的斗争（在19世纪通称“大战”）造成了混乱并耗费了大量金钱，因而促使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尽可能地选择和平和稳定，而且运用欧洲协同体或自由贸易条约等手段使和平和稳定进一步加强。这种环境必然促进人们进行长期的商业和工业投资，因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第二个特点是，大国之间未发生长期战争并不意味着国家间的冲突已经结束。如果说有冲突，那就是欧洲和北美征服不发达民族的战争更加剧烈了，这些战争往往是向海外世界进行经济渗透以及不发达民族工业生产份额迅速下降时欧美列强采取的军事行动。此外，在欧洲强国之间，尤其在民族问题和领土边界等问

题上仍存在地区性和个别国家之间的冲突；正如我们下面要谈到的，例如 1859 年的法奥战争，或者 19 世纪 60 年代的德意志统一战争等公开的斗争，在战争的持续时间和地区方面都有限，甚至克里米亚战争也很难称得上是重大冲突。这里只有美国内战是例外，因而值得研究。

第三个特点是，产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开始对陆战和海战产生影响。但是变化有时比估计的慢得多，只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铁路、电报、速射火炮、蒸汽推进力和装甲战舰才真正成为说明军事实力的决定性象征。新技术虽然进一步加强了大国在海外的火力和机动力的领先地位，但需几十年后，陆、海军指挥官才能改变他们如何打欧洲战争的观念。尽管这样，技术改进和工业发展这两股孪生力量对陆军和海军不断产生影响，而且也影响列强的相对实力。

尽管很难加以概括，但是，工业变革和技术进步的参差不齐所造成的列强均势的变化，与财政和信贷相比，也许对 19 世纪中叶的各次战争结局有着更大的影响。其部分原因是，19 世纪时国家金融和国际金融大规模发展，而且政府官僚制度（国库、稽查员、税务员）对多数政权来说，更加容易从金融市场中筹集资金，除非他们的信用地位低得惊人，或者在国际银行系统出现暂时的偿付危机。但其主要原因是，实际上多数战争持续时间较短，因此重点放在利用现有军事实力迅速取得战斗胜利上，而不是放在长期动员国家资源和筹措新的收入上。例如，无论筹措多少新的资金，都不可能拯救奥地利于 1859 年和 1866 年在战场上的失败，或者 1870 年法军被击溃后的富裕的法国。的确，在美国内战中，财政上的优势帮助北方战胜了南方，英国和法国与即将破产的俄国相比，有更强的财力承担克里米亚战争费用，但这反映出，美国北方和英法在其经济的总体上占优势，而不是只在信贷或财政方面占优势。因此，几乎谈不上战时财政在 19 世纪

发挥的作用比以前更大。

国际经济的发展，产业革命解放的生产力，欧洲相对稳定，当时陆海军技术的现代化以及出现完全限于局部地区的短期战争，所有这一系列因素当然对某些大国比其他国家更为有利。无疑，在这些国家中，英国在1815年以后时期内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总趋势中受益很多，因而成为有别于其他列强的另一种类型的强国。所有其他国家在其相对实力方面经常受到严重影响。而到19世纪60年代，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开始再次改变世界力量对比。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特点也值得一谈。从19世纪初起，历史统计数字（尤其是经济指标）有助于跟踪分析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更准确地判断推动这个格局发展的动力。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很多数据仅仅是估计而已，对于官僚体系不那么健全的国家来说，尤其突出；有些统计数字（例如，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仅仅是统计学家很多年以后所作的估计；而这些统计数字所作的最重要的说明是，经济财富不会马上（或未必）转化为军事力量。统计数字的全部作用是粗略地说明一个国家的物质潜力及其在领先国家中的相对名次。

多数经济史学家竭力强调的“产业革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与1776年、1789年和1917年的政治革命相比是一个逐步的渐进过程；产业革命仅对某些工业和某些生产资料有影响；它是在一个个地区逐步发生的，而不是一下子席卷全国。但所有这些说明都无法回避这一事实，即人类经济环境根本性的重要转变始于1780年前后，在某位权威看来，它的重要意义不亚于从旧石器时代原始的狩猎人向新石器时代定居的务农人的转变（无可否认这个过程要慢得多），工业化（尤其是蒸汽机）的贡献是用非生物能源取代生物能源，利用机器（“快速、有规律、准确和不停运转”的机器）将热变为功，因而人类能利用大量的新能

源。采用这种新机器取得确实惊人的结果：到19世纪20年代，一个人操作几台动力驱动的织布机，其产量是手工织布工人的20倍，而动力驱动的"骡子"（即走锭精纺机），其能力是手纺车的200倍。一个火车可运送需要数百匹驮马才能运送的货物，而且速度快得多。确实，产业革命还有其他很多重要方面，例如，工厂制度或分工。而本文着重研究的是生产力（尤其是纺织工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而它反过来又促进对更多的机器、原料（尤其是棉花）、生铁、船舶、优良的交通设施等的需求。

再者，正如兰德斯教授所说，人类生产力这种空前增长是自我创造的：

> 过去，继改善生活条件，从而改进生存条件并增加经济发展机会之后，总是出现人口增长，终将创造的财富消耗殆尽；现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经济和知识的迅速增长，其速度之快，足以保证源源不断地投资和技术创新，这一局面明显突破了马尔萨斯提出的控制极限。

最后的这句话也很重要。从18世纪起，世界人口的增长开始加快：欧洲人口从1750年的1.4亿，增长到1800年的1.87亿，进而增长到1850年的2.66亿；亚洲的人口从1750年的约4亿在一个世纪后迅速增长到7亿左右。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气候条件较好、土地肥沃、疾病减少——人口以这样的幅度增长是惊人的；再者，尽管欧洲和亚洲的农业产量在18世纪也有增长，而且实际上也是造成人口增长的另一个普遍的原因、新增人口（需要吃饭），数量如此之大，意味着当时农业增产的一切收获有被抵消的危险。在18世纪末，贫瘠的土地承受着重压，农村失业，大批家庭流入早已人满为患的欧洲城市，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人口急剧增长的一些迹象而已。

英国产业革命的贡献（从很粗略的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是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后来国家财富和人口购买力的增长

得以不断超过人口数量的增长。英国的人口从1801年的1050万，增长到1911年的4180万（年增长率为1.26%），英国国民产值的增长快得多，在19世纪大概增长了13倍。由于统计数字① 涉及的地区不同，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2～2.25%。仅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人均产值增长了1倍半。

与1945年以后很多国家的增长率相比，这些数字并不惊人。正如社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产业革命确实使新生无产阶级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在厂矿劳动，在不卫生的、拥挤的和草率建设起来的城市中生活。然而，根本的事实是，"机器时代"生产力的持续增长给当时带来广泛的好处：英国在1815～1850年期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15～25%，而在后来的半个世纪，竟增长到引人注目的80%。艾什顿对那些指责工业化是一场灾难的人说："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是怎样给人数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几代儿童提供衣食和就业。"新机器不仅越来越多地雇佣了迅速增长中的大部分人口，而且增加了全国总的人均收入。一场蒸汽驱动的交通工具革命，以及为满足旧大陆需要，用铁路和轮船从新大陆运来剩余农产品，很快满足了城市工人对食品和重要物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我们可以运用兰德斯教授的估计，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点。兰德斯在1870年指出，英国当时使用1亿吨煤，这个数字"相当于800万亿卡的热量，足以供8.5亿成年男人用1年（当时实际人口约为3100万）"。1870年时，英国的蒸汽机能力约为400万马力，相当于4000万人产生的功率；"这么多人每年会消耗约3.2亿蒲式耳小麦，比整个联合王国1867–1871年期间的年产量高2倍多"。采用非生物能源可以使产业工人不受生物学因素的限制，大

①有的历史统计数字系指大不列颠（不含爱尔兰），有的则指联合国（含爱尔兰），而有的仅包括北爱尔兰，而不包括南爱尔兰。

大增加和创造财富，而不必屈服于快速增长的人口压力。与此相反，1947 年艾什顿清醒地注意到了另一实事：

> 当今，在印度和中国大地上，只见瘟疫流行，饿殍遍野，看来，那里的男男女女，过着牛马般的生活，白天与牛马同劳作，入夜与牛马同安息。这样的亚细亚标准和没有实现机械化的惨状，就是那些仅增加人口而未经历产业革命的人们的命运。

一、非欧洲国家黯然失色

在研究产业革命对大国体系的影响之前，顺便谈一下产业革命对中国、印度和其他非欧洲国家的影响。他们遭受相对的和绝对的双重损害，情况并非象以往人们想象的那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在未受到西方人的影响之前过着幸福、理想的生活。“应当强调的一个基本真理是，任何一个没有实现产业革命和现代化国家的特点是贫困……传统农业的生产力低、人均产值低、而且以农业为其国民收入的主要成份的任何经济从不具备除满足直接消费以外尚能生产剩余物资的能力……”另一方面，从农业生产在 1800 年构成欧洲社会和非欧洲社会的基础这一事实看，以及从印度和中国等国也有很多商人、织工、手艺人这一事实来看，人均收入悬殊不大；例如，在工业化之前，印度的手织机织工的收入大概是欧洲同类织工收入的一半。这一事实意味着，在亚洲拥有大量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情况下，在蒸汽机和动力织布机尚未改变世界力量对比之前，亚洲与人口少得多的欧洲相比，在世界工业生产[1] 中所占比重大得多。

---

[1] 根据贝罗克（《1750～1980年国际工业化水平》一书作者）采用的“工业”定义。

从贝罗克独具匠心的两项估算中（见表6–7）可以看出，在欧洲工业化和扩张之后，力量对比出现了哪些重大变化。

出现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显然是产业革命使生产力惊人地提高。例如，在18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30年代之间，英国实现了纺织机械化，仅在纺织工业一个部门，其生产率增加到300～400倍，因此，英国在世界总的工业中的份额急剧增加就不足为奇了，而且随着英国变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份额继续增加。当欧洲其它国家和美国仿效英国实现工业化时，它们的份额也稳步地增加，它们的人均工业化水平和国家财富也同步增加。而中国和印度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不仅他们在世界总的工业中的份额相对地减少（因西方产量激增）；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经济绝对地下降，这就是说，由于兰开夏纺织厂价廉物美的产品打入中国和印度的传统市场，从而这些国家出现了非工业化。1813年以后，（该年东印度公司结束贸易垄断），印度的棉纺品进口猛增，从1814年的100万码增长到1830年的5100万码，进而增长到1870年的9.95亿码，在这个过程中，排挤了许多国内原有的生产者。于是，最终回到艾什顿的论点——"人口增加，但未经历产业革命"的国家一贫如洗；中国、印度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人口大幅度增长，也许使它们总的人均收入一代不如一代。由此，贝罗克提出了一个令人瞩目并令人震惊的看法，即在1750年，欧洲和第三世界的人均工业化水平也许差距不太大，但到1900年，第三世界的人均工业化水平只有欧洲的1／18（2%：35%），只有联合王国的1／50（2%：100%）。

所谓"西方人的影响"，从多方面来看，主要指19世纪世界强国力量所在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它不仅表现在从沿海贸易商人、航运商和领事的"非正式影响"到对种植园主、铁路建造人和采矿公司进行更直接控制的各种经济关系中，还表现在对探索者、冒险家和传教士的渗透、西方弊病的传入以及对西方的信

表 6　世界工业生产的相对份额（1750～1900 年）

(单位:%)

	1750 年	1800 年	1830 年	1860 年	1880 年	1990 年
(整个欧洲)	23.2	28.1	34.2	53.2	61.3	62.0
联合王国	1.9	4.3	9.5	19.9	22.9	18.5
哈布斯堡帝国	2.9	3.2	3.2	4.2	4.4	4.7
法国	4.0	4.2	5.2	7.9	7.8	6.8
德意志诸邦／德意志	2.9	3.5	3.5	4.9	8.5	13.2
意大利诸邦／意大利	2.4	2.5	2.3	2.5	2.5	2.5
俄国	5.0	5.6	5.6	7.0	7.6	8.8
美国	0.1	0.8	2.4	7.2	14.7	23.6
日本	3.8	3.5	2.8	2.6	2.4	2.4
第三世界	73.0	67.7	60.5	36.6	20.9	11.0
中国	32.8	33.3	29.8	19.7	12.5	6.2
印度／巴基斯坦	24.5	19.7	17.6	8.6	2.8	1.7

表 7　人均工业化水平(1750–1900 年)

(以 1900 年联合王国为 100)

	1750 年	1800 年	1830 年	1860 年	1880 年	1990 年
(整个欧洲)	8	8	11	16	24	35
联合王国	10	16	25	64	87	(100)
哈布斯堡帝国	7	7	8	11	15	23
法国	9	9	12	20	28	39
德意志诸邦／德意志	8	8	9	15	25	52
意大利诸邦／意大利	8	8	8	10	12	17
俄国	6	6	7	8	10	15
美国	4	9	14	21	38	69
日本	7	7	7	7	9	12
第三世界	7	6	6	4	3	2
中国	8	6	6	4	4	3
印度	7	6	6	3	2	1

仰中。"西方人的影响"在密苏里以西、咸海以南的大陆腹地存在，也在非洲河流的河口和太平洋群鸟沿岸存在。如果说，"西方人的影响"，譬如英国在印度建设公路、铁路网、电报装置、港口和土木工程，最后留下的纪念物给人以深刻印象，那么，它在这一时期多次殖民战争中制造的流血、抢劫和掠夺，更令人毛骨悚然。事实上，从科尔特斯[1]时代起，这种武力和征服的特点已经存在，但这时加快了步伐。在1800年；欧洲占领或控制了世界陆地面积的35%；到1878年比例上升到67%，而到1914年达到84%以上。

蒸汽机和机制工具等先进技术促使欧洲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前装炮（雷管、来复线等）的改进是明显的凶兆；后膛炮的出现大大增强了火力，更是重大的进展；而格林式机枪、马克西姆速射机炮和轻型野战火炮则最终使新的旧武器的土著民族根本无法抵御。再者，用蒸汽驱动的炮艇意味着，已在公海占优势的欧洲海军力量可以经过尼罗河、印度河和长江等主要水路向内陆扩展；因此，在1841年和1842年鸦片战争的几次战斗中"复仇女神"号装甲战舰的火力和机动能力对进行防御的中国军队来说是一场灾难，他们被打得一败涂地。当然，地势险恶（如阿富汗的确可挫败西方军事帝国主义的锐气，而且一些非欧洲武装力量，如锡克教徒[2]和阿尔及利亚人，在19世纪40年代采用了较新的武器和战术，也使他们的抵抗力量也很强大。但是每当斗争是在西方能部署机枪和重型武器的开阔地进行时，后果便毫无疑问了。也许19世纪末叶力量对比表现最为悬殊，在一

---

①科尔特斯（Hernan Corfes，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1521年以暴力和欺骗手段征服墨西哥。后任新西班牙总督。——审校者注。

②锡克（Sikh）：锡克教系流行于南亚次大陆旁遮普等地区的宗教，由印度教分裂而成，在英国统治该地区时，曾多次掀起反英斗争浪潮。——译者注。

次 1898 年的恩图曼战役中，吉青纳[1]的部队用马克西姆速射机枪和李—恩菲尔德来复枪在半个上午的时间里就打死 1.1 万名伊斯兰教托钵僧，而自己的部队仅损伤 48 人。因此，火力差距，如同早已出现的工业生产力差距一样，表明领先国家拥有的资源，为落后国家的 50～100 倍。从达伽马时期起就已隐约存在的西方全球统治，至此已不受任何限制了。

二、英国享有霸权？

如果说旁遮普人、安南人、苏族[2]和班图人[3]是殖民主义者在 19 世纪初的扩张中的“失败者”（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那么英国人无疑是“胜利者”。上一章已经谈到，英国人由于巧妙地将海军优势、财政信用、商业才干和结盟外交结合在一起，到 1815 年时，已在世界上取得明显的领先地位。产业革命的贡献在于，不仅使一个在 18 世纪产业革命前重商主义斗争中已取得极大成功的国家的地位进一步加强，而且还将它变为另一种类型的强国。这里再重申一下变化进程是渐进的而不是革命性的，但其结果却令人瞩目。在 1760 年与 1830 年期间，联合王国约占“欧洲工业生产增长的 2／3”，而且它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份额从 1.9%猛增到 9.5%；以后的 30 年中英国工业发展这一数字上升到 19.9%，尽管当时新技术已扩散到西方其他国家。1860 年前后，英国也许已相对地达到鼎盛时期，其生铁产量占世界的 53%，煤和褐煤的产量占世界的 50%，消费的原几占世界原棉产量的 50%。“占世界人口 2%和欧洲人口 10%的联

1 吉青纳（Kitchener，1850～1916）：英国元帅和政治家。——译者注。

2 苏族人（Sioux）：北美印第安人之一族。——译者注。

3 班图（Bantu）：居于非洲中南部之黑人。——译者注。

合王国，其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相当于世界工业生产潜力的40～45%，欧洲工业生产潜力的55%～60%。"1860年时，联合王国的现代能源（煤、褐煤、石油）的消耗量分别比美国或普鲁士／德意志高4倍，比法国高5倍，比俄国高154倍，联合王国一国占世界贸易量的1／5，占制成品贸易的2／5。悬挂英国国旗的商船队占世界商船队的1／3强，而且这个比例在不断增加。无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期的英国人为他们独占鳌头而沾沾自喜，（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1865年的说法）这时的英国已成为世界贸易中心：

>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

鉴于这一充满自信的表述及其作为根据的工业和贸易统计数字似乎要说明英国当时占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为了公平起见，提出一些其他论点，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尽管这一点有些迂腐——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815年后的几十年间不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当时中国（后来还有俄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而且事实上显然农业生产及其分配是这一时期各国国民财富的基础，包括1850年前的英国在内。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来没有象它的人均产值或它的工业化阶段那样，给人以深刻印象。再者，"国民生产总值本身的量有多少，并无重要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品使500万工厂工人的产品相

形见绌，但是既然其中大部分产品是立即消费掉的，因而根本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在1850年，英国之所以强大，无可匹敌，在于它拥有生产财富的现代工业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

其次，——这一点不是迂腐的——英国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并没有把日益增长的工业力量组织起来，以达到迅速获得武器装备和兵力的目的，这和17世纪30年代华伦斯泰[1]的做法，或纳粹经济的做法都不同。相反，在工业化的早期，自由放任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很流行，宣扬实现持久和平、降低政府开支（尤其是国际开支），减少国家对经济和个人的控制等目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承认，为了保护英国社会"不受来自其他独立社会的暴力和侵犯"，保持一支陆军和一支海军，似有必要；但武装部队本身"不事生产"，不能象工厂或农场为国家增加财富，因此应当将武装部队减少到能与国家安全相适应的尽可能低的水平。由于亚当·斯密的信徒，特别是理查德·科布顿[2]的信徒，假定（或者，至少希望）战争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将来发生的可能性更小，对于将国家组织起来进行战争这种想法自然会感到吃惊了。结果，在英国的工业和交通方面出现"现代化"的同时没有改善陆军，陆军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里停滞不前（也有某些例外）。

因此，虽然英国经济地位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中期十分优越，但为对付冲突实行经济"动员"的程度亚于斯图特王朝初期以来的任何时候。当时不断取消了一些目的在于加强国家安全和国

---

1 华伦斯泰（Wallenstein，1583～1634）：神圣罗马帝国统帅。——审校者注。

2 理查德·科布顿（Richard Cobden，1804～1865年）：英国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译者注。

家财富的关系的重商主义措施：取消保护性关税；解除出口先进技术（例如，纺织机械）的禁令；废除《航海条例》（制订该条例的目的之一是大量储备英国用以防御战争的商船和水手）；终止帝国的“优惠”。对比之下，国防开支保持在绝对低的水平上，19世纪40年代平均每年约为1500万英镑，动乱的19世纪60年代，也不高于2700万英镑；而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0亿英镑。实际上，在1815年以后的50多年时间里，武装部队花费的费用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中央政府的开支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远不足10%，这比18世纪或19世纪的还低得多。这些数字即使对一个手段有限、野心不大的国家来说，也是够低的。而对一个要“统治海洋”，拥有辽阔的疆域，并声称对保持欧洲力量均势有着浓厚兴趣的帝国国家来说，这些数字确定是引人注目的。

因此，英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力量大小，与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的一样，并不反映在国家的作战能力上；同时英国自由放任的体制结构以及日益不过问贸易和工业事务的很小的官僚机器，也不可能动员资源去打一场全面战争而不发生大的动乱。下面还要谈到，即使规模更有限的克里米亚战争也使英国的制度受到严重冲击，不过冲击引起的担心随即消失。不仅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期的人们对欧洲军事干涉表现得比过去更不热情，因为军事干预总是耗资巨大，还可能是不道德的，而且他们认为，欧洲强国之间在1815年以后的60年间普遍存在力量均势，因而英国没有必要全面地承担义务。英国通过外交途径和调动海军舰队，对欧洲重要边缘地区（葡萄牙、比利时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政治事件亟力施加影响，但避免干预其他地区。到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人们普遍认为，甚至进行克里米亚战争也是失策。英国是如此地不愿打仗而且缺乏战斗力，所以它在关键的1859

争，对决定皮埃蒙特的命运不起重大作用，不同意帕麦斯顿[1]和罗素[2]干预1864年的万勒苏益格——荷尔斯泰茵事件，并对1866年普鲁士打败奥地利和4年后打败法国袖手旁观。因此，毫不奇怪，这一时期英国军队的规模较小正是反映了它的军事能力（见表8），无论如何也没有军队可以动员去打一场欧洲战争。

表8　列强兵力(1816～1880年)

国　　别	1816	1830	1860	1880
联合王国	255000	140000	347000	248000
法　　国	132000	259000	608000	544000
俄　　国	800000	826000	862000	909000
普鲁士／德意志	130000	130000	201000	430000
哈布斯堡帝国	220000	273000	306000	273000
美　　国	16000	11000	26000	36000

即使在欧洲以外英国愿意部署军队的地方，如印度，派驻当地的军政官员几乎总是抱怨管辖的领域太大，而指挥的部队不足。无论这个帝国在世界地图上给人多么深刻的印象，地方官员心里明白，帝国在勉为其难。但这一切只是说，19世纪初期和中期的英国是另一种大国，它的影响是不能用军事霸权的传统标准衡量的。英国的强大，表现在某些别的领域，而在英国人看来，其中任何一个领域都远比维持一支庞大而耗费巨资的常备陆军更有价值。

---

[1] 帕麦斯顿（Palmerston，1784～1865）：英国政治家；在1855～1858年间和1859～1865年间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2] 罗素（Russell，1792～1878）：英国政治家，在1846～1852年间和1865～1866年间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首先是海军领域。当然，在1815年以前的一个多世纪里，皇家海军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但海上霸权的争夺连绵不断，尤其与波旁王朝曾多次进行较量。特拉法尔加之战后的80年里，显著的特点是，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敢于向英国海上霸权真正挑战。当然，英国偶尔也"怕"法国；英国海军部也密切注视俄国的造船计划以及美国建造大型的护卫舰。但这种种对英国的挑战很快消失掉，只有英国的海上力量（用劳埃德教授的话来说）产生了"海上帝国史上从未有过的广泛影响"。尽管1815年以后，英国皇家海军人数不断减少，但其实际战斗力有时可能超过任何别的三支海军，或四支海军。而英国的主要舰队当时是影响欧洲政治（至少在其周围地区）的一个因素。例如，为了保护葡萄牙君主国免遭国内外危险，把舰队停泊在塔克斯；在地中海果断地使用海军部队（1827年击溃在纳瓦里诺的土耳其舰队；1840年遏制在阿克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每当"东方问题"尖锐化，就蓄谋派海军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前；凡此种种，为的是显示英国海上力量，尽管地理范围有限，但欧洲各国却不能不掂估它的分量。在欧洲以外地区英国皇家海军的小舰队，乃至个别战舰参与大量活动（镇压海盗，拦截贩奴船只，陆战队士兵登陆以及慑服从广州到桑给巴尔的地方统治者），看来也许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英国势力第二个重要领域是它的不断扩大的殖民帝国。同样，目前总的形势是，竞争远远不如两个世纪以前那样激烈，那时为了帝国版图，英国必须反复与西班牙、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作战。现在，除对法国在太平洋的活动或俄国在土耳其斯坦的蚕食行动不时感到吃惊外，已经没有厉害的对手了。因此，所谓在1815年至1880年期间，英帝国的大部分地区是在强权政治的真空中存在的这种说法，并非言过其实，这也是英国殖民军规模较小的原因。美国共和政体在西半球的发展以及法国和俄国在东半

球的发展，确实限制了英国帝国主义的扩张，并给它带来一些问题。但在很多热带地区英国势力（商人、殖民者、探险者、传教士）长期以来除土著民族外，没有遭遇其他任何外国人。

由于相对地缺乏外来压力，以及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在国内抬头，很多评论家认为没有必要夺取殖民地，这只不过是套在负担过重的英国纳税人脖子上的“磨石”。然而，不管英国国内有什么反帝国主义言论，事实是帝国在继续扩张，1815 年至 1865 年期间，年平均扩张速度约 10 万平方英里（根据某项估算）。有些殖民地是为了战略和贸易的目的夺取的，如新加坡、亚丁、福克兰群岛、香港、拉各斯；而另一些则是贪婪土地的白种殖民者扩张的结果，他们越过南非草原，加拿大大草原和澳大利亚人口稀少的内地，他们的扩张往往激起当地人的反抗，又总是被英国或英属印度派来的部队镇压下去。甚至当英国政府苦于承担越来越多的新责任而反对正式兼并时，任从乌干达到列旺，从刚果到长江到处仍可感到扩张中的英国的“非正式影响”。与法国人零星的殖民地活动以及美国人和俄国人更限于局部地区的国内殖民相比，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帝国主义者的英国人则完全属于另一种类型。

英国第三个特征与实力表现在金融领域。当然，这一点绝不能与国家在工业和贸易方面总的进展分开；促进产业革命需要资金，而产业革命则又以投资收益的方式产生更多的资金。正如上一章所述，英国政府早就知道怎样运用银行信货和股票市场。但是，到 19 世纪中叶时，金融领域的发展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与以往的发展不同。初看起来，数量方面的区别引人注目。联合王国长期处于和平状态，容易得到资金，加上国家金融体制改进，因而促使英国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国外投资：在滑铁卢之战以后的 10 年内，年输出额为 600 万英镑左右，到 19 世纪中期上升到 3000 多万英镑，而到 1870 年至 1875 年期间，每年达到惊人的

7500万英镑。英国从这些利息和股息中得到的收入，在19世纪30年代末，每年可轻而易举达到800万英镑，到19世纪70年代每年超过5000万英镑；但英国随即将其中大部分收入向海外再投资，使其有效地螺旋式上升，从而不仅使英国更加富裕，而且不断促进全球贸易和交通。

这样大量资本输出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也是重大的。首先，海外的投资收益大大减少。英国一直存在的有形商品年度贸易差额。在这方面，投资收入进一步增加了航运、保险、银行收费、商品交易等方面早已相当可观的无形收益。这些收入总合起来，不仅确保决不会发生收支平衡危机，而且使英国在国内外变得越来越富了。其次，英国的经济好比一个大风箱，吸进大量原料和粮食，放出大量纺织品、铁制品和其他制品。与这种有形贸易同时开展并相互补充的是航运、保险和银行等方面业务联系组成的网络，它在19世纪的过程中从伦敦（尤其突出）、利物浦、格拉斯哥和其他许多城市向外扩展。

英国国内市场开放，而且伦敦愿意把海外收入再投资于建设从佐治亚到昆士兰的新铁路、港口、公用事业和农业企业，所以在有形贸易流量和投资模式[1]之间，总的说来相互补充。此外，越来越多地采用金本位制，并在从伦敦提取汇票的基础上发展国际汇兑和支付方法，因此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中期人们确信，根据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则，他们发现了能同时确保不断繁荣和世界和睦的秘密。尽管很多人士——托利党中的保护主义者、东方国家的专制君主、爱好新奇的社会主义者——看来都很愚蠢，未

[1] 例如，阿根廷能在英国找到推销其牛肉和谷物等出口产品的现成市场，因而它不仅能支付从英国进口的产品及各种服务，而且能偿付伦敦提供的长期贷款，因而提高了再次借款的信用。这与美国在18世纪向拉丁美洲贷款明显不同：美国的做法是，只提供短期贷款，但不准进口农产品。

能认识这个真理，但经过一段时间，人人都会认识到自由放任经济和政府功利主义法规的基本有效性。

尽管所有这一切使英国人在短期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裕，那么从长远看这里是否包含战略上的危险因素呢？明智地回顾一下就能发现，这些结构经济的变化至少产生后来影响英国在世界上的力量对比的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英国对其它国家的长远扩展作出贡献，其方法有二，一是通过财政上一再给予帮助来建立和发展外国的工业和农业，一是，建造铁路、港口和轮船，使海外生产者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具备竞争的能力。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蒸汽动力、工厂制度、铁路和随后电力的出现，使英国有能力克服不利于提高生产力的自然障碍和物质障碍，从而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和实力，同时这些发明对美国、俄国尤其是中欧的帮助更大，因为不利于发展的自然障碍和物质障碍在被陆地包围的国家中更大。粗略地说，工业化的贡献是使国家利用本国资源的机会均等，使周围的海军兼贸易小国失去其以往拥有的某些优势，而让以陆地为基础的一些大国得到这些优势。

第二个潜在的战略弱点在于英国的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国际贸易，更重要的是依赖国际金融。到 19 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出口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 1／5，这个比例比沃尔波尔[①]或皮特(Pitt）时期高得多；尤其对庞大的棉纺织业来说，海外市场十分重要。而从国外进口原料和（越来越多的）食品也很重要，因为英国当时正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和工业为主的社会过渡。而在所有增长最快的部门——银行、保险、商品交易和海外投资等“无形的”服务行业——依靠世界市场更为重要。世界变成了英国伦敦商业区的所有物，这在和平时期一切很好；如果再打

①沃尔波尔（Walpole，1676～1745)：1715～1717年和1721～1742年期间任美国财政大臣。——译者注。

一场大国战争，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英国的出口市场是否会受到比 1809 年和 1811～1812 年期间更加严重的影响？整个经济和国内人口难道不会变得过份地依赖进口商品吗？而在发生冲突期间，进口商品是会很容易被切断或中止的。再爆发一场世界大战，以伦敦为基础的全球银行和金融体系不会垮台吗？因为到那时也许会发生市场关闭、保险中止、国际资本受阻转移、信贷破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先进经济与不太"成熟"、但较少依赖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国家相比，也许受到的损失更加严重。

如果存在自由主义者所假定的国际和睦与不断繁荣的情况，那么所有这一切看来是杞人忧天了；要求政治家做的全部工作就只是理智地行动，避免象过去那样与其他民族愚蠢地争吵。而且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派确实认为，英国的工业和贸易与全球经济结合得越紧密和对全球经济的依赖性越大，则对导致冲突的政策加以抑制作用也越大。同样，应当欢迎金融方面的发展，因为它不仅促进 19 世纪中期的"繁荣"，而且还显示英国已变得多么先进和进步；即使其他国家仿效英国并实现工业化，英国可将其力量转到促进这一发展的服务方面，并因而得到更大的收益。用伯纳德·波特的话来说，英国是第一个长出腿的青蛙卵，第一个变为青蛙的蝌蚪，第一个跳出池塘的青蛙。英国在经济上迥然不同，唯一的原因只是它与其他国家相比已遥遥领先。由于环境顺利，对战略弱点的担心似乎就毫无根据了；而且大多数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代中期的人宁愿象金斯利[1]那样，相信宇宙之命运在起作用，金斯利在 1851 年参观水晶宫[2]的世界博览会时，流下了自豪的泪花：

①金斯利（Kingsley，1819～1875）：英国牧师、小说家和诗人。——译者注。

②位于伦敦郊外的锡德纳姆（Sydenham）游乐场，1936年烧毁。——译者注。

珍妮纺纱机[1]和铁路，丘纳德[2]的班船和电报，对我来说……是一些迹象，表明至少在某些方面我们和宇宙和睦共处；表明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威力非凡的神灵在起作用…这就是主宰和创造一切的上帝。

因此与时运极佳的其他文明国家的人们一样，英国人相信他们取得这样的地位既是"天然的"，又是命中注定会继续下去。而且正象所有其他文明国家一样，他们准备遭受突如其来的冲击。但那终究是将来的事，在帕麦斯顿[3]和麦考莱[4]掌权时代，英国最为明显的是实力，而不是弱点。

三、中 等 强 国

在1815年以后约半个世纪中，经济和技术变化对欧洲大陆大国相对地位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严重，其主要原因是工业化是从一个比英国差得多的基础上开始的。越向东去，当地经济的封建色彩越重，农业比重越大；西欧1790年以前，在贸易和技术发展的很多方面都与英国相近，尽管为此，20年的战争给它留下了严重创伤；人口减少、关税壁垒变化、税收加重、大西洋地区"田园化"、失去海外市场和原料、难以得到英国的最新发明，这一切都是妨碍经济全面发展的障碍，即使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由于某些特殊原因），一些已很兴旺的行业和地区也遇到这

---

①珍妮（Jenny）：珍妮纺纱机系织工哈格里夫斯于1765年发明，珍妮为其女儿之名。——译者注。

②丘纳德（Cunand，1787～1865）：英国工程师。——译者注。

③帕麦斯顿（Palmenston，1784～1865）：1855～1865年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④麦考莱（Macaulay，1800～1859）：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历史学家，1846～1847年任军需总监。——译者注。

种困难。如果说，实现和平意味着恢复正常贸易，并让欧洲大陆的企业家看到自己如何大大落后于英国，但不会引起突然出现的现代化。因为当时没有足够的资金实现变革，地方既不要求、官方也不热情去实现变革；而且欧洲很多商人、手艺人和手摇纺织机织工拼命反对采用英国的技术，十分正确地看到新技术是对他们原有生活方式的威胁。结果，尽管蒸汽机、动力织布机和铁路在欧洲大陆取得某些进展。

在 1815 年至 1848 年期间，经济的传统特点依然突出：农业生产比工业生产占优势，缺乏廉价和快速的运输工具，消费品生产优先于重工业生产。

正如表 7 所示，在 1750 年以后的一个世纪，人均工业化水平的相对增长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

在“欧洲复辟王权”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外交形势互相结合，也使当时的国际状况冻结起来，或者说：对当时的秩序只能有小的调整。正因为法国大革命对欧洲的内部社会安排和传统的国家体制提出了令人吃惊的挑战，梅特涅和保守分子们都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一切新事物的发展。人们对于冒全面战争的冒险主义外交，如同对争取国家自决和修改宪法的运动一样，感到不满。总的说来，政治领导人认为，仅就国内事务而言，他们手头的事已经够多的了，要对付国内动乱和地方利益集团的干扰，他们中间很多人对于刚出现的新机器、城市化的发展和向前工业社会的同业公会、手工业行会和保护性条例的初次挑战，都开始感到威胁。对此，一位历史学家是这样描述的：“这是一场引起 1830 年起义总爆发的地方性内战以及大批的叛乱”，这一情况意味着政治家一般既无精力，也无愿望参与会严重削弱本国政权的国外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采取的很多军事行动是毫无意义的，

其动机正是为了维护那时的社会政治秩序，以免遭到革命的威胁，例如，1823 年奥地利军队扑火在皮埃蒙特进行的抵抗，同年，法军入侵西班牙以恢复费迪南国王原有的权力，而最令人瞩目的事件是，利用俄国的部队来镇压 1848 年的匈牙利革命。如果这些反动措施在英国舆论中日益不得人心，那么，英国这个岛国性质则意味着，它不会为了使自由派力量不受镇压而进行干预。就欧洲内部的领土变化而言，这些变化只有在取得大国的“协同体”的同意之后才能出现，其中有些国家也许设法要求以某种方式得到补偿。因而 1815～1865 年这段时间，与在此之前的拿破仑时代和在此之后的俾斯麦时代都不同，这段时间的多数难处理的政治问题（比利时问题、希腊问题）都采用国际化的方法解决，反对单方面采取行动。所有这种做法使当时的国际格局保持基本的也许是靠不住的稳定。

在 1815 年以后的几十年里，普鲁士对待国际问题的立场显然受到这些总的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尽管获得莱茵兰，领土扩大了很多，霍亨索伦侯国[1] 看来远没有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那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最后只是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普鲁士的经济发展才实际上超过欧洲其它地区。而在 19 世纪的前 50 年，普鲁士在工业上似乎是一个侏儒，普鲁士的生铁年产量为 5 万吨，不仅不如英国、法国和俄国，而且不如哈布斯堡帝国。再者，获得莱茵兰，不仅造成普鲁士地理上的分裂，而且加剧了较“自由”的西部诸省和较“封建”的东部诸省的政治分裂。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内局势紧张是政治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虽然反动势力往往占上风，他们对 1810～1819 年的改良主义倾向仍感吃惊，也被 1848～1849 年的革命吓得惊惶

[1] 霍亨索伦侯国（HohenzoHern state）：由德意志的霍亨索伦家族建立的王朝，先后统治过勃兰登堡侯国、普鲁士公国和德意志帝国。——译者注。

失措。甚至在军方再次强行建立十分粗俗的政权时，普鲁士的上层人士由于担心国内出现动荡局面，因而不想在外交政策方面采取冒然行动；而保守分子则认为，他们需要在邻近的欧洲其他地区，尤其是俄国，乃至奥地利尽量物色能使局势保持稳定的力量。

关于“德意志问题”的争论使普鲁士的内政问题争论变得更加复杂，所谓“德意志问题”是指德意志的 39 个侯国能否最终统一，以及采用什么手段能达到这个目标。因为人们预料到，这个问题不仅使普鲁士的自由派民族主义者与多数的保守主义者分裂，而且可以使德意志的中部和南部的侯国进行棘手的谈判，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与哈布斯堡王朝再度对立（1814 年因在萨克森问题上进行激烈争论而终于形成对立）。尽管普鲁士是日益重要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无可争辩的盟主，该同盟是 18 世纪 30 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奥地利由于受到本国实业家中保护主义者的压力而无法参加，因此，在这几十年间，政治力量对比一般对维也纳有利。首先，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 年）和腓特烈·威廉四世（1840～1861 年）都担心与哈布斯堡帝国发生冲突，其后果会比梅特涅及其继承者施瓦岑堡① 与其北方邻国的冲突后果更为严重。此外，奥地利在兰克福主持德意志邦联的会议②；奥地利得到很多较小的德意志侯国的同情，更不用说普鲁士的原有的保守分子了；而且看来奥地利是欧洲的一个公认强国，而普鲁士只不过是德意志的一个邦国。维也纳有着更加重大的影响，这一最引人注目的迹象出现在 1850 年在厄尔穆斯达成的协议上，使普鲁士一时再也无法运用欺诈手段以谋求在德意志

①施瓦岑堡（Schwarzenberg，1800～1850）：奥地利首相。——译者注。

②德意志邦联系德意志的邦国联盟，根据1815年6月8日维也纳会议通过的邦联法案，该邦联包括 34 个封建君主国和 4 个自由市。——译者注。

问题上获得优势地位，当时普鲁士同意遣散其军队，并同意放弃其统一的计划。在腓特烈·威廉四世看来，在1848年革命以后不久宁可在外交上蒙受耻辱，也不愿意打一场有风险的战争。即使象俾斯麦这样对于向奥地利提出的要求作出让步感到伤心的普鲁士民族主义者也认为，在最终解决“争夺德意志统治权的斗争”之前，在任何其它方面都几乎不太可能有什么作为。

腓特烈·威廉之所以在厄尔穆斯投降，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他知道俄国沙皇在“德意志问题”上支持奥地利。从1812年至1871年的整个时期，实际上，柏林一直忍痛避免将军队的矛头指向东方。由于思想方面和王朝方面的原因则肯定有助于说明奥地利作出这种让步是对的，但这些原因完全掩饰不了普鲁士的自卑感，俄国得到1814年维也纳会议规定的波兰大部分领土就很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圣彼得堡反对促使普鲁士走向自由化的任何措施、众所周知，沙皇尼古拉一世认为德意志的统一纯属空想（尤其是，既然德意志统一是在1848年由法兰克福一次激进的议会上将国王的王冠交给普鲁士国王而实现的!），以及俄国在达成厄尔穆斯协议之间支持奥地利，所有这一切表明外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1854年爆发克里米亚战争[1]时，普鲁士政府渴望保持中立，担心参加与俄国的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甚至更担心得不到奥地利和西方列强的尊重。因此，普鲁士采取这样的立场是合乎逻辑的，但是，由于英国人和奥地利人厌恶柏林采取“摇摆”政策，直到巴黎会议（1856年）正式举行时才以某种方式让普鲁士外交官与其他代表一起开会。因此，只是象征性地将普鲁士作为勉强合格的与会国。在其他方面——尽管持续时间不太长——普鲁士发现自身受到别的强国的限制。帕麦

①克里米亚战争：也称东方战争。1853～1856年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联军之间以克里米亚为主战场的战争。——译者注。

斯顿遣责普鲁士军队于 1848 年侵犯石勒苏益格—霍尔斯泰茵，这不算最令人不安的。而最令人难堪的是法国先后于 1830 年、1840 年、和 19 世纪 60 年代一再表现出对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的潜在威胁。所有这些关系紧张时期仅仅证实了普鲁士与维也纳的争吵，加上有时圣彼得堡咆哮如雷已说明的一点，这就是在 19 世纪的前 50 年，普鲁士根本不是大国，其地理条件差，实力不如强大的邻国，被国内问题和德意志的内部问题分散了注意力，而且在国际事务中确实发挥不了更大的作用。也许，从普鲁士各方面的实力看，这也许是一种令人难堪的说法：普鲁士拥有的从教区学校到大学的教育体系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普鲁士的行政管理体系是相当有效的；而且普鲁士的军队及其不可轻视的总参谋部早就进行战术和战略两个方面改革的研究，尤其是"铁路加步枪"的军事意义的研究。问题在于，只有在克服了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前的内部政治危机之后，在最高层以强有力的领导取代腓特烈·威廉四世的优柔寡断的领导以后，以及在普鲁士已建立工业基础之后，才能利用上述潜力。因此，只是在 1860 年之后，霍亨索伦侯国才能从其接近二类国家的水平中脱颖而出。

正如世间很多事物一样，战略上的弱点是相对而言的；普鲁士与南部的哈布斯堡帝国相比，其存在的问题也许并不那么令人气馁。如果说，在 1648～1815 年这段时间，普鲁士帝国处于"上升"阶段，而且可以"表明自身的立场"，那么这种扩张并不能消除维也纳努力发挥大国作用所遇到的困难。至少从长远来看，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的解决办法使这些困难更复杂化了。例如，事实上奥地利人必须经常与拿破仑作战，并取得胜利，而这意味着，在 1814～1815 年谈判期间的全面调整边界中，他们需要得到"补偿"；尽管哈布斯堡王朝明智地同意从荷兰南部、德意志的西南部（山前地带）和波兰的部分地区撤出，这方面由于哈

布斯堡王朝大举向意大利扩张，以及坚持在新建立的德意志邦联中起领导作用而得到补偿。

假定英国的评论家和梅特涅本人乐于接受欧洲均势的一般理论，尤其是一些有关方案，那么，振兴奥地利国家是值得称赞的。那么越过欧洲从意大利北部的平原向加里西亚扩展的哈布斯堡帝国则起到保护均势的中心支点的作用：制止法国对西欧和意大利的野心，保持德意志的现状，反对“大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和普鲁士的扩张主义者，对俄国人向巴尔干半岛渗透设置障碍。上述各项任务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一个或几个别的大国的支持；而哈布斯堡王朝在五方对阵决定胜负的这盘复杂的棋局中起重要作用，但愿原因似乎是哈布斯堡王朝对凝固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解决办法的一切很感兴趣—尽管法国、普鲁士和俄国迟早需要某些变化，而英国于 19 世纪 20 年代以后在战略上和思想上越来越找不到应该支持梅特涅的理由，因而对奥地利维持现有秩序的各方面所作的努力不太愿意给予帮助。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在 1815 年以后的几十年里，欧洲之所以普遍出现全面和平，其主要原因是哈布斯堡帝国当时所处的地位及其所起的作用。因此，当哈布斯堡帝国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为了保持意大利和德国的现状而其它强国不给予军事支持时，哈布斯堡帝国被迫退出这两个战区；1900 年以后，当哈布斯堡帝国自身的生存出现问题时，不可避免地爆发一场王位继承的重大战争——这场战争对欧洲均势来说有重大意义。

只要态度保守的欧洲强国在法国东山再起或一般意义上的“革命”面前团结一致地维持现状，那么哈布斯堡帝国的弱点就会被掩盖起来。梅特涅通过要求神圣同盟在思想上的团结一致，通常可以确信俄国和普鲁士会给予支持，而这又可使他腾出手来为防范自由主义者的任何干扰作出安排，包括派奥地利部队扑灭那不勒斯的 1821 年起义，让法军在西班牙采取军事行动以支持波

旁政权，或者硬性规定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国必须执行反动的《卡尔斯巴德法令》[1] 同样，哈布斯堡帝国与圣彼得堡和柏林保持关系，则从其镇压波兰民族主义的共同利益中受益，而这对俄国政府来说，与有时在希腊或英吉利海峡等问题上意见分歧相比，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共同镇压加里西亚波兰人起义，而奥地利经俄国和普鲁士同意于 1846 年合并克拉科夫自由市，都表明从君主政府的团结一致中能得到好处。

而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梅特涅的战略有严重缺陷。在 19 世纪的欧洲，还比较容易制止一场激进的社会革命；每当一场革命发生（1830 年、1847 年、1871 年的巴黎公社），胆颤心惊的中产阶级转向“法律和秩序”一边。而在法国大革命和 19 世纪初的各种解放战争的激励下普遍存在的利于民族自决的思想和运动是永远扼杀不了的；梅特涅企图扑灭独立运动使哈布斯堡帝国精疲力尽。由于奥地利坚决镇压一切民族独立运动，因而很快再也得不到老盟友英国的同情。奥地利在意大利一再动用军事力量促使各阶级都反对哈布斯堡“狱卒”，而几十年后，这种做法又中了拿破仑三世的计谋，当时野心勃勃的法国君主能帮助加富尔[2] 将奥地利人撵出意大利北部。同样，哈布斯堡帝国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愿意参加关税同盟，以及由于立宪和地理方面的原因而不可能成为“大德意志”的一部分，这使德意志的很多民族主义者失望，他们开始指望普鲁士进行领导。即使是对维也纳镇压革命的努力一般都给予支持的沙皇政权有时也发现，处理民族问题比处理奥地利问题更容易：例如亚历山大一世不理睬梅特涅反复提出

---

[1] carlsbad Decrees，1819年，德意志邦联政府迫害资产阶级进步人士和镇压民主运动的法令。——译者注。

[2] 加富尔（1810～1861年）：撒丁王国首相（1852～1859年，1860～1861年）、意大利王国首相（1861 年）、意大利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反君主立宪派领袖。——译者注。

的反对意见，在19世纪20年代末与英国合作支持希腊独立的政策，就是一个明证。

事实上，在民族日益觉醒的时代，哈布斯堡越来越是一个时代错误。在其他各个大国中，人们指出：

> 多数公民有共同的语言和宗教。法国人至少有90%说法语，而且名义上也有90%属于天主教会。普鲁士人有80%以上的人是有德意志血统的人（其余的人多数为波兰人），而在德国人中，有70%的新教徒。沙皇统治的7000万臣民中，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少数民族（500万波兰人，350万芬兰人、爱沙尼亚人、列特人和拉脱维亚人，以及300万形形色色的高加索人），此外还有5000万的俄罗斯人，信奉正教①。不列颠群岛的居民有90%说英语，70%是新教徒。象这样的国家几乎没有必要花大力气去统一；他们有本身的内聚力。而奥皇统治的是一个种族混杂的帝国，每当他想起这种情况时，总是感叹不已。他和他的800万臣民是有德意志血统的人，比这种或那种斯拉夫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鲁提尼人②、克罗特人③和塞尔维亚人多1倍，有500万匈牙利人，500万意大利人和200万罗马尼亚人。这样会构成怎样的一个国家呢？

答案是根本不存在的。

"被看作这个帝国的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机构"的哈布斯堡军队反映了种族上的这种多样性。在

---

①正教：基督教的一派，与天主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派。——译者注。

②居住在波兰加利曾东部、匈牙利东北部和现在的苏联、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一部分地区的乌克兰人的名称。——译者注。

③又称克罗地亚人，南斯拉夫一民族。——译者注。

1865年（这里哈布斯堡帝国与普鲁士争夺德意志控制权的决定性冲突前的一年），哈布斯堡军队在其花名册上有128286名德国人、96300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52700名意大利人、22700名斯洛文尼亚人[①]20700名罗马尼亚人、19000名塞尔维亚人、50100名鲁提尼人，37700名波兰人、32500名马扎尔人[②]27600名克罗特人和5100名其他民族"。尽管这样一来，这支军队象印度王公率领的英属印度军队那样五花八门，而且与整齐划一得多的法国军队或普鲁士军队相比，存在种种弊端。

这种军事上的潜在弱点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而变得更加严重，造成资金缺乏的部分原因是这个帝国难以征收到税金，而主要原因是其贸易基础和工业基础都很薄弱。尽管有些历史学家谈到在1760年至1914年这段时间，"哈布斯堡帝国的经济在上升"，事实上，在19世纪的前50年，工业化只是在波希米亚、阿尔卑斯山区和维也纳周围地区出现，而在这个帝国的更多地区仍与工业化相对无缘。尽管奥地利本身在向前发展，从人均工业化水平，钢铁产量、蒸汽动力等方面看，整个帝国落后于英国、法国和普鲁士。

再者，法国的数次战争的费用"使这个帝国资金耗尽，公债负担沉重，大量纸币贬值"，因而实际上迫使政府将军事开支降到最低限度。1830年，军队分配到的资金只占总收入的23%（1817年占50%），而到1848年，这个比例降到20%。在1848～1849年、1854～1855年，1859～1860年和1864年出现危机时，同意额外增加军事开支；但这些费用绝对不足以使军队达到满员水平，而当人们认为危机已经结束时，军事开支很快就降了下来。例如，1860年的军事预算为1.79亿佛罗林，到1863年降

①斯洛文尼亚人：在南斯拉夫西北部生活的民族。——译者注。

②马扎尔人是匈牙利的主要民族。——译者注。

为 1.18 亿佛罗林，在 1864 年与丹麦的冲突中上升到 1.55 亿佛罗林，到了 1865 年，即到了与普鲁士进行战争之前一年，军事开支再次大幅度降到 9600 万佛罗林。上述各笔军事预算与法国、英国或（稍晚一些的）普鲁士的军事预算根本无法相比；而且即使用 19 世纪中期的标准来衡量，奥地利的军事行政被认为是腐败的，而且效能很差，因此当时分配给军队的费用不会得到有效使用。总之，哈布斯堡帝国的军事实力与要求其参与的战争根本不相称。

所有这一切并不预示着哈布斯堡帝国即将灭亡。正如很多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这个帝国的持久力相当惊人；该帝国经受住了宗教改革运动、土耳其人、法国大革命的考验，而且还证明能经受住 1848～1849 年事件、1866 年的溃败，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的严峻考验。尽管哈布斯堡的弱点显而易见，但它也自有优势。这个君主政体不仅得到德意志种族的臣民的效忠，而且还得到非德意志国家的很多贵族和“士兵”家属的效忠；例如，哈布斯堡帝国在波兰的统治与俄国和普鲁士的管理相比是相当宽厚的。再者，这个帝国具有复杂的，多民族的特点，而且在各地有很多对手，因此中央政府进行分而治之，正如该帝国谨慎地使用军队所表明的那样：匈牙利的军队主要驻扎在意大利和奥地利，而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军队驻扎在匈牙利，轻骑兵有半数驻扎在国外，等等。

最后这样产生的消极后果是，其他大国（即使与哈布斯堡帝国交战的大国也不例外）都无所适从。沙皇尼古拉一世也许厌恶奥地利对巴尔干半岛提出要求，但他仍然很乐于派兵帮助镇压 1848 年的匈牙利革命；法国也许为了将哈布斯堡军队撵出意大利而施展阴谋诡计，但是拿破仑三世同样知道，将来维也纳很可能是与普鲁士或俄国抗衡的对法国有利的盟国；而且，俾斯麦尽管决心消除奥地利人在德国的所有影响，但当哈布斯堡帝国在

1866年投降时，仍渴望保留这个帝国。只要上述情况继续存在，哈布斯堡就会继续存在——当然经过默许。

法国尽管在拿破仑战争中遭受损失，但在1815年以后50年的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比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优越。法国的国民收入高得多，而且使用资金更为方便；法国的人口远远超过普鲁士，而且比哈布斯堡帝国的人口分布更加均匀；法国可以更加轻而易举地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而且还能负担一支数量可观的海军。尽管这样，这里将法国列入"中等强国"，其原因完全是因为从战略、外交和经济等方面的综合能力看，法国在某个特定领域尚不能集中资源，并取得决定性的领先地位。

关于在1814～1815年期间，在强权政治方面的基本事实是，所有其他大国都表示要决心制止法国在欧洲继续称霸的企图；为了挫败拿破仑的最后尝试，伦敦、维也纳、柏林和圣彼得堡不仅愿意就其他问题（例如，萨克森问题）的争吵进行调解，还想建立战后体系以阻止法国今后沿着传统路线进行扩张。因此，尽管普鲁士身为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的保护人，奥地利仍然加强了在意大利北部的地位，而英国的影响扩展到伊比利亚半岛地区；而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有庞大的俄国军队作为后盾，当时俄国的庞大军队准备越过欧洲，以维护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解决办法。因此，法国的多数人士都极力主张采取一项"恢复"政策，很显然，当时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进展。一方面，当时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是承认法国是欧洲协同体的一个平等的伙伴，另一方面，使法国在邻国的影响恢复到可与当时强国在那儿的影响相比。而即使到法国在伊比利亚半岛能与英国处于均势，而且在列凡特重新发挥重要作用时，他们总是唯恐会形成另一个反法同盟。到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情况变得很清楚，只要法国对低地国家采取任何入侵行动，就会出现英国和普鲁士的反法同盟，法国远不是它的对手。

巴黎可打的另一张牌是与大国之一建立密切的联系，因而可利用它来达到法国的目标。在其它国家之间存在潜在对抗，而且亲法同盟能获得（经费、部队、武器）可观利益的情况下，似乎是有理的假设；但它在三个方面存在缺陷。一是也许会出现其它强国对法国利用得多，而法国对其它强国利用得少的局面，这一局面与19世纪30年代中期时，梅特涅遇到的情况类似，当时仅仅是为了将伦敦和巴黎分开，他接受了法国的建议。二是在一个意识形态起如此重大的作用的时期，法国政体在这几十年间出现的更迭必然对外交关系有影响。例如，长期以来都希望与俄国形成同盟，但这一希望由于法国1830年爆发大革命而破灭。最后一点是，当然仍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尽管某些时候，若干其他强国想与法国合作，但这个时期，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想改变当时的状况；那就是它们仅仅与法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而不承诺让法国在领土上得到好处。只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在法国以外的其它国家才普遍要求调整1815年维也纳会议规定的边界。

如果法国在欧洲其他国家面前象它在路易十四统治鼎盛时期那样强大，或者象在拿破仑鼎盛时期那样强大，那么看来这些障碍并不难以克服。但是事实上，在1815年以后，法国并不是一个特别强大的国家。在1793年至1815年的战争期间，也许有150万法国人丧生，而更重要的是，在整个19世纪期间法国人口增长不如其他任何大国。上面已经谈到，长期的冲突不仅从各个方面使法国的经济失调（见上一章，）而且实现和平使法国面临英国这个强大对手从商业方面提出的挑战。在1815年以后，对法国的多数生产者来说，基本事实是存在占压倒优势的强劲的工业生产国，它不仅是最靠近法国的邻国，而且在所有的国外市场，有时甚至在他们本国的受到很好保护的国内市场中都是一支强劲的力量。“法国这样缺乏竞争能力，而且在法国存在不利于现

代化的抑制性因素，(例如，农业可耕地较少、交通落后、基本上都是地区性市场、得不到廉价的、随时可用的煤)，海外市场未提供各种促进因素，这一切意味着，在 1815 年至 1850 年期间，法国的工业增长率远远低于英国。19 世纪初，英国的工业产值与法国的相当；到了 1830 年英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 182.5%；而到了 1860 年，这个比例上升到 251%。再者，即使当 19 世纪的后 50 年法国的铁路建设和全面工业化的速度开始加快时，法国惊讶地发现德国的发展速度甚至更快。

现在，历史学家认为，很显然再也不能将法国 19 世纪的经济轻描淡写成“落后”或“令人失望”而不加考虑了；法国人实现国家繁荣的道路与英国所走的别的道路在很多方面差别相当大，这是合乎逻辑的。社会上对产业革命的恐惧心理在法国并不普遍；将主要精力放在高质量产品，而不是放在大量生产的产品上，因而各项制造业的人均增值大大提高。如果从整体上看，法国人在国内没有投资大型工业企业，那往往是一个计划问题，而不是法国贫穷和发展迟缓的迹象。实际上，法国的资金大量过剩，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欧洲其他地区的投资。法国政府不可能因为资金短缺而不知所措，而且还在改进与武装部队建设有关的弹药和冶金方法等方面投资。法国的发明家在佩汉斯将军的领导下发明了平射炮、“拿破仑”号和“光荣”号等“划时代的舰艇设计”以及米尼[1] 式子弹和来线步枪。

尽管这样，事实仍然是，从经济和其他方面看，法国的**相对**能力下降。再说一遍，虽然法国的领土超过普鲁士或哈布斯堡帝国，但情况已与一个世纪之前不同，再也找不到一个领域，法国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法国的军队很庞大，但其数量不如俄国。法国的舰队断断续续地得到法国历届政府的支持，而其规模通常

---

[1] 米尼 (Minie，1814～1879)：法国发明家。——译者注。

不如英国皇家海军，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很大。从工业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看，法国落后于勇于开拓的邻国。法国的“光荣”号战舰下水不久即被英国皇家海军的“勇士”号军舰超过，这种情况正象法国的野战炮落后于普鲁士的克虏伯公司设计的野战炮那样。法国在欧洲以外地区确实发挥作用，但是法国的领地和影响也远没有英国那样广泛。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因而对法国的真正实力，不仅很难衡量，而且往往很难使用，法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混合型的强国；往往对其应当选择欧洲的利益还是欧洲以外地区的利益犹豫不决；这反过来又影响法国的外交，而法国当时的外交由于意识形态和均势等方面的考虑已经很复杂。制止俄国向君士坦丁堡[1]进军是否比阻止英国对列凡特提出领土要求更重要呢？难道不应当将奥地利撵出意大利或对英吉利海峡的英国皇家海军提出挑战吗？对于早先为实现德意志统一而采取的措施应当鼓励呢，还是反对？在对上述各项政策既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的情况下，甚至将法国作为欧洲“协同体”的正式成员国对待的情况下，还往往发现法国存在矛盾心理和犹豫不决。这就不足为怪了。

另一方面，不应忘记，对法国起到制约作用的总的形势，也可以使法国起到牵制其他大国的作用。如果说，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时期，主要情况就是这样，那么最初甚至在 19 世纪 20 年代末时，情况就早已如此。很显然，由于法国的版图较大，因此法国的振兴对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半岛、低地国家和与法国相距较远的地区都有意义。英国和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一些事件施加影响时，需要将法国考虑进去。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法国在军事上对俄国起到的主要牵制作用，比摇摆不定的哈布斯堡帝国乃至

---

1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旧称。——译者注。

英国都大得多。是法国削弱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地位，而且主要是法国在起作用，尽管不那么令人瞩目，因而英国未能将沿非洲和中国海岸的所有地区完全纳入其势力范围。最后一点，当奥地利与普鲁士“争夺德意志统治权的斗争”进行到最激烈阶段时，这两个国家都对拿破仑三世的反应十分关切。总之，法国在1815年以后振兴，而法国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强国，即使在其领导人已认识到法国的优势再也无法与两个世纪以前相比的情况下，仍很积极地开展外交活动，在军事上相当强大，是一个只可与之友好相处而不可与之敌对的国家。

四、克里米亚战争和俄国力量的衰退

在1815年以后几十年中出现了国际和平和工业化时期，俄国的相对力量衰退最为严重，尽管只是到了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时这一点才完全明朗化。1814年，当俄国军队向西挺进时，欧洲怀着敬畏的态度，而当沙皇在哥萨克轻骑兵前导下进入巴黎时，市民们则小心翼翼地高呼“亚历山大皇帝万岁！”和平解决本身，加上十分保守的主张应防止未来在领土和政治方面再出现变化，由于俄国派出一支80万大军而有了保证；从海军力量看，英国皇家海军超过其他国家的舰队，同样，从陆军力量看，任何国家都不如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都不如俄国这个东方大国，这两个国家甚至在宣布君主制与俄国团结一致时也对俄国的实力感到担心。当以救世主自居的亚历山大一世的王位由专制的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继承时，俄国作为欧洲宪兵的作用甚至可能更加强了；而1848～1849年的一系列革命事件使尼古拉一世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正如帕麦斯顿指出的那样，在1848～1849年，俄国和英国是当时仅有的“屹然挺立着”的强国。哈布斯堡政府不顾一切地要求镇压匈牙利革命时能得到帮

助，俄国派出三支军队，使其要求得到满足。而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四世在对待国内的改革运动上犹豫不决，加上出现了要求改变德意志联邦的建议，因而俄国人乘机无情地施加压力，这种局面持续到柏林宫廷接受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对厄尔穆斯作出外交上的让步为止。至于1848年以后的“变革力量”本身，其所有组成部分，无论是溃败的波兰和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失意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都同意下述说法，即在欧洲阻碍进步的主要堡垒长期以来一直是沙皇帝国。

在1815年至1880年期间，至少与其他强国相比，俄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衰退。这并不是说，即使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在经济方面也丝毫没有改进：尼古拉一世的很多官员对市场力量或实现现代化的任何迹象抱敌对态度。俄国的人口增长很快（1816年为5100万人，1860年增长到7600万人，1880年又增加到1亿人），城镇增长速度是所有国家中最快的。铁产量增加，纺织工业的规模扩大了很多倍。据称，从1804年至1860年期间，工厂和工业企业从2400家增加到15,000余家。从西方进口蒸汽机和现代机械；从19世纪30年代起，开始出现铁路网。对于这几十年间俄国是否出现“产业革命”，历史学家一直有争论，这个基本事实证实了事物一直在发展。

事实是，当时欧洲的其他国家发展快得多，俄国却在衰退。由于俄国的人口远比其他国家多，因此在19世纪初叶，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很容易名列榜首。两代人[①]以后，如表9所示，情况就不再是这样。

而在研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时（见表10）这些数字甚至使人更加吃惊。

①两代人：约60年。——译者注。

表 9 欧洲大国的国民生产总值(1830～1890 年)

(市场价格，按 1960 年美元和价格计算；单位：亿美元)

国别	1830 年	1840 年	1850 年	1860 年	1870 年	1880 年	1890 年
俄国	105	112	127	144	229	232	211
法国	85	103	118	133	168	173	197
英国	82	104	125	160	196	235	294
德国	72	83	103	127	166	199	264
哈布斯堡帝国	72	83	91	99	113	122	153
意大利	55	59	66	74	82	87	94

表 10 欧洲大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830～1890 年)

(按 1960 年美元和价格计算)

国别	1830 年	1840 年	1850 年	1860 年	1870 年	1880 年	1890 年
英国	346	394	458	558	628	680	785
意大利	265	270	277	301	312	311	311
法国	264	302	333	365	437	464	515
德国	245	267	308	354	426	443	537
哈布斯堡帝国	250	266	283	288	305	315	361
俄国	170	170	175	178	250	224	182

这些数字表明，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这几年的增长势不可挡，这主要由于人口出生或征服土耳其斯坦[①]和其他地区，而与生产率（尤其是工业生产率）的实际增长几乎无关。俄国的人均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一直落后于西欧；而差距进一步扩大，例

①亚洲中部从里海到戈壁沙漠的广大地区。——译者注。

如，1830年，俄国的人均收入为英国的一半，60年后，约为英国的1／4。

同样，俄国的铁产量在19世纪初增长一倍，而英国则增长了29倍，根本无法相比；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俄国从欧洲最大的生铁生产国和出口国变为日益依赖于进口西方产品的国家。甚至需要正确地看待俄国在铁路和轮船等交通工具方面取得的进展。到1850年，俄国的铁路仅仅比500英里略多一点，而美国的铁路有8500英里；航运贸易在较大河流或者波罗的海和里海以外地区增长，主要是其中大部分运送为国内迅速增长的人口所需的谷物，和向英国运送小麦以支付进口产品的费用。新产品往往由外国商人和企业家掌握（出口贸易肯定是这种情况），因而使俄国进一步成为发展先进经济所需的原料供应国。进一步研究有关资料，看来多数新“工厂”和“工业企业”雇佣的员工不到16人，而且几乎都没有实现机械化。普遍缺乏资金，对消费品的需求低，中产阶段很弱小，运输距离遥远，气候极其恶劣，这个独裁、多疑的国家对内十分苛刻，所有这一切使俄国比欧洲其他国家更难出现工业“腾飞”的前景。

长期以来俄国在经济上的这些不祥的趋势没有转化为显著的军事弱点。相反，1815年以后大国一般地选择旧体制，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这些国家的军队的社会成份、武器和战术等方面。处在法国大革命后的阴影中，各国政府更关心的是他们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而不是军事改革；将领们本身不再遇到总体战的考验，他们的注意力放在等级制度、服从命令和谨慎从事上面——这些特点由于尼古拉一世迷恋于正式阅兵、盛大游行而变得更加突出。由于这些情况，看来给国外观察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俄国军队的庞大规模及其大量新兵的坚定勇敢，而不是军事后勤或军官团的一般教育水准。再者，俄国军队当时积极参与多次向外扩张的战役，扩张范围达到高加索，并越过土耳其斯坦，往往

取得成功，这种势头已开始使正在印度的英国人担心，并且使英俄之间的关系在 19 世纪比 18 世纪紧张得多。俄国镇压 1848～1849 年的匈牙利起义，加上沙皇声称随时可派出 40 万军队扑灭在巴黎的起义，也同样给国外人士留下深刻印象。未能引起国外观察家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大部分俄国军队必须执行国内守卫任务，在波兰与芬兰执行“治安”任务和承担边界巡逻与军事殖民地等其他活动；其余人员的效能不很高，例如，匈牙利战役死伤 1.1 万人，其中除 1000 人以外均系病故，原因是军队的后勤和医疗工作的效率差。

1854 年至 1855 年的克里米亚战役证实了俄国确实落后，令人十分震惊。沙皇的军队集中不起来。盟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作战（这些作战并不十分激烈），加上瑞典军队可能进行干预，便拖住了在北部的 20 万俄国军队。早先在多瑙河一带侯国的战役，以及更大的危险如奥地利果真进行干预，则将危及比萨拉比亚、西乌克兰和俄国占领的波兰。俄国在高加索与土耳其的战争，与保卫俄国的远东领土一样，对部队和供应系统提出了大量要求。当英法联军对克里米亚的攻击使俄国领土的敏感的地区爆发战争时，沙皇的军队对英法联军的入侵束手无策。

在海上，俄国拥有一支规模相当大的海军，将领们很得力，因此在 1853 年 11 月时，俄国海军是能彻底击溃锡诺普力量较弱的土耳其舰队的；而当英法舰队参战时，形势出现了逆转。俄国的很多船只是用毛皮制造的，而且适航性差，舰船的火力不足，水兵未经充分训练。英法联军拥有大量蒸汽驱动的战舰，其中有些配备榴霰弹和康格里夫火箭。尤其是，俄国的敌人拥有建造较新式舰艇（其中包括几十艘用蒸汽驱动的炮艇）的工业制造能力，因此，当战争持续较长时间时，他们的优势变得更加明显。

而俄国陆军的情况甚至更糟。正规步兵部队的作战很出色，在海军上将纳希莫夫（1802～1855 年）的英明领导下和托特莱

本上校的工程天才，俄国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长期保卫战是个令人瞩目的功绩。至于其他一切方面，军队都严重匮乏。骑兵部队经受不住风险，而且骑兵部队参加阅兵的马匹经不住激战考验（非正规的哥萨克骑兵在这方面的能力较好些）。更糟糕的是，俄国士兵的装备极差。俄军的老式的燧发枪机滑膛枪的射程为 200 码，而英法联军的步枪的有效射程实际上达到 1000 码；因此俄国人的死伤惨重。

最糟的是，即使认识到任务这样繁重，俄国的整个体制无法采取相应政策。军队领导很不得力，人员之间严重对立，甚至连大型战略都制订不出来，这里完全反映出沙皇政府普遍无能。训练有素，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层军官少得可怜，而普鲁士军队这方面的军官多得很。官兵的进取精神被全部扼杀。令人震惊的是，即使在国家出现紧急状况，能应征入伍的预备役军人也很少，因为大规模采用短期服役制度，就会导致废除农奴制度。实行这种制度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服役期长的俄国军队有很多超龄军人；另一个更致命的后果是，在战争初期匆忙入伍的大约 40 万名新兵根本没有受过训练，因为负责新兵训练的军官不足，而且大量人力离开农奴市场使俄国的经济受到损害。

最后，在后勤和经济方面存在缺陷。因为在莫斯科以南地区没有铁路，用马拉的货车必须穿越数百英里的大草原，大草原在春季冰雪融解和秋天雨季时是一片泥潭。再者，马匹本身需要食用大量饲料（这些饲料需要用其他驮马运载等等），因而后勤的工作量很大，而成效甚微，两者不成比例：英法联军的部队和援兵从法国和英国经海路在三周内可到达克里米亚，而俄国的部队有时要用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前线。更令人吃惊的是俄军的装备库存告罄，“战争开始时，储备的枪支有 100 万支；到 1855 年底时，储备的枪支只留下 9 万支。在 1656 门野战炮中，只有 253 门可以使用。……火药和子弹的储备甚至更加糟糕”。战争

的时间持续越长，英法联军就拥有越大的优势，而英国人实行封锁使新武器无法进口。

而封锁的作用不仅如此，封锁使俄国的谷物和其他产品的出口中断（不包括经陆路向普鲁士的出口），因而俄国政府除了大量借债以外无法偿付战争费用。军费开支甚至在和平时期也占国家收入的 4／5，在 1853 年时约为 2.2 亿卢布，而在 1854 年和 1855 年的两次战争中约上升到 5 亿卢布。为了使惊人的赤字得到弥补，俄国财政部在柏林和阿姆斯特丹借债，但卢布的国际价值下跌；为了弥补其他赤字，俄国恢复印刷纸币，从而导致价格大幅度上涨和农村日益动荡。财政部早先关于以银本位卢布和禁止使用所有期票的大胆尝试——这始终是拿破仑战争期间以及在波斯，土耳其和波兰与起义者的战争期间“健全财政”破产的原因——由于克里米亚战争而完全落空。如果俄国坚持打徒劳无益的战争，王位委员会在 1856 年 1 月 15 日得到的警告是国家将陷于破产，与大国进行谈判是避免灾难的唯一途径。

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英法联军认为克里米亚战争容易取胜；这场战争也使他们受到严峻的考验和难堪的冲击。有意思的是，法国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少，在这次战争中，法国因其兼有以下两类不同性质的国家的特点而受益——法国在工业上和经济上不象俄国那样落后，而且“非军事化”不如英国那样彻底。在圣阿尔诺将军率领下向东派出的军队，曾参加过北非的作战，而且有相当丰富的海外作战经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他们的后勤和医疗系统与 19 世纪中期的行政管理工作一样卓有成效；而法国军官们有理由对英国同事们带着超重行李又经验不足的表现感到困惑不解。法国的远征队，其规模大得多，而且在战争中取得大部分的重大突破。法国在这次战争中，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恢复了拿破仑的昔日威风。

而到战争后期的某些阶段，法国开始出现疲于奔命的现象。

尽管法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法国政府必须与铁路建设部门以及设法从动产信贷银行和其它银行家那里争夺现金。当时，黄金都消耗在克里米亚战争和君士坦丁堡战争上，结果国内价格上涨；谷物歉收更无助于摆脱困境。尽管人们不了解战争死伤总数（10万人），但法国早期对战争的热忱很快消失。物价飞涨造成的民众骚动进一步证实了塞瓦斯托波尔失陷后广泛流传的观点，即战争的延长仅仅是为了达到英国自私的和野心勃勃的目的。拿破仑三世也急切地想结束这场战争：俄国已遭到惩罚，法国的威信已经提高（而且在巴黎的一次重大的国际和平会议之后会进一步提高），很重要的一点是再也不能利用黑海地区问题使战争升级，而根本不过问德国问题和意大利问题。即使拿破仑在1856年无法明显地重新描绘欧洲的地图，但他可以肯定地认为，法国的前景比滑铁卢之战以后的任何时候都光明。在以后的10年里，原有的欧洲协同体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存在的分歧会使这种错觉继续存在。

而英国对克里米亚战争很不满意。尽管作出某些改革，陆军仍沿用威灵顿的模式，而英国统帅拉格伦（1788～1855年）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中实际上担任威灵顿的军事秘书。而从骑兵的一般情况看，骑兵规模是适宜的，但往往使用不当（不仅仅在巴拉克拉瓦使用不当），而且几乎无法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城设施中进行部署。尽管部队是作战英勇顽强的老兵，但是在克里米亚遇到雨季和冬季时，温暖的掩蔽所的数量少得惊人，陆军的医疗条件很简陋，对痢疾和霍乱的广泛流行束手无策，而且陆上运输不足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挫折，英国举国上下都为之愤慨不已。更令人难堪的是，当时根本就没有经过训练的后备部队投入战斗，因为英国军队和俄国军队一样，是一支主要用于执行守卫任务的常备部队；尽管俄国至少可以强制征招数十万新兵，采取放任态度的英国人也无法征集到新兵，结果政府的处境很难堪：

靠登广告征募新兵来弥补克里米亚部队兵员的不足。尽管英国军队一直是法国军队的小伙伴，但英国并未能真正有机会确保纳尔逊[1]式的胜利，它的敌人精明地将舰队撤到设防港口中。

这里顺便谈一下伦敦《泰晤士报》所披露的关于英国公众对英国部队在军事上无能和部队伤病员增加十分不满的报道；这篇报道不仅导致内阁的更迭，而且促使人们对“战时的自由国家”固有困难展开热烈的辩论，再者，整个事件表明，在要求国家整年对主要敌人进行广泛的军事作战的情况下，有些原来似乎是英国特有的优势（例如，行政管理从简，帝国的军队规模不大，主要依靠海军，强调个人自由和新闻自由，议会和各部都有一定的权利），会很容易变为劣势。

英国对这次考验的反应（与美国对20世纪的一些战争的反应十分类似）是给武装部队调拨大量的款项，以弥补过去的疏忽；而交战国的军费开支的粗略数字对说明战争的最终结局又非常有用（见表11）。

表11 参战列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军费开支

（单位：万英镑）

国别	1852年	1853年	1854年	1855年	1856年
俄国	156	199	313	398	379
法国	172	175	303	438	363
英国	101	91	763	365	323
土耳其	28	?	?	30	?
撒丁	14	14	14	22	25

[1] 纳尔逊（Nelson，1758～1805）：英国海军上将，于1805年在特拉法加取得战胜拿破仑一世的胜利。——译者注。

即使英国振作起来，也不能很快找到适当方法加强实力：军事开支也许要增加几倍，也许要订购数百艘用蒸汽驱动的船只，到1855年远征队的帐蓬、毛毯和弹药也许会过剩，好战的帕马斯顿也许坚持打垮俄罗斯帝国的必要性；如果法国采取实现和平的措施，而奥地利保持中立，那么英国的规模很小的陆军会几乎无所作为，而这恰恰就是塞瓦斯托波尔失陷以后的几个月里发生的事件。只有在全国及其政治经济“军事化”程度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英国才能有效地与俄国单独作战；而对一位由于克里米亚战役在战略上、宪法上和经济上造成的困难而感到不安的政治领导人来说，这场战争可能需要的费用实在过高。因此，尽管英国人感到受骗而以为取得了真正的胜利，英国还是愿意妥协。所有这一切使得很多欧洲（法国人、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怀疑英国的目的和可靠性，这一点正如所有这一切使英国公众对参与欧洲大陆事务更加厌恶一样。因此，当1856年拿破仑执政的法国走向舞台的中心时，英国不断地向舞台的边缘走去，而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1]和国内的改革运动只能使局面更加严重。

如果说克里米亚战争已经使英国人感到震惊的话，那么什么也比不上俄国的国力和自尊心遭受的打击，更不用说48万人死亡造成的损失了。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直接了当地说，“我们再也不能自欺欺人”，“……我们与一流强国相比又弱又穷，再者，不仅在物质资源，而且在精神资源，尤其在管理方面则更差。”这种认识促使俄国的改革者努力进行一系列的重要变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废除农奴制。此外，到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期，对铁路建设和工业化的鼓励远远超过其父王执政时期。煤炭生产、钢铁生产、大型公用事业和规模大得多的工业企业从19世纪60

[1] 印度民族大起义（1857～1859）：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起义。——译者注。

年代起，成绩更加显而易见，而且俄国经济史中提供的统计数字，给人以足够深刻的印象。

但是，看法的改变仍然影响人们的判断。这种现代化的步伐能赶上，或超过大量目不识丁贫穷农民每年的增长吗？这种现代化在以后的20年能赶上英国的中西部、鲁尔、西里西亚和匹茨堡的钢铁生产和制造厂的迅速增长吗？俄国，甚至通过其经过改组的军队能赶上普鲁士即将公布于世的“军事革命”吗？军事革命会再次将国家实力中的**质量**因素放在比**数量**因素更重要的地位吗？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会使俄国的民族主义者失望，他们洞若观火，俄国在欧洲的地位已远远不如1815年和1848年时那样突出。

五、美国和南北战争

前面已经谈到，从托克维尔[1]开始，研究世界政治的观察家认为，俄罗斯帝国和美国几乎是同时兴起。人们都承认，这两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宪法存在根本区别，而从世界强国的角度看，这两个国家在其地理规模、“不设防的”和不断变动的边界、迅速增长的人口及他们的几乎没有开发的资源等方面有很多共同点。其中大部分情况是真实的，但是，在整个19世纪，美国和俄国在经济上有很多重要差异，而这对国力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一是从人口总数看，尽管在1816年（俄国为5120万，美国850万）和1860年（俄国7600万，美国3140万）期间，两国的人口差距大大缩小。与此关系更密切的是人口的性质：俄国的主要成份是农奴，收入和产量较低，而在自耕农场或在快速发展

---

[1]托克维尔（de Tobqueville，1805～1859）：法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1849年任外交部长。——译者注。

的城市中生活的美国人，与其他国家相比，生活水平和国民产值一般较高。到1800年时，美国的工资比西欧的工资已大约高出1/3，而且在整个19世纪期间，一直保持这种优势，如果没有增加的话。到19世纪50年代时，尽管欧洲的移民大量流入，由于随时可得到西部的土地，工业不断增长，因而劳动力较少，而且工资较高，这样一来又促使生产厂商向减少劳动力的机器投资，从而使国家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年轻的共和国不卷入欧洲的权力斗争，英国皇家海军（而不是门罗主义）① 为了将旧大陆与新大陆分开而强制建立的缓冲国则意味着，对美国的未来繁荣的唯一威胁可能来自英国本身。尽管对1776年和1812年的痛苦仍记忆犹新，尽管在西北部边界问题上存在争议，英美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英国的资本和产品流向美国，和美国的原料（尤其是棉花）回流到英国将两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进一步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战略上安全可靠的美国，不必将资金用在庞大的国防开支上，而将自身的（和英国的）资金集中用来发展本国巨大的经济潜力。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以及1846年与墨西哥的战争都没有大量消耗这类生产性投资。

这一切的结果是，即使在1861年4月爆发内战之前，美国已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尽管美国与欧洲相距很远，美国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内部发展上（而不是放在外贸上），而且农村比较艰苦，所有这一切部分地掩盖了这一事实。尽管美国在1860年时，其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产值中的比重还大大落后于英国，都已超过德国和俄国，而且即将超过法国。美国，在1860年时，其人口只有俄国的40%，其城市人口却比俄国的城市人口多一倍多，其生铁产量为83万吨，而俄国为35万吨，美国现代能源

①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美国总统门罗1823年12月2日在国情咨文中提出欧洲国家不得干涉南北美洲事务的原则，史称门罗主义。——译者注。

消耗比俄国高 14 倍，美国的铁路里程数比俄国多 29 倍（甚至比英国多 2 倍）。美国的正规军只有 2.6 万人，而俄国的庞大军队有 86.2 万人。这两个国家的版图相当于一个洲那样大，在经济指数和军事指数方面的差异也许从来都没有当时那样大。

当然，过了一年以后，南北战争开始改变美国人国家资源中专门用于军事目的的数量。本文不打算研究这场战争的由来和起因：但是既然南北双方的领导人都决心打到底，而且既然各方都要求数十万人参战，这场战争很可能持久。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还有作战距离，“前线”广泛分布在从弗吉尼亚沿岸到密西西比河，甚至于向西一直到密苏里和阿肯色——其中大部分地区是森林、山脉和沼泽地。同样北方在对其敌人的港口进行海上封锁时，巡逻的海岸线相当于从汉堡到热内亚。换句话说，打垮南方，在后勤上和军事上是一项特别困难的任务，而这一点对一个将其武装部队保持最小规模，而且缺乏大规模作战经验的民族来说，尤为突出。

尽管这场为时 4 年的战争消耗大量人力财力，而且死伤惨重——美利坚合众国有 36 万人丧生，而美国南部同盟[①] 有 25.8 万人丧生[②]——这场战争促使美利坚合众国将其潜在的国家力量暂时地变为世界上的头号军事大国，一直持续到 1865 年以后的部队复员。内战开始时，双方的军队都经验不足，后来发展成为大规模征募的军队，双方都使用现代有来复线的火炮和轻武器，在北弗吉尼亚的围城战中拼死战斗，或者用火车大量地运送到西部

---

①美利坚诸邦同盟。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叛乱诸邦之间的同盟。——译者注。

②阵亡人数约占这场战争死亡人数的1／3，其余2／3主要死于疾病。死伤人数约共有 62 万人，这个数字高于美国在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的死亡人数的总和，而遭受这样重大损失的是一个人口少得多的国家。

地区，利用电报与军队总部进行联系，并利用战时经济所动员的人力财力资源；再者，在海战中首先使用装甲舰、旋转炮塔和早期的水雷与鱼雷，以及用蒸汽驱动的武装快船劫掠商船。这场冲突与克里米亚战争或普鲁士的统一战争相比，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采用20世纪初期首次真正工业化的“总体战”，值得指出的是，为什么北方能赢得这场战争。

首要的和最明显的原因——假定参战各方的意志力相当——是在人口和资源方面不成比例。南方为自身生存而战，而且（往往）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在战斗士气上占优势；南方可以为骑兵和步兵招募到更多的男性白人；南方拥有一些决心坚定，而又素质很好的将领；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可以进口弹药和其它补给品以弥补自身武器装备的不足，所有这一切也许都是事实。但是这些都无法完全抵消北方和南方在数量上的明显悬殊。北方约有2000万白种人，而南方同盟只有600万。再者，美利坚合众国的人口总数随着移民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在1861年至1865年期间，有80多万移民到达北方），而到1862年时决定征募黑人部队——而完全可以料到，南方会避免采取这种做法，这种情况持续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约有200万人先后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军队中服役，服役人数在1864～1865年期间达到最高数100万人，而南方同盟的军队前后只有90万人左右，其最大兵力从来没有超过1863年末时的“最高数”——46.45余万人，南军人数逐渐减少。

而影响战争的因素仍然不仅仅是单纯的人数。即使南方为了使其军队达到曾经达到过的最大规模，其承担的风险是使过多的人离开农业、矿山和铸造厂，因而使其已经靠不住的打一场长期战争的作战能力进一步削弱。实际上，南方同盟从一开始就发现自身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在1860年，北方拥有11万个生产单位，而南方只拥有1.8万个（而且南方的很多生产单位依靠北

方的技术专长和熟练工人)；南方同盟只生产 36.7 万吨生铁，而宾夕法尼亚一个州的生铁产量就有 58 万吨；纽约州的产品产值几乎为 3 亿美元——比弗吉尼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的产品产值总数还多 3 倍多。交战双方在经济基础上的悬殊令人吃惊，这种经济实力的明显悬殊不断地转化为战斗力的明显差距。

例如，南方几乎不具备步枪生产能力（主要利用从哈泼渡口的兵工厂缴获的机器进行生产）(哈泼渡口系 1747 年时罗伯特·哈泼拥有的渡口，是在波托马克河和谢南多亚河交汇处的城镇，也是 1859 年时约翰·布朗[1] 而且严重地依赖于进口，北方大规模地扩充其国内的步枪工厂，其生产的枪支将近 170 万支。在战争期间北方可以保持、乃至扩展铁路系统（长约 22000 英里，从东向西南部呈扇状分布)；南方只有 9000 英里的铁路线，而且本来供应紧张的机车和车辆逐渐损坏。同样，任何一方在战争爆发时都没有大量的海军，南方的不利条件是不具备能生产船用发动机的机械厂，而北方拥有数十家这样的机械厂。尽管美利坚合众国的海上优势，人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承认，而在这个时期，穿过封锁线的船只将欧洲生产的弹药运送给南部同盟的军队，南方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使北部的商船队遭受沉重打击——封锁网无情地对着南方港口逐渐收紧。到 1864 年 12 月，美利坚合众国的海军约有 671 艘战舰，其中包括开战以来建造的 236 艘汽船。北方的海军在确保其武装力量控制内陆的大河，尤其在密西西比——田纳西地区中也起重要作用；由于成功地运用铁路和水路联运，帮助了美利坚合众国在西部战区发动了攻势。

最后一点，南部同盟认为，无法偿付战争的费用。出口棉花是南部平时的主要收入来源；当贸易中断，在欧洲强国不干预这

---

[1]约翰·布朗 (John Brown)：缴获的兵工厂的所在地。——译者注。

场战争——这一点使南方大为失望——的情况下，无法补偿这场战争的损失。在南方几乎没有银行和流动资本；在南北双方的生产率由于战争而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土地税和奴隶税的收入几乎等于零。向外国借债几乎毫无所得，而得不到外国通货和硬币，就很难支付重要进口产品的费用。南方同盟的国库也许只好多印钞票，但是"发行过多的纸币，加上商品严重短缺，促使通货膨胀来势汹涌"——而这对百姓继续作战的决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相比之下，北方总是可以从税收和贷款中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以偿付这场战争的费用；北方设法印刷"绿票子"（美钞），以进一步促进工业和经济的发展。美利坚合众国的生产率在战争期间再次迅猛提高，这一点不仅在弹药、铁路建造和装甲舰的生产中，而且在农业产量中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到战争结束时，北方士兵的给养和供应也许优于历史上的任何军队。如果当时存在美国解决军事冲突的特殊方法的话——用韦格利教授的话来说，叫"美国的战争方式"——姑且先录于此，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将其巨大的工业和技术潜力动员起来，用来打垮敌人。

如果说，所有上述内容对一场前前后后似乎持续了将近 4 年的冲突结局来说，看来是一种有决定意义的解释的话，那么也许应当指出南方在战略上遇到的根本问题。在规模和人口方面不平衡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超过北方；能取得的最好结果是削弱敌军的力量和意志力，使之放弃高压政策，并承认南方提出的要求(指存在奴隶制度或分治，或兼而有之)。如果地处边界地区的马里兰和肯塔基等州在投票时以压倒多数同意加入南方同盟（但这一局面根本没有出现)，那末对这项战略本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如果象英国那样的某个强国进行干预，那么对南方会有很大帮助，而作出会出现这种局面的假定，是因为对英国 19 世纪 60 年代初的政治重点存在惊人的误解。如果排除整个军事平衡转向对南方有利的这两种可能性，那么摆在南方同盟面前的唯一战略

抉择就是顶住美利坚合众国的压力，并期待北方的多数人会厌恶战争。而这意味着，它必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且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美利坚合众国就能动员更多的资源、增加弹药生产、建造数百艘战舰，并通过海上封锁，在弗吉尼亚北部不懈地施加军事压力，在西部长期进行战争，和谢尔曼对敌人领土发动毁灭性的大规模攻势，从而对南方无情地施加压力。随着南方的经济衰退，士气低落和第一线部队减员——到 1865 年初，南方的"执勤现役部队"的总人数减少到 15.5 万人——投降才是唯一的现实选择。

六、德意志的统一战争

尽管欧洲很多军事观察家对美国的南北战争进行了研究，由于这场战争有一些具体特点（战争的距离、战场荒无人烟、是一场内战冲突），因而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表明总的军事发展，而是表明 19 世纪 60 年代即将在欧洲出现的武装斗争。欧洲的克里米亚战争不仅破坏了欧洲协同体的老式外交，而且也使"位于欧洲侧翼的"各个强国认为不必对干预欧洲的中心地区承担义务：俄国从遭到蒙受耻辱的惨败中恢复过来需要很长时间；而英国宁肯集中精力解决帝国的问题和国内问题。因而，这样一来，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人为地造成欧洲事务由法国来支配。普鲁士在腓特烈·威廉四世执政时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已经处于不光彩的地位，接替腓特烈·威廉四世继位的威廉一世和普鲁士议会尤其在军队改革符合宪法与否进行争论，使普鲁士举国上下十分震惊。就哈布斯堡帝国来说，当时它仍在反对皮埃蒙特以维护意大利的利益和反对普鲁士以维护德意志的利益这样互相关连的问题上要手腕，与此同时，则竭力抑制国内匈牙利人的不满。

法国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时期看来很强大，而且充满信心。自

从19世纪50年代初以来，金融、铁道和工业开发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进展。法国的殖民帝国扩展到西非、印度支那和太平洋地区。法国的海军也有了发展，有时（例如1859年）使英吉利海峡彼岸的英国震惊。从军事上和外交上看，在解决德意志问题和意大利问题上，看来法国都是一支有决定意义的第三种力量——1859年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法国代表皮埃蒙特[①] 迅速干预皮埃蒙特与奥地利的短期战争。

在迫使哈布斯堡帝国放弃其对伦巴第的控制中；无论马让塔和索尔费里诺等战役有着怎样重要的地位，1859年时，敏锐的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是奥地利人在军事上的无能，而不是法国人在军事上的卓越才能（当然也不是皮埃蒙特在军事上卓越才能!），决定了战争的结局。法国的军队，拥有更多的步枪，确实比奥地利更占优势——这成为大量死伤的主要原因，这使法兰西斯·约瑟夫皇帝十分气馁——而法国的缺陷也很明显：医疗供应和弹药供应严重匮乏，动员计划缺乏目的性，拿破仑三世本人的领导能力也并不出众。而这一切在当时无关紧要，因为哈布斯堡军队的实力更弱，而且吉乌莱将军的领导更使人忧心忡忡。战斗力毕竟是**相对的**，而哈布斯堡军队在陆地上（1866年的库斯托泽之战）和海洋上（利萨之战）仍能轻而易举地对付意大利人，尽管当时哈布斯堡军队已不是法国、普鲁士或俄国的对手。而从广义上说，这并不意味着，法国本身在与**不同**敌人进行的一场未来战争中能自然而然地占优势。这场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参战各方的军事领导能力、武装系统和生产基础等的不同水平。

既然恰恰是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段时间里，由于产业革命而出现的技术迅速发展对战争首次产生真正的影响，难

---

①意大利西部——历史地区，1720年成为撒丁王国一部分，1831年并入意大利王国。——译者注。

怪当时各国的武装部队都感到要设法解决前所未有的作战问题。哪些武器是战斗中的更重要的武器呢？是步兵用的后膛枪呢，还是炮兵用的采用钢制炮管的新式机动火炮？铁路和电报对战场的指挥有什么影响呢？新的军工技术是使进攻的军队占优势呢，还是使防御的军队占优势？关于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当然都取决于环境。就是说，战争的结局不仅取决于采取较新式的武器，还取决于在什么地形使用这种武器，以及部队的士气和战术能力，供应系统的效能，尤其是所有有助于决定战争结局的各种其他因素。既然无法事先了解各项因素怎样起作用，关键的因素是要有一个能熟练地处理各种问题的军政领导，和能十分灵活地对待新环境的一种军事手段。而在所有这些重要方面，哈布斯堡帝国，乃至法国都不如普鲁士那样成功。

普鲁士的19世纪60年代的"军事革命"是建立在很多相关因素上的，这场军事革命很快产生了迪斯累里[①]高度称赞的欧洲事务中的"德意志革命"。其一是新上台的威廉一世[②]及其国防大臣为了对付自由派的反对而进行一种独特的短期服役制度：其中，有3年时间在正规军义务服役，再服4年预备役，尔后再转入后备军，这意味着全面动员的普鲁士军队在7个年度中都有新兵参加。既然不许找人替代，而且后备军可接管多数的守备和"后方地区"警卫任务，执行这种制度之后，普鲁士相对于其人口而言，其第一线的军队比任何其他大国多得多。这项制度，还有赖于普鲁士人民至少有较高的初等教育水平——多数专家认为，一种可迅速扩充的短期服役制度在一个由目不识丁的农民组成的

①Disraeli（1804～1881）：1867～1868年、1874～1880年任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译者注。

②William I：1797～1888年、1861年～1888年任普鲁士国王，1871～1888年任德意志帝国皇帝。——译者注。

国家中很难行得通——而且，执行这项制度还有赖于有一个良好的机构专门管理这样大量的人员。如果被征募对象在训练、被服、武器和给养方面不足，而且运往决战地区的运输能力不足，那么他们在征募一支50万的军队或一支100万的军队中毕竟几乎毫无用处；再者，如果军队指挥官与这样大量的人员联系不上，而且无法管理，那么就不仅仅是浪费人力和资源的问题了。

对这支部队进行管理的机构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它在19世纪60年代初时还默默无闻，后来在老毛奇[①]的天才领导下成为“军队的智囊”。到那时，和平时期的多数军队由作战部队组成，作战部队得到军需、人事、工程和其它部门的支援；实际的军事参谋只是到战争开始并建立司令部时才组成。在普鲁士这个例子中，毛奇吸收了军事学院的最卓越的成就，并给参谋们讲授制订防范可能出现的未来战争的计划和战备措施的方法。作战计划必须在战争爆发前制订好，而且要不断修改；军事演习和军事行动，则与其他强国参与的历史性战役和作战一样，都加以仔细研究。当时，普鲁士专门设立一个部门对其铁路系统进行监督，并确保其部队和补给品能更快地运到目的地。尤其是，毛奇的参谋部系统设法向军官团反复灌输与大部队作战的实践，（大部队是指集团军或满员的军），他们有独立的机动和作战能力，而且随时准备在决战战场集结。如果无法与毛奇在后方的总部保持联系，前方将领可根据某些基本程序主动采取相应措施。

当然，上面介绍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型。普鲁士军队并非完美无缺，甚至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改革之后，在实际作战中也遇到过万事开头难的问题。很多野战指挥官不考虑毛奇的意见，在条件不成熟的攻击中到处乱闯，或者用错误的方法盲

①老毛奇（elder Moltke，1800～1891）：德国军事家、元帅，1858～1888年任总参谋长。——译者注。

目进攻，1866年奥地利之战中犯的这类错误不胜枚举。从战斗本身看，1870年时，普鲁士的警卫部队在格拉韦洛特—圣普里瓦（St.privat）进行正面攻击时，也显得十分愚蠢（而且损失惨重）铁路系统本身并不能保证战争胜利；铁路供应往往只将大量的储备物资运到前线，而需要这些物资的部队此时已经离开。也不能说，普鲁士制订了科学的计划就能保证其部队始终拥有最精良的武器：在1866年，奥地利的炮兵显然占优势，而且在1870年，法国的夏斯波[1]发明的拉栓式步枪精良得多。

普鲁士采用的方法其真正意义不在于这种做法没有错误，而在于总参谋部能仔细地研究过去的错误，并对训练、编制和武器进行相应的调整。1866年，普鲁士军队的火炮弱点暴露无遗，陆军便很快改用克虏伯公司的新式后膛炮，这种炮在1870年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在铁路系统未能按计划及时供应时，便设立一个新的机构改变这一局面。最后，毛奇强调要部署多个能独立作战，而且还能援助其他部队的满员的集团军，这意味着，即使某个部队受到严重挫折——在奥地利与普鲁士的战争中以及法国与普鲁士的战争中实际上都出现过这种情况——整个战争不至于失利。

因此，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普鲁士人在1866年夏天很快取得战胜奥地利人的胜利，只有少数观察家在这之前已经估计到这一点。尽管汉诺威、萨克森和德意志北部诸邦加入哈布斯堡一边，由于俾斯麦进行一系列外交活动，因而大国在斗争的初期阶段都没有进行干预；这样一来，毛奇就有机会派三支部队分别通过山路后在波希米亚平原会合，再攻击在萨多瓦（克尼格拉斯）的奥地利人。作为回顾，战争结局几乎全在意料之中。意大利之

①夏斯波（chassepot，1833～1905）：法国的发明家，其发明采用直动式枪机的后膛式步枪于1866～1874年间在法国军队中使用。——译者注。

战需要哈布斯堡军队投入 1/4 以上的力量（普鲁士军队在这次战争中取胜）；普鲁士采用的征兵制则意味着，尽管普鲁士的人口还不到对方的一半，毛奇可以部署的前线部队几乎与敌人相当。

哈布斯堡军队的经费不足，没有建立真正的参谋制度，而且贝内代克领导不当；而无论各部队怎样英勇作战，他们在开阔地的冲突中被普鲁士火力强得多的步枪击毙。1866 年 10 月，哈布斯堡帝国只好割让威尼托，并放弃其在德国的一切利益——德国当时在俾斯麦的北部德意志邦联的领导下积极进行改组。

"争夺德意志领导权的斗争"即将完成；这场关于哪一方（是普鲁士，还是日益惴惴不安和多疑的法国）将在西欧取得优势的冲突日益迫在眉睫，而到 19 世纪 60 年代末，双方都在考虑寻找时机。从表面上看，法国看来仍然较强。法国的人口比普鲁士多得多（尽管在欧洲讲德语的人总数较多）。法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意大利和海外其他地区取得了经验。法军拥有世界上最精良的夏斯波步枪，这种步枪的性能比普鲁士的撞针枪好得多；而且法军拥有**机枪**这一新式秘密武器，射速为每分钟 150 发，法国的海军明显占优势；此外，预期会得到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帮助。1870 年 7 月是对普鲁士的厚颜无耻进行惩罚的时机（指俾斯麦对卢森堡的未来和霍亨索伦王族继承西班牙王位的可能候选人等问题进行了狡猾的外交活动），只有少数法国人对这一事件的结局抱怀疑态度。

法国崩溃的规模之大和速度之快——到 9 月 4 日，遭到沉重打击的法军在色当投降，拿破仑三世成为战俘，巴黎的帝国政权被推翻——对上述的乐观的设想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事实证明，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都帮不了法国的忙，而且，法国的海军力量完全不起作用。因此，一切都取决于敌国的军队，而且这时事实证明普鲁士人无可争辩地占优势。尽管双方都利用铁路

网将大量的军队运往前方，法国的动员效果差得多。征集到的预备役军人必须赶上早已奔赴前线的部队。炮兵部队分散在法国各地，集中起来并非易事。相比之下，在宣战的15天内，德国有3个军（人数远远超过30万人）开进萨尔和阿尔萨斯。法国夏斯波步枪的优势往往被普鲁士人用机动速射火炮推进战术所抵消。机枪留在后方，从未得到过有效使用。巴赞[1]元帅的麻木不仁和无能真是无法形容，而且拿破仑本人也好不了多少。相比之下，当普鲁士的个别部队在"战争迷雾"中作战失误和损失惨重时，毛奇对各部队进行远距离监督，而且及时调整原计划以便利用意想不到的环境，所有这一切都使部队的进攻势头保持到法军溃败。尽管共和国的军队又继续抵抗了几个月，德国仍无情地收紧对巴黎和法国东北部的包围；卢瓦尔的陆军作了徒劳的反击，游击队员造成轻微破坏不可能掩盖这一事实，即法国作为一个独立大国的地位已被粉碎。

很显然，普鲁士——德意志的胜利是其军事制度的胜利；迈克尔·霍华德敏锐地指出："一个国家的军事制度不是社会制度以外的独立部分，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个方面"。在德意志的纵队和总参谋部的管理井井有条的背后是一个在装备和适应现代战争的条件等方面都比欧洲其他国家占优势的政权。1870年时，德意志诸邦的总人口已超过法国，而仅仅是德意志的分裂掩盖了这一事实。德国的铁路线里程数超过其他国家，而且这些铁路线十分适合军用。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及其钢铁产量正赶上法国。德国的煤产量比法国多1倍以上，德国的现代能源消耗比法国多50%。德国的产业革命造就了越来越多的象克虏伯钢铁和军械联合企业那样的大公司，这些公司增强了普鲁士——德意志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军队的短期服役制度使国内外的自由派不安

①巴赞（Bazaine，1811～1888）：法军将领。——译者注。

——而且当时，人们都普遍批评“普鲁士军国主义”，——但是这项制度能有效地将国家的人力动员起来用于军事目的比自由放任的西方国家或落后的以农业为主要成份的东方国家都做得好。

这一切现象的背后是这个民族拥有水平高得多的初等教育和技术教育、举世无双的大学和学术机构、化学实验室和研究机构。

用当时的双关语来说，欧洲走了主妇，又来了男主人。由于俾斯麦十分熟悉政府事务的管理，其熟练程度令人吃惊，因此，在1870年以后的整整20年内，德国在大国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外交家们指出，所有铁路都通往柏林。而且正如多数人注意到的那样，促使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最重要的国家的因素，不仅是德意志帝国首相的聪明才智和冷酷无情。而且还有德国实现统一以后进一步迅速发展的工业和技术；还有德国的科学和教育以及地方的行政管理；此外，还有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普鲁士军队。可是国外的观察家们几乎都没有注意到德意志第二帝国内部存在严重裂痕，俾斯麦常常对此感到烦恼。欧洲各国，即使是孤立主义的英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个新巨人的影响。俄国人，尽管在1870—1871年期间乐于保持中立，并利用西欧的危机来改进自身在黑海的地位，但对欧洲的重心在柏林这一事实不满，而且暗中对德国今后的所作所为表示担心。在1870年，法国人（教皇的保护人）在洛林溃败，而已占领罗马的意大利人逐渐转向柏林。奥地利—匈牙利帝国也是这样（在维也纳于1867年与匈牙利妥协之后这一点变得明朗化了），这个帝国希望它在德国和意大利丧失的地位能在巴尔干半岛得到补偿——但它清楚地了解到这种野心也许会引起俄国的反应。最后，受到冲击而十分难堪的法国人认为，对于政府和社会中的很多方面需要反思和改革（指教育、科学、铁路、武装部队和经济），这些都涉及到法国一直企图与莱茵河彼岸的强大邻国重新保持均势。在当时和在这之

前，人们将1870年看作欧洲史上有决定意义的分界线。

另一方面，也许由于多数国家认为在19世纪60年代的动乱之后需要喘口气，而且也由于政治家在新秩序下谨慎地行事，1871年以后10年左右的大国外交史是谋求稳定的历史。美国和日本由于分别关心南北战争以后南方各州的改组和重建以及明治维新以后的效果，它们都不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与以前相比，这个体系以欧洲为中心的倾向甚至更加严重。尽管当时存在改头换面的"欧洲五头政治"，均势和1815年以后的情况相比已有很大变化。普鲁士——德意志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取代了普鲁士的地位，成为当时欧洲各国中最强大，也最有影响的国家，而普鲁士在当时一直是最弱的国家。此外，还有另外一个新兴的大国，这就是统一后的意大利，而意大利的经济非常落后（尤其是缺煤），这意味着即使意大利在欧洲外交中比西班牙或瑞典等国有着更重要的地位，它也决不可能被真正接纳为强国同盟的成员。结果由于意大利对地中海和北非提出了要求，因而与法国的敌对日益严重，使法国分散了注意力，而且成为一个对德国今后有用的盟国；其次是由于意大利拥有反对维也纳的解放战争遗产和自身对巴尔干半岛西部有野心，因此也使奥地利和匈牙利不安(至少在俾斯麦在1882年的德奥意"三国同盟"中弥合这种紧张关系之前是这样)。这意味着，德国兴起后的两个主要"牺牲品"奥地利—匈牙利或法国、可将其精力完全集中到柏林上来，因为这两个国家在背后都有一个富有朝气的（如果不是十分强有力的话）意大利。这个事实又进一步说明了奥地利为什么与德国和解，因而成为准卫星国的原因，这还意味着，即使法国的国力比较雄厚，而且也值得同它结为盟国、但这些方面由于在未来与柏林进行的战争中鉴于南部还有一个与之敌对的，无法捉摸的意大利而受到损害。

在法国被孤立，奥地利—匈牙利胆怯以及德国南部和意大利

的中间的"缓冲国"当时并入较大的国家单位的情况下，牵制德国进一步扩充的唯一重要因素看来是俄国和英国等独立的"侧翼"强国。对英国政府来说，欧洲均势这个问题看来不怎么紧迫，英国政府当时正摇摆于格莱斯顿[1]所强调的内部改革（1868年～1874年）和迪斯累里所强调的国家的"帝国"命运和"亚洲"命运（1874～1880年）之间。俄国可能不是这种情况，俄国哥恰可夫首相[2]和其他人都对将他们的普鲁士保护国变为强大的德国不满；但是这种感情与在圣彼得堡宫廷和波茨坦宫廷中存在的王朝之间的私下同情和思想上的同情交织在一起，产生这种同情的原因是，当时俄国仍然迫切需要从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希望柏林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并恢复在中亚的利益。总之，侧翼强国是否有可能干预西欧和中欧的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本身的作为；如果能够假定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得到充分满足的国家，那么当然不必介入。

在1871年以后俾斯麦本人很愿意作出这类保证，因为他不愿意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国家，这个国家包括数百万的奥地利天主教徒，使奥地利、匈牙利帝国遭到破坏，而且使德国在一心报复的法国和多疑的俄国之间陷入孤立。因此，在他看来，同意建立三皇同盟（1873年）则安全得多[3]，这个准同盟强调东方的君主政体（不同于"共和国"法国的政体）在思想上的团结一致，同时冻结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上的某些冲突。在1875年出现"战争认识"危机期间，有迹象表明德国政府也许正

[1] Gladstane（1809～1898）：英国政治家，1868～1894年间四次连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2] TOPHAKOB（1798～1883）：1856～1882年任俄国外交大臣，1867～1882年任首相。——译者注。

[3] 三皇同盟，亦称普鲁士同盟。普鲁士为争夺德意志领导权，与萨克森、汉诺威等邦缔结条约而建立的君主同盟——译者注。

在考虑对法国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伦敦和（尤其是）圣彼得堡得出的警告使俾斯麦确信，进一步改变欧洲均势的任何做法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因此，由于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原因，德国保持在1871年确定的边界以内——有些历史学家称其为“半霸权强国”——这一局面持续到德国在军事上和工业上的增长以及俾斯麦以后的领导人的野心使德国能对当时的领土状况表示异议为止。

我们在下一章还要研究这种变化。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段时间里，由于俾斯麦本人的外交活动，使现状得以保持不变，俾斯麦认为，现状对维护德国的利益是必不可少的。这位首相在这方面的努力得到1876年突然出现的事件的特别大的帮助，这个事件是古老的“东方问题”又出现激化阶段，即土耳其对保加利亚的基督教徒进行大屠杀，和俄国对此作出军事上的反应，从而将其所有注意力从莱茵河转向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在多瑙河下游地区或达达尼尔海峡爆发的敌对行动确实甚至于可以危及德国，如果听任这场危机升级为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的话，到1878年初时，看来这种局面很可能出现。而俾斯麦以“真正的中间人”的身份进行外交活动让所有强国在柏林会议[1]上达成妥协，这件事加强了谋求危机的和平解决的压力，并再次突出了德国当时在欧洲事务中的核心作用的和稳定局势的地位。

在1876～1878年出现的异乎寻常的东方危机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德国的相对地位。尽管俄国在黑海的小型舰队与土耳其的作战中战绩显赫，但俄国军队参加1877年战役表明，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以后的改革并未真正奏效。尽管俄国军队由于勇敢

[1]欧洲大国为重新划分巴尔干的势力范围而召开的国际会议。在英、奥联合施加压力和德国持“中立”态度的情况下，处境孤立的俄国被迫作出重大让步。——译者注。

和人数众多而在巴尔干半岛战区和高加索战区取得了战胜土耳其人的最后胜利，但有很多例子说明“不能非常充分地侦察敌人的阵地，部队之间不能协同作战和司令部指挥混乱”；而且英国和奥地利以代表土耳其进行干预相威胁，迫使俄国政府再次认识到即将遇到失败，并同意对其于 1877 年末提出的要求进行妥协。如果在俄国的泛斯拉夫人后来认为俾斯麦应对其主持的柏林会议作出这些屈辱的让步负责的话，那么，事实仍然是，在圣彼得堡的上层人士中，很多人甚至更清楚地认识到，需要同柏林保持良好关系，而且在 1881 年甚至要再次以新的形式再达成一次三皇谅解。同样，尽管在 1879 年危机最严重的时刻，维也纳以摆脱俾斯麦的控制相威胁，翌年，奥地利和德国的秘密结盟，象后来 1881 年的三皇同盟以及 1882 年的德奥意同盟一样，将奥地利再次系到德国的绳子上。再者，这三项协定的作用是使法国受到其他缔约国的疏远，而且使这些缔约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德国。

最后，19 世纪 70 年代末的一些事件再次突出地说明了英国和俄国在远东和亚洲长期对抗，因而促使这两个强国期待柏林保持友好的中立，并将公众的注意力进一步从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及中欧移开。在 19 世纪 80 年代时，这种倾向变得更加明显，当时的一系列事件标志着“新帝国主义”时代已经开始，这些事件是：法国在 1881 年攫取突尼斯，英国在 1882 年干涉埃及，从 1884 年起大规模“争夺”热带非洲，1885 年，英国和俄国可能再次就阿富汗爆发战争。尽管这种新出现的殖民主义所造成的长期影响即将深刻地改变很多大国的地位，但其造成的短期影响将突出地说明了德国外交在欧洲产生的影响，因而这对俾斯麦为保持当时的状况而作出的努力有利。如果俾斯麦在 19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一系列的特别居心叵测的条约和反条约体系不可能造成持久稳定的局面，看来仍然可以确保欧洲强国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和平占据上风。

七、结　论

在 1815～1885 年这段时间，没有出现任何的旷日持久的精疲力尽的军事斗争，而美国的南北战争则是重要的例外。在这个时期，诸如 1859 年的法国和奥地利的冲突或 1877 年俄国对土耳其的攻击之类的战役大为减少，这对大国体系几乎毫无影响。即使某些更大的战争，在某些重要方面也有局限性：克里米亚战争主要是一场地区性战争，而且在英国能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之前已经结束；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以及法国和普鲁士的战争都是短期的战役，这与 18 世纪的持续时间长得多的冲突形成鲜明对比。因而难怪一些军事领导人和研究战略问题的学者对大国之间的未来战争的想法，是 1870 年普鲁士式在铁路和动员计划、总参谋部制订的发动快速攻势计划、采用速射火炮以及数量庞大的短期服役军队等方面一场毁灭性的快速取胜的战争，这样庞大的军队可在数周内集中起来打垮敌人。当时并不知道较新式的速射武器如果使用得当，对防御性战争，而不是对进攻性战争更为有利；当时也不重视美国南北战争表现出的不祥之兆，在这场战争中，将一些互相矛盾的一般原则和广阔的地形结合起来，对这个时期的持续时间长，更加激烈的冲突更为有利，而不是对这个时期的持续时间较短的激烈的欧洲冲突更有利。

而所有这些战争，无论是在田纳西河谷的战争，还是在波希米亚平原的战争，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战争，还是洛林战场的战争，都表明这样一个普遍结论，即被打败的大国是这样一些强国：这些强国未能适应 19 世纪中期的“军事革命”、未购置新武器、未能动员并用武器装备庞大军队、未能采用铁路、轮船和电报所提供的先进的交通通讯设施、不具备足以维持武装部队的工业生产基础。在所有这些冲突中，取得战争胜利的一方的将领和

军队在战场上经常犯严重的错误，但这些决不可能抵消取胜的交战国在训练有素的人力、供应、编制和经济基础等方面拥有的优势。

最后可以更概括地总结 1860 年以后这段时间的情况。正如本章开头指出的那样，在滑铁卢战役以后的半个世纪的特点是，国际经济不断发展、工业发展和技术变革推动了大规模生产的发展，大国体系相对稳定，出现非常局部的短期战争。此外，尽管当时已出现陆军武器和海军武器的某些程度的现代化，但是在武装部队内部的新发展比受产业革命和宪法—政治变革影响的民用领域出现的新发展少得多。这半个世纪变革的主要受惠国一直是英国；从生产力和世界影响看，英国在 19 世纪 60 年代末也许达到发展顶峰（即使格莱斯顿首次出任首相时执行的政策往往掩盖这一事实）。主要的失败者是那些不在欧洲的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农民国家，这些社会经受不了西方工业产品的冲击和西方的军事袭击。由于同样的基本原因，俄国、哈布斯堡帝国等工业化不太发达的欧洲大国开始丧失它们早先的地位，新统一的意大利从来未能跻身于一流大国。

再者，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这些趋势更加严重。大量的世界贸易，加上更重要的是工业产值增长很快。工业化原先局限于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和北美的部分地区，也开始改变其他地区的面貌。尤其是，工业化正在提高德国和美国的地位，到 1870 年，德国和美国的工业产值已分别占世界工业产值的 13%和 23%。因此，到 19 世纪末出现的国际体系的主要特点已被人们发现，尽管当时只有很少的观察家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在 1815 年以后的欧洲协同体的体制中相对稳定的五头政治正在消失，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到 19 世纪 60 年代时与几十年前相比，其成员国更愿意窝里斗，还由于某些成员国比其他成员国强大 2–3 倍。再者，大西洋彼岸正在打破欧洲自身对现代工业的垄

断。蒸汽动力、铁路、电力和其它现代化手段对一切有愿望和可能采用这些手段的国家有利。

在1871年以后这段时间没有出现重大冲突，在这段时间里，俾斯麦在欧洲外交中占有支配地位，这也许表明，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分裂以后，新的平衡已建立起来。除了加强陆军、海军和外事机构，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业发展和技术发展当时正在进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地改变世界的经济平衡。而且不需要太长的时间，生产基础和工业基础的这些变化就可以影响大国的军事能力和外交政策。

第五章　两极世界的到来和"中等强国"的危机(1885～1918年)

在1884～1885年的冬季，世界诸大国以及几个较小国家在柏林召开会议，试图就西非和刚果的贸易、航海和边界问题以及在非洲实行有效占领的原则更广泛地达成一项协议。在许多方面，可以把"柏林西非会议"象征性地看成是旧欧洲在全球事务中居支配地位时期的顶峰。日本不是这次会议的成员国，虽然它正在迅速地进行现代化，但仍被西方看成是一个古怪而落后国家。对比之下，美国却参加了这次会议，因为华盛顿认为这次会议所讨论的贸易和航海问题与美国在国外的利益有关；但在其他许多方面，美国仍处于国际舞台之外，直到1892年，欧洲诸大国才把它们驻华盛顿的外交代表级别从公使升格为大使——这是成为头等国家的标志。俄国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当时它在亚洲拥有颇多利益，但在非洲的影响则微不足道。事实上，它是作为一个二等国家被邀参加会议的，除在法国反对英国问题上给予一般的支持外，没有起什么别的作用。因此，事务的中心是伦敦、巴黎和柏林之间的三角关系，而俾斯麦处于最重要的中间位置。地球的命运似乎同前一个多世纪一样，仍然掌握在欧洲一些政府手中。诚然，如果这次会议决定的不是刚果盆地而是奥斯曼帝国的未来，那么象奥匈帝国和俄国这样一些国家所起的作用可能会大一些。但这仍不能否认一个当时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即欧洲是世界的中心。就在这同一时期，俄国的德拉基米洛夫将军曾断言"远东事务是在欧洲决定的"。

在以后的30年中——这对大国体系的进程来讲不过是一瞬

间——欧洲大陆发生了分裂，有些国家濒临崩溃。又过了30年，看来欧洲大局已定：大陆许多地区经济遭到破坏，部分地区变成废墟，而它的未来则将掌握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决策者们手中。

显然，在1885年无人能确切预测出60年后欧洲会变成一片废墟，但在19世纪末确有许多敏锐的观察家觉察到世界力量正推动局势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还有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政治家，以庸俗的达尔文主义世界竞争的观点，又是讲演，又是写文章，谈论成功与失败、发展与衰退。甚至有的已经看出未来世界秩序至少到1895年或1900年会是何种模式。

这些预言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德托克维尔思想的复活，即认为美国和俄国是未来的两大世界强国。毫不奇怪，当俄国在克里米亚遭到灾难和在1877年对土耳其战争中表现平常时，当美国在进行内战和此后进行重建及向西部扩张的值得反省的几十年中，这种观点已失掉了基础。然而，到19世纪后期，美国工农业的发展和俄国在亚洲的军事扩张，使得许多欧洲观察家对20世纪的世界秩序感到担忧。当时流行的说法是，20世纪将由俄国的皮鞭和美国的钱袋来主宰。也许是因为新重商主义者的商业观念再次战胜了和平的、科布顿式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主张，人们比以往更倾向于认为经济实力的变化也会导致政治和领土的变化。就连一向慎重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在1898年也承认，世界已分成为“生气勃勃”和“气息奄奄”两类大国。近代中国在1894—1895年对日战争中的失败，西班牙1898年在同美国的短暂冲突中受屈辱，法国在上尼罗河的法索达事件（1898—1899）中在英国面前退却，等等这些事实，都证明“适者生存”这一规律正象对动物一样，也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大国间的斗争不再象1830年，甚至不象1860年时那样，只局限于欧洲问题，而

是涉及到世界各地的市场和领土。

如果说美国和俄国由于地大、人多似乎注定将成为未来的大国，那么谁将与它们并驾齐驱？“三个世界帝国的理论”——即普遍认为只有三个（有的说法是四个）最大和最强的国家能够保持独立——影响了许多帝国政治家。英国殖民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在 1897 年就公开宣称：“我以为，时代的趋向就是把一切权力集中到一些较大的帝国手中，而那些落后的小王国似将落到次要和附属的地位……”德国海军上将蒂尔皮茨怂恿威廉皇帝说，建立庞大的海军对德国至关重要，这样可以使它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俄国、英国、美国、德国）之一。有位达西先生曾警告说，法国也必须赶上去，因为“不进则退，退则亡”。对于英国、法国和奥匈帝国这些老牌强国来说，问题在于它们在这些对国际现状新的挑战面前能否维持自己的地位。对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些新兴强国来说，问题则在于它们能否在不算太晚的时刻突破束缚，取得柏林所谓的“世界政治自由”。

自然，在 19 世纪临近结束时，并非每个人都崇尚这样的观念。许多人更为关心的是国内的社会问题。许多人抱定和平合作的自由放任理想。但在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军界和各帝国组织中，关于世界秩序的主要观点是强调通过斗争、更迭、竞争、使用武力和组织国家资源以提高国力。世界上不发达地区正迅速被瓜分，但这只是故事的开始。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提出，由于可并吞的领土已所剩无几，因此提高效率和发展国内则势将取代扩张主义而作为现代国家的主要目标。“在更广阔的地理和更久远的历史这两个概念之间”将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远为密切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说，如果资源能够得到适当利用，那么它的规模和数量将能更精确地反映在国际力量对比中。一个拥有几亿农民的国家可能无足轻重。而另一方面，即使一个现代国家，如果不是立足于足够强大的工业生产基础上，也将显得暗淡

无光。英国帝国主义者利奥·艾默里曾警告说:"取得成功的大国将是那些拥有最强大的工业基础的国家。""那些拥有工业实力和科学创造能力的民族将能战胜所有其他民族。"

此后半个世纪的国际事务的历史大都应验了这样一些预言。欧洲内外，力量对比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老牌帝国衰落了，新兴帝国崛起了。1885 年的**多极**世界早在 1943 年已为**两极**世界所取代。国际斗争加剧，并爆发了与 19 世纪欧洲的有限冲突全然不同的战争。工业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成为国力中更重要的因素。工业生产在国际上所占份额的变化也反映在军事力量和外交影响在国际上所占地位的变化。个人作用仍应考虑。有谁能说，在列宁、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他们没起作用呢?但他们在强权政治中所起的作用仅只是因为他们能够控制和改组一个大国的生产力。而且，正象纳粹德国本身命运所揭示的，战争考验着每个世界强国，对于缺乏实现其领导人的野心所需的工业技术力量，因而也缺乏军事武器的任何国家，都将是无情的。

尽管在 19 世纪 90 年代已预测到此后 60 年大国斗争的大致情况，但**每个具体**国家的成败还不能断言。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否能保持或提高其工业生产能力。而且还总与一个国家所无法改变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一个国家是靠近国际危机的中心还是处于外围?它是否能不受侵略?它是否会同时两面或三面受敌?民族的内聚力、爱国心以及国家对其居民的控制手段也都很重要;一个社会能否经受住战争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内部成分，还可能取决于对待联盟的政策和决策。是作为一个大联盟集团的一员，还是孤军作战?是从一开始参战的，还是半路参战的?原先中立的一些大国是否参加到对方一边?

这些问题说明，对"两极世界的到来和'中等强国'的危机"作任何适当的分析，都必须考虑以下三个层次不同但又互相影响的

因果关系：第一，当某些国家在物质上变得更为强大（或不甚强大）时，它的军事、工业生产缘基础的变化；第二地缘政治、战略和社会文化等因素，这些因素能影响每一个别国家对世界均势中这些更为广泛的转变所作的反应；第三，影响20世纪初期大规模联盟战争成败的外交和政治变化。

一、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平衡

19世纪末的那些世界事务观察家们认为，经济和政治变化的步伐在加快，因此可能使国际秩序比以前更加不稳定了。力量平衡总在发生变化，因而造成不稳定并且不时发生战争。苏赛迪德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本中写道："使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并因此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但到19世纪最后25年，影响大国体系的变化空前广泛和迅速。全球贸易和通信网络——电报、轮船、铁路、现代印刷机——意味着科学技术上的突破或工业生产的新成就，几年之内就可从一个大陆传入另一个大陆。1879年吉尔克里斯特和托马斯发明了将廉价磷矿石转变为碱性钢的方法后，5年内，西欧和中欧就已有87座碱性炼钢炉投产，而且这一方法还越过大西洋传入其他地区。其结果不仅导致各国钢产量发生了变化；而且也意味着军事潜力发生了重大变化。

众所周知，军事潜力并不等同于军事实力。一个经济巨人，可能由于其政治文化或地理上的安全原因而是一个军事矮子，但一个没有足够经济资源的国家却可能将其社会组成令人生畏的军事强国。"经济力量＝军事力量"这个过于简单化的公式，无论在这一时期还是在其他时期，都有例外，这一点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然而，在现代工业化战争时代，经济和战略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为了理解影响19世纪8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国际力量对比的长期变化，有必要研究一下经济数据。选择这些数据是为了估价一个国家进行战争的潜力，因此不包括对此无甚帮助的某些众所周知的经济指标。①

人口数量本身从来不是表示力量的可靠指标，但表12至少从人口统计方面说明俄国和美国为何被看作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大国，也说明了德国和（其后的）日本开始与其他国家拉开了一些距离。

有两种方法"使用"表12的原始数据。第一种是，将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与城市人口（见表13）进行比较，因城市人口常是工业和商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第二种是，以大不列颠国家作为"基准"数据与其他国家人均工业水平数据进行比较（见表14）。两种方法都很有益，并可互相补充。

表12　各大国总人口(1890～1938)

(单位:百万人)

		1890	1900	1910	1913	1920	1928	1938	
1	俄国	116.8	135.6	159.3	175.1	126.6	150.4	180.6	1
2	美国	62.6	75.9	91.9	97.3	105.1	119.1	138.3	2
3	德国	49.2	56.0	64.5	66.9	42.8	55.4	68.5	4
4	奥匈帝国	42.6	46.7	50.8	52.1	—	—	—	
5	日本	39.9	43.8	49.1	51.3	55.9	62.1	72.2	3
6	法国	38.3	38.9	39.5	39.7	39.0	41.0	41.9	7
7	英国	37.4	41.1	44.9	45.6	44.4	45.7	47.6	5
8	意大利	30.0	32.2	34.4	35.1	37.7	40.3	43.8	6

①例如世界贸易份额，这类数据可将海上贸易国家拔高到与之不相称的地位，同时低估自给自足程度颇高的国家的经济实力。

表 13　各大国城市人口及其占总人口的百分比(1890～1938)

(单位:百万人)

		1890	1900	1910	1913	1920	1928	1938	
1	英国	11.2	13.5	15.3	15.8	16.6	17.5	18.9	5
	(1)	(29.9%)	(32.8%)	(34.9%)	(34.6%)	(37.3%)	(38.2%)	(39.2%)	(1)
2	美国	9.6	14.2	20.3	22.5	27.4	34.3	45.1	1
	(2)	(15.3%)	(18.7%)	(22.0%)	(23.1%)	(25.9%)	(28.7%)	(32.8%)	(2)
3	德国	5.6	8.7	12.9	14.1	15.3	19.1	20.1	3
	(4)	(11.3%)	(15.5%)	(20.0%)	(21.0%)	(35.7%)	(34.4%)	(30.2%)	(3)
4	法国	4.5	5.2	5.7	5.9	5.9	6.3	6.3	7
	(3)	(11.7%)	(13.3%)	(14.4%)	(14.8%)	(15.1%)	(15.3%)	(15.0%)	(7)
5	俄国	4.3	6.6	10.2	12.3	4.0	10.7	36.5	2
	(8)	(3.6%)	(4.8%)	(6.4%)	(7.0%)	(3.1%)	(7.1%)	(20.2%)	(5)
6	意大利	2.7	3.1	3.8	4.1	5.0	6.5	8.0	6
	(5)	(9.0%)	(9.6%)	(11.0%)	(11.6%)	(13.2%)	(16.1%)	(18.2%)	(6)
7	日本	2.5	3.8	5.8	6.6	6.4	9.7	20.7	3
	(6)	(6.3%)	(8.6%)	(10.3%)	(12.8%)	(11.6%)	(15.6%)	(28.6%)	(4)
8	奥匈帝国	2.4	3.1	4.2	4.6	—	—	—	
	(7)	(5.6%)	(6.6%)	(8.2%)	(8.8%)				

表 14　人均工业化水平(1880～1938)

(以大不列颠 1900 年工业化水平为 100 计算的相对值)

		1880	1900	1913	1928	1938	
1	大不列颠	87	〔100〕	115	122	157	2
2	美国	38	69	126	182	167	1
3	法国	28	39	59	82	73	4
4	德国	25	52	85	128	144	3
5	意大利	12	17	26	44	61	5
6	奥地利	15	23	32	—	—	
7	俄国	10	15	20	20	38	7
8	日本	9	12	20	30	51	6

这里不用对表 13 和 14 的数字作详尽分析，也可作出几个大致的判断。一旦把城市人口数量和工业化程度作为衡量“现代化”的标准，那么多数大国的地位与表 12 中的地位相比，就会有很大变化：俄国从第一位降到最末位，至少到 20 世纪 30 年代它的工业发展以前，情况如此；英国和德国取得应有的地位；美国则因人口众多和社会高度工业化二者兼备，因而地位突出。即使在这一时期开始时，大国中的最强者和最弱者之间的差距，不论是绝对还是相对而言，都是很大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仍然有着巨大的差别。现代化的进程可能把所有这些经历相同“阶段”的国家都卷了进去，但这并不意味每个大国都能得到同等程度的利益。

若对工业生产力的详细数据加以研究，大国之间的重大差别就显得更为清楚。钢铁产量常被看作是这一时期的军事潜力以及工业化本身的标志，因此表 15 列出了相应数字。

然而，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最好尺度也许是它的现代形式能源（即煤、石油、天然气和水力发电，而不是木材）的消耗，

因为它既是一个国家利用无生命形式能源的技术能力的标志，也是它的经济脉搏跳动速度的标志。表 16 列出了这些数字。

表 15 各大国钢铁产量(1890～1938)

(单位:百万吨;1890 年为生铁产量，以后年份为钢产量)

	1890	1900	1910	1913	1920	1930	1938
美国	9.3	10.3	26.5	31.8	42.3	41.3	28.8
英国	8.0	5.0	6.5	7.7	9.2	7.4	10.5
德国	4.1	6.3	13.6	17.6	7.6	11.3	23.2
法国	1.9	1.5	3.4	4.6	2.7	9.4	6.1
奥匈帝国	0.97	1.1	2.1	2.6	—	—	—
俄国	0.95	2.2	3.5	4.8	0.16	5.7	18.0
日本	0.02	—	0.16	0.25	0.84	2.3	7.0
意大利	0.01	0.11	0.73	0.93	0.73	1.7	2.3

表 16 各大国能源消耗(1890～1938)

(单位:百万公吨等效煤耗)

	1890	1900	1910	1913	1920	1930	1938
美国	147	248	483	541	694	762	697
英国	145	171	185	195	212	184	196
德国	71	112	158	187	159	177	228
法国	36	47.9	55	62.5	65	97.5	84
奥匈帝国	19.7	29	40	49.4	—	—	—
俄国	10.9	30	41	54	14.3	65	177
日本	4.6	4.6	15.4	23	34	55.8	96.5
意大利	4.5	5	9.6	11	14.3	24	27.8

表 17　各大国相对工业总潜力(1880～1938)

(以 1900 年的英国为 100 计算)

	1880	1900	1913	1928	1938
英国	73.3	〔100〕	127.2	135	181
美国	46.9	127.8	298.1	533	528
德国	27.4	71.2	137.7	158	214
法国	25.1	36.8	57.3	82	74
俄国	24.5	47.5	76.6	72	152
奥匈帝国	14	25.6	40.7	—	—
意大利	8.1	13.6	22.5	37	46
日本	7.6	13	25.1	45	88

表 18　世界工业生产相对份额(1880～1938)

(单位:百分比)

	1880	1900	1913	1928	1938
英国	22.9	18.5	13.6	9.9	10.7
美国	14.7	23.6	32.0	39.3	31.4
德国	8.5	13.2	14.8	11.6	12.7
法国	7.8	6.8	6.1	6.0	4.4
俄国	7.6	8.8	8.2	5.3	9.0
奥匈帝国	4.4	4.7	4.4	—	—
意大利	2.5	2.5	2.4	2.7	2.8

表 15 和表 16 证实，某些大国在特定时期内——德国在 1914 年以前，俄国和日本在 20 世纪 30 年代——它们的工业绝对产量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而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增长速度却减慢了。相对地说，这也代表着在此期间一个国家的工业相对地位（表 17）。

最后回头来看表 18 贝罗克所列世界工业生产份额数字是很有用的，它显示了在上一章对 19 世纪的均势所作的最初分析以后发生的变化。

二、大国的地位（1885～1914 年）

面对这些令人沮丧的具体数字，诸如某大国在 1913 年只拥有世界工业生产量的 2.7%，或另一大国在 1928 年的工业潜力只有英国 1900 年的 45%等，值得再次强调的是，所有这些统计数字如果不是放在特定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条件下，那么都将是抽象的。有些国家虽然实际工业产量相同，但由于诸如社会内聚力、为了国家的需要动员资源的能力、它的地缘政治地位、以及它们外交能量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国家作为大国来讲，其实力却可能有很大不同。由于篇幅所限，本章不可能象科雷里·巴尼特前些年对英国所作的大量研究那样，对各大国都进行详细分析。但以下的论述将尽力使之接近巴尼特的大体构想，即他所说的：

> 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力决非仅在于它的武装部队，而且还在于它的经济和技术资源，在于执行对外政策时的灵活性、预见性和决心，在于其社会和政治机构的效率。这种力量尤其在于其民族本身，在于它的人民，他们的技能、精力、志气、纪律性、创新精神，他们的信念、信仰和幻想。而且，还在于将所有这些因素相互联

系起来的方法。此外，对一国的国力还不能仅从它本身孤立地去考虑，还要联系该国的对外或帝国义务，联系到别国的国力来考虑。

为了说明重大战略效果的多样性，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首先看一下加入国际体系的三个比较新的成员：意大利、德国和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在1870～1871年已成为统一的国家；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开始摆脱它自己造成的孤立状态。这三个国家中都有赶超原有大国的动力。到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三个国家都在获取海外领地，也都开始建立一支现代化舰队以补充其常备军。它们都成了当时解决外交事务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并且最迟到1902年都成了某个老牌大国的联盟伙伴。然而，所有这些相似之处都难以超过它们所具有的真正实力的基本差别。

意大利

乍看起来，统一的意大利国家的出现代表了欧洲均势的重大变化。原来还是许多互相对抗的小国，一部分还处于外国主权控制之下，并且一直受到外国干涉的威胁，而现在却成为一个稳固的整体，拥有3000万人口，其增长之迅速已接近于1914年法国人口总数。这个时期，它的陆、海军虽不特别强大，但正如表19和表20所示，已是相当可观。

在外交方面，正如以上指出的，意大利的兴起，无疑冲击了它的两个邻近大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并且当它在1882年加入“三国同盟”而使意-奥对抗表面上得到“解决”时，也肯定了孤立的法国正处于两面受敌的地位。因此，在实现统一后的10年内，意大利似已成为欧洲大国体系的正式成员，而且罗马已与其他大国的首都（伦敦、巴黎、圣彼得斯堡、维也纳、君士坦丁堡）相齐名，成为别国向其派驻全权大使的地方。

表 19　各大国军人和海军人员数量(1880～1914)

	1880	1890	1900	1910	1914
俄国	791000	677000	1162000	1285000	1352000
法国	543000	542000	715000	769000	910000
德国	426000	504000	524000	694000	891000
英国	367000	420000	624000	571000	532000
奥匈帝国	246000	346000	385000	425000	444000
意大利	216000	284000	255000	322000	345000
日本	71000	84000	234000	271000	306000
美国	34000	39000	96000	127000	164000

表 20　各大国的战舰吨位(1880～1914)

	1880	1890	1900	1910	1914
英国	650000	679000	1065000	2174000	2714000
法国	271000	319000	499000	725000	900000
俄国	200000	180000	383000	401000	679000
美国	169000	240000	333000	824000	985000
意大利	100000	242000	245000	327000	498000
德国	88000	190000	285000	964000	1305000
奥匈帝国	60000	66000	87000	210000	372000
日本	15000	41000	187000	496000	700000

但是，意大利的大国地位的外貌却掩盖着一些巨大的弱点。首先是国家的经济停滞，特别在南部农村。其全国文盲率为37.6%，而南部还要高得多，这远远超过任何其他西欧国家或北欧国家。这反映了意大利农业在许多方面的落后性——自耕的小农、贫瘠的土地、少量的投资、实物的地租、落后的运输。意大利的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财富只能同西班牙和东欧的农民社会相比，而不能同荷兰和西伐里亚相比。意大利不产煤，尽管它已着手开发水力发电，但它的能源大约88%仍靠英国的煤，这不仅对平衡收支是个沉重负担，而且也是一个可怕的战略弱点。在此情况下，工业发展不大，而人口不断增加，对意大利是福也是祸。因为它使人均工业产值的增长比其他西方大国要慢。而如果每年没有数10万意大利人（一般都是更有活力和才干的人）移居大西洋彼岸，则情况对意大利就更为不利。用肯普的话说，所有这一切使意大利成为“情况不利的后来者”。

但这并不是说意大利没有现代化。的确，许多历史学家在谈到这个时期时，把它称之为“焦利蒂时代的工业革命”，并说“我国经济生活有了决定性变化”。至少在北方，钢铁、造船、汽车制造等重工业以及纺织工业有很大发展。格什伦康认为，1896至1908这几年证明意大利是在朝着工业化“大跃进”。的确，意大利工业增长速度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快，人口急剧地从农村流向城市，银行系统本身重新作了调整以提供工业贷款，实际国民收入迅速提高。皮埃蒙特地区的农业也显示出类似的前进步伐。

然而，一旦把有关意大利的统计数字与其他大国相比，便显得暗淡无光了。它确实建立了钢铁工业，但它在1913年的产量只及英国的1/8、德国的1/17、比利时的2/5。它的工业增长速度确实很快，但由于起点很低，所以实际成果给人印象不深。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它的工业实力还不及英国1900年

的1/4。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它所占的比重实际上从1900年仅有的2.5%下降到1913年的2.4%。虽然意大利勉强挤进了大国行列，但值得指出的是，除日本外，其他每个大国都拥有2倍或3倍于它的工业实力；有的国家（德国和英国）为它的6倍，有一个国家（美国）则是它的13倍多。

如果意大利人具有较大的民族内聚力和决心，可能会使上述弱点有所弥补，但这些因素都不存在。在意大利这个国家所存在的忠诚是家族性的和地方性的，也许是地区性的，但不是全国性的。由于意大利政府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对立，天主教会禁止它的成员为国家效力。这种情况既无助于消除南方同北方长期存在的差距，而北方的工业化只能加大这一差距；也无助于改变意大利半岛众多地区的村社与外界的隔绝状态。受到本国人和令人赞赏的外国自由主义者所欢迎的复兴思想，并未能太多地渗透到意大利的社会。军队征召新兵很困难，同时部队的实际驻地不可能按战略原则，而只能按地区政治来考虑安排。文职和军队的高层人物之间互不了解、互不信任。意大利社会普遍存在的反军国主义情绪，军官队伍素质很差，缺乏配备现代武器所需资金，这一切早在损失惨重的1917年卡普里托战役或1940年埃及战役很久以前就使人对意大利的军事效能产生了怀疑。它的统一战争靠的是法国的干涉和此后普鲁士对奥匈帝国的威胁。1896年在阿多瓦（位于阿比西尼亚）的惨败，使意大利获得个"欧洲唯一一支被毫无有效反击手段的非洲国家击败的军队"这样极不光彩的名声。意大利政府决定发动的1911～1912年在利比亚的战争，使意大利总参谋部自己都感到意外，给财政带来极大的灾难。1890年看上去还很强大的海军，其相对规模在不断缩小，其效能已很成问题。皇家海军的历任地中海舰队总司令总是希望，如果在这一时期它与法国发生战争，意大利舰队会采取中立、不结盟立场。

所有这一切使得意大利的战略和外交地位不断下降。意大利

总参谋部不仅敏锐地觉察到在数量和技术上它与奥匈帝国、（特别是）法国相比都处于劣势，而且也知道到意大利的不敷需要的铁路网和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使它不可能按普鲁士方式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灵活的调动。同时，不仅意大利海军觉察到自己的不足，而且意大利易受攻击和漫长的海岸线还使它的联盟政治极为矛盾，因此使得战略计划比以前更加混乱。意大利在 1882 年与柏林签订的联盟条约最初是令人鼓舞的，特别是当俾斯麦想麻痹法国的时侯；但即使在这样情况下，意大利政府仍在尽力与英国保持更为密切的关系，因为仅英国一国就能把法国舰队的力量抵销。在 1900 年以后的几年内，当英、法关系趋于密切，而英、德两国由合作走向对立时，意大利感到自己已无选择余地，只能转向新的英、法联盟。对奥匈帝国的积怨加剧了这种状况，这正象因在意大利尊重德国和重视德国工业金融，从而阻止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公开破裂一样。因此，到 1914 年，意大利又处于与 1871 年同样的地位。它是“大国中最小的国家”。在邻国眼中，它令人失望地难以捉摸和毫无原则。它对阿尔卑斯、巴尔干、北非以及更远的地方都怀有商业和扩张主义的野心，这使它同朋友和敌人的利益都发生了冲突。经济和社会状况不断削弱它影响各种事件的能力，然而它依然是竞赛场上的一员角逐者。总之，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似乎都认为，同意大利结为伙伴总比相互为敌要好，但两者的利害差别并不大。

日本

意大利在 1890 年是大国体系中的一个边缘成员，而日本则根本还没有加入这个大国俱乐部。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被由地方封建领主（大名）和武士贵族特权阶级（武士）所组成的分散的封建寡头政治控制着。日本的自然资源缺乏，并且国土多山，宜耕地只占 20%，因此缺乏经济发展通常所需的先决条件。日本人民由于使用的语言复杂，无相近语种，并且具有强烈的独特

文化意识，因而与世隔绝，所以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仍保持着内向和抵制外来影响的特性。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所以从世界强国的角度看，日本似乎注定是政治上不成熟、经济上落后、军事上软弱无力的国家。但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它已成为远东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这样一个转变有着 1868 年以来明治维新的影响，而其产生的原因，则是日本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决心避免在日本发生类似在亚洲其他地方被西方控制和殖民化的现象，即使所采取的改革措施会打乱封建秩序和遭到武士集团的顽强反抗。日本必须现代化并非因为个别企业家希望如此，而是因为“国家”需要它。在将早期的反抗镇压之后，现代化即按国家财政计划与控制顺利进行，这使得柯尔培尔或腓特烈大帝的努力也相形见绌。制定了以普鲁士——德国模式为基础的新宪法。改革了法制。教育制度有很大发展，使得这个国家的文化水平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得到提高。历法改变了。穿着改变了。出现了现代银行系统。从英国皇家海军聘请了专家进行指导建立了现代日本舰队，来自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专家帮助陆军现代化。日本官员被派往西方陆军和海军学院学习。虽然也建立了本国的军火工业，但仍从海外购买了现代武器。国家鼓励创建铁路网、电报业和航运线。国家还联合日本新兴企业家共同发展重工业、钢铁和造船业，并使纺织业生产现代化。政府以补贴方式帮助出口商、鼓励航运业、创办新工业。日本的出口产品，特别是丝绸和纺织品，产量猛增。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政治许诺，即实现国家的“富国强兵”口号。对日本人来说，经济实力和陆、海军实力是密切相关的。

但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困难仍很严重。虽然在 1890 至 1913 年间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但农村人口仍同原来差不多。甚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仍有 3／5 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

林业和渔业。尽管耕作技术有了许多改进，但多山的农村并且大多是小片土地的拥有者，妨碍了进行类似英国模式那样的“农业革命”。在这种“负担沉重”的农业基础上，日本的工业潜力或人均工业化水平一经比较，就都只能处于或接近于大国行列的末尾(参见表 14 和表 17)。虽然根据其现代燃料能源消耗的大量增加和它在世界工业生产能力中所占比例的提高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工业在 1914 年前已有巨大发展，但在许多其他方面仍很不足。它的钢铁产量不多，严重依靠进口。同样，虽然它的造船工业已有很大发展，但仍需从其他国家订购一些战舰。它的资金也非常短缺，所需国外贷款日益增加，但从未能满足工业、基本建设和军事部门的投资需要。在经济上，它奇迹般地成为在帝国主义高度发展时代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唯一非西方国家；但与英国、美国和德国相比，它在工业和金融方面所占分量仍很轻微。

然而，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帮助了日本进入大国行列，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能超过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第一个因素是它在地理上与其他国家隔绝。它附近的大陆海岸由衰败的中华帝国掌握，毫无威胁。而且，当中国、满洲和（更令人感到惊恐的）朝鲜可能落入另一大国之手时，地理条件将日本置于距这些地方比任何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更为接近的位置。比如，当俄国在 1904～1905 年试图沿着 6000 哩的铁路提供军需物资时，就深感不便；而当英美海军数 10 年后在卷入救援菲律宾、香港和马来亚时，发现它们必须尽力解决各种后勤问题。假如日本在东亚的势力稳步增长，任何其他大国家只有尽最大努力才能阻止日本最终成为在该地区起支配作用的强国。

第二个因素是士气。似乎无庸置疑，日本人对其文化独特性的强烈意识，崇拜天皇和崇敬国家的传统，崇尚军事荣誉和勇敢气质的武士道精神，对纪律和刚毅精神的强调，所有这些，可以使人立即产生强烈爱国和不怕牺牲的政治素质，并且增强了日本

为获得战略安全和市场、原料而向“大东亚”扩张的动力。这反映在1894年对中国进行的成功的陆、海战上，当时这两个国家曾为它们在朝鲜的权益要求而争吵不休。在陆上和海上，装备较好的日本军队似乎受到一种必胜的意志驱使。在这次战争结束时，来自俄、法、德“三国干涉”的威胁迫使日本政府痛苦地撤回它对旅顺港和辽东半岛的权利要求，但是这只不过增加了东京尔后卷土重来的决心。政府中如果有，也只是极少数人不同意林权助男爵的严酷结论：

> 如果认为新型战舰是必要的，那我们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去建造；如果我们军队的组织不适当，那我们就必须从现在起开始对它进行改造；如果有需要，我们的整个军事体制也必须加以改革……
>
> 目前，日本必须保持冷静，站稳脚跟，以便平息对她的怀疑；在此期间，必须巩固国家实力的基础；同时我们必须注视和等待在东方的时机，这一时机总有一天会到来。当这一天到来时，日本将决定她自己的命运……

10年以后，当它对朝鲜和满洲的野心与沙皇俄国的野心相冲突时，报复的时机终于到来。当海军专家们为东乡司令的舰队在对马海峡决战中摧毁俄国舰只而留下深刻印象之时，日本社会总的态度则使其他观察家感到震惊。对旅顺港的突然袭击（1894年同中国冲突时开始采用的一种习惯作法，1941年又再度采用过），在西方受到赞许，因为它体现了日本民族主义者为争取彻底胜利而不惜任何代价的热忱。更值得注意的似乎还是日本官兵在旅顺港和沈阳周围的陆战中的表现，在这里，为了攻占俄军壕堑，有数万士兵在横穿布雷区、跨越铁丝网和通过机枪扫射带时丧失了生命。似乎，即使在大规模工业化战争时代，武士道精神凭着刺刀也能获得战场上的胜利。正象所有当代军事专家所作的

结论那样，如果士气和纪律依然是国家力量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那么日本就有丰富的这类资源。

然而，即使在当时，日本也还不是羽毛丰满的大国。日本是侥幸打败了更为落后的中国和军事上头重脚轻并且因圣彼得斯堡和远东之间距离遥远而处于不利地位的沙皇俄国。此外，1902年的英日联盟曾允许日本得在无第三国干涉的情况下在其附近领域作战。它的海军依靠的是英国建造的战舰，它的陆军依靠的是克虏伯制造的枪炮。最重要的是它发现靠本身的资源已不可能在财政上支持高昂的战争花费，但它还能依靠从美国和英国筹措到的短期贷款。正象结果所显示的，到1905年底，当同俄国进行和谈时，日本已濒临破产。东京公众可能对此尚不清楚，他们对最后协议规定了一些宽容的条件使俄国能够轻易溜掉而感到愤怒。尽管如此，由于胜利已被确认，日本的武装力量受到了颂扬和称赞，它的经济得以恢复，它的大国地位（即使是地区性的）得到所有国家的承认，日本成熟了。在远东，任何重大事情，不考虑它的反应是干不成的；但它是否能进一步扩张而不引起较早存在的大国的反应，则还不清楚。

德国

有两个因素确保了德国帝国的兴起，与任何一个“新到来的”伙伴相比，对大国的均势都具有更直接和更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因素是，远不同于在地缘政治处于孤立状态下出现的日本，德国正好崛起于旧欧洲国家体制的中心；它在建立直接触犯了奥匈帝国和法国的利益，并且它的存在改变了欧洲已有的各大国的相对地位。第二个因素是，德国在工业、商业和陆海军方面进一步发展的绝对速度和广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它的国力不仅已3倍或4倍于意大利和日本，而且超过了法国或俄国，可能还赶上了英国。在1914年6月，80多岁的韦尔比勋爵回忆说，他们记得“在19世纪50年代，德国是一群由无足轻重的幼君统治着

的无足轻重的小邦”，现在，它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中已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并且还在发展着。仅此一点就使“德国问题”在1890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内成为这么多世界政治事务的中心。

这里只能提供少许有关德国经济爆炸式增长的具体情况。它的人口从1890年的4900万急剧增加到1913年的6600万，在欧洲仅次于俄国——但因德国的教育水平、社会保证和人均收入都远比俄国高，所以这个国家在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是强有力的。而据意大利的一个资料说，意大利的军队每召募1000名新兵就有330名是文盲；其他国家的相应比例是，奥匈帝国为220／1000，法国为68／1000，德国更使人吃惊，只有1／1000。受益者不仅是普鲁士军队，而且还有要求工人要有熟练技术的工厂、需要训练有素的工程师的企业、寻求化学家的实验室、希求得到管理人员和销售人员的公司。德国的学校体系、各种工艺院校和大学可以充分提供以上的人才。把这种知识的成果用之于农业，使德国农民利用化肥和大规模现代化提高了他们的作物产量，使每公顷的产量比其他任何大国都高得多。为了安抚容克贵族和农民联盟，给德国农业提供了相当多的关税保护，以对付生产成本更低的美国和俄国的粮食；然而因为它的效率较高，所以巨大的农业部门并没有使人均国民收入和产量降低到欧洲大陆其他大国因此而降到的水平。

但德国就是在这些年的工业发展中才真正出了名。它的煤产量从1890年的8900万吨增加到1914年的2.77亿吨，略低于英国的2.92亿吨，远超过奥匈帝国的4700万吨、法国的4000万吨和俄国的3600万吨。钢产量的增加更为惊人，1914年德国的产量为1760万吨，高于英、法、俄三国产量的总和。尤其引人注目的乃是德国在电力、光学和化学等20世纪新兴工业方面的成就。类似西门子和通用电气这样的大公司就雇用了14.2万人，它们控制着欧洲的电力工业。以拜耳和霍奇斯特公司为首的

德国一些化学公司，生产的工业染料占世界总产量的 90%。这些成功的事绩自然也反映到德国的外贸数字上，在 1890 和 1913 年间出口额增加了两倍，使德国接近于世界领先出口国的英国。它的商船也有很大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处于世界第二位。那时，德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例（14.8%）已高于英国（13.6%），是法国（6.1%）的两倍半。它已成为欧洲的经济动力点，尽管它一再声称缺乏资本，但似乎并未减缓其发展速度。难怪象弗雷德里希·瑙曼这样的民族主义者为德国的这些发展成就和德国在世界的地位具有的含义而欢欣鼓舞，他写道："德意志民族带来了发展，发展带来了陆军、海军、金钱和力量。……只有当一个奋发的民族在它的喉头感觉到春天的甘露时，才可能产生现代的、巨大的能体现力量的各种工具。"

象瑙曼这样的评论家们，甚至还有象泛德意志联盟和德意志海军联盟这样一些狂热扩张主义者压力集团，竟会欢迎并且推动德国在欧洲和海外扩大其影响，是不足为怪的。在这个"新帝国主义"时代，在每一个其他大国中也能听到类似的喊叫；正象吉尔伯特·默里在 1900 年恶作剧地评论那样，**每一个**国家似乎都要宣称："我们是各民族的精华和花朵，……最有资格统治其他民族。"更重要的也许是，1895 年以后德国统治阶层的头面人物似乎也深信，当时机成熟时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例如，海军上将蒂尔皮茨坚持认为，德国的工业化和海外征服"就象自然法则那样不可抗拒"；比洛总理宣称："问题不在于我们要不要开拓殖民地，而是不管我们要不要，我们**都必须**开拓殖民地"；威廉皇帝本人也毫不在乎地宣布，德国"在古老欧洲的狭窄边界以外有很多重大任务需要完成"，虽然他也想像得出，德国是在欧洲大陆上以一种和平意义行使着"拿破仑式的至高权利"。所有这些，完全改变了俾斯麦一再坚持的腔调，即德国是一个渴望维持欧洲现状而不热心于海外领土（尽管在 1884～1885 年有过开拓

殖民地企图）的"饱和"国家。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夸大德国这种关于扩张的"意识形态上的一致"的特殊侵略性，可能是不明智的。法国和俄国、英国和日本、美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家们也都宣布了它们各自国家的注定使命，尽管在语调上不那么宿命论和狂热。

就德国扩张主义而论，重要的是或者这个国家已经具备改变现状所需的实力手段，或者已经拥有创造这种手段的物质资源。关于这种能力最引人注目的证明就是，1898 年以后迅速建立了德国海军，在蒂尔皮茨的领导下这支海军舰队已从世界第六位跃居仅次于英国皇家海军的第二位。到战争前夕，公海舰队拥有 13 艘无畏型战舰、16 艘老式战舰和 5 艘战列巡洋舰，已是一支强大力量，它迫使英国海军部几乎将其所有主力舰队逐渐从海外驻地撤到北海。同时有迹象（较好的内部结构、炮弹、光学设备、射击控制、夜间训练等）表明，德国舰船在各个方面都较优良。虽然蒂尔皮茨从未能得到巨额经费以实现他建立一支"与英国同样强大"的海军的真实目标，但是他还是建立了一支足以威吓敌对的法国或俄国舰队的力量。

德国在陆上成功地进行作战的能力似乎给某些观察家留下的印象不深。的确，乍看起来，在 1914 年以前的 10 年内，普鲁士陆军同强大得多的沙皇俄国陆军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而且法国陆军也能与之相匹敌。但这是个不可靠的表面现象。由于复杂的国内政治原因，德国政府选择了把陆军保持在一定的规模，而让蒂尔皮茨的舰队大量增加它在整个国防预算中所占份额的做法。当 1911 年和 1912 年的紧张的国际形势促使柏林决定大规模扩充陆军时，装备上的迅速变化给人以强烈印象。在 1910 年和 1914 年间，它的陆军预算从 2.04 亿美元增至 4.42 亿美元，而法国只从 1.88 亿美元增至 1.97 亿美元——而且为了达到这样的军队规模，法国征召了 89%的适龄青年，德国只征召了 53%。确实，

到 1914 年俄国为它的陆军已花费了大约 3.24 亿美元，但已感到极为紧张：国防开支占俄国国民收入的 6.3%，而德国只占 4.6%。除英国外，德国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更能承受“军备重担”。此外，普鲁士陆军可以动员并且装备几百万预备役军人，而且因为他们受到较好的教育和训练，所以能很快部署到前线作战，但法国和俄国却做不到。法国总参谋部认为，他们的预备役军人只能在后方使用；而俄国则既没有装备其数百万理论上的预备役军人所需的武器、皮靴和军服，也没有军官来管理他们。但即使这些，也还不能弄清德国的军事能力究竟已达到何种程度，因为这种能力还反映在一些不能用数量来衡量的因素上，诸如良好的国内交通线、能较快进行动员的体制、优良的参谋训练、先进的技术等等。

但是，德意志帝国却被它的地理位置和外交削弱了。因为它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心，所以它的发展似乎将同时威胁到许多其他大国。它的军事机器的效能，再加上泛德意志的重新安排欧洲边界的号召，引起了法国和俄国的警惕，使它们彼此更为接近。德国海军的迅速发展使英国深感不安，正如德国对于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的潜在威胁一样。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德国是“天生被包围着的”。即使德国的扩张主义指向的是海外，但如果不侵犯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它将如何走出去呢？向拉丁美洲进行冒险只能以同美国开战为代价。19 世纪 90 年代在中国的扩张总要遭到英国和俄国的反对；而在 1905 年日本战胜俄国之后便不再成为问题。建造巴格达铁路的企图使伦敦和圣彼得堡都深感不安。保护葡萄牙殖民地的努力受到英国的阻挠。当美国能够明目张胆地在西半球扩大其影响时，日本正在侵入中国，俄国和英国在向中东渗透，法国则在“修整”它在西北非的殖民地，而德国人却两手空空。当比洛 1899 年在他著名的《铁锤或铁砧》的演说中愤怒地宣称：“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外国势力、任何外国朱庇特来告诉我

们：‘还能做什么呢？世界已被瓜分完毕’”时，他表达了人们一种普遍的不满。难怪德国的评论家们呼吁要重新划分世界。

诚然，所有新兴大国都要求改变已经固定下来的、对业已存在的老牌大国有利的国际秩序。从“**现实政治**”的观点看，问题在于这一特殊的挑战者是否能确保这样的变化不致引起太多的反对。而且，如果地理条件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那么外交的作用也就很重要；因为德国不享有像日本那样的地缘政治的位置，所以它管理国家的本领必须特别高明才行。由于认识到第二帝国的突然出现所引起的不安和妒忌，俾斯麦在1871年以后力图使其他大国（特别是俄、英两个侧翼大国）相信德国没有进一步的领土野心。但威廉和他的顾问们却急于显示他们的气概，就很不谨慎了。他们不仅表示他们对现存秩序不满，而且——这也是他们最大的失败——柏林的决策过程在极端帝国主义目的外衣背后隐藏着一种混乱和不稳定性，这使得在秘密活动中所有目睹者都感到吃惊。这有许多是威廉二世本身的性格弱点造成的，但俾斯麦宪法中有关制度的规定也有缺陷，这就使情况更为严重；没有一个团体（象一个内阁那样）对政府全面政策集体负责，不同的部门和利益集团可以不受上级控制或不顾轻重缓急地追求自己的目标。海军几乎只想着将来同英国的战争；陆军在计划如何消灭法国；金融家和商人希望打入巴尔干、土耳其和近东，并在此过程中消除俄国的影响。1914年贝思曼·霍尔韦格首相在1914年7月悲叹说，结果是“向每一个人挑战，阻碍每一个人，而实际上在所有这些进程中又谁也没被消弱”。在充满自私自利和互相猜疑的国家的世界上，这不是一个成功的诀窍。

最后，仍存在着一种危险，即如果不能取得外交或领土上的成功，则将影响威廉德国微妙的国内政治，他的容克上层担心农业利益会（相对）减少、有组织的工人在增加，在工业繁荣时期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在扩大。果然，在1897年以后，对“**新世界政**

策"的追求大为活跃起来，这是出于以下的考虑，即这样做在政治上得人心，并且可以转移对德国国内政治分歧的注意力。但柏林的政权总是要冒双重危险：如果它在与"外国朱庇特"对抗中退却下来，那么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舆论就会谩骂和谴责皇帝和他的助手；而如果国家全力以赴参加一场战争，那么就很难讲广大工人、士兵和水兵群众的自发爱国主义能胜过他们对最保守的普鲁士——德意志国家的厌恶情绪。当一些观察家认为一场战争可能把这个国家团结起来支持皇帝时，其他一些观察家则担心它将使德国社会政治结构更为紧张。此外，这还需要把各方面情况联系起来考虑——例如，德国的国内弱点远不如俄国或奥匈帝国那么严重，但弱点确也存在，并肯定会影响德国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总体"战的能力。

许多历史学家争辩说，帝国的德国是一个"特殊情况"，在沿着一条"特殊道路"发展，有朝一日总要超过国家社会主义而达到顶点。单就 1900 年前后的政治文化和花言巧语来看，这是一个难以检验的主张：俄国和奥地利的反犹太主义至少与德国一样强烈，法国的沙文主义与德国一样明显，日本的文化独特性和天命论的意识与德国一样在广泛保持着。这里研究的每一个大国都是"特殊的"，并且在帝国主义时代都太急于宣扬它的特殊性。但从强权政治的标准看，德国确实具有重要的特性。它是一个把西方民主国家的现代工业化的实力与东方君主国专断的（有人企图说成是不负责的）决策结合起来的一个大国。除美国外，它确是一个拥有向现存秩序挑战实力的"新到来的"大国。而且，它是一个在上升中的大国，如果它进一步向东或向西扩展它的边界，它就只能牺牲强大的邻国利益：用卡利奥的话说，这个国家将来的发展不是"间接地"而是"直接地"损害欧洲的均势。对一个国家来讲，这是一个爆炸性的结合。用蒂尔皮茨的话说，就是"要想弥补失去的地盘……将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对新兴的国家来说，进行突破似乎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对那些目前受到压力的老牌大国来说，设法保住自己则更为迫切。这里有必要再次指出所谈论的三个大国——奥匈帝国、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也许特别是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别。但是，一些有关它们在世界事务中相对实力的图表说明，到 19 世纪末，同五六十年前相比，都明显地削弱了，尽管它们的国防预算更多，它们的殖民帝国版图更广，并且它们（就法国和奥匈帝国而言）在欧洲仍有领土野心。此外，这样讲似乎是公正的，即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知道，国际舞台已变得比他们的前任所面临的状况更为复杂和险恶，这种认识迫使他们考虑对政策作出重大改变以适应新的形势。

奥匈帝国

虽然奥匈帝国在业已存在的大国中是最弱的一个——用泰勒的话说，是正在滑脱大国行列的一个，但从宏观经济统计数字来看并不明显。尽管有相当多的人移居国外，但其人口还是从 1890 年的 4100 万上升到 1914 年的 5200 万，远超过法国和意大利，略多于英国。奥匈帝国在这几十年内工业化也有很大进展，但变化速度在 1900 年以前可能比以后快些。到 1914 年，它的煤产量达到 4700 万吨，已相当可观，比法国或俄国都高。甚至在钢产量和能源消耗方面也绝不比这两个“同盟国”的任何一个差多少。它的纺织工业产量经历了一个高峰，酿酒和甜菜的生产上升，加利西亚的油田被开采，匈牙利地区实现了机械化，斯科达兵工厂的规模在成倍扩大，主要城市在实现电气化，国家大力支持兴建铁路。根据贝罗克的一项统计，奥匈帝国 1913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与法国相同，这看起来有些可疑——正像法勒所宣称的下述情况同样可疑，即它在“欧洲实力”中所占比例从 1890 年的 4.0%上升到 1910 年的 7.2%。然而，很明显，奥匈帝国从 1870 年到 1913 年的增长率属于欧洲最高之列，而它的“工

业潜力”甚至增长得比俄国还快。

然而，一旦人们更详细地研究一下奥匈帝国的经济和社会，就会发现一些重大缺陷。其中最根本的也许就是在人均收入和产量方面存在着巨大地区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从瑞士阿尔卑斯山到布科维纳地区内的社会经济和种族差异。这不仅是说在 1910 年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 73%的人口从事农业，而在整个帝国内只占 55%；而更主要和更令人吃惊的是财富分配极为不均，下奥地利（850 克朗）和波希米亚（761 克朗）的人均收入远远超过加利西亚（316 克朗）、布科维纳（310 克朗）和达尔马提亚（264 克朗）。然而，正当奥地利一些省和捷克一些地区开始工业“起飞”，匈牙利正进行农业改造之际，那些被贫穷折磨的斯拉夫地区人口却增长得最快。结果，奥匈帝国的人均工业化程度仍然远低于各领先大国，并且尽管绝对产量都有增加，但它在世界工业生产能力中所占比例在这几十年内一直徘徊在 4.5%左右。这不是一个承担着奥匈帝国战略任务的国家所能赖以生存的坚强经济基础。

这种相对的落后性，可能会被象在日本或法国存在的那种高度民族文化内聚力所弥补；但遗憾的是，维也纳控制着这个欧洲种族差异最多的国家。例如，当 1914 年大战来临时，动员令要用 15 种不同的语言发出。在波希米亚地区讲德语和讲捷克语的人之间由来已久的紧张关系并非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及其顾问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尽管“青年捷克”运动把它说成是这样。虽然匈牙利在 1867 年以后取得了维也纳平等伙伴的地位，但直到 1899 年匈牙利与维也纳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双方在关税、少数民族的待遇、军队的“匈牙利化”等问题上一再发生冲突。西方观察家们担心整个奥匈帝国的崩溃，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就“两国同盟”问题重新与俄国进行秘密会谈，以防止德国继承奥地利领地和进入亚得里亚海岸。的确，到 1905 年，维也纳

总参谋部在悄悄地准备一项应急计划，以便在危机一旦恶化即对匈牙利实行军事占领。维也纳关于民族问题的清单仍未排除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南部意大利人对在他们的土地上强行德意志化极为愤慨，并期待越过边界从罗马方面得到援助——在某种程度上，就象被俘的罗马尼亚人向东期待着布加勒斯特一样。相比之下，波兰人是比较平静的，部分原因是它们在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享有优于在德国和俄国统治的国土上所能享受到的权利。但是，对帝国统一的最大危险是来自南部斯拉夫人，因为内部持不同政见的集团似乎是指望着塞尔维亚，甚至是更远处的俄国。在维也纳有许多自由主义人士不时要求同南部斯拉夫人的要求进行妥协，但遭到匈牙利贵族们的强烈反对。这些人既反对使匈牙利的特殊地位遭到任何削弱，又要在匈牙利境内维持对少数民族的强烈歧视。因为温和派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遭到拒绝，这就为奥地利—德国民族主义分子打开了大门。总参谋长康拉德将军就坚持，对塞尔维亚人和他们的同情者应当用武力来对付。尽管这一主张遭到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本人的制止，但如果帝国的生存一旦真地受到威胁，它始终不失为一种最后解决问题的手段。

所有这些无疑都会从各方面影响奥匈帝国的实力。并不是说多民族一定就意味着军事上的软弱。军队仍保持着统一的机构，并且极为擅长使用多种语言进行指挥；在驻防和部署军队时，仍不忘采用分而治之的老办法。但在某种情况下，越来越难以依靠捷克或匈牙利部队的全心全意的合作，甚至克罗地亚人（在“军事边界”地带已利用了几个世纪）的传统忠诚也被匈牙利人的迫害所腐蚀。更有甚者，维也纳为平息所有这些独立主义者的不满所采取的传统对策是设立各种委员会、安排新的工作、减免税收、增加铁路支线等等。“在 1914 年，有 300 多万文职人员，管理着诸如学校、医院、福利、税务、铁路、港口等多种多样事

务，……结果……弄得没有多少钱留给军队本身。”根据莱特的统计，奥匈帝国的国防经费在“国家（即中央政府）经费”中所占比例，远少于任何其他大国。结果，它的舰队从来也没有足够的经费用以赶上在地中海的意大利海军，更不必说法国海军了。分配给陆军的经费也只有俄国和普鲁士陆军所享受到的 1／3 到 1／2。陆军的武器，特别是火炮，都已过时，而且数量很少。因为缺乏资金，只有 30%左右可征用的人力应征入伍，而且其中许多人又被打发“长期休假”或者只接受八周的训练。这种制度难以造就大批能适应战时需要的后备军人。

在 1900 年以后的 10 年左右时间里，国际形势日趋紧张，奥匈帝国的战略地位显得确很危险。它的内部分割状态有使国家分崩离析的危险，并使它与多数邻国的关系复杂化。它的经济增长虽也明显，但却无法赶上英、德等领先大国。它的人均国防支出比许多其他大国都少，它征召入伍的适龄青年所占比例远低于任何大陆国家。加之，它似乎有如此众多的潜在敌人，以致帝国总参谋部不得不为应付各种情况的战役制定计划——其他大国很少会为这种复杂情况所烦扰。

奥匈帝国有如此多的潜在敌人，是它本身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多民族状况造成的。尽管有“三国同盟”存在，但在 1900 年以后它同意大利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康拉德在某些场合极力主张对这个南部邻国进行军事打击；即使它的建议遭到外交部和皇帝的断然拒绝，但沿意大利边界的驻军和要塞却在不断加强。再往远些看，维也纳已对罗马尼亚感到不安，因为在 1912 年它加入了敌对阵营，因而构成对维也纳的明显威胁。但招致严重怨恨的国家是塞尔维亚，它与门的内哥罗一起象块磁铁似的吸引着奥匈帝国境内的南部斯拉夫人，因此成为帝国必须除掉的一块毒瘤。这一令人快意的解决办法带来的唯一问题是，对塞尔维亚的攻击很可能会引起奥匈帝国最可怕的对手沙皇俄国的军事反应，当大批

奥匈帝国军队超越贝尔哥莱德向南推进时，俄国可能会入侵东北前线。虽然极端好战的康拉德宣称，为免使奥匈帝国同时和所有这些敌人作战，这是“外交家们的责任”，但它自己在1914年以前的战争计划却暴露了这种荒谬的军事欺骗行为，为此陆军已不得不做好准备。当由9个军组成的主力部队（A梯队）做好部署准备对付意大利或者（!）俄国时，同时还动员了由3个军组成的较小集群对付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巴尔干小集群）。此外，一个由4个军组成的战略预备队（B梯队），将随时准备或者增援A梯队并使之成为一支强大进攻力量，或者如果没有来自意大利或俄国的危险则参加巴尔干小集群对塞尔维亚的进攻。

据说“问题的核心简单地说就是奥匈帝国企图靠二流国家的资源扮演一个大国的角色”。这种孤注一掷加强全线的做法，使帝国处于到处受到削弱的严重危险。这至少给帝国的铁路系统和控制它的官员们提出了超乎常人能力的要求。不仅如此，这些军事行动上的困境证实维也纳多数观察家1870年以来所不愿接受的事实：一旦爆发大国战争，奥匈帝国就需要德国的支持。如果仅限于奥—意间的战争（尽管康拉德对此时常担心，然而这只是最不可能的偶然事件），情况可能还不致如此；但如果奥匈帝国卷入与塞尔维亚的战争，并且后者得到俄国的帮助，那么它肯定需要德国的援助；因此康拉德在1914年以前曾一再试图获得柏林对这一点的保证。最后，这种军事计划的荒诞性再一次反映了许多当代人可以看出的，但某些后来的历史学家却不愿接受的事实，即：如果在巴尔干和奥匈帝国本土爆发的民族主义不满情绪继续发展下去，那么要维护约瑟夫皇帝独有的但不合时宜的继承权已几乎不可能。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欧洲平衡必定会受到损害。

法国

1914年法国比奥匈帝国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其中最重要的

也许就是它只有一个敌人——德国，因此可以集中其全部国家资源来对付它。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情况并非如此，当时法国正在埃及和西非同英国进行较量，并且与英国皇家海军展开决定性的海军竞赛，与意大利的争吵几乎达到刀兵相见的程度。同时，还准备对德国进行报复。甚至当一些比较谨慎的政治家将法国从危险的边缘拉回来并转而进入同俄国结盟的早期阶段时，法国的战略困境仍很严重。它最难对付的敌人显然是德意志帝国，而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但意大利的海军和对殖民地的争夺（正象法国人看待它的那样）也是使人感到不安的，这不仅是为它自己的缘故，而且因与意大利的战争几乎肯定会把它的德国盟友卷进来。对于法国陆军来说，这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师必须驻守在东南部。对海军来说，一个老的战略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是把舰队集中于地中海或大西洋各港口，还是冒险把它分成两支较小的力量。

所有这些都是因 1882 年英国占领埃及以后英、法关系迅速恶化而造成的。从 1884 年起，两国海军暗地进行着逐步升级的竞赛。对英国来说，这种竞赛有可能使它失掉地中海的交通线并且（偶尔）还担心法国越过海峡入侵英伦三岛。更持久和更具威胁性的是经常发生的英法殖民冲突。英国和法国在 1884～1885 年曾就刚果问题发生过争吵，在整个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又就西非问题争吵不休。1893 年，他们在泰国问题上几乎走到了战争边缘。最大的危机发生在 1898 年，当时它们为争夺对尼罗河谷的控制已对抗了 16 年之久，这一对抗在基奇纳陆军和马尚德小远征军在法索达的冲突中更达到了顶点。虽然法国人在这次冲突中败下阵来，但它们依然是精力旺盛、胆大妄为的帝国主义者。不论是廷巴古图还是东京湾的居民，都未把法国看成是走下坡路的大国。在 1871 年和 1900 年间，法国所拥有的殖民地又增加了 350 万平方哩，它无疑是仅次于英国的最大海外帝国。虽

然那些地区的商业并不太发达，但法国却在达喀尔和西贡之间建立了一支相当大的殖民地军队和一批重要海军基地。即使在法国没有开拓殖民地的地方，例如地中海东部沿岸和中国南部，它的影响也很大。

有人认为，法国之所以能够执行这样一种具有活力的殖民政策，是因为政府机构允许一小撮官僚、殖民地总督和殖民党热心家推行各种"前进"的战略，而这些战略是第三共和国快速更迭的部长们没有机会加以控制的。但是，如果说法国议会政治的多变状态无意识地加强和坚定了它的帝国政策——借助于把政策交给常务官员和他们在殖民地的"院外集团"的朋友来掌握——那么它对海军和陆军事务的影响却远不是那么令人感到愉快。例如，体制的迅速变化使之提拔了不少海军新部长，其中有些人纯粹是"官吏"，而另一些人则顽固地坚持着（但又经常在变的）一些海军战略主张。因此，虽然在这几十年中拨给了海军巨额款项，但这些钱却使用不当：造船计划就反映了政府决定的多变，这届政府偏爱商业掠夺战略，下届政府又力主建造战船，结果留给海军本身的是一堆杂乱的船只。这样的海军无法与英国或后来的德国相抗衡。但政治对法国海军的影响与对陆军的影响相比就显得逊色。在陆军中，军官团表现出的对共和主义政治家的强烈反感，以及各式各样的军人和文职人员的冲突（其中德雷福斯事件最为臭名昭著）削弱了法国的机体，使军队的忠诚和效能都成了问题。只是随着 1911 年以后出现了令人注目的民族复兴运动，这些军人和文职人员的争端才被搁置一边，而共同对抗德国敌人；但也有许多人怀疑，这样的政策是否会给法国武装部队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另一明显束缚法国实力的国内因素是它的经济状况。这一问题非常复杂，并且因一些经济历史学家对不同指标的偏爱而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从积极方面看：

> 在这一时期，参加工业投资和对外信贷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有了很大发展。建立了现代化的钢铁工业。兴建了一些新的大型工厂，尤其是在洛林矿区。在法国北部产煤区，出现了工业社会常见的、脏乱情景。在工程技术和新兴工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法国拥有著名的企业家和革新家，他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已经在钢铁、工程、汽车和飞机制造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象施奈德、彭乔特、米什林和雷诺等一些公司都处于先锋地位。

的确，直到亨利·福特的大规模生产方法出现以前，法国是世界上主要的汽车生产者。19世纪80年代进一步掀起兴建铁路的热潮。这种热潮与改进了的电报业、邮政系统和内河航运一起，增强了发展国内市场的趋势。农业受到1892年梅利安税法的保护，并且仍着眼于生产高质量产品，以获取更大的人均增值。指出这些绝对经济发展指数和在这几十年内法国人口数目增加不多，用以衡量同法国人口有关的产量，给人以深刻印象——例如，人均增长率、人均出口值等等，情况都是如此。

最后，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法国的流动资本极为丰富，可以（并且是有计划地）用来为国家的外交和战略服务。在这方面给人印象最深的标志就是很快偿还了1871年对德赔款，根据俾斯麦的错误计算，预计这笔赔款在未来的许多年内可将法国实力严重削弱。但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法国资金还不断流入欧洲内外许多国家。到1914年，法国的国外投资总额达90亿美元，仅次于英国。这些投资不仅对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很大地区的工业化有帮助，而且也给法国本身带来很大政治和外交利益。在进入20世纪的时候意大利逐渐疏远了“三国联盟”，如果不完全是因意大利需要资金，那么至少两者是同时发生的。

法、俄贷款给中国以换取筑路和其他特权，几乎一直是在巴黎筹款并通过圣彼得斯堡而汇集起来的。法国在土耳其和巴尔干的大量投资——受挫的德国人在1914年以前是绝对无法与之较量的——不仅使它在政治文化方面，而且在获得购买法国武器而不是德国武器的合同方面，都得到了好处。最重要的是，法国把钱投资到它的俄国盟国的现代化上，从1888年10月在巴黎市场第一次筹措贷款，到1913年提供5亿法朗紧急贷款——条件是大大延伸俄国在波兰诸省的战略铁路系统，这样就可动员“俄国蒸汽压路机”尽快压服德国。这还清楚地显示了法国运用其财政力量加强它自己的战略力量的能力（虽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国的军事机器效率越大，德国人就必须准备越快地打击法国）。

然而，一旦再次利用比较经济的数据，法国经济增长的这种正面形象便黯然失色了。虽然它确实在国外有大量投资，但没有什么证明表明，这些资本给国家带来了理想的报偿，无论就赢得的利润而言，还是从外国对法国产品的订货增长情况来看都是如此。甚至在俄国，也经常是德国商人抢走了进口贸易的最大份额。在19世纪80年代初，德国在欧洲出口厂商中所占比例已经超过法国；到1911年，它几乎比法国多了一倍。这也就反映了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法国经济在一两代人以前遭受到英国工业的有力竞争，而现在它又在受德国工业巨人崛起的影响。除了象汽车工业这样极少的例外，统计数字一再显示了这种暗淡景象。到大战前夕，法国的工业总潜力只有德国的40%左右，钢产量略超过德国的1／6，煤产量尚不足德国的1／7。煤、钢、铁由于是从小工厂和用贫矿生产的，通常成本比较高。同样，尽管法国化学工业的发展有所进展，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从德国进口。由于工厂小，技术落后，并严重依赖需加保护的国内市场，因此毫不奇怪人们把19世纪法国工业的发展冷酷地描写成是“患关节炎的……踌躇不前的、时断时续的和进展缓慢的”。

它的田园生活魅力，至少就相对实力和财富而言，也没有给人带来安慰。病害对丝绸和酿酒业生产的打击一直没能完全恢复过来；梅利安税法在保护农业收入和维护社会安定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延缓了农村人口的流动和扶持了效率不高的生产者。到1910年前后，农业仍占有40%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并且耕地绝大部分是小土地经营，这对法国的生产力和整个财富都是明显的拖累。贝罗克的统计表明，法国191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德国的55%，它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例只相当于德国的40%左右；赖特的统计则说，1914年法国的国民收入为60亿美元，而德国为120亿美元。如果法国再同它的东部邻国发生一次战争，而法国又是孤立无援时，那就只能重复1870～1871年的结局。

在这些比较数据中有许多表明，法国象落后于德国一样，也落后于美国、英国和俄国许多，因此到20世纪初，它在诸大国中只能排在第五位。仅仅由于两国关系恶化而造成的同德国的对立，侵蚀了法国的实力。在这方面，趋势是不妙的。而且，在1890至1914年间，德国人口增加将近1800万，而法国只增加了100万多一点。再加上德国拥有雄厚的国民财富，这就意味着，无论法国多么加紧维持它的军事实力，它将始终落后于德国。通过征召80%以上的适龄青年入伍，法国组成了一支摇摇欲坠的庞大军队，至少根据某些标准来看是这样：例如，法国能从4000万人口中动员80个师，相比之下优于奥地利从5200万人口中只能动员48个师。但以此来对付德国，则无济于事。普鲁士总参谋部不仅能从其训练有素的预备役军人中动员100多个师，而且还拥有可征召的巨大人力潜力——德国几乎拥有1000万适龄人，而法国只拥有500万人；并且德国有为数可观的11.2万名训练有素的军士，这是扩充军队的关键因素——相比之下，法国只有4.8万名军士。而且，虽然德国的军费开支只占

其国民收入的较小部分，但绝对金额却很大。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法国最高统率部针对“不可接受的劣势地位”所进行的斗争是徒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关于德国物质优势的机密备忘录同样令人吃惊：“德国有4500挺机枪，法国只有2500挺；德国有6000门77毫米加农炮，法国只有3800门75毫米加农炮；在重炮方面德国几乎处于完全垄断地位。”尤其是最后一个方面，表明了法国最糟糕的弱点。

然而，法国军队还是满怀信心地参加了1914年的战争。他们放弃了防御战略而转为全力进攻。这反映了他们在极力强调士气，正像格兰梅森和其他人一再企图向军队灌输的那样——人们估计这是想从心理上弥补物质上的那些弱点。梅辛将军鼓吹说，决定胜利的既不是军队的数量，也不是那些使人惊奇的机器”，“胜利将属于具有英勇和良好素质的士兵——这里我指的是超群的肉体和精神上的耐力和进攻能力。”这种武断的观点与1911年摩洛哥危机以后在法国出现的“爱国主义复兴”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也表明，尽管阶级和政治分裂使得法国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显得非常脆弱，但是国家能战斗得比1870年好得多。大多数军事专家认为，即将来临的战争将是短暂的。因此，最重要的是能有多少个师马上投入战场，而不是德国的钢铁和化学工业的规模，也不是德国拥有的数百万潜在的兵员。

对于这种民族自信心的复活影响最大的，可能是由于外交部长德尔卡塞和他的外交官们的努力而使法国在世纪转变的年代中不断提高了国际地位。尽管德皇政府采取种种外交手段企图加以削弱，但他们不仅培育和维护了与圣彼得斯堡的重要联系，而且还不断改善了同意大利的关系，实际上使它从“三国同盟”中分裂了出来（因而也缓解了必须在萨瓦和洛林两地同时作战这一战略问题）。最重要的是，法国能够在1904年的协约中调和了它们与英国关于殖民地的纠纷，然后又使伦敦自由党政府的领导成员们

确信，法国的安全也是英国的国家利益。虽然由于英国国内政治原因而未能使法国成为英国的一个固定盟国，但增加了将来当德国的公海舰队有所增强和出现德国通过中立的比利时向西攻击的迹象时，得到英国支持的机会。如果英国介入，那么德国不仅要担心俄国，而且要担心皇家海军对其公海舰队的影响和对其海外贸易的破坏，以及向法国北部部署人数不多但意义重大的英国远征军同俄国和英国结成联盟共同对德作战，这是 1871 年以来法国梦寐以求的，现在似乎已成为明显的现实。

法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能同德国一对一地作战，这是法国历届政府都要避免的事情。如果大国的标志是有决心和有能力战胜任何另一大国，那么法国（和奥匈帝国一样）则已降到更低的地位。但是，对于一个精神上有战争准备、军事上比较强大、经济上富裕、尤其是拥有强大盟国的国家来说，这个定义标准在 1914 年时就显得太抽象了。即使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法国是否能顶得住德国，也还是个问题，但大多数法国人似乎都认为能够做到。

大不列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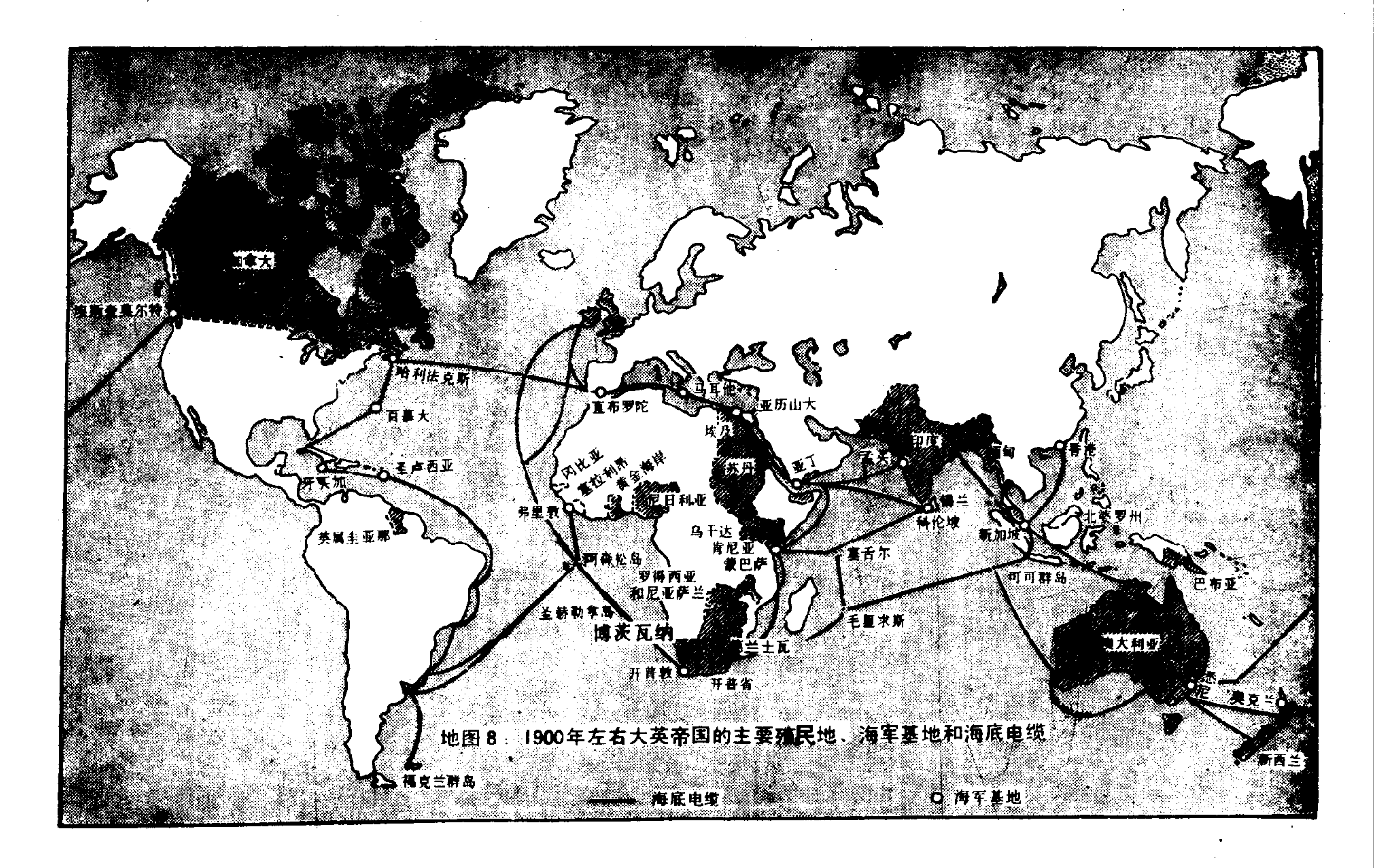
乍看起来，英国给人的印象总是深刻的。在 1900 年，它曾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大帝国，国土拥有大约为 120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约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单是在此以前的 30 年内，大英帝国就增加了 425 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 6600 万人口。不仅是后来的一位持批评态度的历史学家，而且连法国人和德国人，阿散蒂人和缅甸人，以及当时许多其他人都有以下同感：

在（1914 年）大战爆发以前的大约半个世纪内，英国的实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同时对其他国家的任何类似野心明显地缺乏同情心。……如果真的有个国家正企图获得世界霸权，那就是英国。事实上，英国不只是企图获得这个霸权，而且已经得到了。德国人只是在谈论要修建一条通往巴格达的铁路，而英国女王已

经是印度的女皇。如果有某个国家已打破世界力量均势，那就是英国。

英国的实力还表现其他一些方面：皇家海军的巨大发展，其实力相当于仅次于它的两个最大舰队之和；遍布全球无与伦比的海军基地和电缆通信站网；世界最大的商船队；运载着世界最大贸易国的货物；伦敦市的金融服务业务，使英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投资者、银行家、保险商和商人。1897年在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那些尽情欢呼的人们，是有些值得自豪的理由的。每当人们讨论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中世界上的三个或四个帝国时，英国——而不是法国，不是奥匈帝国，也不是许多其他候补国家——始终属于前列。

然而，如果从其他角度看——比如从英国"官方意见"的清醒计算或从后来研究英国实力衰退问题的历史学家们的估算来看那么19世纪后期肯定不是英帝国"企图获得世界霸权"的时期。正相反，这种"企图"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作出，并在1815年胜利时达到顶点。这次胜利使英国在此后半个世纪内蓬勃发展，确立了实际上无可争辩的海上的和帝国的极大优势。然而，1870年以后，世界力量均势的不断变化，从两个不祥的并且互相影响的方面腐蚀着英国的霸权。第一个意见，工业化扩到其他国家以及随之而来这些国家陆、海军所占分量的变化，使大英帝国的相对地位受到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的削弱，因为正是这个公认的大国，在现状的基本变化中所得少于所失。强大统一的德国的出现使英国受到的影响并不象法国和奥匈帝国那样直接（只是在1904～1905年以后伦敦才考虑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英国这个国家受到的重大冲击是美国力量的兴起，因为英国在西半球的利益（加拿大、加勒比海的海军基地、在拉丁美洲的贸易和投资）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重要得多；英国这个国家受俄国边界扩张和土耳其斯坦战略铁路的影响最大，因为每个人都能看出，



地图8：1900年左右大英帝国的主要殖民地、海军基地和海底电缆



这对英国在近东和波斯湾的影响是个威胁，并且最终可能威胁到它对印度次大陆的控制；英国这个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例最大，天朝被分割或在这一地区出现新的势力，都会最严重地损害英国的经济利益；同样，1880 年以后对殖民地的争夺，使英国这个大国在非洲和太平洋的相对地位也受到极大影响，因为(用霍布斯鲍姆的话说）它得“以控制着大部分不发达世界的非正式帝国，换成了个只控制不发达世界的 1／4 的正式帝国”——尽管不断有许多新的领土归属维多利亚女王，但这并不是一笔占便宜的交易。

虽然这些问题中有些（在非洲或中国）完全是新问题，但其他一些（同俄国在亚洲和同美国在西半球的竞争）则都是前几届英国政府遇到的老问题。现在所不同的是，各个竞争国家的相对实力已有很大增加，而且似乎这些威胁几乎是在同时发展着。正象奥匈帝国为了对付许多在欧洲的敌人而弄得手忙脚乱一样，英国政治家们也必须努力应付一切确实具有世界规模的外交和战略把戏。例如，在关键性的 1895 年，英国内阁不得不在担心着：中日战争后中国可能分裂；奥斯曼帝国因亚美尼亚危机而崩溃；几乎在与美国就委内瑞拉——英属圭亚那边界问题争吵的同时，在南部非洲问题上又隐隐出现与德国的冲突；法国在赤道非洲军事远征；以及俄国人向兴都库什推进。在海军方面也不得不玩些花招；不管怎样经常增加皇家海军的经费，但面对着 19 世纪 90 年代正在建立的五六支外国舰队，它已不能再象 19 世纪中叶那样“控制大海”了。正如英国海军部反复指出的那样，它能够对付美国在西半球的挑战，但只能靠从欧洲水域把战舰调过来，就象它能够增加皇家海军在远东的规模，但只能靠削弱地中海海军中队一样。它不可能在每个地方都那么强大。最后，在军事上还不得不玩弄的一个把戏是，将若干营的兵力从奥尔德肖特调到开罗，或从印度调到香港，用以应付一些最紧急情况——而且，所

有这些都必须靠小规模志愿部队来完成，这同按普鲁士方式大规模调动军队无法相比。

第二个是，互相影响的弱点不是那么直接和引人注目，但可能更为严重。这就是英国工业和商业优势受到削弱，而这种优势恰好是英国海军、陆军和帝国实力所依赖的最后手段。已经建立的英国工业，例如煤、纺织和铁器制造，在这几十年内绝对产量不断增加，但在世界产量中的相对份额却不断减少；在那些新兴的、越来越重要的工业领域，例如炼钢、化学制品、机床和电气产品，英国很快就失去了它以前具有的领先地位。工业生产在1820～1840年间的年增长率约为4%，在1840～1870年间约为3%，后来增长得更加缓慢；在1875～1894年间，年增长率只略高于1.5%，远远低于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这种工业优势的丧失，很快反映在对用户的无情竞争中。首先，英国出口商品定价偏高，以致在经常受高关税壁垒保护的工业化欧洲和北美市场上丧失了它们的有利地位，并且此后又丧失了某些殖民地市场，在这些市场上其他大国一面与之进行商业竞争，一面在它们的新附属地征收关税；最后，人们意识到由于越来越多的外国产品进入未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使英国工业受到削弱——这是英国变得更无竞争能力的最明显的标志。

19世纪后期英国生产率的衰退和竞争能力的减弱，是经济史上研究最多的问题之一。它涉及到许多复杂的问题，例如民族特性、世代差异、社会精神气质、教育制度以及一些更特殊的经济原因，象投资少、工厂落后、劳资关系恶劣、推销无术等等。对于关心相对状况的大战略研究者来说，这些解释并不重要，而更重要的是从总体上讲英国正在不断失去的基础。1880年，联合王国在世界工业总生产能力中所占比例为22.9%，到1913年这个数字已下降到13.6%；英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在1880年为23.2%，而在1911～1913年间已只有14.1%。就

工业实力来讲，美国和德意志帝国已走在前面。这个“世界工场”现已处在第三位，这倒不是因为它没有发展，而是因为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

对于有理性的英帝国主义者们来说，没有比这种相对经济衰退更可怕的了，简单说因为它影响到英国的**实力**。1904年W·A·S休因斯教授曾问道：“假如受到（外国竞争）威胁的某种工业恰好属于你的国防体制基础，那你将处于什么地位呢？”“如果没有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巨大的工程行业，你就无法过活，因为在现代战争中你将没有建设你的舰队和军队并保持其发挥作用的手段。”与这种发展相比关于西非殖民地边界问题或萨摩亚群岛前途问题的争吵就毫无价值了。因此，英帝国主义者开始关心关税改革——放弃自由贸易规定以保护英国工业——并且更加密切与白人自治领地的关系，以保证国防税收和帝国专有的市场。用约瑟夫、张伯伦吓唬人的话说，英国现在已成为“疲倦的泰坦，（摇摇晃晃地）顶举着过于巨大命运之球”。英国海军大臣警告说，在未来的岁月内，联合王国依靠卖身力量将不足以保持其应有的与美国或者与俄国，甚至是与德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我们将被真正的势力推到一旁。

然而，如果说从**长远观点来看**英帝国主义者们无疑是对的话——一位有影响的新闻记者加文在1905年就悲观地问道：“正在庆祝特拉法尔加海战100周年的帝国还能生存下个100周年大庆吗？”——那么他们几乎都有把当时的危险夸大了的倾向钢铁贸易和机床工业在许多市场被赶走，但是肯定还没被挤掉。纺织工业在1904年以前的几年内出现了出口畅销势头，当回顾起来这只能被看成是个晚秋季节。英国的造船工业——对皇家海军和兴旺的商船队都是至关重要的——仍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在这几十年内下水的船只占世界商船吨位的60%以上和占它战舰的33%。这对担心英国在战时会过分依靠进口粮食和原料的人来

说也是某种安慰。确实，一旦英国卷入大国之间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工业化战争，就会发现它的许多军事工业（例如，炮弹、飞机、滚珠轴承、光学设备、永磁电机、染料）不足所需，这反映了以下一个传统的估计，即英国军队是为了应付小规模殖民战争而部署和装备的，不适用于大规模陆战。但是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英军参加的正好是这种小规模冲突。至少有些权威人士在1898年就已经预言，如果真地爆发一场战壕加机关枪的消耗性、持久性的"现代"战争，那么就不仅英国一国需要必要的物资了。

因此，这个时期的英国也还拥有经济实力这一事实是对把英国问题描绘得过于悲观和笼统的一个警告。回顾往事，人们可以断言："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使英国达到了繁荣和实力的顶峰，而从1870年到1970年的英国历史，则是一部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从顶峰持续不断衰退的历史。"但是，仍然存在一种夸大和预测这种衰退速度，以及忽视这个国家甚至非工业领域仍拥有非常巨大财力的危险。首先是英国，在国内外都是非常富有的，虽然英国财政部已深切感到在1914年以前的20年内因为采用新技术使每条战舰价格上涨一倍多而承受沉重的压力。此外，选民数量的增加首次导致了相当大的"社会"支出。而且，如果为"大炮加黄油"增加的费用从绝对值来看似乎使人吃惊，那是因为这个守夜国对个人收入只收取很少的所得税，并且只把国民收入的很小部分用于政府开支。即使在1913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总支出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2.3%。因此，虽然英国在1914年以前是国防开支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它的国防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却比欧洲其他任何大国都小；并且，如果说主要帝国主义者们都倾向于在反对英国的工业实力的同时并贬低英国的财政实力，那么当时英国的确在海外拥有195亿美元左右，数额惊人的投资，相当于世界对外

投资的大约 43%，这无疑是国家的一个财源。毫无疑问，只要有需要，英国甚至是能够负担一场规模大耗资多的战争。更值得怀疑的是，如果英国被迫将愈来愈多的国家资源用于军备和现代的工业化的战争，那么它是否仍能保持其自由政治文化——自由贸易、低政府开支、征兵不足、主要依靠海军。但毋容置疑的是英国有一个资财充实的国库。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提高了英国在大国中的地位。虽然越来越难以想象在战略铁路和大量军队正在破坏印度和其他领地的地缘政治安全的时代仍能保卫帝国的陆地边界，但大不列颠诸岛的孤立位置却依然是个很有利的条件——使它的居民不必担心受到邻国军队的突然入侵，使它能强调海上力量而不是陆上力量，并且使它的政治家们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比大陆国家的政治家们具有更大的活动自由。此外，虽然一个广阔和难以防卫的殖民帝国的领地意味着具有很大的战略难题，但是也给英国带来了相当大的战略优势。遍布各地的帝国驻军、加煤站以及便于海上增援的舰队基地，使英国在大陆以外同欧洲大国进行任何冲突都处于极为强有力的地位。正象英国能够帮助其他海外领地一样，这些海外领地（特别是自治领和印度）也能以军队、船舰、原料和金钱帮助帝国力量——这正是白厅的政治家们为了实现更有组织的"帝国防卫"而精心培养其海外亲信时代。最后，可以带些嘲讽地说，因为英国的势力和影响在早年已扩展得如此之大，所以英国现在拥有许多缓冲地带、许多无关重要的地区，因此也就有许多妥协余地，特别是在其所谓"非正式帝国"的范围内。

英国帝国主义的许多公开的悦耳的论调并不说明妥协和退让已成为当代的法则。但是，英国各部之间磋商和内阁会议决策的体制，允许年复一年地对其战略重点进行仔细评估，研究英国在全球义务方面的每个问题，并决定采取妥协还是强硬的政策，因此，由于英、美战争在经济上是损失巨大的，政治上是不得人心

的，战略上是很困难的，所以在委内瑞拉争端、巴拿马运河和阿拉斯加边界等问题上采取妥协政策似乎更为可取。相反，当19世纪90年代英国欣然与法国就西非、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争端达成协议时，却用武力捍卫它对尼罗河谷的统治权。10年以后，它试图缓和英德对抗（通过建议就海军比例、葡萄牙殖民地和巴格达铁路等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一旦发生大陆战争双方能否遵守保持中立的诺言则大可怀疑。当外交部长格雷在1914年以前试图接近柏林的努力，获得了几乎同索尔兹伯里早先企图就亚洲问题同圣彼得堡达成协议一样的成功时，双方都透露了一个共同的设想：外交是能够解决世界事务中的大部分问题的。一方面提出1900年前后英国的全球地位被削弱得正象20世纪30年代后期将被削弱的那样；另一方面认为，1914年以前"英国实力曾大为膨胀"，以致打乱了世界均势。这两种意见同样都是对非常复杂的局势的片面看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十年内，大不列颠意识到在工业上已被美国和德国超过，并且在商业、殖民地和海运方面受到激烈的竞争。然而，从财政资源、生产能力、帝国领地和海军实力综合来看，它可能仍然是世界"头号"大国，尽管其领先程度已远不如1850年时那样明显。但是，这种"头号"大国的地位也是英国的主要问题。英国现在已是一个成熟的国家，它的固有利益是保持现有格局，或者至少保证形势缓慢地、和平地变化。它会为了某些明显的目的而打仗——例如为了保卫印度，维持海军特别是在内海的优势，可能还有保持欧洲的均势——但每个问题都必须从更广阔的范围加以考虑并联系英国的其他利益加以权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索尔兹伯里在1889年和1898至1901年反对与德国确定承担军事义务，格雷在1906至1914年竭力避免确定承担反对德国的军事义务。虽然这使得巴黎和柏林的决策者们感到英国的未来政策令人沮丧地难以捉摸，但它却反映了帕默斯顿

那个仍然被广泛接受的主张，即英国有永久的利益但无永久的盟国。即使允许这样肆意行动的环境随着 19 世纪的结束已在不断缩小，而存在于英国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帝国和大陆之间的利益冲突，战略和财政之间的利益冲突——仍继续按老方式用传统的手法加以解决。

俄国

按照大多数人的估计，沙皇帝国在即将到来的 20 世纪内也会自动成为“世界大国”精英俱乐部的一名成员。它从芬兰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辽阔幅员就保证了这一点。它的为数众多、迅速增长的人口同样保证了这一点。它的人口约为德国的 3 倍、英国的 4 倍。4 个世纪以来，它不断向西、向南、向东扩张，尽管遇到不少挫折，但丝毫没有想停止的征候。它的常备军在整个 19 世纪内一直是欧洲最大的，在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也仍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得多，其前线部队有 130 万，而且号称有多达 500 万的预备役部队。俄国的军事开支也极为巨大，并且除了快速增长的“正常”开支以外还有“特别”拨款，其数额可能等于德国军费的总开支。在 1914 年以前，铁路建设在飞速发展——在短时间内就使德国人首先向西袭击的计划（即所谓施利芬计划）受到被破坏的威胁——并且在日俄战争后还在拨款建立一支新的俄国舰队。甚至普鲁士总参谋部对俄国势力的这种扩张都感到震惊。小毛奇曾断言，到 1916 和 1917 年普鲁士的“敌人的军事力量将强大到普鲁士不知怎样才能对付它的程度”。相反，有些法国观察家则非常高兴地盼望着，总有一天俄国“蒸汽压路机”会向西压来并碾平柏林。同时，有一定数量的英国人，特别是那些与圣彼得堡大使馆有联系的英国人，极力敦促他们的政治首脑人物：“俄国正迅速变得如此强大，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与她的友谊”。从加利西亚到波斯、到北京，都普遍关注着俄国势力的增长。

俄国真的会象这些主张所暗示的那样，正在再次成为欧洲宪兵吗？怎样估计这个国家的真正实力，从 18 世纪至今一直是西方观察家所关心的问题。但由于缺乏作为比较用的资料的可靠来源，也由于俄国人对外国人和对自己人讲的不一样，再加上存在着只依靠完全主观的论述而不顾客观事实的危险，所以进行这样的估计始终是比较困难的。不管对《欧洲如何评价 1914 年以前的俄国》论述得多么详尽，但不同于对《俄国实力》本身的精确分析。

然而，从确实存在的似乎真实的证据中可以看出，俄国在 1914 年以前的几十年内似乎是既强大、**又软弱**——这依旧取决于从望远镜的哪一端来观察。首先，从工业上讲，它现在要比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强大得多。在 1860 到 1913 年这段很长的时期内，俄国工业产量以给人深刻印象的 5%年平均增长率发展着，而到 19 世纪 90 年代，这一增长率已接近 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它的钢产量已赶上法国和奥匈帝国，并远超过意大利和日本。它的煤产量增长更快，从 1890 年的 600 万吨增加到 1914 年的 3600 万吨。它是世界上第二个产油大国。建立已久的纺织业也有发展——纱锭数又远远超过法国或奥匈帝国。同时，还有新发展起来的化学工业和电力工业，更不必说军事工业了。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周围新建了许多往往拥有数千名工人的大型工厂。俄国的铁路网在 1900 年就已经有 31000 英里左右，后来不断增加，到 1914 年已接近 46000 英里。由于俄国在 1892 年采用了金本位制，稳定了对外贸易，从 1890 年到 1914 年俄国对外贸易额几乎增加两倍，成为世界第六贸易大国。不仅俄国政府和铁路债券，而且还有俄国商业潜力都在吸引着外国投资，这给经济现代化带来了大量资金。这笔巨额资金像溪水一样流进国家金融洪流（从不断增加的海关收入和对伏特加酒及其他消费品征收的税款汇集而成的），而国家将这些钱也投入到经济

基本建设中。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到1914年俄国已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工业大国。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它会不会在拥有广阔领土和众多人口的同时，最终也拥有强大的工业力量呢？

但从望远镜的另一端来看，则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即使到1914年俄国工厂中的工人已大约有300万人，那也只占总人口的1.75%，这个比例低得惊人。而且有些工厂例如一个纺织厂雇用了一万名工人，表面上看给人印象颇深，但大多数专家现在都认为，那些数字可能是不真实的，因为在这个劳动力充裕而技术落后的社会中，可以由新来男工和女工们通宵“轮班”使用纱绽。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俄国有一些本国企业家，但是它的工业化程度是靠外国人实现的——例如象辛格这样成功的国际公司以及大批英国工程师——或者至少是由外国投资者创办的。“1914年，90%的采矿业，将近100%的石油开采业，40%的冶金工业，50%的化学工业，28%的纺织工业，都是外国拥有的。”这种情况本身并不奇怪——意大利的情况就有些类似——但它过于严重地依赖外国企业家和资本，的确表明俄国工业的发展，不是依靠本国的资源而是这种办法也许能也许不能（象1899年和1905年那样）维护其利益。到20世纪初期，俄国已是世界上外债最多的国家，并且为了继续吸收外资，必须向投资者提供高于市场平均值的利率；而且对外支付的利息日益大于“看得见的”外贸余额。总之，这是一种危险的状况。

也许这正是俄国经济“不成熟”的另一个标志。而俄国工业的最大部分是纺织和食品加工业（也就是说，不是工程和化学工业）这一事实也是一样。为了保护它那既不成熟、效益又差的工业，俄国的关税率在欧洲是最高的，而且每当增加国防预算和铁路建造时，进口产品大量涌入的现象也随之增加。但最能说明俄国发展落后状态的事实，也许是直到1913年俄国的出口有63%

是农产品，11%是木材。必须不惜一切地用这些东西来支付美国农业设备，德国机床和国家巨额外债的利息——然而还不能完全做到这点。

如果以相对产量来估计俄国的实力，情况就更糟。虽然俄国在1914年以前是第四工业大国，但比美国、英国和德国却落后许多。以钢产量、能源消耗、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例和总工业潜力等一些指标同英国和德国相比就黯然失色了；如果把这些数字同人口数量联系起来并按人平均计算，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在1913年，俄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少于德国的1／4，不足英国的1／6。

在1914年曾使小毛奇和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感到畏惧的俄国，基本上是个农民社会。80%左右的人口以农业为生，其余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也仍然同农村和公社有联系。这一不光彩的事实必须同其他两个事实联系起来看。第一，俄国人口的大量增加——仅在1890到1914年间就增多了6100万张嘴——大都是在农村和最落后（和非俄罗斯）地区，这些地区的共同点是土壤贫瘠、肥料短缺、使用木犁。第二，所有这个时期的国际比较资料都说明俄国整个农业的效益都非常之低——它的小麦产量不足英国和德国的1／3，马铃薯产量约为一半。虽然在波罗的海地区有现代庄园和农场，但在其他许多地区，土地村社所有制的影响和中世纪掠夺式的耕作习惯使农业失去了对个体企业的刺激。土地定期地重新分配也产生了同样影响。增加一个家庭的土地份额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下一次重新分配土地以前尽量多生几个儿子。落后的交通，难以预测而又恶劣的气候对农作物的影响，南方“有剩余”的省份和人口过多、缺少肥料、需要“进口”的老俄罗斯的一些省份之间的悬殊差距，都无助于解决这种结构性问题。结果，虽然农业产量这几十年一直在增长（每年约增长2%），但它的收益却被人口的增长（每年增长1.5%）抵消很多。而

且，因为这个庞大的农业部门使其人均产量每年只增加 0.5%，所以俄国的实际国民生产人均增长情况只约有 1%，远低于德国、美国、日本、加拿大和瑞典。当然，这与大量引用的工业年增长率 5%或 8%的数字大为不同。

所有这一切的社会后果，也是评价俄国实力的一个因素。格罗斯曼教授观察到，"工业异乎寻常的迅速增长，往往会与其他方面，特别是农业和个人消费方面的严重停滞——甚至是大倒退——联系着；而且它还往往会在速度上超过社会的现代化，如果允许这样讲的话"。其实这是句似乎真实的话。因为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国家被妄想"获得并保持欧洲大国地位"的妄想迷住心窍的政治当局推着进入现代化的时代。因此，虽然人们肯定能看到相当多的自发的企业活动，但进行现代化的巨大动力是国家刺激的，并且与军事需要——铁路、钢铁、武器装备等等有关。但是，为了集资购大量进口的外国产品和支付巨额外债的利息，俄国政府必须保证农业出口（特别是小麦）稳定增长，即使在 1891 年大饥荒时期也是如此，有许多年农业输出增长较慢，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剥夺了的生活必需品和营养不足的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而且，为了支付本国在工业化和国防开支方面的巨额投资，必须一再提高高额的（主要是间接的）税收、紧缩个人消费。用经济历史学家的话说，沙皇政府是从求助无门的平民百姓那里"强行"获取他们的积蓄的。因此，出现了令人惊异的现象，"到 1913 年，政府平均从每个俄国人的收入中取走用于目前防务的钱，比英国人平均高出 50%，而俄国人的收入却只有同时期英国人的 27%"。

这种农业落后，工业化和极为沉重的军事开支的病态结合所造成的巨大社会牺牲是不难想象的。在 1913 年，俄国政府给武装部队的拨款有 9.7 亿卢布，但用在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只有 1.54 亿卢布；并且，因为中央政府机构不给地方政府象美国或英国地

方政府所拥有的那种财政权力，所以这种经费方面的不足也不可能从其他方面得到弥补。在迅速发展的城市中，工人们不得不与无排污系统、有害健康的环境、可怕的住房条件和很高的租金作斗争。酗酒现象令人难以想象的出现，这也是一种暂时摆脱残酷现实的方法。死亡率在欧洲是最高的。工厂内强制性的纪律和生活水平没有任何可见的提高，这些情况引起人们对制度的不满，这反过来又为民粹派分子、布尔什维克分子、工团主义者、激进派分子——的确为任何主张巨大变革的人（尽管有检查制度），提供了理想的温床。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1905年动乱以后，局势平静了一段时间。但在1912～1914年这三年中罢工事件、群众性抗议、警察逮捕和屠杀等愈来愈多，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但是，这类骚动如果同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到现今制度的所有俄国领导者都感到惊恐的"农民问题"相比，则相形见绌了。当收成不好和价格上涨时，这两者就同对高租金和恶劣工作条件的不满相互影响，结果导致多次大规模农民爆动。1900年以后的情况，历史学家诺曼·斯通写道：

> 波尔塔瓦省和坦波夫省大部分地区荒芜了；庄园主的住宅被烧毁，牲畜被残害。*1901*年动用军队进行干涉共*155*起（*1898*年只有*36*起）；*1903*年有*322*起，动用了*295*个骑兵连和*300*个步兵营，有的还预备了大炮。*1902*年是整个局面的顶峰。军队被用于镇压农民达*365*次。*1903*年，为了维持国内秩序集结的兵力远远超出*1812*年的军队数量……在中部黑土地带的*75*个行政区中有*68*个行政区发生了"动乱"——*54*个庄园被毁。情况最坏的地区是萨拉托夫。

在1908年以后，为内务部长的斯托雷平试图通过解散农民公社来缓和这种不满情绪时，他只不过是挑起了新的动乱——或是发生在决心保持他们公社制度的村庄，或是发生在新独立而很

快破产的农民中间。因此,"1909 年 1 月,需要动用军队的事件有 13507 起,而那一年(全年)共有 114108 起。到 1913 年,因'攻击国家政权'而被逮捕的人达 10 万"。不用说,这一切使得一支本不心甘情愿的军队疲于奔命,而这支军队还要忙于镇压怀有怨恨情绪的少数民族——波兰人、芬兰人、格鲁吉亚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亚美尼亚人——他们试图维持在 1905~1906 年社会制度脆弱期间在"俄罗斯化"问题上获得的勉强让步。今后任何一次军事上的失败都会再次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在为摆脱莫斯科的统治而奋斗。虽然我们没有确切的统计材料,在 1914 年 8 月结婚的 200 万俄国人中无疑有很大一部分是这些少数民族,目的是为了逃避征兵。

简而言之,人们无需仅仅根据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的观点就可看出,1914 年以前的俄国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的火药箱,假如再发生歉收或工厂工人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多半会引起一场大火,或者——也可能——是一场大战。这里不得不使用"多半会"这个字眼,是因为在许多地区(与这些不满一起)还存在着对沙皇和国家的深厚忠诚、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议会、广泛存在的泛斯拉夫同情心和与之相称的对外国人的憎恨。的确,同 1904 年一样,1914 年还有许多无用的评论家和奉承者坚持认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俄国不应保持沉默。他们强烈主张,如果发生战争,国家应当坚定地支持争取胜利的行动。

但是,俄国面对 1914 年可能的敌手,能保证取得这样的胜利吗?在日俄战争中,俄国士兵非常勇敢沉着地战斗——正象在克里米亚战争和 1877 年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一样——但由于参谋工作不力、后勤支援差、战术莫明其妙而影响了作战效果。现在要以这样状况的部队来对付奥匈帝国——特别是对付具有强大军事工业实力的德意志帝国——能会获得更好的结果吗?尽管在此期间俄国的工业绝对产量有了增加,但可怕的事实是,俄国的生

产能力相对于德国来说实际上是在减少。例如，在 1900～1913 年间，它自己的钢产量从 220 万吨增加到 480 万吨。同样，俄国的能源消耗和总的工业潜力，不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值，都不如德国。最后，还应当注意到，在 1900～1913 年间，由于德国和（特别是）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例急剧增长，所以俄国所占比例从 8.8%下降到 8.2%。发展趋势也不鼓舞人心。

但是有人认为，“用 1914 年衡量军队的标准来看”，俄国还是强大的，因为“一场考验经济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战争正象考验军队的战争一样”，不是军事专家们所能预计的。如果这样的话，人们就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在研究同一时期的德国军事实力时，既注意了克虏伯的钢、造船厂，染料工业和德国铁路的效率，也注意了前线的军队。不管怎样，如果从一些重要的军事数字来看，那么俄国创建从未有过的那么多的师、炮兵连、战略铁路和战舰，这一事实还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的。假如战争持续的时间不长，那么这些一般性统计数字就可说明俄国的实力是在不断增长的。

然而，一撇开这些水面肤浅的统计数字，甚至连军事问题也都变得更难理解了。俄国的社会经济和技术落后又成为了决定性因素。庞大的农业人口意味着，实际上每年只能将 1／5 的适龄青年征召入伍；若把每个健壮的男人都吸收入伍将会把这个制度搞得混乱不堪。而那些新征募的农民也难以成为现代工业化战争的理想兵员。由于把注意力赤裸地过度集中于军事装备方面，而不是放在国家实力更广泛、更微妙的领域（例如，普及教育程度、技术专长、官僚机构的效能），所以俄国在人员素质方面的落后是令人吃惊的。直到 1913 年，它的识字人口占社会比例只有 30%，正象一位专家尖刻评论的那样，这“比 18 世纪中叶英国识字人口所占比例还低得多”。当它极为顺利地投票通过大军征募新兵的拨款时，军队拥有的则是极少受过训练的军士，那又

有多大用处呢？俄国总参谋部的专家们，带着“自卑和妒嫉的心情”看待德国在这方面的实力，认为俄国那样的军队是没什么用的。他们（正象某些外国观察家那样）也意识到了优秀军官的严重短缺。的确，从目前所有的资料来看，俄国军方显然尖锐地意识到了它在各个方面——重型火炮、机枪、对众步兵的管理、技术训练水平、通讯联络、甚至庞大的机群——所存在的弱点。

详细研究一下俄国的动员计划和战略铁路系统，也会得出同样令人沮丧的结论。虽然到1914年铁路网的总英里数似乎已不算少，但把它与沙皇帝国广袤的领土相比——或者与西欧远为密紧的铁路系统相比，就显得很不足了。总之，因为这些铁路许多都造价太低，所以往往路轨太轻，路基太软，储水塔和叉道口太少。机车有的烧煤，有的烧油，还有的烧木材，这就使情况更加复杂化——但比起下述的棘手情况，这又是个小问题了，这一情况就是部队的平时驻地与战时部署地区完全不同，并且受其精心规划的疏散政策的影响（波兰人在亚洲服役，高加索人在波罗的海各省服役，等等）。一旦大战爆发，大批军队要靠不称职的铁路部队人员以某种方式有效地运送，而这些人员“1／3以上是文盲或半文盲，3／4的军官未受过技术训练”。

由于俄国对法国和塞尔维亚承担了义务而引起的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使动员和部署问题更加恶化。为了这个国家铁路系统效率不高，并且部署在波兰突出地带的部队容易受到来自东普鲁士和加利西亚的可能的“钳形”攻击，所以在1900年以前对俄国最高统帅部来说，在战争开始时处于守势，并不懈地增强其军事实力，看来是审慎的。的确，有些战略家在1912年还主张这样做。但是更多的将军们则渴望打败奥匈帝国（他们有信心取胜），并且因为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所以一旦奥匈帝国侵略西利西亚，即帮助后者。但是，由于俄国害怕德国会采取行动，所以不可能把它的部队集结在南部前线。在

1871 年以后的几十年内，计划制定人员一直设想，俄德战争将以德国人向东大规模快速突然袭击开始。但当施里芬计划大纲昭然若揭时，圣彼得堡受到法国的巨大压力，要尽快地向德国发动进攻，以便援救它的西方盟国。由于担心法国被消灭，加之巴黎坚决主张进一步提供贷款要同提高俄国的进攻能力相联系，这就迫使俄国计划制定人员同意尽可能快地向西发动进攻。在 1914 年以前的几年当中，所有这一切在总参谋部内引起了激烈争论。对于诸如要多少个军部署在北线而不部署在南线，要否拆除波兰的旧防御工事（在这些要塞中荒唐地安装了许多新式大炮），以及是否有可能其部分动员而不全部动员等问题，出现了各派不同意见。鉴于俄国所承担的外交义务，这种矛盾心理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无助于达到使军事机器顺利运转的目的，而这是迅速战胜敌人的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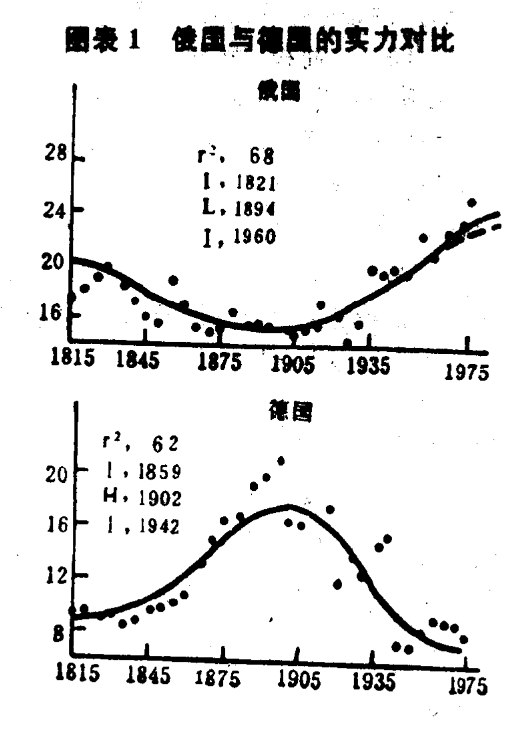
这类问题可能已发展到几乎令人作呕的程度。俄国的 50 个骑兵师，对于一个很少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可是这支骑兵队伍大约有 100 万匹马!——需要大量的饲料，单这一项就可能使俄国铁路系统陷于瘫痪；供应干草无疑会减缓任何一次的持久性的进攻行动，甚至会影响后备部队的调动。因为它的运输系统落后和武装部队所担负的国内治安任务，它号称的几百万士兵在战时并不都能成为前线部队。而且，虽然在 1914 年以前给军队的拨款总数似乎相当巨大，但很大部分都花在食物、服装和饲料等基本需要上了。类似的情况是，尽管大规模地扩充了舰队，并且许多新设计的船只被描述为“性能极好”，但海军仍需要水平高得多的技术训练和在它的人员中更经常地进行战术实践练习，以使它们真能作战。由于以上两者都不具备（水兵仍然主要以岸上为基地），并且被迫将它的舰队分驻在波罗的海和黑海，所以俄国海上力量的前景并不好——除非它只与土耳其人打仗。

最后，在对这个时期的俄国全部能力进行评价时不可避免地要对它的政权本身作些评论。虽然某些外国保守人物赞赏俄国的专制和集权制度，坚持认为这一制度比西方民主制度更能使国家政策具有连贯性和力量，但如果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种制度有无数的缺陷。沙皇尼古拉二世作为个人来讲象个波将金村民，头脑简单，深居简出，不喜欢处理难题，并且盲目相信他同俄国人民的神圣关系（当然，他对人民的真正福利并无兴趣）。政府更高层的决策方法足以给“拜占庭主义”一个坏名称：不负责任的大公、感情容易激动的女皇、反动的将军和腐败的投机商，他们的权力远远超过政府可以容纳的，并且只能偶尔才能向沙皇进言的众多勤奋而聪明的部长们。各部之间，比如外交部和军方之间缺乏协商和理解的状况，有时令人吃惊。宫廷对议会（杜马）采取公开蔑视的态度。在贵族只关心自己的特权、沙皇只关心自己心情的平静这样的气氛中，要实现激进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在这里，统治集团总是害怕工人和农民骚动。而且，虽然从绝对值来讲俄国政府的开支是世界上最多的，但它对富人征收的直接税却最少（占国家年收入的6%），而把沉重的税收负担放在粮食和伏特加酒上（约占40%）。在这里，国家的支付能力很脆弱，由于俄国贵族把钱花在国外所造成的资金大量外流国家对这些资金也无法进行征税，由于严酷的专制传统、缺陷极多的等级制度和低水平的教育和薪金，致使俄国缺乏象在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国能推动行政系统进行工作的那样有能力的文职骨干官员。俄国实际上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由于领导人的不断更迭，它仍然会盲目地、毫无准备地卷人对外纠纷，而不吸取1904年的教训。

那么，我们应怎样估价这些年来俄国的真正实力呢？它在工业和军事方面年年都在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它还拥有其他许多实力——军队的规模、社会某些阶层中的爱国主义和使命感、

几乎无懈可击莫斯科心脏地区——这也是确实的。在对付奥匈帝国、土耳其，现在也许还能在对付日本的战争中，它都具有打赢的良好前景。可怕的是，与德国隐隐出现的冲突来得过早了，使俄国不知所措。斯托雷平在1909年曾夸口说:“假如给俄国20年的国内外和平，你就会认不出俄国了。”这可能是真的，尽管德国的实力在同一时期内似乎也能提高。但根据多兰和帕森斯两位教授统计的资料（见图表1），俄国在这几十年内“相对实力”正在从1894年以后的低点开始上升，而德国则已接近其巅峰了。

图表1　俄国与德国的实力对比



注：L＝低点年份

H＝高点年份

I＝转折点年份

材料来源：多兰、帕森斯

虽然这样的描述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可能过于图式化了，但是在 19 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俄国的实力和影响大致与其经济日益落后成比例地衰退，这倒确实是真的（如前所述）。每爆发一次重大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都暴露了军事上的老弱点，并迫使俄国政府尽力争取缩小俄国同西方国家拉开的距离。在 1914 年前的几年里，对某些观察家来说似乎这一差距又在缩小了，尽管对另一些观察家来说仍然存在多方面的弱点。因为没能有斯托雷平所要求的 20 年和平，所以不得不再次通过战争的考验，看看它是否已恢复到 1815 年和 1848 年它在欧洲强权政治中所拥有的地位。

美国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在全球力量对比方面所发生的全部变化中，对于未来最具决定性作用的无疑是美国的崛起。在整个南北战争期间，美国能够发挥前述的许多优势——富饶的农田、丰富的原料，以及开发这些资源的现代技术（铁路、蒸汽机、采矿设备等）奇妙地适时发展。由于没有社会和地理条件的限制，没有明显的外来危险，大量外国的和本国的投资日益增长——这些投资以使人目眩的步伐使美国改造着自己。例如，在 1865 年内战结束到 1898 年美西战争爆发的这段时间内，美国小麦产量增加 256%，玉米产量增加 222%，精糖增加 460%，煤增加 800%，钢轨增加 523%，铁路运营公里数增长 567%以上。“在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其增长速度几乎是从零开始，用百分比来加以说明已毫无意义。例如，原油从 1865 年的 300 万桶增加到 1898 年的 5500 余万桶，钢锭和铸件产量从不到 2 万长吨增加到近 900 万长吨。”这种增长势头并未因对西班牙的战争而停止；恰恰相反，在整个 20 世纪初期仍以同样迅速的步伐继续增长。的确，正因拥有上述优势，才自然而然取得全过程的成绩。这也就是说，只有长期愚昧、常年内战、自然灾害方能妨碍这种发展—

—或者阻碍为了淘金漂洋过海而来美并扩大了美国劳动大军的数百万移民。

美国似乎拥有某些其他大国部分拥有的全部经济优势，而没有其他的劣势。它幅员辽阔，到 1914 年已拥有大约 25 万英里铁路，使交通大为方便（俄国当时拥有 4.6 万英里铁路，但延伸的面积却超过美国的 2.5 倍）。美国农业的每英亩产量一直超过俄国，并且即使它的产量永远达不到西欧集约化农业地区那样高的产量，它的已耕面积、农机效率以及不断降低的运输费用（因为铁路和船运发达）也能使美国的小麦、玉米、猪肉、牛肉以及其他农产品的价格都低于欧洲任何国家。从技术上讲，美国一些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例如，国际收割机公司、辛格、杜邦、贝尔、科尔特和标准石油等公司，都相当于，甚至往往优于世界任何其他公司；并且它们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经济规模，而它们的德国、英国和瑞士竞争者则没有这样的条件。在俄国，工厂“大型化”并不是工业效益的良好标志；而在美国，一般来说则是这样。例如，“当 1901 年安德鲁、卡内基把美国钢铁公司售给 J.P.摩根财团时，其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的总产量”。当著名的英国战船设计师威廉·怀特在 1904 年周游美国时，他惊奇地发现在美国各造船厂正在同时建造 14 艘战舰和 13 艘装甲巡洋舰（虽然令人惊奇的是美国商船队仍然还很小）。在工业、农业和通讯方面，效率既高，规模又大。所以，到 1914 年美国国民收入，无论是绝对值还是人均值，都远比任何其他国家要高，这是毫不奇怪的。

表 21 及其他一些有关的比较统计数字都反映了这种迅速发展的结果。1914 年，美国产煤 4.55 亿吨，远超过英国的 2.92 亿吨和法国的 2.77 亿吨。它是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铜的最大消费国。它的生铁产量大于仅次于它的 3 个国家（德国、英国和法国）产量之和。它的钢产量几乎等于仅次于它的 4 个国家（德

表 21　1914 年各大国的国民收入、人口和人均收入

	国民收入	人口	人均收入
美国	137(亿美元)	9800(万)	377(美元)
英国	110	4500	244
法国	60	3900	153
日本	20	5500	36
德国	120	6500	184
意大利	40	3700	108
俄国	70	17100	41
奥匈帝国	30	5200	57

国、英国、俄国和法国）的产量。1913 年它的现代燃料的能源消耗等于英国、德国、法国、俄国和奥匈帝国的总消量。它生产和拥有的汽车比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实际上它才是一整个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其发展之快，已接近于超过整个欧洲的程度。有一种计算认为，的确，如果这样的增长率继续下去，并且能避免一次世界大战的话，那么到 1925 年美国就会超过欧洲而成为拥有世界最大经济产值的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老牌大国遭受经济损失和失调，使美国提前了 6 年，到 1919 年就实现了上述的计算，甚至在 1914 年的大灾难以前，“瓦斯科·达·伽玛时代”——欧洲统治世界的 4 个世纪——就即将结束了。

对外贸易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确实不大（1913 年外贸收入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8%左右，而英国占 26%），但它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冲击却相当可观。从传统上讲，美国出口原料（特别是棉花），进口成品，并且靠黄金出口来弥补“有形”贸易中通常的赤字。但内战以后，工业化的飞快发展完全改变了这种模

式。随着美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制品生产国，它开始将它的农业机器、钢铁制品、机床、电气设备以及其他产品打入世界市场。与此同时，北部实业家院外集团势力非常强大，它能保证用越来越高的关税将外国产品抵制于国内市场之外；相反，原料或某些特殊商品（象德国的染料）则大量进口，以供美国工业之需。当美国工业品的大量出口成为最重要的变化时，“运输革命”则推动了美国的农业品的出口。，由于1900年以前的半个世纪内将小麦从芝加哥运到伦敦的运费从1蒲式耳40美分急剧降低到10美分，于是美国农产品越过大西洋涌向欧洲。玉米出口在1897年达到最高峰，为2.12亿蒲式耳，小麦出口1901年达到2.39亿蒲式耳；这一浪潮还包括谷物和面粉、肉类和肉制品。

当然，这种商业转变的后果主要在经济方面，但也开始影响到国际关系。美国工厂和农场的过高生产能力引起了广泛的忧虑，人们担心甚至是美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可能不久也无力吸收这些产品，因而促使一些大财团（中西部农场主以及匹兹堡一些钢铁生产者）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给予各种帮助以开拓或至少保持海外市场的开放。鼓动保持对中国的“门户开放”以及为使美国成为拉丁美洲的主要经济力量所表现出的巨大兴趣，只是美国扩大在世界外贸中所占份额所关心的两个具体表现。在1860到1914年间，美国出口增加6倍多（从3.34亿美元增加到23.65亿美元），而由于有效地保护了自己的市场，进口只增加了4倍（从3.56亿美元增加到18.96亿美元）。面对廉价美国产品大量涌进的情况，欧洲大陆农场主们鼓动提高关税——他们通常也能达到要求；英国，为了换取自由贸易，已经牺牲了它的谷物农场主们的利益，但这时由于美国机器和钢铁大量涌进也产生了警惕。当新闻记者W·T·斯蒂德耸人听闻地写道“世界在美国化”——这是他1902年出版的一本著作的书名——的同时，威廉皇帝和欧洲其他领导人则暗示有必要联合起来对付“不公平”的美国

贸易巨人。

但是更能促使不稳定的也许是美国对世界金融体系和货币流通的冲击，虽然这点还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到。因为美国在同欧洲的贸易中有巨大顺差，所以欧洲的逆差必须靠资金转移来弥补——使欧洲大量投资直接进入美国工业、公用事业和服务性行业(到 1914 年总共约为 70 亿美元)。虽然这些金条的西流可以通过欧洲投资的利润和美国支付海运、保险等服务性费用而回收一些，但消耗还是很大的，并在不断增加；而这一情况又因为美国财政部的争取积聚世界黄金储备近 1／3 的政策（随后已被搁置起来）而更加恶化。此外，虽然美国现在已成为全球贸易完整体系中不可分的一部分——这部分同原材料供应国的贸易有逆差，而同欧洲的贸易有巨大顺差——但它自己的金融结构还不发达。例如，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用英镑进行的，伦敦起着黄金最后债权人的作用。由于没有能够控制金融市场的中央银行，由于纽约与大草原各洲之间的巨额资金季节性的流入和流出完全取决于谷物的收成和多变的气候，同时也由于一些投机商不仅能扰乱国内货币体系而且还经常扰乱对伦敦黄金的需求，所以美国在 1914 年以前的几年内已经变成为一个巨大的但又无法预测的风箱，它不仅能煽动世界贸易体系，而且有时也能戏剧性地使之冷却下来。1907 年的美国银行危机（最初是由于投机商们企图垄断铜市场而引起的）也影响到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汉堡，这只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冲击着其他大国经济生活的一个例子。

美国工业实力和海外贸易的这种崛起，也许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更为强硬的外交和美国浮夸风格的“世界政治”。即主张世界各国人民都具有特殊的道义上的天赋，这正是美国对外政策比旧世界高明之处，但这一主张掺杂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论点，同时也掺杂着工业和农业压力集团获取海外市场的强烈愿望。传统的，也许经常是被夸大的关于门罗主义受到威胁的警

告，常是伴随着美国跨越太平洋去履行它的“天命论”。虽然美国仍须避免纠缠于结盟之中，但国内许多集团现在极力敦促它开展更积极的外交——在麦金利、（特别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政府领导下正是这样做的。1895 年就委内瑞拉边界争端同英国发生了争吵——从门罗主义来看是正当的——3 年以后又在古巴问题上同西班牙进行了更加戏剧性的战争。华盛顿要求单独控制地峡运河（代替过去的与英国共管安排），不顾加拿大的抗议重新划定阿拉斯加边界，以及 1902～1903 年在德国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后美国在加勒比地区做好舰队作战准备，以上这些都表明美国决心在西半球不受其他任何大国的挑战。然而，作为这种态势的“必然结果”美国政府已表现出要对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诸如尼加拉瓜、海地、墨西哥、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外交压力和军事手段进行干涉的意愿，如果它们的行为不符合美国准则的话。

但是，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真正特点是它干涉和参与西半球**以外**的事件。它出席 1884～1885 年柏林西非会议是反常的和莫名其妙的；在美国代表团作了赞成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的冠冕堂皇的发言之后，却从未批准后来签订的协议。直到 1892 年《纽约先驱报》还建议取消国务院，因为它在海外可做之事太少了。1898 年与西班牙的战争改变了这一切，不仅使美国在西太平洋（菲律宾）获得了一块立足之地，使它得以成为某种类型的亚洲殖民大国，而且还使赞成强硬政策的人们政运亨通。次年国务卿海·约翰的“门户开放”照会，就是美国希望在中国拥有发言权的早期表示，这同 1900 年美国派遣 2500 人的军队参加国际联军到中国恢复秩序一样。罗斯福甚至表示了参与“**大国政治**”的更强烈的意愿，他在导致日俄战争结束的谈判中起着调停者的作用，他坚持美国参加 1906 年关于摩洛哥问题的会议，并且与日本和其他大国进行谈判，企图维护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后来的学者们把大多数这样的行为并不看成是基于对美国在世界上

的真正利益的清醒估计，而是更多地反映他们外交政策风格不成熟、种族中心主义的天真和希望给国内外群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愿望——这些特征将使美国未来的"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复杂化；但即使真是这样，在这帝国主义分子的高调和民族主义分子的自豪的时代里，美国也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如何，除对中国事务外，罗斯福的继任者们都未能坚持这种积极主义的外交，他们更喜欢保持美国不受西半球以外的国际事务的影响。

在开展这些外交活动的同时，美国也增加了军备开支。在两个军种中，海军得钱最多，因为一旦受到外国进攻（或是对门罗主义的挑战），海军是美国防御的前线，并且也是在拉丁美洲、太平洋和其他地区支持美国外交和商业活动的最有用的手段。在19世纪80年代末已经开始重建舰队，但最大的推动是美西战争的时候。因为在那次战争中海军得以轻易取胜似乎证明了马汉海军上将和"大海军"院外集团的观点的正确，并且因为战略家们一直担心与英国打仗的可能性和随后从1898年开始又担心与德国打仗的可能性，所以一直不断地在建造战舰。在夏威夷，萨摩亚群岛，菲律宾和加勒比地区取得海军基地，使用海军船只在拉丁美洲充当"警察"，以及1907年罗斯福派遣他的"白色大舰队"环行世界的戏剧性的行动，似乎都在强调海上力量的重要性。

结果是，1890年的海军经费为2200万美元，只占联邦政府支出的6.9%，而到1914年，分配给海军的经费为1.39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支出的19%。这些钱并非都使用得当——国内舰队基地太多（当地政治压力的结果）而护卫舰只太少——但结果还是给人印象颇深。虽然美国海军要比英国皇家海军小得多，"无畏"级战舰也比德国少，但在1914年它仍然是世界第三个最大的海军。甚至美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的建造，也没能使美国计划人员从这样一个困境中摆脱出来，即是把舰一分为二，还是听任美国某侧海岸线暴露给敌人；一些官员在这些年的记录，暴露

了美国对别的大国抱有的类似妄想狂的怀疑。实际上，假如美国在20世纪初能与大不列颠重归旧好，那么它会是非常安全的；即使害怕德国海上力量的增长，但它也远没有必要象任何其他大国那样感到担忧。

美国军队的规模不大，从许多方面反映了它的安全状况。陆军也是被美西战争推动发展的，至少这次战争使公众意识到军队规模实际上有多么小，国民警卫队混乱到何种程度，早年在古巴的战役多么接近于一场灾难。1900年以后正规陆军的规模扩大了两倍，并且在菲律宾和其他地方增加了驻防任务，但同塞尔维亚或保加利亚这样中等欧洲国家相比，美国陆军看起来依然很不安。与英国相比，美国甚至对搞大量常备军抱有一种无所顾忌的厌恶情绪，并且避免对盟国承担固定的军事义务。它的防务开支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因此，尽管它在1898～1914年间有过帝国主义行为，但正象社会学家赫伯特·斯潘塞所说的，它仍然是个“工业”社会，而不象俄国那样是个“军事”社会。因为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超级大国的兴起”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所以还是值得说一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和美国之间的惊人差别。俄国拥有的前线陆军约为美国的10倍；但是美国的钢产量为俄国的6倍，能源消耗为俄国的10倍，工业总产值为俄国的4倍（按人均产值计算，美国为俄国的6倍）。毫无疑问，对于欧洲各国总参谋部来说，从能将大量有用部队迅速投入战争方面考虑，俄国似乎更为强大；但从所有其他标准来看，则是美国强而俄国弱。

美国的确已成为一个大国。但它并不是大国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由于总统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划分使得积极结盟政策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而且也显然没有一个人喜欢放弃目前十分舒适的隔离状态。美国与其他强国相隔有数千哩的海洋，拥有一支微不足道的陆军，满足于已有的半球控制权，并且至少在罗斯福离职

后并不热心从事全球性外交，所以美国在1913年仍站在大国体系的边缘。而且，因为其他国家在1906年以后大都把注意力从亚洲和非洲转向巴尔干和北海的开发，所以毫不奇怪，刚进入20世纪前后的时期相比，它们趋向于把美国看成是国际力量平衡中一个不那么重的因素。这是1914年以前另一个共同的假设，但是大战本身将证明它是错误的。

三、联盟和走向战争（1890～1914年）

了解这几十年内大国体系变化方式的第三个和最后一个因素，是研究从俾斯麦去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内反复无常的同盟外交。虽然在19世纪90年代发生过一些较小规模的冲突（中日战争、美西战争、布尔战争），并且后来在日俄战争中还有过一次规模较大但仍能算是局部性的冲突，但从那时以后，总的趋势，用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的话说，就是联盟集团的“固定化”。与此同时，大多数政府都期望在下次大战爆发时，它们将会是某个同盟的成员。因为结盟既能带来好处也会带来不利，这就使得对国家相对实力的估计变得更加重要也更复杂。

当然，结盟外交的趋势在当时并未影响到遥远的美国，并且只是通过1902年和1905年的英日同盟在地区范围内冲击着日本。但是，由于这些年来相互间产生的恐惧和敌视，结盟外交越多越影响着所有的欧洲大国，甚至是英伦三岛。在和平时期建立固定的军事同盟——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是1879年由俾斯麦开始的，当时他试图通过建立奥德同盟来“控制”维也纳的对外政策，并吓退圣彼得堡。根据这位德国宰相的暗地盘算，这一行动的目的还在于诱使俄国放弃它的“反复无常的政策”，并且回到它们曾维持过一段时间的“三皇同盟”上来。但是，俾斯麦的行动留下的延续时间较久的遗产是，德国保证在奥匈帝国万一受到俄

国进攻时，能给以援助。到1882年，伯林和罗马也缔结了一个类似的互助协议，以防受到法国进攻。次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又双双搞出另一个秘密盟约，以帮助罗马尼亚对付俄国的侵略。研究这种外交政策的学者们强调，俾斯麦主要考虑的是短期的和防御性的——安慰一下维也纳、罗马和布加勒斯特神经紧张的朋友们，在外交上孤立法国，为防俄国侵犯巴尔干准备"退却"阵地。无疑这是真的。但事实上俾斯麦已作了保证，而且即使这些秘密条约的确切性并不为人知，它也会使法国和俄国都担心它们自己被孤立，并且猜想柏林这个幕后大操纵者已建立起一个难以对付的同盟，以便在战时能压倒它们。

虽然俾斯麦自己通往彼得堡的"秘线"（所谓1887年的再次保证条约）防止了德国与俄国之间的正式破裂，但在19世纪80年代末，为了防止法俄稳步地走向结盟，这位宰相在他的这些奇特的、带有欺骗性的活动中也确有某些人为的和冒险的成份。法国收回阿尔萨斯——洛林的愿望和俄国向东欧扩张的愿望，主要都是因为害怕德国而未敢行事。法国和俄国都没有其他有名的大陆盟友；相互的利益促使他们彼此接近，俄国需要法国的贷款和武器，法国需要俄国的军事援助。虽然由于资产阶级的法国与反动的沙皇制度之间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差别而使这一趋势减缓了一段时间，但1890年俾斯麦的退休和威廉二世政府的更具威胁的行动促成此事。到1894年，形成法俄"两国同盟"抗衡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三国同盟"的局面，只要"三国同盟"存在，法俄相互承担的这种政治和军事义务就将继续下去。

形势的这一新发展从许多方面似乎稳定了欧洲局势。两个同盟集团之间存在着大体均势，使得大国冲突的可能性比以往也减少了。法国和俄国在摆脱它们的孤立状况转向关心非洲和亚洲事务。阿尔萨斯和保加利亚紧张局势的缓和也有助于局势的稳定。的确，到1897年，维也纳和圣彼得堡同意将巴尔干问题搁置起

来。此外，德国也转向“世界政治”，而意大利则以其独一无二的方式卷入阿比西尼亚纠纷。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南非、远东、尼罗河谷和波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也就是“新海军主义”时代，各大国都深信海军和殖民地是自然而然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因而竞相建立它们的舰队。因此，毫不奇怪，在这10年当中，大英帝国虽然一般不参与欧洲纠纷，但它已感受到来自法国和俄国等老对手以及后来的象德国、日本和美国等新的竞争者最沉重的压力。在这样情况下，欧洲各同盟集团的军事条款的重要性看来已越来越不切合实际了，因为象英法在法索达的冲突(1898年)、布尔战争或在中国争夺租借地等，这时已不会触发一场全面战争。

但是，把眼光稍微放远一些，就会看到这些帝国主义的竞争必会影响，甚至是在大国间的关系，到进入20世纪时，对大不列颠帝国的压力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使得在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周围的一些人士要求结束“光荣的孤立”并同柏林结盟，而那些同僚部长们，诸如鲍尔弗和兰斯多恩，开始承认需要外交妥协。在巴拿马运河、阿拉斯加边界、猎捕海豹等问题上英国对美国的一系列让步——在“英美友好”的名义掩护下——使英国摆脱了在西半球战略上难以防守的地位，而更重要的是，大大改变了19世纪政治家们认为当然的看法：英美关系永远是冷淡的、勉强的和偶而敌对的。1902年在英日建立联盟时，英国的政治家也是想借此减轻一下英国在中国的困难战略负担，尽管这在一定条件下要以支持日本为代价。而且，到1902～1903年，一些有影响的英国人士认为，有可能在殖民地问题上同法国妥协，而法国早在法索达危机时就已表示不愿为尼罗河问题进行战争。

虽然所有这些安排似乎首先关心的只是欧洲以外的事务，但它们都间接地影响着各大国在欧洲的地位。英国在西半球的战略困境得到解决，加上它在远东得到日本舰队的支持，这就减轻了

皇家海军在海上部署兵力的一些压力，加强了它在战时巩固自己地位的前景；而英法对抗的解决意味着英国的海上安全甚至得到更大的加强。这一切也都影响到意大利，它的海岸线实在太易受攻击，不容它把自己置于与法英联合相对抗的阵营；在任何情况下，到20世纪初的几年里，法国和意大利都有各自希望改善关系的良好理由（财政上的和北非问题的）。然而，如果意大利退出"三国同盟"，那就必定影响它与奥匈帝国若明若暗的争吵。最后，甚至遥远的英日联盟也会对欧洲国家体系产生影响，因为当日本在1904年决定就朝鲜和满洲前途问题向俄国挑战时，英日联盟使得任何第三国都不可能介入。而且，当日俄战争爆发时，英日条约的特殊条款和法俄同盟有力地促使作为交战双方"第二国"的英国和法国，相互打交道以避免被公开卷入冲突。因此，如果日本在同一个敌国交战，英国应保持"善意中立"，但如果日本，在同数个敌国交战，英国则必须提供军事援助；法国同意帮助俄国使用了类似的语言。因此，除非伦敦和巴黎都同意置身于战争之外，否则它们之间新建立的友谊将被毁掉。毫不奇怪，远东爆发的敌对行动很快就使伦敦和巴黎结束了它们关于殖民地问题的争吵，并且达到1904年4月的谅解。最初因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而引起的英法对抗的年代现在已经过去。

但如果没有另外两个因素，既使有以上所述一些情况，也不会引起1904～1905年著名的"外交革命"。首先是英法两国对德国疑惧日益加深。因为德国宰相比洛和德皇威廉二世宣称"德国世纪"即将到来，虽然它的目的还不清楚，但看起来是具有野心和对人危险的。到1902～1903年，德国"公海舰队"的航程和结构都显示出它主要是针对英国而建立的，这就促使英国海军部要认真考虑反击措施。再有，德国对奥匈帝国的意图使得巴黎心神不安，而它对美索不达米亚的野心又使英帝国主义者感到厌恶。这两个国家怀着日益增长的愤怒心情，注视着比洛为挑起1904

年的远东战争并使英法卷入进去而进行的外交努力——在这次事件中，柏林是主要的受益者。

对欧洲均势和国家关系产生更大影响的是在这次战争中日本海军和军事上的巨大胜利和 1905 年间俄国的普遍骚乱。随着俄国在以后的几年内出乎意料地降为二等大国，欧洲的军事平衡决定性地偏向柏林——法国要对抗德国其前景现在也比 1870 年时更糟。如果说德国有向西进攻的适宜时机，那大概就是 1905 年夏天。但是，德皇担心国内社会动荡不稳，他希望改善同俄国的关系，同时对英国怀有疑虑，因为英国从中国到英国领海重新部署了战舰，并在考虑一旦德国真地发动进攻，将给予法国援助，所有这些都对德国政策有所影响。柏林不愿陷入战争，而是选择了外交取胜的作法，迫使其首要敌人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辞职，并坚决主张召开国际会议以制止法国对摩洛哥的权利的要求。但因大多数与会国支持法国在摩洛哥拥有特殊地位的要求，所以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结果无情地证实了德国的外交影响比俾斯麦时期已下降到何种程度，尽管其工业和海、陆军实力仍在增长。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使国际竞争从非洲又回到欧洲大陆。这一趋势很快因三个更重要的事件而得到加强。第一个事件是 1907 年英俄在波斯、西藏和阿富汗问题上达到谅解，这本身是个地区性事务，但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清除了在整个 19 世纪各大国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伦敦与圣彼得堡之间的那些亚洲争端，从而减轻了英国在印度的防务，而且也促使神经紧张的德国人去讨论在欧洲“被包围”的问题。同时，尽管仍有许多英国人，特别是在自由政府中，尚未把自己看成是反德同盟的组成部分，但他们的理由却被第二个事件削弱了，这就是：1908～1909 年激烈的英德“海军竞赛”，其结果是使德国蒂尔皮茨的造船计划进一步增加，而英国则害怕甚至会失去它们的海军在北海的领先地位。当英国在此后的三年内试图缓和这种竞争时，德国就要求伦

敦在欧洲发生战争时保持中立，这使得多疑的英国人逐渐后退了。它们和法国忐忑不安地注视着1908～1909年的巴尔干危机。在这次危机中，俄国对奥匈帝国正式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省非常愤怒，这一吞并导致德国要求俄国接受既成事实，否则要对后果负责。俄国人因在最近的对日战争中受到削弱，所以屈从了。但是这种外交恫吓的做法在俄国产生爱国主义反应，使俄国增加了国防费用，并且决心更紧地依靠某个同盟。

因此，尽管在1909年以后偶尔还在一个首都和另一个首都之间试图达成一项谅解，但是"固定化"的趋势都在加强。1911年发生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当时英国强硬地进行了干涉，支持法国反对德国，而危机结果导致在法、德两个国家中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并且当民族主义分子公开谈论未来冲突时，两国都大规模扩充了军队；而在英国，这次危机则促使政府开始正视陆军和海军为一旦参加一项欧洲战争制定计划出现的分歧。一年以后，英国部长霍尔丹勋爵在柏林的外交使命失败和德国舰队的进一步扩大，促使伦敦于1912年11月签订了妥协性的英法海军协定。就在这时，巴尔干同盟各国也仿效，意大利军队对土耳其发动了机会主义的进攻，在这个同盟的成员国为战利品而争吵之前，实际上已将奥托曼帝国赶出欧洲。这一古老"东方问题"的复活是所有事件中最严重的一件，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大国实际上不能真正控制住对抗中的巴尔干各国对自身利益的狂热追求；另一方面是因为某些新的发展看来已威胁到某些大国的切身利益；塞尔维亚的兴起使维也纳感到恐慌，德国对土耳其的军事影响日益增长使彼得堡感到害怕。1914年6月斐迪南大公遇刺激起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了行动和后来俄国进行了报复。这些都证明在旧的陈词滥调中也确有一些真理，即大公之死只不过是点燃火绒盒的一个火花。

1914年6月的暗杀是历史上由一次特殊事件引起全面危机，然后爆发世界大战的尽人皆知的例子之一。奥匈帝国对塞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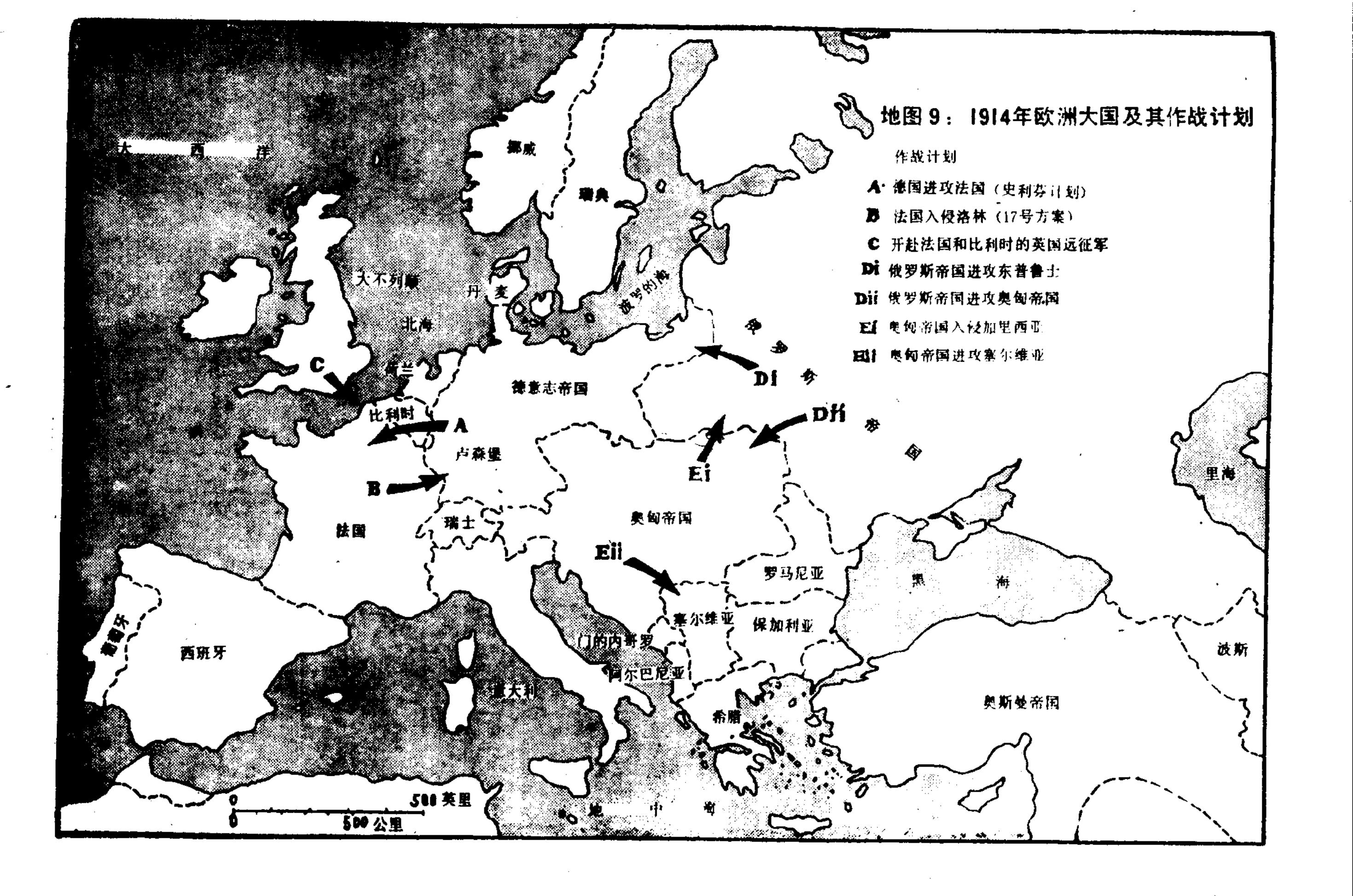
维亚的要求，它对塞尔维亚和解性的答复予以拒绝，以及它对贝尔格莱德的攻击，导致俄国为帮助它的塞尔维亚盟国而进行了战时动员。而这反过来又使普鲁士总参谋部迫切要求立即实现施里芬计划，也就是经过比利时向西对法国进行先发制人的进攻——这又进一步把英国卷了进去。

虽然在这场危机中每个大国都是按照自己认为的本民族利益行事，但它们决定战争也受到各自的作战计划的影响，这也是千真万确的。1909 年以来，德国向奥匈帝国不仅作出外交上的而且作出军事上的保证，事态到了这种程度是俾斯麦从未考虑到的。而且，不论战争的具体起因是什么，德国的作战计划总是要经过比利时向法国进行直接的大规模突袭。相反，维也纳的军事计划人员却仍在为几条不同战线而犹豫不决，但首先在塞尔维亚进行打击的决心在不断增强。在法国贷款的推动下，俄国保证更快地进行动员，并且一旦战争爆发就向西攻击；同时，还根据不太充分的理由，法国在 1911 年通过了著名的第十七号计划，其中包括轻率地向阿尔萨斯——洛林发动袭击。同时，意大利站在三国同盟的盟友一边共同作战的可能性已大为减少，而在万一德国进攻比利时和法国时英国在欧洲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却更大了。不用说，各国总参谋部无疑都会设想到，**速度**是最根本的。也就是说，一旦象是有可能发生冲突，最重要的是抢在敌人之前动员自己的部队并将它们部署到边界前后。如果这种想法对柏林来说特别确切，因为德国陆军必须保证先在西方击败敌人，然后回师向东对付行动缓慢的俄国，那么同样的想法在其它地方也会盛行。一旦真地发生重大危机，那么在战略计划者们接管权力以前，外交家们也没有很多活动时间了。

回顾起来所有这些战争计划值得注意之点不仅在于它们就象一副多米诺骨牌，头张一倒，其余随之倒。而且，重要之点还在于，因为当前同盟战争似乎较之，例如，1895 年或 1870 年的战

争更为合理，所以冲突拖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点。对 1914 年 7 至 8 月开始的战争将于“圣诞节前结束”这一臭名昭著的错误估计，通常用以搪塞的说法是，因为没有料到速射火炮和机枪使机动性作战成为不可能，并迫使大量军队躲进堑壕，因而也就很难将他们逐出阵地；后来乞灵于远程炮击和大量步兵进攻也未能解决问题，因为炮击只能弄得阵地尘土飞扬，并向敌人指明进攻的地点。也有人几乎用同样搪塞办法争辩说，欧洲各国的海军部对即将爆发的战争也估计有误，它们只作了战舰相互遭遇时进行决战的准备，而没有适当注意北海和地中海的地形以及水雷、鱼雷和潜艇等新武器也使舰队难以按传统方式进行作战。因此，不论是海上还是陆上，都是由于技术原因而不可能快速取胜。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但它需要和同盟体系本身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如果允许俄国单独进攻奥匈帝国，或者如果允许德国重演它们在 1870 年对法国的战争而且其它大国保持中立，那么两者胜利的前景（即使稍有推迟）终究都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这些联盟意味着，即使一个交战国在某次战役中遭受重创或者发现自己的资源不足以继续维持战斗，但由于有希望获得或已得到许诺可以获得盟国的帮助而促使它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再往后看一下，法国在损失惨重的尼韦勒进攻和 1917 年的兵变之后能够艰难地坚持下来，意大利在 1917 年卡波雷托失败之后能够艰难地避免崩溃，奥匈帝国因在 1916 年遭受极大损失（或者甚至是 1914 年在加利西亚和塞尔维亚的失败）之后仍能艰难地继续战斗，无一不是由于及时得到各自盟国的支援。因此，同盟体系本身实际上决定了战争不能速战速决，而反过来这又说明，在这种拖延时间很长的战争中，——正象在 18 世纪的大规模同盟战争中一样——胜利将属于陆海军和金融、工业、技术资源两方面综合实力最强的一方。


地图9：1914年欧洲大国及其作战计划
作战计划
A 德国进攻法国（史利芬计划）
B 法国入侵洛林（17号方案）
C 开赴法国和比利时的英国远征军
Di 俄罗斯帝国进攻东普鲁士
Dii 俄罗斯帝国进攻奥匈帝国
Ei 奥匈帝国入侵加里西亚
Eii 奥匈帝国进攻塞尔维亚
大西洋
挪威
瑞典
大不列颠
丹麦
北海
波罗的海
荷兰
比利时
德意志帝国
卢森堡
法国
瑞士
奥匈帝国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
门的内哥罗
阿尔巴尼亚
希腊
意大利
西班牙
葡萄牙
黑海
里海
波斯
奥斯曼帝国
地中海
500英里
500公里



四、总体战和力量对比（1914～1918年）

在根据两个同盟的总战略和它们可以利用的军事与工业资源情况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研究之前，回顾一下各大国在1914年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可能是必要的。美国是处于局外人的地位——尽管因它与英国和法国有密切的商业和金融联系，不可能做到象威尔逊要求的那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保持中立"。日本为了占领德国在中国和中太平洋的领地而任意解释英日同盟条款；但不论是这件事，还是它的海军护舰任务进一步扩大，都不是决定性的，对于协约国来说，有个友好的日本显然要比有个敌对的日本好的多，相比而言，意大利在1914年选择了中立政策，而从其军事和社会经济的脆弱性来看，保持这样的政策可能是明智的。如果说在1915年决定参加**反对**中欧同盟国的战争是对奥匈帝国的一个打击，那么很难说这会象协约国外交官们所希望的那样对英国、法国和俄国有很大好处。几乎同样的，也很难说土耳其在1914年11月决定站在柏林一边参加战争对谁最有好处。确实，土耳其封锁了直布罗陀海峡，从而也封锁了俄国的谷物出口和武器进口；但到1915年，俄国小麦已难以运到**任何地方**，同时在西方也已没有多余的"军火"。另一方面，土耳其的这一决定使近东对法国和（特别是）英国的帝国扩张敞开了大门——虽然这一决定也使在印度的帝国主义者和白厅不能把精力完全集中于西部战线。

因此，真正处于关键地位的是欧洲"五大"国。在目前阶段，要把奥匈帝国作为完全与德国分离的国家来对待，是办不到的，因为虽然在许多问题上维也纳的目标常与柏林背道而驰，但决定战争或和平问题——或许还是能否继续作为一个半独立大国的问题——则只能听命于其强大的盟国。奥德联合是令人生畏的。它

表 22　1914 年双方联盟的工业／技术对比(根据上列表 15～18)

项目 ＼ 数字 ＼ 国家	德国／奥匈帝国	法国／俄国	+英国
在世界工业生产能力中所占百分比(1913 年)	19.2%	14.3%	+13.6% = 27.9%
能源消耗(1913 年)等效煤耗，单位为 100 万公吨	236.4	116.8	+195.0 = 311.8
钢产量(1913 年)单位为 100 万公吨	20.2	9.4	+7.7 = 17.1
工业总潜力(以 1900 年的英国为 100 计算)	178.4	133.9	+127.2 = 261.1

的前线部队比起法国和俄国要小得多，但它们能进行有效的内线作战，并可补充大量的新兵。正如从表 22 可以看出的那样，它们在工业和技术实力方面对比“两国同盟”也拥有相当大的优势。

当然，法国和俄国的地位则完全相反。法国和俄国彼此相隔半个多欧洲，（至少说）很难协调它们的军事战略。而且，虽然在战争开始时它们在军队实力上似乎占有很大优势，但这种优势由于德国人聪明地在前线作战中使用了受过训练的后备役军人而受到削弱，并且在 1914 年秋季法俄不计后果的攻势之后这种优势又被进一步削弱。胜利不再是取决于速度，而越来越好象取决于实力；工业指数也并不那么鼓舞人心。如果是法俄单独卷入反对中欧同盟国的持久“总体”战，那是很难想象它们怎么鼓舞人心。如果是法俄单独卷入反对中欧同盟国的持久“总体”战，那是很难想象它们怎么能够获胜。

自然，事实是德国决定取道比利时对法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这就使英国主张进行干涉的人占了上风。不论是根据“均势”的传统理由，还是为了保卫“可怜的小比利时”，英国决定对德宣战都是关系重大的，虽然英国的规模不大，服役期长的军队对整个军事均势只能产生不大的影响——至少在这支力量把自己转变成在欧洲大陆战线上一支人数众多的新征兵组成的部队以前是这样。但是，因为这场战争将会持续不止几个月，所以英国的实力还是相当可观的。它的海军可以使德国舰队陷于瘫痪状态并且封锁中欧同盟国家——虽不能迫使后者屈服，但可切断他们和大陆欧洲以外地区的补给来源地的通路。反过来讲，它的海军可以保证协约国补给来源地的自由通路（后来被潜艇战役中断时例外）；而且除这种优势外，英国还是一个富有的贸易国家，同世界各地有广泛联系并且有巨大的海外投资，其中有些至少可用来支付美元购货的支出。从外交上讲，这些海外联系意味着，英国作出干预的决定影响到日本在远东的活动、意大利的宣布中立

(和后来的转变立场）和美国一般来说的乐善好施的姿态。很自然，也保证了各自治领和印度向英国更直接地提供海外支援，它们的军队很快进驻到德意志帝国的殖民地区，后来又参与土耳其的作战。

此外，英国仍有巨大的工业和财政资源可以在欧洲支配，既可用以增加贷款和向法国、比利时，俄国和意大利输送军火，同时又可以用以为黑格在西线雇用的大量军队提供补给和支付所需费用。表 22 所列经济指数显示了英国的实力在干预中的重要性。

的确，这一切使协约国在物质方面拥有重大的优势，但不是压倒优势，同时 1915 年意大利的加入进来也未能使天平上的分量变得对协约国更为有利。然而，如果说在一场持久的大国战争中胜利通常属于拥有最大生产基地的那个同盟、那么人们就会提出一些明显的疑问，例如：为什么在战争进行了两、三年协约国仍未能取胜？——而且 1917 年还出现了某种失败的危险——为什么他们那时发现，争取美国参战是极为必要的？

部分的答案应该是，协约国占优势的那些地区并不能提供迅速或决定性战胜中欧同盟国的条件。1914 年的德国帝国的殖民地在经济上并不很重要，因此（除瑙鲁的磷酸盐外）这殖民地的丧失意义小。德国海外贸易的丧失的确给它造成的损害更大一些，但并未达到英国“海上力量的影响”信徒们所想象的那种程度；因为德国出口贸易为了战争生产的需要作了重新安排，所以，如果它的运输体系能够维持，军事征服（例如对卢森堡的矿石、罗马尼亚的小麦和石油）能消除许多原料的短缺，并且能经过中立的各邻国得到其他供应，那么中欧同盟国集团在粮食方面实际上是能够自己满足的。海上封锁确有影响，但这只有和所有前线的军事压力集合起来才行，而且即使如此，这种影响的作用也是迟缓的。最后，英国武器库中的另一种传统武器、即 1808

～1814 年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的全线外围作战，不能用来对付德国海岸，因为它的海上基地和陆上基地的防御太坚固了；而当用这种武器来对付较弱的力量——例如在加利波利或萨洛尼卡——时，协约国一方的作战失利和防御一方的新武器（地雷区、速射海岸炮兵连），都使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效果大为减弱。正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每一次寻找敌方同盟的“易受袭击的致命点”的行动，都要损失在法国作战的协约国部队。

对协约国海军的压倒优势，也可以得出相同样的论点。北海和地中海的地理情况意味着协约国的主要交通线是安全的，无需搜寻停泊于港口中的敌人船只，或对敌国的海岸实行危险的近距离封锁。相反地，如果德国和奥匈帝国舰队想获得“制海权”的话，那么它们就必须主动走出向英法意海军作战；因为如果他们躲在港内，那将毫无用处。然而，中欧同盟国的海军没有谁愿意派它的作战舰队去对付这样强大的力量来完成实际上是自杀的使命。因此，确实发生过的几次海军水面冲突都是偶然遭遇（例如多格滩和日德兰半岛等海战），而这些海战除了肯定一下协约国对海上通道的控制以外，在战略上并不重要。由于战舰受到水雷、潜艇和侦察机或齐伯飞艇的威胁，发生进一步海上遭遇战的可能性更少了；这些威胁使双方指挥员对派出他们的舰队越来越谨慎，除非获知敌方舰只已接近己方海岸线（一种极不能有的情况）。由于海战中的这种软弱无力状态，中欧同盟国逐渐转向利用潜艇攻击协约国的商船，这是一种严重得多的威胁。但是，打击敌人贸易的潜艇战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缓慢和难办的事，它的实际成效只能把协约国造船厂新下水的吨位和所损失的商船吨位对比——并且和被毁坏的潜艇数目对比才能看出。潜艇战并不是一种能保证迅速取胜的战争形式。

协约国在军队数量和工业方面具有相对弱势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军事斗争本身的性质。当各方拥有数百万军队但被散乱地部署

在数百哩宽广的国土上时，要想以耶拿或萨杜瓦方式取得一次决定性胜利是很难的（在西欧是不可能的）；甚至一次提前几个月就做了精心筹划和准备的"大攻势"，通常要分解为数百个小规模战场行动，并且一般还是在通讯联络几乎全部中断的情况下进行。尽管前线可能在某些地段有进有退，但因手段不足，无法真正突破，这就使得各方能及时动员和调集后备队、重新储备弹药、设置铁丝网和大炮，为下一次对峙冲突作准备。直至战争后期，还没有一支军队能够找到一种办法使自己的部队能通过往往有四哩纵深的敌方控制的防区，并能做到既不使部队暴露于毁灭性的反击火力之下，又不使敌方阵地被突击前的炮击打得崎岖不平，使己方难以向前推进。既使一次偶然的突击出人意料地越过了敌人几道壕堑，也没有特殊装备用来扩大这一有利形势。铁路是在后几哩，骑兵太容易受攻击（并受饲料的牵制），重负载步兵难以远行，而至关重要的炮兵又受到长长的马拉辎重车队的限制。

除了获得一次迅速的战场胜利所存在的这个一般性问题以外，还有个现实情况，即德国具有两个更特殊的有利条件。其一是，德国军队于1914年8、9月间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全面推进，使它占领了高地的山脊，从那里可以俯视整个西线。从那时以后，除了象凡尔登战役这样的罕见例外，它在西线始终处于防御的地位，迫使英法部队在不利条件下发动进攻。虽然英法部队在数量上占优势，但仍不足以改变这一基本不利条件。其二是，德国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东线和西线之间有良好的国内交通设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协约国对它的"包围"，因为象法金汉和鲁登道夫这样一些将军能够把一些师从这一条战线调到另一条战线，而且有一次是将整整一个集团军在一周内横跨中欧的调动。

随后，在1914年，甚至当该集团军的大部分在西线发动进

攻的时候，普鲁士总参谋部又神经质地抽调两个军去增援已暴露的东线。这一行动对于西线攻势不是一个致命打击，而西线攻势从后勤支援上讲无论如何是不妥的；但这一行动的确有助于德国人反击俄国人过早发动的入侵东普鲁士的攻势，这一攻势是俄国人自己围绕马祖湖展开的。当1914年11月在伊普雷进行的血战使法金汉确信毫无希望很快在西线获得胜利时，又进一步将8个德国师调给东线司令部。因为奥匈帝国部队在塞尔维亚战役中受到屈辱性的打击，并且因为不切实际的1914年法国第十七号计划由于在洛林损失60多万人而中止了执行，所以看来只有在俄属波兰和利西亚的开阔地带才有可能实现一次突破——虽然一点都不清楚是否俄国还重演它伦堡对奥匈帝国的胜利，或者是德国重演它在坦能堡和马祖里湖的胜利。因为英法军队在整个1915年间不断在西线发动猛烈攻势（在这里，法国损失了150万人，英国损失了30万人），所以德国人准备沿东线发动一系列野心勃勃的突击，部分目的是为了营救被围困在喀尔巴阡山地区的奥匈帝国军队，但更主要的是为了歼灭在这一地区的俄国军队。事实上，这支俄国军队仍相当强大（并还在增加），要歼灭它是不可能的。但到1915年底，俄国人遭到在战术上和后勤供应上均占优势的德军一系列毁灭性打击，并被赶出立陶宛、波兰和加利西亚。在南部，德国增援部队联合了奥地利部队和机会主义的保加利亚人，最后终于占领了塞尔维亚。西方协约国在1915年的所有努力——从指挥有误的加利波利战役，到毫无成效的萨洛尼卡登陆，到促使意大利参战——都未能对俄国人真正有所帮助，似乎也没能形成对牢固的中欧同盟国集团的挑战。

1916年法金汉不明智地改变了德国战略——将军队移向西线，以便通过对凡尔登的反复攻击致法国于死地——但这只能证明原先政策的正确性。当大量德国师在凡尔登战役中遭到覆灭时，俄国人都能够于1916年6月由勃鲁西洛夫将军指挥在东线

发动它们最后的大规模攻势，把组织松垮的哈布斯堡军队一路赶回喀尔巴阡山并使之濒于崩溃。几乎与此同时，黑格指挥的英国军队在索姆河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对德国人坚守的山脊线一连数月地施加压力。随着协约国这两次兄弟般的作战行动导致了凡尔登战役逐渐停息（并于 1916 年 8 月底由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接替法金汉），德国的战略地位也得到改善。德国在索姆河的损失是惨重的，但比黑格部队的损失要小。由于西线转为防御态势，使德国得以再次把军队调到东线，加强了奥匈帝国部队，随后占领了罗马尼亚，并支援了南部的保加利亚。

德国除拥有处于内线有效的铁路和良好的防御地位这些优势外，还有个与此有关的**时间选择**问题。协约国的总资源很强大，但在 1914 年并不能立即动员起来以争取胜利。俄国军队的行政部门一直能一批一批征募新兵以补充战场上不断的损失，但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参谋人员能用来把部队扩充到超过一定的限度。在西线，直到 1916 年黑格的军队总人数也没有超过 100 万，并且甚至在那时英国人还想把它的部队投入欧洲以外的战役，这样就减轻了对德国人的潜在压力。这意味着，在这场战争的头两年里，俄国和法国担负了牵制德国军事机器的主要任务。双方都打得非常之好，但到 1917 年初，兵力明显现衰竭现象。正象 1917 年尼韦尔的冒然突击所暴露的那样，凡尔登战役已使法国军队消耗到接近于它的极限；虽然勃鲁西洛夫的进攻实际上已将哈布斯堡军队摧毁使其不再为一支作战部队，但它并没能给德国本身造成损害，反而使俄国的铁路、食物储备和国家财政变得更加紧张，现有的受过训练的俄国兵力消耗很大。虽然黑格的新增部队弥补了法军日益衰弱，但并不预示着协约国在西线的胜利；而且如果把这些部队也胡乱用于正面进攻，德国人也许仍能坚守在佛兰德斯，同时放胆在东线继续进行扫荡。最后，也不能指望从阿尔卑斯山南面得到什么帮助，在那里，意大利人也正在绝望地呼

吁给以帮助。

这种双方作出越来越大的军事牺牲的现象，不可避免地也同时存在于财政和工业领域——但（至少在1917年以前）同样出现了相持不下的结果。最后人们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刺激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式做了大量研究，当时的方式第一次给许多地区带来了现代工业，并且使军工生产有了惊人的增加。但反复考虑一下就会认为这确实不足为怪。尽管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人对于1914年以前军备竞赛的费用多方感到惋惜，但那时只是将国民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平均略高于4%）用于军备。当"总体战"的到来使这个数字上升到25～33%时——也就是说，当战时政府决定性地指挥工业、劳动力和财政时军工生产的迅速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因为到1914年底和1915年初各个军队的将军们都为经常发生"弹药短缺"而诉苦，所以对这种短缺被发现所造成的影响感到害怕的政治家们，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同实业界和劳动者结为联盟来生产人们所期望的物资。假如现代官僚政治国家拥有发行公债和提高税收的权力，那就不会再有那种为维持长期战争曾使18世纪的国家陷于瘫痪的财政障碍。因此，不可避免的，在早期为适应这些新的情况而作了调整之后，所有国家的军工生产都会迅猛增加。

因此，了解一下各交战国的战时经济有哪些弱点所在是很重要的，因为除非得到处境较好的盟国帮助，这些弱点很可能会导致崩溃。在这方面，不准备对大国中最弱的两个国家，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用太多的篇幅加以论述。因为很明显，奥匈帝国虽然在漫长的战线（特别是在意大利战线）上防守的很出色，但如果没有德国一再的军队介入，而这种介入进一步使哈布斯堡帝国变为柏林的卫星国，那么它早在与俄国的战争中崩溃了。而意大利，虽然在卡波雷托惨败以前并不需要对任何地方那种程度的直接军事援助，但是从那次惨败以后则越来越依赖更富有、更强大

的盟国，靠它们提供粮食、煤和原料、提供航运支援，提供29.6亿美元贷款用以支付生产军火和其它物资的费用。它在1918年的最后"胜利"，就象哈布斯堡帝国的最后失败和灭亡一样，主要取决于别的地方采取的行动和决定。

有人认为，到1917年，意大利、奥匈帝国和俄国是在竞相走向崩溃。之所以俄国成为事实上第一个走向崩溃的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具有不同于罗马和维也纳的两个问题：一是，它有绵延数百哩的边界暴露在强大得多的德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之下，二是，甚至在1914年8月肯定在土耳其参战以后，在战略上它是处于孤立的地位，因此，从来未能从盟国那里得到能维持其战争机器的巨大消耗所需要的军事或经济援助。与其它参战国一样，当俄国很快认识到其弹药储备的消耗速度大约为战前预计的10倍时，它就必须大规模地扩大其国内生产——这样做比等待大大推迟的海外订货要可靠得多，即使这样做意味着要把资源转移到莫斯科自私自利的工业家手中。但是，在战争的头两年半时间里，俄国的武器生产，甚至是整个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大大加剧了不能适应需要的运输系统的紧张程度，因为它的运输系统在任何情况下连调动部队、为骑兵运送饲料等任务都很难满足。因此，它的弹药储备常堆积在离前线几哩的地方；粮食无法运到缺粮地区，特别是城市缺粮地区；协约国的补给品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一港口一放就是几个月。这些永久性基本设施的不适应性不仅靠俄国小小的而又短效率的下层官僚机构无法克服，就是好争吵不休和处于瘫痪状态的上层政治领导也束手无策。相反的，沙皇制度由于采取不顾后果的非平衡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在掘坟墓。这种财政政策本质上是取消贸易（占其年收入的1/3），使铁路收入损失严重（这是它在和平时期的另一大收入来源），并且——与劳合、乔治不同——拒绝提高较富裕阶层的所得税。国家所采取的办法是发行更多的公债

和印制更多的纸币以支付战争开支。物价指数螺旋式上升，以1914年6月的指数为100计算，到1916年12月上升为398，1917年6月又上升到702，这时食品的供不应求和过度的通货膨胀可怕地结合在一起，触发了一次又一次的罢工。

与工业生产一样，俄国的军事成就在战争的头两三年内也是值得赞扬的——甚至它已不再有战前人们想象的那个要压平跨越欧洲通道的“俄国蒸汽压路机”的愚蠢形象。它的军队以其通常的顽强、坚韧作风进行战斗，忍受着西方所未见过的艰辛和纪律；从1914年9月在伦堡的胜利到出色地完成勃鲁西洛夫攻势这样一些俄国同奥匈帝国军队作战的战绩，正象它在高加索战役同土耳其作战获胜一样，只是经常不断的胜利中的一部分。不过，在同装备精良、行动迅速的德国人作战时，战绩则全然相反；但即使那样也需要正确地看待，因为一次战役（例如1914年坦能堡和马祖里湖战役，或1915年喀尔巴阡山战役）的损失可以通过每年征募新兵得到补充，然后就为下一季节的作战作好准备。当然，久而久之，军队的素质和士气必定会受到这种严重损失的影响——在坦能堡和马祖里湖战役中损失250万人，在1915年初的喀尔巴阡山战役中损失100万人，在马肯森进攻中部波兰突出部时另外又损失40万人，从勃鲁西洛夫攻势开始到在罗马尼亚崩溃为止的1916年战役中损失多达100万人。到1916年底，俄国军队死亡，重病和受伤人数约为360万人，另外还有210万人被中欧同盟国俘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它只得决定征召第二类新兵（家庭中唯一养家活口的男人），这样，不仅在农村中造成巨大的农民动乱，而且也给部队带来了成千上万怀有严重不满情绪的新兵。几乎同样重要的是，训练有素的士官人数不断减少，前线的武器、弹药和食品的供应不足以及对德国战争机器的自卑

感日益增长，这些战争机器似乎预先知道了俄国人的全部意图[1]，具有压倒优势的炮火和比任何其他军队都移动得快。到1917年初，战场上的这些连续失败，与城市中的骚乱和农村分配土地的谣言相互影响，在军队中产生了广泛的瓦解作用。克伦斯基1917年7月的攻势——这次又是开始时对奥地利人取得成功，而后来被肯森的反击所粉碎——是最后的一次打击。俄军最高统帅部的结论是，这支军队"简直是一群由于共同渴望和平和共同感到失望而联合起来的庞大的、疲惫的、褴褛的、营养不良的忿怒暴徒"。俄国现在所能期望的只能是失败和比1905年革命远为严重的内部革命。

当尼韦勒毫无意义的进攻促使成千上万的士兵哗变时，就推测法国到1917年年中几乎也会遭到类似的命运，那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事实是，尽管表面上与俄国情况有类似之处，但法国拥有使自己继续维持战斗的关键性有利因素。第一是，民族团结和把德国侵略者赶回莱茵河的决心远为强烈——虽然如果法国是在独自作战这种感情甚至可能逐渐消失。第二是，（这点也许是至关重要的）法国人可以从一场联盟战争中得到好处，而俄国却做不到。从1871年以来，法国人就已懂得他们不能单独同德国对抗；1914～1918年战争完全证实了这一判断。这并不是贬低法国在军事上或经济上对这场战争的贡献，而只不过是为了说明它的来龙去脉。在法国生铁生产能力的64%，钢生产能力的24%和煤生产能力的40%很快落入德国人手中的情况下，1914年以后法国的工业复兴是非同寻常的（这也附带说明了，假如具有政治义务感，法国在19世纪能够做得如何）。大大小小的工厂在法国各地建立起来，并且雇佣了妇女、儿童和退伍军人，甚至

[1] 这毫不奇怪，因为俄国人在使用无线电通讯方面的粗枝大叶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还有从战壕中调回来的新征募的熟练工人。专家治国论的计划人员、实业家和工会联合起来共同努力生产尽可能多的炮弹、重型大炮、飞机、卡车和坦克。产量的迅速提高使得一位学者发出了这样的议论:“不是英国，更不是美国，而是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变成为民主的兵工厂。”

然而，如果没有英国和美国的援助，法国也不可能太多的把投资集中用于武器生产——机枪生产增加了170倍，步枪生产增加290倍。英美的援助在于向新建军火工业输送所急需的煤、焦炭、生铁、钢和机床；英美贷款36亿多美元，法国靠此得以支付海外进口的原料；提供给法国的航运能力，没有这方面的援助，大部分的物资转送将无法进行；另外，英美还提供了粮食。最后提到的这项援助对于一个在和平时期农业生产经常过剩的国家来说似乎是难以令人理解的。但事实是，和欧洲其他参战国(英国除外）一样，法国因将过多的人力从土地上抽走，把马匹用于骑兵或军队运输任务，并且将投资用于制造炸药和大炮从而影响了肥料和农业机械的生产，因此使他们自己的农业受到损害。1917年是歉收的一年，粮食缺乏，物价不祥地螺旋式上涨，法军本身的谷物储备减少到只能维持两天的供应——这种潜在的革命形势（特别是在几次哗变之后)，就是靠紧急调拨英国船只运来美国谷物才得以扭转。

颇为相同的情况是，在整个西线，法国需要依赖英国和后来的美国给以愈来愈多的军事援助。在战斗的头两三年内，法国在战争中首当其冲，并且蒙受到令人震惊的伤亡——甚至在1917年尼韦尔攻势以前损失就已超过300万人；而且，法国没有德国、俄国和大英帝国所拥有的未经训练的庞大后备人力，所以要补充这样的损失非常困难。但是，到1916～1917年，黑格在西线的军队已扩充到相当于法国军队的2／3，并且控制了80多哩的前线。虽然英国最高统帅部无论如何都渴望发动进攻，但是索

姆河战役无疑有助于减轻对凡尔登的压力——这正象1917年帕森代尔从前线法国防守部分吸引开德国兵力一样。当时贝当在几次哗变之后力图重新鼓起部队士气并且希望得到新的卡车、飞机和重型火炮去完成密集步兵显然不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在1918年3月到8月之间在重大历史意义的西线拉锯战中，法国不仅依靠英国和帝国师，而且也依靠日益增多的美国师。同时，当福煦在1918年9月组织他最后的反攻时，他可以运用102个法国师、60个英帝国师、42个（双倍规模的）美国师和12个比利时师，来对付德国197个缺员师。只是靠这几个国家部队的联合作战，才最后把可怕的德国人赶出法国国土，使法国又重新获得自由。

当英国在1914年8月参战时，还没有意识到，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它也要依赖另一个大国。这可从它的战前计划和准备情况推断出来，它的战略家们曾设想当英国皇家海军在各大洋扫荡德国商船队（也许还有公海舰队）和德国殖民帝国被自治领和英属印度军队占领时，英国将派一支少而精的远征军越过英吉利海峡去"堵塞"法国和比利时部队之间的缺口，并在俄国"蒸汽压路机"和法国按照第十七号计划深入本土之前阻住德国的攻势。象所有其他大国一样，虽然英国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避免它脆弱的国际信贷和商业网络发生想不到的危机，但它并未作长期战争的准备。但与其他大国不同，他们也未作欧洲大陆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准备。因此，毫不奇怪，在向法国派遣100万英国军队之前，需要有一到两年紧张准备的时间，并且政府用在步枪、大炮、机炮、飞机、卡车和弹药方面的开支迅速增加仅不过暴露了生产上的无数缺陷，这些缺陷只能由军需部长劳埃德乔治慢慢纠正。如表23所示，这里再次显示了军火产量令人惊讶的增长。

但是，当人们了解到英国国防开支1913年的9100万英镑增加到1918年的19.56亿英镑，即这时的国防开支占政府总开支

的 80%和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2%，那么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与其详细摆出英国和帝国的师团、飞机中队和重炮连数量大规模增加情况，似乎不及指出英国整个战略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的弱点更为重要。首先是，虽然英国的地理位置和大舰队的数量优势意味着在水面作战中协约国拥有制海权，但英国皇家海军对德国 1917 年初开始实施的无限制潜艇战却毫无准备。其次是，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廉价来对付拥有中欧同盟国丰富资源的敌人看来不起什么作用，而同德国军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战略似乎也未能奏效，并且在人力上付出了很大代价。到 1916 年 11 月索姆河战役接近尾声，英国在那场战役中的死伤人数已增加到 40 万人以上。虽然这使得最精良的英国志愿兵被消灭并使政治家们感到震惊，但却未能削弱黑格对最后胜利的信心。到 1917 年年中，他又在准备从伊普雷向东北方对帕森代尔发动一次进攻，而这一次攻势成了一场泥沼中的恶梦，不仅又付出了另外伤亡 30 万人的代价，而且极大地挫伤了在法国的大部分军队的士气。因此，完全可以预料，尽管黑格和罗伯逊将军坚决反对，但劳合、乔治和具有帝国主义狂热性的战时内阁却热衷于把更多的英国师调往近东，因为那里实际的领土利益在向他们招手，并且可能遭受的损失也将远比猛攻防守很好的德军堑壕为小。

表 23　英国军火生产(1914～1918 年)

数量 时间 / 项目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火炮	91	3390	4314	5137	8039
坦克	—	—	150	1110	1359
飞机	200	1900	6100	14700	32000
机枪	300	6100	33500	79700	120900

然而，还在帕森代尔战役以前，英国就承担了（不算这次帝国战役）对德斗争的领导作用。法国和俄国可能在战场上仍有比较庞大的军队，但他们已被尼韦尔代价巨大的攻势和德军对勃鲁西洛夫攻势的反击弄得筋疲力竭了。这种领导作用在经济方面就更加明显，在世界信贷市场上英国发挥着银行家和贷款筹集人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不仅为它自己，而且还为俄国、意大利甚至是法国的借款作担保——因为协约国中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用它们自己的黄金储备或国外投资债券来支付海外进口大量军火和原料所需的款项。确实，到 1917 年 4 月 1 日，协约国内部的战争信贷已增加到 43 亿美元，其中 88%是由英国政府提供的。虽然这看起来象是英国在重演 18 世纪它所充当过的"联盟银行家"的角色，但现在有个很大的区别：现在同美国存在着很大的贸易逆差，因为美国向协约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军火和粮食（但因海上封锁而没有向中欧同盟提供），但却没有要求用商品来补偿。不论是黄金的转让还是英国特有的巨额美元债券的出售，都不能弥补这一差额，唯一办法是在纽约和芝加哥货币市场上借款，用美元现钞来支付美国军火供应商，才能解决这一困难。这反过来又意味，协约国更加依赖美国财政援助来支持他们自己的战争事业。1916 年 10 月，英国财政大臣警告说，"到明年 6 月，或更早些时候，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会处于向我们发号施令的地位，如果他愿意的话"。对于想保持"独立"的大国而言，这种地位全然令人惊恐。

但是，德国的情况又怎样呢？它在战争中的行为是令人震惊的。正象诺塞奇教授指出的那样，"在缺乏盟国大力支援情况下，（它）牵制了世界的其余地区，击败了俄国，将法国这个横行了两个多世纪的欧洲军事巨人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 1917 年又险些使饥饿的英国举手投降"。这一切部分是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优势：良好的国内交通线，西线易于防守的阵地，以及东线

有开阔地带有利于对较弱敌人进行机动战。另外也由于德国军队有着良好的作战素质，这支军队拥有一大批聪明而又善断的参谋军官，他们比其他任何军队的参谋人员都能更快地适应新的作战条件，而且到 1916 年他们已在重新思考防御战和进攻战的性质了。

最后，德国可以凭着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工业基础进行“总体战”。的确，它实际上动员的人数比俄国还多——1325 万对 1300 万——从它们各自的总人口来看这是个很大的成就；并且战场上的师团数目也比俄国多。在最高统帅部和象瓦尔特、拉特诺这样聪明的官僚商人们的监督下，德国本身的军火生产猛增。拉特诺等人建立卡特尔负责分配最重要物质的供应和避免生产出现梗塞情况。经验丰富的化学家生产了因英国海军封锁而断绝来源的那些物品（例如智利硝石）的代用品。在 1916 年入侵后被占领的土地上，从卢森堡和法国北部开采了矿石和煤炭，把比利时工人选用到德国工厂干活，对罗马尼亚的小麦和石油有计划地进行了掠夺。象拿破仑和希特勒一样，当时的德国军事领导人希图从征服中得到报偿。到 1917 年上半年，随着俄国的崩溃，法国的衰败，英国受到潜艇的“反封锁”，德国似乎已到了胜利的边缘。尽管到处是“战斗到底”的动听叫嚷，但伦敦和巴黎的政治家们实际上已在急切地考虑在今后 12 个月内实现妥协性和平的可能。这种情况在形势大变以前一直如此。

然而，在条顿人的军事和工业实力的表面背后，潜藏着相当的问题。在 1916 年夏季以前，也就是说当德国军队在西线处于防御地位而在东线进行扫荡性进攻时，这些问题还不太明显。但是，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无论在投入的火力或蒙受的损失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数量级的变化；德国在西线的伤亡人数，1915 年为 85 万人左右，1916 年猛增到近 120 万人。特别是索姆河攻势给德国人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因为它表明，为了争取战场上的

胜利，英国人最后会做出毫无保留地提供国家资源的许诺；而反过来说，这次战役也导致了 1916 年 8 月所谓的兴登堡计划的提出，这项计划宣布要极大地增加军火生产和远为严格地控制德国经济与社会，以满足总体战的需要。一方面是对人民群众行使各种权力的独裁制度，另一方面是政府大量增加借款和印发钞票而不是提高所得税和股息税——这反过来又使通货急剧膨胀——以上两方面情况的结合沉重地打击了民众的士气，而士气是总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鲁登道夫远不如劳埃德·乔治或克里孟梭这样的政治家理解得多。

即使作了一项经济措施，兴登堡计划也有它的问题。由于宣布了一个完全异想天开的生产总额——炸药产量增加 1 倍，机枪产量增加 2 倍——结果使得德国工业在为满足这些要求而斗争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它不仅需要增加许多工人，而且还需要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从新的高炉直到莱茵河上的桥梁，这又要进一步消耗劳动力和资源。因此，没过多久情况就变得很清楚，要想实现这项计划，只有把熟练工人从军事岗位上调回工厂才行；因此，在 1916 年 9 月复员了 120 万人，1917 年 7 月又复员了 190 万人。在西线损失惨重而东线也续有很大伤亡的情况下，这种抽调意味着，甚至德国大量强壮的男性人口都快使用到极限了。从这方面来讲，虽然帕森代尔战役对英国军队来说是一大灾难，同时鲁登道夫因看到他的部队又有了 40 万人不能作战，因而也把这一战役看成是一场灾难。到 1917 年 12 月，德国军队的人力总数始终未能超过六个月前所拥有的 538 万人这一最高值。

兴登堡计划的最后一个失误是长期忽视农业。在德国从农村抽调了比法国或俄国还要多的人力、马匹和燃料用于满足军队或军火工业的需要———种极其愚蠢破坏平衡的作法，因为德国不能（象法国那样）通过从海外得到粮食以补足差额的办法来弥补这种计划上的失误。在德国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的同时，食品价格

螺旋式上涨，各地人民都抱怨食品供应不足。一位学者尖锐地指出，“由于过分偏重于生产军火，所以到1918年底德国经济的军方管理者已把这个国家带到了饥饿的边缘。”

表24 工业和技术力量对比

(包括美国但不包括俄国)

项目 \ 数字 \ 国家集团	英、美、法三国	德国和奥匈帝国
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可占百分比(1913)	51.7	19.2
能源消耗(1913)——等效煤耗，单位为100万吨	798.8	236.4
钢产量(1913)单位为100万吨	44.1	20.2
总工业潜力指数(以1900年的英国为100)	472.6	178.4

但是，1917年初距离那个时刻还有相当一段时间。当时正是协约国首先感到了战争的压力。的确，俄国正在混乱中崩溃，法国和意大利似乎也都离那种命运不远了。每个集团都已被战争拖得精疲力尽，但德国在总体上仍拥有军事优势。必须从这种总战略意义上来看1917年头几个月最高统帅部对美国所采取的可笑政策。美国政府偏向于协约一边，这甚至在那以前也不是什么大的秘密；尽管对海军封锁问题偶而有些分歧，但由于对协约国民主的普遍的思想上的同情，以及美国出口商对西欧市场日益增加的依赖，使得华盛顿不能对德国完全保持中立。但是，由于德

国宣布对商船运输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和（在“齐美尔曼电报”中）透露了德国人企图和墨西哥结盟的秘密，最后促使威尔逊和国会决定参战。

美国参战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在于军事上，至少在1917年4月以后的12到15个月内是如此，因为美国军队对进行现代战争的准备甚至还不如1914年时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军队。但是，为协约国数十亿美元的战争订货所刺激起的美国生产中所占比例，是经济处于过度紧张状态的德国的2.5倍。它能建造数百艘商船，这在德国潜艇每月能击沉50多万吨英国和协约国船只的哪一年，是极为需要的。它在惊人之短的3个月时间内就能建造出数艘驱逐舰。世界食品出口的一半是美国生产的，现在这些食品可以运往法国和意大利以及美国传统的英国市场。

因此，从经济实力来看，美国的参战完全改变了力量对比，补偿了当时俄国的崩溃还有余。正象表24（应当与表22对照看）表明的那样，现在用来打击同盟国的生产资源是巨大的。

因为把这种经济潜力转化为军事实力存在一段“滞后时间”，所以美国参战的直接后果是含混不清的。在可资利用的短时间内，美国是不可能生产出自己所需数量的坦克、野战炮和飞机（事实上它不得不从法国和英国借用这种重型武器）；但是它能够源源不断地供应伦敦、巴黎和罗马所急需的轻武器弹药和其它补给品。同时，它可以从银行家那里接受私人贷款用以支付所有这些物资，并将它们转变为政府间债务。此外，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美国军队还可以扩充为一支拥有数百万人的有生气、有信心和供应充足的庞大队伍，用以投入欧洲的抗衡斗争。与此同时，英国人必须踏出一条穿越帕森代尔泥沼的道路，俄国军队已溃不成军，德国的增援部队使中欧同盟国能在卡波雷托给意大利一次毁灭性打击，同时鲁登道夫从东线撤回了一些他的部队，以便对已被削弱的英法防线发起最后攻击。诚然，在欧洲以外地区，英

国在近东对土耳其作战正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如果德国人最后要想方设法在西线做到他们在欧洲地区曾经做到过的事情，那么占领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远不能补偿法国的损失。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主要交战国的领导人都把 1918 年所要进行的各次战役看成是对整个战争具有绝对决定性意义的道理。虽然德国必须留下 100 多万人以在东线占领其新征服的大帝国，并且这一征服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1918 年 3 月）中最后为布尔什维克所承认，但是鲁登道夫从 1917 年 11 月初开始不得不以每月 10 个师的速度向西抽调兵力。到德国战争机器在 1918 年 3 月底作好随时进攻的准备，它已拥有超过英法联军几乎 30 个师的优势，并且其中许多部队都是由布鲁赫米勒和其他参谋军官按名为“暴风强击队”新的战术训练过的。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突破协约国防线并且推进到巴黎或英吉利海峡，那将能取得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军事成就。但其风险也是可怕的，因为鲁登道夫仅为这一次战役就动员了德国全部剩余资源；它将是一场规模极其巨大，“或者全赢或者输光”的赌博。在这种情景的背后，德国经济正在不祥地削弱着。它的工业产值已下降到 1913 年的 57%。农业更是受到忽视，并且恶劣的气候也加剧了产量的下降；食物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增加了国内的不满。使用过度的铁路车辆已不能按原计划那样从东部地区运出所需的原料。鲁登道夫部署在西线的 192 个师中，有 56 个师被称之为“攻击师”，从此作为向大量提供正日益减少的装备和弹药储备的口实。这是最高统帅部相信必定成功的一场赌博。但是，如果进攻失败，德国的资源将消耗殆尽——而且正在这时，美国终于能够每月将约 30 万军队调到法国，而德国无限制的潜艇战役也被协约国的护航部队完全控制住了。

鲁登道夫初期的成功——粉碎了数量上占优势的英国第 5 集团军，在法国和英国部队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并且到 1918 年

6 月初在他的另一次猛烈突击中推进到离巴黎 37 哩的地区——吓得协约国赶紧给福熙对西线部队的最高协调权，从英国、意大利和近东派出增援部队，并且又一次（私下里）为妥协性和平而担忧。然而事实是，德国人的战线已延伸得过长，并且不得不忍受从防御转人进攻时通常会产生的后果。例如，在对英国战区进行最初两次沉重打击中，使英国伤亡了 24 万人，法国伤亡了 9.2 万人，但它们自己的损失也高达 34.8 万人。到 7 月份，"德国人损失大约 97.3 万人，并有 100 多万人成为病号。到 10 月份，西线只剩有 250 万人，同时征募新兵的情况也令人绝望。"从 7 月中旬起，协约国不仅在新增战斗人员方面，而且尤其在大炮、坦克和飞机方面都已占优势——这使得福熙得以指挥英帝国、美国和法国军队进行一系列攻势，使得被削弱的德军毫无喘息之机。同时，协约国的军事优势和更大的持久作战能力，还表现他们在叙利亚、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突然，在 1918 年 9、10 月间，以德国为首的整个集团在惊慌失措的鲁登道夫看来似乎行将崩溃，国内的不满和革命与前线的失败相互影响，产生了投降、混乱和政治动荡。因此，不仅德国的军事图谋宣告失败，而且欧洲的旧秩序也土崩瓦解了。

根据"前线作战地区"和后方地区每个人所遭受的可怕损失，苦难和蹂躏，同时也根据人们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成是欧洲人自己造成的对欧洲文明及其世界上的影响的致命打击的观点来看，那么在这方面介绍一下另一份统计材料（见表 25）这里给出了根据原可能显得太唯物主义了，然而事实是这些数据证明了以上论述：中欧同盟国拥有的优势——良好的国内交通线，德国的素质，对许多领土的占领和利用，俄国的孤立和失败等——从长远看并不能克服在纯经济实力方面的巨大劣势和在总动员的兵力规模上相当大的劣势。正象鲁登道夫哀叹精锐部队到 1918 年 7 月已消耗尽是双方力量不平衡的一个反映一样，普通前线士兵对于

这个春天曾遭他们打击过的协约国部队会有那么好的供应感到的惊讶，是双方生产不平衡的一个标志。

表 25 战争开支和总动员兵力(1914～1919)

	战争开支:按 1913 年价格计算(单位:10 亿美元)	总动员兵力(单位:100 万人)
大英帝国	23.0	9.5
法国	9.3	8.2
俄国	5.4	13.0
意大利	3.2	5.6
美国	17.1	3.8
其他协约国*	−0.3	2.6
协约国总计	57.7	40.7
德国	19.9	13.25
奥匈帝国	4.7	9.00
保加利亚,土耳其	0.1	2.85
中欧同盟国总计	24.7	25.10

* 比利时、罗马尼亚、葡萄牙、希腊、塞尔维亚

然而，如果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预先注定的，那就完全错了。这里提出的证据说明，这场战争的整个进程——双方初期的对峙、意大利参战未能起作用、俄国势力被慢慢消耗、美国的干预在保持协约国压力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中欧同盟国的最后崩溃——是同每个联盟在这场斗争中的各个阶段可供利用的经济和工业生产以及有效动员起来的兵力密切相关的。诚然，将军们仍须指挥（或错误地指挥）他们的战役，部队仍须鼓

足每个人的道义勇气向敌人阵地冲击，水兵们也仍须忍受海战的严酷考验。但事实表明，这种素质和才能在双方都存在，而不是按不相称的比例极不相称为联盟的一方所独享。一方所能独享的，特别是在 1917 年以后，只是生产力方面的明显优势。正象在以往的一些漫长的同盟战争中一样，这一因素最终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第六章　两极世界的来临和“中等强国”的危机(1919～1942年)

一、战后国际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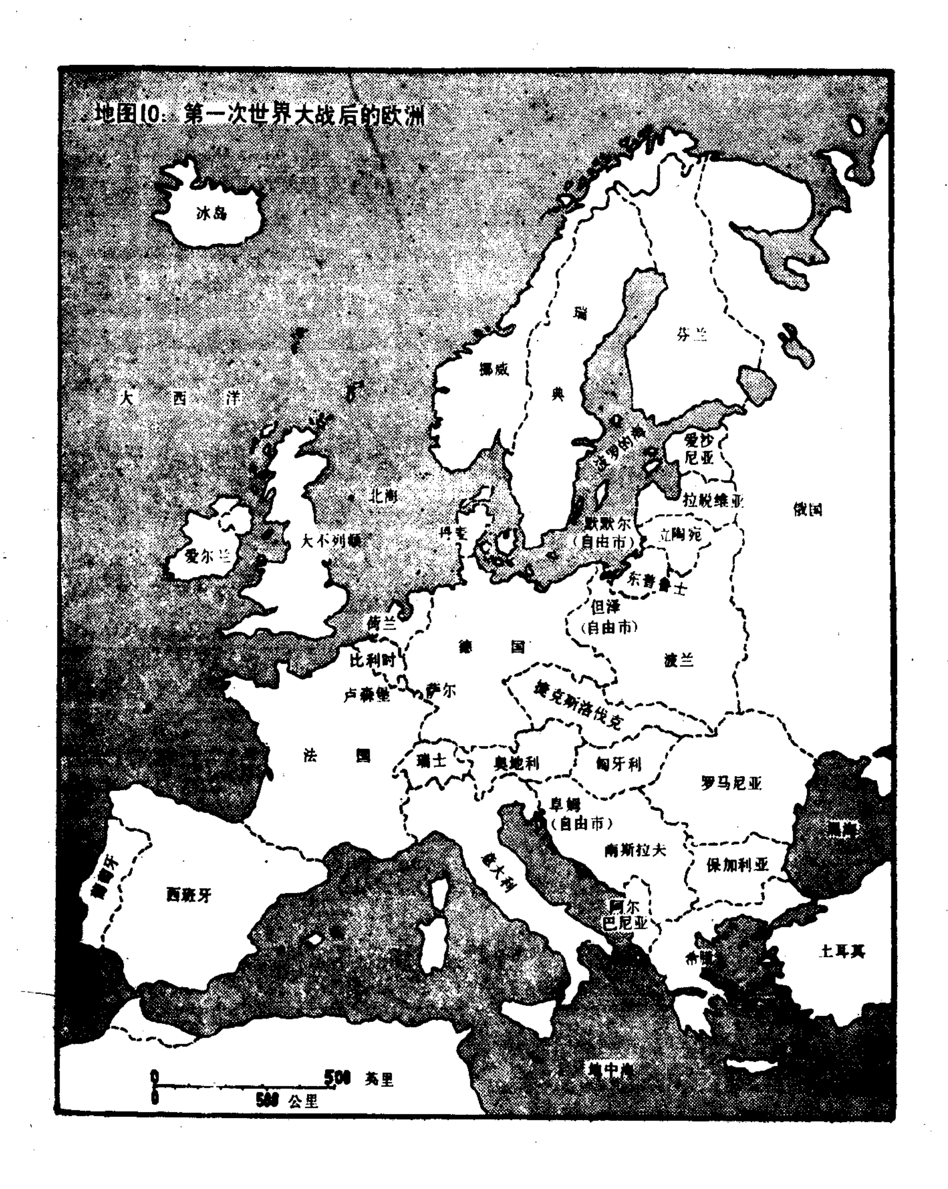
1919年初，大小强国的政治家们聚集在巴黎，以商定和平解决方案。然而，他们遇到了一连串的问题，这些问题比1856年、1814～1815年以及1763年他们的前任们所遇到的范围更广而且更棘手。本来议事日程上的很多事项是可以安排妥当并且写入凡尔赛条约的（1919年6月28日签订），但是由于对抗的种族集团竞相建立“继承国”，使东欧出现了一片混乱，又由于苏联的内战和干涉，以及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强烈反对西方瓜分小亚细亚的企图，所以直到1920年，有些地方甚至到了1923年，许多事情才确定了下来。然而，为了简便起见，这一系列的协议都将不按它们实际的签约年代顺序，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

从领土和法律的角度衡量，在欧洲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是在以前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罗曼诺夫帝国和霍亨佐伦帝国组成部分的那些土地上，出现了一系列民族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虽然种族统一的德国在东欧失去的领土远远少于苏维埃俄国或者已完全瓦解的奥匈帝国，但其实力却遭受到其他方式的损害：亚尔萨斯洛林归还于法国，与比利时和丹麦的边界进行了调整；协约国军队对莱茵兰实行军事占领，并且法国行使对萨尔盆地的经济开发权；必须遵守空前的“非军事化”条款（比如，只允许有极少量的陆军和作海岸防卫用的海军、不允许有空军、坦克或潜艇，取消普鲁士总参谋部）；以及一笔巨额赔款。此外，

德国还失去了其广大的殖民地，使之成为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和自治领—正象土耳其的近东领土变成英国和法国的托管地由新的国际联盟实行遥远监督一样。在远东，虽然日本在1922年归还了中国的山东，但是它却继承了赤道以北从前属于德国的一些岛屿。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各个大国承认了太平洋及远东地区的领土现状，并且同意根据有关原则限制它们的作战舰队的规模，从而阻止了英、美、日的海军竞赛。因此，到20世纪20年代初，东方和西方的国际秩序似乎都已经稳定下来，遗留的（或者将来可能出现的）困难问题将由国际联盟来解决。尽管美国的背离令人吃惊，但是国际联盟仍定期在日内瓦召开会议。

1920年以后，美国突然退到至少相对来说是外交孤立主义的道路上去，这似乎又与前面所说的从19世纪90年代起世界力量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对于那个时期的世界政治预言家们来说，国际舞台即使说不是受到德国、苏联、美国这三个正在兴起的大国的控制，也是越来越受到它们的影响，这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德国已被彻底击败；俄国也在革命中崩溃，然后退到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孤立状态；美国到1919年显然是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也宁愿退出外交舞台的中心。事情的结果是，20世纪20年代以及以后的国际事务，似乎仍然集中于法国和英国的行动或者由国际联盟审议。虽然法国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受到严重的创伤，但是法国和英国的政治家们在国际联盟中仍能起左右局势的作用。现在奥匈帝国已不复存在。意大利在1922年以后墨索里尼领导的国粹党巩固了它的统治而相对平静下来。日本在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作出决议后似乎也相安无事。

因此，奇特的并且（正象将会看到的那样）就象是人为的一样，世界似乎仍是以欧洲为中心。这一时期的外交史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法国“寻求安全”不使德国将来复活。同时，因为美国参


地图10：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
冰岛
大 西 洋
北海
大不列颠
爱尔兰
挪威
瑞
典
芬兰
爱沙
尼亚
拉脱维亚
俄国
默默尔
（自由市）
立陶宛
东普鲁士
但泽
（自由市）
丹麦
荷兰
比利时
卢森堡
萨尔
德 国
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
法 国
瑞士
奥地利
匈牙利
罗马尼亚
阜姆
（自由市）
南斯拉夫
保加利亚
阿尔
巴尼亚
意大利
西班牙
葡萄牙
土耳其
地中海
500 英里
500 公里



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使法国失去了英、美的特别军事保证，所以只得谋求各种各样的替代办法：鼓励组成一个“反对修订论者”的东欧国家集团（1921 年的所谓小协约国）；与比利时（1920 年）、波兰（1921 年）、捷克斯洛伐克（1924 年）、罗马尼亚（1926 年）、以及南斯拉夫（1927 年）缔结了单独的盟约；保持强大的陆军和空军来威慑德国，并且当德国不履行赔款协议时进行武装干涉，如 1923 年鲁尔危机那样；此外，尽力劝说各届美国政府对法国边界提供新的军事保证，而这件事只在多国参加的 1925 年洛迦诺条约中间接地得以实现。由于德国赔款和协约国战争借款互相纠缠在一起，不仅影响了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影响了美国与其以前的欧洲盟国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时期也是一个激烈的财政外交时期。道威斯计划（1924 年）的财政上的妥协，大大缓解了这一矛盾，从而为第二年的洛迦诺条约奠定了基础；接着，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后来又出现了杨格计划（1929 年）修正的财政条款。的确，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随着欧洲的重新繁荣，随着国际联盟显然被接受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新的重要因素，随着许多国家庄严地同意（根据 1928 年的巴黎公约）不采取战争手段解决未来的争端，外交舞台似乎已恢复正常。出现了象施特雷泽曼、白里安和奥斯汀·张伯伦这样的一些政治家，他们就好象是当代的梅特涅和俾斯麦，在欧洲的这个或那个温泉疗养地开会，按照他们的方式解决世界上的事务。

然而，不论表面印象如何，1919 年以后的国际体制的基础结构已明显不同于半个世纪以前影响外交政策的那种结构了，而且也较之更加虚弱了。首先，这 4 年半“总体”战争引起的人口损失和经济破坏是极其巨大的。大约有 800 万人在实际作战中死亡，另外有 700 万人终生残废，1500 万人以上“或多或少受了重伤”——其中大多数人还正当盛年。此外，除了苏联以外，欧洲

大约死去了500多万平民，他们死于“战争引起的原因”——“由战争引起的疾病、饥荒和物资缺乏以及军事冲突直接造成的伤亡”；而俄国，加上内战中的惨重损失，总的死亡数字就更大了。战时“生育赤字”也极高（因为很多男人离家去了前线，所以人口不能再按战前的一般出生率增长）。最后，即使主战场的战斗已经停止了，战斗与残杀却仍在战后边界冲突中发生；比如在东欧、亚美尼亚和波兰，而且这些受战争创伤的地区都未能逃脱1918～1919年可怕的流行性感冒，它又夺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因此，在这一段时期里最后总共伤亡可能已达到6000万人，其中近一半发生在苏联，法国、德国、意大利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在这样一场人类大灾难中，人们的个人痛苦与精神上遭受的打击是无法估量的，但是为什么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农民，这些参与者们都受到了战争的如此深重的影响，却是很容易理解的。

这次战争的物资损失是空前的，对于那些看过法国北部、波兰和塞尔维亚的一片废墟的人来说，甚至更是令人震惊：成千上万的房屋被毁坏，农场被掠夺一空，公路、铁路和电报线路被炸毁，牲畜被宰杀，森林被彻底摧毁，一大片一大片的土地由于散布着未炸的炮弹和地雷而变得不适于耕种。如果再加上航运业的损失、战争动员用的直接和间接费用以及各交战国所筹款项，整个数额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实际上已无法估量。事实上，大约损失2600亿美元，根据有人计算，“相当于世界上所有国家从18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国债的6倍半”。经过几十年的增长后，世界工业生产转而迅速下降；1920年比1913年还少7%，农业生产比正常水平低1／3。出口额只相当于战前时期的一半左右。整个欧洲经济的增长受到阻碍，大约推迟了8年①，

①也就是说，1929年的总产量只相当于如果不发生战争，并且继续按1913年以前的增长率发展时，1921年应达到的产量。

而各个国家所受的影响就更严重了。可以断定，1920 年骚乱中的苏联达到了工业生产的最低水平，只相当于 1913 年的 13%；但是在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大多数东欧国家，工业生产至少也比战前低 30%。

表 26 世界工业生产能力指数（1913～1925 年）

	1913	1920	1925
世界	100	93.6	121.6
欧洲*	100	77.3	103.5
苏联	100	12.8	70.1
美国	100	122.2	148.0
世界其他地区	100	109.5	138.1

*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瑞士、奥地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西班牙。

尽管有些国家受到战争的极大影响，然而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国家轻易地避开了战争的损失——并且还有许多国家提高了它们的地位。因为事实上是，现代战争及由之产生的工业生产能力，也有其积极的影响。从严格的经济和技术意义上来说，这些年在汽车和卡车生产、航空工业、炼油和化学制品、电气、染料和合金钢工业、制冷和罐头制造，以及其他许多工业领域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很自然，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完全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那么从这些工业进展中是很容易得到发展并且获得商业利益的。正因为如此，不但美国，而且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及南美部分地区，由于欧洲国家进行消耗战提出了对工业、原料和食品的要求而刺激了其经济的发展。正象在过去的商业斗争中一样，一个国家受损往往就是另一个国家受益——如果后者避免了战争损失或者至少未受到战争的全面破坏。

世界工业生产方面的数字是很难说明这个问题的，因为它们记录了欧洲（特别是苏联）受战争破坏的程度而其他地区却获得了大量利益。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说，工业化从欧洲向美洲国家、日本、印度和澳大利西亚扩展，并且后面这些地区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日益增长，只不过是从19世纪后期就已很明显的经济发展趋势的继续。因此，根据前面提到过的那项秘密计算，如果美国仍以1914年以前的速度继续增长，那么到1925年在总产量方面就可以赶上欧洲，而战争使这一事件提前了6年，即到1919年就实现了。另一方面，与1880～1913年的变化不同，全球经济平衡的这种特殊变化，如按照市场实力在和平时期花几十年时间都是无法实现的。相反，战争与封锁的作用产生了它们自己的强制性要求，因此大大改变了世界生产与贸易的自然模式。例如，造船能力（特别是美国）在战争中期已有巨大增长，以补充被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但是在1919～1920年以后，世界上的船只数量已经过剩。另外，在战争期间，欧洲大陆的钢铁产量下降，而美国和英国的产量却猛增；但是当欧洲钢铁产量恢复以后，能力过剩却令人震惊。这个问题也影响到了经济的一个更重要的部门——农业。在战争年代，欧洲大陆的农作物产量萎缩，苏联战前的谷物出口贸易也不复存在，然而在北美、南美、澳大利西亚却产量大增，那里的农民是奥国大公之死的明显的（尽管不是预谋的）受益者。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末当欧洲农业复苏以后，世界上的生产者却面临着需求下降和价格下跌的问题。这些结构失调现象影响着所有地区，但是中东欧的情况最为严重。在那里，奥匈帝国分裂后成立的脆弱的“继承国”要尽力设法对付新的边界、混乱的市场和通信事业失调等问题。凡尔赛议和以及按照（粗略地）种族界线重新划定欧洲的版图，这本身并未能保证经济稳定的恢复。

最后，为战争筹集资金引起了空前复杂的经济问题——然后

是政治问题。只有很少几个交战国（英国和美国除外）试图靠提高关税来支付一部分战争费用；而大多数国家几乎完全依靠借款，认为战败的敌人会被迫如期偿付到期的票据——正象 1871 年法国遇到的情况一样。现在，由于库存黄金不足，公债急剧升值，各国财政部门滥发纸币，使物价飞涨。由于战争带来了经济的破坏和国土的混乱，所以在 1919 年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准备追随美国回到金本位制。不严格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导致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给中欧和东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不顾一切地扩大出口造成了国内货币的竞相贬值，这只会使财政更不稳定——并造成政治上的对抗。这种情况又与协约国内部借款的难以处理的有关问题以及战胜国（特别是法国）对德国的巨额赔款要求完全纠缠在一起。欧洲的协约国都欠英国的债，也欠法国的债，但数额较少些；而英、法两国又都欠美国的沉重债务。布尔什维克对苏联的 36 亿美元的巨额借款采取了拒不承认的态度，美国要求收回它们的钱，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则在收到德国赔款之前拒付债务，而德国则声明它们不可能偿还所要求的数额，这场激烈的争吵持续了好些年，从而急剧加大了西欧与不满的美国之间在政治一致性方面的距离。

尽管这些争吵似乎真地通过 1924 年的道威斯计划而平息下来了，但是这场骚乱的政治及社会后果却是极其深远的，特别是在前一年的德国极度通货膨胀期间。同样令人惊恐的是，到 20 年代中期，世界经济表面上看在财政和商业上是稳定的，但是其基础远远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稳固，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尽管那时大多数国家都在恢复金本位制，但是还没有建立 1914 年以前那种以伦敦商业区为基础的微妙的（并且几乎是自动调整的）国际贸易与货币流通结构。事实上，伦敦已经不顾一切地试图恢复那种作用——包括 1925 年不惜严重伤害英国出口商的利益，将英币兑换率固定在 1 英镑兑换 4.86 美元

的战前水平，并且还重新开始向海外大量贷款。然而事实是，随着欧洲的国际债务的增加以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世界金融的中心已在 1914 年到 1919 年间自然而然地越过了大西洋。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很少依靠外国商业并且根本没有与世界经济结为一体，趋向于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农业方面）而不是自由贸易，缺少与英格兰银行完全对等规模的银行，在繁荣与破产之间更猛烈地起伏不定，政治家们更直接地受国内的院外活动集团（也称“第三院”）的影响，这种不同一般的结构意味着，国际财政和商业体制围绕着一个反复无常的有缺陷的中心点旋转。现在已不存在真正的“最后可以求助的贷方”，来为国际经济的基础发展提供长期贷款并且在国际来往结算暂时中断时起稳定作用。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这些结构的不适应性被掩盖了起来，因为当时大量美元以短期贷款形式从美国流入欧洲的政府和自治区，它们都愿意提供高利率以便将这些资金——并不总是很明智的——用于开发，并且弥补它们支付平衡中的缺口。由于短期资金被用于长期计划，由于相当数量的投资（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仍投向农业，因而增加了使农作物价格下降的压力，由于支付贷款的利息及提取偿债基金的费用惊人增长，而且不能靠出口来偿还而只能靠进一步借债来维持，所以在 1928 年夏天，当美国国内的繁荣（以及联邦储备银行相应地提高了利率）大大削减了资本外流时，这种依靠美国资本的体系就已经在崩溃了。

这种繁荣在 1929 年 10 月的“华尔街崩溃”中宣告结束，后来美国借款又进一步减少，于是诱发了似乎是无法控制的连锁反应：现成信贷的缺乏使投资与消费都有所缩减；工业化国家中受抑制的需求损害了食品与原料生产者，他们孤注一掷地不断增加供应，接着就目睹了几乎全面的价格崩溃——这使他们不可能反过来再购买工业制成品。通货紧缩，抛售黄金，货币贬值，对商业与资本采取限制措施，以及拖欠国际债务，都成为那时的各种

权宜之计；而每一种办法都是对全球贸易和信贷体系的进一步打击。当时唯一具有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美国为支援农民而通过了极端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使其他国家更难以赚到美元——并且导致了破坏美国出口的不可避免的报复。到 1932 年夏天，许多国家的工业生产只相当于 1928 年的一半，国际贸易也减少了 1／3。欧洲的贸易额（1928 年为 580 亿美元）在 1935 年仍为 208 亿美元——这反过来又打击了航运、造船、保险等各个行业。

在这种严重的世界范围大萧条及由此引起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国际政治也无法逃脱其可怕的影响。在制造业、原料和农产品方面的残酷竞争加剧了国家间的怨恨，并且促使许多政治家认识到其选民们的不满而试图使外国人付款；有些更极端的团体，特别是右翼团体，利用经济混乱来攻击整个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并且要求采取断然的“民族”政策，必要时可以以武力为后盾。一些更脆弱的民主国家被这些政治和经济的压力压垮了，特别是魏玛德国，而且还有西班牙、罗马尼亚和其他地区。统治日本的谨慎的保守主义者被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逐渐挤掉。尽管西方民主国家较好地克服了这些困难，但是它们的政治家们仍被迫集中于国内的经济管理，并日益倾向于挤掉邻国使之陷于贫困的立场。主要的黄金剩余国，无论美国还是法国，都不愿帮助债务国摆脱困境；确实，法国越来越倾向于运用自己的财政实力试图控制德国人的行为（这只会增加莱茵河彼岸的不满），并且支持它自己的欧洲外交政策。同样，关于德国赔款的“胡佛的延期偿付”使法国大为激怒，这个办法与减少（以至最后拖欠）战争债务的问题是紧密相联的，而这又使美国怨恨万分。通货的竞相贬值，以及在 1933 年世界经济会议上关于美元、英镑比价的分歧，使这种令人沮丧的形势完全呈现了出来。

那时，整个世界体系已被分解为各种对抗性的小集团：以英

国贸易模式为基础并且由于1932年渥太华会议的“帝国特惠关税”而得到增强的英镑集团；由法国领导的金本位国家集团；在远东依赖于日本的日元集团；美国领导的美元集团（在罗斯福也抛售黄金以后）；以及完全与这些经济变动无关并且正稳步地“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因此，甚至在阿道夫·希特勒开始他的建立一个自足的千年帝国计划之前，向自给自足发展的这种趋势就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按照这项计划，对外贸易被简化为特殊的交易和“物物交换”协议。由于法国在德国赔款问题处理上一再反对英国人的权势，罗斯福则声称美国在与英国做买卖中总是吃亏，而内维尔·张伯伦已经确认他最近关于美国政策都是“空话”的说法是正确的，所以这些民主国家都没有心情进行合作，以共同应付在充满裂痕的1919年世界秩序中由于领土要求而产生的压力。

东半球的政治家和外事部门始终感到要理解或处理经济问题都是非常困难的；而对于那些留恋19世纪内阁外交政策的人来说，一个更加混乱的特征也许是，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这个期间，国际事务日益受到广大公众意见的影响。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遍及欧洲的政治集团就不断批评“旧外交”的神秘的、遮遮掩掩的做法和依靠杰出人物的先入之见，要求进行体制改革，使国家事务接受广大人民及其代表的监督。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使这些要求愈加强烈，这一方面是由于要求社会总动员的领导人们已意识到，社会相应地也会要求为其损失作出补偿和要求在和平问题上的发言权；另一方面是由于被协约国宣传员们鼓吹为是为民主和民族自决而战的这场战争，确实粉碎了中东欧的独裁帝国；此外也是由于，正当克雷孟梭和劳合·乔治宣扬需要全面胜利的时候，强有力而吸引人的伍德罗·威尔逊为建立新的开明的世界秩序而不断施加压力。

然而，1919年以后"公众舆论"存在的问题是，它的许多部分都与格拉斯顿和威尔逊的天真想象不符，他们幻想着人民大众都是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有教养的、公正的，充满了国际主义的精神、功利主义的设想并且都是尊重法治的。正如阿诺·迈耶所指出的那样，引起世界大战的"旧外交"（普遍这样认为）在1917年以后，不仅受到威尔逊改良主义的挑战，而且受到布尔什维克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更系统的批判——这种批判对于交战双方阵营中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都颇具诱惑力。虽然这促使象劳合·乔治这样一些机智的政治家们创造了他们自己的一"整套"进步的国内外政策，抵消了威尔逊的影响力并且抑制了工人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向，然而对协约国阵营中更保守的民族主义者的影响就大不相同了。在他们看来，"国家安全"只能用调整边界、获得殖民地和赔款等切实的好处来衡量，为了国家"安全"的利益，威尔逊主义原则一定要坚决抛弃；而且，列宁的威胁更可怕，一定要在布尔什维克心脏地带以及（特别是）在西方出现的模仿苏维埃的地区无情地予以摧毁。换句话说，在议和中采用的政治和外交手段，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和国内政治的背景因素，这在1856年和1878年的会议上还没有如此强烈。

情况还不止这些。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流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景象是死亡、破坏、恐怖、荒芜和这一切的徒劳无益。1919年的"迦太基式的和平"，没有战时政治家们所许诺的那么多好处来补偿人民的牺牲，数百万伤兵和战争造成的寡妇，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困难，信念的消失，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及个人关系的崩溃，所有这一切都归罪于1914年7月所作决定的愚蠢。但是，在民众中广泛存在的这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畏缩情绪，在许多方面与指望国际联盟能保证灾难不再重演的意愿结合在一起，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战争参加者都这样想——尽管英美的文献给人这种印象。遍及欧洲大陆的成千

上万从前的前线士兵，由于失业、通货膨胀以及对战后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秩序的厌倦而醒悟过来。对于他们来说，战争代表了残酷无情但又确实有助益的一些事情：军人的价值，战士间的友谊和忠诚，采取暴力和行动时的战栗与激动。这样的团体，特别是在战败的德国和匈牙利以及极度不满的战胜国意大利就有不少，但是也存在于法国的右翼分子中。对于这样的团体来说，新法西斯运动的思想是很有吸引力的——这是关于秩序，纪律和民族荣誉的思想，关于彻底粉碎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分子、颓废派文人以及自满的中产阶级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以及日本的相应人物看来），生命的不朽特性就是斗争、暴力和英雄主义，并且认为威尔逊国际主义的原则是虚伪的和过时的。

这意味着，20 世纪 20 和 30 年代的国际秩序由于意识形态以及国际社会不断分裂为一些政治集团而越来越复杂化，而且这些集团与前面提到过的从经济上的划分方法只有部分一致。一方面，有些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说英语的那些国家，它们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惧，而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特别是社会经济的）问题，并且大大压缩军队编制；在法国，虽然其领导者由于惧怕德国复活而保持了庞大的陆军和空军，但是很明显，法国的大部分公众是憎恨战争和要求社会复兴的。另一方面，则是苏联的存在，它在很多方面被孤立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之外，虽然它普遍地被人们仇视，但是也吸引着西方的赞赏者，因为据说它提供了一种“新文明”，**尤其是**它逃脱了（1929 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最后，至少到本世纪 30 年代，又出现了法西斯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等“修订论者”，他们不但恶毒地反对布尔什维克，而且公然抨击 1919 年新建立起来的自由资本主义现状。所有这一切，使得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们执行对外政策异乎寻常地困难。他们对于法西斯或布尔什维克的心境都不怎么掌握，只渴望回到已被战争彻底毁灭的爱德华时代的“正常”状态。

与这些问题相比，1919年以后在热带地方兴起的对欧洲中心世界的挑战就不太具威胁性了——但是仍然重要。这里，人们还能找到1914年以前的先例，例如埃及的阿拉比·帕沙起义，1908年以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突破，提拉克企图使印度国大党运动激进化以及中国的孙逸仙反对西方控制的运动。而且，历史学家还注意到象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以及同年发生的夭折了的俄国革命这样的事件，这些事件吸引了也震惊了亚洲和中东的其它地区的原始民族主义者。具有讽刺意义但却可以预料到的是，殖民主义不断向不发达社会渗透，将它们拉入全球贸易和金融网，并且使它们与西方思想意识相接触，其程度越深就越会挑起一种本能的反作用；无论是以部族骚乱的形式来反抗对他们传统的生活和贸易方式的限制，还是以更具重大意义的形式，即受过西方教育的律师和知识分子设法成立群众性政党并且进行民族自决运动，其结果都是不断加强对欧洲殖民统治的挑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各种方式促进了这些倾向。首先，加紧对热带地区原料的经济开发并且企图让殖民地在人力和税收两方面为大宗主国的战争努力作出贡献，这一切必然象欧洲工人阶级一样会提出“补偿”的问题。其次，在西非、西南非、东非、近东和太平洋地区发生的运动，对一般殖民帝国的生命力及持久性产生了怀疑——这一趋势由于协约国对“民族自决”和“民主”的宣传，以及德国向马格里布、爱尔兰、埃及和印度进行的反宣传活动而进一步加强。到1919年，当欧洲大国正着手建立它们的国际联盟托管地时——正象A·J·P·泰勒曾经描述的那样，将其帝国主义利益掩藏在精心制作的遮羞布之下——泛非国民大会在巴黎召开，并且提出了其观点；在埃及创建了华夫脱党，中国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作为现代土耳其奠基人的凯米尔·阿塔图克正崭露头角，突尼斯的宪正党正重新系统地提出其策略，印度尼西亚的萨雷哈特穆斯林已拥有250万成员，甘地正在印度串联

各派反对英国统治的许多力量。

更重要的是，这种"对西方的反抗"不会再遇到诸大国在下面问题上的统一看法了：无论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分歧，在它们与世界不发达地区的人民之间是存在着一条鸿沟的；这也是与柏林西非会议时代的另一个很大不同之处。由于日本人加入大国俱乐部，已经使得这样的一致成为多余的了，日本的一些思想家早在1919年就开始明确表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想法。而且，它完全被列宁和威尔逊提出的"新外交政策"的两种模式所超过——因为无论这些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之间的政治分歧如何，他们都同样憎恶旧欧洲的殖民秩序，并且企图将之改变为其他某种形式。由于很多原因，他们二人都不能阻止在国际联盟的委托管理下殖民秩序的进一步扩展；但是他们的雄辩和影响力已经超出了帝国疆界，并且与本地民族主义者的活动相互影响。在20年代末的中国，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在那里，条约特权、商业渗透和偶然的炮舰行动这种欧洲式的旧秩序，在与苏联、美国和日本提出的其它模式的"秩序"进行竟争中开始失败了，并且在苏醒的中国民族主义面前开始衰退。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殖民主义行将崩溃。1919年英国在（印度）阿姆利则作出强烈反应，20年代末荷兰人将苏加诺和其他印尼民族主义领袖投入监狱并且解散了工会，法国对（越南）东京因稻米和橡胶在农艺上的迅速发展而引起的骚动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所有这些都证实了欧洲军队和武器的余威犹存。当然，对于意大利迟至30年代中期对阿比西尼亚主权进行帝国主义的侵犯也可同样看待。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与远为巨大的冲击，才真正使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失去了控制能力。然而，这种殖民地骚动对于20年代，特别是30年代的国际关系是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的。首先，它们分散了某些大国的注意力（和财源），使之不能只关心欧洲力量平衡问题了。英国的情况最为明显，其领导人

对巴勒斯坦、印度和新加坡的担心程度远比对苏台德或格但斯克更甚——这种轻重缓急的变化也反映在1919年以后它们的“帝国”防务政策中；但是卷入非洲在同样程度上也影响着法国，当然也大大分散了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其次，在某些情况下，在欧洲以外的殖民主义问题的重新出现，正在直接破坏着从前在1914～1918年的联盟结构。帝国主义存在的问题不仅使美国人更不相信英、法的政策，而且到30年代象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以及日本人侵入中国大陆这样的事件，使得罗马和东京与伦敦和巴黎发生决裂——并且给德国“修订论者”提供了可能的伙伴。这又一次表明，按照“旧外交”的习惯处理国际事务更是有点困难了。

战后不稳定最终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样一个棘手的事实：“德国问题”尚未解决而且更加难以处理、更加激烈。当1918年10月德国军队还控制着从比利时到乌克兰的欧洲广大地区时，德国就已在迅速崩溃，这对于德国的民族主义右翼力量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们为这次屈辱的投降而谴责“内部的叛徒”。当巴黎和解条件带来了更大的屈辱时，许许多多的德国人公然斥责这一“奴役条约”和同意这些条件的魏玛民主派政治家们。赔款问题和与之有关的1923年极度通货膨胀，使德国人的不满情绪达到了极点。象国家社会主义者那样极端的人物，只占极少数，他们在20年代的多数时间里从事着不稳定的、具有煽动性的、较次要的活动。但是，不是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修订论者的德国人，也只占极少数。赔款、波兰走廊、限制军事力量、将说德语的地区与其祖国分开，这些问题德国人是不会永远容忍下去的。问题只不过是多久才能废除这些限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使用外交手段而不凭借武力来改变现状。在这方面，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只是加紧了德国人修订凡尔赛条约的努力。

解决德国人在欧洲的“恰当”地位这一问题，与第一次世界大

战以后难以理解的不平衡的国际力量分布的问题搅和在一起。尽管德国失去了一些领土、军备受限制并且经济不稳定，但是从1919年以后它仍**可能**成为一个很强的大国。下面还要更详细地分析德国的实力和弱点，但是这里应当指出，德国依然拥有比法国多得多的人口和大约3倍于法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其内部通信网络完整无损，化工厂、发电厂、大学和技术学院也一样。"当1919年时，德国被打垮了。眼前的问题是德国的衰弱；但是过了几年'正常'生活后，面临的问题又成了德国强大的问题"。而且，正象泰勒指出的那样，欧洲大陆旧有的、有助于抑制德国扩张的那种力量平衡已不复存在。"苏联撤退了；奥匈帝国不存在了。只有法国和意大利保留下来，但是二者在人力上处于劣势，在经济资源上更是这样，它们都被战争消耗殆尽。"随着时间的流逝，首先是美国，然后是英国，表现出对介入欧洲事务的日益增长的厌倦情绪，并且越来越不同意法国要压服德国的做法。恰恰是法国并不安全这一想法，促使巴黎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办法试图阻止德国力量复活：坚持要求全部赔偿；花很多钱维持自己庞大的军事力量；尽力把国际联盟变成致力于保持现状的组织；反对允许德国"武装"到法国水平的一切建议——可以预言，所有这一切，燃起了德国的怒火并且助长了右翼极端分子的骚乱。

法国开展外交和政治攻势的另一种武器是加强与奥匈帝国分裂后成立的东欧各"继承国"之间的联系。从表面上看，支持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那一地区其它的1919～1921年解决方案的受益国，是似乎有理而又有希望的策略；用这种办法就在两翼抑制德国的扩张主义行动。实际上，实行这种方案有很大困难。由于在从前的多民族帝国中，各个种族的人民分散在各个地区，因而在1919年不可能提出一个采取种族聚居原则的领土解决方案；因此，各国的边界都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居住在不合适的一边，这不仅是国内衰弱的根源，也是造成国外不满的根本原因。

换句话说，德国在要求修订巴黎和约方面不是孤立的；而且，即使法国渴望维持现状不变，但是英、美两国却显然都不很赞成对这一地区草率划定的不规则国界。正如伦敦在 1925 年所表明的那样，在东欧是不会有洛迦诺式的保证人的。

在东欧和中欧，由于这些新建立的国家建立了海关和关税壁垒，因而加剧了地区间的竞争，阻碍了全面的发展，所以这一地区的经济情况更加糟糕。战前欧洲有 14 种独立的货币，现在又增加到 27 种，国境线也多了 12500 哩；许多国界将工厂与原料产地、铁厂与其煤田、农场与其市场分开了。更重要的，尽管英法两国的银行家和企业在 1919 年以后进入了这些继承者国家，但是，一旦德国在 30 年代恢复了自身的经济稳定，那些国家的更加"自然的"贸易伙伴还是德国。因为德国不仅离东欧更近，铁路和公路的交通更方便，而且它吸收这一地区剩余农产品所采取的办法，是农产品过剩的法国和实行国内商品特惠关税的英国不可能做到的。德国进口匈牙利小麦和罗马尼亚石油，反过来再向这些国家提供急需的机器和（以后的）军备。况且，这些国家与德国一样也都存在货币问题，所以采用易货方式进行贸易就更容易。因此，从经济上说，中欧可能又逐渐变成德国控制的地带。

1919 年巴黎谈判的许多参加者已意识到了上面提到的某些（虽然显然不是全部的）问题。然而他们觉得，可以象劳合·乔治那样指望新成立的国际联盟"来医治、补救和纠正。……（它）将起着上诉法院的作用，对粗鲁的举止、不正当行为和非正义的侵权行动重新进行调停。"当然，各国间的任何突出的政治或经济纠纷，现在可以由讲道理的人围坐在日内瓦会议桌旁来加以解决了。这又似乎是 1919 年提出的一个很有道理的设想，但是它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失败了。美国拒绝参加国际联盟。苏联被当作"贱民"的国家而拒之于国际联盟之外。对于战败国也是如此，至少在开头几年是这样。当修订论者在 30 年代开始他们的

侵略活动时，它们不久就迅速退出了国际联盟。

此外，由于英法两国对于国际联盟应当是什么模式——是警察还是调停者，一开始就有在着分歧，因此国际联盟缺乏强制力，也没有真正的保证集体安全的机构。因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国际联盟的现实贡献不但没能阻止侵略者，反而搞乱了民主国家。国际联盟受到西方厌战舆论的广泛欢迎，但是由于它的建立就产生了许多主张，认为国际联盟会设法阻止未来的战争，因而不需要国防力量了。结果，国际联盟的存在使得内阁和外交部长们在“旧”的与“新”的外交政策之间摇摆不定，正象满洲和阿比西尼亚事件所充分证实的那样，它一般不保护任何一方的利益。

根据上述所有困难以及在凡尔赛条约签订以后只有20年欧洲就陷入了另一场大战这个不可抗拒的事实来看，无怪乎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看作“二十年的休战”，并且把它说成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混乱的时期——充满了危机、欺骗、暴行和耻辱。但是，象《破碎的世界》、《失去的和平》以及《二十年的危机》这样一些书，都是将这两个十年作为整体来描写的，因而20年代与30年代的重大区别就有被忽略的危险。现在重复一下前面的评论，即到20年代末，签订了洛迦诺条约和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巴黎公约），解决了法德之间的许多分歧，国际联盟不断召开会议而且全面恢复了繁荣，这一切似乎都表明，就国际关系而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然而，在其后的一、两年内，毁灭性的财政与工业崩溃就破坏了这种和谐的气氛。日本和德国（以及后来的意大利）民族主义分子又向现存的秩序提出了挑战，并且这两方面的因素相互影响。经过非常短暂的和平时期以后，战争的阴云又返回了大地。正当民主国家在心理上和军事上均无战争准备，并且它们之间的关系比1919年和平解决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不协调之时，世界秩序却从根本上受到了威胁。因此，无论某一个“主张绥靖的人”在不幸的30年代有什么缺陷及愚蠢之处，

我们还是应当牢记，这十年内政治家们不得不设法应付的局面是前所未有的复杂。

在了解这一时期的国际危机是怎样导致战争以前，再考查一下各大国的实力和弱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大国不仅都受到1914～1918年战争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两次战争之间这段时间的经济与军事发展的影响。关于后一方面的情况，前面的表12～18已说明了各大国间在生产平衡方面的变化。这些情况在下面的讨论中还会一再涉及。这里仅就重整军备的经济问题进一步作两点初步说明。第一，与1914年以前的十年相比，各个大国在30年代的增长率十分不同；世界经济的正常秩序被打乱而形成了许多集团，各个大国都采取了很不相同的经济政策（从四年计划和“新政”到传统的紧缩通货的预算），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产量与财富可能在增长，而另一个国家则显著下降。第二，两次大战之间军事技术的发展使武装力量更加依赖于其国家的生产力。如果没有蒸蒸日上的工业基础，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动员庞大而先进的科研机构跟上新武器的发展，那么要在另一次大战中取得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未来掌握在（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庞大的军队手中，而军队则日益依赖于现代技术和大规模生产。

二、挑　战　者

意大利

如果一个大国的经济脆弱，那么无论其领导者是多么有生气和野心勃勃，也将一事无成，这从30年代意大利的情况可以看得更加明显。从表面判断起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制度已将这个国家从外交世界的腹地推到最前线。它与英国一起，是1925年洛迦诺条约的外部保证人之一；它还与英国、法国和德国一起，

是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签字国。通过攻占科孚（1923年）、加强“平定”利比亚以及大规模介入西班牙内战（5万意大利军队），意大利已表明它坚决要争夺地中海地区的霸权。在1935～1937年间，墨索里尼公然违抗国际联盟的制裁以及西方的反对意见，通过对阿比西尼亚的残酷征服，为阿多瓦的失败报了仇。在另外一些场合，他则主张维持现状，在1934年将军队调到布伦内罗以阻止希特勒接收奥地利，并且毫不犹豫地于1935年在斯特雷扎签订了反德协定。他的反布尔什维克的长篇激烈演说，使他在20年代赢得了许多外国人（包括丘吉尔）的钦佩，在以后的10年中四面八方都想取悦于他——直到1939年1月张伯伦还跑到罗马游说，想阻止意大利彻底滑到德国的阵营。

但是外交上的杰出成就并不是衡量意大利新的伟大形象的唯一方面。这个法西斯国家取消了搞宗派的政党政治，经济上实行替代劳资争端的“各阶级合作主义”的计划，并且支持政府的活动，这一切似乎为清醒过来的战后欧洲社会提供了一种新模式——并且吸引着惧怕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另一种“模式”的那些人。由于协约国的投资，工业化从1915年到1918年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至少在与军工生产有关的那些重工业部门是这样。在墨索里尼领导下，这个国家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从彭坦沼泽地排水工程，到令人难忘的水电发展和铁路系统的改进。电化学工业进一步发展，人造丝以及其他人造纤维也得到很大发展。汽车产量增加了，意大利的航空工业似乎已进入了世界最富有革新精神的行列，它的飞机在速度和高度方面创造了一连串的新纪录。

军事力量也充分显示了意大利崛起的迹象。虽然墨索里尼在20年代还没有在武装力量上花很多钱，但是由于他相信武力和征服，并且日益企望扩大意大利领土，因而导致了30年代期间国际开支的大量增长。确实，到30年代中期，它将略多于10%

的国民收入，和政府收入的 1／3 用在了武装部队上，其绝对数字大于英国或法国，比美国的总额则大得多。为了与法国海军及英国地中海舰队竞争，并且支持墨索里尼关于地中海确实是“**我们的海**”的主张，正在建造漂亮的新战舰。当意大利参战时，它已拥有 113 艘潜艇——“也许是除了苏联以外世界上最大的潜艇部队”。在 1940 年前的几年里，分配给空军（即皇家空军）的款项比海军更多，这也许与早期法西斯主义把重点放在现代化、科学、速度和诱惑力上是一致的。在阿比西尼亚，尤其是在西班牙，意大利人都显示了其空中力量的价值，也使他们自己以及许多外国观察家确信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空军。海军和空军的建设使得意大利陆军的资金大大减少，但是，在 30 年代后期基本上重建了陆军的 30 个师，并且还设计了新型的坦克和大炮。此外、墨索里尼认为，有大量的**法西斯行动队队员**和一伙训练有素的人，所以在另一场全面战争中完全能拥有所声称的“八百万把刺刀”。所有这一切，预兆着第二个罗马帝国的形成很有希望。

然而这真是天大的一场梦。法西斯意大利的强权政治竟然惊人地虚弱。关键问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意大利从经济上说还是一个半发达国家”。它 1920 年的人均收入可能只相当于英国和美国在 19 世纪初以及法国在其后几十年所达到的水平。国民收入数字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即人均收入在北方高于平均水平 20%，而在南方则比平均水平低 30%；并且这一差距甚至还正在扩大。由于移民的不断流动，意大利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份里每年人口增长大约只有 1%；因为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 2%，所以人均所得每年只增长 1%，这并不是灾难性的，但也很难说是一场经济奇迹。意大利虚弱的根本在于仍然依靠着小规模的农业。其农业产值在 1920 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0%，而从事农业的人口占全部劳动人口的一半。这个国家经济落后的另

一个标志是，直到 1938 年一个家庭的开支中还有一半以上花费在食物上。法西斯主义者非但没有降低这些比例，反而更加强调乡村生活的优点，力图通过一套办法来支持农业，包括保护性关税，广泛垦荒，最后是完全控制小麦市场。意大利最重要的考虑是希望减少对国外粮食生产商的依赖，并且强烈希望防止农民进一步流入城市，否则就会增加失业总人口，增加社会问题，结果是农村存在严重的**不充分**就业，同时还带来了相应的一切特征：低下的生产力、文盲、极大的地区差别。

因为，意大利经济比较落后，并且这个国家宁愿把钱花在军备和保护乡村农业上，因此给企业投资的储备金数额很低，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减少了国内资金储备，那么经济萧条以及转向保护主义则是进一步的打击。诚然，有些公司由于接受政府的飞机或卡车订货而获得很多利润，但是意大利的工业发展要从自给自足的政策获得好处（总的来看）是不太可能的；关税只能保护无效率的生产者，而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新重商主义则减少了早先曾大大刺激过意大利工业化的外国投资的流入。到 1938 年，意大利仍然只拥有世界工业生产的 2.8%，钢产量占 2.1%，生铁占 1%，铁矿石占 0.7%，煤占 0.1%，现代能源的能量消耗率远低于其它任何大国。最后，由于墨索里尼明显地渴望与法国打仗，有时甚至要与英国和法国一起打仗，所以值得指出，意大利仍窘迫地依赖于进口肥料、煤、石油、碎铁、橡胶、铜和其它重要原料——80%要经过直布罗陀海峡或苏伊士运河，而且其中大部分要靠英国船只运输。这种制度的典型特点是，万一这些进口物资中断时没有准备应付意外事故的计划，并且因为到 30 年代末意大利连满足它当前的需要的外币都没有，所以这类战略物资的储备政策是根本谈不到的。意大利人买不起对生产更现代化的飞机、坦克、枪炮和舰船（这些武器是大约 1935 年以后的几年内研制的）极为关键的德国机

床，其原因就是这种长期的货币短缺。

尽管墨索里尼政权十分重视并把大量财力都放在军备上，而它们的实际成效和状况还是很糟——而且越来越糟，其原因也是经济上的落后。海军大概是三军中装备最好的，但是要把英国皇家海军赶出地中海大概还是太弱了。它没有航空母舰——墨索里尼禁止建造——而被迫依赖于皇家空军，这是一种缺乏军种间合作的拙劣的安排。海军的巡洋舰是只能在好天气时使用的舰只，其庞大的潜艇部队也被证明是巨大的投资浪费："船只缺乏攻击用的计算机，当受到深水炸弹攻击时空气调节系统的管道破裂会放出有毒气体，并且潜艇的下潜速度比较慢，这在敌机临近时是很麻烦的。"在意大利空军中也存在类似的逐渐过时的现象，虽然在对阿比西尼亚部落进行的轰炸中（即使不是总能命中）显示了其能力，接着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表现又给许多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到 30 年代末，"菲亚特"CR42 双翼机与英国和德国的更新式的单翼机相比则显得黯然失色了；甚至轰炸机部队也只有轻型和中型轰炸机，发动机性能差、炸弹杀伤力很小。然而这两个军种在国际预算中所占比例仍能保证不断增长。相比之下，陆军所占的比例从 1935～1936 年的 58.2%，下降到 1938～1939 年的 44.5%，并且这正是陆军迫切需要现代化坦克、大炮、卡车和通信系统的时期。当意大利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其陆军的"主战坦克"是"菲亚特 L.3"型，重量为 3.5 吨，没有无线电设备，视野狭窄，而且只有两挺机枪——这时德国和法国的最新式坦克设计，重量将近 20 吨，而且装有更具杀伤力的重型武器。

由于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严重影响意大利经济发展的许多弱点是几乎无法克服的，所以那种认为意大利在与另一个特定大国的战争中能够获胜的看法是很轻率的；由于其武装力量是早期重整军备的受害者，并且其装备很快就陈旧了。所以意大利的前景更为暗淡。由于这个问题是 30 年代几乎同样影响着法国和俄国的

一个共同问题，所以在专门分析意大利的弱点之前，较详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关键的因素就是将科学技术成就尽快地应用于这一时期的军事发展上，当时正在改造各个军种的武器系统。例如，战斗机很快从机动的（但只配备轻型武器并且用的是蒙布）时速约为200哩的双翼机，发展到"装有多挺重机枪和机关炮、座舱装甲和自封油箱的硬铝单翼机"，其时速可达400哩并且需要功率更大的发动机。轰炸机正在——在那些花得起这笔钱的国家里——从双发近程中型轰炸机发展为可携带大量炸弹、作战半径在2000哩以上、造价很高的四发轰炸机。华盛顿条约以后建造的战舰（例如，"国王乔治五世"号、"俾斯麦"号和"北卡罗来纳"号），与以前的舰型相比，速度更快、装甲板更厚并且配备了更强大的防空系统。新型航空母舰是设计完善的大型舰只，与20年代现代化水上飞机母舰和改进型战斗巡洋舰相比，具有强大得多的攻击能力。坦克的开发者们抓紧研制武器装备更好、装甲更厚的重型坦克，这就要求拥有比1935年前几年的轻型试验样车所用的功率大得多的发动机。而且，所有这些武器系统已开始受到电信技术的变革、导航设备和反潜探测设备的改进、早期雷达和改进型无线电设备等的影响。这不仅使新式武器更加昂贵，而且也使创建过程更加复杂。谁有足够的新机床、测量仪器和模具来转而生产这些改进型武器呢？军备生产和电力供应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吗？它们有足够的零部件工厂和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吗？谁敢停止生产那些已试用过的但是也许逐渐过时的老型号，而去等待需经试验然后再建造的新型号呢？最后——而且是关键性的——不顾一切地重整军备，与国家的经济状况、获得国外资源和国内资源的能力以及达到支付平衡的能力有什么关系呢？当然，这些并不是什么新的困难问题，但是它们给予30年代决策者的压力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这迫使他们不得不加紧考虑解决这些问题。

从这种技术和经济（以及外交）的角度出发才可以最好地了解30年代大国重整军备的各种模式。在这十年中各个国家在编制其实际每年国防开支总额方面，尽管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但是通过表27还是可以对当时情况有相当的了解。

用这种对比的观点来看，意大利问题就更加清楚了。从绝对数字上说，30年代前半期意大利的军费开支并不很大，不过当时的军费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除了苏联以外，可能比其它所有国家都要高。但是，旷日持久的阿比西尼亚战争，同时又介入了西班牙内战，导致了1935～1937年间国防开支的巨大增长。因而，意大利这些年的国防开支有一部分是用于当时的战争，而没有用于三军或军事工业的建设。相反，在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的冒险，使意大利受到极大削弱。这不仅由于战场上的损失，而且由于战争拖得时间越长，就需要进口——并且支付——更多的重要战略性原料，使得意大利银行的储备金到1939年已减少到几乎一无所有的地步。由于买不起空军和陆军现代化所需要的机床和其他设备，所以这个国家可能在1940年前两三年就已经日益衰弱了。陆军的改组对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仅靠将每个师的建制从三个团减少到两个团，而使师的数目增加了一半，这种做法使许多军官得到了提升，但是在实力上却无丝毫增长。凭着生产能力比1915～1918年还低的工业来支持（如果能用支持这个词的话）的空军，声称拥有8500多架飞机；但是进一步的调查表明，它总共只有454架轰炸机和129架战斗机，而且只有极少数在其他国家空军中堪称第一流的飞机。意大利没有象样的坦克、高射炮、快速战斗机、合适的炸弹、航空母舰、雷达、外币以及后勤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竟然在1940年把他的国家推入了另一场大国战争中，他设想这是一场已经打赢了的战争。事实上，只有奇迹或德国人能够阻止一场空前规模的历史性的灾祸。

当然，以上这些只强调了武器和数量，而忽略了领导能力、人员素质以及民族好战性等因素；然而可悲的是，这些因素非但没有弥补意大利物资的不足，反而增加了其相对的脆弱性。尽管在表面上进行了法西斯主义灌输工作，但是在 1900 年到 1930 年间，意大利的社会及政治文化并没有什么改变，以致使军人生涯更能吸引那些有才能有抱负的男子汉。相反，集体的低效率、缺乏创新精神以及关心个人前程，都显得荒谬可笑——使德国使馆官员和其他军事观察家都感到十分惊诧。陆军并不是墨索里尼的驯服工具；它能够而且经常阻挠他的愿望实现，提出种种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事情不能办到。陆军的命运就是经常在没有事先商议的情况下，被推入战斗而它又不得不在其中有所行动。由小心谨慎而缺乏训练的高级军官指挥，而且缺少有经验的军士作为中坚力量，在万一发生大国战争时，这样的陆军的处境是无望的。海军（除了有进取心的小型潜艇部队外）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皇家空军的军官队伍和机组人员尽管受到较好的教育和训练，但是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因为他们仍驾驶着陈旧的飞机，其发动机易毁于荒漠，炸弹的杀伤力很小，火力也弱得可怜。也许根本不需要再说，没有参谋长委员会来协调三军之间的计划或讨论（更不用说解决）防御重点了。

最后，负有头等战略责任的是墨索里尼本人。普遍认为，他并不是他自己设想的那种希特勒式的全能领导人。国王维克托·埃曼努埃尔三世力求保住他的特权，并且成功地保持了官僚和军官队伍大多数人对他的忠心。对于许多意大利人来说，罗马教皇的职位也是一个独立的竟争性的权力中心。到 30 年代，大工业家和不驯顺的农民对这一政体都不热心；国家法西斯党本身，或者至少是地区首领，则似乎更关心工作的分配而不是追求国家荣誉。但是，即使墨索里尼已占绝对统治地位，意大利的局势也不会变得更好些，因为这位领袖有自欺的嗜好，经常说大话和咆哮

恐吓，天生的不诚实，不能有效地行动和思考，而且管理能力很差。

表 27　诸大国的国防开支（1930～1938）

（单位：百万美元，当年币值）

	日本	意大利	德国	苏联	英国	法国	美国
1930	218	266	162	722	512	498	699
1933	183 (356) [387]	351 (361)	452 (620)	707 (303)	333 (500)	524 (805)	570 (792)
1934	292 (384) [427]	455 (427)	709 (914)	3479 (980)	540 (558)	707 (731)	803 (708)
1935	300 (900) [463]	966 (966)	1607 (2025)	5517 (1607)	646 (671)	867 (849)	806 (933)
1936	313 (440) [488]	1149 (1252)	2332 (3266)	2933 (2903)	892 (911)	995 (980)	932 (1119)
1937	940 (1621) [1064]	1235 (1015)	3298 (4769)	3446 (3430)	1245 (1283)	890 (862)	1032 (1079)
1938	1740 (2489) [1706]	746 (818)	7415 (5807)	5429 (4527)	1863 (1915)	919 (1014)	1131 (1131)

在 1939 年和 1940 年，让意大利保持中立还是让它与德国并肩战斗，西方协约国经常从正反两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总的看

来，英国的参谋长们不愿意大利介入战争，以便在地中海和近东保持和平；但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回想起来这些反对意见是正确的。在人类战争的历史上很少有人会认为，增加一个敌人将使敌方比我方遭到更大的损失；但是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至少在这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日本

日本对现状发起的挑战也有一种极为独特的风格，需要既成大国更严肃地对待。20 和 30 年代的世界，具有种族主义和文化上的偏见的浓厚色彩，西方很多人根本没有把这些"矮小的黄种人"放在眼里；只有当日本人对珍珠港、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群岛实行毁灭性攻击时，才彻底揭示了认为日本人目光短浅、发育不全、不会运用机械的这种拙劣的陈词滥调完全是一派胡言。日本海军刻苦地训练昼夜作战而且认真学习；其使馆官员则源源不断将情报反馈给东京的计划制定者和船只设计师。陆军和海军航空兵也经过了很好的训练，拥有大批合格的驾驶员和勇于献身的机组人员。就陆军本身而论，坚毅而又极度爱国的军官领导着充满武士道精神的部队；在进攻和防御作战中他们都是难以制服的军队。导致暗杀（所谓的）懦弱大臣的狂热可以很容易地转变成战斗力。当其他国家的军队只是在口头上叫嚷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日本士兵却真正理解了这句话并且付诸行动。

然而，日本与祖鲁斗士的区别在于，前者在这一时期不但有纯粹的勇敢，还拥有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推动了 1914 年前日本就已开始的工业化过程。这一方面是由于协约国的军火订货合同以及对日本航运业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本自己的出口商跨入了西方已不能再提供供应的亚洲市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进口和出口增加了两倍，钢和水泥生产增加一倍以上，在化学和电子工业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日本在战争期间还清了外债并且与美国一样，成为一个

债权国。它还成了一个主要的造船国，1919年就下水了650000吨位，而在1914年仅有85000吨位。国际联盟的《世界经济概览》表明，战争对日本工业生产能力的推进比对美国还大，1919～1938年期间继续保持了这样的增长势头，这说明日本的总的发展速度仅次于苏联而居世界第二位（参见表28）。

事实上，到1938年，日本在经济方面不仅远远超过了意大利，而且制造业和工业产品的全部指数都赶上了法国（参见表14～18）。如果其军事领导人不发动1937年在中国的战争和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这是更惨重的失败），则它也可能早就赶上了英国的产量，而不致于拖到60年代中期。

这并不是说日本毫不费力就克服了所有的经济困难，而只是说明它正引人注目地变得强大起来。由于其银行制度还很不发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要适应债权国的地位并不容易，而且其对货币发行量的管理已经引起了极大的通货膨胀——更不用说1919年的"米骚动"了。随着欧洲恢复了和平时期的纺织品、商船和其他产品的生产，日本感到了重新开始的竞争的压力。在这一阶段，日本的制造业成本还普遍高于西方。而且，日本人口的很大部分还从事着小块土地的农业生产，这些小团体不仅受不断增加的从台湾和朝鲜进口稻米的影响，而且也受极端重要的生丝出口贸易由于30年代以后美国需求减少而衰落的影响。通过帝国扩张来缓解这些不幸，对于焦急的或野心勃勃的日本政治家来说一直是个诱惑——例如，征服满洲就意味着经济和军事上的利益。另一方面，通过重整军备以及对所控制的东亚市场的剥削，日本的工业和商业在30年代得到恢复，因此更增加了其对进口原料的依赖（在这方面，日本至少与意大利有相似之处）。随着日本钢铁工业的发展，对中国和马来亚的生铁和矿石的需要量更大了。国内的煤和铜也满足不了工业生产的需要；但是比这一切都更为关键的是，这个国家几乎全部依赖于各种石油燃料。日本

表28 工业生产能力的年度指数（1913～1938）

（1913年为100）

	世界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苏联	意大利	日本
191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20	93.2	122.2	59.0	92.6	70.4	12.8	95.2	176.0
1921	81.1	98.0	74.7	55.1	61.4	23.3	98.4	167.1
1922	99.5	125.8	81.8	73.5	87.8	28.9	108.1	197.9
1923	104.5	141.4	55.4	79.1	95.2	35.4	119.3	206.4
1924	111.0	133.2	81.8	87.8	117.9	47.5	140.7	223.3
1925	120.7	148.0	94.9	86.3	114.3	70.2	156.8	221.8
1926	126.5	156.1	90.9	78.8	129.8	100.3	162.8	264.9
1927	134.5	154.516	122.1	96.0	115.6	114.5	161.2	270.0
1928	141.8	162.8	118.3	95.1	134.4	143.5	175.2	300.2
1929	153.3	180.8	117.3	100.3	142.7	181.4	181.0	324.0
1930	137.5	148.0	101.6	91.3	139.9	235.5	164.0	294.9
1931	122.5	121.6	85.1	82.4	122.6	293.9	145.1	288.1
1932	108.4	93.7	70.2	82.5	105.4	326.1	123.3	309.1
1933	121.7	111.8	79.4	83.3	119.8	363.2	133.2	360.7
1934	136.4	121.6	101.8	100.2	111.4	437.0	134.7	413.5
1935	154.5	140.3	116.7	107.9	109.1	533.7	162.2	457.8
1936	178.1	171.0	127.5	119.1	116.3	693.3	169.2	483.9
1937	195.8	185.8	138.1	127.8	123.8	772.2	194.5	551.0
1938	182.7	143.0	149.3	117.6	114.6	857.3	195.2	552.0

对“经济安全”的追求——这在其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统治者眼中有着不言自喻的好处——激励它勇往直前，但是后果却却有好有坏。

尽管存在——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些经济困难，在30年代早期，高桥领导下的财政部为了拨给三军更多的经费，宁愿不计后果进行借款。军费在政府开支中所占比例从1931～1932年的31%，上升到1936～1937年的47%；当高桥终于对这样做的经济后果产生恐惧，并且着手限制军费的进一步增加时，就立即被军国主义分子暗杀了，而军费开支则螺旋式地上升。第二年，军费开支就达到政府开支的70%，从绝对数字上说，日本的军费比富足得多的民主国家还多。因此，到30年代末，日本三军的状况比意大利好得多，而且可能比法国和英国还好。日本帝国海军的规模在法律上受到华盛顿条约的限制，要求它只能稍大于英国或美国海军规模的一半，但是实际上要比这强大得多。当英美两个主要海军大国在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紧缩开支时，日本却不断建造直至达到了条约规定的数量——实际上还悄悄地远远超过了限制量。例如，其重型巡洋舰的排水量接近于14000吨，而条约要求是8000吨。日本所有的主要军舰速度都很快，而且有很强的武备；旧战舰都经过了现代化改装，到30年代末，日本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大和"级巨型军舰。所有这一切中最重要的因素，虽然舰队司令们都没有充分认识到，那就是日本的强大而有效的海军航空兵，它拥有3000架飞机和3500名驾驶员，集中在舰队的10艘航空母舰上，而且还包括一些部署在陆地上的极有杀伤力的轰炸机和携带鱼雷的空军中队。日本的鱼雷具有无比的威力和极好的质量。最后，这个国家还拥有排在世界第三位的大型商船队，不过（难以理解地）海军竟在实际上忽视了反潜战。

由于征兵制，日本陆军容易获得充足的人力而且使绝对服从和全体竭尽全力的传统在新兵的思想中深深扎根。日本虽恪守前些年规定的陆军规模，但是按照其扩张计划，陆军将从1937年的24个师和54个空军中队，增加到1941年的51个现役师和

133个空军中队。另外还有10个后方师（训练新兵的）以及许多独立旅和卫戍部队，这些又可能相当于30个师。因此，到战争前夕，日本的陆军超过了100万人，还有近200万受过训练的预备队作为后援。日本在坦克方面并不强，而东亚许多地方的地形或木桥也都不适于坦克通行，但是它拥有优良的机动的炮兵，而且受过丛林战、渡河以及两栖登陆的很好训练。陆军的2000架一线飞机（和海军一样）包括了难以对付的"零式"飞机，其速度和机动性可以与那一时期欧洲制造的任何飞机相媲美。

因此，日本的军事实力是很强的，但是也不是没有弱点。30年代政府所做的决定反复无常，而且时常被各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国内军事争端以及暗杀而搞得很不连贯。另外，陆军和海军之间缺乏充分的协调一致——无论如何这并不独特，其他国家也有这种情况，但是由于各军种心目中的敌人和作战地域各不相同，所以日本的情况存在着更大的危险。海军考虑的是将来与英国或美国打仗，而陆军则盯着亚洲大陆以及苏联对日本亚洲利益构成的威胁。由于陆军在日本政府界影响特别大，并且还控制着帝国总司令部，所以它的观点一般来说占据优势。在1937年有意策划的芦沟桥事变之后，陆军坚持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虽然海军或外交部都不情愿这样做，但是没有提出有力的反对意见。尽管从满洲国向中国北方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并且沿着中国海岸登陆，但是日本陆军发现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在损失了大量军队以后仍坚持战斗，并且在日本突击纵队和飞机的追击下撤退到内地。帝国总司令部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这场战争蒙受巨大损失——陆军大概只伤亡70000人——而是这场无结果的并且不断扩大的战争所带来的惊人花费。到1937年底，在中国已经有70多万日本军队，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虽然威尔莫特估计到1938年有150万这个数字似乎太高了）。但却根本不能迫使中国人投降。东京所谓的这次"中国事

件”现在每天花费 5 百万美元，并且引起国防费的更大增长，1938 年采取了限额配给，而且还实行了一连串的规定，实际上使日本处在了“总体战”的动员状态。日本政府为了支付巨额国防开支而越来越多地借债，所以国债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螺旋式上升。

使这一战略更难于维持的是，日本外币和原料储备日益减少，并且越来越依赖于从非难它的美国、英国和荷兰进口。在对中国的战争中，其空军耗费了大量的燃料。在这之后，被迫“命令工厂减少使用燃料 37%，轮船减少使用 15%，汽车减少使用 65%”。这种状况对日本人来说是更加不能忍受的；因为他们认为，蒋介石军队只有经过滇缅公路、法属印度支那或其他路线得到西方供应才能维持抵抗。日本必须向南方进攻，这样既可将中国与外界隔离，又可牢牢地掌握住东南亚、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及婆罗洲的石油和其他原料。这一定论日益加强，这是合乎逻辑的，不可抗拒的。当然，这正是日本海军一直热衷的方向；虽然陆军以前关心的是苏联及其在中国扩大势力范围，但是也逐渐被迫承认，采取行动保证日本的经济安全是必要的。

这就导致了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凭着日本到 30 年代末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它们可以轻易地将法国人和荷兰人分别从印度支那和东印度群岛赶出去。正象白厅的战略计划制定者们在 30 年代暗中承认的那样，即使是英帝国也很难抵挡住日本人；到欧洲爆发战争时，英国要在远东全面投入战争已不可能。然而，对于日本人来说，要进行对苏联或对美国的战争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例如，1939 年 5 月到 8 月间，与（苏联）红军在诺蒙汉(Nomonhan) 周围进行的漫长的边境流血冲突中，帝国总司令部对于苏联在大炮和飞机方面的明显优势以及体积大得多的苏联坦克的强大火力十分震惊。由于关东（满洲）军只有俄国驻蒙古和西伯利亚的师的数目的一半，而且大量军队在中国越陷越深，

所以就连极端主义的陆军军官也认识到必须避免与苏联的战争——至少在国际环境更加有利以前是这样。

但是，如果北方战争会暴露出日本的局限性，那么冒着美国卷入的危险在南方打仗不也一样吗？而且，如果东京染指荷属东印度群岛和马来半岛，那末本来就极不赞成日本人在中国的行动的罗斯福政府能袖手旁观从而使日本逃脱美国的经济压力吗？1938 年 6 月美国对航空材料出口实行了“道义上的禁运”，第二年又废除了美日贸易协定，最重要的是，在 1941 年 7 月日本人接管印度支那以后，英国、荷兰、美国三国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与铁矿，这一切都清楚地说明“经济安全”只有以与美国的战争为代价才能实现。然而，美国有将近 2 倍于日本的人口，并且按每年的数字计算，国民收入为日本的 17 倍，钢产量为日本的 5 倍，煤产量为 7 倍，汽车产量为日本的 80 倍。即使在不景气的 1938 年，美国的工业潜力也是日本的 7 倍；在其他年份可能是 9 倍或 10 倍。即使承认日本人有高昂的爱国热情，并且人们还记得 1895 年（中国）、1905 年（俄国）它在与强大得多的对手的战争中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但是它现在的算盘也几乎是不可信的——而且是荒唐的。确实，对于象山本海军上将这样清醒的战略家们来说，进攻象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似乎太愚蠢了，特别是当情况很清楚，大多数日本军队必须留在中国的时候；然而，如果日本到 1941 年 7 月后还不同美国较量，那么必将招致西方的经济勒索，这也是日本人不能忍受的。后退是不行的。日本的军事领导人准备孤注一掷了。

德国

在 20 年代，德国似乎是对战后领土和经济解决办法感到不满的那些大国中最弱而且最不安定的。德国受凡尔赛条约军事条款的束缚，肩负着必须支付战争赔款的重担，因边境地区转让给法国和波兰而在战略上受到抑制，并由于通货膨胀、阶级关系紧

张以及选民和政党中相应的反复无常和混乱而在国内造成动乱，使它在外交事务中不可能有象意大利和日本那样的行动自由。到20年代末，由于普遍繁荣以及施特雷泽曼通过外交手段提高德国的作法获得了成果，使情况大大改观。但是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政治上不安定的“半自由”大国，因1929～1933年的财政及商业危机破坏了它的不稳定的经济和遭人唾弃的魏玛共和国。

如果说希特勒的出现在几年之内改变了德国在欧洲的地位，那么再回顾一下前面提出的那些观点就很重要了：每一个德国人实际上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是“修订论者”，而且早期的纳粹对外政策计划的许多内容都与德国民族主义者过去的野心和被抑制的武装部队有连续性；很多其他国家和种族集团也都不满意1919～1922年中东欧边界解决办法，它们在纳粹分子掌权之前早就要求改变而且愿意联合柏林政府一起进行修订；德国在领土、人口和原料方面虽然受到损失，但是仍保持着成为最强大的欧洲大国的工业生产潜力；现在的国际力量平衡需要遏制德国扩张的复活，与1914年以前相比是更加力量悬殊并且更不协调了。希特勒改善德国的外交和军事地位的计划很快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当时有许多情况帮助他不择手段地利用机会，这也是很清楚的。

就本书所涉及的主题而言，希特勒的“特殊之处”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是他打算建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具有特别激烈和疯狂的性质：通过消灭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其他所谓的非日耳曼民族的成分，建立一个种族上“纯洁的”社会，人民的思想和灵魂都无条件地支持其政权，代替以往对阶级、教会、地区和家庭的忠诚；对经济实行动员和控制，都是为了**发展德意志民族特性**，只要领袖宣布有此必要，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与多少个大国相抗衡，都必须这么做。充满暴力、争斗和憎恨的思想体系，为击溃敌人感到高兴，对于妥协的想法则不屑一顾。从20世纪德国社

会的实际情况和复杂性来看，不用说这是一种不现实的幻想，因为在这个国家存在着对“希特勒权力的限制”，有许多个人和利益集团，曾在1932～1933年支持过希特勒，甚至到了1938～1939年也这样；但是热情不断下降了；无疑有些人公开反对这一政权，另外还有很多人逐渐在内心产生了抵制情绪。尽管有这些例外情况，但是毫无疑问，国家社会主义政权深得人心，而且——更重要的是——关于它对国家资源的支配权是绝对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由于政治文化倾向于战争和征服，而政治经济则发生严重畸形，到1938年军费开支已占到政府开支的52%和国民生产总值的17%，所以德国已成为完全不同于西欧其他任何国家的一类国家。在签订慕尼黑协定的那一年（1938），德国在武器方面的花费比英国、法国和美国合在一起还多。在国家机器能够集中起来的限度内，德国全部国力都被动员起来，以投入一场重新开始的战争。

德国重整军备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在这个扩张时期内刺激起来的国民经济处于惊人的不稳定状态。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意大利和日本两国的经济在30年代末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当法国和英国设法对荒唐的军备增长速度作出反应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但是这些国家中没有哪一个象德国这样突然而迅速地发展武装力量。在1933年1月，其法定的陆军本不应超过10万人，不过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军方就制定了将7个师扩充为21个师的秘密计划，并私下准备重建空军、坦克部队和凡尔赛条约禁止的其他兵种。1933年2月希特勒对冯.费里奇发出关于“建立一支尽可能强大的军队”的一般性指示，计划人员们立即把它当作一支“放手大干”的令箭，可以将以前的计划付诸实现，并最终摆脱财政和人力上的制约了。到1935年宣布了征兵令，陆军的最高限额增加到36个师。1938年吞并了奥地利部队，接管了莱茵兰宪兵队，建立了装甲师，并且改组了地方后备军，使军队

的数字变得更大了。在1938年末的危机期间，陆军总共有42个现役师、8个预备师和地方后备军的21个师；到第二年夏天战争开始时，德国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为103个师——一年中就猛增了32个师。德国空军的发展更加显著也更加迅速。德国飞机产量从1932年的仅仅36架增长为1934年的1938架和1936年的5112架，空军从（1933年7月规定的）26个空军中队增加到战争开始时的302个空军中队，有4000多架前线飞机。如果说海军的规模没有那么引人注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正如蒂尔皮茨早些时候发现的那样），建立一个强大的作战舰队至少要花10～20年的时间。虽然如此，到1939年，雷德海军上将已指挥着许多快速的现代化战舰，海军的人数已发展为1932年时的五倍，海军军费也达到希特勒掌权前的12倍。在海上，与在陆上和空中一样，德国的重整军备计划一心一意地要尽快改变力量平衡。

虽然这一切从外表看来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其内部肯定是不稳定的。德国经济受到凡尔赛领土解决方案的打击。1923年的严重通货膨胀，支付赔款，以及重新进入1914年前的国外市场的困难，使德国的产量到1927～1928年才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然而，这种复苏马上又遭到随后几年的严重经济危机的破坏。这场危机对德国的打击比对其他大多数国家都严重得多；到1932年，工业生产只是1928年的58%，进出口锐减一半以上，国民生产总值从890亿金马克跌至570亿金马克，而且失业人数也从140万人增加到560万人。希特勒在早期获得威望，主要是由于筑路、电气化和工业投资等广泛的规划，甚至在没有开始征兵以前就大幅度减少了失业人数，而征兵又解决了其余的失业问题。然而，到了1936年，经济复苏日益受到极其巨大的军费开支的影响。从短期来看，这样花钱是准凯恩斯主义政府对资本投资和工业增长的另一种推动。但是，不用说从

长期来看，就是从中期来看，其经济后果也是可怕的。也许只有美国经济才能经受得住这样程度的军费开支的压力而没有重大困难；德国经济是肯定承受不了的。

当时国外观察家还没怎么发觉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决策方式极为混乱，而这种情况似乎是希特勒为保持最终权威而加以鼓励的。虽然宣布了四年计划，但是并没有一个能将军备建设与德国经济能力联系起来，并且按照轻重缓急分配三军经费的有条理的国家计划。戈林，名义上负责四年计划，实际上是个不可救药的管理者。相反，每个部门都各自进行危险的扩张，规定新的（往往是荒谬的）目标，紧接着就拼命争取必需的资本投资，特别是原料的分配。幸亏政府对劳动力实行严格控制，迫使私人工业将其利润重新投入国家支持发展的制造业，并且通过高额税收、赤字借贷、抑制工资及个人消费，硬将国民产值越来越多地用于军事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否则情况确实会更加混乱的。到1938年，政府开支急剧上升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3%（而且这时大多数“私人”投资确实是按国家的要求做了），但是仍没有足够财力来满足军队的互相重复，有时甚至是夸大妄想狂的要求。为德国海军建造的“Z—计划舰队”需要600万吨燃料油（相当于德国1938年的全部消耗量）；德国空军计划到1942年拥有1.9万架（！）前线飞机和后备飞机，这将需要“当时世界石油产量的85%”。同时，各军种还都力争能得到更多的熟练工人、钢铁、滚珠轴承、石油以及其他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

最后，疯狂的军备建设还与德国极端依赖进口原料相抵触。只盛产煤的德国还需要大量的铁矿、铜、矾土、镍、石油、橡胶以及现代工业和现代武器系统所依赖的许多其他物资。相反，美国、英帝国以及苏联在以上所有这些方面却蕴藏丰富。1914年以前，德国通过迅速发展的工业制品出口来偿付这些进口；但在

30年代就不行了，因为德国工业这时已改为生产国防军所消费的坦克、枪炮和飞机了。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费用以及随之而来的赔款，再加上传统出口贸易的崩溃，实际上已经花光了德国的全部外币。1938年德国只拥有世界黄金及财政储备的1%，相形之下，美国占54%，法国和英国各占11%。正因如此，德国政府机构制定了通货管制、易货协定和其它一些特殊“交易”等严格的制度，以便偿付必需的进口而不支付黄金或货币。也正因如此，在四年计划指导下，还努力通过生产人工合成代用品（油、肥料等）以摆脱这种依赖，这种努力受到很大的赞扬。这些办法都有所帮助；但是任何一种办法，甚至所有办法合在一起，都不能弥补军备建设的需求。这就是当国家的原料储备耗尽，而资金也花光不能偿付新的供应时，德国兵器工业经常出现危机的原因。雷德在1937年就警告说，除非有更多的原料保证，否则整个海军的建设将被迫停下来。1939年1月，当德国经济部门为了增加外币储备而展开一场“出口战”时，希特勒亲自下令大幅度削减对国防军的钢铁、铜、橡胶和其他原料的配给。

对德国实力和政策来说，从以上情况可以得出三个相关的结论。第一，在1938～1939年间，德国并不象希特勒喜欢吹嘘以及西方民主国家所惧怕的那样强大。在战争开始时号称拥有275万人的野战军，其中机动性好而又装备精良的师的数目实际上很少，缺乏装备的后备师占很大部分；有经验的军官和军士根本满足不了对大量新兵进行训练的需要。军火储备不足。在战争开始时，甚至著名的装甲部队所拥有的坦克也比英国和法国的坦克总数少得多。准备在40年代中期参战的海军自己就说自己“根本不具备与英国打一场大仗的充足装备”——这是对水面战舰的一个很公平的概括，尽管其潜艇将有助于弥补这种不平衡。至于德国空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对手长期以来一直很弱——但是它始终存在缺乏后备部队及后勤部队的问题。在30年代末的国际性危

机中，德国空军从来没有象其对手想象的那样强大——而且其航空工业和机组人员都很难适应“第二代”飞机。例如，在慕尼黑危机期间，具有“充分作战能力”的机组人员的数量，比规定为“前线”机组人员的数量要少得多——要把伦敦炸为灰烬这样一种想法则完全是无稽之谈。

然而，如果完全同意最近“修订论者”的作品中关于德国在1939年时对战争还无准备的说法，那也是愚蠢的。归根结蒂，军事实力是相对而言的。只有极少数国家的军队会认为他们的需要全都得到了满足；而德国的弱点也必须与其敌人的弱点作比较衡量。如进行比较，那么局势似乎对柏林更有利得多，特别是由于德国军队在**作战原则**方面非常有效：其陆军准备集中运用坦克部队，然后让它们在战场上冲在最前头，用无线电保持联系；其空军，尽管趋向于执行“战略”任务，但是也受过支援陆军挺进的训练；其潜艇部队，虽然规模小，但是战术非常灵活。这都是对橡胶之类的储备不足的一个重要补充。

这样就给我们带来了第二个结论。因为德国军队重新武装得太快，以至于造成了经济紧张，所以在希特勒方面看来，通过战争的办法消除经济困难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希特勒很清楚地知道，吞并奥地利不仅能给德国增加另外5个师的部队，一些铁矿和油田，以及相当规模的金属工业，而且还能带来2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比较起来苏台德在经济上的用处较小（虽然确实有煤层），但在1939年初，德国的外币情况十分危急。因此，毫不奇怪，希特勒贪婪地盯住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领土，并且一旦实现占领以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在1939年3月赶往布拉格去视察这一战利品。除了捷克国家银行拥有的黄金和货币资产以外，德国人还攫取了大批矿石和金属，并且很快将之用于支援德国工业；同时，规模很大而又有利可图的捷克兵器工业，现在也可以用来通过向巴尔干国家的用户销售（或交换）产品而为德国

人赚钱了。德国人还夺得了捷克军队的飞机、坦克和武器，其中一部分用于装备德国新建的师，还有一部分则出售换成外币。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生产，对于德国在欧洲的实力是个极大的推动，而且使得希特勒狂热的（尽管多少有点儿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重整军备计划得以继续——直到下一次危机的出现。正如蒂姆·梅森曾经指出的："对于由独裁和重整军备造成的这一政权的结构上的紧张和危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更加独裁和更多的重整军备。……一场掠夺人力和物资的战争，根源就在于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德国经济发展的这种可怕的逻辑。"

第三个结论——和问题——就是：德国这种征服和掠夺的政策到底能走多远而不致过分冒险呢？一旦德国开始重整军备并且其军队装备了现代化武器后，征服弱小邻国并且获得新的领土、原料和货币的模式似乎也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到 1939 年 4～5 月间，波兰是下一步的目标已很明显了。然而，即使波兰能很快被征服，德国有能力面对法国和英国——也就是说，能在德国经济仍严重依赖进口原料时，进行一场将给其经济带来更大挑战的战争吗？有迹象表明，虽然在 1939 年希特勒乐于冒险与西方民主国家交战，但是他仍希望西方国家能再一次让步，并且允许他单独对波兰进行另一场有限的掠夺战争；这反过来又会帮助德国经济，以准备约在 40 年代中期进行第一次大国战争。到 1939 年，在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和战略力量虚弱，而它们的政治领导人又踌躇不决的情况下，即使冒险与这些国家进行一场时机未成熟的战争，似乎也是值得的——不过，如果军事行动象在 1914～1918 年战争的各条战线上那样相持不下，德国在现代化武器方面的领先优势可能就会慢慢削弱。如果美国为协约国提供援助，元首及其政权的胜利就更成问题了；或者，如果军事行动扩展到苏联，这个国家的辽阔广大，就会使战争变成一场考验国家经济耐久力

的长期的持久战了。

另一方面，纳碎政权是靠征服维持生命的。希特勒从一个获得物接着又转向下一个目标，那么征服怎么样并且在哪里才能停止下来呢？希特勒这个权迷心窍的自大狂的全部逻辑就是，在欧洲不应有任何其他国家同德国对抗，并且在世界上可能也不应有这样的国家。只有这样，他的敌人才能被打垮，“犹太人问题”才能解决，千年帝国才能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这位德国元首虽然全面继承了他的先辈腓德烈[1]和俾斯麦的衣钵，但是又有很大不同。他有夺取世界霸权的狂妄计划，而且根本不把在实现这一梦想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放在眼里。希特勒既抱有疯狂的达到长远目标的野心，又需要摆脱当前的危机，所以他不得不和日本人一样，犯下了尽快改变国际秩序的罪行。

三、法国和英国

面临这场渐渐形成的风暴，法国和英国的处境非常严峻而且越来越困难。虽然两国间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区别，但是它们都是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都曾经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都不能(尽管付出了最大努力）以任何持久的方式恢复它们记忆中美好的爱德华时代的政治经济，都感到了国内工人运动造成的巨大而且不断增长的压力，公众舆论都渴望避免另一场战争并且非常关心国内“社会”问题而不是外交事务。这决不是说，伦敦与巴黎的外交政策是完全一致的。由于它们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极不相同，并且它们各自的政府所受到的压力也不一样，所以这两个民主国家在如何解决“德国问题”方面时常产生分歧。不过。虽然它们为解决手段而争论不休，但是两国的最终目标还是一致的。在

---

1 腓德烈　即费里德里希。——译者注。

1919 年以后动荡不安的几年里，法国和英国无疑仍然是大国。

在 30 年代初，法国似乎更强大并且更具影响力，至少在十分重要的欧洲局势中是这样。在这些年，法国陆军的规模在诸强国中排在第二位（仅次于苏联），空军也排在第二位（苏联的总数仍然更大）。在外交上，法国也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日内瓦和东欧。1919 年过后的几年中，法国发生了持续好几年的严重经济动乱，因为当时不能再依赖于英美的补助，而德国的赔款又远远少于预期数额，所以被迫对法郎进行了调整。以适应这些棘手的事情。但彭加勒在 1926 年又稳定了币值，使法国工业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1929 年与 1920 年相比，生铁产量从 340 万吨猛增到 1030 万吨，钢产量从 300 万吨增长到 970 万吨，汽车从 4 万辆增长为 25.4 万辆；同时，化学制品、染料以及电气产品也都摆脱了战前由德国控制的状态。法郎的有利比价有助于法国贸易的发展，而且法兰西银行的大量黄金储备对法国在整个中欧和东欧的贸易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当“大崩溃”来临时，法国似乎是受到影响最小的国家——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有黄金储备和处于有利地位的币值，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法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比英国要小得多。

然而，在 1933 年以后，法国经济以一种稳定的、有条不紊的、惊人的方式开始崩溃。在其他主要贸易国竞相抛售黄金的情况下，徒劳地试图避免法郎贬值，意味着法国的出口越来越缺乏竞争力，其对外贸易已经崩溃：“进口下降了 60%，出口下降了 70%”。在经过几年的瘫痪之后，1935 年决定大大紧缩通货又给了萧条的法国工业部门一个沉重的打击。当 1936 年人民阵线政府强制通过了四十小时工作周和工资增长的协议时，对工业部门的打击更沉重了。这个行动，加上 1936 年 10 月法郎的大幅度贬值，加速了业已存在的法国黄金大量外流的现象，严重伤害了其国际信用。在农业上，农业人口仍占法国国民的一半，产量在西

欧最低，剩余产品使价格不断下降而且使本来已很低的人均收入每况愈下，那些在工厂中失去工作的人返回农村更加速了这一倾向；和意大利一样，这种回归乡土的唯一（很令人怀疑的）好处就是掩盖了真正的失业率。建筑业明显地衰落了。象汽车这样的新兴工业，正当它们在其他地方恢复起来的时候，在法国却停滞不前。1938 年，法郎只是其 1928 年价值的 36%，与十年前相比，法国的工业生产只达到 83%，钢产量只相当于 64%，建筑业相当于 61%。从影响法国实力的角度看来，最可怕的数字也许就是，慕尼黑年（1938 年）的国民收入比 1929 年少了 18%；而这时正面对着非常危险的德国，并且也正是大规模重整军备的紧要关头。

因此，单单从经济方面来看，是很容易说明 30 年代法国军事实力的衰退的原因的。法国一方面凭着 20 年代末的相对繁荣，另一方面又担心德国在暗中重整军备，所以在 1929～1930 年和 1930～1931 年预算年度迅速增加了国防开支（特别是陆军的经费）。遗憾的是，法国错误地寄望于日内瓦裁军会谈，接着又受到大萧条的影响，使法国人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到 1934 年，国防开支仍相当于国民收入的 4.3%，与 1930～1931 年度的比例一样，但是绝对数额少了 400 多万法郎，因为经济衰退得太快了。虽然莱昂.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想方设法扭转军费开支的下降趋势，但是直到 1937 年才超过了 1930 年的国防预算额——并且增加的数额部分是用于弥补野战军的非常明显的不足及进一步修筑防御工事上的。因此，在这些关键性的年份中，德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跃到了前面：

> 法国在汽车生产上已经落后于英国和德国；它的飞机制造业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内已从第一位落到了第四位；其钢产量从 1932 年到 1937 年间仅增长了 30%，而德国工业的增长为 300%；在这同样的 5 年间，法国

的煤炭生产量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935年初归还萨尔煤田所造成的，结果使德国的产量增长了。

经济急速衰退，加上债务负担，以及1914～1918年战争的抚恤金支出占去了政府开支总额的一半，这些都使法国不能满意地重新武装其三军，即使在1937和1938年法国将其预算的30%以上用于国防时也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法国海军很可能是供应最好的，但却白费了力气，到1939年它已拥有一支各方面协调而又现代化的舰队，但是它对于挡住德国在陆地上的进攻几乎没什么帮助。在三军当中，法国空军的情况最糟，经常苦于资金缺乏，规模不大而且分散的航空工业勉强在维持着。在1933年到1937年间每月只生产50或70架飞机，大约是德国生产数量的1／10。例如，1937年德国生产了5606架飞机，而法国只生产370架（有的资料说是743架）。到1938年，政府才开始给飞机工业大量投资，由于扩展太快，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影响生产流程的障碍，更不用说由于转产新型高性能飞行而引起的设计及飞行方面的困难了。例如，大有希望的“德瓦蒂内520”型战斗机，直到1940年1月到4月间才向空军首批交付了80架，当德国发动闪电战时，其驾驶员刚刚开始练习驾驶这种飞机。

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在这些经济和生产的难题后面，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法国社会对大战的重大损失很震惊，被反复的经济打击和挫折搞得很不景气，并且被阶级和意识形态问题弄得四分五裂，当政治家们力图解决货币贬值、通货紧缩、四十小时工作周、更高的税收以及重整军备等问题而又没有成功时更加剧了这种形势。因此，在进入30年代时，法国社会呈现出社会风气和内聚力的严重衰退。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引起了——至少到西班牙内战时——法国公众舆论

的进一步分歧，而远远不是建立一个**神圣同盟**。极右分子（正如街头小曲所唱的那样）宁要希特勒，不要勃鲁姆，而许多左盟分子则不赞成军费开支增长和打算废除四十小时工作周的做法。这种思想观念上的抵触，与各政党的反复无常和两次大战期间法国政府的长期不稳定（1930 年到 1940 年间换了 24 届）相互影响，使这个社会不时地给人以濒临内战边缘的印象。至少，法国已很难顶住希特勒的放肆行动以及墨索里尼的狂乱。

正如以前在法国政界经常发生的那样，这一切影响着军政关系和军队在社会上的地位。法国领导人必须在充满怀疑和阴郁的气氛中活动，除此之外，在法国还存在着许多特殊的弱点。法国没有象英国的帝国国防委员会或者参谋长小组委员会那样有效的机构，以便把政府的军事部门和非军事部门组织在一起有条不紊地讨论战略计划，乃至协调三军的对立观点。陆军的领导人物，如甘默林、乔汉、魏刚以及（幕后的）贝当，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重视防御，小心谨慎，对战术创新不感兴趣。他们断然拒绝了戴高乐关于建立一支小规模现代化坦克部队的建议，而他们自己又不采取任何运用新型作战武器的其他办法。联合兵种的政策未能实现。忽略了战场指挥与通信(例如，通过无线电）的问题。贬低飞机的作用。虽然法国情报部门提供了大量关于德国人想干什么的情报，但是均被忽视；德国人在其对抗演习中使用了大规模装甲兵团，但法国对这种作战方式的效果却公开表示怀疑；而且所有送往法军每个驻地图书馆的古德里安的[注意坦克！]的翻译本均无人问津。这就意味着，即使当法国工业受到刺激而制造了大量坦克，其中有很多象“索玛—35” 那样的高质量坦克时，法国也没有运用这些坦克的适当的理论原则。由于在指挥与训练上存在着这样一些不足，所以一旦发生另一场大战，法国军队将很难补偿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缺陷以及经济的衰退。

法国的这些弱点也不能象1914年以前那样靠外交活动和有利的联盟策略来克服。相反，发展到30年代，法国对外政策中的矛盾变得更加公开化了。当然，这些矛盾首先已经表现在，洛迦诺条约以后采取的躲在马奇诺防线后进行战略防御的做法与阻止德国在东欧扩张这一愿望是不相容的，因为按照协定的要求，法国应在必要的时候前去援助其大陆盟国。德国在1935年收复萨尔地区以及希特勒重新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化地区，使得法国的军事领导人即使乐于采取攻势作战也很难向前推进。但是，这些事情与1936年法国外交和战略地位不断遭到的打击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当时在阿比西尼亚危机问题上与意大利发生争吵，意大利从反对德国的一个可能的同盟者变成了潜在的敌人；西班牙内战的开始，预示着另一个法西斯国家正在法国的后面建立；并且比利时退缩到中立状态，这对全局有战略性的影响。在这灾难性的一年的年底，法国不能再全神贯注于其东北前线了，而且，为了帮助一个东方伙伴而突然袭击莱茵兰地区的想法也变得淡漠了。因此，在慕尼黑危机之时，许多法国领导人被必须对捷克斯洛伐克履行义务的前景吓呆了。最后，慕尼黑协议一经签订，巴黎就发现苏联对于与西方合作更充满了敌意，而且不再看重1935年的法苏公约了。

在这样悲观无望的外交、军事和经济情况下，法国在将来与德国的任何战争中将采取主要依赖获得英国的全力支援的战略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有其明显的经济理由。法国严重依赖于进口煤（30%）、铜（100%）、石油（99%）、橡胶（100%）和其他重要原料，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英帝国并且靠英国商船队运输。一旦发生“总体战”，下跌的法郎将再次需要英格兰银行帮助维持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确，到1936～1937年，法国已经深深感到要依靠英——美财政援助了。从另一方面看，只有靠英国皇家海军的帮助才能断绝德国的海外供应。到30年代末除需要新的英

国远征军参战外，还需要英国皇家空军的帮助。人们普遍认为，所有这些方面都说明法国在战略上采取守势的政策是有其长远的逻辑性的；如果能象1914年那样阻挡住德国对西方的任何进攻，那么英法两个帝国的资源优势最终就能奏效——并且无疑还可以收复在东部暂时失去的捷克和波兰领土。

然而，很难说法国这种"等待英国"的战略是一种绝对的好事。显然，它把主动权交给了希特勒，在1934年以后希特勒就一再表明他知道怎样利用这种主动权。此外，它还束缚住了法国人的手脚（虽然有很多迹象表明象庞纳和甘默林这样一些人情愿受这样的限制）。从1919年以后，英国就怂恿法国对德国采取比较温和的、更调和的政策，并且对于法国的高鲁人式的不妥协态度非常反感；在希特勒掌权后的年代里，英国政府及其人民都不太重视法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困境。尤其是，英国强烈地反对法国对奥匈帝国崩溃后成立的东欧"继承国"的军事行动，并且当英法合作已经不可避免时，英国还给巴黎施加压力要它放弃它的义务。甚至在捷克危机以前，英国还扰乱甚至暗中破坏法国对柏林采取强硬路线的老政策——但又不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替代办法。只是在1939年春天，两国才真正结成正式的军事同盟，并且即使那个时候它们在政治上的互相猜疑也没有完全消除。正象下面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似乎完全可以认为英格兰并不是这么"背信弃义"，而只是缺乏远见、痴心妄想并且为许多国内问题和帝国问题所困扰；但是这只能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要遏制德国的扩张主义，那么法国的政策要依赖这样一个软弱而又动摇不定的国家是靠不住的。

法国最大的失算也许是，它认为30年代末的英国是能够象1914年时那样帮助抑制德国人的挑战的。当然，英国仍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它具有许多战略优势，其工业产量和工业潜力是法国的两倍；但与20年以前相比，它自己的地位也并不是那

么稳固和有保证的，从心理上讲，不列颠民族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伤害，并且战后徒劳无益的"迦太基式"的和平（就平民能够看到的而论）使它不再抱有幻想。公众对于军国主义、介入欧洲大陆事务以及对力量平衡的任何关心都表现出厌倦情绪，而与此同时，议会民主制完全形成了（通过 1918 年和 1928 年扩大公民权），工党也已兴起。也许英国的情况比法国更甚，这几十年内的国家政策似乎都是围绕着"社会"问题的——具体反映在，1933 年的政府开支的很小一部分（10.5%）是用于武装力量的，而分配给社会事务的总和则占 46.6%。鲍尔温和张伯伦经常提醒他们的内阁同僚们，现在已不是通过对中东欧的难处理的问题的干涉就可以获得选票的时候了（在白厅眼中）这些国家的边界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即使对于不甚关心社会问题或要选举花招而更关心外交事务的那些政治团体和战略计划人员来说，1919 年以后的国际形势也使他们变得小心谨慎和不愿承担任何义务了。战争一结束。各自治领就迫切要求重新确定它们的地位。当这种要求通过 1926 年贝尔福宣言和 1931 年威斯敏斯特条例而得以实现时，它们发展为实际上独立的国家，同时（只要它们愿意）可以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它们没有一个渴望参加关于欧洲问题的战争；有些国家，象爱尔兰、南非甚至加拿大，不愿参加任何战争。尽管英国希望保持帝国统一的形象，但是它也只能进行关于能得到自治领支持的问题的战争；而且，即使当这种分离主义随着来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威胁的增长而缓和下来时，伦敦仍意识到欧洲以外地区对于其全部对外政策决定的重要性。从严格的军事意义上来说，更重要的仍然是，英国陆军还有皇家空军在印度、伊拉克、埃及、巴勒斯坦以及其他地方所从事的"帝国维持治安"活动。实际上，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大部分年代里，英国陆军发觉自己已恢复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作用：苏联对印度的威胁被看成

是最大的（尽管多少有些抽象化的）战略危险；镇压当地土著闹事是日常的作战行动。最后，由于皇家海军坚持要“向新加坡派一支主力舰队”，并且白厅认为应该关心保卫其遥远而又脆弱的领地免受日本的侵犯这也是无可非议的，所以英国总战略中的这种帝国思想因素大大加强了。

诚然，英国“护门两面神”的这种战略矛盾心理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但是更可怕的是，它现在所依据的工业基础是更加虚弱了。英国的工业生产在20年代处于停滞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英国货币对金本位的兑换率太高。虽然英国受到的损害不象德国和美国那样巨大，但是1929年以后世界范围的不景气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其失调的经济。仍占英国出口额40%的纺织品生产减少了2／3；占出口额10%的煤下降了1／5；造船业也遭到沉重打击，1933年的产量下降到战前的7%；钢产量在1929～1932年这3年中就下降了45%，生铁产量下降53%。随着国际贸易枯竭并且由货币集团所取代，英国在世界贸易额中所占比例继续呈下降趋势，1913年占14.15%，1929年下降到10.75%，1937年又下降到9.8%。而且，靠航运、保险和海外投资所得到的无形利润，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大大超过有形贸易差额，现在已根本办不到了；到30年代初，英国已只能靠它的资本过活了。1931年危机的打击，导致工党政府倒台和决定抛售黄金，使政治家都意识到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脆弱性。

从某种程度上讲，那些领导人的看法可能确实是言过其实了。到1934年，经济已慢慢开始恢复。北部的老工业虽然萎缩了，但是新兴工业——飞机、汽车、石油化学制品、电气产品——却正在兴起。“英镑集团”内部的贸易为英国出口商提供了某种支柱。食品和原料价格的下降帮助了英国的消费者。但是，这样的缓和对于财政部来说是很不够的，它所担心的是英国在国外的脆弱的信誉和进一步挤兑英国货币。在他们看来，压倒一切的事

情是支付它在世界上应承担的费用，这意味着要保持政府收支平衡、使税收保持最低水平并且控制国家开支。当满洲危机使英国政府在 1932 年放弃了著名的“十年准则”的时候，财政部立即坚决认为”不能据此说明国防部门不顾依然十分严峻的财政和经济状况而不断增加开支是合理的”①。

这种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联合作用的结果，使英国象法国那样，在 30 年代初期正当独裁国家开始增加国防开支的时候，它却在削减其国防开支。直到 1936 年在对这个国家“国防的不足之处”进行了为时几年的研究以后，在希特勒公开重整军备以及随后的阿比西尼亚危机的双重冲击下，英国的国防开支才第一次大幅度上升；但是这一年的国防经费仍少于意大利，只有德国的 1／3 或 1／4。即使在那个时候，财政部仍采取控制措施，政治家们也担心国内舆论的反对，所以全面重整军备受到了阻碍，只是到了危机的 1938 年才真正开始。然而，早在那个时候以前，三军就发出警告说，“同时面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来保卫我们的贸易、领土和生命安全”是不可能的，并且强烈要求政府”减少我们潜在敌人的数目和获取潜在盟国的支持”。换句话说，为了在远东、地中海和欧洲本身的威胁面前保卫这个经济上虚弱、战略上过分延伸的帝国，需要运用外交手腕——绥靖外交。参谋长们认为英国在任何国外战区都不够强大；而由于德国空军令人吃惊地兴起，给这种令人忧郁的事实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使得这个岛国的居民第一次直接受到敌人军事行动的威胁。

有某种迹象表明，英国的参谋长们实际上与其他每个国家的军事专家们一样，对于他们国家的前景也都非常悲观；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们变得小心谨慎并且悲观起来了。但是，毫无疑问，

①这是1919年以后的一项命令，要求三军在今后十年内不参加大规模战争这样的假设条件下制定它们的预算。

到 1936～1937 年，英国在空军方面已被德国追上，其规模不大、长期服役的陆军在欧洲大陆上也无多大作为，其海军也已不可能控制欧洲水域并且将主力舰队派往新加坡。使英国决策者更加心神不定的也许是，它现在已经极难找到参谋长们所需要的那些“潜在盟国”了。英国把其他国家组织起来共同对付拿破仑的那些联盟、以及 1900 年以后的年代里实现的成功的协约的和睦状态，都已不复存在。日本已由盟国变成了敌人；意大利也是这样。苏联是另一个“侧翼”大国（用德海的话说），从传统上讲它是联合英国反对大陆霸权的，但是现在已实行外交孤立主义，并且对西方民主国家很不信任。至少对于灰心丧气的白厅人员来说，几乎不可思议而又不可预测的是美国在 30 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政策；它避免承担各种外交和军事义务，仍然不愿参加国际联盟，强烈反对英国收买修订论者国家的各种做法（例如，承认日本在东亚的特殊地位，或者向德国提供特殊的付款和交换协定），并且根据中立法令英国不可能再以 1914 年到 1917 年间为了维持战争努力而采取的那种方式在美国市场上借款，此外，就象英国打乱法国的东欧战略一样，美国也以同样的（也许是并非故意的）方式不断打乱英国的总战略。这样一来潜在的盟国只有法国以及英帝国的其他属地了。然而，法国在外交上的需要使英国承担了在中欧的义务，这遭到自治领的强烈反对，并且整个“帝国防御”结构也不能承担保卫任务；另一方面，帝国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关心也分散了抑制德国威胁所需要的注意力和资源。因此，30 年代的英国发觉自己已处于全球外交和战略的困境之中，而没有满意的解决办法。

但这并不否认鲍尔温、张伯伦和他们的同事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也不是说英国绥靖政策的决定因素使丘吉尔和其他批评者提出的另外各种可供选择的政策都成为不可行的了。英国政府一直存在一种愿望，尽管得到的都是反证，但仍然信赖与纳粹制度打

交道的“合理”方法。它从感情上对共产主义十分厌恶，使有可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一员的苏联始终受到忽视或被贬低。虚弱的东欧国家，象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也都往往被看成讨厌的东西，对法国问题缺乏同情心也说明了它致命的卑劣精神。它根据不充足的证据始终过高估计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力量，而英国国防所有的弱点则都被用作不采取行动的借口。白厅对欧洲力量平衡的看法是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和短浅的，政府宣布它只能追随（而不是指导）公众舆论，而恰恰就在这时，丘吉尔等人对绥靖政策的批评就受到了系统的审查和压制。因此英国政府希望避免迎战独裁国家的立场虽然有其表面上讲得通的客观上也是能成立的理由，但是在它胸襟极为狭窄的态度中有许多东西，甚至到现在还都显得暧昧不清。

另一方面，对经济上和战略上的现实性进行任何研究还应该承认，到 30 年代末，影响英国总战略的基本问题单靠改变态度甚至更换几个首相是不可能解决的。的确，由于希特勒的进一步侵略行动以及英国舆论的义愤，迫使张伯伦不得不放弃绥靖政策，但愈是这样，基本矛盾就愈变得明显起来了。虽然参谋长们坚决主张大量增加国防经费，但是财政部认为这样增加国防经费是经济上的灾难。在 1937 年英国的国防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与法国一样，已经超过 1914 年前几年的危机年份，但是安全并没有任何重大改善——这完全是因为狂热的德国的军费开支还要高得多。但是，随着英国国防开支的进一步猛增——大约从 1937 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5% 上升到 1938 年的 8.5%，1939 年又上升到 12.5%——其脆弱的经济也开始受到很大影响。虽然为了增加军备而投放了很多钱，但是英国工业设备不适合需要，熟练的工程技术人员严重短缺，使飞机、坦克和舰船的生产减缓了达到预期产量的速度；而这反过来又迫使三军向瑞典、美国等中立国家订购更多的武器、钢板、滚珠轴承和其他

物品，从而进一步消耗了外币储备并且威胁到支付平衡。随着这个国家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减少，其国际信誉也变得更加不稳定。财政部对1939年4月新的重整军备的措施作出反应而冷静地指出："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象1914年那样完全有能力进行一场长期战争，那我们就是在把我们的脑袋埋进沙子里"。这种预测对英国这个大国来说并不是令人愉快的，因为英国的战略计划人员虽认为他们无法打赢一场短期战争，但却总是希望能设法打赢一场持久战的。

到战争前夕，英国在军事领域内也出现了同样严重的矛盾。英国1939年决定再次接受对法国的正式"大陆义务"，并且几乎同时还决定将海军优先部署在地中海而不是新加坡，虽然这解决了一些长期存在的战略问题，但是也使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完全暴露在日本下一步侵略行动的威胁之下。英国还采取了同样矛盾的方式，1939年春天迅速向波兰作出保证，接着又向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作出保证，这标志着白厅重新发现了东欧和巴尔干在大陆力量平衡中的重要性；但是事实上，面对着德国人的坚决进攻，英国武装部队保卫这些地区的前景是很渺茫的。

总之，张伯伦在1939年3月以后对德国采取了强硬政策也好，1940年5月由丘吉尔接替张伯伦也好，都没有"解决"英国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困境；它们都只是重新明确了这些问题而已。对于英国这个处于其历史上这种晚期阶段的范围过大的全球帝国来说——它仍控制着全球1／4的地盘，而其工业生产能力和"战争潜力"却只占9～10%——绥靖政策和反绥靖政策都有不利之处，所以只有在坏事中进行选择了。1939年作出的顶住希特勒的进一步侵略行动的正确选择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各国已反对英国在欧洲的利益，更反对在远东的利益，力量对比已十分不利于英国，以致没有中立大国的干预就很难看出英国如何能保证取得对法西斯主义的彻底胜利。而且，这样也会带

来它的问题的。

四、幕后的超级大国

如上所述，当英国和法国全力以赴地应付30年代的外交和战略挑战时，它们的决策者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苏、美这两个有点分离的大国的态度不明确。要说服它们结成同盟共同对付法西斯国家必须做进一步努力，但是这样做须对莫斯科和华盛顿的要求作重大让步并且在国内会遭到批评，这值得吗？应在哪些方面更热烈地追求其中的哪个国家呢？向苏联靠近的公开行动究竟是会挑起还是遏制德国或日本的反应呢？从柏林和东京的观点来看（罗马还并不这样坚持认为），苏联和美国的态度是同等重要的。当希特勒重新安排中欧的边界时，这两个大国会不会袖手旁观呢？它们对于日本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或在东南亚反对老牌欧洲帝国殖民地的行动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美国会不会象1914～1917年时那样至少给西方民主国家以经济援助呢？通过经济的和国土的交易，苏联会被收买吗？最后，这两种不可思议的内省的政体真的有很重要的意义吗？它们实际上到底有多么强大？它们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中能占多么重要的地位？

在象苏联这样一个"封闭"式社会的情况下，要回答这些问题是比较困难的。然而，苏联在那个时代的经济增长和军事实力的大致情况，现在看来还是清楚的。首先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与其他任何一个大国相比，经过1914～1918年的战争，后来又经过革命和内战，苏联的实力极大地削弱了。其人口从1914年的1.71亿急剧减少到1921年的1.32亿。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丧失使这个国家丢掉了许多工厂、铁路和农庄，剩下的也遭受漫长的战争的严重破坏。工业生产能力到1920年已急剧下跌到1913年产量的13%，它掩盖了某些关键产品的更大崩溃："铁

矿石的产量只有战前的 1.6%，生铁只有 2.4%，钢只有 4.0%，棉花为 5%”。对外贸易完全停顿，农作物总产量还不到战前数量的一半，人均国民收入下降了 60%以上，已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不过，因为这种严重衰退主要是由于 1917～1921 年间社会和政治混乱造成的。因此苏维埃统治（或无论什么统治）的建立必然能实现某种程度的恢复。苏联工业在战前和战争期间的发展使布尔什维克得到了许多工厂、铁路工程和轧钢厂。有了铁路、公路和电报线路的基础结构。工业工人在内战结束后马上就可以返回工厂。农业生产以及食物向城镇的销售都有一种既定模式，一旦列宁决定（根据 1921 年的新经济政策）放弃使农民“公社化”的无效努力而允许个体耕种以后就可以恢复这种模式。因此，到 1926 年，农业产量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又过了两年，工业产量也恢复到战前水平。战争和革命耗费了苏联 13 年的经济增长时间，但是它现在已作好准备重新开始它的迅猛发展了。

但是，苏联在传统的虚弱的经济中艰难地前进，因此这种“发展”不可能很快——对越来越独裁的斯大林说来，当然是不够快的。没有外国投资可供利用，发展大规模工业和在敌对的世界上建立强大的武装部队所需的资金，必须设法从国内资源获得。可以鼓励中产阶级创造资金，也可以剥夺其现有的财富，但现在中产阶级已被消灭了；（1926 年）苏联人口的 78%仍处在落后的农业部门，而农业部门绝大部分仍掌握在私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斯大林来说使这个国家得到钱同时加速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农业集体化，迫使农民参加公社，消灭富农，控制土地的产量，并且确定支付给农业工人的工资和食物转卖的价格（比农工工资高得多）。因此，国家以令人吃惊的残酷手段，干预乡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从城乡每个人身上榨取金钱，达到了连沙皇政权都从来没敢干过的程度。另外还通过故意造成的物价飞涨、名目繁多的税收和费用以及迫使个人购

买国家债券以表示忠诚等办法，加重对人民的剥夺。从粗略的宏观经济学的统计数字来说，总的结果是，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私人消费的比例被压低到51%或52%这个骇人的水平，而在其他处于向工业化“起飞”阶段的国家中，私人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一般为80%左右。

实现社会主义“指令经济”的这种惊人的企图，导致了这两个互相矛盾而又可以预测的经济后果。第一，因为富农（以及其他人）反抗强制的集体化而后被消灭，所以苏联的农业生产出现了灾难性衰退。农场牲畜遭到可怕的抢先屠宰——“马的数目从1928年的3350万匹减少到1935年的1660万匹；牛的数目从7050万头减少到3840万头”——这反过来又造成肉类和谷物产量的急剧下降，使人民已十分悲惨的生活标准更趋低下，直到赫鲁晓夫时期才开始有所恢复。有人曾试图秘密计算国民收入中后来又以拖拉机和电气化的形式转回到农业中去的那一部分——与集体化和物价挖控制所占的数字相对而言——但是，这是我们为达目的而进行的一项秘密的试验，因为（例如）拖拉机厂一经建立以后就可以转产轻型坦克；当然，农民在抑制德国军队方面是没有坦克那么有用的。不容置疑的是，当时的苏联农业生产已经崩溃，特别是在1933年饥荒期间，受害人数估计有好几百万人。当30年代末产量开始恢复时，由于增加了成千上万的拖拉机、大批农业科学家和严格控制的集体农民队伍，就更加促进了农业的恢复。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其代价是无法估量的。

第二个后果则比较乐观些，至少从苏联的经济军事实力的目的的角度看是这样。国民生产总值中私人消费部分下降到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低的水平——并且肯定远远低于纳粹德国计划中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就可以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25%这样惊人的比例用于工业投资，并且仍有比较大的数额用于教育、科学和武装部队。许多苏联人的工作岗位在以惊人的速度发

生着变化，在1928年～1940年这十二年间，从事农业的人口从71%下降到51%，但同时人民受教育的程度也以空前的速度在提高。这在两个层次上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苏联与德国或美国相比，一直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工人队伍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并且有很多是文盲，工业生产部门为了得到更高级的指导和不断改进而需要的工程师、科学家和管理人员的数目却很少。有几百万工人现在正在厂办学校或技术学院中培训，然后（稍晚些时候）随着大学的数目迅速增多，这个国家终于获得了持续增长所需要的训练有素的干部；例如，在"国营经济"部门中的大学毕业工程师的数目，从1928年的4.7万人增加到1941年的28.99万人。苏联宣传人员在此期间所吹嘘的许多数字，无疑是言过其实的并且隐瞒了各种弱点，但是将资源有意识地分配于发展生产却是不容置疑的，此外，还越过乌拉尔山脉建立了许多新的大型发电厂、炼钢厂和其他工厂，这些工厂不容易受到西方或日本的攻击。

结果在工业生产和国民收入方面出现了好转——尽管人们承认的是更慎重的估计——这是工业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因为在前些年（例如1913年，更不用说1920年了）实际的产量和产值都非常低，所以百分数的变化几乎是毫无意义的——尽管上面的表28对于说明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期间苏联的工业生产是怎样发展的还是很有用的。不过，如果我们只研究两个五年计划（1928～1937年）期间，那么苏联的国民收入就已从244亿卢布上升到963亿卢布，煤产量从3540万吨增加到12800万吨，钢产量从400万吨增加到1770万吨，发电量增长7倍，机床产量增长20倍以上，拖拉机几乎增长40倍。确实，到30年代末，苏联的工业产量不仅大大超过了法国、日本和意大利，而且还可能赶上了英国。

然而，在这种引人注目的成功的背后，仍潜伏着许多不足之

处。虽然在30年代中期农业产量缓慢上升，但是苏联农业却不象以前那样能满足国内需求，更不用说有多余产品提供出口了；并且亩产量仍是惊人地低下。尽管在铁路方面增加了投资，但是通讯系统仍是原始的，不适合国家日益增长的需要。在许多工业部门，严重依赖于外国公司和外国专家，尤其是美国的公司和专家。工厂和整个生产过程都非常"庞大"，因此要想很快调整产品结构或采用新设计是十分困难的。有些工业部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扩充，可是现有的原料储备或熟练的人员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妨碍生产流程的因素。1937年以后，苏联经济的发展方向调整为实行大规模军备计划，这必然会影响工业的连续性并且打乱早先的计划。最重要的是苏联发生的大清洗。无论斯大林对自己的这么多人民搞疯狂的妄想狂的袭击是出于什么理由，但是经济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公务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统计人员乃至工头"都被赶到集中营，使得苏联训练有素的人员的短缺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虽然这种恐怖无疑迫使许多人对这种制度表示了斯达汉诺夫式的忠诚，但是也大大抑制了创新、实验、公开讨论和建设性的批评："最简单的事就是避免负责，干任何事都要设法得到上司的批准，不管本地条件如何都机械地服从所接受的一切命令"。这样可以免受伤害，但却无助于复杂经济的发展。

由于苏联诞生于战争并且受到波兰、日本、英国等潜在敌人的严重威胁，所以在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苏联将国家预算的很大比例（12～16%）用于国防开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两年内，这个比例有所下降，这个时候苏联正规部队稳定在大约60万人，作为后盾的庞大但是战斗力很差的民兵部队的规模还要大一倍。满洲危机和希特勒上台导致陆军规模迅速增大，1934年达到94万人，1935年又增加到130万人。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产量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制造了大量的坦克和飞机。

在杜卡切夫斯基周围工作的有创新精神的军官们，都乐意潜心研究杜黑、富勒、利德尔.哈特、古德里安和其他西方军事理论家的思想（尽管不完全接受），到30年代初，苏联不仅拥有坦克部队，而且已拥有庞大的伞兵部队。虽然苏联海军的规模仍不大并且战斗力也不强，但是在20年代末已建立了规模很大的飞机工业，在一段时间里每年所生产的飞机就比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还多。(参见表29)。

但是，这些数字也隐藏着惊人的弱点。从苏联的"庞大"可以预计到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过分强调数量。由于指令经济的特点，导致30年代初生产了大量的飞机和坦克，确实，1932年苏联生产出3000多辆坦克和2500多架飞机——这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得多。由于1934年以后正规部队迅速增加，必然极难找到受过很好训练的足够的军官和军士，来管理这些坦克营和空军中队。在农民过剩而熟练工人非常短缺的国家里，给现代化陆军和空军配备人员是件更加困难的事；尽管苏联有宏大的教育计划，但是在30年代它的主要弱点可能依然是许多工人和士兵受的训练太差。而且，与法国一样，苏联也由于30年代初在飞机和坦克的类型上投资太多而深受其害。西班牙内战证明这些第一代武器在速度、机动能力、航程和刚度等方面有一定局限性，于是加剧了建造更快的飞机和更强大的坦克的竞赛。但是苏联的军事工业，就象海上的大船一样不能很快改变航向；并且当新的型号正在制造和试验时就停止现有型号的生产似乎是愚蠢的。(就此而论，指出下述事实是很有意思的："1941年6月可使用的苏联坦克有2.4万辆，但性能相当于或超过当时德国坦克的新型设计型号只有967辆"。）除此之外，又发生了大清洗。除去红军的首脑——红军中90%的将军和80%的上校都遭到斯大林的疯狂迫害，不仅造成毁掉许多训练有素的军官的全面影响，而且特别给武装力量带来了严重损害。大清洗清除了杜卡切夫斯基和许

多“现代战争”的热心家，消灭了研究德国作战方法和英国作战理论的那些人，使军队的大权落在了象伏罗希洛夫和库拉克这样一些政治上可靠但是头脑迟钝的人物手中。最早的一个结果就是解散了七个机械化军。这一决定是在下述观点的影响下作用的：认为西班牙内战证明，坦克兵团在战场上不能起独立进攻的作用，这些坦克应当分散在步枪营中对步兵进行支援。几乎同样，还断言TB——3战略轰炸机对于苏联来说没有什么用。

表29 诸大国的飞机产量（1932～1939）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法国	(600)	(600)	(600)	785	890	743	1382	3163
德国	36	368	1968	3183	5112	5606	5235	8295
意大利	(500)	(500)	(750)	(1000)	(1000)	(1500)	1850	(2000)
日本	691	766	688	952	1181	(1511)	3201	4367
英国	445	633	740	1140	1877	2153	2827	7940
美国	593	466	437	459	1141	949	1800	2195
苏联	2595	2595	2595	3578	3578	3578	7500	10382

由于苏联空军大都废弃了，装甲部队解散了，军队被清洗运动吓得变成盲目服从，所以苏联在30年代末比起5年或10年以前要弱多了——在此期间，德国和日本大大增加了军火产量，并且变得更具侵略性。1937年以后的五年计划明显包括了巨大的军备建设，等于并且在许多方面（例如飞机生产）大于德国的规模。但是，在这些投资真正转化为非常强大而又装备精良的武装部队以前，斯大林就觉得苏联至少象1919～1922年受到威胁那样正在通过一个“危险区”。这些外部环境帮助说明了30年代苏联外交的种种变化。斯大林担心日本在满洲的侵略行动，也许更担心希特勒德国，他所面临的是在相距几千哩的战区内进行两线

作战的潜在前景（这正是曾吓坏了英国决策者的那种战略困境）。他的外交政策转向西方，包括苏联1934年参加了国际联盟和1935年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了条约，但是这并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增加了"集体安全"。苏联没有与波兰达成协议，实际上就不能给法国或捷克斯洛伐克多大帮助——反过来也一样。英国对于这些建立一个反德外交"人民阵线"的活动表示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斯大林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谨慎态度；莫斯科担心，在西班牙建立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会将英国和法国推向右翼，并且可能使苏联卷入与佛朗哥的支持者意大利和德国的公开冲突之中。

到1938～1939年，在斯大林看来，外部形势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威胁性（这使得他的清洗工作更加愚蠢而令人费解）。慕尼黑解决办法不仅似乎证实了希特勒在中东欧的野心，而且——更令人担心地——暴露了西方并不准备反对这种野心，而是更愿意把德国的势力再进一步转向东方。因为这两年内苏联和日本军队之间在远东还发生了多次边界冲突（需要大大增强在西伯利亚的苏联师），所以斯大林还是决定对柏林实行绥靖政策，这是毫不奇怪的，尽管这意味着要与他的意识形态敌人并肩坐在一起。因为苏联自己在东欧就有政治野心，所以莫斯科在瓜分这一地区的独立国家的问题上根本没有什么保留，只要它自己能分到够大的一份就行了。1939年8月签订了令人震惊的纳粹苏联条约，这样，当西方因希特勒进攻波兰而与德国发生战争时，苏联在西部边境可至少有一个缓冲地带并且有更多的重整军备时间。（用丘吉尔的话说）喂一点给鳄鱼吃似乎总要比被鳄鱼吃掉好得多。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所以要衡量30年代末苏联的实力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因为关于"相对战争潜力"的那些统计数字既不反映内部士气，也反映不了武装部队的素质或地理位置。显然，

红军似乎已不再是麦金托什所描写的在 1936 年那样"拥有先进装备和特别顽强的战士的极其强大的现代化部队"了（除了后一方面以外）；但是，它已经削弱到什么程度，还不很清楚。1939～1940 年对芬兰的"冬季战争"似乎证实了其战斗力的急剧削弱。然而，鲜为人知的 1939 年在诺蒙汉发生的与日本的冲突则表明，苏联有一支领导很得力的现代化部队在作战。此外，斯大林显然被德国陆军在 1940 年取得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式的胜利惊呆了，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急于招惹希特勒参战。他的另一个巨大而明显的忧虑在于，东京可能决定在东方何处发起进攻——这倒不在于日本是个多么可怕的敌人，而是因为西伯利亚的防御在后勤方面消耗很大，并且会进一步削弱苏联对付德国威胁的能力。在东方同日本刚达成边界停战协议，1939 年 9 月朱可夫的装甲部队就马上被召回去参加侵略东部波兰的战斗，这充分说明了这种预防性的战略欺骗伎俩。另一方面，当红军所蒙受的损失已迅速恢复，红军数量增加时（到 1941 年已增加到 432 万人），整个苏联经济就转向战时生产，许多新的工厂在苏联中部地区建立起来，改进型飞机和坦克（包括令人生畏的 T–34 坦克）也在试验中。国防开支在财政预算中的比重从 1937 年的 16.5%，猛增到 1940 年的 32.6%。因此，与这个时期的多数其他大国一样，苏联在与时间赛跑。与 1931 年时相比，斯大林更加需要鼓励他的同胞缩小在生产上与西方的差距。"放慢速度就意味着落后。而落后者就要挨打。……"沙皇时代的俄国就是因为在工业生产和军事实力上落后才"不断地挨打"。苏联政权在其更加专制而冷酷无情的领导人的领导下，决定快速赶上。希特勒会不会让它这样干，那就很难说了。

奇怪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年代里，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实力，与苏联和德国的情况竟成反比例。这就是说，它在 20 年代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后来在萧条的 30 年代又比其他任何大

国都衰退得更快。只是到这个时期的最后一年才开始恢复（并且是部分恢复）。美国在这几十年的头十年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原因，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除了日本以外，美国是从大战中获益的唯一大国。它不但早已是工业制品和食品的最大生产国，而且又变成了世界最大的金融和债权国。它的黄金储备是世界上最多的。它有非常巨大的国内市场。因此许多大公司和批发商建立了巨大规模的经济，特别是在繁荣兴旺的汽车工业部门。它有高标准的生活水平并且容易得到投入资金；两者以互利的方式相互影响，从而推动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制造业，因为消费者的需求实际上可以吸收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所提供的全部产品。例如，1929 年美国生产了 450 多万辆汽车，而法国的产量是 211000 辆，英国是 182，000 辆，德国是 117000 辆。毫不奇怪，橡胶、锡、石油和其他原料的进口猛增，以供应兴旺的制造业；而特别是卡车、农业机器、办公设备和类似产品的出口在整个 20 年代也有很大发展，因为美国海外投资的迅速增长对这种进展也起了扶助的作用。尽管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下列情况仍令人震惊，在这些年内美国的工业产量“比另外六个大国合在一起还多”，并且“美国的人均生产总值进一步说明了她的压倒优势的生产能力，在这方面美国几乎是英国或德国的两倍，是苏联或意大利的 10～11 倍以上”。

正象上述引文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与她那非常强大的工业实力不相称”，虽然情况也确实如此，但这在 20 年代可能还不那么重要。首先，美国人民断然拒绝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作用，因为这样的地位必然会产生外交和军事上的纠纷；如果其他国家的行动对于美国的商业利益不会产生有害影响，那就没有什么理由要介入外国事件——特别是在东欧或非洲之角发生的事件。其次，虽然美国进出口额的绝对值有很大增加，但是正由于美国是个自给自足的

国家，所以进出口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并不大；事实上，“出口的工业产品在总产量中所占比例，从1914年的稍低于10%下降到1929年的不足8%”，并且国外直接投资的帐面数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仍然没有变化——这就说明了尽管原则上广泛接受了世界市场概念，但是美国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面向国内需要。除了某些原料以外，外部世界对于美国的繁荣兴旺并不那么重要。最后，1919年以后的十年内的国际事务对美国利益不存在重大威胁：欧洲人仍在争吵不休，但是比起20年代初要好多了，俄国被孤立，日本也沉寂了。海军竞赛受到华盛顿条约的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美国允许建立相当强大的现代化空军，并且允许海军发展它的航空母舰和重型巡洋舰计划，但是却可以将陆军减少到很小的规模（大约14万正规军）。虽然可以预料将军们和海军上将们都纷纷抱怨从国会得不到足够的资源，并且干了一些有损于国家安全的事情（比如斯廷森以“绅士们不看彼此的邮件”为理由，于1929年决定解散密码破译部队），但事实是，在这十年里美国在军事上虽属中等，但却仍是一个经济巨人。在此期间，美国仍没有象英国的帝国国防委员会或者它自己后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那样一个高级文职军事机构来考虑战略问题，这可能也是这一时期形势稳定的标志。当美国人民断然拒绝战争念头时，有什么必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机构呢？

前面已叙述了美国在造成1929年财政崩溃中的主导作用。为了衡量相对国家实力，更为重要的是，后来的萧条和关税战使它的经济受到了比其他任何经济发达国家都大得多的损失。如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的相对不受控制和反复无常的特性所造成的，那么另一方面也受到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决定选择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尽管美国的农场主和一些工业界院外活动集团抱怨不公平的外国竞争，但是因为美国的工业和农业生产能力很高，（出口超过进口明显地说明了这一

点)，所以如果开放的世界贸易秩序解体将使美国出口商受到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的损害。“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29年为984亿美元，3年以后就暴跌到只有一半。1933年的工业品产值还不到1929年时的1/4。几乎1500万工人失业并且得不到任何支援。……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出口额从52.4亿美元减少到16.1亿美元，下降了69%”。由于其他国家都匆忙参加了保护贸易集团，所以美国严重依赖出口的那些工业部门就被压倒了。“小麦出口额在前10年内的总值为2亿美元，1932年急剧减少到500万美元。汽车出口额从1929年的5.41亿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7600万美元”。世界贸易普遍崩溃，而美国的外贸比重萎缩得更快，从1929年占13.8%下降到1932年的还不到10%。更有甚者，到30年代中后期，当一些其他大国开始稳定地恢复生产时，美国在1937年却又发生更为严重的经济动乱，使前5年内获得的进展又大部分丧失掉了。但是，由于出现了称之为“分隔的世界经济”——也就是说，逐渐趋向于成立比20年代时具有强大得多的自给自足能力的贸易集团——所以美国的这第二次衰退并未使其他国家受到多么严重的损失。总的后果是，在发生慕尼黑危机的那一年，美国在世界工业产值中所占比例，比1910年前后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低（参见表30）。

因为这次衰退极其严重，并且对外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所以在胡佛特别是罗斯福掌权时，美国政策变得更加内向。鉴于孤立主义者的强硬主张和罗斯福有一系列紧迫的国内问题需要解决，所以很难指望罗斯福能象科德尔.赫尔和国务院所希望的那样将注意力集中到国际事务上。不管怎样，因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仍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所以批判下面的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即“致力于恢复国内经济”，并且“希望看到即刻的行动和结果（以及）按民族习惯制定政策，而经常不大考虑美国的计划对其他国家的可能影响”。1934年下令禁止向

拖欠其战争借款的任何外国政府再提供贷款，1935年禁止在发生战争时输出武器。不久，又禁止向任何交战国提供贷款。所有这一切使得英国和法国在抵抗法西斯国家的问题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了。意大利1935年受到公开指责，与此同时美国却大大增加了对墨索里尼政权的石油供应而使英国海军部惊愕万分。作为对德国和日本的侵略行动的部分反应，美国对它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商业限制“引起（双方的）对抗，但是对于这些国家的对手却并没有提供有意义的帮助。罗斯福的经济外交政策树立了不少敌人，而没有赢得朋友或支援未来的盟国”。最严重的后果——虽然责任需要共同承担——也许是正当独裁者国家进行挑战的时候，在白厅和华盛顿之间出现了互相猜疑。

表30 诸大国在世界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例（1929～1938年）

	1929	1932	1937	1938
美国	43.3	31.8	35.1	28.7
苏联	5.0	11.5	14.1	17.6
德国	11.1	10.6	11.4	13.2
英国	9.4	10.9	9.4	9.2
法国	6.6	6.9	4.5	4.5
日本	2.5	3.5	3.5	3.8
意大利	3.3	3.1	2.7	2.9

然而，到1937年和1938年，罗斯福本人似乎也变得更加担心法西斯威胁，尽管美国公众舆论和经济困难妨碍了他率先采取行动。他给柏林和东京的文电变得更强硬了，而他对英国和法国的鼓励也稍微热情了一些（尽管这种做法在短期内还难以帮助这两个民主国家）。1938年，英美海军举行了秘密谈判，研究如何对付日本和德国双双挑战的问题。这位总统的“隔离”演说，正是

他将要对独裁者国家实行经济上差别待遇的一个早期信号。最重要的是，罗斯福现在迫切要求大量增加国防开支。正如表26的数字所表明的那样，即使在1938年，美国的军备开支还少于英国或日本，并且只相当于德国和苏联花费的总额的一小部分。不管怎样，飞机生产在1937年和1938年间实际上翻了一番，并且国会在1938年通过了一项"海军首位"法令，允许大大发展舰队。那时，还对B—17轰炸机样机进行试验，海军陆战队正在精心研究其两栖作战原则，而陆军（当时还没有合用的坦克）则尽力设法解决装甲战的问题并且在安排庞大部队的动员计划。当战争在欧洲爆发时，还没有一个军种完全作好了准备；但是，相对于现代战争的要求来说，他们所处的状况比1914年时要好。

这些重整军备措施都几乎没有影响到美国这种规模的经济。30年代末美国经济的关键因素是利用得太少了。失业人数在1939年大约为1000万人，然而由于对运输机传送带、电动机(代替蒸汽机）进行投资和有较好的管理技术，而大大提高了每个人时的工业生产率；不过因为劳动力的工时大大减少了，所以很少通过绝对产量数字表现出来。1937～1938年价格下跌也无助于需求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新政"方案也不足以刺激经济和发挥这种利用率很低的生产能力之优势。例如，1938年美国生产了2640万吨钢，大大超过德国的2070万吨、苏联的1650万吨和日本的600万吨；但是后三个国家的炼钢工业是在以满负荷工作，而美国的钢厂有2/3处于闲置状态。后来的情况是，这种利用率很低的状况不久就由于巨大的重整军备计划而大大改观。1940年授权海军的作战舰队增加一倍(!)，陆军航空军计划建立84个空军大队，有7800架作战飞机，（根据"选募法"和"训练条例"）建立一支拥有近100万人的陆军——这一切对美国的经济都产生了影响；美国的经济与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不同，它不受严重结构问题的影响，只是由于大萧条而使利

用率很低罢了。正因为美国有巨大的多余能力，而其他国家经济处于过热状态，所以能够说明将来战争的结果的最重要的统计数字，也许并不是1938年实际钢产量或工业产量的数字，而是试图衡量国民收入（表31）和不很精确的“相对战争潜力”（表32）的那些数字。因为这两个表的情况都提醒我们，虽然美国在

表31　诸大国1937年的国民收入和用于国防开支的比例

	国民收入(10亿美元)	用于国防开支的比例
美国	68	1.5
英帝国	22	5.7
法国	10	9.1
德国	17	23.5
意大利	6	14.5
苏联	19	26.4
日本	4	28.2

大萧条期间蒙受了不相称的损失，但是美国仍然是（用山本海军上将的话说）一个沉睡的巨人。

这位巨人在1938年以后、特别是1940年以后的觉醒，最后证实了在这个时代的军备竞赛和战略分析中，时机选择是个关键性问题。就象英国和苏联稍早些时候的情况一样，美国现在正在尽力缩小由于法西斯国家优先投入大量国防经费而拉开了的军备差距。从下面的统计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出，只要国内有这种政治决心，它的国防开支可以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直到1939年的时候，美国国防开支还只占总开支的11.7%，国民生产总值的1.6%——这两个百分数远远低于任何其他大国。国防开支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如果增加到接近于法西斯国家的军费

开支比例，美国就会自动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国家。此外，有许多迹象说明，柏林和东京已意识到美国的这种发展将减少它们将来扩张的机会。在希特勒的情况下，问题更加复杂化，他把美国蔑视为一个退化变质的、人种混杂的大国，但是因为到四十年代中期军事平衡将决定性地偏向英—法—美阵营，所以他也感到他不敢等到那个时候再重新开始他的征服。从日本人方面

表 32　1937 年诸大国的相对战争潜力

美国	41.7%
德国	14.4%
苏联	14.0%
英国	10.2%
法国	4.2%
日本	3.5%
意大利	2.5%
七个大国	90.5%

来说，因为对于美国的看法更加严肃认真，所以分析问题也更加准确：这样，日本海军估计，尽管其战舰实力在 1941 年底是美国海军的 70%，这个数字还是相当体面的，但是“到 1942 年这个数字将下降到 65%，1943 年将下降到 50%，1944 年则只有灾难性的 30%了”。与德国一样，日本如果打算在越来越被超级大国的阴影笼罩着的世界摆脱中等强国的命运，那么它也有迅速采取行动的强大的战略动机。

五、逐渐展现的危机（1931～1942 年）

当全面研究每个大国的相对强弱，并且与时代的经济和技术军事动向相结合时，30 年代国际外交的发展情况就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了。这并不意味着，象沈阳危机、埃塞俄比亚危机、苏台德危机等各种各样的危机的**地方性**根源是完全不相干的，或者说如果诸大国协调一致就不会存在国际问题了。但是很显然，当发生地区性危机时，每个大国首都的政治家们都不得不从两个方面来观察这些事件：他们既要考虑更大的外交舞台，也许还特别要考虑他们国内的紧迫问题。1931 年满洲事件与英国货币危机和第二届工党政府的倒台相互影响之后，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向他的同事鲍尔温谨慎地阐明了这一观点：

> 我们已被日复一日的麻烦事搞得晕头转向，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综观全局并且精心制定有关的政策，我们只得整天焦虑不安地生活。

它很好地提醒我们，政治家们考虑问题的方法往往是眼前的和注重实际的，而不是长期的和战略的。但是，即使在英国政府恢复元气以后，也没有迹象表明它打算改变其对日本征服满洲所采取的小心谨慎的政策。英国领导人除了需要继续处理经济问题以及公众始终对卷入远东事务表示的厌恶情绪之外，也还意识到各自治领都要求和平，而且在日本拥有战略优势的地区内帝国防御却处于十分糟糕的状态。总之，有各种各样的英国人同意东京关于对付愤怒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决定，而更多的人则希望保持与日本的良好关系。甚至在日本人进一步扩大侵略以后，那些看法逐渐消失时，白厅可以采取更强烈行动的唯一方式就是与国际联盟或其他大国联合在一起。

国际联盟的原则是令人赞美的，但是除了派出它的领导成员

国的武装部队以外，它自己并没有有效的办法阻止日本人在满洲的侵略。因此，它只能求助于一个调查研究委员会（李顿委员会）而这却给诸大国一个迟迟不动的借口。与此同时日本则继续进行它的征服。在诸大国中，意大利在远东没有实际利益。德国虽然与中国有商业和军事联系，但是它宁可不采取行动而是观察日本“修订论者”是否能为欧洲提供一个有用的先例。苏联倒是关心日本侵略，但是不大可能被邀与其他大国合作，而且又不想单独被人推入战争。法国预计是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它不希望看到改变现有国土边界和藐视国际联盟决议的先例；另一方面，法国越来越担心德国在秘密地重整军备并且需要维持欧洲现状，而远东发生纠纷会把注意力甚至军事资源从德国问题上转移开，法国一想到这点就感到胆战心惊，虽然巴黎公开宣称坚决站在国际联盟的原则立场上，但是它私下里暗示日本，它理解日本在中国的问题。相反，美国政府——至少以国务卿斯廷森为代表的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宽恕日本人的行动，他们把这种行动看成是对美国生活方式在理论上赖以生存的门户开放世界的威胁，这种看法是对的。但是，斯廷森的高度原则性的指责既没有引起担心会引起纠纷的胡佛的重视，也没有引起宁愿随风转舵而不准备讨伐的英国政府的注意。结果是斯廷森和胡佛各自发表备忘录进行争吵，并且（更重要的是）在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留下了互相怀疑的后患。所有这些提供了被一位学者称为“外交政策的限制”的令人沮丧而又有说服力的例证。

日本人1931年在满洲的军事行动是不是在国内政府不知道的情况下实行的倒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一行动在西方国家未能作出重大反应的情况下获得成功并且扩大了。更大的后果是证明了国际联盟在防止侵略方面是无能为力的。并且三个西方民主国家不能采取统一行动。这也明显表现在同时在日内瓦进行的关于地面和空中裁军的讨论中；当然，在这次会议上，美国缺

席，而英法在如何对待德国的“平等”要求上各持已见，并且英国继续回避向法国作出任何保证来减轻它的忧虑，这就意味着希特勒新政权可以离开谈判桌并且谴责现有条约而不用担心受到任何惩罚。

到 1933 年，正当世界经济会议不欢而散，三个民主国家建立它们自己的货币和贸易集团的时候，德国威胁的复活又进一步对英、法、美外交合作增加了压力。虽然法国更直接受到德国的威胁，但是英国却感到它的行动自由受到很大侵犯。到 1934 年，内阁及其国防军需委员会都承认，虽然日本是更直接的危险，但德国却是更大的长期威胁。因为它的力量还不可能同时对付这两个敌人，所以在其中一个地区达到和解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有些集团倾向于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以便能更好地对付德国，但是外交部认为在远东的英—日谅解会破坏伦敦与美国的微妙关系。另一方面，对希望优先加强英国在东方的防御力量的那些帝国和海军集团来说应当指出，法国对德国的修订论者的活动表示忧虑，英国不可能不支持法国，并且（在 1935 年以后）忽略来自德国空军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也是致命的。在这 10 年的剩下的时间里，白厅决策人千方百计要摆脱在地球的两边可能两面受敌的这种进退维谷的战略困境。

然而，在 1934 年和 1935 年，这样的困境似乎令人烦恼不安但是还不那么紧张尖锐。尽管希特勒政权显然令人讨厌，但是他却令人奇怪地自己表示愿意与波兰达成与一项解决办法；不管怎样，德国在军事上还是比法国或苏联要虚弱得多。而且，在 1934 年多尔富斯暗杀以后德国对奥地利采取行动的努力，促使墨索里尼在布伦纳山口部署了部队以示警告。意大利有可能同当时的大国联合起来，这种前景使法国特别欣慰，因为法国想在 1935 年 4 月的“斯特雷扎阵线”中成立一年反德同盟。几乎同时，斯大林表示他也非常希望与“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到

1935年，苏联不仅参加了国际联盟，而且还与巴黎和布拉格签定了安全条约。虽然希特勒明确表示他反对"东方洛迦诺"，但是看来德国已完全受到各个方面的牵制。在远东，日本没有什么动静。

然而，到1935年下半年，没等希特勒动一个手指头，这种令人鼓舞的局面就很快瓦解了。一方面，英国对法国重新开始与苏联联合表现出不安，另一方面，法国对1935年6月的英—德海军协定也感到沮丧。这就已经暴露了英国和法国对于"安全问题"的不同理解。为了获得格外的安全，这两项措施都是单方面采取的：法国希望把苏联拉到欧洲的势力平衡中，英国则切望能满足它在欧洲水域和远东的海军需要。但是，这两个邻国互相把对方所采取的步骤都看成是给了柏林一个错误的信号。即使如此，这样的矛盾是有害的但并不是灾难性的，而墨索里尼决定在一系列地方性冲突以后入侵阿比西尼亚，并且枉费心机地企图实现其建立一个新的罗马帝国的野心，这种情况就不同了。这也是地区性争端具有特别广泛的影响的一个例证。阿比西尼亚事件使一个新的潜在反德盟国变成了死敌而将法国惊呆了，整个阿比西尼亚事件这一插曲对于法国来说是一场十足的灾难：允许严重违背国际联盟原则是令人不安的，墨索里尼显示其潜力也同样是令人不安的（因为他下一步会进攻什么地方呢?）；另一方面，从严格的**现实政治**角度来说，将意大利推到德国阵营是一个惊人的愚蠢行动——但是后一种考虑不大可能动摇理想主义的英国。然而，白厅的困境至少同样也是很大的，因为它不仅必须妥善处理广大公众对意大利公然违背国际联盟原则的行径感到更加不安的情绪，而且还要担心一旦西方国家忙于地中海纠葛时日本在远东会干出什么事来。法国担心与意大利的争吵会诱使希特勒染指莱茵兰，而英国则怀疑它会鼓励日本在亚洲进一步扩张，特别是因为当时东京正要公开废除海军条约和进行无限制的舰队建设。从

更大的意义上说，二者都是对的；同以前一样，困难仍然在于如何使眼前的问题和长期的影响协调一致。

法国的担心首先被证明是正确的。1935 年英—法提议将东北部非洲的国土调整给意大利（霍尔-赖伐尔协定）引起英国舆论哗然，特别是道义上的愤慨。对于这些愤怒情绪是否应该附和？还是仍在私下里花言巧语地粉饰为什么它们不应与意大利打仗的战略和经济理由呢？伦敦和巴黎政府还在左右为难犹豫不决，而希特勒却已趁机下令重新占领了非军事化的莱茵兰（1936 年 3 月）。从严格的军事角度来说，这算不上一次大打击；那时，法国是不会发动一次对德国的进攻的，英国也完全不可能这样做。但是，凡尔赛解决办法的这种进一步削弱——以及洛迦诺条约的彻底废弃——产生了这样一个普遍问题：什么是（或不是）一种国际上可以接受的改变现状的办法？由于国际联盟领导成员在 1935～1936 年阻止墨索里尼侵略上的失败，国际联盟这时几乎完全声名狼藉，例如在西班牙内战或 1937 年日本公开侵略中国时，它起的作用就很小或根本没起什么作用。要想制止或至少控制现有领土秩序的进一步变化，只有靠主要的"现有的"大国对"修正论者"国家采取坚决行动才能做到。

然而，每个"现有的"大国看来都没有实际可能以诉诸武力相威胁。的确，正当法西斯国家更密切地联合到一起时（在墨索里尼宣布罗马—柏林轴心以后不久，德国和日本在 1937 年 11 月又签订了它们的反共产国际条约），它们的潜在对手却变得更加内向和不团结了。尽管美国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和轰炸菲律宾波奈非常不满，但是对罗斯福来说，即令他想要在海外事务中采取决定性步骤，1937 年也不是个好年头：经济受到重新开始的萧条的打击，并且国会通过了更严格的中立法规。因为罗斯福所能提供的一切全是谴责的语言而没有任何行动，所以它的政策"只能越来越增加英—法对美国可靠性的怀疑"。斯大林也将精力集中于

国内事务，不过方式完全不同，它的清洗和形式上的审判那时正处于顶峰。虽然斯大林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小心翼翼地扩大了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帮助，但是他意识到许多西方国家虽不喜欢“黑衬衫”但更不喜欢“红衬衫”，并且参加与轴心国的公开战争是非常危险的。日本在远东的行动以及反共产国际条约的签订，使得斯大林愈加谨慎。

然而在1936～1937年间受影响最大的大国无疑是法国。不仅它的经济衰退、政治局面四分五裂，以致有些观察家认为它已接近于内战，而且它自己苦心策划的欧洲安全体制在一系列破坏性打击之后几乎已完全垮台。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排除了过去一直认为法国陆军能采取攻势作战压迫柏林的任何可能性；因为法国空军正变得逐渐过时，所以现在似乎有很容易受到德国空军伤害的危险；阿比西尼亚事件和罗马—柏林轴心使意大利从一个潜在的盟国变成了一个最难预料和威胁越来越大的敌人；比利时退出而保持中立打乱了保卫法国北部边境的现有计划，并且（由于经费的原因）没有办法延长马奇诺防线来弥合这一空挡；西班牙内战增加了在法国后方建立一个法西斯亲轴心国家的可怕前景；而在东欧，南斯拉夫改变方针而更加靠近意大利，小三国协约似乎将要消灭。

在这些悲观的、几乎瘫痪的情况下，随着内维尔、张伯伦在1937年5月代替鲍尔温担任首相，大不列颠的作用变得十分重要。张伯伦由于担心他的国家的经济和战略的脆弱性并且他个人对于战争前景也感到恐惧，因此决定通过给独裁国家一些“现实的”好处来缓和它们的不满，从而制止欧洲未来的任何危机的发生。这位首相对苏联持怀疑态度，蔑视罗斯福的“夸夸其谈”，觉得法国实行既不妥协又不抵抗的混乱外交而感到很不耐烦，认为国际联盟完全不起作用，于是他开始实行他自己的战略，即借助绥靖政策以获得持久的和平。早在那时以前，伦敦就把愿意在商

业上和殖民地方面让步之事传给了柏林；张伯伦的贡献是愿意考虑欧洲本身的领土变化而加速了这种步伐。同时，正是由于这位首相看准了德国是最大的危险，所以他切望改善与意大利的关系，希望意大利从轴心国中分离出来。所有这一切必然引起争论——特别是它引起了 1938 年初张伯伦的外交部长艾登的辞职，遭到了国内少数但是越来越多的反绥靖主义者的批评，增加了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怀疑——但是另一方面也完全可以辨明，在过去的外交史上也有很多大胆的行动引起争议的。张伯伦的战略的真正缺陷在于，希特勒基本上是**不能绥靖的**并且决意要建立未来的领土秩序，这种秩序单靠小规模调整是永远不能满足的。这一缺陷在欧洲有些人是明白的，但不是多数人。

尽管这个结论到 1939 年已变得很明显了，并且到 1940～1941 年更加明显，但是在 1938 年这个危机的年份中，英国政府甚至法国政府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1938 年春天奥地利的接管就是希特勒喜欢不宣而战的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例子，但是人们能够真正反对使德国人与德国人联合的原则吗？这只能加强张伯伦的判断：捷克斯洛伐克讲德语的少数民族的问题，必须在这场危机使得大国发生战争或走到战争边缘以前予以解决。普遍公认，苏台德问题是个更有争议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也拥有国际承认的主权，西方大国希望满足希特勒的要求现在看来更多地是出于消极的自私的恐惧心理，而很少出于积极的理想——但是事实是，这位德国领袖是当时准备打仗的唯一领导人，并且由于在慕尼黑会议上他得到让步而使击溃捷克人的前景化为乌有，这确实使他恼火。进行大国战争总是需要两个国家参与的，但在 1938 年还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作为希特勒的对手。

因为西方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缺乏进行战争的决心，因此，在这里再讨论如果英国和法国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而战斗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个持续很长时间的争论是没什么意义的，不过应

该指出，军事力量对比并不是象绥靖政策的各种各样的辨护士提出的那样有利于德国。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在慕尼黑解决办法以后，力量对比更有利于希特勒了。捷克斯洛代克1939年3月作为欧洲一个中等强国被消灭，德国获得了捷克的武器装备、工厂和原料，斯大林越来越怀疑西方，这一切都超过了有利于伦敦和巴黎的那些因素：如英国军火产量大大增加，英法军事合作更密切，英国和自治领的舆论已倾向于抵抗希特勒。同时，墨索里尼由于他自己的某些紧迫理由，不想立即站在他的独裁者伙伴一边参加对西方国家的大国战争，即使如此，张伯伦也未能（1939年1月）使意大利从轴心国分离出来，也没有能制止意大利侵略巴尔干。

因此，当1939年晚春希特勒开始对波兰施加压力时，避免战争的可能性已经比前一年小了——而如果爆发战争，英法获胜的前景则更小。在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残余"国家成为德国的并吞物，一个月后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使得民主国家在不断增长的社会压力下不得不去"制止希特勒"，并向波兰、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提供担保，从而将西欧与东欧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其紧密的程度至少以前英国是从未考虑过的。然而，波兰不能得到西方国家的直接援助，而且在法国陆军采取战略防御而英国将大量资源集中于改进本国的对空防御的那段时期内，任何间接援助也是为数很少的。能够给予波兰的唯一直接援助只能来自东方，而如果张伯伦政府对于与莫斯科达成协议一事不热情，那么波兰人方面就会坚决反对红军呆在他们的领土上。既然斯大林最关心的是争取时间和避免战争，而希特勒需要的是增加对西方国家的压力使之放弃波兰，所以这两个独裁者从各自的现实利益出发在做着一笔以牺牲华沙为代价的"交易"，尽管他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突然宣布（1939年8月23日）不仅提高了德国的战略地位，而且使在

波兰问题上爆发战争实际上已不可避免。这次伦敦和巴黎都不能选择“绥靖”政策，尽管经济和军事环境（可能比前几年更加）需要避免一场大国战争。

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又是英国和法国反对德国，并且与1914年一样，英国派遣远征军越过英吉利海峡，同时，英法海军实行它们的海运封锁。不过，在其他许多方面，这次大战的战略形势与上次大战是十分不同的，同盟国处于劣势。不仅没有东部战线，而且柏林与莫斯科之间关于分割波兰的政治协议还导致了商业上的安排，苏联源源不断地向德国提供原料，从而消除了英法封锁对德国经济的任何影响。确实，在这次战争的第一年内，德国的油料和其他原料的储备仍是非常少的，但是代用品生产、瑞典铁矿石和苏联日益增加的供应，帮助填补了这一差距。此外，同盟国在西部战线行动迟缓，这意味着对德国石油和弹药储备没有多大压力。最后，对于德国来说，不存在象1914～1918年战争中奥匈帝国那样靠它支撑的成为拖累的盟国。如果意大利在1939年9月也参加了战争，那么它自己的经济不足可能给德国本来就很少的储备造成极大压力，并且也许使得德国在1940年错过了向西进攻的机会。诚然，意大利的参战会使英法在地中海的地位复杂化，但是也不一定很复杂化，而罗马的中立却可以为德国贸易提供有用的渠道——这就是为什么柏林的许多策谋者希望墨索里尼仍站在局外旁观的原因。

虽然这场“骗子”战争没有检验德国经济的脆弱性，但是它却允许德国完善了国家战略中德国军队占重大优势的那些因素——即，作战原则、联合兵种、战术空军力量以及分散进攻战。特别是波兰战役证明了闪电战的功效，暴露了许多弱点（但可以加以改进），并且加强了德国人通过快速突然袭击和适当的集中空中与装甲力量就能战胜敌人的信心。丹麦和荷兰的迅速被蹂躏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挪威的地理条件一方面使得德国装甲师难

以通过，另一方面又受到英国海上力量的影响，所以这次战役在德国空军取得制空权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始终处于不安定的危险状态。但是，德国军事原则和作战战术能力的优势的最好例子是1940年5月到6月的法国战役，当时规模较大但是组织较差的同盟国步兵和装甲部队，被古德里安的成群的坦克摩托化步兵打得落花流水。在所有这些遭遇战中，进攻者拥有相当大的空中优势。因此，1940年战争与1914～1916年的战争不同，在1914～1916年战争中没有一方在处理比较新的战争条件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技巧，而1940年战争则显示了德国人的优势，这些优势似乎排除了德国长期的经济脆弱性。

更重要的是，德国战争机器由于在1939～1940年取得了如此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大大扩充了其可能得到的油料和原料来源。它不仅能（并且这样干了!）对被它打败的敌国进行残酷掠夺，而且法国的消灭和英国明显不能发动大规模军事战役也意味着，扩大战争不会使德国军队的储备严重枯竭。德国已建立起一条陆地运输线以获取西班牙原料，瑞典矿石现在已无遭受同盟国远征军侵袭之患，对希特勒快速威功暗地里心惊胆战的苏联不断增加了供应。在这些情况下，正当法国崩溃的时候意大利参战并不造成它可能会造成的经济上的困难——它也确实使英国资源从欧洲分散到近东，尽管意大利令人吃惊的作战失利说明在整个30年代对它的估计都是过高了。

如果战争仍继续只由这三个交战国进行，那么就很难说它还能持续多久。在丘吉尔领导下的大不列颠帝国决定继续战斗，并且动员了大量的人力和弹药储备——例如1940年的飞机和坦克生产就都超过了德国。而且，当英国自己的黄金和美元储备那时已不足以支付美国供应时，罗斯福就设法取消了不利的中立法规，并且使国会相信，通过租借法案、“驱逐舰与基地交换”协议、护航保护等办法支持英国是美国自己的安全利益。总的结果

是使这两个主要交战国都不能决定性地伤害另一方。如果在英国战役中德国不可能越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那么地面力量的不平衡也使得英国军队根本没有可能进入欧洲。轰炸机司令部对德国发动突然袭击是鼓舞英国士气的好办法，但是眼下不会造成多大实际损失。尽管在北大西洋也偶然进行过突然袭击，但是德国水面舰队是不能打败英国皇家海军的；另一方面，由于邓尼茨采用了新的战术和附加的船只，所以潜艇战仍旧是很大威胁。在北非、索马里和阿比西尼亚，大英帝国部队发现容易攻取意大利占据的地盘，但是却非常难对付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或在希腊的德国侵略军采用的爆炸式作战方式。因此，被称之为"最后的欧洲战争"的第二年，是以防御性胜利和小规模获胜为特征，而不是靠大规模遭遇战和征服。

希特勒在 1941 年 6 月作出入侵苏联的灾难性决定，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整个战争局势。从战略上讲，这意味着德国现在必须在几个战线上作战，因此重蹈其 1914～1917 年的困境之复辙——这使得德国空军尤为紧张，因为它的空军中队稀稀拉拉地分布在西方、东方和地中海。此外，这还确保了大英帝国在中东的阵地——如果希特勒将进行"巴巴罗莎军事行动"的四分之一的军队和飞机派到中东，就肯定能征服中东——并且就象本国岛屿一样可以作为将来对敌人进行反攻的跳板。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深入到苏联境内几百哩的广大地区内作战以及后勤方面的需要，使得德国军队不能发挥其最大的优势：它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动突然进攻，从而在它自己的供应开始耗尽并且其战争机器慢下来以前彻底打垮敌人。与 1941 年 6 月德国及其盟国配备在前线的强大力量相比，支援和后续资源很少，尤其从可怜的公路系统来看更是如此；因为它设想这场战争在 3 个月内结束，所以没有做冬季战争的思想准备；1941 年德国飞机生产大大低于英国或苏联，更不用说美国了；德国军队的坦克远比俄国少；并且石油和

弹药的供应在大规模战争中很快就消耗掉了。即令德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斯大林在即将来临的进攻面前下了愚蠢的部署命令，使德国人在战争的头四个月内得以杀死或俘虏300万苏联人——但这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苏联可以蒙受人员和装备上的惊人损失，并且放弃100万平方哩的国土，但是仍然没有被打败；因为这个国家有非常庞大的后备力量，所以即使莫斯科沦陷甚至斯大林本人被俘，也不能迫使苏联投降。总之，这是一场无限的战争，第三帝国尽管曾取得出色的成就和辉煌的战绩，但是还没有装备到能打这场仗的程度。

在德国军队已攻到莫斯科大门口并且日本在1941年12月向西伯利亚发动猛攻的情况下，苏联是否能够生存下来，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是一个推测起来引人入胜而又不可能回答的问题。日本在1940年9月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三国条约，后来（1941年4月）又与苏联签订中立协议，希望在它集中力量向南扩张时对苏联起个抑制作用；但是东京的许多人听到德国推进到莫斯科的消息时又产生了与苏联打仗的兴趣。如果日本军队真的进攻它在亚洲的传统敌人而不同意采取向南的行动，那么罗斯福也许仍然很难说服美国人民全力投入这样一场战争，并且英国在远东能够给予苏联的援助（如果丘吉尔单独参战）也会是很小的。斯大林没有面临可怕的两线作战的局面，而却能在1941年底将受过很好训练的并且善于冬季作战的一些师，从西伯利亚调来帮助抵抗德国进攻，然后再把德国人赶回去。然而，从东京的观点来看，决定向南扩张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东京夺取法属印度支那以后）在1941年7月西方国家禁止与日本贸易并且冻结了其财产，使陆军和海军强烈地意识到，除非它们屈服于美国的政治要求或者试图夺取东南亚的石油和原料供应，否则在几个月内它在经济上就会崩溃。因此，从1941年7月开始，向北与苏联作战实际上已成为不可能的事，而向南作战则是不可避免的——但

是，当它侵吞婆罗洲、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时估计美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所以还必须消灭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设施以及它们的珍珠港舰队基地。日本将军们现在发现仅仅为了保持他们的“中国事件”的势头，就必须支持离本土几千哩的大规模作战。而攻击的目标是他们以前几乎没有听说过的。

1941年12月是已经变成全球战争的这次大战的第二个重要转折点。当月苏联在莫斯科周围开始的反攻证明，闪电战至少在这里是失败了。而且，尽管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头六个月内的辉煌战果严重打击了同盟国，但是失去的领土（甚至是新加坡或菲律宾）从总战略的角度讲实际上都并不真正极为重要。更重要的是，日本的行动以及希特勒无必要的对美宣战，最终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参战了。诚然，单单工业生产力并不能保证军事实力——尤其是德国的作战能力说明，简单地人对人和美元对美元的比较是很荒唐的——但是，大同盟（丘吉尔喜欢这么叫）比起轴心国来在物资方面占有很大优势，并且它的生产基地也远离德国和日本武装部队，因此它拥有建立一支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所需的资源和机会，而任何一个早期的法西斯侵略对手都不可能拥有这样的力量。实际上，在第二年，德托克维尔在1835年关于出现两极世界的预言最终即将实现。



第三编

当代和未来世界的战略和经济



第七章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化（1943～1980年）

温斯顿·丘吉尔一听到美国参战的消息，公开表示他的欣慰，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正如他后来解释的，因为这一来“希特勒的命运注定了，墨索里尼的命运注定了。至于日本人，将粉身碎骨。剩下的事只是如何正确运用优势兵力的问题了”。然而在1942年，甚至到1943年上半年以前，在同盟国阵营内更为审慎的人来看，如此胸有成竹，未免荒诞。因为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半年内，日本军队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横冲直撞，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倒各殖民帝国，南面包括中国，威胁印度、澳大利亚和夏威夷。苏德战场方面，1941～1942年严冬刚过，德军便恢复野蛮进攻，直捣高加索；几乎在同一时候，一支由隆美尔率领的德军小部队在北非推进到距亚历山大不到55英里的地方。德国潜艇对同盟国护航舰队发动空前猛烈的袭击，结果1943年春同盟国商船损失惨重；而英美利用战略轰炸对德国经济进行“反封锁”并未奏效，反而带来机组人员的严重伤亡。如果说轴心国的命运早在1941年12月后已经注定，那么没有迹象表明，那时他们自己也觉察到了这一点。

一、正确运用优势兵力

然而，丘吉尔的基本设想是正确的。一场欧洲战争转变成了真正的全球大战，这个情况迫使英国要运用复杂的战略手段。许多历史学家指出，新加坡沦为敌手是英国集中飞机和训练有素的海军舰队到地中海战区去的后果。但是新的交战国适当地动员起

来后，完全改变了整个力量对比。虽然目前德国和日本的战争机器还能继续征战，但他们的手伸得越长，越难以招架同盟国早就准备着的反攻。

第一次反攻发生在太平洋。尼米兹的舰载机对驶向珊瑚海（1942年5月）和中途岛（1942年6月）的日军迎头痛击，显示了在浩瀚的太平洋上作战中海航力量的重要作用。同年末，日军被赶出瓜达尔卡纳尔岛，美澳联军挺进新几内亚。1943年底，在中太平洋反攻开始时，美国两支战斗舰队劲旅，在4支机动特遣部队、12艘航空母舰掩护下进击吉尔伯特群岛，以压倒优势掌握了制空权。

英军以更大的优势兵力于1942年10月在阿莱曼横扫德军阵地，把隆美尔部队赶回突尼斯。在蒙哥马利下令进攻时，他拥有相当于对手6倍的坦克、3倍的军队，并几乎掌握了全部制空权。11月，艾森豪威尔的10万英美联军在法属北非登陆，开始一场“钳形运动”从西面打击德意军队，后者终于在1943年5月全面投降。此时，邓尼茨也被迫从北大西洋撤退其进行群狼战术的德国潜艇，这些潜艇在袭击同盟船只中遭受重创，因同盟国船队现在有了“解放者”号超远程轰炸机护航航母，以及装备新式雷达和深水炸弹的反潜护卫舰群的护航，并可从破译的“超级”密码中密切注视德国潜艇的行踪。盟军在握有欧洲制海权后，为取得制空权花费了很长时间，最后由于迅速发展了“野马”式远程战斗机而得到解决。这种飞机于1943年12月首次为美国空军轰炸机群护航出征。不到9个月，德国空军保卫第三帝国士兵、工厂和居民的空中力量削弱，并因此一蹶不振。

对德军最高统帅部更为不利的是东线的优势发生了变化。早在1941年8月，许多观察家就认为苏联的大国地位正在消逝之中。但哈尔德将军却在参谋部作战日记中吐露了他的忧虑：

我们估算敌人大约有200个师。现在已经查清的就有360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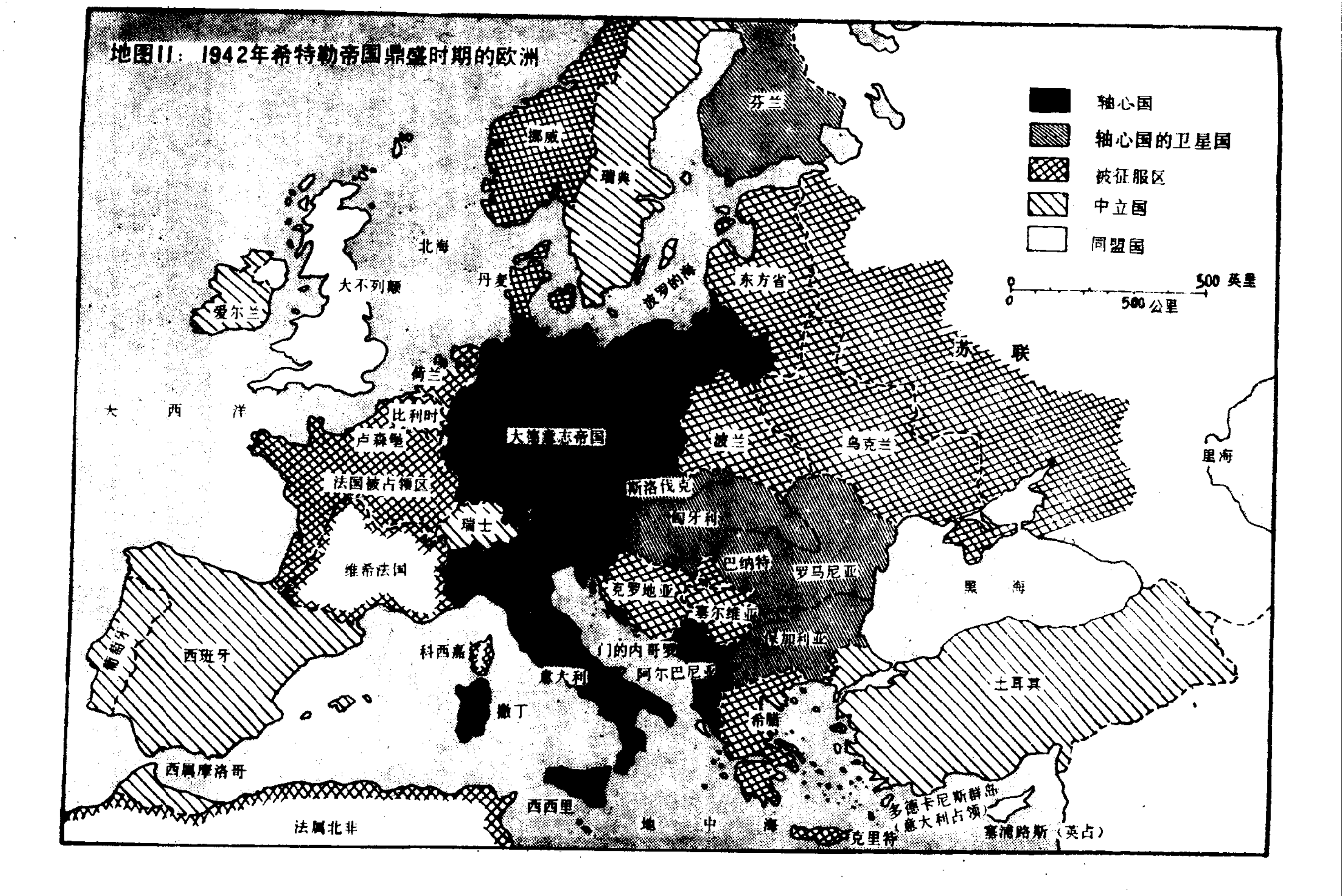
师……它们的武器和装备比我们差，指挥官的战术水平也很差。但是，……如果我们击溃 12 个师，俄国佬只不过再添上 1 打就是了……时间……对他们有利，因为他们靠近自己的资源，而我们离自己的资源却越走越远。

在这场肆无忌惮、野兽般残忍的大规模战斗中，伤亡数字之大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总和相形见绌。德国人宣称头 5 个月作战中打死、打伤或俘虏的苏联人共 300 多万。然而，就在此刻，斯大林和最高统帅大本营却在筹划在莫斯科附近进行首次反攻，红军当时仍有 420 万野战军，坦克和飞机数量也占优势。诚然，无论陆战还是空战，在作战本领上红军都不如德军，甚至到了 1944 年，为了消灭一个德国兵，红军要牺牲五六个人。1941～1942 年可怕的严冬过后，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再次发动进攻，这次指向斯大林格勒，从此，灾难便从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接踵而至。德军于 1943 年夏妄图重整旗鼓，纠集了所有装甲部队组成庞大无比的 17 个装甲师围攻库尔斯克。在这场二次大战最大的坦克战中，红军以 34 个装甲师、4000 辆坦克抗击德军的 2700 辆坦克。苏联坦克一周之内损失大半，但同时粉碎了大部分希特勒装甲师，并准备一鼓作气反攻柏林。正当此时，传来盟军登陆意大利的消息，为希特勒逃脱灭顶之灾提供撤军的借口，同时这一消息也进一步证实了第三帝国的对手们正在加紧收缩包围圈。

那么，这一切仅仅是“正确运用优势兵力”的结果吗？很清楚，经济力量永远不是影响军事效果的唯一因素，即使在 1939～1945 年的机械化战争中也是如此；克劳塞维茨曾经讲过，经济同打仗的关系就好比铸剑匠的技巧同击剑术的关系一样。1941 年以后，德日头目所犯严重的政治或战略错误不胜枚举，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就德国而言，既有较小的错误决策，如

1943年初大量增援北非，无异于主动送上俘虏；也犯了蠢得可怕的错误，如对苏联乌克兰人及其他非俄罗斯少数民族的虐待，本来他们在遭受纳粹暴行之前是愿意逃脱斯大林主义的控制的。此外，还傲慢地武断"恩尼格玛"密码绝不会被破译；由于思想偏见，反对军工厂雇佣德国妇女，而所有德国的敌国都乐于利用这个巨大而未经开发的劳力库。德军高级官员的互相倾轧使他们无法有效地抵制希特勒疯狂发动野心勃勃的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攻势。更重要的是，学者们所说的：多头统治"混乱"，即政府各部与"次帝国"（军队、党卫队、省长、经济部）之间的互相夺权斗争，妨碍了对形势的一致估计和资源分配，更不用说象其他国家那样制订出所谓"重大战略"。德国的这种状况根本谈不上是在严肃地打仗。

日本的战略错误虽还不算极其严重，恶果也稍少一些，但也十分令人惊愕了。由于日本采取所谓"大陆"战略，陆军的作用占统治地位。它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役中仅仅投入11个师，与在满州里有13个师、在中国有22个师比较起来，使用的兵力是最少的。甚至在美国反攻中太平洋时，日本派往该地区的陆、空军增援部队既来得很慢，数量又极少，这同1943～1944年大规模进攻中国部署人力物力的情况相比，尤为显著。不无讽刺的是，尼米兹率部队于1945年初迫近日本，城市遭到轰炸，面临彻底摧毁时，日本在中国还有100万军队，在满州里约有78万军队，这些军队慑于美国潜艇的作战威力，已无法撤回。



地图II：1942年希特勒帝国鼎盛时期的欧洲



日本帝国海军也该受到应有的谴责。中途岛等关键性战役的处理错误百出。航空母舰已经显示出了它在太平洋战斗中的无比威力后，许多日本元帅于山本五十六死后，仍眷恋战列舰，企图伺机打出第二个对马海战来。1944 年莱特湾战役以及更具象征性的“大和”号战列舰单独自杀性出航都反映了这种错误。日本潜艇备有相当厉害的鱼雷，却完全部署不当，不用来打击敌人的交通线，而为作战舰队执行侦察任务或为岛上被困驻军运送给养。虽然日本比英国更依赖进口物资，海军却不去保护自己的商船队，在发展护航系统、反潜技术、护航航母以及反潜舰群方面都十分落后。海军在 1941～1943 年调拨资源建造大型“大和”号船舶时期，由于喜好战列舰，根本不造护航驱逐舰，美国却建造了 331 艘。日本在情报、密码和破译密码方面的斗争也完全失败。所有这一切对于日本维护“大东亚共荣圈”，如同德国的错误对于保持“千年帝国”一样，其后果是相同的。

显然，（按经济学的一般术语来说）目前尚无已知方法来“分解”出那些错误“因子”，以便发现假如不做这些蠢事，结局是否会好一些。但是，除非同盟国方面同样犯严重战略和政治错误，否则，从长远看，他们借助其生产优势最终必占上风。当然，如果 1941 年 12 月德国胜利占领莫斯科，会损害苏联作战的力量以及斯大林的统治，但是当苏联人民面临只有被灭绝的命运，而在几千英里外的东部还保存着巨大生产和军事后备力量的情况下，他们会投降吗？尽管“巴巴洛萨”计划给苏联造成经济损失（煤产量下降 57%，生铁产量下降 68%，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 1941 年比德国多制造 4000 架飞机，1942 年则多 1 万架，而且这些军备仅供苏联一线作战，德国则须同时对付 3 个战场。红军在兵力、坦克、大炮、飞机的优势不断增长的条件下，实际上在作战的第二年已能承受损伤（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不仅如此，还一往直前追击日益虚弱的德军。到 1945 年初，仅白俄罗斯和乌

克兰两条战线上，苏联就已占据绝对优势，它的兵力是德国的5倍，装甲车也5倍于敌，炮兵为7倍多，空中力量为17倍。

鉴于几月前在法国的英美领导已拥有“20：1的坦克优势和25：1的飞机优势”，而德军竟能打胜仗并坚持下来，这一事实不能不令人吃惊。德军甚至到1944年末，仍象在1918年9月那样，继续占领着远比战争开始时德意志帝国疆域更大的领土。对此问题，军事历史学家作出了实质上一致的反应：德军作战原则强调战场指挥官享有灵活机动的决策权，事实证明，这比英军谨遵既空战术、苏军全线浴血突击以及美军尽管积极但无打仗本领的冲锋陷阵，要优越得多；德军联合兵种的经验比任何对手都丰富；德军参谋人员和军士训练有素，技能很高，即使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仍然如此。

当代关于赞赏德国作战表现的著作连篇累牍，但是不应该掩盖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柏林同东京一样，手伸得过长。1943年11月，据约德尔将军估计，390万德军，加上很少的28.3万轴心国盟军企图在东线抵挡住550万人的苏军。在芬兰德军有17.7万人，守卫挪威和丹麦的是48.6万人。德国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占领军为137万。“此外，有61.2万人被牵制在巴尔干，41.2万在意大利……希特勒的军队在欧洲纵横万里，全面铺开，但每条战线在数量和装备上均处于劣势。”日军的情况同样如此，从缅甸到阿留申群岛，稀稀落落遍布整个远东地区。

有人认为，即使在那些“改变战争进程”的战役里，如果是轴心国而不是同盟国取得胜利，也只不过会推迟战争结局的到来而已。假定尼米兹在中途岛海战损失1艘以上航空母舰的话，当年就会补充3艘新舰队航母、3艘轻型舰队航母和15艘护航航母；1943年则可增到5艘舰队航母、6艘轻型舰队航母和25艘护航航母；1944年就可有9艘舰队航母和35艘护航航母。同样，在大西洋之战的关键年代里，同盟国在1942年损失船只

830万吨，1943年为400万吨，但这些吓人的数字分别得到盟国新下水的700万吨船只和900万吨新商船的补偿。之所以能做到这种地步，主要归功于美国造船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到1942年中期，美国下水的船只吨位比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吨位增长得快。因此，一位著名的权威人士作出了这样的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潜艇战可以推迟，但不能改变战争的结局。"就陆战而言，情况也是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主要是一场

表33　1944年坦克产量

(单位：辆)

德　国	17800
苏　联	29000
英　国	5000
美　国	17500（1943年为29500）

表34　各大国飞机产量（1939～1945年）

(单位：架)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美国	5856	12804	26277	47836	85898	96318	49761
苏联	10382	10565	15735	25436	34900	40300	20900
英国	7940	15049	20094	23672	26262	26461	12070
英联邦	250	1100	2600	4575	4700	4475	2075
同盟国总和	24178	39518	64706	101519	151761	167654	84806
德　国	8295	10247	11776	15409	24807	39807	7540
日　本	4467	4768	5088	8861	16693	28180	11066
意大利	1800	1800	2400	2400	1600	—	—
轴心国总和	14562	16815	19264	26670	43100	67987	18606

炮战和坦克战，而德国生产的大炮、自行火炮和坦克比苏联要少

得多，更不用说盟国加在一起的总数了（见表33）。

但最能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是飞机产量（见表34）。

因为众所周知，没有制空权，陆军和海军都不可能有效地作战；有了制空权，不仅可以取得战役胜利，还可对敌人的战时经济给予沉重打击。

上述有关数字还没有说明英美飞机总数内包含很大一部分四引擎重型轰炸机，因此，如果就引擎数量或飞机结构重量加以比较，同盟国的优势则更加显著。所以不管德军怎样竭力保卫制空权，他们的城市、工厂和铁路还是不断遭到破坏，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至于几乎完全没有空中保护的日本本土，情况则更为严重。这也说明为什么邓尼茨的德国潜艇必须潜在水下，为什么斯利姆在缅甸的部队能够增援英帕尔，为什么美国航空母舰可在整个西太平洋对日军基地多次发动攻击以及为什么盟军士兵受到德军顽强抵抗时，总能求助于飞机打垮敌人，并继续进攻。值得一提的是，盟军开始大规模进攻西欧那天（1944年6月6日），在西线德军只得纠集319架飞机抵御盟军的12837架飞机。借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剑术（象战术一样），确实需要技巧和经验；但若剑手的剑已耗尽，剑术再好也无济于事。在“剑匠之战”中，同盟国显然稳操胜券。

事实上，即使在德、日帝国扩张以后，交战双方的经济和生产力量对比，也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更不平衡。据已知粗略估计，1938年“大德意志帝国”工业产量和“相对战争潜力”所占世界份额，大致等于英、法两国的总和，总的资源和战争潜力则可能少于英、法的总和。但英、法帝国在战争爆发时全面战备动员的程度不及德国，如前所述，同盟国在重要的作战技能方面也很欠缺。德国在1939年，特别是1940年攫得的领土，使它的力量大大超过丘吉尔控制下孤立的、受到一定挫伤的大英帝国。法国的崩溃和意大利的参战，使英帝国面临一支强大的联合军事力

量，战争潜力几乎比英国大1倍。从军事上看，柏林—罗马轴心的陆上力量是难以攻破的，海上力量还处于劣势，空中力量则不相上下。所以英国宁愿在北非而不在欧洲打仗。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的初期，虽然当时红军伤亡惨重，领土沦丧，设备遭到破坏，但看来并没有改变这种力量对比。

但是，1941年12月的一些决定性事件，整个改变了力量对比：苏联的莫斯科反攻表明苏联没有在德国闪电战前败下阵来；随着日本和美国卷入这场全球性冲突，形成了巨大工业生产力量的"大同盟"。这一切还不能立即影响军事战役的进程，因为德军还十分强大，足以在1942年夏对苏军开展新攻势，而日本在头6个月里乘美国、丹麦、英国之不备，轻而易举，连连获胜。但上述事件回避不了这一事实，即同盟国具有相当于轴心国2倍的制造工业能力（以1938年不确切的数字计算，该数字低估了美国的份额）、3倍的"战争潜力"和3倍的国家收入，即使把法国的份额加到德国总数中去仍然如此。到1942年和1943年，同盟国蕴藏的能力转化成飞机、大炮、坦克和船舶。1943～1944年美国一国就能每天生产1艘船舶，每5分钟生产1架飞机！此外，同盟国还制造了许多新式武器（"超级堡垒"式轰炸机、"野马"式战斗机、轻型舰队航空母舰），而轴心国只能制造少量先进武器（喷气式战斗机，23型潜艇）。

瓦根菲尔关于参战国军备生产的统计数字，很好地表明了力量对比的决定性变化（见表35）。

上表说明，1940年英国军备生产远远落后于德国，但增长较快，因此次年略有领先，而这一年是德国经济自由发展的最后一年。斯大林格勒和北非两次军事打击以及施佩尔出任经济部，导致1943德国武器生产急剧增长，同时日本的产量也增加了31倍多。尽管如此，这两年中英、苏两国的军备生产增长同轴心国的相等（1941～1943年英、苏增长100亿美元；轴心国增长98

亿美元)，并在军备总生产上占优势。而最令人惊讶的变化是，美国在1941年至1943年期间武器产量增长8倍多，这意味着1943年盟国武器总产量相当于敌人的3倍多，至此，最初孕育的盟国和轴心国之间“战争潜力”和国家收入的力量不平衡，终于明朗化了。直到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无论德军多么巧妙地发动东西两线的战术反攻，最终被盟军的绝对优势火力所压倒。到1945年，成千架英美轰炸机每天轰炸德国，红军几百个师已摆好直捣柏林和维也纳的阵势。这一切，从各方面再一次说明了这样一个确凿的事实，即在一场持久的大规模联合战争中，最富有的国家终将取得最后胜利。

表35　各大国军备生产（1940～1943年）

(单位：10亿美元；1944年币值)

	1940	1941	1943
英　国	3.5	6.5	11.1
苏　联	(5.0)	8.5	13.9
美　国	(1.5)	4.5	37.5
同盟国参战国总数	3.5	19.5	62.5
德　国	6.0	6.0	13.8
日　本	(1.0)	2.0	4.5
意大利	0.75	1.0	—
轴心国参战总数	6.75	9.0	18.3

至于日本太平洋战争的失败，情况也是如此。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1945年投掷原子弹标志着世界军事史的分水岭，意味着生存将成为疑问。不过，在1945年的作战中，这只是美国迫使日本投降采取的一系列军事手段之一。美国成功的潜艇战使日本受到饥饿威胁，成群的B—29轰炸机蜂拥而至，把城镇化为

灰烬（1945年3月9日对东京的“燃烧弹空袭”伤亡约18.5万人，毁坏26.7万座建筑物），美国及盟国还准备大举入侵日本本土。但最后仍决定投放，尽管当时还有不同看法。关于是否投掷原子弹的问题，其动机是多方面的，包括希望减少盟军的伤亡，向斯大林发出一些警告，证实原子弹工程的巨额耗资是正确的等等。是否真正出于上述动机，这一点直到今天仍有争议。但是，这里问题的重点在于，当时世界上独有美国一家，才有如此雄厚的生产和技术资源，不仅可以进行两场大规模常规战争，而且还能投入科学家、原料、资金（约20亿美元）来发展一种效果难以预料的新式武器。广岛浩劫与柏林陷落不仅象征着又一场战争的结束，而且也标志着世界事务新秩序的开端。

二、新的战略态势

早在战斗高峰时期，美国军事策划人员已经勾划出一幅新秩序的轮廓。一份政策性文件指出：

> 反对当前敌人的战争一旦胜利结束，世界在国家军事力量对比方面出现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从罗马帝国衰落后的1500年中发生的事件来看，只有罗马帝国衰落一事可与之比拟……打败日本以后，美国和苏联将是仅有的头等军事大国，其原因在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有利，疆土辽阔以及巨大的军火生产潜力。

对此，历史学家可能进行诡辩，认为过去1500年中没有出现性质上可供比较的事件，但战后全球力量对比和战前完全不同，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昔日的大国，法国和意大利已黯然失色。德国统治欧洲的企图，正如日本对远东和太平洋的野心一样也已破产。英国尽管有丘吉尔，也在衰弱下去。19世纪和20世纪初人们经常预测的两极世界终于到来，用德波特的话说，国际

秩序现在“已从一个体系转变到另一个体系”。看来只有美国和苏联算得上“超级大国”，而两者之中美国拥有更大的优势。

鉴于大部分国家被战争拖得精疲力尽，或仍处于“不发达”的殖民地阶段，1945 年美国国力之强盛，犹如 1815 年的英国，可谓“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它的实力从绝对意义上说，也确系史无前例。由于巨额战争的刺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 1939 年不变美元计算,从 1939 年的 880.6 亿美元增至 1945 年的 1350 亿美元，以现值美元计算则增长更高，为 2200 亿美元。美国“新政”时期未能消除的“经济萧条”终于完全根绝，同时未加充分利用的资源和人力也都得到适当开发。“战争期间美国工业企业的规模扩大近 50%，产量提高 50%以上。”1940 年至 1944 年期间，美国工业发展极为迅速，年增长率为 15%以上，其速度之快，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虽然大部分增长是由军事生产引起的（1939 年军用品占总产量的 2%，1943 年剧增至 40%）但非军用品产量也增加了，因此，与其他参战国不同，美国的民用经济部门并未受到影响。美国的生活水平以及人均产量都高于其他任何几家。在所有大国中，美国不仅没有因战争变得穷困，反而是大发战争财的唯一国家。战争结束时，华盛顿拥有 200 亿美元的 2／3。同时“……世界制造工业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实际上世界 1／3 的各类商品是由美国生产的。”这使美国在战争结束时成为最大的商品出口国，甚至战后的几年内其出口仍占世界出口总量的 1／3。由于美国大规模扩大造船设备，已拥有世界船舶供应量的一半。所以从经济上讲，可说整个世界变成了美国的“盘中餐”。

这一经济实力也反映在军事力量上。战时结束时，美国有 1250 万军事人员，其中海外驻军 750 万。虽然到了和平时期这个总数自然会减少（1948 年陆军人数为 4 年前的 1／9），但这只是政治抉择的反应，并不表示实际的军事潜力。如果说战后初期

美国在国外的作用有限，那么能更好地说明美国实力的应是它的现代化武器数量。这一阶段美国海军无疑“天下第一”，它有1200艘大型军舰组成的舰队（以数十艘航空母舰，而不是战列舰为主力，实力远远超过英国皇家海军，当今海上力量无法与之匹敌。美国航母特混舰队和海军陆战师已经充分显示了从海上向地球任何地区投送兵力的能力。美国的“制空权”则更是威力无比：它的2000多架重型轰炸机粉碎了希特勒的欧洲，1000架超远程B–29型轰炸机使许多日本城市化为灰烬，现在又补充了更为强大的喷气战略轰炸机，如B–36型轰炸机。最重要的是，美国垄断了原子弹，使它可以向任何未来的敌人发动攻击。不过，正如后来分析家所指出的，其实美国的军事力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原子弹的信者量很少，而投掷原子弹的政治影响太大），同时也难于运用军事力量对苏联这种相距遥远、捉摸不透、十分可疑的国家施加影响。但是，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以前，美国这种无可名状的优越形象没有受到破坏，并且由于许许多多的国家请求美国给予贷款、武器和军事援助，更进一步树立了这种形象。

鉴于美国在经济上战略上占据了特殊有利的地位，它在1945年后向外扩张，对于熟悉国际政治史的人们来说，这是不足为奇的。随着传统大国的衰落，美国稳步地填补了它们消逝后造成的真实。既当上头号大国，就再也不把自己限制在原有的海岸线以内，甚至自己的半球以内了。诚然，战争本身是导致美国向外扩张实力和影响的主要原因，例如，因战争的缘故，1945年美国在欧洲驻有69个师，在亚洲和太平洋驻有26个师，在美国本土上却一个师也没有。美国由于政治上承担了改组日本、德国（以及奥地利）的义务，所以它就“呆在那里”；同时由于曾取道太平洋诸岛、进入北非、意大利和西欧打过仗，便也在这些领土上驻扎军队。然而许多美国人（尤其是军人）希望美国武装力

量的部署恢复到1941年前的状况，以便他们能在短期内回家。尽管这一想法使丘吉尔等人吃惊，引起共和党内孤立主义者的兴趣，但事实上已无法使时钟倒转。就象1815年后的英国人一样，现在轮到美国人发现他们在各地的非正式影响变成了更为正式的影响[illegible]并陷入重重纠葛之中。象英国人一样，美国人每次想就[illegible][illegible]为界时，却又会发现“不安全的新边界”。“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来临了。

这个新秩序下的经济状况，至少是可以完全预料到的。战争期间一些国际法学家，如科德尔·赫尔，曾据理阐明，30年代的世界危机主要是由国际经济机能失调引起的，即是由保护关税、不公开的经济竞争、限制原料供给、闭关自守的政府政策引起的。18世纪启蒙运动的信念是“贸易畅行无阻，则带来和平”，这与美国出口工业界的想法吻合，后者施加压力，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打开新的国外市场来吸收美国因生产力提高而剧增的产品，随着美国政府开支的减少，会引起战后萧条。军方也坚决要求美国对战略重要物资如石油、橡胶、金属矿进行控制(或可不受限制地获取)。上述种种因素，促使美国决定建立有利于满足西方资本主义需要，特别是有利于西方最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新秩序，这与亚当·斯密的一贯诊断是一致的:“贸易不设置障碍,可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从而全面提高生产率，增加所有人的购买力。”于是，1942～1946年间作出了一揽子国际性安排——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及后来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这个新经济体制下，一些要想获得“复兴开发”资金的国家，发现他们不得不遵从美国关于自由兑换货币和进行公开竞争的要求（如英国，虽力求保持帝国特惠关税，还是屈从了），否则就要用这个体制不相往来（如苏联，它认为这是同社会主义的控制措施不相容的)。

这种安排在实践中产生的缺点是，首先，所获资金不足以恢

复6年战争造成的破坏；其次，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制度必然对具有最佳竞争地位的国家有利，即对未受战争损害、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美国有利，而对那些不具备竞争条件的国家，即被战争蹂躏、疆界改变、难民成群、房屋炸毁、机器损耗、负债累累、市场萧条的国家十分有害。后来，直至美国感觉到欧洲社会普遍存在不满以及苏联的影响不断增长这两种危险倾向时，才加紧制定“马歇尔计划”，允诺为大规模重建“自由世界”的工业发放资金。但此时美国出现了扩张经济势力与建立全球军事基地和签订安全条约同时并举的局面。这与1815年英国扩张基地和建立条约关系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不过最显著的区别在于，英国能够避免过多地同一些主权国家建立固定而密切的联盟关系，而美国现在承担了这种义务。确实，美国承担的一切义务几乎都是随着“冷战”的逐渐开展所作的“事态反应”，但不管怎么说，事实上这些义务使美国完全不同于其早期的所作所为，而深深卷入到全球扩张之中。

看来，1945年美国决策人对此并不感到烦恼，许多决策人还认为，这不仅是“天命所定”，而且觉得现在有一个绝好机会来理顺被原来的大国搞乱了的事情。亨利·卢斯在《时代》杂志的文章中洋洋得意地写道，“美国经验是通往未来的秘诀……美国在全世界兄弟国家中，应当算老大。”美国不仅殷切希望中国，而且鼓励后来称作第三世界的所有国家效仿美国的自立、企业精神、自由贸易和民主观念。赫尔预言，“这一切原则和政策有利于唤醒世界各自由民族对于正义、权利和幸福的认识与向往，以致不用几年功夫，整个国际将变得令人十分满意。”无论是老牌英、荷帝国主义分子、欧洲左倾政党，还是目前可憎的莫洛托夫，谁要是迟钝到不能理解这一事实，那么胡萝卜加大棒将迫使他接受正确的发展趋势。一位美国官员说道，“现在该轮到我们在亚洲击球了”，也许他还要再加一句：几乎该到处击球了。

美国势力很难渗入的地方是苏联控制的地区。1945年以来苏联自称是反法西斯战斗的真正胜利者。根据红军的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消灭了德军506个师，1360万伤亡或被俘总数中有1000万是在东线损失的。甚至在第三帝国崩溃以前，斯大林调往远东好几个师，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在满洲里进攻已衰弱的日本关东军，因此在广岛事件三天之后苏联对日宣战，并非出乎意外。两线的持久战斗完全扭转了俄国1917年后在欧洲严重衰弱的地位，并实际上恢复到近似1814～1848年俄国大军充当东欧、中欧宪兵时的地位。俄国通过北面损害芬兰、中部牺牲波兰、南面吞并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扩大了自己的疆域。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也重新并入俄国。除占据东普鲁士一部分土地外，并蓄意割取东捷克斯洛伐克一小片土地(鲁塞尼亚或外喀尔巴阡乌克兰)，从而直接通向匈牙利。俄国势力壮大后，在其西部和西南部设置了由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挣脱束缚前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组成的新卫星国"防疫线"。在这些国家与西方之间隔离着众所周知的"铁幕"。铁幕后面共产党干部和秘密警察决心使这一整个地区以完全不同于科德尔·赫尔希望遵循的原则行事。远东的情况也是如此。苏联迅速占领满洲里、北部朝鲜和萨哈林岛，不仅为1904～1905年日俄战争报仇雪耻，而且得以同不接受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人会合。

如果说苏联影响的增长给人以深刻印象，那么它的经济基础曾经受严重摧残，与美国安定繁荣的经济相比，尤为明显。

苏联的人口损失骇人听闻：军队死伤750万；平民被德军杀害600～800万；再加上因食物配给减少、强制劳动以及大量增加工作时间造成的"间接"战争损失，"1941～1945年共约2000～2500万苏联公民死于非命"。由于伤亡的主要是男子，两性的不平衡严重影响了国家的人口结构，出生率大为下降。在德国占领

下的欧洲俄罗斯、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等地，物质损失之大，实令人难以想象：

> 沦陷区的 1160 万匹马、2300 万头猪，被杀掉或抢走的分别为 700 万匹和 2000 万头。13.7 万台拖拉机、4.9 万台谷物联合收获机和大量牛棚及其他农场建筑被毁。6.5 万公里铁轨、15800 个火车头、42.8 万辆货车、4280 条内河航船以及半数铁路桥梁均被毁掉或损坏，因此交通运输遭到破坏。这一地区内约 50%的城市居住区、120 万所房屋以及 350 万所农村房屋均被毁坏。
>
> 许多城镇变成废墟。成千上万个村庄夷为平地。人们住在地下的洞穴里。

因此，毫不足怪，当苏联人进入其德国“占领区”时，企图把所有搬得动的财物、工厂、铁轨等等都弄走，并要求其他东欧国家补偿（如罗马尼亚用石油、芬兰用木材、波兰用煤补偿）。

苏联在军备生产和前线作战方面无疑都是战胜了德意志帝国，但它的胜利是靠集中力量进行军工生产和大力紧缩其他部门，如消费品、零售贸易以及农产品的供应获得的（尽管食品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德国的掠夺）。因此，实际上 1945 年的苏联在军事上是庞然大物，在经济上一贫如洗，民生凋敝，失去平衡。由于苏联断然拒绝美国“租借法”，后来又因附加政治条件不接受美国的金钱，遂转而恢复 1928 年后依靠本国资源实行的加强经济发展的计划，强调生产资料（重工业、煤、炭、电力、水泥）的生产和发展交通运输，而不利于消费品和农业的生产，军费开支则自然较战时水平有所减少。结果，经过克服最初的困难，在重工业方面创造了“小小的经济奇迹”，1945～1950 年重工业产量将近增加了 1 倍。斯大林坚决要求重振国力，无疑它可以竭力达到这一赤裸裸的目标，而使大多数俄国人的生活标准降

到革命前的水平。应当指出，与1922年后的发展情况相同，工业生产多已“恢复”到战前的产量。例如，1950年前后乌克兰的冶金、电力生产达到或刚刚超过1940年的水平。战争使苏联的经济发展又一次被抑制了大约十年的时间。从长远观点看，更为严重的是，关键的农业部门的持续失败。

由于取消紧急战时鼓励措施以及完全不恰当的（和方向错误的）投资，农业凋敝，粮食产量下降。斯大林生前一直坚持反对农民自留地的激烈的长期斗争，致使俄国农业一贯的低生产率和低效率继续存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斯大林决心要在战后世界中保持苏联的高度军事安全。由于重建经济的需要，庞大的红军在1945年后减少了2／3，但仍拥有配备2.5万辆前线坦克和1.9万架飞机的175个师，所以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防力量。在苏联看来，为了未来的侵略者，更具体地说，为了控制新攫取的欧洲卫星国以及远东的征服地，必须拥有这样的国防力量。虽然红军是一支编制庞大的部队，但许多师空有其表，或者实际上是卫戍部队。而且，红军面临被新的军事进步淘汰的危险，1815年后的数十年中，俄国大军就曾遭遇这一危险。要消除这一危险，不仅需要对军队进行重大改组和现代化，而且要调动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科技资源致力于发展新武器体系。到1947～1948年，令人望而生畏的米格—15喷气战斗机开始服役，同时模仿[illegible]英建立了一支远程战略空军。苏联利用俘虏的德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发展各种类型的导弹。早在战争时期苏联就已调拨人力、物力进行原子弹的研制。在对德战争中，仅能助战的苏联海军也得到了改造，增添了新式重型巡洋舰和许多远洋潜艇。苏联的许多武器是衍生的，按西方标准衡量，并不先进。然而，不容置疑的是，苏联不甘落后的决心。加强苏联实力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斯大林重新强调内部纪律和30年代末期的那种绝对一致。他这样做究

竟是出于日益加重的偏执狂，还是要通过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步骤来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还难以判断，但事实说明了真相。任何同外国有联系的人都被怀疑；回国的战俘被处决；以色列国家建立后，犹太人可选择原效忠的国家，从而导致苏联国内再次制定反犹太人的措施。军队领导人的地位被削弱，备受尊崇的朱可夫元帅于1946年被解除苏联地面部队司令的职务。党的纪律和接纳党员更为严格；1948年一贯失宠于斯大林的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全部遭到清洗。苏联加强了书刊审查制度，不仅审查文学和艺术作品，而且涉及自然科学、生物学和语言学。这种在整个体系内部实行全面"抓紧"的做法，自然是与上述重新坚持农业集体化以及冷战紧张局势的出现相适应的。自然，苏联统治下的东欧国家也同样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极权统治，在那里取缔反对党、举行公开审判、否认个人权利和私有财产已形成社会风尚。所有这一切，特别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的民主制度遭到践踏，使西方对苏维埃制度的热情大大减退。同时，人们也不大清楚，究竟这些措施是精心策划的——苏联上层一贯的逻辑是要把卫星国及本国人民同西方思想和财富的影响隔离开来——还是仅仅反映了斯大林临近命终前日益加重的偏执狂症状。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世界上总还有这样一大片领土，它完全不受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影响，并向人们提出了可供选择的另一前景。

苏联帝国的发展看来肯定了麦金德等人地理政治学的预言，即一个军事大国将控制欧亚"心脏地带"的资源，但要进一步扩张到"心脏地带的边缘地区"，则将遇到企图保持全球力量平衡的海上大国的抗争。几年后，美国政府受到朝鲜战争的震撼，它完全放弃了原先"一个世界"的思想，代之以超级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展开无情斗争的概念。但是这一点在1945年的情况下还不明朗化，正如德·托克维尔所指出的，美国和苏联是当时仅有的两个

有力量支配半个地球的命运的国家，但同时美苏两国沦为“全球主义”思想的牺牲品。1946年莫洛托夫宣称，“苏联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苏联参加，任何国家都不能决定任何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这与早先丘吉尔和斯大林可能达成东欧问题的私下协议时美国向莫斯科发出的通告如出一辙，那时美国声称“在这场全球战争中几乎没有一个问题，无论是政治的或军事的，是美国所不关心的”。一场严重的利益冲突已不可避免。

那些从前的大国现已沦为中等国家，它们的衰落衬托出超级大国的勃兴。现在，这些国家的情况如何呢？应该说明，在1945年后的一段时期内，德、意、日法西斯战败国与英国或法国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战争刚一结束，盟国就进行策划，以确保德国和日本不再对国际秩序构成威胁。这些计划不仅包括对两国实行长期军事占领，而且把德国划分为四个占领区，其后成为两个德国。剥夺了日本海外掠得的地盘（与1943年意大利的情况一样），同时也剥夺了德国在欧洲获得的利益以及它在东部旧有的领土（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等）。除战略轰炸，交通运输的负荷过重，住房紧张以及原材料不足和出口市场缺乏等种种困难造成的灾难以外，盟国还加强了对工业的控制，并在德国拆除了工业设备。1946年德国的国家收入和产量急剧减少，竟不及1938年的1/3。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经济倒退：1946年实际国家收入只是1934～1936年的57%；制造业的实际工资降至同期的30%；对外贸易以致两年以后出口仅占1934～1938年的8%，进口为18%。日本的航运被战争摧毁。纱锭的数量从1220万支减至200万支，煤产量减少一半，如此等等。无论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德、日作为大国的日子似乎都已过去了。

意大利虽然在1943年改变了立场，站到盟国一边，但是其经济命运依然黯淡。两年来盟军在意大利作战，轰炸半岛，加剧了墨索里尼战略冒险行动造成的损害。“1945年……意大利的国

民生产总值倒退到 1911 年的水平，与 1938 年相比，实际上减少约 40%。尽管战争使人口遭受损伤，但由于殖民地居民遣反回国和停止移民，人口急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到惊人的程度，如无国际援助，特别是美国的援助，许多意大利人早已饿死了。”到 1945 年意大利的实际工资降到 1913 年的 26.7%。事实上这一时期这些国家都严重倚赖美国援助，犹如美国的经济附属国。

从经济上看，很难说法国和德国有什么差别。法国遭受德国劫掠达四年之久，其后于 1944 年又进行了几个月大规模的战斗，结果“大部分水路和码头被阻塞，大部分桥梁被毁坏，大部分铁路系统暂时不能运行”。福仑的法国进口贸易指数表明，到 1944～1945 年，法国的进出口指数实际上等于零；当时法国的国家收入仅为 1938 年（法国黯淡的一年）的一半。法国的外汇储备已经空虚，法郎在外汇兑换中已不可兑换。1944 年法郎与美元的比价 50：1“完全是虚假的”，一年之内跌到 119：1；到 1949 年情况较稳定时，定值为 420：1。法国的党派政治，特别是共产党的作用，同建设、国有化和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也明显地相互影响。

另一方面，“自由法国”是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成员，曾多次参加重大战役，并在西非、列旺岛和阿尔及利亚反对辛维希部队的“内战”中获得胜利。在战争中，德国占领法国后，法国人由于政治效忠的分歧出现了分裂，在此情况下，戴高乐的组织则紧紧依靠英、美的支持，他们要求英、美给予更多的援助，尽管如此，仍对英、美不满。但英国热切希望法国再度成为欧洲的军事强国，替代分崩离析的德国，以遏制苏联，因而法国获得了许多大国地位的待遇——在德国的占领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头衔，等等。法国虽不能恢复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但力图坚持在印度支那的利益以及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保护国地

位；就海外行政区域和领地规模而言，法国仍是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并决心牢牢地保持住这一地位。在许多外界人士（特别是美国人）看来，法国在经济上如此赢弱，如此紧紧依赖美国财政援助之时，竟想重新获得世界第一流大国的地位，简直是“夜郎自大”。事实也却实如此。也许法国这种自大狂的主要后果，是把已被战争改变了的全球战略势态的真相掩盖起来了（至少多了几年）。

虽然 1945 年大多数英国人在对现实作一番比较时可能感到愤慨，但他们的民族和帝国仍旧以世界大国之一的面目出现。这种情况同样掩饰了新的战略力量对比，同时使伦敦决策人心理上很难适应于没落的政治地位。英帝国是唯一自始至终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的大国。在丘吉尔的领导下，无疑它是“世界三强”之一。它的海、空战绩，甚至陆军战绩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辉煌得多。到 1945 年 8 月，英王的所有属地，包括香港，都回到了英国手中。英国军队和空军基地遍布北非、意大利、德国和东南亚。皇家海军虽然损失惨重，但仍拥有 1000 多艘军舰、近 3000 小型战艇以及大约 5500 登陆艇。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是世界上第二大战略空中力量。然而，正如科雷里·巴尼特具有说服力地论证那样：

> “胜利”不是保持英国实力的同义语，打败德国（及其盟友），固然是保持实力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仅仅是一个因素。因为德国人被打败了，英国的实力也同样耗尽了。重要的不是沉缅于“胜利”本身，而应多加考虑胜利的形势，特别是英国自己的处境……

明显的事实是，英国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严重消耗了自己的力量，黄金和美元储备枯竭，国内机器严重耗损，尽管大力动员资源和人力，还是不得不信赖美国的军火、航运、粮食及其他供应以维持战争。英国对进口品的需要逐年增加，而出口贸易萧

条。1944 年出口额仅为 1938 年的 31%。当工党政府于 1945 年 7 月执政时，在批阅的首批文件中，有一份就是凯恩斯有关当前国家面临"财政敦刻尔克"[1]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备忘录：贸易逆差巨大，工业基础减弱，海外机构过多；这一切意味着亟需美援以代替已停止的租借法所提供的物资。如果没有美国援助，那么"我们将必须进行比战争以来任何时期都更为严厉的节制……"于是，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发生的一样，英国希望为英雄们建造舒适的家园的目标需要再次修改。但这一次人们不相信英国仍处于世界政治的中心地位了。

然而，英国对大国地位的幻想缠绵不绝，甚至热衷于建立"福利国家"的工党大臣们也是如此。因此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英国力图认真地解决下述相互矛盾的问题：提高国内生活水平，实行"混合型经济"，消除贸易逆差，并同时维持遍布在德国、近东、印度的一系列海外基地，以及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与苏联不断恶化的关系。关于艾德礼政府的研究材料表明，这届政府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提高了工业生产率，减少了贸易逆差，进行了社会改革，稳定了欧洲局势。工党政府谨慎地从印度撤出、从巴勒斯坦的混乱中脱身以及放弃对希腊和土耳其的保证，从而解除了一些日益沉重的海外负担。另一方面，鉴于 1945 年凯恩斯通过华盛顿谈判获得大笔贷款，马歇尔计划进一步提供了大量援助，而英国的许多商业对手仍处于劫后余生、自顾不暇的境地，在此情况下英国经济得以恢复，因此这是一种脆弱的、有限的经济复苏。从长远观点看，英国 1947 年的撤退究竟是否成功，同样也令人怀疑。这次撤退自然是卸掉了难以承受的包袱，但是这一战略"奇特步法"是建立在假想之上的，即假想

[1] 1940年英军被德军打败，从敦刻尔克撤回本国，此处意即严重危机。——译者注。

放弃某些地区，英国就能根据真正的帝国利益——放弃巴勒斯坦，换取苏伊士运河，放弃印度，换取阿拉伯石油——来重新部署自己的基地。在此阶段，白厅显然无意放弃帝国其余属地，从经济上讲这些地方现在对英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除非以后受到进一步打击和抓住属地不放付出的代价日益高昂，才会迫使英国对其世界地位重新估价。然而，当前它还是一个过分扩张但仍强大的战略实体，在世界划分为两大国集团中它也是美国最有用的盟国和重要的战略合作者。

然而事与愿违，英法两国政府的一切努力不过是枉费心机，“欧洲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这一点已毫无疑义。战时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急剧增长 50%以上，而整个欧洲，除苏联外的国民生产总值却下降约 25%。欧洲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份额少于 19 世纪初以来的任何时期；甚至到 1953 年战争的破坏已大部分得到恢复时，欧洲也仅占世界制造业总产量的 26%（美国占 44.7%）。欧洲的人口现在只是世界总人口的大约 15～16%。1950 年欧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但是，那时苏联已大大缩小了差距。表 36 表明了各大国国民生产总值情况。

表 36 各大国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50 年)

(以 1964 年美元价格计算)

	国民生产总值 (单位：10 亿美元)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单位：美元)
美国	381	2536
苏联	126	699
英国	71	1393(1951)
法国	50	1172
西德	48	1001
日本	32	382
意大利	29	626(1951)

欧洲大国黯然失色更明显地反映在兵力和军费方面。例如，1950年美国国防费用为145亿美元，军事人员138万；苏联的部队更为庞大（430万人），军费略高（155亿美元）。在这两方面，两个超级大国都远远超过英国（23亿美元；68万人）、法国（14亿美元；59万人）和意大利（5亿美元；23万人），当然德国和日本当时处于非军事化状态。1951年朝鲜战争的紧张局势使中等欧洲强国大大增加了国防费用，但与美国（333亿美元）和苏联（201亿美元）的国防开支比较，则相形见绌。该年英、法、意三国的国防费用总和不到美国的1／5、苏联的1／3，而它们的军事人员总和则为美国的一半、苏联的1／3。无论在相对经济力量方面，还是军事力量方面，看来欧洲国家都已完全失势了。

核武器和远程运载系统的产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上述情况的印象。事实表明，许多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十分清楚，他们正在走向人类全部战争武器史和人类破坏能力方面的转折点。1945年7月16日在阿拉莫戈多成功的试验向人们进一步证实，"一个巨大、崭新的东西诞生了，它的重要性将是无法估量的，远远超过迄今影响我们生存的电的发现或其他任何伟大的发现。"当"预示世界末日来临的强烈持续、可怕的轰鸣"在广岛、长崎上空不停地喧嚣、进行着血腥大屠杀时，人们再也不能对这种武器的威力有什么怀疑了。原子弹的制造迫使美国决策人对将来的许多实际后果进行仔细的考虑。原子弹对常规战争的影响如何？应在战争一开始使用它，还是用作最后的手段？发展更大型的氢弹或较小型的战术核武器的作用和潜力如何？应否与他国分享核技术知识？斯大林在广岛事件后的第二天指派他的权力极大的安全部门头目贝利亚负责原子弹研制计划。由此可见，美国原子弹的出现无疑推动了苏联早已进行的核武器研制。虽然苏联这时在制造原子弹和运载系统方面明显落后，但他们追赶得很快，远远

超过美国人的估计。1945 年后的几年中，看来可以认为美国的核心优势有助于"抵销"苏联的常规部队优势。但是，在国际关系史上确实为时不久，苏联就赶上美国，并以此证实了它的论断：美国垄断核武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原子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略态势"，因为它使任何掌握它的国家拥有大规模恣意破坏的能力，甚至毁灭人类本身的能力。这一新武器技术的出现，更严厉和更直接地对传统欧洲国家增大了压力，迫使它们急起直追，否则只有承认被降到二流国家的地位。当然，德国和日本以及经济和技术上衰弱的意大利都没有参加核俱乐部的可能性。但对于伦敦政府来说，即使在艾德礼接替丘吉尔时，如果说英国不想掌握这种武器，那是难以相信的，因为核武器既可作为威胁手段，又可"显示英国科技优势，而这是英国的实力所在，若仅按人口数量来衡量英国的实力，那是不足的。"换句话说，掌握核武器被看作保持独立大国地位是相对容易的途径，不久后法国对此也深感兴趣。但这种打算无论在逻辑上多么吸引人，在实际上受到某些因素的阻挠而难以实现：两国都不会在几年之内拥有核武器和运载系统；它们的核武器库与两个超级大国的相比极其有限，并可因技术的进一步飞跃而变得陈旧过时。尽管伦敦和巴黎（以及后来的中国）都有参加核俱乐部的雄心壮志，但 1945 年后最初的几十年中它们所作的一切努力，其后果犹如 1914 年前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力图拥有自己的无畏型战舰一样。换言之，这与其说是实力的反映，不如说是虚弱的反映。

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从战略上和政治上看，当今世界已从传统的多极转变为两极，这里意识形态起着重大作用。诚然早在 19 世纪古典外交时代意识形态因素已对政策起过作用，梅特涅、尼古拉一世、俾斯麦和格莱斯顿的行动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当"激进右翼"和"激进左翼"起来向

"资产阶级自由中心"流行的思潮发动挑战时，意识形态的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然而，由于30年代末期促使多极之间相互敌对的原因极其复杂，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释世界事务是困难的(如英国保守党丘吉尔要同共产党苏联结盟反对纳粹德国，美国自由主义者主张支持英、法的欧洲外交，但主要瓦解欧洲以外的英、法帝国)。何况战争时期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同法西斯作斗争，在此前提下，各种政治和社会原则的分歧都可兼容并包。1943年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同时西方赞赏苏联对巴巴洛萨计划进行的抵抗，似乎这样一来，消除了彼此间原有的猜疑——特别是在美国，1943年美国《生活》杂志以轻快的语调声称，俄罗斯人"长得象美国人，衣着象美国人，想法也象美国人"；一年后《纽约时报》写道，"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苏维埃俄国已经过时了"。这类看法不管多么天真，它有助于说明美国人普遍不愿正视这一事实，即战后世界并非是他们想象中的国际间和睦相处。譬如，许多美国人就对丘吉尔1946年3月著名的"铁幕"演讲感到痛苦和愤慨。

此后不到1～2年，出现了所谓苏联与西方之间的"冷战"，其意识形态性质暴露无遗。许多迹象表明，苏联不会允许东欧实行议会式民主，苏联在继续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在希腊、中国及其他地方共产党人及其对手正在进行内战，最后，但决非最不重要的是，人们对"红色威胁"、间谍网和国内颠覆活动的恐惧日益增加，这一切使得美国公众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对此杜鲁门政府也迅速作出了反应。出于担心苏联要占领由于英国撤销对希腊和土耳其的保证而出现的权力真空，杜鲁门总统于1947年3月在其"杜鲁门主义"的演说中，描绘了一个面临在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原则之间作出抉择的世界：

一种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基础之上的，其特点为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

个人自由、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不受政治迫害。另一种生活方式是建立在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的基础之上的，它依赖的手段是恐怖压迫、新闻控制、选举阴谋以及压制个人自由。

杜鲁门继续说道，美国的政策是要"帮助自由人民维护其制度和独立完整，反对企图把极权制度强加于他们的侵略行径。"此后的国际事务，用带感情色彩的字眼形容，那就象一场摩尼教徒的斗争；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就是"善与恶的力量相互交错，全身武装，进行着历史上前所未的的争斗，自由反对奴役，光明反对黑暗。"

无疑使用这类词条有它对内的目的，不仅在美国，在英国、意大利、法国到处的保守势力乞灵于这种语言来败坏敌手的名誉或攻击自己的政府"对共产主义手软"。反过来，这又肯定加深了斯大林对西方的疑虑，这一点很快地反映在苏联报刊上，说什么西方要争夺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新的敌人正从四面八方包围苏联，建立前进基地，支持反动政权反对一切共产党势力，蓄意"收买笼络"联合国成员。莫斯科宣称，"美国外交政策的新方针是回到反苏老路，旨在纵容战争，以武力建立英美统治的世界"。这种说法为苏联政权提供了根据，以便镇压国内不同政见者，牢牢控制东欧，强制实行工业化以及耗费巨额军事费用。因此，冷战使双方都利用意识形态原则来掩盖各自的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两种人类的观念，是"相互排斥的"。这种看法使双方都把整个世界理解和描绘成一个意识形态争吵不可能与大国政治利益相分离的舞台。一个国家要么属于美国领导的集团，要么站在苏联一边，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在斯大林和乔·麦卡锡时代那种认为有中间道路可走的想法是幼稚的。这就是新的战略现实，不仅分裂的欧洲各国人民要适应它，而且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的人民都不得

不去适应它。

三、冷战与第三世界

事实表明，冷战开始后的 20 年中，国际政治主要关心的是，如何适应苏美对抗的形势，以及如何局部地抵制这种苏美对抗。最初，冷战的焦点集中在划分欧洲边界问题上。因此，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德国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决定 1945 年获胜的大国在欧洲的影响大小。无疑，在 20 世纪前半期苏联因德国侵略而遭受的损伤比任何国家都大，因此苏联人决心在 20 世纪后半期不允许历史重演，加之斯大林本人坚决要求应得到安全保障，苏联人的决心更加坚定。与此相关，苏联的第二个考虑是，推动共产主义世界革命。因为如能建立一些遵从莫斯科领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苏联的战略和政治地位很有可能加强。这种考虑超过许多世纪以来争夺不冻港的要求，对于决定 1945 年后的苏联政策有重大的影响，尽管还有各种问题尚待仔细解决。因此，首先苏联决心废除 1918～1922 年签定的领土协定，以“完善”其战略目标。如前所述，这意味着苏联重新控制波罗的海国家、向西推进波苏边界、消灭东普鲁士以及攫取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领土。对此西方倒并不担心，因为其中许多领土问题战时已有协议。令人担忧的是，苏联表示希望保证在中、东欧原独立国家中建立“对莫斯科友好”的政权。

在这方面，波兰的命运是其他国家的先例。波兰问题十分尖锐，因为英国 1939 年作出决定要为波兰领土完整而战，而战时波兰军队（及流亡政府）曾在西方作战。在卡廷发现大批波兰军官的坟墓，苏联对华沙起义的不满，斯大林坚持要改变波兰边界以及在卢布林出现亲莫斯科的波兰派别，这一切都使丘吉尔对苏联的意图深感疑虑。过了不几年，苏联果真在波兰扶植了一个傀

儡政权，并且全部清除了占据实权地位的所有亲西方的波兰人。至此，西方的担心终于得到了证实。

莫斯科在解决波兰问题时，许多方面都同“德国问题”有关。在领土方面，波兰向西调整边界不仅减少了德国的领土（如吞并东普鲁士），还会诱使波兰反对德国将来修改奥德——尼斯界线。在战略方面，苏联坚持使波兰成为一个安全“缓冲地带”的意图是要确保不再出现德国1941年的进攻，因此，莫斯科坚持要决定德国人民的命运也是合乎逻辑的。在政治方面支持“卢布林”波兰派和培养德国流亡共产党人同时并进，以便他们有朝一日返回故土发挥作用。在经济方面，苏联剥削波兰及其东欧邻国，意味着随后也将掠夺德国的财富，然而，当莫斯科终于明白迫使德国人日益贫困就无法赢得他们的友谊时，便停止了掠夺财富，莫洛托夫的调子也变得中听得多了。但是这些策略上的变化无关紧要，重要的明显信号是，苏联企图在决定德国未来的问题上，如果没有最后决定权，也要有重要发言权。

在波兰和德国两个问题上，苏联的政策必然会同西方的政策发生冲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美、英、法都希望自由市场观念和民主选举制度成为整个欧洲奉行的原则（尽管伦敦和巴黎比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更希望国家能占有较重大的地位）。在战略上，西方同苏联完全一样，决心阻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对此，特别是法国，直到50年代中期仍忧心忡忡。但他们之中谁都不愿看到红军取代德国国防军统治欧洲。1945年后法意两国政府虽然容纳了共产党人，但对任何国家掌握政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这种感觉由于东欧的非共产党逐步被取缔而更加深化。虽然希望苏联同西方和解的呼声犹存，但事实是，它们各自的目标在所有问题上都彼此矛盾。如果某一方面的计划获得成功，另一方就感到威胁，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看来冷战不可避免，直到双方同意在对一切事物的看法上相互妥协，

冷战才会结束。

因此，这里没有必要评述紧张局势如何逐步升级，正如同前面的章节在分析世界强国的发展动力时，没有必要对梅特涅外交作详细说明一样。然而，1945年后冷战的主要特点值得研究，因为这些特点至今仍对国际关系的处理产生影响。

第一个特点是加剧欧洲两个集团之间的"分裂"。分裂并非在1945年立即发生，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盟国占领军和那些在德国人撤离后，从隐蔽和流亡的秘密状态转而公开"上台"的政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处理紧急的行政工作——恢复交通和公用事业，提供城市食品，安排难民住房以及追捕战争犯。在工作进行过程中意识形态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在德国占领区美国人发现，他们无论同法国人，还是同苏联人，都同样地争吵；欧洲新成立的国会和内阁中，东欧的社会党人同共产党人坐在一起；西欧的共产党人同基督教民主党人坐在一起。但到了1946年末和1947年初，鸿沟扩大并日趋公开；德国几个占领区内各种公民投票和地区选择表明，"西德的政治状况……与东德的政治状况之间开始出现明显的区别"；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逐步清除政府中担任要职的非共产党一事，导致1947年4月法国国内的政治危机，德国共产党人被迫退出政府。一个月以后意大利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南斯拉夫铁托的政治统治（取代战时盟国达成的有关争分权统治的协议）被西方说成是莫斯科策划扩张的又一步骤。这些分歧，再加上苏联不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使那些期望战后同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的美国人尤为不安。

因此，西方怀疑一旦时机成熟，斯大林也控制西欧和南欧并确在加速这一时机的到来，这不过是西方进一步的同意而已。这种情况不可能靠直接使用武力来实现，尽管苏联不断对土耳其增加压力，从而华盛顿忧心忡忡并于1946年将其特混舰队派驻东地

中海；但这种情况却很可能通过莫斯科的仆从利用战争引起的持续经济混乱和政治对立而促成。希腊共产党的叛乱是一个迹象；法国共产党支持的罢工是又一个迹象。苏联因企图讨好于德国舆论而受到猜疑；如果多愁善感，那么意大利北部共产党人的势力同样也值得忧虑。研究这些事件的历史学家现在十分怀疑，这些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莫斯科制定的“总计划”的操纵。希腊共产党人、铁托和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是对付他们自己当地的敌人，而不是确立世界马克思主义制度；而西方共产党和工会领袖则首先需要适应他们的追随者的情绪。另一方面，只要不导致一场大的战争，共产主义在上述任何国家得手，当然会受到苏联的欢迎。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联问题专家为乔治·凯南等人提出“遏制”苏联时，引起人们的共鸣。

“遏制战略”的形成与发展十分迅速，其内容有两点最为突出。第一，美国向莫斯科表明地球上哪些地区“不允许……落入敌手”。对此，凯南认为实际上是消极的做法，但军方首领一直把它看作稳定局势的可靠保证。因此，这些地区的国家将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以加强自己的防御力量；一旦苏联对它们进攻，则将被看作宣战。第二个要点具有较积极的意义，这就是美国认识到，抵制苏联颠覆的力量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物质和精神的严重损耗”而消弱了。所以长期遏制政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美国庞大的经济援助计划，帮助欧洲和日本重建被毁坏的工业、农业和城市；这样做的结果，将不仅可减弱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对他们的诱惑，同时有助于调整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美国。借用凯南似乎有理的地缘政治学论点来讲如果说“从国家安全的观点看，世界上只有五个工业和军事大国对于我们至关重要——美国本身，其对手苏联、英国、德国和日本”，那么把三者留在西方阵营之内并加强其实力就可形成迫使苏联永远处于劣势的“力量组合”。显然斯大林的苏联对于这一战略怀有极大疑虑，

特别是因为它包括了复兴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最近的敌人。

逐一分析作为分水岭的1947年及其后双方采取的各项步骤似无必要，不如研究一下最后总的结果意义更大。美国取代英国向希腊和土耳其作出保证——象征着昔日的世界警察向新兴的世界警察移交责任；伦敦和华盛顿的逻辑大致相同——；这种做法的理论依据就是无区域限制的全球性杜鲁门“主义”。在欧洲，美国公开表示愿意“帮助各国自由人民维护他们的制度”，并同他们认真讨论怎样解决普遍存在折磨欧洲大陆的经济困难、食物短缺、煤炭不足等问题。美国政府的解决办法——所谓提供大量援助“使欧洲经济自立”的马歇尔计划——，是有意向所有欧洲国家，无论共产党国家还是非共产党国家，一视同仁提出的建议。但是不管接受美援对于莫斯科有多大的吸引力，苏联同西欧曾经合作，而这时正值苏联实行最僵硬的社会化和集体化经济体制。众所周知，马歇尔计划的目的在于使所有欧洲人确信私有企业比共产主义企业能更好地为他们带来繁荣昌盛。莫洛托夫在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谈判中退席，以及苏联对波兰和捷克施加压力不许它们申请援助，其结果使得欧洲较前更为分裂。西欧在美国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之下（大国如英、法、意、西德所获最多）结成了一体化的北大西洋商业网，经济增长突飞猛进。在东欧，共产党的控制日益加紧。1947年成立欧洲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这是重新组建和半公开的共产国际。布拉格的多党政府被1948年的共产党政变推翻。铁托的南斯拉夫逃脱了斯大林可怕的控制，但其他卫星国都遭到清洗，并于1949年被迫参加经济互助委员会，后者远非苏联的马歇尔计划，“只不过是压榨卫星国的一个新机构”而已。丘吉尔1946年的“铁幕”之说，也许有些为时过早，但两年之后他的话得到了证实。

东西方经济对抗加剧的同时，军事对抗也日益增长，德国又一次成为争端的中心。1947年3月英法签订敦刻尔克条约，规

定签约国一方一旦遭到德国进攻，另一方则提供全面军事援助(尽管英国外交部认为这种可能只是“理论上的”，令人担心的还是西欧内部的软弱)。1948年3月这一条约扩展代之以布鲁塞尔条约，并增加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为签约国。在后一条约中虽未提到德国的名字，但应该说，许多西欧（特别是法国）的政界人士感到烦恼的不是“苏联问题”，而是“德国问题”。1948年到来时，他们这种根深蒂固的顾虑受到冲击。布鲁塞尔条约签订的当月，苏联从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会议上退席，宣称在德国经济和政治前途问题上苏联与西方有不可调和的意见分歧。3个月后，为了取缔德国黑市和制止货币混乱，三个西方管制大国宣布发行一种新的德国马克。苏联对此单方面行动的反应是不仅取缔西德货币在其管制区内流通，而且强行禁止出入柏林这个仅隔西方势力范围100英里的孤立地区。

正是1948～1949年的柏林危机把对抗引到千钧一发的地步。华盛顿和伦敦的官员已在讨论与苏联作战时如何团结欧洲国家、领地和美国共同行动的办法。象制定马歇尔计划时一样，美国人希望欧洲人首先提出自己的军事安全计划，但此刻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挑战已准备认真对待。“红色恐怖”笼罩在整个美国，于是对外采取了更加强硬的行动。1948年3月杜鲁门甚至要求国会恢复征兵制，同年6月国会通过选征兵役法，这一请求终于获准。所有这些措施都是由于苏联封锁通往柏林陆路而迅即采取的。此后的11个月里，直至陆路交通恢复以前，美英依仗空中力量时代的威力向柏林空运补给，诱使斯大林摊牌。当时曾有许多人主张派遣军队护航打开进入柏林之路，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不难相信，可能要挑起一场战争。事实上美国根据一项新条约已将一批B-29轰炸机调往英国机场，由此可见美英对待柏林危机的认真态度。

在这种形势下，甚至孤立主义的参议员也转而支持成立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的建议，以美国为正式成员国的北约组织的主要战略目的是一旦苏联进行侵略，北美将援助欧洲各国。最初的几年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活动反映出它主要关心的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计划。这表明美国外交传统的历史性变化，即取代英国担当两"翼"的领先强国，致力于维护欧洲的均势。美英政府认为，北约的主要任务是使美国和加拿大同布鲁塞尔条约签字国联合起来，使相互支持的保证扩大到也同样具有不安全感的挪威和意大利等其他国家。北大西洋公约签字之日，实际上美国在欧洲只有10万军队（1945年有300万），抵御苏联西进的驻军一共只有12个师——法国7个，英国2个，美国2个，比利时1个。尽管这一时期苏联军队并不象西方渲染的那样强大，但两大集团兵力的不平衡仍令人感到恐惧。稍后，这种恐惧更有增无减，认为共产党有可能象朝鲜战争时期跨过鸭绿江那样迅疾扫荡德国北部平原。这意味着北约的战略日益依赖美国远程轰炸机对苏联入侵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同时，还必须建设庞大的常规部队。这就使三个两"翼"大国——美国、加拿大、英国——长期承担了对欧洲大陆的军事义务，这样的承诺足以使30年代的战略决策者大惊失色。

北约联盟在军事方面起到了马歇尔计划在经济方面所起的作用。它进一步加深了1945年欧洲划分为两个阵营的裂隙，只有传统中立国（瑞士、瑞典），佛朗哥的西班牙和某些特殊国情况的国家（芬兰、奥地利、南斯拉夫）处于阵营之外。对此，苏联方面作出了及时的回答，即成立了苏联统治的华沙条约组织。这种不断深化的分裂反过来使德国统一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尽管法国人十分担忧，但50年代末在北约范围内开始建设西德的武装力量，是合乎逻辑的，如果西方真想缩小军队总数的差距的话。但这必然促使苏联建立一支在特殊控制下的东德军队。鉴于两个德国各自组成了军事同盟，两个集团对今后任何使德国中立

的企图，必须会感到疑惧，并把它看作是对本身安全的打击。在苏联方面，这一看法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却进一步加深了，这是由于出现了一种新的信念：任何共产党国家都不能放弃其信仰（即后来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1953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私下承认东欧卫星国家"只有通过全面战争或苏联人本身才能得到自由"。正如巴特利特所说，两者无一可能。1953年东德的一次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了。1956年匈牙利决定退出华约，苏联大为吃惊，派几个师制止了匈牙利的独立。1961年赫鲁晓夫承认失误，下令竖立柏林墙以阻止人才流入西方。1968年捷克人遭到了12年前匈牙利人同样的命运，只是流血少些而已。苏联领导人采取的上述各项措施只能加深两个集团之间的分裂，不管官方如何宣传，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苏联的吸引力无法与西方相匹敌。

冷战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它从欧洲逐步向世界各地横向扩展这是并不奇怪的。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的精力几乎全部集中于应付德国的威胁；但这并不意味莫斯科对土耳其、波斯和远东的政治前途不感兴趣，对此，在1945年8月苏联已作明确表示。因此苏联同西方关于欧洲问题的争论决非地理上仅限于欧洲大陆，因为争论的原则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如究竟是实行自治政府还是首先考虑国家安全，是实行自由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计划等等。更重要的是，战争本身造成了从巴尔干到东印度群岛的广大地区大量社会和政治动乱；甚至在那些没有直接被侵略军蹂躏的国家（如印度或埃及），经过人力、物力、思想的动员之后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旧的社会秩序已经瓦解，殖民政府声名狼藉，地下民族主义政党发展壮大，抵抗运动不断高涨，人们不仅努力争取军事胜利，而且要求进行政治改革。换句话说，1945年世界形势的特点是到处发生了政治动乱。这种形势，一方面对于大国渴望尽快恢复和平时期的稳定可能构成威胁；另一

方面也向信奉不同的普遍真理的每一个超级大国提供机会，以争取从崩溃的旧秩序废墟中站起来的广大人民的支持。战争期间同盟国曾对反对德国和日本的统治进行斗争的抵抗运动组织给予援助，所以在1945年后这些组织自然还希望继续得到援助，尽管它们相互敌对，争权夺利。这些党派团体中，有共产党的组织，也有坚决反对共产党的组织，使得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决策人更加难于把地区性争端与全球性斗争区别开来。希腊和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已经表明当地的国内争端可迅速转变为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件。

苏联和西方发生的第一次在欧洲以外地区问题的争端正是这种战时特别协议的后遗症。1941～1943年伊朗处于美、英、苏三国军事保护之下，这种做法既可不使伊朗属于同盟国阵营也可保证任何一个盟国不得与德黑兰政权勾结获取非法经济权益。1946年初，莫斯科不仅不从伊朗撤军，似乎还在支持伊朗北部亲共产党的分裂主义活动。这时，一贯反对俄国在世界这一地区运用威胁手段的英国大为不满，而杜鲁门政府则比英国更加严厉，不久即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苏联军队撤出后，伊朗军队立即镇压了北部各省的分裂活动并取缔共产党。对此，华盛顿洋洋得意，因为它同时还证实了杜鲁门主张的对苏联强硬政策已见成效。用乌拉姆[1]的话来说，那就是“早在遏制理论出笼之前，伊朗事件本身就已揭示了遏制的全部含义”。伊朗事件还使华盛顿作好了心理准备，今后可对苏联其他方面的活动作出同样反应。因此，希腊持续的内战、莫斯科施加压力迫使土耳其在直布罗陀海峡和卡尔斯边界地区让步，以及英国政府1947年宣布不再对希、土两国提供保证，这一切都促使美国公众支持初期的杜鲁门主义。早在1946年4月美国国务院就曾提出大力支持“联合五国

[1] 乌拉姆系《扩张与共处》一书的作者。——译者注。

与苏联邦系统”。华盛顿接受了上述观点，并且开始把能够阻挡苏联扩张至东地中海和中东的“北层”国家中各种危机联系起来通盘处理，这表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成分，如果不是全部被地缘政治的考虑所代替，也至少是同它结合在一起了。

西方大国是以共产主义向全球进攻的观点来看待远东发生的变化的。荷兰人即将被苏加诺有广泛基础的民族主义运动从“东印度群岛”赶走；法国人很快卷入胡志明的越盟的武装斗争；英国人不久进行了马来亚反暴乱战斗，即使苏伊士以东没有共产党，这些老牌殖民大国也会作出上述同样的反应。另一方面，40年代末期如声称暴乱者是由莫斯科指使的，确实可以取得美国同情，在上述情况下，法国则还可取得军援。但是“失去”中国对于美国的震动远比这些亚洲南部的挑战要大得多。从19世纪以来，美国传教士就在中国开展工作，美国在这片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土地上进行了大量文化、精神“投资”（财政投资少得多），而战争期间由于蒋介石政府的报纸宣传，投资的规模被夸大了许多。远不止宗教意义上讲，美国感到它对中国负有“传教使命”。国务院和军方某些人士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然而他们的认识没有赢得舆论的普遍赞同。到40年代末便开始得到用僵硬的“非黑即白”的思想方法观察世界政治的共和党右派的赞同。

东方这些年来的政治动乱和不稳使华盛顿经常处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美国不能被别人看成是第三世界腐败政权或没落殖民帝国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又不愿见到“革命力量”进一步扩大，因为（据说）那将加强莫斯科的势力。1947年敦促英国从印度撤出是件比较容易办到的事，因为这只涉及将政权移交给尼赫鲁领导下议会民主政府。同样，1949年迫使荷兰离开印度尼西亚也是办得到的，尽管华盛顿仍担心象1946年给予菲律宾独立时那样，共产党的暴动又在印尼开展。美国的“犹豫不决、反

复无常”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的表现。例如美国决策人本来的意图是要在日本实行全面的社会改革和非军事化，后来都改变主意，决定通过大公司重建日本经济，甚至怂恿日本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以减轻美国的经济、军事负担和确保日本成为亚洲的反共堡垒。

在1950年前华盛顿之所以采取上述强硬立场，原因有二。第一，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比较灵活的“遏制”政策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攻击，其中不仅有共和党批评者和以“赤色分子”罪名迫害他人而名声大噪的乔·麦卡锡，还有政府内部新的死硬派如路易斯、约翰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迪安·腊斯克以及保罗·采。因此杜鲁门为被迫采取较坚决的行动以保护他自己的国内政治派别的势力。第二，1950年6月北朝鲜越过三八线发动进攻。对此，美国立即认为是莫斯科指挥的总的侵略计划的一部分。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使华盛顿那些希望推行强硬政策、甚至好战政策以阻止失败的势力占了上风。颇有影响的记者斯图尔特·艾尔索普，用十根木柱的保龄球游戏作比喻，把克里姆林宫比作野心勃勃打硬攻的球手时写道：“我们正在很快地失去亚洲”。

> 头柱是中国，已经倒下了。第二排的两根柱是缅甸和印度支那。要是它们也倒了，下一排的三根柱暹罗、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肯定也会倒下。如果这些亚洲地方全丢了，带来的心理、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几乎一定会把第四排的四根柱印度、巴基斯坦、日本和菲律宾都推倒。

这种思想的变化对美国整个东亚政策产生很大影响。最明显的表现是对南朝鲜的军事支持迅速升级。南朝鲜这个声名狼藉，采取高压手段的政权，对于发动这场冲突本应受到相应的谴责，但这时却被看作无辜的牺牲者。美国最初派遣空军和海军支援，

不久又增援了陆军师和海军陆战师，致使麦克阿瑟发动大规模仁川反攻以及联合国军北进，从而挑起1950年10～11月间中国的干涉。由于不使用原子弹，美国人被迫进行了一场类似1914～1918年的堑壕战。到1953年6月将近停战时，美国在战争中耗资500亿美元，派往战区的部队在200万人以上，伤亡5.4万多人。虽然美国已遏制北朝鲜，但对南朝鲜又承担了长期的重要军事义务，使美国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从南朝鲜撤出。

朝鲜战争还导致美国对亚洲其他地区的政策作出重大改变。到1949年，许多杜鲁门政府人士因厌恶蒋介石已放弃对他的支持，藐视台湾“残余”政府，并考虑步英国后尘承认毛泽东的共产党政权。然而，仅仅一年之后，美国舰队却又支持和保护台湾，把中国看成凶恶的敌人，并认为有必要使用原子弹反击它的侵略(至少这是麦克阿瑟的看法)。印度尼西亚的原料和食品供应极其重要，因此对新政府提供援助，以打击共产党叛乱分子；在马来亚，则鼓励英国人也照此办理；在印度支那，美国一面施加压力，要法国人建立一个较有代表性的政府，一面准备投入军队和金钱抗击越盟。美国已不再相信仅凭美国文明的道德和文化号召力就足以阻止共产主义扩散，因此转而承担越来越多的军事和领土方面的义务，特别在杜勒斯担任国务卿以后。1951年8月美国与菲律宾签订条约，再次肯定美国拥有在菲律宾的海空基地的权利并作出美国保卫菲律宾的承诺。几天之后，华盛顿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了三方安全条约。一周之后，同日本最终缔结和平条约，合法地结束了太平洋战争并完全恢复了日本的国家主权，但与此同时又签订了安全条约，规定美军有权驻扎日本本土诸岛和冲绳岛。华盛顿对共产党中国始终采取敌视政策，对台湾则大力支持甚至向金门、马祖等很小的前哨也提供援助。

冷战的第三个主要之点是两大集团之间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与此同时建立军事同盟。(如表37所示) 国防开支的趋势是不平

衡的。

表 37　　大国国防开支（1948～1970 年）

（单位：10 亿美元）

时间	美国	苏联	西德	法国	英国	意大利	日本	中国
1948	10.9	13.1		0.9	3.4	0.4		
1949	13.5	13.4		1.2	3.1	0.5		2.0
1950	14.5	15.5		1.4	2.3	0.5		2.5
1951	33.3	20.1		2.1	3.2	0.7		3.0
1952	47.8	21.9		3.0	4.3	0.8		2.7
1953	49.6	25.5		3.4	4.5	0.7	0.3	2.5
1954	42.7	28.0		3.6	4.4	0.8	0.4	2.5
1955	40.5	29.5	1.7	2.9	4.3	0.8	0.4	2.5
1956	41.7	26.7	1.7	3.6	4.5	0.9	0.4	5.5
1957	44.5	27.6	2.1	3.6	4.3	0.9	0.4	6.2
1958	45.5	30.2	1.2	3.6	4.4	1.0	0.4	5.8
1959	46.6	34.4	2.6	3.6	4.4	1.0	0.4	6.6
1960	45.3	36.9	2.9	3.8	4.6	1.1	0.4	6.7
1961	47.8	43.6	3.1	4.1	4.7	1.2	0.4	7.9
1962	52.3	49.9	4.3	4.5	5.0	1.3	0.5	9.3
1963	52.2	54.7	4.9	4.6	5.2	1.6	0.4	10.6
1964	51.2	48.7	4.9	4.9	5.5	1.7	0.6	12.8
1965	51.8	62.3	5.0	5.1	5.8	1.9	0.8	13.7
1966	67.5	69.7	5.0	5.4	6.0	2.1	0.9	15.9
1967	75.4	80.9	5.3	5.8	6.3	2.2	1.0	16.3
1968	80.7	85.4	4.8	5.8	5.6	2.2	1.1	17.8
1969	81.4	89.8	5.3	5.7	5.4	2.2	1.3	20.2
1970	77.8	72.0	6.1	5.9	5.8	2.4	1.3	23.7

1950年后的数年中、美国国防开支剧增明显地反映了朝鲜战争的耗费以及华盛顿关于世界受到威胁，必须重新武装的看法。1953年后开支下降是由于艾森豪威尔企图及早控制“军事工业联合企业”，以免对社会和经济带来损害。1961～1962年开支增加反映了柏林墙和古巴导弹危机的影响。1965年后费用跃增表明美国对东南亚承担的义务增加。虽然苏联军费数额只是一种估算，而且莫斯科在政策上又故弄玄虚，但下述推测可能是正确的：即1950～1955年间之所以加强军备是因为担心如不大量增加飞机和导弹，在同西方作战中，苏联本土将遭到空袭的严重破坏。1955～1957年军费减少反映了赫鲁晓夫的缓和外交和生产消费品的资金增加。1959～1960年后大力加强军备说明同西方的关系恶化，在古巴危机中蒙受羞辱并决心加强各军兵种。共产党中国军费较少是经济增长状况的反映，但60年代加强了国防表明北京准备为同莫斯科决裂付出代价。至于西欧各国，表37中的数字说明，英、法在朝鲜战争时期大量增加了国防开支，法国由于卷入印度支那战争，到1954年前军费一直在增加，但其后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的国防费用增加得很少（偶有下降）。因此，除中国军费增长外（其中数字也很不准确），50年代和60年代的军费开支状况表明，这一时期仍是一个两极世界。

也许比数字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武器竞赛的多层次和多方面的特点。1949年苏联成功地制造了原子弹，这虽然使美国感到震惊，但美国深信，在核交战中它使苏联遭受的损伤远比苏联可能给予它的打击大得多。另一方面，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1月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第68号备忘录指出，必须“尽快增加我国以及盟国的总的空军、陆军和海军力量，使之达到在军事上不严重倚赖原子武器的地步”。1950～1953年期间实际上美国地面部队扩大了2倍，虽然其中大部分是征召后备役去朝鲜作战，但同时

也是决心要把北约承担的一般性军事义务转变为**陆地上**的同盟，以阻止当时美、英决策人担心的苏联对西欧的侵犯。根据1952年里斯本协定，要建立90个盟军师，实际上达不到这个理想的数字，但是盟国对欧洲的军事义务明显增加。例如，到1953年美国从1个师增加到5个师，英国同意在德国驻扎4个师，加之当时还扩建了西德军队以补偿伦敦和巴黎所削减的部分。所以50年代中期北约和华约之间的军事力量大致平衡。此外，北约各国对空军增加了巨额开支，到1953年北约约有飞机5200架。关于苏联陆军和空军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所知甚少，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斯大林死后朱可夫着手重大改组：撤销大批非精锐部队，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以导弹取代大炮，总之，军队的进攻能力比1950～1951年西方最担心苏联进攻时有了很大提高。与此同时，苏联预算中最大追加部分用于加强空军的防御和进攻力量。

东西方军备竞赛的第二个领域在海上这一较新领域的斗争也很复杂。美国海军快速航空舰特混舰队及潜艇舰队曾以辉煌的战绩光荣地结束了太平洋战争；英国皇家海军也以打了一场远比1914～1918年僵持不下的海战坚决得多的"硬战"而自豪。但由远程战略轰炸机或导弹装载的原子弹的出现（特别是经过比基尼岛试验，与各种战舰对比之后）似乎对海战的传统武器装备、甚至航空母舰的前途都产生了怀疑。美、英两国海军在1945年后由于缩减国防开支和进行"合理化"整编，将各军事部门人员合并为统一的国防部，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朝鲜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它们，在这次战争中美、英海军的两栖登陆、舰截机空袭以及西方灵活运用海上力量的作战能力和方法再次得到证实。这时美国海军加入了核俱乐部，因为它已建成一种新的大型航空母舰，载有配备原子武器的突击轰炸机，并计划到50年代末建立成能发射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动力潜艇。英国虽无力担负建造现代

化航空母舰的费用，但还保持改装后的航空母舰“突击队”用于小规模局部战争，并象法国一样，致力于建设一支潜艇威慑力量。到1965年西方各国海军的舰艇和人员比1945年少，但它们的力量却比以往强大得多。

苏联扩建舰队是刺激西方不断增加海军的最大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海军虽有一支较大的潜艇部队，但战果甚微，大部分海军人员在陆地作战（或协助陆军渡江）。1945年后斯大林命令按德国最佳设计方案建造更多的潜艇，以保卫广大的海岸线。同时他也热衷于建设一支包括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的更大的水面舰队。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后来很快地被赫鲁晓夫下令停止实施，他认为核导弹时代没有必要耗资建造大型战舰，在这方面，他同西方许多政治家以及空军元帅的观点一致。可是苏联潜在的敌人使用水面舰队的一系列事实又动摇了苏联领导人的这一观点，例如，1956年英、法海上攻击苏伊士，1958年美军在黎巴嫩登陆（挫败苏联支持的叙利亚），尤其是1962年紧张的导弹危机冲突中美国战舰在古巴周围设置封锁线。克里姆林宫（在有影响的海军上将戈尔什科夫的推动下）从这些事件中吸取的教训是，除非苏联也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否则它在世界大国的利害冲突中将永远处于不利地位。美国海军60年代初迅速发展北极星导弹潜艇，使苏联更进一步认为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其结果，苏联海军一方面大量扩建各种舰艇，如巡洋舰、驱逐舰、各类型潜艇以及混合式航空母舰；另一方面扩大海外军事部署，以斯大林从未有过的姿态向西方在地中海或印度洋的海上优势挑战。

观察家以历史的观点对苏联戈尔什科夫时期和40年前德国蒂尔茨时期在加强军事建设方面作了多方面比较，认为这种挑战是很明显的。不过即使苏联要进行一场新的“海军竞赛”，要赶上美国海军耗费极大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还需要几十年。1945年后军备竞赛真正的“革命”不是在海军方面，而是在原子武器和

发射原子武器的远程导弹方面。尽管广岛和长崎惨遭伤亡，还有许多人认为原子武器“只是另一种炸弹”而已，并没有把它的出现看作人类制造毁灭性武器史上的分水岭。而且，1946年巴鲁克原子能发展国际化计划失败后，西方出现一种麻痹思想，认为美国拥有核垄断，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可抵销（和遏制）苏联地面部队的优势；更有甚者，西欧国家还认为，对于苏联的军事入侵，美国（随后英国）一定会用核武器空中轰炸来回答。

技术革新，尤其是苏联的技术进步，改变了这一切想法。苏联于1949年（大多数西方人的估计早得多）成功地爆炸了一个原子装置，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苏联制成远程轰炸机，特别是“野牛式”轰炸机，更令人惊愕不已，因为在50年代中期，人们认为这种轰炸机不仅能飞抵美国，而且（错误地）估计其生产数量很大，以致美苏之间出现了“轰炸机差距”。在这方面之所以引起争议，一是难于获得有关苏联军事力量的确切证据，一是美国空军惯于夸大苏联军事力量。实际上不到几年功夫，所谓美国不可战胜的时代就已过去了。1949年华盛顿决定生产一种新的毁伤力大得惊人的“超级”炸弹（氢弹）。这次美国以为又要掌握决定性优势了。在福斯特·杜勒斯惊人的讲话中和空军的计划中都一再表明，50年代初期到中期，一旦再发生战争，美国要对苏联或中国进行“大规模报复”。这种报复策略引起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内部人士和私下相当大的不安，因此决定建设常规部队和战术（即“战场”）核武器以代替战略核武器作为发动“世界大决战”的手段。此时，来自苏联的消息对这一战略当头一棒。1953年，仅在美国试验之后的9个月，苏联也试验了氢弹。而且，苏联政府还拨出大笔资源发展德国战时已开始研制的火箭技术。到1955年，苏联大批量生产中程弹道导弹（ss—3），1957年发射了一枚射程为5000英里的洲际弹道导弹，所用火箭发动机于同年10月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号”送入轨

道。

苏联的军事成就震动了华盛顿。它意味着美国的城市和轰炸机易于遭受苏联的突然袭击，因此华盛顿为了弥合所谓"导弹差距"，调拨大批资源发展洲际弹道导弹。但核军备竞赛不可能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从1960年以来，各方又迅速发展了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并制成各类战场核武器和短程火箭。同时，战略决策人及其"思想库"的分析专家在深思熟虑，根据"灵活反应"战略应付各个不同阶段军备竞赛升级的方案。无论他们提出的方案多么高明，其中无一可解决核武器与常规战争传统作战方法的结合问题，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甚至不可能解决的难题（例如，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使用战场核武器将使大部分西德化为灰烬）。如果美苏双方别无他择，只得乞灵于向对方本土投掷高当量氢弹，那么彼此的伤亡和破坏将是空前的。华盛顿和莫斯科陷入了丘吉尔所谓"相互恐怖平衡"之中，以致不得不致力于发明创造各自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了核战争技术的研制。50年代英、法两国也在努力发展自己的原子弹和运载系统，但就当代飞机、导弹、核弹标准衡量，看来在核领域也只有两个超级大国可以称雄。

在这场竞争中决定性的重点是，苏联和西方在全球竞相建立联盟关系和追逐新的伙伴关系，或至少要阻止第三世界国家参加对方阵营。战后初期，美国在这方面的活动占压倒优势，这是因为它有1945年的有利地位以及它在西半球之外已有许多驻军和空军基地；另一重要事实是，许多国家寻求华盛顿的经济援助并有时要求军事支持。对比之下，苏联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家园，在外交上则主要关心稳定在利于自已的边界，既无军事实力又无军事手段向外伸展。尽管在巴尔干、芬兰北部和远东苏联获得部分领土，相对来说，它仍然是内陆的超级大国.此外,有一点现在看来很清楚，即斯大林以极其谨慎和猜疑的眼光看待外部世

界，他担心西方不能容忍共产党公开得手（例如，1947年在希腊），对于绝非“苏联傀儡”的共产党领导人如铁托和毛泽东同样疑虑甚深。1947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以及大力宣传支持世界革命是30年代（甚至是1918～1921年）作法的继续，但实际上莫斯科在这一时期避免卷入外界事务。

然而，如上所述，华盛顿认为共产党统治世界的总计划已逐步展开，必须加以“遏制”。1947年美国向希腊和土耳其承担义务是实施遏制政策的第一个信号；1949年北约组织条约的签订则可谓是实施这一政策的惊人之举。50年代随着北约成员进一步增加，遏制政策意味着美国保证“保卫大部分欧洲，甚至部分近东——从斯匹次卑尔根到柏林墙并远及土耳其亚洲边界。但是这一切还只是美国极度扩张的开始。里约条约以及同加拿大的特别协定表明美国对整个西半球的防务负有责任。澳新美条约的缔结则确立了美国在西南太平洋的义务。50年代初期，东亚的冲突导致签订一系列双边条约，美国作出援助沿“大太洋环”的日本、南朝鲜、台湾以及菲律宾的保证。1954年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使美国得以进一步联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巴基斯坦和泰国，以保证在这一广大地区内相互支持共同反对侵略。1955年在中东美国倡议成立另一地区集团——巴格达条约（后为中央条约组织），规定在条约范围内英国、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负有共同对付、颠覆和进攻的义务。在中东其他地方由于犹太人与美国人关系密切以及1957年“艾森豪威尔主义”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的结果，美国同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约旦相继达成特别协定。1970年，一位观察家指出：

> 美国在30个国家驻军100万以上；是4个地区防务联盟的成员、也是5个联盟的积极参加者；同42个国家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是53个国际组织的成员；

向全世界大约100个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

要承担这一连串义务，哪怕是路易十四或帕默斯顿也会感到难以为继。然而在一个似乎迅速变小、各部分又彼此相关的世界里，美国逐次所作的承诺都有它的逻辑。最初，美国曾声称，朝鲜并非至关重要，但结果招致第二年共产党的进攻，那么，在这个两极世界中，华盛顿能在何处划线为界呢？迪安·腊斯克在1965年5月议论道："这是一个很小的行星，我们必须关心它的一切——所有的陆地、海洋、大气层以及外层空间。

如果苏联过去向外部世界扩展实力和影响的范围较小，那么斯大林死后的年代有了显著的进展。显而易见，赫鲁晓夫希望人们称颂苏联，甚至不是害怕苏联而是爱戴苏联；他也想把用于军事的资源转到农业投资和生产消费的方面。他的外交政策的总观点反映他希望冷战"解冻"。在制服了莫洛托夫后，他从奥地利撤军，将波卡拉海军基地和旅顺港分别归还芬兰和中国，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并提出存在"各个不同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论点（这一立场激怒了他的许多主席团同事以及毛泽东）。作为对西德参加北约的回答，赫鲁晓夫虽然在1955年正式签订了华沙条约，但他还是愿意打开同波恩的外交关系。他也很想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尽管由于他个人反复无常的作风以及华盛顿长期以来一贯对苏联行动的不信任态度而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缓和。同年赫鲁晓夫出访印度、缅甸和阿富汗后，苏联对于正在争取独立的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开始认真对待。

一切变化并非象热情洋溢的赫鲁晓夫期望的那样完美和顺利。1956年4月，斯大林主义控制的工具——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解散了。令人尴尬的是，两个月以后发生了匈牙利暴乱（要脱离社会主义走"独立的道路"），不得不用斯大林式的手段将其镇压下去。同中国的争吵有增无已，造成了共产主义世界深刻的分裂（下面将论述）。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击落美国U-2飞机

事件（1960年）、柏林墙危机（1961年）及其苏联在古巴的导弹问题上与美国的冲突（1962年），使缓和触礁而沉陷。但这一切都没有改变苏联走向世界的政策。苏联同新出现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在联合国与其代表进行接触就已必然加强了苏联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此外，赫鲁晓夫希望显示苏维埃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因此决心要在国外寻找新朋友。1964年后，他的较务实的接班人对打破美国设置在苏联周围的警戒线以及对遏制中国影响态度积极。与此同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渴望摆脱所谓“新殖民主义”，准备实行计划经济，摈弃放任经济，其结果往往使西方停止给予援助。所有这一切导致苏联外交政策明显“向外扩张”。

这一“向外扩张”以十分果断的方式于1953年12月通过同印度签署一项贸易协定开始（时间与副总统尼克松访问新德里巧合），接着1955年帮助建造比莱钢厂，后来又提供许多军援。苏联同第三世界最重要的大国印度的这种关系，使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感到不快，同时也是对巴基斯坦加入巴格达条约的惩罚。几乎同时，1955～1956年，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向埃及提供援助，取代华盛顿对阿斯旺水坝筹集资金。苏联还向伊拉克、阿富汗和北也门贷款。坚决反帝的非洲国家如加纳、马里和几内亚也得到苏联的赞助。最大的突破是1960年苏联在拉丁美洲同卡斯特罗的古巴签订第一个贸易协定，当时古巴已同被激怒的美国卷入纠纷。苏联的一套行为方式并未因赫鲁晓夫下台而改变。它首先进行一场大肆喧嚣的反帝宣传运动，然后便自然地向一切新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提出签订“友好条约”、提供贸易信贷、军事顾问等等。苏联在中东还可以从美国支持以色列得到好处（例如，60年代莫斯科对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埃及不断增加援助）。它向北越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赢得威望，甚至在遥远的拉丁美洲也宣布对民族解放运动负有义务。在为争取扩大世界影响的斗争中

苏联摆脱了斯大林偏执的审慎做法，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难道华盛顿和莫斯科竞相争夺世界，利用条约提供援助、贷款、出售武器以扩大各自的影响，就意味着一切重大国际事务必须受美、苏两家敌对的战术影响的两极世界的来临吗？从杜勒斯或莫洛托夫的观点看来，世界就是如此安排的。然而，当这两个集团角逐于世界各地以及1941年在它们都不熟悉的地区竞争的时候，都遇到一种非同以往的趋势。因为，这时第三世界刚刚兴起，许多成员在终于摆脱了传统欧洲帝国的控制后，不甘愿再度沦为另一个相距遥远的超极大国的卫星国，尽管这个超级大国能提供有用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实际上，当前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是，20世纪强权政治的一个重要趋势——超级大国的兴起，开始与另一个更新的趋势——世界政治分化，相互发生影响。在1900年左右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占上风的社会中，很容易认识到一切权力集中在世界上越来越少的几个首都手中。但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傲慢与野心播下了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塞西尔·罗得斯[1]泛斯拉夫主义者或奥匈军人大肆鼓吹民族主义，在布尔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芬兰人之中激起了反响。宣传德国和意大利应该统一的民族自决思想，或1914年协约国支持比利时的决定，不断向东、向南传到埃及、印度和印度支那。鉴于英、法、意、日在1918年战胜德、奥、匈三国，并在1919年抵制威尔逊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民族主义活动只容许在限定的范围内进行，例如，可给予东欧各民族自决权，因为他们是欧洲人，从而应看作"文明"人，但同样的原则却不适用于中东、非洲或亚洲等地，在这里，帝国主

[1] 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kes，1853～1902）：英国殖民者，因其为英帝国掠夺与侵占南非，故部分南非殖民地以其名命名为罗得西亚（Rhodesia）。——译者注。

义列强肆意扩张领土，镇压独立运动。1941 年后这些帝国在远东的势力丧失，战争的发展，需要动员组织属地的经济力量和征募兵员，大西洋宪章的思想影响，以及欧洲衰落等种种因素加在一起，解放了要求变革的力量，到了 50 年代形成所谓第三世界。

被称作"第三"世界，是因为它坚持区别于美国和苏联统治的集团。这并不表明 1955 年 4 月最早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同超级大国毫无关系或不承担义务，例如，对于会议参加者土耳其、中国、日本、菲律宾来说，"不结盟"一词就可能不很恰当。另一方面，这些国家迫切要求加速非殖民化进程，要求联合国重视除冷战紧张局势之外的其他问题，要求采取措施改变经济上仍被白人统治的世界。50 年代末、60 年代初，非殖民化第二个重要阶段开始时，一大批新成员加入到第三世界的行列，它们几十年（或几个世纪）以来在外国统治下受尽苦难，现在独立后又必须同面临的大量经济困难作斗争。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数量剧增，他们开始有力量控制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原有 50 个国家（绝大多数为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现逐步变为 100 多个国家的组织，其中许多是新的亚洲成员国。这一情况限制不住大国的行动，它们作为安全理事会常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这是谨慎的斯大林坚持的条件）。但是，如果一个超级大国希望求助于"世界舆论"（如 1950 年美国要求联合国援助南朝鲜），那么它就必须得到联合国组织的赞同，而其成员对华盛顿和莫斯科所关注的事并不赞同。鉴于 50 年代和 60 年代在国际斗争中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是非殖民化和要求结束""不发达"状态，而苏联在这些问题上采取灵活的支持态度，因而从 1956 年的苏伊士危机到后来的越南问题、中东战争、拉美和南非等一系列问题上，第三世界舆论都具有强烈的反西方色彩。甚至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重点也一直是反殖民主义问题，会议的地点（1961 年在贝尔格莱德，1961 年在开

罗，1970 年在卢萨卡）也反映出会议议题发生了变化，欧洲问题已不是讨论的中心。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不再完全操纵在拥有最大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大国手中了。

最卓越的不结盟运动早期倡导人铁托、纳赛尔、尼赫鲁是进行变革的象征性代表。南斯拉夫与斯大林决裂、（早在 1948 年被驱逐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后能保持国家独立，未遭苏联侵犯，此事极其引人注目，而斯大林死后南斯拉夫仍继续坚持这一政策，所以第一次不结盟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决非偶然。纳赛尔在 1956 年同英、法、以色列发生冲突之后，提高了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威望，他严励批评西方帝国主义，同时也欣然接受苏联援助，但他不是莫斯科的傀儡，他“对待本国的共产党态度很坏，并在 1959 年至 1961 年期间通过新闻广播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苏运动”。泛阿拉伯主义，特别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不是无神论唯物主义的天然伙伴，尽管当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力图将二者合而为一。至于印度，苏联向这个代表“温和的”不结盟国家长期以来的领袖再三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中印冲突和印巴冲突之后援助达到了新的顶点，然而这并没有使尼赫鲁停止对苏联在其他地方的行为加以批评，并对印度共产党心怀疑忌。他谴责英国在苏伊士的政策是由于他厌恶任何大国对外进行干预。

这些年来许多新的国家加入了国际社会，苏联希望它们同西方疏远，但由于不了解当地情况，在外交上未免经常有“得”有“失”。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中国问题（下面将进一步论述），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事例。1958 年伊拉克政权更迭，苏联趁机向这个阿拉伯国家作出友好姿态并提供贷款，不料 4 年后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政变对共产党进行了血腥镇压。莫斯科一贯援助印度，不可避免地要激怒巴基斯坦，它无法既讨好一个又不失去另一个。起初，苏联在缅甸很有成功的希望，后因这个国家驱逐所有外国人而失败。在印度尼西来，情况更糟，苏加诺政府接受

大量苏联和东欧援助后于1963背弃莫斯科转向北京，两年以后印尼军队极其残忍地屠杀共产党人。1961年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因苏联大使卷入当地罢工将其遣返回国，并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拒绝苏联飞机在科纳克里机场加油。1960年刚果危机中苏联支持卢蒙巴，结果损害了卢蒙巴的前程，其继任者蒙博托关闭了苏联使馆。1972年萨达特命令把2.1万名苏联顾问赶出埃及，这是苏联遭受的最突出的挫折，也是对苏联势力的最大打击。

因此，第三世界与“前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无疑，有的国家一贯亲苏（古巴、安哥拉），有的则强烈亲美（台湾、以色列），这主要因为它们感到邻国的威胁。一些国家以铁托为榜样，真正奉行不结盟政策；另一些国家在倾向于一个集团（因接受其援助）的同时，极力不过分对它倚赖。而第三世界不断发生的革命、内战、政变、边境冲突经常使莫斯科和华盛顿出乎意外，措手不及。塞浦路斯、欧加登、印巴边界、柬埔寨的地区性抗争往往使超级大国左右为难，因为交战双方都向它们要求支援。苏联和美国同以往的大国一样，面临的实际困难是，它们的“救世”旨意并不自动地被别的社会和文化所接受。

四、两极世界的分裂

当20世纪60年代进入70年代时，有充分理由可以说明华盛顿–莫斯科关系在世界事务中仍然举足轻重。苏联在军事上已很接近美国的水平，但所有其他国家和它们的差距很大，不可同日而语。如在1974年，美国的国防费用为850亿美元，苏联为1090亿美元，为中国的（260亿美元）的3～4倍，为各主要欧洲国家（英国97亿，法国99亿，西德137亿）的8～10倍。美

国和苏联的军队分别为200多万和300万，比欧洲国家的大得多，比中国300万现役军人的装备好得多。两个超级大国各拥有战斗机5000架以上，比以前各大国的总和多10倍多。1974年美国战舰总吨位为280万吨，苏联210万吨，大大超过英国（37万吨）、法国（16万吨）、日本（18万吨），和中国（15万吨）。但最大的差距是在核运载工具的数量上，见表38。

表38　各大国核运载工具（1974年）

	美国	苏联	英国	法国	中国
洲际弹道导弹	1054	1575	—	—	—
中程弹道导弹	—	600	—	18	(约)80
潜艇弹道导弹	656	720	64	48	—
远程轰炸机	437	140	—	—	—
中程轰炸机	66	800	50	52	100

每个超级大国都拥有消灭对方（和所有其他国家）的能力。这种状态很快被称为“相互确保摧毁“（MAD）——因此它们就开始协商以各种方式来控制核军备竞赛。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安装了“热线“，使双方在发生另一危机的情况下可以通话；1963年，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英国也签署了），该条约规定禁止在大气层、水下和外层空间进行核试验；1972年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签署的条约限制各方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并使苏联停止建立反弹道导弹体系；1975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延长了上述条约；在70年代后期又谈判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1979年6月签署，但美国参议院从未批准）。然而，这种种双方议定的措施以及促使双方都同意这些措施的各种经济的、国内政治的和外交政策的动机,都不能使军备竞赛停止；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只是禁止或限制了某一武器系统，又使资金转向另一领域而已。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

逐步地坚定不移地增加了军费拨款，而美国国防费用计划却由于越南战争耗资巨大，后又遭到公众对这一冒险行动的反对而被打乱，但军费总数的长期趋势越来越高。双方每隔几年就要增加一些新的武器系统：各自的火箭都装上多弹头；海军增加核导弹潜艇；**战略**导弹的核僵持（这使欧洲担心美国在苏联向西方攻击时不发射运程导弹进行回击，因为那会使美国城市遭到原子武器的攻击）导致新型中程或"战区"核武器如潘兴II式和巡航导弹的发展以对付苏联的 ss-20 弹道导弹。军备竞赛和各种军备控制谈判都不过是华盛顿和莫斯科所创造的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任何一方面都使它们处于舞台的中央。

在其他领域里，美苏对抗也处于中心地位。如前所述，1960 年以来苏联加强军备的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它大大扩展了水面舰队——从**物质上**看，它制造越来越多更强大的导弹驱逐舰和巡航舰，然后是中型直升机母舰和航空母舰；从**地理上**看，苏联海军开始越来越多地把舰队派到地中海以及更远的印度洋、西非、印度支那和古巴，在这些地区它能使用越来越多的基地。这反映了美苏对抗已向第三世界深入扩展，主要因为莫斯科进一步成功地打入了一些迄今由西方势力垄断的地区。中东持续紧张的局势，特别是 1967 年和 1973 年的阿以战争（美国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意味着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仍将指望莫斯科的援助。南也门和索马里的马克思主义政权为苏联海军提供海军基地设施，使苏联的军事存在以新的面貌出现在红海之上。但挫折照例伴随着进展而来：由于莫斯科明显偏向埃塞俄比亚，致使索马里于 1977 年将苏联人员和船舰驱逐出境，仅只几年以后，在埃及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苏联在这一地区的进展遭到美国的反击，美国在阿曼和迪戈加西亚岛增加了军事力量，增运在肯尼亚和索马里拥有海军基地权，并对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增运武器。不过，在更远的南

方，苏联和古巴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部队给予军援；受苏联援助的利比亚卡扎非政权不断企图向外输出革命；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几内亚、刚果和西非其他国家中出现马克思主义政府，这一切都说明莫斯科在争夺全球势力范围的斗争中节节得胜。1979年，苏联亲自向阿富汗进军——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在东欧以外的扩张行动——以及古巴鼓励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左派政权，使人们加深了这样的印象：美苏竞争是无限度的，并促使华盛顿方面采取更多的反击行动和增加国防费用。到1980年，新的共和党政府谴责苏联是邪恶的帝国，认为对它只能用大规模防御力量和强硬政策作为回答，自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时代以来，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什么变化。

虽然，在1960和1980年之间，美苏关系及其风云变幻是问题的中心，但其他倾向也起着作用，它们使国际力量体系两极化的程度较前大为减弱。不仅第三世界的兴起使事态复杂化，而且以前由莫斯科和华盛顿主宰的似乎坚如磐石的两个集团也有了严重的裂痕。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分裂是其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其影响甚至到现在也还难以作出充分的估计。所谓“科学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也会因具体环境、固有的文化力量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碰壁失败，这一点回想起来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毕竟列宁自己为了进行1917年的革命，也不得不在许多方面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始学说。对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考察的某些外国观察家们意识到，毛泽东至少并不想盲目顺从斯大林对工人和农民相对重要性所持的教条主义立场。他们还看到，莫斯科不是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甚而迟至1946年和1948年，还在权衡中共与蒋介石国民党之间企图倾向后者，苏联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建立“一个生气勃勃的新的共产党政权，它是在一个人口几乎3倍于苏联的国家里，在没有红军的帮助下成立起来的。它必然会成为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吸引力的竞争中心”。

中苏分裂如此深刻，致使大多数观察家十分惊异，而多年来美国却因害怕全球共产党阴谋对之视而不见。应该承认，朝鲜战争以及随后发生的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角逐，转移了美国对莫斯科—北京轴心冷淡状态的注意力。在此情况下，斯大林提供相对少量的对华援助，但索取的代价却是强调苏联在蒙古和满洲里的特权。虽然毛泽东得以在 1954 年与苏联的谈判中调整了平衡，但他在金门、马祖沿海岛屿问题上对美国的敌意以及他更加顽固坚信（至少在那时是如此）同资本主义的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使他对赫鲁晓夫的早期缓和政策抱有极端怀疑的态度。但从莫斯科的观点看来，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不必要地向美国挑衅似乎是愚蠢的，特别是当美国明显地拥有核优势的时候；若在 1959 年中印边境冲突中支持中国也是外交上的失败，因为印度对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非常重要；由于中国嗜好独立行动，支援他们的核计划而不对之进行某种控制，是很不明智的——这一切都被毛泽东看成是苏联的一连串背叛行为。到 1959 年，赫鲁晓夫取消了与北京的原子能协定，并向印度提供贷款，其数量比曾经给予中国的大得多。次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大会上，“分裂”终于公开化。1962～1963 年，情况更加恶化：毛泽东指责苏联人在古巴问题上投降，而后又同美英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苏联人在那时已中止了对中国及其盟友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增加了对印度的供应；发生了第一次中苏边境冲突（虽然没有象 1969 年那样严重）。1964 年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并在努力制造运载系统，这一消息更为值得注意。

从战略上来说，这次分裂是 1945 年以来唯一最重要的事件。1964 年 9 月，《真理报》的读者看到了一篇报导，感到十分吃惊：毛泽东不仅要求归还 19 世纪中华帝国丧失于俄国的亚洲领土，而且还谴责苏联侵占了千岛群岛、波兰的一部分、东普鲁

土以及罗马尼亚的一部分。依毛泽东看来，苏联应按中国的主张把面积缩小150万平方公里！这位固执己见的中国领袖被自己的夸夸其谈冲昏头脑的程度有多么厉害，这很难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一切——边境冲突和中国原子武器的发展——是对克里姆林宫的严重警告。的确，60年代苏联增强武装力量至少部分是觉察到东方产生了新的危险，另一方面是对肯尼迪政府加强国防的必要反应。"苏联在中国边境的驻军已从1967年的15个师增加至1969年的21个师，乃至1970年的30个师"——这最后的一次急剧增加是由于1969年3月的达曼斯基岛（或珍宝岛）的严重冲突引起的。"到了1972年，苏联沿中国4500哩的边境线部署了44个师（与之相比在东欧只有31个师），而苏联空军的1／4已由西方调至东方。"由于中国现已拥有氢弹，有迹象表明，苏联正在考虑先发制人，对罗布泊的核设施进行袭击——这就促使美国制定自己的应变计划，因为它认为不能让苏联去消灭中国。自从1964年华盛顿曾考虑参与苏联的"预防性军事行动"以遏制中国发展为一个核大国以来，它已走得很远了！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的中国已正式上升为第三超级大国了。在经济上，中国的问题很大——加之它的领袖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随之带来了中断和不稳，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虽然它自恃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但其民兵恐非苏联摩托化步兵师的对手。中国的海军与日益扩展的苏联舰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它的空军虽然庞大，但主要是较老式的飞机，而它的核运载系统还处于初建阶段。不过，除非苏联打算冒险去激怒美国并冒犯世界舆论而对中国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核袭击，否则任何较低水平的作战都会迅速造成重大伤亡——中国似乎愿意接受，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政治家们就不是那么乐意了。所以当苏中关系恶化时，无怪乎莫斯科不仅对同西方进行限制核武器谈判感兴趣，而且还加快步伐同联邦德国之类的国家改善关系，而联邦德国在维

利·勃兰特统治下似乎比阿登纳时期更加愿意促进缓和。

在政治和外交舞台上，中苏分裂使克里姆林宫处境尴尬。虽然赫鲁晓夫本人愿意容忍“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始终以不背道而驰为条件!），但苏联被公开指责背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它的卫星国和保护国被鼓动去挣脱俄国的“枷锁”，它在第三世界所作的外交努力被中国对抗性的援助和宣传弄得复杂化，这一切对苏联来说又是另一回事了。特别是，以农民为基础的毛牌共产主义往往比俄国强调工业无产阶级更为合适，情况就更是如此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苏维埃帝国的东欧有追随中国的真正危险——只有行为古怪的阿尔巴尼亚政权才这么做。但北京谴责莫斯科镇压捷克 1968 年的自由化改革，又谴责它 1979 年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这仍然使它感到难堪。而且，在第三世界，中国在阻挡苏联的影响方面，似乎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中国在北也门竭力竞争，它完成了大部分坦桑尼亚铁路建设计划，它批评苏联没有充分支持越盟和越共的反美斗争，它与日本恢复关系后就警告东京不要同苏联在西伯利亚进行重大的经济合作。但这又很难说是一次势均力敌的斗争——通常苏联可以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更多的贷款和先进武器，而且也可以利用它的代理人古巴和利比亚来施加影响。但是，要同一个马克思主义兄弟国家竞争，又要同美国竞争，这比 20 年前可预测的两极抗衡来说，令人更加烦恼。

中国独断独行的路线，在各方面使外交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离奇，特别是在亚洲。中国人对莫斯科追求印度感到不快，在中印边境冲突后苏联还向新德里运送军需品，就更加使它气恼了。因此，北京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冲突中支持巴基斯坦，对苏联入侵阿富汗表示强烈不满，这是不足为奇的。在 70 年代后期，莫斯科支持北越扩张，北越参加经互会，苏联海军日益增多地出现在越南港口，于是同中国更加疏远了。1978 年 12 月越南入侵柬埔寨，中国就同其南邻进行了残酷的但并不十分成功的边境冲

突，而越南又受到苏联大量的武器供应。到这个阶段，莫斯科甚至更倾向于台湾政权，而北京则怂恿美国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增加海军力量以对抗苏联的海军中队。中国批评苏联对西方太过软弱之后只不过 20 年，就转而敦促北约组织增强防务并警告日本和共同市场不要加强同苏联的经济联系了！

相比之下，从 60 年代早期以来，西方阵营主要由戴高乐发动了反对美国霸权的运动而引起了混乱，但从长远看来还绝没有中苏分裂那么严重——不过这肯定增加了这样的印象：这两个集团都处于破裂之中。戴高乐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犹新，美国对他没有平等相待一事使他怒不可遏，对美国在 1956 年苏伊士危机中的政策也感到愤慨，至于杜勒斯在象金门那样的问题上习惯于威胁发动一场核战争，不用说，就更令人恕恼了。在 1958 年后的几年里，戴高乐为了使法国从阿尔及利亚脱身，有许多事情要做，忙碌不堪，但就在那时，他也还批评欧洲屈从于（他是这么看的）美国的利益。象 10 年前的英国一样，戴高乐看到核武器是维持大国地位的机会。当 1960 年法国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消息到来时，这位将军大呼："法国万岁——从今天早晨起，她更强大、更骄傲了。"他决心使法国的核威慑完全独立，他愤怒地拒绝了华盛顿提供给英国的那种北极星导弹系统的建议，因为肯尼迪政府附加了条件。这意味着法国自己的核武器计划在国防总预算中所占的比例要比其他国家的大得多（也许高达 30%），但戴高乐及其后继者仍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付出的。同时，他着手使法国脱离北约组织的军事机构，1966 年把北约组织的总部逐出巴黎，关闭法国领土上所有的美国基地。与此相结合，他寻求改善法国同莫斯科的关系——他的行动受到莫斯科的热烈欢迎——并积极宣传欧洲独立的必要性。

戴高乐采取了惊人的行动，不只是靠高卢人的雄辩和值得骄傲的文化。法国的经济借助于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和其他美国的补

贴，并受益于40年代后期以来欧洲总的经济恢复，近20年来获得了迅速发展。印度支那（1950～1954年）和阿尔及利亚(1956～1962年）的殖民战争，使法国暂时把资金转用到这方面来，但这种情况并不是无法弥补的。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形成时期，法国通过谈判为其国家利益争取到很有利的条件，使它在重建农业和实现工业现代化中，从这个较大的市场上得到了好处。戴高乐虽然对华盛顿持批评态度，并坚决阻挠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但却在1963年同阿登纳的德国戏剧性地达成了和解。他成天谈论欧洲必须独立自主，摆脱超级大国的统治，应牢记欧洲过去的光荣历史（自然法国处于领先地位），并齐心协力追求同样光荣的未来命运。这些话都很激烈，但却引起铁幕两边的反应，许多人既不喜欢苏联的也不喜欢美国的政治文化，更不用说它们各自的外交政策了，而这些话恰恰投合了这部分人的心意。

但到了1968年，戴高乐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因学生和工人的骚乱而受到损害。现代化造成资金紧张，而且法国的经济相对来说规模不大（1963年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3.5%），这意味着法国还不够强大，还完全不能象这位将军所想象的那样起左右局势的作用。不管他向西德提出什么样的特殊协定，西德都不敢放弃同美国的紧密联系，波恩政治家们知道，他们最终是要大大依赖于美国的。而且，苏联在1968年残酷镇压了捷克的改革，说明东方的超级大国根本不想让它势力范围的国家实施本国的政策，更不用说去参加法国领导的泛欧洲的联盟了。

戴高乐虽然高傲自大，但却是势不可挡的潮流的象征和推进者。西欧各国在军事上与美苏相比还有许多薄弱之处，但它们的军队比1945年战后时期，相对来说，是大多了，强多了。其中两个国家已拥有核武器，并正在发展运载系统。在经济上，“欧洲的复兴”获得极大的成功，这在下面还要详细加以探讨。而且，

俄国虽在 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但是，把欧洲分裂为封闭式集团的冷战时代已经动摇了。维利·勃兰特主要在接受 1945 年边界为永久性边界的基础上，于 1969～1973 年间，同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特别是同东德政权（最初是勉强的）达成了和解，这一令人瞩目的和解政策揭开了东西方接触的繁荣时期的序幕。西方投资和技术进入铁幕，而这种“经济缓和”又推动了文化交流，赫尔辛基人权协定（1975 年）的签订，以及防止对未来军事行动的误会并争取达到相互裁军等活动。超级大国基于各自的考虑，对上述一切均表赞同，自然也作了某些保留（特别是苏联一方）。但也许最为重要的事实是：欧洲人坚持施加压力以求达到“和解”，甚至在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关系冷却之后也是如此。所以，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要在将来制止这一进程是十分困难的。

美苏两国在适应这一新的多元化国际环境方面，美国比苏联所处的地位要有利得多。不管戴高乐反美姿态如何，决没有下列情况严重：中苏边境冲突，取消双边贸易，意识形态方面的相互抨击，世界范围的外交斗争，到了 1969 年，已使某些观察家认为苏中战争不可避免。不管美国政府对法国的行动感到多么气恼，也几乎不用因这类争吵而重新部署部队。无论如何，法国还允许北约组织保留飞越上空的权利，输油管道可穿越法国境内，巴黎并遵守同西德的特别防务协定，因此，如华约军队向西方攻击，法国可提供军队。当然，1945 年后美国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一个强大而独立的（即不受苏联统治的）欧洲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有助于美国减轻防务负担——虽然得承认这样的欧洲可能在经济上，也许在外交上，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正因如此，华盛顿鼓励一切趋向欧洲一体化的行动，并力促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相形之下，如果在西方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欧洲联盟，那么，苏联可能不仅在军事上开始感到不安全，而且还要担忧这

一实体对罗马尼亚人、波兰人和其他卫星国人民会产生吸引力。莫斯科有选择的缓和政策以及同西欧的经济合作是另一回事，这样做是由于可以带来技术上和贸易上的利益，可以进一步离间欧美，以及由于中国在苏联的亚洲前线挑战。不过，从长远来看，一个繁荣、复苏各方面（除军事之外，这一领域也许会强大起来）都超过苏联的欧洲，恐怕不会符合苏联的最大利益。

回顾以往，美国是否在适应世界力量的变化方面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这一点在1960年后的许多年中并不明显。首先，美国极端憎恶"亚洲共产主义"，在许多美国人的眼里，毛泽东的中国代替赫鲁晓夫的苏联已成为世界革命的煽动者。印度是华盛顿（象莫斯科一样）想要追求的国家，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在早些时候金门马祖冲突中造成的侵略形象。在60年代，美国和中国之间几乎看不到任何缓和的迹象，当时毛泽东的宣传机器正在谴责苏联人在古巴问题上的退缩以及同西方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最后，在1965～1968年之间，中国陷入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长期不稳定，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华盛顿政府更加憎恨。这一切说明不会出现"一种同美国改善关系有很大进展的局面。"

最重要的当然是，美国在这些年来自己也因越南战争中出现的问题而日益动乱。大多数美国人把北越人和南方的越共视为蔓延性的亚洲共产主义的新体现，对此必须及早用暴力加以制止，以免进一步起破坏作用。既然这些革命力量是由中国和苏联鼓励和供应物资的，那么，中苏两大国（但也许特别是嗜好严厉批判的北京政权）只能被看成是联合起来反对"自由世界"的敌对的马克思主义联盟的一部分。的确，当约翰逊政府使自己在越南的军事集结逐步升级时，华盛顿的决策者经常担心他们究竟能走多远而不致挑起中国对朝鲜战争所进行过的那种干涉。从北京政府方面来看，整个60年代肯定曾经认真讨论过，在北方同苏联的冲

突日益激烈，在南方美国陆战和空战不断升级，二者对中国是否同样是不祥之兆。但事实上中国与不同种族的越南人的关系历来是敌对的，对苏联给予河内的武器数量也十分怀疑，但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当权的整个时期里，大多数西方人没有看到这种紧张关系。

美国在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长期作战对国际力量格局或对美国人民的国民心理所产生的影响之大，在许多方面，象征性的和实践上的，无论怎样估计，都很难说是言过其实。大多数美国人民对他们国家在世界上的作用的认识仍然深深受着那场冲突的影响，虽然方式不同。事实上，这是由一个"开放的社会"进行的战争，由于五角大楼文件的揭露，由于电视和报刊天天报道屠杀以及明显的失败，战争就更加公开化了。这场战争是美国明显打败了的第一次战争，它搅乱了人们心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感受。毁坏了大批人的声誉——从四星将军到那些"最著名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美国社会关于国家目标和国家应优先考虑的事项的一致看法发生了分歧，而这场战争恰恰同这种分歧相符，并在颇大程度上促使了分歧的形成，伴随而来的是通货膨胀，前所未有的学生抗议和城市骚乱，接着又是使总统丢丑一时的水门事件危机；在许多人看来，这场战争同国父们所教导的一切都处于激烈而又具讽刺性的矛盾之中，它使美国在世界大多数地区都不受欢迎；最后，从越南归来的美国士兵受到令人羞愧的被遗弃的待遇，这将在10年后产生反响，并以战争回忆录、书籍、电视纪录片和个人悲剧的形式使这次冲突的回忆继续困扰公众的意识——这一切事实都意味着越南战争，从人员伤亡方面说来虽然小得多，但对美国人民的影响却有些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人的影响一样。越战的影响主要反映在美国人的个人和心理方面，更广义地说，这些影响可看作是对美国文明和美国宪法秩序的危机。因此，不管这场冲突对大国的战略性如何，战争的影

响仍将继续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上面最后所提的那些问题是我们研究的最重要的方面，需要在此进一步加以说明。首先，这场战争有益地、清醒地提示人们：军事装备和经济生产能力的巨大优势并不总是自动地转化成军事**战斗力**。但这并不有损于本书的论点，本书所强调的是在大规模的、持久的（并往往是联盟的）大国之间进行的战争中，在参战各方都有同等胜利机会的条件下，经济和技术的重要性。从经济上说，美国的生产能力可能比北越高 50～100 倍，从军事上说，美国拥有的火力足以把敌人炸回到石器时代（如某些鹰派极力主张的那样）——当然使用核武器就能把整个东南亚都消灭掉。但这**不是**一场使这些优势都能充分发挥出来的战争。美国害怕国内舆论和世界反应，所以不能对永不会成为美国**致命**威胁的敌人使用原子武器。这场冲突的合法性和效率日益成为问题，政府担心美国公众反对在冲突中造成重大伤亡，于是不得不限制使用常规战争手段；限定轰炸作战，规定不得占领通过中立国老挝的胡志明小道，以及不得截留运载武器到海防港口的苏联船只。不去惹动两个主要共产主义国家参加战争，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切从实际上把战斗降低为一系列小规模的在丛林和稻田中进行的遭遇战，这种地形减弱了美国火力和（直升机运载的）机动性的优势，相反，却突出了丛林战的技术和小部队的密切结合——这对精锐部队来说问题不大，但对应征入伍者不断补缺轮换的分遣队来说就很成问题了。虽然约翰逊仿效肯尼迪，也向越南派出越来越多的军队（最高时达到 1969 年的 54.2 万人），但还是永远不能满足威斯特摩兰将军的要求，政府坚持认为这仍然是一场有限的冲突，所以拒绝动员后备军，或将经济纳入战时状态。

在对美国实际的军事力量不利的条件下作战的种种困难，反映了一个更大的政治问题——手段和目的的不一致（克劳斯威茨

可能这样说）。北越人和越共是为他们坚信的事业进行战斗的；其他不为信念而战的人，无疑也必须服从强烈民族主义政权的纪律。而南越的政府系统相形之下却显得腐败和不得人心，处于明显的少数地位，佛教僧侣反对它，惊恐的、受剥削的、厌战的农民也不支持它。忠于政权而又勇于作战的地方部队不足以补偿这种内耗。当战争日益升级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提出了为西贡政权作战是否有效的问题，而对正在败坏美国军队本身的士气低落、厌世情绪滋长、无纪律、吸毒、嫖妓、对"越南佬"日益增加的种族蔑视，战场上的暴行等，则深感忧虑，除此之外，美国自己的货币或美国较大范围的战略态势也在日益削弱。

胡志明曾宣称,他们的军队情愿按 10：1 的比例损失人员——当他们不顾一切地从丛林里钻出来攻打城市时（如 1968 年春节攻势）他们往往受到这样的损失，但是胡志明强调，虽然受到这些损失，他们仍然要继续战斗下去。这种意志力在南越是看不到的。美国社会本身由于日益被这场战争的各种矛盾所困扰，也不愿为获胜而牺牲一切。这种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即便战争对双方利害攸关，事实证明，一个开放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成功地进行一场半心半意的战争的。这就是根本的矛盾，无论是麦克纳马拉的系统分析或是关岛基地上的 B-52 轰炸机都不能使之改变。

西贡失守（1975 年 4 月）后 10 多年来，有关那场冲突的各个方面的书籍虽还在大量出版，但仍然难于清楚地估计它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影响如何。从较远期的前景来看，比如说从 2000 年或 2020 年往回看，可以认为它对美国在世界上的目空一切（或如参议员富布赖特所谓的"权力的自负"）造成了有益的冲击，从而迫使这个国家对政治和战略的重点更加深思熟虑，更明智地去重新适应一个自 1945 年以来已有很大变化的世界——换言之，很象是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或英国人在布尔战争中所

受到的冲击，这种冲击也使他们实行了有益的改革并作了重新估价。

但现在，这场战争的近期影响只能是有害的。恰恰在约翰逊建设“伟大的社会”的国内开支急剧上升时，战争费用大幅度猛增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下面还将对此进行研究。再者，当美国对越南大量倾注金钱时，苏联花在核力量上的钱日益增多，从而获得了大体上的战略均势。苏联还稳步增加了海军军费，使它的海军这些年来上升为全球炮舰外交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在 70 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选民反对增加军事开支，这就使美苏之间这种不平衡状态更进一步恶化。在 1978 年，“国家安全费用”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为 30 年来的最低额。由于战争本身，又由于战后的削减，军队的士气直线下降。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机构进行了大改组，这虽然对防除弊端是必要的，但却无疑约束了它们的战斗力。美国把力量集中在对付越南，使同情它的盟国也感到忧心忡忡。它为支持一个腐败的政权而采取作战手段，结果西欧和第三世界的公众舆论都背弃了它。某些作家说美国同地球上大多数其他地区都“疏远”了，这就是疏远的主要原因。它导致美国忽视拉丁美洲，并趋向于以军事上支持非民主制政权和用反对革命的行动（如 1965 年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来替代肯尼迪所希望的“进步联盟”。越战后必然开展的那场关于将来美国是否应为世界某些地区进行战斗的公开辩论，使盟国感到困惑，无疑使敌人受到鼓舞，并使摇摆不定的中立国考虑参加另一方以便自己重新获得保障。在联合国大会的辩论中，美国代表越来越受到围攻，显得很孤立。自从亨利·卢斯断言在人类大家庭中美国将成为各国的兄长以来，事态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越南战争另一个强权政治的后果是，也许有 10 年之久，它使华盛顿认识不清中苏分裂已到了什么程度，所以也就没有抓住机会去制定一种如何处理这种局面的政策。因此，1969 年 1 月

共产主义的死敌理查德·尼克松任总统后竟如此迅速地纠正了这种疏漏，就更加令人瞩目了。但用加迪斯教授的话来说，尼克松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僵硬性和政治上的实用主义的独特的结合”，而实用主义在他同国外大国打交道时表现特别明显。虽然尼克松不喜欢国内的激进派，而且也憎恶智利的阿连德实行社会主义政策，但这位总统在全球外交方面却自称是超脱意识形态的。1972年，他下令大量增加对北越的轰炸，以迫使河内更接近于美国从南越撤军的讨价还价的立场，同年，他又旅行至中国去同毛泽东和解，对他说来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他选择亨利·基辛格作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后又任国务卿），这就更值得注意了。基辛格对世界事务的态度是历史主义的和相对主义的：认为应从较大的范围来看待事物，而且事物是互相联系的；应根据大国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它们国内的意识形态来对它们作出评价；寻求绝对的安全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因为这会使所有其他人都绝对地不安全——人们能希望达到的只是建立在世界事务处于合理的力量对比基础上的相对的安全，明智地承认世界舞台永不会完全和谐，并愿意互相磋商。正如他在著作中论述的政治家们（梅特涅，卡斯尔雷，俾斯麦）一样，基辛格觉得“处理人际和国际事务中，懂得适时而止，可谓智慧之开端”。他的格言是帕默斯顿式的（“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和俾斯麦式的（“如果我们同中苏双方保持比他们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那么中苏之间的敌对就能最好地为我们的目的服务”），基辛格是自凯南以来的美国外交中，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但是，比起这位钦羡19世纪欧洲政治家的同行凯南来，基辛格指导政策的机会要多得多了。

最后，基辛格认识到美国的实力是有限的，不仅因为美国无法既在东南亚的丛林里打一场持久的战争，同时又保持其他的更重大的利益，而且还因为他和尼克松两人都觉察到世界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新的力量正在逐渐破坏迄今为止还没有受到挑战的

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从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实力来看，两个超级大国仍远居前列，但从另一些方面来看，世界已变得更多极化："从经济上来说，"他在1973年时指出，"现在至少有5个主要集团。在政治上，已经出现了更多的势力中心……"他同意凯南的观点（并作了补正），指出了5个重要地区，即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西欧。他和华盛顿的许多人不同，（也许）和莫斯科所有的人不同，他是欢迎这种变化的。在大国的协作中，相互保持平衡，谁也不统治谁，将出现一个比两极世界"更安全、更好的世界"，而在两极的形势下，"一方的得利即为另一方的绝对损失。"基辛格深信自己有力量在这多元化的世界保护美国的利益，所以竭力主张基本上重新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外交这个词的最大意义上）。

1971年后中美稳步地恢复友好关系所引起的一场外交革命，对"世界力量的相互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日本虽然对华盛顿的行动感到吃惊，但它认为终于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了，这样就可进一步推动它的迅速发展的亚洲贸易。亚洲的冷战看来是结束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更加复杂化了：巴基斯坦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传递秘密消息的外交渠道，在1971年同印度的冲突中接受了这两个大国的援助。据估计，莫斯科也曾给予新德里大力支持。在欧洲，均势也发生了变化。克里姆林宫对中国的敌意感到恐慌，对基辛格的外交感到吃惊，因而认为签订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条约并鼓励进行其他各种尝试以改进同铁幕另一边的关系是稳妥之计。1973年阿以战争时克里姆林宫同美国发生严重对抗，随后，基辛格就开始了"穿梭外交"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进行调解，有效地冷落了苏联，迫使它起不了任何有意义的作用，这时，克里姆林宫也采取了克制的态度。

如果不是1974年8月水门丑闻把尼克松轰出白宫，使那么多美国人对政府更加不信任的话，很难说基辛格这种俾斯麦式的

把戏能玩多久。事实上，这位国务卿在福特任总统期内虽继续留任，但其运筹帷幄的自由已日益减少。国会经常大幅度削减防务预算的申请。1975 年 2 月，即南越、柬埔寨和老挝被侵犯以前几个月，国会取消了对这些国家的援助。战争权力法案大大减少了总统向国外派遣美国军队的权限。国会投票议决，不得将中央情报局的基金和武器送给安哥拉亲西方的派别来对抗苏古干涉。共和党右翼由于美国在国外的势力日益减弱而焦躁不安，并责怪基辛格放弃了国家利益（巴拿马运河）和老朋友（台湾），所以这位国务卿的地位早在 1976 年大选中福特被夺去政权之前就已经开始崩溃了。

整个 70 年代，美国都要尽力解决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各个不同的政治集团都试图使自己顺应降低了的美国国际地位，所以不可避免地，它的对外政策比局势平静时更加反复无常。在以后的几年里，政策上仍出现了一些无论从哪种标准来衡量都是引人注目的“摇摆”。卡特在格莱斯顿和威尔逊[1]最值得称誉的信念——必须创造一个“更公正的”全球秩序的影响下，轻快地进入了国际体系，但这个体系中的许多其他角色（特别是在世界上的“麻烦地点”）却都不想按照犹太——基督教的原则来施行政策。第三世界对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经济差距表示不满，这种不满在 1973 年石油危机时更加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卡特深谋远虑和宽宏大量地推进了北南合作。他在重新谈判巴拿马运河条约的条款，拒绝把拉丁美洲每一次改良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看待等方面，也同样表现出他的通情达理。卡特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兜售”1978 年的戴维营协议，受到了应有的赞扬——不

---

[1] 格莱斯顿（W E Gladstone，1809～1898年）英国首相，自由党领袖，对内曾倡导改革，对外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威尔逊（T W Wilson，1856～1924 年），美国总统（1913～1921 年），民主党人。——审校者注。

过，对他来说毫不足奇，这也同时引起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非议，从而使苏联乘机加强了同中东较激进国家之间的联系。卡特政府虽有良好的意愿，但由于这个复杂的世界似乎日益不愿听从美国的忠告，由于它自己政策的反复无常（往往因政府内部争吵引起）而终于失败。某些独裁右翼政权由于践踏人权受到全世界的痛斥和压力，但华盛顿仍继续支持扎伊尔的蒙博托，摩洛哥的哈桑国王和伊朗国王——至少一直支持到伊朗国王在1979年退位为止，这就导致了人质危机，从而又引出了营救人质的无效尝试。在世界其他地区，从尼加拉瓜到安哥拉，美国政府都难于发现值得它支持的民主自由力量，但要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进行斗争则又犹豫不决了。卡特还希望使防务费用保持低水平，他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同苏联的“缓和”既没有制止苏联军费开支的上升，又没有制止它在第三世界的行动。1979年末，当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时，华盛顿正在进行大规模增强防务，它当即退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取消向莫斯科出售谷物，并开始执行——特别是在布热津斯基对中国和阿富汗的著名的访问期间——“均势”政策。而仅在4年以前，总统还曾谴责这种政策！

如果说卡特政府在就职时带了一套治理复杂世界的简单处方，那么，1980年他的继任者的处方也差不多同样简单——虽然是截然不同的。里根政府对在前20年中美国“搞糟了”的一切充满反感，它由于选举大胜而受到吹捧（胜利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伊朗丢脸事件的影响），它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世界的看法有时完全是摩尼教的，它有意要把国家驶往新的航向。它认为“缓和”已经过去了，因为缓和只不过给苏联的扩张主义提供了一副假面具。它要加强各个方面的军备建设。人权问题已在日程之外。“独裁政府”则备受宠爱。奇怪的是，甚至“中国牌”也是可疑的了，因为共和党右翼支持台湾。可以预料，这种头脑简单多由于在外部世界的复杂现实面前遭到失败，加之还有国会和公众的

反对，国会和公众喜欢他们总统的朴素的爱国主义，但对他的冷战政策则抱怀疑态度。在拉丁美洲，或在任何有丛林覆盖从而使人想起越南的地方进行干涉，往往都遭到反对。核军备竞赛升级造成普遍不安，人们施加压力，要求重新恢复武器谈判，特别是，当政府的支持者谈论在同苏联的核对抗中能“得胜”的时候。热带地区的独裁政权垮台了，它们往往是由于同美国政府的联系而更加不得人心的。不准欧洲人向苏联购买天然气，却准许美国农民把谷物出售给苏联，欧洲人对这种逻辑感到迷惑不解。在中东，里根政府不能对贝京先生的以色列施加压力，这同它的协调阿拉伯世界使之成为一个反苏阵线的战略是矛盾的。在联合国，美国似乎处于空前的孤立状态，1984 年它竟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种局面会使弗兰克林·罗斯福感到惊愕不已。美国在 5 年之内把防务预算翻了一番，当然它拥有的军事装备要比 1980 年为多；但是人们越来越怀疑，五角大楼耗费巨资是否收回了有益的代价，是否能控制其军种间的抗争。入侵格林纳达被大肆宣扬为巨大的成功，但从各种军事行动的角度看来，却近似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滑稽剧那样令人忧虑。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政府有那么多成员互相争吵（甚至在国务卿黑格引退之后），政府首脑似乎不大注意关键性的重要问题，而且政府以民族优越感的眼光来观看外部世界（很少例外），因此，甚至那些抱同情态度的观察家们也怀疑政府是否已制定出一套首尾一致的宏伟战略。

这些问题中有许多将在最后一章中再来探讨。这里把卡特和里根政府的各种麻烦问题都列在一起的理由是，总的说来，它们转移了对正在形成全球强权政治的更大的力量的注意力——特别是两极世界已转变为多极世界这一点，基辛格早已察觉并开始设法去适应它。（下面将要看到，增加的 3 个政治和经济势力中心——西欧，中国和日本——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它们本身没有什

么问题，但与这里所谈无关。）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把注意力集中在尼加拉瓜、伊朗、安哥拉、利比亚等等国家的刚刚露头的问题上，还会使它看不清下列事实：70年代世界政治转变中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可能是苏联。——对此，本节结束前有必要进一步作些简短阐述。

无疑苏联在这些年来增强了它的军事力量。但正如乌拉姆教授所指出的，由于其他的事态发展，这只意味着：苏联的统治者意识到了大多数美国人在40年代和50年代令人不快的发现：实力增强并不会自动地给予一个国家更大的安全，特别是在核时代里。从经济和军事，从绝对和相对，几乎从每一个角度来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比斯大林时期要强大得多。但伴随着这大大增强了的力量而来的是国际上的新发展和对国外承担的义务，这就使苏维埃国家在外来危险和世界政治动荡面前，比过去，例如比1952年的时候，更加脆弱。

此外，在卡特政府末期，美国就已恢复了国防建设。继任的里根政府又以高速度继续进行这一任务，扬言要重新建立美国在战略核武器中的军事优势，要促进美国的海上霸权，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先进的技术。被激怒的苏联回答说，他们军费开支更大，武器更多，但这不能掩盖一个尴尬的事实，即这将使其发展速度已大大降低并在高技术竞赛中已处于不利地位的经济承受更大的压力。到70年代后期，苏联已处境窘迫，需要进口大量外国谷物，更不用说技术了。它的东欧卫星国，除经挑选的共产党干部外，对政府日益不满，特别是波兰人的不满已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即使重演1968年入侵捷克的行动恐怕也无补于事。在南方，由于害怕它的阿富汗缓冲国沦入外国（大概是中国）势力范围之内，因而煽动了1979年的政变，这不仅成为苏联军事上的泥潭，而且对它的国际地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阿富汗的行动，不论是在西欧或是在非

洲，都大大降低了苏联作为他国“模式”的魅力。中东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如伊朗那样）它既反对当地的共产党人，也反对亲美集团。而更主要的是，中国无情的敌视态度，这种态度由于阿富汗和越南的纠纷，在70年代末比初期似乎更加明显。如果说两个超级大国之中有哪一个已“失去了中国”，那么这就是苏联。最后，苏联年迈的统治者的民族优越感和狭隘的怀疑心理，以及它国内的统治集团上层人士，对彻底改革的“阻挠”，使苏联要成功地适应新的世界力量对比大概比美国还要困难。

这一切应使华盛顿感到某种安慰，并引导它在处理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缓和、更周密细致的态度，甚至在对外发生意外和不愉快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应该承认，在某些问题上，例如改变以前对台湾的支持方面，里根政府的确采取了更加实用主义和和解的态度。但是，还很难丢弃那些在1979～1980年选举运动中所说的话，也许因为它不仅是雄辩的措词，而且也是对世界秩序和美国注定应在其中占有的位置所抱的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正如过去经济发生的那样，凡抱有这种心情的国家，很难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对外事务，而总是按照他们自己的主观想法去做。

五、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1950～1980年）

1971年7月，理查德·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向一群新闻媒介的经理重申他的意见，认为现在已有5个世界经济实力中心——西欧、日本、中国以及苏联和美国。“在本世纪最后1／3时间里，这5支力量将成为在经济方面决定未来的中心，又**因为经济实力是其他各种实力的关键**，所以也将在其他方面决定世界的未来”。如果说，总统关于经济实力的重要性的讲话是正确的话，那么，就必须进一步深入了解冷战早期以来世界经济所发生的变

化，因为国际上的贸易和繁荣虽然常受到某些不寻常的动乱（特别是在 70 年代）的影响，但仍可发现似能构成可预见的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某些基本的长期的趋势。

在这里引用的比较经济统计表，同本书所涉及的所有的较早时期一样，不可能十分精确。自从马尔霍尔的《统计学字典》问世以来，政府和国际组织增加了雇佣的职业统计人员，并发展了先进的技术，这些情况有助于说明进行恰当的比较工作是有多么的困难。"封闭的"社会不愿公布它们的数字，各国衡量收入和产品的方式各异，外汇率起伏不定（特别是，1971 年后决定放弃黄金外汇标准，采用浮动外汇率），这三者加在一起使人们对所有的**单一**的经济数据系列是否正确都抱怀疑态度。但另一方面，**若干**统计指数是可以得到适当程度的信任的，可用以进行互相对比并指出今后的大致趋势。

第一个迄今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出现了贝罗克正确描述的"绝对空前的世界工业产量的增长率。"1953～1975 年，世界工业产量年均总增长率为引人注目的 6%（人均 4%），甚至在 1973～1980 年，平均年增长率为 2.4%，从历史的标准看，这就很不少了。贝罗克自己对"世界制造业工业生产"的计算——已由罗斯托关于"世界工业生产"的数字基本证实——赋予这种过高的增长以某种意义（参见表 39）。

贝罗克指出，"1953～1973 年间的世界工业累积产量相当于 1800～1953 年间整整一个半世纪的产量。"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新技术的发展，农业不断转向工业，把国家资源纳入"计划经济"之中，以及工业化扩展至第三世界等有都助于造成这种戏剧性的变化。

1945 年以后的世界贸易量以更为明显的方式，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惊人地大大增长了，这同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畸形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表 39　世界制造业工业生产（1830～1980 年）

(1900 年为 100)

	生产总数	年增长率
1830	34.1	(0.8)
1860	41.8	0.7
1880	59.4	1.8
1900	100.0	2.6
1913	172.4	4.3
1928	250.8	2.5
1938	311.4	2.2
1953	567.7	4.1
1963	950.1	5.3
1973	1730.6	6.2
1980	3041.6	2.4

表 40　世界贸易量（1850～1971 年）

(1913 为 100)

1850	10.1	1938	103
1896～1900	57.0	1948	103
1913	100.0	1953	142
1921～1925	82	1963	269
1930	113	1968	407
1931～1935	93	1971	520

更为令人鼓舞的是，正如阿什沃思所指出的，到 1957 年，世界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第一次超过了初级产品的贸易，这是几十年来工业制成品总产量的增长大大高于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也相当高的）增长的结果（参见表 41）。

表 41　世界生产增长百分比（1948～1968 年）

	1948～1958	1958～1968
农产品	32%	30%
矿产品	40%	58%
制成品	60%	100%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差距的原因可以被解释为先进工业国（特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制造业和贸易的大大增长。但它们对初级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第三世界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工业化，这意味着这几十年来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比 20 世纪任何时候为快。虽然西方帝国主义对世界其它地区的许多社会造成了损害，但是在工业化国家的扩张时期，这些社会的出口和一般经济的增长看来的确还是受益最大的。福尔曼一佩克认为，在 19 世纪，当“开放的”经济，如英国的经济，正在迅速扩张的时候，不发达国家发展很快，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工业世界陷入萧条时期时，同样首先是不发达国家最倒霉。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它们又获得较快的增长率，因为发达国家正繁荣兴盛，原材料的需求增加，而且工业化也在扩展。贝罗克指出，第三世界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比重在 1953 年的最低点（6.5%）之后，已稳步上升至 8.5%（1963 年），然后是 9.9%（1973 年）和 12%（1980 年）。据中央情报局的估计，不发达国家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也在增长，从 11.1%（1960 年），12.3%（1970 年），到 14.8%（1980 年）。

但是，如果纯粹从第三世界人口的数字来衡量，那么它们在世界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是低得不成比例——而其贫穷状况令人可怕。1980 年工业化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 10660 美元，象巴西那样的中等收入国家为 1580 美元，象扎伊尔那样的第三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则是令人吃惊的 250 美元。因为事实是，它们

在世界产量和制造业产量中的比例**总的说来**虽然是在上升，但收益却并不是在所有不发达国家中均等的。在殖民者撤走的时候，一些热带国家，大多象帝国主义时代以前那样，其财富差别已经很大。由于对这些国家半成品的需求方式不同，各自能争取到的援助的数量不同，气候、政治的变化，环境的损害，以及难以控制的经济力量等原因，使各国的差别更为悬殊。干旱可以使一个国家多年遭到破坏。内战，游击队活动，或强迫农民重新定居可以降低农业产量和贸易。世界价格，如花生或锡的世界价格的下跌几乎可以使一个单一产品的经济停顿。利率上升或美元增值均可造成严重的打击。西方医学在防治疾病方面的成就使人口急剧上升，增加了对食物储备的压力，并有从总的国民收入中把收益全部抹掉的危险。另一方面，有些国家进行了“绿色革命”，由于改进了耕作技术，采用新的植物品种，农业产量增加了。此外，那些幸运拥有石油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创纪录的大量收入，使它们成为一种不同的经济类型——虽然，当80年代初石油价格下跌时，连这些所谓的欧佩克不发达国家也受到了损失。最后，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就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兴起了若干个罗斯克兰斯所谓的“贸易国家”——南朝鲜，台湾[1]，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它们仿效日本、西德和瑞士进行企业管理并承担义务为世界市场生产工业制造品。

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差距，说明了过去几十年来宏观经济变化的第二个主要特征——即世界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经济增长率，这对较大的工业化强国和对较小国家说来都同样适用。鉴于(根据以往各个世纪的纪录）这一趋势最终对国际力量对比产生最大影响，那么就值得稍为详尽地加以研究，看它是如何在这几十年里影响主要国家的。

---

[1] 原文如此——审校者注。

1945年日本的经济转变无疑是这几十年来持续现代化的最引人注意的样板。它作为商业和技术上的竞争对手超过了几乎当今所有的“先进”国家，并为其它亚洲“贸易国家”提供了仿效的模式。的确，日本在几乎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因在经济方面以及——对它来说是致命的——军事和帝国主义方面成为第一个模仿西方的亚洲国家而崭露头角。虽然它在1937～1945年的战争中遭到很大损伤，它同传统市场和供应者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但它拥有的工业基础还可以恢复，它的人民是有才能的，受过良好教育，并具有社会凝聚力，现在可以把人民上进的决心引导到和平商业活动上来。1945年后的几年里，日本被打败，沦为被占领国，依赖于美国的援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50年，形势在颇大程度上发生了转变，因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防务开支很大，促进了日本出口公司的发展。例如，丰田正面临着倒闭的危险，却因美国国防部的第一批卡车订货单而得救，许多其它公司也差不多都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当然，出现“日本奇迹”，除了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的军事费用所起的刺激作用之外，还有更多的原因。努力去精确解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使自己转变的，别的国家又如何才能仿效它的成功经验，这件事本身就已变成一种小型发展行业了。成功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它坚信不移能达到最高水平的质量管理，它向西方借来（并加以改进）先进管理技术和生产方法。它得益于国家大力实施高标准的普及教育，拥有大批的工程师、电子和汽车专业人才，小规模的企业工厂，以及大财团。社会风气提倡勤奋工作和对公司忠心耿耿，主张通过妥协和谦让来调解劳资纠纷。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大量的资本，而日本获得了所需资本，其原因部分是由于在美国战略保护伞下的“非军事化”国家所需防务费用微乎其微，也许更主要的是由于它实行亟力鼓励个人高额储蓄的财政和税务政策，以便将资金用于投资目的。日本的成功

还得益于通商产业省"培植新的工业和技术发展项目，同时有步骤地停办陈旧衰落的工业"所有这一切与美国自由放任经济的方式完全不同。

对"日本的奇迹"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日本问题专家更强调文化和社会因素，此外还有一个时来运转的民族所具有的那种难以确切表达的国民自信心和意志力的"有利因素"），但无法否认日本在经济上已取得巨大成就。1950～1973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10.5%的惊人的速度向上增长，大大高于所有其他工业化国家，甚至使世界发展受到沉重打击的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也未能阻止日本在随后的年代里的增长率仍然几乎相当于它的主要对手的两倍。日本稳步地成为某些制成品的世界主要生产者，这些制成品的范围是相当惊人的——照相机、厨房用具、电气产品、乐器、小型摩托车等等，不一而足，大有增加之势。日本的产品向瑞士钟表工业挑战，超过了德国的光学仪器工业，压倒了英国和美国的摩托车工业。在10年之内，日本已生产全世界半数以上的船舶吨位。到70年代，它的更现代化的炼钢厂已与美国钢铁工业的产量持平。它的汽车工业的变化就更富有戏剧性了——在1960～1984年间，它在世界汽车生产中所占的比例从1%上升到23%——结果日本产的汽车和卡车成百万地出口到世界各地。日本稳步地、持续不断地由低技术产品向高技术产品发展——计算机、电讯、航天、机器人和生物工艺学。同样，它的贸易顺差也稳步地、持续不断地增加了——成为金融和工业巨人——它在世界生产和市场上所占的比重也随之扩大。当1952年同盟国结束军事战领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略高于法国或英国的1／3。到70年代后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英国和法国的总和，超过美国的半数"。在约30年的时间里，它在世界制造业产量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已从2%～3%上升至10%左右，而且还在不停地上升。只有

苏联在1928年以后的年代里才达到过这样的增长率，但日本经历的痛苦要少得多，而且更令人瞩目，基础更为广泛。

与日本相比，任何一个其他大国在经济上都必然显得呆滞。不过，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后的年代里开始表现出自己的力量时，对此，几乎所有的人都予以重视。这部分地可以说是反映了对"黄祸"的传统忧虑，因为这个东方沉睡的巨人一旦为国家的目标而组织起八亿人民时，它就必然会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乎从其立国开始就对外国列强采取了十分强硬的（且不说是挑战）的立场，尽管这可能是它感到自己处于被包围之中的一种神经质反应。它在朝鲜和金门、马祖同美国的冲突，向西藏的进军，同印度的边境斗争，同苏联愤怒决裂并在有争议地区的军事对抗，同北越的流血冲突，中国（特别是毛泽东统治时期）在批评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时通常使用的好战的宣传腔调，以及把人民解放运动推向全球，这一切使它在世界事务中成为一个比谨慎而狡猾的日本人更为重要，也更难以捉摸的形象。仅从中国拥有世界1／4人口而言，它的政治倾向何方，就必须予以认真对待。

不过，以严格的经济标准来衡量，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是经济落后的典型例子。例如，在1953年，它只占世界制造业生产的2.3%，它的"全部工业潜力"只相当于1900年时英国的71%！它的人口年增长率数以千万计，而人口构成的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其人均产量非常低下，几乎不能为国家增值。当1949年后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的时候，由军阀、日本侵略以及40年代后期的内战所造成的破坏尚未完全消除。不过，经济的前景还不是完全无望。中国拥有公路和轻型铁路的基础设施，它的纺织工业是有实力的，它的城市和港口是企业活动的中心，特别是满洲里地区在30年代已经过日本人的开发。如果中国要使它的工业起飞，需要的只是长期稳定和大量投资。50年

代初，这两个条件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因为共产党统治全国，而苏联源源不断给予援助。1953年的五年计划有意识地模仿斯大林式的做法，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增加钢、铁和煤的生产。到了1957年，工业产量已翻了一番。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国内筹措的或是向苏联借贷的工业投资资金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的经济需要。而中苏分裂后，苏联突然终止了一切财政和技术援助。此外，毛泽东愚蠢的决策：如鼓励开办成千上万小型炼钢厂以求达到“大跃进”；发动“文化大革命”（导致技术专家、专业管理人才和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蒙受耻辱），这一切都大大延缓了中国的发展。最后，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对抗性外交政策以及它同几乎所有邻国都发生军事冲突，意味着还不得不从国家本已短缺的资金中拨出很大一部分作为军事费用。

从经济上看，文化大革命期间，并非一无可取之处，它至少强调了农村地区的重要性，促进了小规模的工业并改进了耕种技术，给予农村基本的医疗和社会照顾。但要大大增加国民生产，必须实行进一步的工业化，改善基础设施并进行长期投资，使文化大革命停息下来，增加同美国、日本和其它经济发达国家的贸易，才有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中国自己的煤炭和石油资源，同它的许多贵重矿藏一样，正迅速得到开采。到1980年，它的钢产量达3700万吨，大大超过了英国或法国，但其现代能源消耗，却两倍于任何一个欧洲的领先国家。也是1980年，它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已上升5%（1973年为3.9%），接近于西德。近年来的猛增也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党的领导不得不进行调整，降低国家“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而且值得重复一提的是，中国的财富或产值的任何统计数字，只要按人口平均计算，它的相对的经济落后性就又会暴露出来。尽管有这些缺陷，但人们还是逐渐清楚地看到，这个亚洲巨人终于行动起来了，并决心建立同它打算扮演的大国角色相称的经济基础。

尼克松在他1971年7月的讲话中，认为第5个经济实力地区就是“西欧”。显然，谈起西欧，似乎更多地表述地理概念，而不象中国、苏联和美国那种统一的、咄咄逼人的强国。西欧本身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意——它可以指苏联统治范围以外的所有国家（因此也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希腊和土耳其）；它也可指原先（或扩大了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至少还拥有的公共机构框架；或通常用作昔日列强（英、法、德、意）的简称。美国国务院在制定对苏联或中东的某种新政策之前，也许需要同这些大国进行磋商。尽管如此，仍不能排除“欧洲”一词在语义学上发生混乱的可能性，因为长期以来，英国人认为“欧洲”的形成始于英吉利海峡彼岸；此外，还有许多主张种族平等，献身于欧洲一体化的欧洲人（再加上德国的国家主义者），他们把战后欧洲的划分看成是临时状态，认为两边的国家终将结合成某种较大的联合体。因此，在政治上和宪法上，只能把“欧洲”或甚至“西欧”一词用作修辞手段——一种模糊的文化——或地理概念了。

不过，从经济上看，这些年来欧洲各国的经历确有某种基本类似之处。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持续的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到1949～1950年，大多数国家已恢复到战前的生产水平，某些国家（当然，特别是战时的中立国）还大大领先。此后，制造业产量逐年增加，出口额空前增长，就业率显著上升，可支配收入和投资资本达到历史的高水平。结果使欧洲成为世界上除日本外发展最快的地区。“1950～1970年间，欧洲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约5.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4%，而相应的世界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和3%。工业生产上升更快，年增长率为7.1%，而世界增长率则为5.9%。因此，到1970年欧洲的人均产量几乎比1950年多2.5倍。”有趣的是，这种增长遍及欧洲大陆各个地区——在西北欧的工业中心，在地中海地区，在东欧，甚至呆滞的英国经济在这个时期也以超过它以往几十年的速

度迅速增长。因此，毫不足怪，本世纪初以来，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相对下降的地位很快开始提高。“1950年至1970年间，欧洲在世界商品和服务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37%升至41%，在工业生产方面，增长率还要高，从39%升至48%。”中央情报局1960年和197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应承认所依据的统计资料是有争议的），“欧洲共同体”在世界总产量中的比重甚至比美国还要大，为苏联的两倍。

欧洲经济复兴的原因，如略加思考，是完全不出乎意外的。长期以来，欧洲大陆许多国家遭受侵略，长期战争和外来占领的痛苦，城市、工厂、公路和铁路遭到轰炸，封锁造成了食物和原材料短缺，成百万人被动员参军，成百万牲畜被屠宰。甚至在战前，欧洲经济的“自然”发展（即随着新的能源和生产资源出现，新的市场产生和新的技术传播，经济一个一个地区地逐步发展）就已受到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强权国家”的破坏了。日益增高的关税壁垒使商品供应国和市场相隔离。政府补贴使无能的公司和农场在外国竞争面前受到保护。越来越多的国家收入被用于军备开支而不是用于商业企业。因此，在这种“封锁，阻遏，自给自足，民族经济和损人利已的气候中”，欧洲的经济不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1945年后，不仅有“新欧洲人”如莫内、斯帕克、哈尔斯坦等决心创立可避免过去错误的经济结构，而且还有一个乐于助人和仁慈的美国，愿意作为一种合作事业（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其它援助方案）为欧洲的复兴提供资金。

这样，由于战争和政治的原因，而受到挫伤和不能充分利用其经济潜力的欧洲现在已有机会来弥补这些缺陷了。无论欧洲大陆的东部，还是西部都有决心要“重新进行建设”，并愿意从30年代的蠢事中吸取教训。不管是凯恩斯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计划，都极力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旧的结构崩溃（或失去信誉）已使革新比较容易了。美国不仅按马歇尔计划给予数十亿美

元的援助——欧洲人形象地称之为“及时雨，雪中炭”——并且还向欧洲国家提供了国防保护伞。(英国和法国在朝鲜战争年代里及其非殖民化前时期里，防务耗费巨大。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英、法及其所有邻国势必将本已短缺的国家资源更多地用于军备。) 由于贸易壁垒减少了，公司和个人就可以在更广阔的市场上发展企业。特别是发达国家（这里指欧洲国家）相互的需求更大，所以它们之间的贸易总是比同其他地区的贸易更为有利可图。因此这几十年来，如果说欧洲的“对外”贸易比其它一切都增长得更快的话，那主要是因为在邻国之间的买卖做得更多了。1950年后的一代人的时间里，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当于此前一个半世纪增长的总和。这种社会经济变化的速度是惊人的：西德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的劳动人口从1950年的24.6%降至1973年的7.5%，同期法国从28.2%降至12.2%（1980年降至8.8%）。可支配收入随着工业化的普及而迅速增加，西德人均收入从1949年的320美元猛增至1978年的9131美元，意大利则从1960年的638美元猛增至1979年的5142美元。西德每千人拥有的汽车数量从6.3辆（1948年）增至227辆（1970年），法国从37辆增至252辆。无论怎样衡量，尽管也有地区差别，但事实清楚地表明，他们获得了很实在的收益。

如果观察每个欧洲强国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方面是普遍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多样的变化速度及其影响——这两种现象的结合。新闻工作者夸张地把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南发生的事件称之为“意大利奇迹”，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在1948年后以相当于战争时期近3倍的速度急剧增长，实际上，直至1963年，意大利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除日本和西德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1963年，增长速度减慢了。但回顾起来，也许这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意大利始终是欧洲“四强”中最不发达的国家，换言之，它的发展潜力过去未曾充分挖掘出来。意大利的制

造商摆脱了荒谬的法西斯经济政策，并大大受益于美国的援助，充分利用本国较低的工资费用和设计方面的盛名，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出口业，特别是向共同市场的出口。水力发电和廉价进口的石油弥补了本国煤炭供应的不足。汽车制造对经济是一付很强的兴奋剂。由于国内消费水平提高，汽车制造厂菲亚特多年来在国内市场上占领先地位，为向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出口倾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除传统的制成品，如鞋类和高档服装之外，现在又增加了新的产品。60 年代，意大利的电冰箱销售量超过了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但这些成就无论如何还不能说已十全十美。意大利南北之间的差距仍长期存在。在内地城市和较穷困的乡村地区，社会环境比北欧要差得多。政府不稳定，巨大的"黑市经济"，高额的国家赤字，再加上超过一般水平的通货膨胀率，都影响里拉的价值，并表明这种经济复兴是很脆弱的。只要在全欧洲就收入或工业化进行比较，那么意大利每次都比不过更先进的邻国，但如在增长率方面进行比较，情况则好得多。这就是说，意大利的起点是落后一大截的。

对比之下，英国在 1945 年时是遥遥领先的，至少在欧洲大国中是如此。这也许是英国在随后的 40 年里经济相对衰退的某种缘由。也就是说，既然它（象美国一样）并没有受到战争很大的破坏，它的增长率就不会象那些经过多年军事占领和破坏刚刚恢复的国家那么高。至于在心理方面，如上所述，英国没有被打败，它仍然是波茨坦"三强"之一，它重新得到了它作为世界帝国的一切，这一事实很难使英国人看到有什么必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激烈的改革。战争非但没有产生新的机构，而且还保留了传统的体制，如工联、文官制、古老的大学等。1945～1951 年工党政府虽然推行国有化和建立"福利国家"的计划，但对经济实践和经济工作观念并没有根本改变。英国自信在世界上仍占据特殊地位，继续依靠所窃取的殖民地市场，为保持英镑价值而斗争，但

结果是徒劳的。英国在海外维持大批驻军（耗费了大量金钱），不参加争取早期欧洲的统一活动，除美国外，它的防务开支大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所有其他大国。

1945年战后初期，由于其他国家更加衰弱，而英国却审慎地退出印度和巴勒斯坦，出口暂时高涨，以及在中东和非洲保持了帝国地位，这一切部分地掩饰了英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脆弱。因此，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时英国蒙受的羞辱是对它的沉重打击，因为这不仅暴露了英镑的软弱，而且也暴露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在美国不同意的情况下，英国就不能在第三世界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可以说在有些方面英国衰落的现实仍然被掩饰了，例如，在防务上，1957年后它采取了依靠核威慑的政策，这比大规模的常规军要省钱得多，而且还可以继续保持大国的地位；在经济上，英国50年代和60年代普遍的经济繁荣。它的增长率几乎是欧洲最低的，但无论如何还是比前几十年的发展要强一些，所以麦克米伦就可以向英国选民宣称："你们的景况从来没有这么好！"从可支配收入或洗衣机和汽车的数量来衡量，这样的判断从历史上来说是正确的。

同其他进步更快的地区相比，英国似乎是患了德国人不客气地称作的"英国病"——即好斗的工会，糟糕的管理，政府的通货膨胀与紧缩迅速交替的政策，对艰苦工作和企业家精神传统的否定态度等等。新的经济繁荣带来了进口高潮，英国大量进口了设计较好的欧洲产品和廉价的亚洲商品。从而导致国际收支困难，英镑危机和货币贬值，结果加剧了通货膨胀，提高工资的要求更加强烈。英国政府在不同时期采取了控制物价，制定增加工资法规，紧缩财政等措施来制止通货膨胀，并为持续增长创造正常条件。但这些措施很少能长期行之有效。英国的汽车工业逐步被外国竞争者削弱，一度繁荣的造船业几乎完全靠海军部的订货来发展，电器和摩托车制造商发现已失去竞争力。在这种趋势下也有

一些公司明显地例外（如帝国化学工业公司），伦敦中心商业区的金融业保持不衰，零售业仍然实力雄厚——但是英国的工业基础已无情地受到侵蚀。英国 1971 年参加共同市场并没有获得所期望的万灵药方，因为一方面受欧洲经济共同体昂贵的农业价格政策的束缚，另一方面打开了英国市场之后制造业面临了更大的竞争。北海石油也说不上是什么天赐之财：它给英国带来大量外汇收入，但却使英镑价格猛涨，从而损伤了制成品的出口。

从经济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到贝罗克所说的“英国工业的加速衰退”。英国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 1953 年的 8.6% 下降至 1980 年的 4%。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迅速减退，从 19.8%（1955 年）到 8.7%（1976 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在 1945 年为世界第三位，已被西德超过，后又依次被日本和法国超过。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逐步被许多较小但较富的欧洲国家超过，到 70 年代后期，更接近于地中海各国而不是西德、法国或比荷卢三国了。的确，英国（无论是在世界贸易还是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大都是由于在前几十年里特殊的技术和历史情况使它得到不相称的大量世界财富和贸易，而现在这些特殊情况都不存在了，其它国家又能开发自己的潜力来实现工业化，所以英国相对地位的下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否应下降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快，则是另一个问题。至于它与欧洲邻国相对而言是否会再进一步下降，同样也很难说。80 年代初，这一下降势头似乎趋平而稳定了，英国仍为世界第六经济大国，且拥有雄厚的军事力量。不过，同劳埃德·乔治时代，甚至同 1945 年的克莱门特·艾德礼时代相比，今日英国无论如何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中等强国，称不上泱泱大国了。

当英国经济正在相对衰退中萎缩时，西德却正出现“经济奇迹”。这里应再次强调，相对来说，这种发展，也是“理所当然”的。联邦德国甚至在被肢解的状态下，还拥有欧洲最发达的基础

设施，巨大的国内资源（从煤炭到机床厂），人民受教育的程度很高，经理、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力量特别强大，东德来此移居的人才大大增强了这支科学队伍的力量。在过去半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里，由于德国军事机器的需要，经济力量畸形发展。现在国家的能力（象日本一样）可以完全集中在商业成就上，唯一的问题就是恢复的程度。德国的大企业，曾相当顺利地适应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以及纳粹统治的需要，现在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并学习美国的管理思想。大银行再次在工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化学和电气工业很快又重新作为欧洲的工业巨人出现。取得巨大成功的汽车公司，如大众汽车公司和默塞德斯公司在同数以百计的小供应厂商竞争中，必须取得"收益增殖效果"。由于出口猛增——德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仅次于美国——日益增多的公司和地方团体都需要引进"客籍工人"以满足对非熟练劳动的紧迫需求。德国经济又一次——百年来的第三次——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力量源泉。

从统计数字上看，德国在不断地获得成功。1948～1952年间，工业生产增长110%，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提高67%。德国总投资额达到欧洲最高水平，因此德国公司可随时得到资本而大大受益。钢产量在1946年实际上等于零，但很快就达到欧洲最高量（1960年为3400万吨以上），而大多数其它工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德国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欧洲首位。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52年只有320亿美元，10年之后达欧洲最高额(890亿美元)，70年代后期已超过6000亿美元。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60年为数不多，只有1186美元（当时美国为2491美元），到1979年就已达令人赞叹的10837美元——超过了美国的人均数9595美元。出口顺差逐年增加，德国的马克需要不断向上调整，已成为一种储备货币了。西德人面临有更高效率的日本人的竞争自然也有所担心，但它无疑是"贸易大国"中第二个最

成功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同它的40%的领土和3.5%以上的人口相分离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就，就更令人印象深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虽然有成百万有才能的劳动力流失到西方，但仍然很快就表明，在东欧所有国家中（包括苏联在内）它的人均产量和工业化程度是最高的。如果有可能回到1937年时的边界，一个统一的德国将再次遥遥领先于欧洲所有经济对手，也许同大得多的苏联相比也不会落后很多。

正是由于德国被打败被分割，由于它的国际地位（以及柏林的地位）继续受"条约大国"的控制，它的经济实力才没有转变成政治权力。联邦共和国对东德人抱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所以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之间关系的冷暖特别敏感。它同东欧和苏联的贸易量最大，一旦再次发生战争，很明显，它又将处于前线。苏联和法国（仅稍次于前者）对"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任何迹象都感到惊恐，这意味着德国决不可能成为一个核大国。它对邻国如波兰人和捷克人感到愧疚，在苏联面前表现软弱，深深依赖于美国，以感激的心情欢迎戴高乐提出的法德特殊关系，但却很少感到能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去控制法国独断的政策。西德人对自己的过去怀有深刻的心灵上的矛盾，所以很高兴别人把自己看成是国际事务中的好成员，而不是决定性领袖。

这种情况同法国在战后世界中的作用，或更确切地说，同法国在1958年戴高乐掌权后世界中的作用形成鲜明的对比。上面已经提到，莫内领导下的计划制定者在1945年后希望取得的经济进步，受到了殖民战争、政党政治动荡和法郎疲软的严重影响。但在印支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法国的经济迅速增长。几十年来它的人口第一次得到增长，从而刺激了国内需求。法国是个富饶，多样化，但却是半发达的国家，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它的经济就处于停滞状态。只是由于和平的到来，美援的输入，公用事业的国有化，以及广大市场的刺激，它的经济才

得以增长。此外，法国（象意大利一样）工业化的人均水平相对低下，因为在法国经济中，小城镇和农业所占比重较大，这意味着工业化方面的增长是十分显著的：从 1953 年的指数 95 到 1963 年的 167，到 1973 年的 259（与联合王国 1900 年的指数为 100 相对比）。年均增长率在 50 年代达到 4.6%，60 年代猛增至 5.8%，这是由于参加了共同市场，受到促进所致。共同市场的特殊安排不仅保护法国的农业不受世界市场价格的影响，而且为它在欧洲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西方的普遍繁荣有助于法国传统的高增殖货物（服装，鞋类，酒，珠宝）的出口，现在又增加了飞机和汽车。1949～1969 年间，汽车生产增长 10 倍，铝 6 倍，拖拉机和水泥 4 倍，铁和钢 2.5 倍。法国虽然工业不发达，但始终是相对富有的，到 70 年代，它就更加富有了，而且总的看起来更加现代化了。

不过，法国经济的发展决没有它的莱茵河对岸的邻国那样具有广泛的工业基础，蓬皮杜总统希望他的国家很快能赶超西德，但这种愿望毫无实现的可能。除了电气，汽车以及航天工业等某些显著的例外，法国的大多数公司都仍然是小型的、投资不足的，产品与德国的相比，价格过高。虽然实行了农业"合理化"改革，还是保留了许多小农田——实际上是靠共同市场的补贴政策来维持的。法国农村所承受的压力，再加上工业现代化（关闭老的炼钢厂等）造成的社会紧张状态，使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爆发，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 1968 年的骚乱。法国的燃料供应贫乏，严重依赖石油进口，而且（虽然它制定了野心勃勃的核能计划）它的国际收支也随着世界石油价格的起落而大幅度波动。它同西德的贸易逆差逐步增大，不得不对德国马克实行定期的（即使难堪的）贬值——与美元法郎汇价的失控波动相比，这样做对于保持法国经济地位，恐怕是更为可靠的措施。即令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时期，法国的经济也还存在某种危险性——经济遇到冲击

的情况下，就有许多精明的资产阶级携带家庭储蓄到瑞士去。

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4%，可是它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却总是大大超过它的实力地位——这种情况不仅在戴高乐任总统期间是如此。这也许是由于民族文化上绝对的过于自信造成的，而且恰恰遇到一个英美影响减退，苏联越来越失去吸引力而德国又很谦逊的时期。如果西欧的确应有一个领袖和发言人的话，那么，比起孤立主义的英国人或被征服的德国人来，法国是个更为突出的候选人。而且，历届法国政府都很快地认识到可以说服共同市场采取一种特殊路线以加强法国不大的实力，例如在农业税，高技术，海外援助，联合国中的合作，对阿以冲突的政策等等方面，法国善于利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共同市场，使之作出有利于巴黎的路线决策。而当情况需要时，法国却可以完全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不受这一切的约束。

这4个欧洲大国，在这几十年来财富和生产全都增加了，而它们的邻国较小，因此不能保证永久的幸福。最初，想实行紧密的政治上、宪法上一体化的希望，在成员国仍很强烈的民族主义面前破灭了。首先表现这种民族主义的是戴高乐的法国，接着那些小心翼翼较晚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国家（英国，丹麦，希腊）也表现了这种情绪。经济上的争端，特别是关于农业补贴政策的高昂费用问题，往往使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会议讨论陷于僵局。中立的爱尔兰参加共同体后，不可能达成一项共同防务政策，这一任务只得留待北约组织进行（法国现已退出其指挥机构）。70年代石油涨价的冲击对欧洲的打击特别严重，最初的乐观主义情绪冷了下来；人们普遍感到惊慌，布鲁塞尔方面也作了不少谋划，但看来还是难于实行高技术政策以对抗日本和美国的挑战。虽然欧洲经济共同体面临许多困难，但它的经济规模本身，就意味着现在的国际局势与1945年或1948年时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经济共同体是世界商品最大的进口商和出口商（虽然

其中多数是欧洲内部的贸易)，到 1983 年，它拥有最多的国际货币和黄金储备；它制成的汽车（占世界产量 34%）超过日本（占 24%）或美国（占 23%），水泥超过所有其它国家，它的粗钢生产仅次于苏联。1983 年，它的总人口大大超过美国，几乎完全与苏联相等——各有 2.72 亿——拥有 10 个成员国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大大超过苏联或所有经互会成员国。如果说欧洲共同体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还未成熟的话，那么，与 1956 年相比，它现在在世界经济均势中已是一个强大得多的力量了。

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苏联的发展情况可以说几乎是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这几十年来，苏联不仅保持了一支强大的陆军，并且在核战略方面同美国并驾齐驱，它发展了远洋海军，在世界各个地区扩展自己的势力。苏联拼命争取在世界舞台上与美国平起平坐，可是这同它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强调生产基础在决定事物中的重要性)，自称是世界上最初的共产主义国家，却随着时间的推移遭到日益增多的经济困难。

这并不否定斯大林晚期时代以来苏联和整个苏联统治下的集团国家取得的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经济进步。在这几十年里，这个地区在许多方面比西欧的变化更大，虽然这可能主要是由于起步时很穷，“不发达”的缘故。不管怎样，从粗略的统计数字来衡量，收益是很可观的。苏联的钢产量，在 1945 年仅为 1230 万吨，1960 年猛增至 6530 万吨，1980 年达 14800 万吨（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钢国)；发电量在同期由 4320 万瓩／小时增至 29200 万瓩／小时，后又增至 129400 万瓩／小时，汽车产量从 7.4 万辆跃至 52.4 万辆，后又跃至 220 万辆；而在这张产品增加单子上还可以无限地添加上去。工业总产量在 50 年代每年平均增加 10%以上，假定 1953 年的增长为 100，那么到 1964 年则为

421，这是惊人的成就——正如人造地球卫星，宇宙空间探索和军事装备那样，突出地显示了苏联杰出的才能。到赫鲁晓夫在政治上垮台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已比斯大林统治时期繁荣得多，基础广泛得多，而且绝对收益稳步增长。

不过，有两个严重的缺陷开始对这些成就投上阴影。首先是增长率长期的逐步降低，1959 年以来工业产量逐年从两位数的增加越来越下落，到 70 年代后期已落到每年 3～4%，并且还在下降。从历史上看，这是很自然的发展过程，因为现在已经很清楚，最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年增长率主要是大量投入劳动和资本的结果。当现有的劳动力储备已开始被充分利用后（同时要与武装部队和农业的需求相竞争），增长的速度就不得不放慢。至于资本投资，主要是投向大型工业以及与国防有关的生产，于是重蹈覆辙强调数量而不是质量的增长，并使许多其他经济部门投资不足。虽然赫鲁晓夫和他的继任者们提高了一般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但苏联的个人消费是被有意识地控制在低水平以便保存国家资源用于重工业和军事方面，所以消费需求就不可能（象西方那样）刺激经济的增长。也许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长期影响苏联农业的结构上和气候上的弱点了。尽管苦恼的苏联计划工作者和他们的部长们对农业全力以赴，慷慨投资，但农业的净产值还是从 50 年代的每年增长 4.8%降到 60 年代的 3%和 70 年代的 1.8%了。如果考虑到农业部门在苏联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它的人口在 1950 年后的 30 年里增加了 8400 万这一事实，那么，人均国民生产总的增长大大低于工业生产的增长率，说明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强制性”的成就。

第二个严重缺陷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即苏联相对的经济停滞。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苏联在世界制造业产量和世界贸易中的比重都在增加，赫鲁晓夫宣称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并总有一天会“埋葬资本主义”，似乎还有点道理。但自那时以后

的趋势越来越使克里姆林宫担忧。欧洲共同体在它的工业"半巨人"西德的带领下，已经比苏联富有得多，生产能力也大得多。小岛国日本发展十分迅速，它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超过苏联只是时间问题而已。美国虽然工业相对下降，但在总产量和财富方面仍保持领先地位。普通的苏联人及其东欧同志的生活水平和西欧人的差距并没有弥合，马克思主义经济体制下的人民对西欧抱有羡慕的心理。在新技术如计算机，机器人，电信等方面，暴露出苏联及其卫星国力量薄弱，处于无法竞争的地位。而农业生产力仍然是低下的：1980 年，美国一个农业工人生产的粮食足够供应 65 人，而他的苏联同伙生产的粮食却只够供给 8 人。这就使困恼的苏联不得不进口日益增多的食品。

苏联本身的许多经济困难在其卫星国中都能看到相同的反应。这些卫星国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的增长率也很高，不过与西方相比，起点仍然较低；经济发展重点同样强调集中计划，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东欧国家之间在繁荣和增长的程度上虽有很大差别（现在也仍然如此），但总的趋势都是经济最初膨胀扩张，然后收缩、衰退——使马克思主义的计划者左右为难，无所适从。苏联可以开荒，增加耕地，但北方冬季的生态环境和南方不毛之地限制了发展的可能性（令人很容易想起赫鲁晓夫信心百倍开垦的"处女地"如何很快地变成了风沙干旱地带）；同样地，广泛开发自然资源，如开采石油储藏有冒效率日益下降的危险，因为开采深入到永久冻土地带时，采掘费用就迅速上升了。可以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工业和技术，但却要把用于国防或消费品生产的资金拨出作为代价，而国防是苏联的头号重点，不管领导人如何变换也都是如此，轻视消费品生产又很不得人心（特别是在东欧），因为这时先进的通讯系统已使人们对西方相对的繁荣看得非常清楚。最后，苏联及其共产党伙伴的政权可以计划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不仅仅是根除腐化和打击官僚主义之类的经常性改

革，而是改革制度本身，提供个人刺激，引进更为现实的价格结构，允许个体农业发展，鼓励公开辩论以及以企业家精神发展新技术领域等等，换言之，就象匈牙利在 70 年代巧妙实行的那样，去追求"可怕的资本主义"。正如捷克 1968 年的经历所表明的，要实行这种战略的困难在于"自由化"措施使共产党"统治的"政权本身成了问题——所以在警惕性很高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理论家和军方对这种策略都是很不满意的。因此，扭转相对的经济衰退，必须小心从事，但这样一来就不大可能获得显著的成功了。

也许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们的第一对手美国从 60 年代以后也似乎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它正在迅速失去 1945 年在世界财富、生产和贸易中占有的相对比重。当然，要了解美国的相对衰退最重要的就是应提到 1945 年。正如前所述，在那个历史关头，美国优越的经济地位既是空前的，也是人为的。它之所以处于世界之巅，部分原因在于它本身的生产激增，但也是由于其它国家暂时还处于虚弱状态。随着欧洲和日本恢复了战前的生产水平，这种局势就会转而对美国不利；当世界制造业普遍扩大后（1953～1973 年间增加 3 倍多），形势还将进一步变化，因为当全世界都在建立新的大小工厂时，不可能想象美国还能保持它 1945 年时的一半份额。根据贝罗克的估算，到 1953 年，美国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百分比已下降到 44.7%；到 1980 年，为 31.5%，并且还在下降。大概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央情报局的经济指数表明，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 1960 年的 25.9%下降至 1980 年的 21.5%（虽然美元在货币市场中短暂的升值能使今后几年的比重增加）。问题的要害并不是美国的生产大大减少了（除西方世界工业普遍衰退之外），而是在于其它国家的生产大幅度增长。汽车生产也许最能说明构成这一事实的两种趋势：1960 年，美国生产 665 万

辆汽车，占世界汽车产量1280万辆的很大比重，即52%；到1980年，世界总产量为3000万辆，所以尽管美国生产的绝对数字已增至690万辆，但只占世界产量的23%。

也许这可聊以自慰——同70年前英国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时曾经聊以自慰一样——但这一发展前景有其令人担忧的一面。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美国必定要相对衰退吗?”而是“它必得**如此迅速**衰退吗?”因为事实是，甚至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全盛期，由于令人不安的人均生产年增长率的低下而已经使它的竞争地位下降了（特别是同以前的几十年相比，见表42）。

表42 人均产量平均年增长率（1948～1962年）

	1913～50	1948～62
美　国	1.7	1.6
联合王国	1.3	2.4
比利时	0.7	2.2
法　国	0.7	3.4
联邦德国	0.4	6.8
意大利	0.6	5.6

这里又一次论证了这是一种历史上的“自然”发展。迈克尔·鲍尔弗指出，在1950年前的几十年里，美国产量的增长比任何国家都快，因为它是标准化方法和大规模生产的主要创新者。结果，它“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能进一步地满足人类的需求并已经在高效率水平上进行生产（从每人每小时产量的角度衡量），所以同其他国家相比，用更好的方法或更好的机器增加产量的现有的可能性是较小了。”事实虽的确如此，但美国经济中出现的某些长期趋势，对美国并没有好处：财政和税收政策鼓励高消费，但同时带来了个人低储蓄率；与其他国家相比，除用于军事目的外，用于研究和开发的投资逐渐下降；而国防开支在国民产值中所占的比例，比西方集团任何国家都大。此外，越来越多的美国

人口从工业转向了服务业，也就是说，转向了低生产率领域。

在50年代和60年代，上述经济趋势被一系列事实所掩盖：美国高技术（特别在空间领域取得惊人的进展；高度的繁荣促进了对豪华汽车和彩电的消费需求；美元以外援、军费或银行和公司投资的形式从美国流向世界贫穷地区。在这方面回忆一下60年代中期瑟万—施赖伯所谓的"美国的挑战"是有教益的。当时"美国的挑战"引起了普遍的惊慌——美国向欧洲大量投资（继而扩展到其他地区），据说把这些国家变成了经济卫星国；埃克森和通用汽车公司等跨国公司引起了人们的畏惧与憎恨；但与这些趋势相联系的是人们对美国商业学校倡导的先进的管理技术表示敬佩。从某种经济的观点看来，的确，美国投资和生产的这种转移是经济力量和现代进步的标志；它利用低廉的人工成本优势保证自己能有更多的机会打入海外市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流量最终变得如此之大以致开始超过美国人在出口工业制品，食品和"无形"服务方面所赚得的盈余。虽然50年代后期这种日益增长的国际收支逆差的确使美国黄金外流，但大多数外国政府还是乐于持有更多的美元（已成为主要储备货币）而不要求支付黄金。

但进入60年代后，这种顺利的局面就消失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比前者更甚）都愿意增加美国海外军费开支，而且不仅限于越南，尽管越南冲突已使流水般的美元出口泛滥成灾。同时肯尼迪和约翰逊（比前者更甚）都亟力增加国内开支，这种增加趋势在1960年以前就已经有了苗头。两届政府都不愿为增加税收付出政治代价以补偿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结果，联邦政府每年都有赤字，物价飞涨，美国工业日益失去竞争力——这一切又导致更大的国际收支逆差，（约翰逊政府）扼制了美国公司的国外投资，于是后者转为新的欧洲美元。同期，美国在世界（非经互会）黄金储备中所占比重急剧下降，从68%（1950年）降至仅

27%（1973年）。整个国际支付和货币流通体系都在这些问题相互影响之下动荡起伏，而这种情况又因戴高乐愤怒反击他所谓的美国“出口”通货膨胀而进一步恶化，此时尼克松政府发现别无他择，只有使私人市场美元和黄金脱钩，然后使美元对其它货币的比价浮动。由此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美国财政处于顶峰时代的产物由于其主要支柱现已不能再承受压力而垮台了。

70年代美元自由浮动的详细情况，以及历届政府在政治上不造成太大痛苦的情况下努力控制通货膨胀和刺激增长所走的曲折道路，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70年代，美国高于平均指标的通货膨胀往往使美元对德国和日本货币疲软。80年代初期，对严重依赖欧佩克供应石油的国家（如日本，法国）造成损失的石油冲击，世界各地的政治骚乱，以及美国的高利率都驱使美元升值，虽然这些摇摆不定的现象很重要，有增加全球经济不稳的倾向，但比较起来，对我们的目的可能不太重要，而具有更重大意义的是一种始终不断的较长期的趋势，这就是日益降低的生产增长率，在私人部门从2.4%（1965～1972）降至1.6%（1972～1977）再降至0.2%（1977～1982）；以及日益增长的联邦赤字，可以看到它给经济一种凯恩斯主义的“促进”，但代价是从国外吸取大量现金（被美国较高的利率所吸引），以致美元价格达到人为的高度，使国家从净债权国变成净债务国；此外，美国制造商在同进口的汽车，电器，厨房用具和其它制成品进行竞争方面已日益困难。因此，毫不奇怪，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度曾为世界上最高的，现在已开始从名单上往下降了。

对于那些不把美国同瑞士收入或日本生产率作有选择的比较，而从较大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经济及其需求的人来说，那么仍旧能感到一些安慰。卡列奥指出，1945年后的美国政策确曾达到某些基本的重大的目标：同30年代的不景气对比国内实现了繁荣，在不发生战争的条件下遏制了苏联的扩张主义；西欧经济

——和民主传统——得以复兴，后来日本又参加进去创造了“一个日益一体化的经济集团，”“有一系列多边机构……管理共同经济和军事”；最后，是“老的殖民地帝国变成独立国家，仍同世界经济紧密结合”。总之，美国保住了自由的国际秩序，并日益依赖于它。虽然美国在世界生产和财富中所占的比重已经降低，也许比应有的速度降低得更快，但是，全球经济均势重新分配所造成的环境，对于它的开放市场和资本主义传统还是过于不利。最后，美国虽看到它在生产方面的领先地位由于某些增长得更快的经济而不断下降，但是，它在真正国家实力的几乎一切方面都仍然大大超出苏联，并且——由于坚持遵循自己的企业经营的信念——仍可通过管理方面的首创精神和技术要求的刺激而有所发展，而它的马克思主义的对手在接受这些事物时困难就大得多。

较详尽地探讨这些经济活动的影响，有待最后一章来进行。但对上面研究过的与全球经济均势有关的趋势，以统计的形式（参见表43）表示其实质还是有帮助的。这些趋势是：不发达国家部分地恢复了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引人注目的发展，不过中国的发展程度较低，欧洲经济共同体虽然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集团，但其比重已不断下降，苏联的比重稳定，但后来又缓慢下降，美国的下降更快，但仍拥有强大得多的经济力量。

的确，到1980年，即表43中的最后一年，世界银行人口数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本身，都显示出世界经济均势有**多极化**的分配趋势，如表44所示。

表 43　各国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份额（1960～1980 年）

(单位：百分比)

	1960	1970	1980
不发达国家	11.1	12.3	14.8
日本	4.5	7.7	9.0
中国	3.1	3.4	4.5
欧洲经济共同体	26.0	24.7	22.5
美国	25.9	23.0	21.5
其他发达国家	10.1	10.3	9.7
苏联	12.5	12.4	11.4
其他共产党国家	6.8	6.2	6.1

表 44　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1980 年)

	人口(百万)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	国民生产总值(10 亿美元)
美国	228	11360	2590
苏联	265	4550	1205
日本	117	9890	1157
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中 12 个国家)	317	—	2907
西德	61	13590	828
法国	54	11730	633
联合王国	56	7920	443
意大利	57	6480	369
东西德合计	78	—	950
中国	980	290 或 450	284 或 441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生产均势中的这些长期变动本身并不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它们对实力政治的影响。正如列宁自己在1917～1918年所指出的，各国经济增长率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某些特定的强国的兴起和另外一些国家的衰落：半个世纪以前，就资本主义力量来说，德国同当时的英国相比，是个可怜的微不足道的国家。日本同俄国相比也同样是微不足道的。能够“想象”在10年或20年后帝国主义强国的相对力量仍然不改变吗？绝对不能想象。

列宁虽然是针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而言，但是这个规律看来适用于**所有的**国家，不管它们喜欢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平衡的经济增长率迟早都会导致世界政治和军事均势的变动。这无疑就是本世纪以前4个世纪中大国发展的模式。由此得出结论，在过去20或30年中世界生产中心发生的不寻常的迅速变动不能不对当今领先强国宏观战略的未来产生影响，对此，完全值得用最后一章来加以研究。

第八章　走向21世纪
历史和推测

这一章的标题意味着不仅到了一个新的年代，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论述的方法。哪怕是刚刚消逝的过去，也叫做历史，但出于偏见和资料困难，即使写前十年事件的历史学家也“难于区分暂时的现象和根本的规律”，尽管如此，历史学家仍遵循同样的学术原则，可是论述当今如何向未来演变的著作，即使所研讨的趋势眼下已经发生，也不敢声称掌握了历史真理。不仅因为档案中的原始材料包括专题论著、经济预测和政治估计要变化，而且所写的东西是否确凿也难于设想。在处理“历史事实”中尽管有许多方法论方面的困难，但诸如奥国皇太子被刺或军事失利之类的历史事件毕竟确有其事。而对于未来的任何事情，则不可能说得那么肯定。预见不到的事态、偶然的事故、发展趋势中止等等都可以毁掉最有可能的预测，假如不是这样，那么预言家就太幸运了。

下面谈的只能是建立在对当前全球经济和战略趋势合理推断基础上的假设和预测，但不能保证这一切（或其中任何一点)都会发生。过去几年美元国际市场价格起伏波动以及1984年后石油价格暴跌（对苏联、日本、石油输出国组织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都是前车之鉴，告诫人们不要凭经济动向作出结论。何况世界政治和外交从来不是直线发展的。许多著作中论述当代事务的最后章节仅仅几年之后就必须根据事后的认识加以修正。如果本

书这一章平安无恙，那才真是意想不到的了。

也许展望未来的最好方法是概略回顾过去 5 个世纪大国的兴衰。本书的一个论点是，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世界变化的主要原动力，尔后它影响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以及各个国家和帝国的地位。全球经济变化的速度并不始终如一，因为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本身是参差不一的，受发明家、企业家所处的环境以及气候、疾病、战争、地理位置、社会结构等等条件的制约。同样，全球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的发展也有快有慢，不仅取决于技术、生产和贸易的变化方式，而且取决于对增加生产和财富的新方式的接受能力。当世界上某些地区进步的时候，其他地区就在相对地或（有时）绝对地落后了。这一切毫不足奇。因为努力改善生活条件是人的本能，所以世界永远不会停止不前。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思想文化突破，经过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时期出现的“精密科学”又进一步得到提高，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变化的原动力自身总在持续不断地发展，比以往变得愈来愈强大。

本书第二个主要论点是，经济增长速度不平衡对于世界各国相对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地位具有长期重大的影响。这也是毫不足奇的，而且这一论点过去曾经多次谈论过，只是强调的重点和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世界不需要等到恩格斯时代到来才懂得“再没有比陆军和海军更需要依赖经济条件的了”。今天的五角大楼，象文艺复兴时代的君主一样，都很明白军事力量有赖于充足的财富支援，而财富又来自繁荣的生产、兴旺的收入和优良的技术。如上所述，经济繁荣并不**总是或立即**转化为军事战斗力，因为这还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如地理条件、民族精神到指挥才干和战术能力。然而事实表明，一切世界**军事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都是**生产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后的必然结果。而且国际体系中各个帝国和国家的兴衰无不取决于主要大国战争的结局，胜利永远属于拥有最大物质资源的一方。

既然下面要讲的是推测而不是历史，因此推测只能建立在可望实现的假设基础之上，这里的假设是，过去5个世纪的大趋势将会继续下去。国际体系，不管一时由6个大国来控制或只由两个大国来控制，一直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说，除拥有主权的、利己的、民族国家之外，别无更大权威。在每个特定时期这些国家根据其**相对**的长期实力，有的前进，有的退缩。1987年或2000年的世界大概不会停滞在1870年或1660年的状态。恰恰相反，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当前国际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比以往任何时候变化得更快：农产品和原料产品失去相对价值，工业“生产”与工业“就业”脱钩，知识密集型商品在一切先进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世界资本流量日益与商业形态分离。所有这一切，连同科学上的许多新发展，必将影响国际事务。总之，除非上帝干扰或者爆发一场核灾难，技术和经济发展实质上仍然是促进世界力量变化的原动力。如果关于计算机、机器人、生物技术等的作用的乐观估计是正确的，再加上关于部分第三世界的“绿色革命”成功（印度、甚至中国真正成为粮食净出口国）的预测也是正确的，那么整个世界到21世纪初期就会富裕得多了。即使技术进步不十分快，经济增长也可能出现。改变人口结构及其对需求生产的影响，以更先进的方法使用原材料，将可保证经济增长。

很清楚，这种增长也会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快些，有的地方慢些，取决于变化的条件。正是这一点令人最难于判断，只能做暂时性的预测。譬如，无法保证日本过去40年中惊人的经济发展在今后20年还会继续下去；苏联的增长率自60年代以来一直下降，如它的经济政策、经济机制发生变化，则90年代也不是不可能再度提高。然而，从当前的趋势来看，这两种结局都不太可能。换句话说，假定从现在起到21世纪初日本真的停滞下来，而苏联经济突然繁荣，那么只能是由于情况和政策的急剧

变化远远超过了现有根据所作的合理假定。今后 15 年或 25 年世界将是个什么样子，对此所作的估计有可能错误，正因如此，决不意味着人们宁可接受难以置信的结果，而不相信根据当前广泛事态发展所作的合理预测。

例如，众所周知今日“世界潮流”之一是太平洋地区的崛起。有理由预期，这一趋势将继续下去，这是因为它的发展具有十分广泛的基础。它不仅包括经济实力强大的日本，还包括迅速变化中的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有众所公认的繁荣的工业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有取得巨大成就的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如台湾、南朝鲜、香港和新加波，以及更大范围的东南亚联盟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广而言之，也包括美国太平洋沿岸诸洲和加拿大诸省。各种因素巧妙的结合促进了这一广大地区的经济增长：如面向出口的国家的工业生产力极大提高，反过来又导致外贸、航运和金融业的巨大增长；新技术以及廉价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工业获得重大进展；增加农业产量（特别是谷物和牲畜）的努力成效卓著，结果农业增长速度超过人口的总增长等等。各种成就彼此相互促进，从而近年来创造出远远超过传统的西方大国以及经互会的经济增长率。

例如，1960 年亚太国家（除美国以外）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仅为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 7.8%，1982 年增长了 1 倍多，达到 16.4%，此后亚太地区的增长率一直超过欧洲、美国和苏联的增长率，而且超过的幅度越来越大。很可能在 2000 年亚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 20%以上，即与欧洲或美国相同；即使增长率比过去的 1／4 世纪“低得多”，也会取得上述成就。太平洋盆地的这种活力从美国这一时期经济平衡的变化中也可以看得出来。1960 年美国与亚太地区的贸易只占美国与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贸易的 48%，但 1983 年提高到了美欧贸易的 122%。随着这一变化，美国国内人口和收入的分

布也发生了向太平洋沿岸转移的趋向。尽管太平洋地区有个别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或出现影响某一特定工业的困难，看来总的发展趋势还会继续下去。因此，一位经济专家胸有成竹的预言并不令人意外，他说，整个太平洋地区现在掌握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3%，到2000年将拥有50%，并作出结论，“世界经济的重心正迅速向亚洲和太平洋转移，因为太平洋已处于世界经济力量主要中心之一的地位”。当然，19世纪以来诸如此类的话已是老生常谈，但只是1960年以后随着太平洋地区商业和生产力的巨大增长，这个预言才成为了现实。

同样，有理由假定，今后几十年，一个令人不感兴趣但却更为广泛的趋势将要继续，这就是军备竞赛费用将呈螺旋式上升，这是由于崭新的武器系统的巨大耗费以及国际对抗刺激的结果。据观察，“历史上始终不渝的事情极少，其中之一可说是军事费用比例总是上升”。如果这种说法对于18世纪的战争和军备竞赛来讲是对的（姑且不论短期的波动），那么对本世纪来讲就更加正确了，因为18世纪武器技术发展缓慢，而本世纪新的飞机、战舰和坦克一代比一代耗资更大，而且还应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英王爱德华时代的政治家们曾因一艘1914年前的战舰要花250万英镑而大吃一惊，那么如果知道现在英国海军部花1.2亿多英镑更换一艘护卫舰，该惊愕得不知所措了！美国国会议员在30年代末愿为几千架B-17轰炸机拨款，现在看到五角大楼的估计——仅仅100架新型B-1轰炸机就需花2000亿美元，也只好知难而退了。目前各方面的军费都在螺旋式上升：

>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相比，轰炸机费用是那时的200倍。战斗机费用为100倍或更多一点。航空母舰和作战坦克的耗费分别相当于那时的20倍和15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艘G级潜艇每吨价值5500美元，现三叉戟飞机每吨需160万美元。

综合研究一下这些问题就不难看出，今天的军火工业正同商业性自由市场工业分道扬镳。前者一般集中于少数与国防部门有特殊关系的大公司（无论在美国、英国、或法国都如此，在实行“中央管制经济”的苏联更是如此），国家往往通过转让专有合同和保障超成本费用予以保护使之不受市场影响，因其产品的消费者只有国家及友邦。而后者，即使象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大公司，为了在千变万化的国内外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也必须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在这种市场上质量、消费者的口味和价格都是极其重要的可变因素。军火工业由于军界希望拥有最先进“工艺水平”的武器，以便军队能够对付一切可能出现的（有时是难以置信的）作战场面，因此它的产品越来越贵，越来越精致而且数量极少。而商业性自由市场工业则因市场竞争和大规模生产的缘故，在对制造家用商品或办公用计算机的最初原型进行大量投资后，就把商品的平均成本费用压低。如果说，19世纪末以来新技术和科学发展的迅猛增长必然会促使军火制造商与政府挂钩而不受“自由市场”规律的约束，那么目前这种现象增长之快则更令人吃惊。有人挖苦地说，到2020年也许造一架飞机就把五角大楼全部预算用光了。美国有关“军事改革”的各种建议可能有办法制止这种预言实现，但是未必能逆转以越来越高的费用制造越来越少的武器的趋势。

自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是由于武器发展必然日趋复杂，如现代战斗机可包含10万部件，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在陆地、海面、海底、空中以及外层空间不断进行着一系列军备竞赛。如果说北约国家和华约国家之间的对抗是最大的对抗（因其中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投资占世界总额的80%，拥有世界飞机和舰艇总数的60～70%），那么在中东、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从伊朗到朝鲜横跨亚洲到处存在着较小的但仍然有相当规模的军备竞赛，至于战争，就更不用说了。其结果，第三次世界的军费开

支激增，甚至最贫穷的国家也是如此，而且向这些国家出售和转让武器的规模与日俱增。1984年世界武器进口达350亿美元，数额之巨竟超过世界谷物贸易（330亿美元）。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次年，世界军费支出总数约9400亿美元，大大超过全球较贫困的半数人口的总收入。更有甚者，武器费用的增长比世界经济增长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要快。为首的是美国和苏联，它们每年投入国防的费用超过2500亿美元，看来在最近的将来总数要超过3000亿美元。许多国家武装力量的费用在政府预算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增长，唯有在经济衰弱和硬通货紧缺的条件下，而不是出于减少军费的真诚意愿（极少数例外，如日本和卢森堡），这种情况才能被加以制止。"世界问题研究所"提出的所谓"世界经济军事化"正以比30年以前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这两种趋势——一是经济增长结构不平衡，全球生产均势朝有利于太平洋盆地的方向发展；一是武器和武装力量费用呈螺旋形上升——它们自然是彼此分离的两种发展趋势，但同时日益明显的是，它们之间似乎将越来越相互影响，实际上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相互影响。技术和工业变化的动力驱使着这两种趋势的发展（即使是个别军备竞赛也含有政治和思想动机）。两种趋势严重侵害国民经济：第一种趋势促成财富和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快慢不均，使一些社会比另一些社会富裕；第二种趋势浪费了国家资源——不仅从投资资本和原材料的角度来衡量是这样，而且（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要从参加有关国防生产与从事以出口为主商业性经济发展的科学家、工程师、研究与开发人员的数量比例上看。据说国防消费对商业经济也起一定的作用，因此看来越来越难于辨明过滥的军费开支必将损害经济增长。军事投资过多的当代社会所经历的困难只不过是重蹈腓力二世的西班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俄国以及希特勒德国的覆辙。庞大的军事建设也许就象

一座宏伟的纪念碑，看上去威风凛凛给敏感的观众以深刻印象，但如果它不是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上（在这里指生产力高的国民经济），那么它将有倒塌的危险。

因此，从广义上讲，这两种趋势都含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意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看来会降低它的社会公众的士气，产生不满情绪，并加剧对国家开支重点安排的非议；另一方面技术和工业高速度扩展也会自食恶果，对于迄今未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尤其如此。大规模军备生产耗费可对国家经济中某些特殊工业部门带来好处，但它转移了社会其他部门的资源，从而使国家经济无力对付外国的商业挑战。除非大敌当前，兵临城下，否则要在本世纪维持高额国防开支几乎总要挑起"大炮与黄油"的论战。这一点已经激起一场关于经济力量与军事实力之间适当关系的辩论，虽然还不是十分公开的辩论，但它对于我们的目的具有更大的意义。

因此，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呈现出今天这样的紧张状态——一个国家既处于混乱的军事政治世界之中，又处于自由放任的经济世界之中；一方面它为了寻求战略安全，需要投资制造最新武器系统并调拨大量国家资源用于武装力量建设，另一方面它为了寻求经济安全，又需致力于国家的繁荣兴旺，而国家财富取决于经济增长（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财富创造方式的结果），取决于增加生产和活跃国际、国内市场需求——而这一切又有可能被极度的军备费用破坏殆尽。正因为军事建设投资过多将减缓经济增长率并导致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下降，接着引起财富下降，最后引起实力下降。这里整个问题是一个怎样使短期安全与长期安全之间保持平衡的问题，即如何一方面需要以巨大国防力量维护短期安全，另一方面又需要提高生产和收入保证长期安全的问题。

这两种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到了20世纪后期变

得更为尖锐，因为公众面前有着各种可供仿效的“模式”。一方面，有极其成功的“贸易国家”和地区——主要在亚洲，如日本和香港，也包括瑞士、瑞典和奥地利，它们抓住自1945年以来世界生产和商业相互依存关系大发展的机会得到了好处，它们奉行发展与其他社会的和平贸易关系的对外政策。其结果，这些国家在保证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将国防费用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从而把解放出来的资源用于国内高消费和资本投资。另一方面，有各种“军事化”经济——东南亚的越南、陷于长期战争的伊朗和伊拉克、以色列及其心怀戒备的近东邻邦，以及苏联本身——它们每年拨出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有时更多）用于国防费用，坚信为了保证军事安全有必要维持这样高的军费标准，但却明显地由于挪用了本应投入生产性和平用途的资源自食恶果。世界上介于“商人”和“武士”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其余大多数国家，既不大相信世界已安全到足以把军费减到日本那种异常低的水平，不对以牺牲经济和社会利益的高昂代价来换取大量军备费用感到不安，并且意识到可以有某种折衷办法妥善处理短期军事安全与长期经济安全的关系。对于那些难于摆脱庞大的国外军事义务的国家来说，与日本完全不同，它们在这个难题上遇到的情况更为复杂。而在许多主要大国中，计划人员已经尖锐地意识到，他们不仅必须在武器费用激增与生产投资之间保持平衡，而且必须与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特别是全体人口中不同年龄的人们的需求）保持平衡，这对如何按轻重缓急分配经费比以往更加困难。

因此，当世界向21世纪进发的时候，时代如果不是要求所有政府，那么至少要求大多数政府同时实现三重使命：为国家利益保障军事安全（或某种可行的安全措施）；满足公民的社会经济需求；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其中最后一项无论对于当前提供所需大炮与黄油的积极目的，还是对于将来避免经济相对衰落以致

损害人民的军事和经济安全的消极目的，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技术和商业发展速度不平衡以及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情况下，要在一段持续的时间内完成上述所有三大使命将是非常艰巨的任务。然而只完成前两项任务——或其中任何一项——而没有完成第三项，从长远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对衰落，这就是一切不能适应世界力量变革的进程、而本身发展缓慢的社会的命运。正如一位经济学家严肃指出的："这实在难以想象，不过事实的确如此，只要一个国家生产率的增长在一个世纪里落后于其他国家1%，例如英国，就会从世界无可争议的工业领先地位沦为今天的中等经济地位。"

本章下面要讲的重点就是各主要国家在实现这一任务中所处的地位如何（好或坏）。鉴于国防费用与军事安全、社会与消费需求以及发展经济需要投资，这三者都有各自的需求，必定产生对资源的争夺，毋庸赘言，要找一个绝对完善的办法解决这种紧张关系是不可能的。充其量只能做到三方面保持大体协调，但究竟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协调，国家本身的各种条件（而不是均衡论的）将永远起重大作用。一个被敌对邻国包围的国家会认为，最好比相对不受威胁的国家多花一些钱在军事安全上；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会感到要支付大炮和黄油的费用都比较容易，一个决心致力于经济增长以赶上其他国家的社会，则与处在战争边缘的社会不同，对事务的孰优孰缓，孰轻孰重，自有考虑与安排。由于地理、政治和文化等因素不同，一个国家的"解决办法"与另一个国家的决不会完全一致。但基本论点仍然是：如果一个大国在国防、消费和投资三者相互竞争的需求之间不能取得大致的平衡，则未必能长久保持它的地位。

一、中国的平衡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任何一个国家更迫切需要实现武器现代化，以满足社会需求并将一切资源投入非军事性企业生产，这是因为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同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许最不好。中国经受了长期的艰难困苦，它的现任领导人看来正在实现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中国因物资紧缺受到严重约束，但当前的经济发展已使情况有所好转，**如果能够保持经济发展持续上升**，这个国家可望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大变化。

中国的弱点众所周知，这里只需简单几笔略加提及。北京(有一定的理由）认为它在外交上和战略上处于被孤立和包围之中。如果说这部分是由于毛泽东对邻国的政策造成的，那么它也是前几十年间其他大国在亚洲的对抗和野心带来的后果。中国人对日本过去的侵略行径一直记忆犹新，并且这一历史记忆使北京领导人对近年日本的迅猛发展加强了警觉性。尽管在 70 年代北京与华盛顿关系解冻，但因为美国政府，尤其是共和党政府过分热衷于建立一个反苏集团，对台湾旧情缠绵，并积极干预北京所喜爱的第三世界国家和革命运动，中国对美国仍然将信将疑。台湾以及一些近海小岛的前途一直是个棘手问题，目前还处于半明半暗之中。中国同印度的关系冷淡，并由于它们分别同巴基斯坦和苏联的关系而更加复杂化。尽管莫斯科近来竭力向北京“求爱”，中国仍然感到应该把苏联看作是它的主要外来危险，这不仅因为苏联沿边境部署了许多个师和大批飞机，还由于苏联侵略阿富汗，而且更令人恼火的是苏联支持南部邻国越南推行军事扩张主义。看来，中国人现在多少有点象本世纪初的德国人，在他们努力提高自己在全球范围内大国地位的同时，还要深入考虑四

周的“包围圈”。

这个不得不处理一系列棘手的多边外交事务的国家，与其主要对手相比，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都不很强。从数量上看，中国军队规模很大，但现代战争武器装备非常不足。大部分坦克、枪炮、飞机和军舰都是按多年前获得的苏联或西方模型仿制的，肯定不能与世界最近生产的更加先进的武器装备相匹敌。中国由于缺乏硬通货和不愿意过分依赖其他国家，国外购买武器的数量一直保持在最低限度。也许，使北京领导人更为焦虑的是中国的战斗力减弱。毛主义反对军队专业化，认为农民民兵更好，这种乌托邦式的办法丝毫无助于1979年与越南进行的边境战争。久经战场和训练有素的越南军队打死大约2.6万、打伤3.7万中国人。[1] 在经济方面，中国看来仍然远远落后官方公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字，即使按更适合西方概念及经济计量方法修改以后，也超不过500美元，对比之下，许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大超过了1.3万美元，苏联也达到可观的5000多美元。中国的人口可能从今天的10亿上升到2000年的12亿或13亿，所以个人收入大量增加的希望不大。甚至到了下个世纪，普通中国人同其他大国的居民比较仍将是贫穷的。不用说，要统治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协调各种集团（政党、军队、官僚、农民）的关系，取得进步而不产生社会的和思想的动乱，困难是很大的，对于哪怕最灵活、最明智的领导人都是一个考验。中国在上一世纪国内历史上还没有过令人鼓舞的长期发展战略的先例。

但是，过去的6～8年里，中国的改革和进步非常明显，它

---

①G·西格尔：《防御中的中国》（伦敦，1985年版，详细论述了中国战斗力的下降；H·W·詹克斯：《从导弹到滑膛枪：1945～1981年中国军队的政治和专业》（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2年版）。

意味着总有一天，人们会以历史学家评价柯尔培尔[①]的法国、腓特烈大帝统治初期或日本明治维新后几十年复兴时期的观点来看待邓小平领导的这一时期，也就是说，把这一时期的中国看成是一个利用一切注重实效的手段竭力发展综合国力的国家，以**国家主义**的意识指导实践，平衡促进企业、发挥积极性和进行变革的各项要求，使得国家的目标尽可能迅速和顺利地实现了。实行这样的战略必须善于观察政府政策的各个方面是如何相互联系的。所以，它包含复杂的“平衡术”，要求对下列各方面作出谨慎的决断：稳妥进行各项改革的速度，与短期需要相矛盾的长期需要的资源分配数量，国内需要和对外需要之间的协调，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在一个仍具有“修改过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国家里还要决定使意识形态和实践能够调和的方法。尽管中国已经遇到不少困难，而且将来很可能出现新的困难，但迄今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

例如，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到经过60年代动乱之后的中国军队现在正在进行改革。人民解放军（包括海军和空军）计划从420万人削减到300万人，这实际上是加强了实力，因为其中很多部队只是从事铁路建设和民事任务的支援部队。那些保留下来的武装部队各方面的素质可能更高，改换新军服和恢复军衔（曾被毛泽东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取消）也说明了这一点。部队将增强力量，其办法是通过征兵以替代大量志愿兵（可使国家增加优秀人员）；改组军区；调整编制以及改善军事院校军官训练（后者也是在贬黜毛主义时期才开始的）。与此同时，大规模的中

---

①柯尔培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是法国路易十四时期财政大臣，推行所谓“柯尔培尔主义”即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为发展工业，扩大输出，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争取贸易顺差，发展商业和运输业。柯尔培尔主义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译者注。

国武器现代化即将开展，中国武器数量虽然很大，但都已相当过时而行将淘汰。海军正用一系列新式舰艇装备起来，从驱逐舰、护航舰到快速攻击舰甚至气垫船。它还建立了一支非常大的常规潜艇舰队（1985年为107艘），成为世界第三大常规潜艇力量。中国的坦克炫耀着激光测距仪，飞机已装备现代化雷达成为全天候型。这样做的动机，一是要试验现代化战场条件下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参加1981年一次军事演习的有六七个军，并有飞机支援——它们在1979年的越南冲突中连连失利）①，一是要重新考虑沿苏联边境的“前方防御”战略，使之有利于在漫长而无掩护的边界后面进行反击。海军也在进行大规模的试验：1980年一支由18艘军舰组成的特混舰队配合中国最近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在南太平洋8000海里水面执行任务。（人们不禁惊叹，这是自15世纪初郑和航海以来中国第一次炫耀海上力量吧？）。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以军事大国面貌出现的中国，其核技术的发展惊人迅速。虽然中国首次核试验是在毛泽东的时代进行的，毛却公开嘲笑核武器，大肆赞扬“人民战争”的长处，相比之下，邓的领导坚决要使中国尽快加入现代化军事国家的行列。早在1980年，中国就在试验射程7000海里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个射程不仅可包括整个苏联，而且也包括部分美国）。一年以后，中国的一枚火箭发射了三颗航天卫星，这意味着中国已掌握多弹头火箭技术。中国的核力量多数是陆基的、中程的而不是远程的。但是，现在有了新的洲际弹道导弹，而且就核威慑而言，最重要的可说是有了一支装备导弹的潜艇舰队。自1982年以来，中国一直在试验潜射弹道导弹，并努力提高射程和射击准确度。也有报导说，中国正在试验战术核武器。所有这些成就是在大规模原子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也是在中国拒绝遵守国际限制协议

①德雷尔：《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第1017页。

“冻结”核武器发展的情况下取得的，因为这些协议仅仅对现有核大国有利。

与军事技术的杰出才能对比，不难看出一些一直存在的薄弱环节。从生产一个武器样品、批量生产、试制和试验到武装部队拥有武器，总要相隔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对于资本和科学资源都不富有的国家尤其如此。严重的挫折——包括发射导弹时潜艇可能爆炸，取消或放慢执行武器计划，缺乏冶金技术专门知识、先进的喷气引擎、雷达、导航和通讯设备——继续阻碍着中国为在军事上达到同苏联和美国真正平等所作的努力。中国的海军，虽然进行太平洋演习，却远非“远洋”舰队，导弹潜艇力量也将长期落后于两个超级大国。目前两个超级大国正大批投资开发比以前任何潜艇潜水更深、行驶更快的巨型潜艇（如俄亥俄级，A级）。最后，谈到资金，它表明，只要中国的国防费用仅及超级大国的1／8或1／8左右，那是没有办法实现完全的均势的，所以，中国不能打算得到每一种武器或准备应付一切威胁。

不过，即使中国目前的军事力量所产生的影响也比一些年以前大得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训练、组织、设备方面的改善应在与其地区性敌手如越南、台湾、印度较量中比过去的20年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哪怕同苏联的军事力量对比也可能不再是过分有利于莫斯科了。假如未来的亚洲争端导致中苏战争，莫斯科的领导可能发现，要对中国发动重大的核攻击在政治上是多么困难，因为这既要考虑世界的反应，又难于预料美国的反应。如果苏联就是要“走核战争的路”，那么，苏联武装部队要想确保摧毁中国日益增长的陆基导弹，尤其是舰基导弹系统而不受到还击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另一方面，如果只是打常规战争，苏联将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对于战争的可能性，莫斯科采取了认真对待的态度，这一点从它在乌拉尔东部的两个军区部署大约50个师（包括6或7个坦克师）的苏联部队这一事实可窥见一斑。即使

这批部队可以对付驻扎在边境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70个或更多的师，苏军的优势还不足以取得惊人的胜利。尤其是，如果中国人以空间换取时间来降低苏联闪电战的效果，情况更会如此。许多观察家认为，现在中亚存在着“大致的均势”和“力量的平衡”，如果确实如此，战略影响将远远超出紧邻的蒙古地区。

但是，中国长期作战最大的实力还不在这方面，而在于它的经济在以往几十年中显著的飞速增长，并且看来将来可能继续增长。正如前一章所提到的，早在共产党牢固地建立起它的统治之前，中国就有了相当规模的制造业，因为国家幅员辽阔，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以及连连受到战争和国内战争的破坏，所以这一事实被掩盖起来了。马克思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国内和平的到来以及国家积极鼓励工农业的发展，这一切使生产得以突飞猛进，尽管某些时候（如在毛的领导下）使用了一些异乎寻常和反生产力的措施。1983～1984年间，一位观察家写道：“自1952年以来，中国工农业年增长率已经分别达到10%和3%左右，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5%～6%。”如果说这些数字不能与一些以出口为主的亚洲“贸易国家”如新加坡所达到的成就相比拟，但对于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中国，这些数字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明中国即将变成一定规模的经济大国。据估计，70年代后期，中国工业经济已达到1961年苏联和日本的水平（如果不是更高的话）。而且，值得再次提出的是，这些平均增长率包括了所谓“大跃进”的1958～1959年，与苏联关系破裂，苏联撤走它的资金、科学家和蓝图的60年代初期，以及不仅破坏工业计划而且毁掉几乎一代人的全部教育、科学制度的“文化大革命”混乱时期。假如没有发生这些事情，中国的发展从总体上来说可能更快——这可从以下事实得到证实：在过去5年邓领导的改革中农业年平均增长8%，而工业达到惊人的12%。

从很大程度上讲，农业部门一直是中国的机会所在又是它的

薄弱之处。东亚人的水稻耕作方法使得每公顷产量异常丰收，但是劳动极其密集，所以要转变为大规模农业机械化形式，譬如说，象美国大草原那样使用机械是很困难的。又因为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30%以上，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农业部门的衰退（或仅仅是发展减慢）都会成为阻碍整个经济的绊脚石，这种情况在苏联已经很明显地发生了。中国除面临这一挑战以外，还有一个人口定时炸弹。中国已经力图在仅有的2.5亿英亩可耕地上养活10亿人口（美国4亿英亩庄稼养活2.3亿人口）。如果不更加依赖进口粮食，它能在2000年养活另外两亿人口吗？而进口粮食既带来国际收支差额又用掉战略计划费用。对这一关键性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是困难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专家们提出了不同的论证。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传统的食品出口逐渐下降，1980年短期内成了纯粹的**进口国**。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把大量科学资源用于实现印度模式的“绿色革命”，邓鼓励面向市场的改革以及大大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没有把费用转嫁给城市），结果过去5年内的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1979～1983年间，正当世界其他地方处于经济不景气时，8亿中国农村人口的收入增加了大约70%，他们摄取的食物热量几乎达到巴西人或马来西亚人的水平。“1985年，中国人比10年前多生产1亿多吨粮食，这是历史上最大的生产高潮之一。”在人口增加和肉类消费随之日益增加（需要更多谷物）的情况下，要一直保持农业消费品的增长，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因为土地的面积是有限的，靠施肥增产的产量肯定会逐渐减退。不过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这方面设法维持它的复杂的平衡作用，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中国工业化运动的未来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但也是国内更加难于处理的问题。工业化的进程受到阻碍，不仅是因为消费者缺乏购买力，而且由于多年来实行苏联式和东欧式的拙劣计划。过去几年来“自由化”的措施——允许国营企业根据商品质量、价

格和市场需求的实际状况进行调节，鼓励私人经营小企业，扩大对外贸易——使工业产量有很大的提高，但也带来许多问题。数以万计的私营企业的出现吓坏了一些党的理论家。物价上涨（大概归咎于价格必要的调整和众矢之的——“敲诈勒索”与“牟取暴利”这两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引起了城市工人的抱怨，他们的收入既不如农民也不如实业家的增长得快。此外，对外贸易激增导致迅速吸收进口产品，从而产生贸易赤字。1986年赵紫阳总理讲话中提到，事情多少有点“失控”，需要“整顿”一下，此外还宣布降低某些“狂热”的增长指标，这一切暗示存在着一些内部问题和思想问题。

不过，即使削减后的年增长率也是引人注目的，今后每年准备增长7.5%（1981年以来为10%），这就是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将翻一番（若增长率为10%，则仅需7年），经济学家根据某些理由，似乎认为这样的目标是能够达到的。首先，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自1970年以来占国民生产总值份额的30%以上，但相应地也带来了问题，即减少了用于消费的部分，减少的部分由物价稳定和收入均等得到补偿，可是反过来又妨碍了企业发展。不过，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增长同时也说明有大量可供生产性投资的资金。其次，存在着降低成本的巨大潜力：中国历来是最恣意挥霍和浪费能源的国家之一（这是它的石油储量大幅度下降的原因），但是，1978年后的能源改革已经大量地减少了一项工业主要“投入”的成本，从而腾出资金投入其他部门或用于消费。此外，只是现在中国才刚刚开始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关闭（或被迫从事与提高生产效力相违背的活动）长达10多年后的今天，不言而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赶上其他国家已经取得的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对此，几年前帕金斯在其《国际影响》一书中曾经提出：

> 只有在这一背景下，人们才能理解 *70* 年代后期数以千计的中国科学家去美国或西方其他国家呆 *1～2* 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的重要性……最早 *1985* 年或最迟 *1990* 年中国将有成千熟悉各个领域尖端科学的科技干部，成千上万在国内和国外受过训练的人员将充实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编制，至少在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活动领域将实现使中国的工业技术提高到最先进的国际标准的计划。

同样地，只有在 1978 年后中国才开始鼓励（尽管有所选择）对外贸易和在中国投资，才使得中国的经理和企业家有机会挑选西方政府和公司热情提供的技术设备、专利和生产设备，而西方政府和公司未免夸大了中国市场对这些项目的需求。北京政府由于想要控制对外贸易的水平和商品种类，看来对于进口将进行审慎的选择以促进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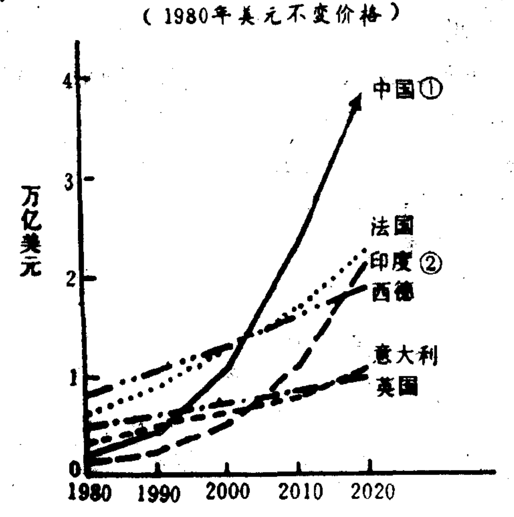
最后，也许中国"经济跃进"中最显著的方面是严格控制国防开支，使军队不消耗其他方面所需要的资源。从邓的观点看，国防应该摆在中国自诩的"四个现代化"的第四位上——在农业、工业、和科学之后。尽管很难获得中国国防开支的精确数字（主要因为计算方法不同），看来很清楚，国民生产总值中军队所占比例 15 年来持续下降——从 1971 年的大约 17.4%（根据某一资料）到 1985 年的 7.5%。这一情况会引起军界抱怨，从而加剧内部对于发展经济的先后顺序和一些经济政策的辩论。如果中国南部或北部重新发生严重的边境冲突，那么很清楚，国防开支又会变过来。不过国防开支必须放在次要地位这一事实可能是最重要的迹象，表明中国全力以赴发展经济的时代开始了，并且与苏联迷恋于"军事安全"和里根政府热衷于投资建设武装力量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许多专家指出的，中国在现有国民生产总值及国内储蓄额、投资的条件下，使国防支出超过 300 亿元人民币不会成问题。但北京不这样做，反映它深信只有当它的生产和财富增加

许多倍时，长期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总之，“唯一可能阻止中国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的事情也许是发生同苏联的战争或者‘文化大革命’式的长期政治动乱。中国的管理、能源和农业问题是严重的，但这些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面临和需要克服的问题”。如果说这是一种乐观的说法，那么与《经济学家》杂志近期的计算相比较就未免逊色了。《经济学家》的计算表明，假定中国保持年均增长率 8%——认为这是“可行的”——2000 年前中国会超过英国和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的总数，而到 2000 年将大大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大国。

图 2 中国、印度和某些西欧国家 1980～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预测

（1980年美元不变价格）



注：①假定 1980～1985 年增长率 7%，此后为 8%；

假定 1980～1985 年增长率 5.5%，此后为 7%；

假定其他国家年增长率保持 1970～1982 年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经济学家》杂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以上计算的最大缺点是竟把建立在可变因素上的预测搞得如此精确。但是，总的观点依然成立：如果不发生某种大灾难，中国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将获得非常大的国民生产总值，那时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将是少的，不过毫无疑义要比今天富有得多。

关于中国将来对国际舞台产生的影响，值得提出以下三个观点。第一点，也是对我们的论题最不重要的一点，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促进了对外贸易，中国不可能变成另一个西德式日本。中国这样的大陆大国本身的国内市场规模、人口和原材料的状况使它完全不可能成为依赖海外商业的那种较小的海上"贸易国家"。它的农业部门劳动密集程度已经很大，而政府决心不过分依赖进口粮食，它也是阻碍外贸发展的一个因素。看来中国将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低成本商品生产国（如纺织品），这将有助于支付购买西方的、甚至苏联的技术所需的费用。但是，北京明确地决定不依赖外国资本、制造业及市场，也不依赖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某个供应国。获取外国技术、设备和生产方法必须服从于中国平衡行动总的要求。这种做法与中国近来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矛盾（还可能成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及亚洲开发银行成员）。加入这些机构，并不暗示北京将加入"自由世界"，而正如他们精明而讲究实际的算计那样，中国可以藉此通过国际组织进入外国市场，获得长期贷款，这比同某一大国或私人银行单方面"打交道"好得多。换句话说，这种做法保护了中国的地位和独立。第二点是独立的，但与第一点有内在联系。这就是 50 年代毛政权时期，看来对于频繁的边境冲突很感兴趣。而北京现在则乐于同邻国保持和平关系，即使对那些它抱有怀疑的国家也是如此。如上所述，和平对邓的经济战略是极为重要的；战争，即使是地区性战争，也会将资源转移到军队方面而打乱中国"四个现代化"轻重缓急的安排。情况可能正如人们最近一直所谈论的，中国在对莫斯科的关系问题上感到轻松多了，因为中国

在军事方面已取得进步，大致上形成了中亚的均势。由于军事上达到一定程度的力量平衡，或至少有了一定的防御能力，中国现在能够集中更多的精力发展经济了。

虽然中国（怀有和平的意愿），但它也强调决心保护自己的完全独立，极力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外军事干涉。即使对日本，中国始终予以密切注视，限制它的进出口贸易份额，还警告东京在发展西伯利亚问题上不要卷入太深。对于华盛顿和莫斯科，中国一贯采取更为谨慎和批判的态度。所有苏联有关改善关系的建议，甚至包括1986年初苏联工程师和科学家重返中国的建设，都没有改变北京的基本立场，即在莫斯科对全部三个突出问题、或至少某些问题作出让步之前，不可能真正改善关系。这三个问题是：苏联侵略阿富汗，苏联支持越南，以及长期未解决的中亚边界和安全问题。另一方面，美国的拉丁美洲和中东政策屡屡遭到北京的攻击（类似对苏联在热带冒险的抨击）。尽管中国不是正式的第三世界运动的成员，尽管它今天的批评与60年代毛的怒斥相比要温和得多，作为一个经济上不够发达的国家，并对白色人种统治全球一贯抱有疑虑，它对于超级大国的干涉行径自然要进行批评。虽说中国对苏联觊觎亚洲深恶痛绝，但对美国窃窃私议怎样打“中国牌”和什么时候打“中国牌”同样感到可疑。以北京的观点看来，倾向苏联或倾向美国（中苏争吵以来经常如此）可能都必要，那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例如，联合监视苏联核试验和交换有关阿富汗及越南情报；但是，最理想的是在两者之间处于等距离的地位，让他们两个都向“中央王国”求爱。

在这方面，中国在现在（和将来）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角色的重要性增加了，增加的原因，由于找不到更恰当的字眼来形容，也许可以称之为它和其他大国相处的“作

风”。关于这一点乔纳森·波拉克[1]说得非常之好，值得在这里大段详尽的引述：

> 仅仅用武器、经济实力和大国潜力来解释中国在全球力量均衡中的重要性是不够的。如果中国的战略意义只是一般性的，而它的经济活动又充其量不过是多种形式的混合体，那么，就说明不了为什么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把中国看得那么重要，不能说明为什么世界上其他重要国家对它的审慎关注。答案在于，尽管中国作为一个受威胁和受侵略的国家有它自己的特点，中国非常机灵地、甚至鲁莽地运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北京对待超级大国的策略，从各个不同时期来看，总的有：对抗和武装冲突，部分和解，非正式结盟，独立不羁近乎超脱，不时还发出几句刺耳和愤怒的议论。其结果，中国对所有国家都变得十分重要，同时，又在许多方面令人捉摸不透，甚至对它的长远目标和方向感到担心。
>
> 的确，这种不定的、自由意志的策略有时要承受很大的政治和军事风险。然而，这个策略给予作为主要大国出现的中国以相当的声望。中国经常无视两个超级大国意愿或要求而独立行动，有时它的行为远远出乎人们意料。尽管中国看上去脆弱，但它从不向莫斯科或华盛顿俯首听命，屈从压力。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中国占据一个独一无二的国际地位，既是战后时期许多重要政治、军事冲突的参加者，又是抵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随意划分集团的国家。的确，在某种意义上就其本身而

---

①“中国和全球战略平衡”一文作者。见哈丁主编《中国80年代的对外关系》第173～174页。

言，中国理所当然地应被视为候补超级大国——它不仿效或追逐苏联或美国，而是反映北京在全球政治中的独特地位。从长远意义上讲，中国所代表的政治和战略力量是如此重要，以至而不能把它看作是莫斯科或华盛顿的附属品或只是一个中间力量。

最后，需要再次强调的一点是，尽管中国此刻正压缩军费开支，但它无意将来仍然在战略上"无足轻重"。相反，中国越是以柯尔培尔式的国家主义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就越是意味着要搞强权政治。这是非常可能的。只要想一想，中国正在注意扩大它的科技基础，并在这么薄弱的基础上取得火箭及核武器的惊人成就，就可以明白了。为了加强国家经济基础，结果挪用了武器投资的经费，很难叫中国的将军们满意（他们象各地的军人一样，宁要短期安全手段，不愿长期安全手段）。但是，《经济学家》杂志说得好：

因为中国军人耐心地帮助经济改革顺利进行，所以，会有报答的。如果邓先生的全部经济计划可望按常规进行，根据计划规定，1980～2000年中国的产值将翻两番（公认这是很大的设想），那么，10～15年中民用经济完全可能获得足够的力量迅速推动军事部门前进。那就到了中国军队、中国的邻国和大国要认真考虑一些事情的时候了。

这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二、日本的困境

北京执意对东亚可能发生的一切事务表现关注，这一事实冲击着日本自称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或许可象人们所挖苦的那样将它称作"同所有的人来往"。也许最好对日本的困境概括作如

下:

自1945年以来，由于日本取得了发展的巨大成功，它在世界经济和强权政治格局中享有独特的，非常有利的地位。然而日本人感到这是一种极微妙、极脆弱的地位，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这个地位就会被严重地打乱。所以，以东京的见解，最好的情况，首先就是那些导致“日本奇迹”的因素继续存在下去。然而，正因为今日世界是一个“愤愤不满”的国家与“心满意足”的国家相互竞争的纷杂的世界，同时又因为技术和商业变革来势迅猛，以致很可能那些有利的因素会减少或全部消失。基于日本相信它所处的地位微妙而脆弱，它知道公开抵制变革的压力是困难的，相反，必须通过外交妥协来减缓或转变这种压力。因此，每当日本发现自己处于其他国家政治交叉冲突中时，它便不停地提倡和平解决国际问题，并感到恐慌与窘迫；当它稳步走向富裕的时候，则明显地表示希望同每一个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关于日本非凡的经济成功的原因本书前面已论述。40多年来，日本本土一直受美国核力量及常规部队保护，日本的海上航道受美国海军保护，因此，这使日本得以把它的国家力量从军国主义扩张中解放出来，把资源从高额国防开支中解放出来，投入到不断大力发展经济的事业中去，尤其是开拓出口市场。如果没有日本人民倡导的企业家精神，质量保证和辛勤劳动，这个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但是，日本也受益于某些特殊的因素：为了促进出口，几十年来人为地压低日元比值；正式或非正式地限制购买进口外国工业品（当然不是工业需要的不可缺少的原材料）；日货在目前的自由国际贸易秩序中畅行无阻，同时美国市场保持对其“开放”，尽管这样做不断增加了美国自己的负担。所以，在过去1/4的世纪中，日本一直能够享有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巨人的所有优势，而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也没有因这种发展引起历史性的不利的领土问题。毫不奇怪，日本情愿局势保持目前的状

况。

由于日本现在获得成功的基础完全在经济领域，无疑这也就成了东京最焦急的方面。一方面（下面将进一步讨论），技术和经济增长给这个国家提供了辉煌的新成就，使它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处于最有利的政治经济地位，对此，仅少数人持有异议。另一方面，日本的巨大成功激起了一种"剪刀作用"反应，以对抗其出口为主的经济扩张。剪刀的一个方面是那些雄心勃勃的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如南朝鲜、新加坡、台湾①、泰国等等，以及仅有较低产品等级（如纺织品）的中国，都在同日本竞争，所有这些国家的劳务费用都比日本的低得多②，并且在日本不再享有决定性优势的领域里如纺织品、玩具，家庭用品、造船，甚至（较低程度上的）钢铁和汽车，发起了强大的挑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船舶、小汽车、卡车和钢铁生产衰落了，而是迫切需要提高产品的"高级市场"水平，（如高级钢材，更先进、更大型的汽车）。这些产品现在正从生产系列中撤消。所以通商产业省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计划淘汰那些不再具有竞争力的工业，不仅要在淘汰过程中减少损伤，而且要作出安排将资源和人员转移到其它具有竞争力的国际经济部门。

"剪刀"中更令人担忧的第二个方面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对日本产品毫不留情地打入他们的国内市场作出了越来越敌对的反应。欧美国家的人民每年在自己繁劳的市场上购买日本的钢、机床、摩托车、汽车、电视机和其他电器。日本同欧洲共同体及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扩大。欧洲人的反应一向更为强烈，涉及的范围包括从进口限额到官方蓄意设置的障碍（例如法国要求日本的电器商品只许经由人员不足的普瓦蒂埃海关进口）。美国政府由

---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②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公司在那里建厂的原因。

于本身奉行开放的世界贸易制度，对于禁止或限制日本进口忧豫不决（除某些可疑的"自愿"限制外）。实际上目前美国在向日本提供食品和原材料，而后接受日本的工业制成品，这是一种美国早在一个半世纪以来就不存在的"殖民地"或"不发达"的贸易状况，对于这一局面，甚至美国最坚决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的人也感到不安。而且，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日益增长（到1986年3月31日截止本财政年度为620亿美元）同时美国工业在跨越太平洋竞争中首当其冲受到围攻也对政府施加了压力，这一切使华盛顿感到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减少这种不平衡——如促使日元比值上升和大量增加美国向日本的进口等等。由于西方世界趋向于实行半保护贸易主义，以及趋于限制纺织品或电视进口总量，看来日本将不得不与它的亚洲竞争对手划分本已缩小了的市场。

所以，毫不奇怪，某些日本发言人否认形势大好，并指出日本现有市场的份额和繁荣正面临令人惊恐的诸多威胁：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在许多工业领域里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西方政府对日本出口的限制；要求改变日本收税法的压力；储蓄资金转化为消费资金；保证大量增加进口；最后是日元的迅速升值。据称所有这一切可能意味着日本出口导致的繁荣的结束，支付盈余的下降，经济增长率的减退（随着它的经济进一步"成熟"以及大规模发展的潜力减少，增长率早已减慢了）。与此有关，令日本焦虑的不仅是它的经济日趋成熟，由于它的人口年龄结构到2010年，"可工作的人口（15～64岁）比率将是工业领先国家中最低的"，这将要求日本提高社会保险金开支并可能导致社会失去动力。而且，要求日本消费者购买外国制造的产品（除某些名牌产品，如梅塞德斯汽车之类以外）的任何企图都会引起国内的政治争论，这种争论反过来可能瓦解全国的政治一致性——而后者是长期以来日本持续的出口导向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

然而，尽管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由于进入成熟阶段的确在逐

渐减慢，尽管其他国家的确不愿意让日本保持经济优势（它曾有助于日本早期出口的极度扩展），但仍有相当多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将来日本很可能比其他主要大国发展更快。首先，日本作为一个极大地依赖进口原材料（99%的石油，92%的铁，100%的铜）的国家，它从不断变化的贸易条件中获得巨额收益，由于贸易条件的变化，降低了许多矿石、燃料和粮食的价格；1980～1981年以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使日本每年节省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同时也只是引起原材料和粮食价格多次下跌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次而已。此外，虽然日元迅速增值很可能减少日本的部分海外出口（始终取决于需求弹性），但它也大大降低了进口费用，从而有助于工业保持竞争力和维持低通货膨胀率。还有，1973年的石油危机促使日本研究各种节约能源的方法，对于增加工业经济效益起到很大作用；仅在过去的10年里就使得日本依赖石油的数量减少25%。这次危机还迫使日本不断开发新的原料来源，并对新开发地区进行巨额投资（有点类似19世纪英国向海外投资）。但这一切并不能绝对肯定日本从此可以依靠源源不断的廉价原材料输入，但是，预兆是良好的。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日本工业正向21世纪初期最有发展前途的（也就是最终最有利可图的）经济部门——高技术迅猛前进。换句话说，日本逐步地放弃了纺织、造船、普通钢材的生产，让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去生产，所以，很清楚，它的企图是在具有更高增值的先进科学制造业中成为如果不是唯一的领先势力的话也至少是领先势力之一。它在计算机领域里传奇般的成就早已是尽人皆知。日本公司由于起初大量移植了美国技术，现在它们已经能够利用本国一切有利条件（如：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通商产业省的支持、良好的质量管理、有利的日元对美元的比价），并（可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它的产品，把美国公司驱除出半导体生产领域，包括16K、64K随机

存储器，或者更晚些的256K随机存储器等产品。

令美国计算机工业更为担忧的是日本明显地决意进入两个新的更有利可图的领域。第一个是先进的计算机生产，尤其是复杂的和极为昂贵的"第五代"巨型计算机的生产。该计算机比当前最大的计算机运算速度快成百倍。可使多项工作获益非浅。对于日本进入这一领域速度之快，以及通商产业省和日立、富士通等大公司所投研究金额之巨，美国专家们早已大惊失色。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计算机软件领域里，而这个领域中直到80年代初以前，美国公司和少数几家欧洲公司从未受到挑战。无疑，成功地生产巨型计算机和软件是一项比制造半导体更艰巨的任务，它将是对日本设计师极大的考验。与此同时，美国公司和欧洲公司(后者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 都在准备迎接商业性挑战。美国国防部将给予大力支持以确保美国公司在巨型计算机的发展中居领先地位。它们仍是非常自信地认为日本会永远被排斥在这些领域之外。

鉴于倍受尊敬的《经济学家》杂志、《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及其他许多报刊经常登载有关日本进军高技术领域的文章，这里就不必赘述了。日本三菱公司与美国西屋公司之间的联系一直被认为是日本对核能工业兴趣日增的明证。日本对生物技术十分重视，特别是关心它对增加粮食产量的作用。在陶瓷制品方面情况也是如此。据报道，日本飞机发展株式会社已与美国波音飞机公司联合生产90年代新一代的节油飞机，对此，一位美国专家痛斥为"浮士德的交易"，因为在这笔交易中日本仅提供少量资金保险却获得美国的技术和专门知识，此事也许对未来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但也许最重要的（从纯粹产量来说），是日本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已经获得的惊人的领先地位。日本在发展（试验性的）由计算机、激光和机器人控制的整个工厂，这是最终解决日本劳动力逐渐减少问题的出路！最新数据表明，"日本在继续推

广使用工业机器人，其数量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是美国的数倍。"另一调查指出，日本使用机器人的效率比美国人高得多。

在所有这些高技术冒险事业的后面是更为广泛的国家结构上的诸多因素，这使日本比它的主要对手具有显著的优势。外国人把通商产业省在经济上的作用与著名的普鲁士总参谋部等同起来可能是夸大了。然而，看来不容置疑，通商产业省对于日本经济发展起着广泛的指导作用：如安排科研工作；为发展中的新工业部门提供资金；为衰落的行业设法安全停产，它的指导工作一直比美国不协调的自由放任作法要好得多。第二种力量是日本分配给研究与开发工作大量（并逐步增加的）资金，这是说明某些特定公司和工业部门之所以振兴或衰落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1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占资金的比重实际上可能增加1倍，即从1980年的2%提高到1990年的3.5%。而美国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一直在2.7%左右。如果除去军事研究，日本用于研究与开发的人时与美国的一样多，并且很快其费用也会相等。假如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90年代初，日本非军事性研究与开发的支出将居首位"。也许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日本工业部门本身承担经费进行的研究与开发工作所占比重要远远超过欧洲国家和美国（在欧洲和美国，研究与开发工作多由政府或大学来做）。换句话说，日本研究与开发的目标是直接瞄准市场的并期望尽快得到报偿，"纯"科学的研究留给其他人去做，只有当"纯"科学研究成果与商业的关系清晰可见时才得到发掘。

第三个有利因素是日本国民储蓄水平很高，与美国相比尤其突出。这部分是由于税制不同：美国一贯鼓励个人借贷与消费，而日本则鼓励私人储蓄。从总的来看，日本规定的退休金额一般不算富足，所以个人必须为他或她的晚年大量储蓄，这就意味着日本的银行和保险公司获得充足的资金，可向工业提供大量低息

资本。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得税和社会保险费的份额低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并且日本显然要保持这一政策以便腾出钱来作为投资资本。那些想要模仿日本方式的欧洲人首先必须大量缩减他们的社会福利开支。那些羡慕日本体制的美国人就必须削减国防费用和社会开支，并且要采取比迄今更为激烈的手段改革税收法。

第四个力量是日本公司的产品有本国市场作为重要保证（除名牌产品和特殊产品外），这种条件是大多数美国公司和欧洲公司（尽管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所不再具备的。尽管日本出现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官方内部的一贯做法和制订了有利于日本厂商利用国内市场的规章制度，但即使废除了这些重商主义的措施，也不可能说服日本的消费者“购买”除原材料和基本粮食以外的“外国货”。日本产品的高质量和日本人对本国产品使用的习惯，强烈的文化自豪感以及复杂的国内分配和销售结构保证了国内市场的存在。

最后，根据各种数学的和科学的性能测验结果表明，日本的劳动力素质相当高。他们不仅经过高度竞争的公共教育系统的训练，而且受到公司本身的系统培训。甚至日本15岁的青年在考试科目（如数学）中也表现出超过他们西方对手的明显优势。在高等科学领域，力量对比则有所不同：日本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但它却有比西方国家多得多的工程师（大约比美国多5%），它有近70万从事研究与开发的工作人员，比英、法、西德加在一起的总和还多。

对于上述五个因素的综合成效，无法用统计数字作出估价并与其他领先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但是这五个因素综合在一起，明显地奠定了日本工业极其坚实的基础。驯顺而勤奋的日本劳动力，工业体系中普遍存在的和谐关系，只有公司的工会别无其他组织，努力寻求意见一致以及实际上不存在罢工现象，这一切也

是构成日本工业基础的组成部分。显然，这里存在着令人不感兴趣的地方，例如工作时间较长，对公司绝对顺从的风尚（从清晨的早操开始），缺乏真正独立的工会，住房面积狭窄，强调等级和差别。而且，工厂大门以外，日本也有激进的学生团体。对于这些事实以及日本社会的其他动乱，许多西方观察家们已作评论——其中某些人怀着欧洲大陆人对 19 世纪早期英国“工厂体制”同样的恐惧来看待日本这个国家。换句话说，就产量和创造财富而言，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安排工人和社会的方式，但它势必带来对传统准则和个人行为方式令人不安的挑战。因为若要仿效日本工业奇迹的做法，则不仅必须照搬日本这种或那种技术或管理方法，而且包括模仿其社会体制，所以观察家们如大卫·哈尔伯斯坦认为：“它是本世纪未来的年代里美国所面临的最新和……最艰巨的挑战……一种比同苏联的政治、军事竞争更为艰难、更为激烈的竞争……”。

这些工业力量似乎还不够，日本又以主要债权国的面貌惊人迅速地出现于世界面前，每年输出几百亿美元，进一步补充其工业力量。自从通商产业省 1969 年解除日本贷款出口控制及建立对海外投资的财政鼓励规章以来，这个变化一直在进行中，它基于以下两个基本原因：首先是日本的个人储蓄水平极高——日本人工资的 20%以上用于储蓄，因此到 1985 年“日本家庭平均总储蓄额首次超过年平均收入”，这就使金融机构手头资金充足，不断增加海外投资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第二个原因是由于近年来出口收益猛增导致日本史无前例的巨额贸易顺差。日本大藏省担心这样大量的盈余（如果返回国内的话）会加剧国内通货膨胀，一直鼓励各大银行向海外巨额投资。1983 年日本资本的净外流额是 177 亿美元，1984 年一跃而为 497 亿美元，而 1985 年再次上升到 645 亿美元，使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净债权国。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预测，到 1990 年，世界其余国家将向日本举债约

5000亿美元。据野林研究所预言，到1995年日本海外资产总额将超过10000亿美元。毫不奇怪，日本银行和保险公司正在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和最成功的财政金融机构。

日本大量资本输出的后果对世界经济以及可能对日本本身既孕育着危险，也包含着益处，东京把一笔相当大的资金投入金融性的基本建设（如英吉利海峡遂道）或开发新的铁矿（如在巴西），将从这些事业中直接或间接地得到好处。日本公司正在把其它资金和余额转移到海外兴办子公司（特别总是从事生产的子公司），其办法是或者在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制造日本产品以保持竞争能力，或者在欧洲共同体国家和美国境内建立工厂以逃避保护主义关税。然而这股流动资本的大部分是短期债券（尤其是美国的国库券），一旦它们被日本大量地收回，就会打乱国际金融体系（如1929年那样），并且对美元和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压力，因为这些钱大部分是用于筹措里根政府巨额预算赤字的资金。但总的来看，东京很可能保持剩余资本的再循环，进行新的一轮海外投资，将资本转回国内。

近年来日本上升为世界主要净债权国，与此同时，美国从最大的债权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这个变化来得如此迅猛，以致要对其全部含意作出估价仍然十分困难。鉴于“历史上每一个全球经济高涨时期债权国均率先发展，所以日本时代正在到来。”很有可能，东京将步荷兰、英国、美国的后尘，以领先于世界的银行家面貌出现，对国际商业和金融进一步起着中期和长期的促进作用。当前引人注意的是早在日本强大的“有形的”工业领先地位遭到任何重大损害之前，日本就已发挥极大的“无形的”金融作用，这同过去英国发生的情况相类似。如果日元升值过高，工业经历了很长的“成熟期”，制造业基地缩小生产增长率减缓，那么也许上述局面会发生变化，并且变化很快。然而，即使发生了这种变化，也有理由（如上所述）认为：作为一个制造业国家，日本地

位的任何下降都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根据预测到2000年日本所掌握的海外资产数目，定可使它的往来帐户收支平衡得到巨额海外收入的大量补充。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讲，日本似乎注定要更加富有起来。

21世纪初的日本在经济上会有多强大呢？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战争、生态方面的灾难，如果不再出现30年代或世界不景气以及保护主义，一致的答案似乎是：一定会强大得多在计算机、机器人、电讯、小汽车、卡车、船舶，也许还有生物、艺术、甚至航空和航天领域，日本将居世界第一位或第二位。到那时，在金融方面，日本可能自成一个档次。早有报道：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美国和西欧，以致它的生活水准几乎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将来它在世界制造业产量或世界总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究竟会有多大，现在还很难说。值得回忆的是：1951年日本总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英国的1／3，美国的1／20。然而，在30年内却超出英国1倍，几乎是美国的一半。诚然，由于特殊的条件，这些年来，日本增长率的提高异常迅速。然而根据多方估计，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日本的经济仍可能以大约每年1.5%～2%的增长率发展，比其他大国经济（自然中国除外）要快。出于这一原因，一些学者，如赫尔曼·卡恩和埃兹拉·沃格尔认为：21世纪初期日本将是世界上“头号”经济大国，毫不足奇，许多日本人为这一前景欢欣鼓舞。对于一个仅拥有世界人口3%，可居住土地面积仅0.3%的国家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就，但是，根据新技术的内在可能性，人们自然会想，日本人民和土地的潜力或许已被发掘到接近最大的限度了，象其他相对较小的边缘国家或岛国（葡萄牙、威尼斯、荷兰，甚至英国）那样，终有一天，日本会在那些拥有远比它丰富得多的资源、仅需要模仿其成功诀窍的国家面前黯然失色。尽管如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的发展将沿着继续向上的轨道前

进。。如情况果真如此，也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仍很难以精确的数字推测其含意。许多在国际比较中通用的统计（如中央情报局的）是根据美元和市场兑换率计算的；因此1985～1986年美元对日元的比值暴跌近40%，若照这种估算，与美国相比，就会极大地提高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同苏联相比也是如此，因为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经常以“几何平均美元数”来计算）。仅将日元从其目前对美元的兑换率提高到120甚或100日元对1美元，就使日本整个国民生产总值接近美国，大大超过苏联（某些经济专家认为这种兑换率是“真实的”）。由于兑换率频繁波动造成困难，某些经济学家宁愿使用“购买平价率”进行计算，尽管这种计算方法也存在着问题。

无论人们如何衡量日本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力量，有两个事实是压倒一切的。第一是日本的经济繁荣，生产效率极高这一势头方兴未艾；第二是日本的军事力量和国防开支同它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无关。它拥有一支合理规模的海军（包括31艘驱逐舰，18艘护卫舰），一支保卫本土的空军和一支规模不大的陆军。十分明显，与其他国家相比以及与它本身在本世纪30年代、甚至10年代相比，它称不上是一个军事大国。日本分配给国防的经费相对来讲非常之少，这对“负担均分”的争论来说是一个很恰当的例证。根据《军事平衡》所举数字，1983年日本国防开支为116亿美元，法国、西德和英国为210～240亿美元，而美国则为庞大的2390亿美元。所以，平均每个日本居民在1983年只须为防务支付98美元，而英国人为439美元，美国人则为1023美元。尽管日本现在很繁荣，看来日本利用两种相互关联的方法轻而易举地摆脱了防务费用：第一，它躲在其他国家即美国的保护伞下；第二，它的低国防开支有助于减少公共费用，从而为日本制造业生产提供更多的资源，使其美国及欧洲竞争对手严重遭受损伤。

假如日本真的对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批评家施加的压力作出响应而将其国防开支增加到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水平，即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 3～4%，那么这将是急剧的转变，这会使日本（同中国一道）成为世界第三军事大国，其一年的国防费用将超过 500 亿美元。毫无疑问，基于日本的技术和生产资源，它有能力为其海军建造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或作为威摄力量的远程导弹。这样做肯定使国内的一些公司如三菱公司等有利可图，同时提供了在远东对抗苏联的一支力量，从而为伸手太长的美国助一臂之力。

然而，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东京将努力避开外部压力或至少维持尽可能低的国防开支而又不导致与华盛顿不和。主要的原因还不是要保持日本国防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 1%的最高限额之内的这一纯粹象征性愿望；按北约的定义，（即包括军人养老金）日本早已打破了这个限额，无论如何在 50 年代初，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中相当大的百分比是用于国防费用的。这与 1951 年美日安全条约的条款也无多大关系，该条约是美军驻扎日本的法律根据，并进一步鼓励东京开展贸易，而不是考虑加强战略力量，因为 80 年代的情况已完全不同于朝鲜战争时期了。日本政府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本国和本地区反对大量增加国防开支和修改宪法中禁止向海外派遣军队（甚至出售武器）的规定。对于 30 年代军国主义的暴行、战争时期的损失、（尤其是）原子弹的恐怖的记忆，在日本人的意识中种下了根深蒂固地对战争及战争手段的厌恶和怀疑之感，其强烈程度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和平主义。然而，随着更年轻、更自信的一代的出现，这种记忆和感觉总会发生变化，在不远的将来，占主导地位的舆论很可能是迫使东京政府不断增加巧妙命名为“自卫队”的费用，使之达到一定的水平。

除了这些道义的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之外，还有经济的原因。

日本的实业家和政治家反对增加公共费用（正如上面提到的，日本的公共费用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所有成员国都低得多），因为对他们来说，增加1倍或2倍国防费用就必须通过大大增加公共部门的赤字或提高税收来支付，而这两者都是他们极其厌恶的。除此之外，据认为，30年代大规模的陆军和海军并没有给日本带来军事的或经济的“安全”，而且很难看出，现在增加国防开支是否能够防止阿拉伯国家切断石油供应。而后者在战略上，对日本来说，是比假设的核冬天还要严重的危险。由此说明，为什么每当中东出现危机时，东京便极力“委曲求全，默不作声”。再者，如果日本以一个世界性“贸易国家”的姿态出现，放弃使用武力，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那不是更好么？现代战争耗资巨大而且通常是破坏生产的，因此日本人认为他们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有许多优点。

这些看法无疑由于东京意识到下列事态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它知道它的许多邻邦对日本大规模建设军事力量将作出警觉的反应。显然，苏联定会作出反应，因为归根结底是美国要求日本“负担自己的一份”防务来对抗苏联；同时苏联同日本在北海道以北诸岛问题上仍有争端；而且苏联可能还感到，在远东要对付中国扩张实力就已经够伤脑筋的了。那些过去曾经被日本占领的地区如朝鲜、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会作出反应，它们对任何复活日本民族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迹象都已经神经过敏地作出了反应，它们一致鼓励东京“努力采取非军事性的方式促进东南亚的和平与安全”。也许，赫然出现在东京面前的困难首先是要减轻易发怒的北京的疑虑，北京对于1937～1945年间日本犯下的暴行记忆犹新，而且也已警告日本不要过多地卷入开发西伯利亚的事情（这使日苏关系复杂化了），或支持台湾。

甚至日本的经济扩张（同时带来急需的投资以及某些开发性

援助和旅游业等好处）也使它的邻邦深感疑虑，它们觉得正被再次吸进一个更新的、更阴险的、经过翻版的“大东亚共荣圈”中去，特别是因为日本从这些国家进口的商品不多（除原材料外），却向它们大量倾销自己的产品，它们的这一感觉就变得更加强烈了。在这方面，中国也是直言不讳的。起初，它欢迎70年代末日本迅速发展对华贸易和投资，后来急剧地削减了，部分原因是中国本身的国际收支逆差，部分是由于要避免经济上依赖任何一个外国，以便杜绝在中国取得非分的好处；邓在1979年要求美国同中国的贸易“必须与日本的相等”，以防止出现日本变种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

目前的这一切不过是预示今后的动向的小小迹象，但却使东京的政治家们对于日本走向21世纪时如何制定一项首尾一致的最佳对外战略感到焦虑不安。毋庸置疑，随着日本经济力量的扩展，日本会成为第二个威尼斯，不仅从广泛贸易的意义上讲是如此，而且也表现在保护它的海上通道和建立半海外属地方面。然而，内部和外部对于产生一个强大的日本均持反对态度，这一点使它不仅要避免按照老式帝国主义的方式采取行动来摄取领土，而且也不会增加很多国防力量。但是，后面这个结论将更加激怒那些要求西太平洋防务“负担均分”的美国人。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日本不大量增加军备开支，会受到批评，如果增加的话，也会遭到痛斥。不管日本走哪条路，都使它那美其名曰“最大获益最小危险的外交政策”招来麻烦。这再一次表明：即使日本经济增长的步伐加快，它也宁愿东亚的军事和政治态势尽可能地不发生变化。那也是一种复杂的困境，因为即使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也难以想象亚洲深刻的经济变革怎么能不给其他领域带来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

因此，日本人深深忧虑的可能是那些极少、甚至从未公开讨论过的问题。其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外交上的谨慎，另一方面是为

了避免出现这样的事态发展以及对东亚本身未来力量对比的关切。“全方位和平外交”就目前来讲自然十分美妙，但是，如果手伸得太长的美国真要摆脱它对亚洲的承诺，或发现无法保护石油从阿拉伯源源流向横滨时，这一外交政策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爆发另一场朝鲜战争，它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中国开始统治这一地区，它又有何用场呢？如果正在衰落的、神经质的苏联采取侵略行为它又有何好处呢？当然，无法回答这种假设的和吓人的问题。然而，即使是一个仅有一支小“自卫队”的“贸易国家”，有朝一日也会发现它将不可避免地要作出回答。正如过去所发现的在国际强权政治的无政府主义的世界里，商业才干和金融财富有时也不再能发挥作用了。

三、欧洲经济共同体——潜力与问题

当今世界上有5个主要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中心，其中唯有欧洲不是单一的主权民族国家——这就说明了这一地区在进入21世纪初新兴大国体系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即使我们在考虑这块大陆的未来前景时把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排除在外（由于现实的某些原因而必须这样做），我们还面临这样一些国家：有些是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个经济政治组织的成员但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军事联盟的成员，而另一些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但又不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还有一些则是两者都不参加的中立国家。由于存在这种异常现象，所以这一节将着重研究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主要成员国的政策）而不把非共产主义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这是因为只有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一组织和结构才至少**有可能**形成第五个世界力量。

然而，正是因为我们研究的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潜力**而不是其当前的现实情况，因而要推测它在2000年或2020年是个什么

样子，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形势类似于19世纪中期德意志联邦成员所处的情况，只是后者的规模小一些。已有的关税同盟已经证明它在鼓励贸易和工业发展方面非常成功，因此很快吸引了一些新成员参加，而且很明显，如果这个扩大的经济共同体能将自己变为一个强国，那么它就会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新的重要角色——已有的大国将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调整。然而，只要不发生这种变革，只要关税同盟的成员国之间对于进一步的经济一体化以及更进一步的政治和军事一体化有分歧；只要存在着关于哪个国家为首的争吵，以及各党派与压力集团之间关于得失的争论，那么它就将长久地处于分裂状态，无法发掘其潜力，也不得与其他强国平起平坐。虽然时间和环境都不相同，但是上一个世纪的“德国问题”仍是目前“欧洲问题”的缩影。

就潜力而言，欧洲经济共同体显然拥有一个大国的规模、财富和生产能力。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参加，其12个成员国的人口现在总共为3.2亿左右——比苏联人口多5000万，几乎比美国人口多一半，而且，受教育的程度很高。在欧洲有几百所大学和学院，并且有数百万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虽然共同体成员国平均人均收入掩盖了巨大的悬殊——例如，在西德与葡萄牙之间收入差别就很大——但是总的来说比苏联富庶得多，而且有些成员国按人均计算比美国还要富裕。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它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虽然其中大部分是欧洲内部贸易。衡量其经济实力的更好的标准也许是汽车、钢铁、水泥等的产量，在这方面它已超过美国、日本和苏联（除了钢铁）。根据每年的统计数字以及过去6年中美元与欧洲货币比价的大幅度涨落情况，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1986年）与美国大体相当，或者相当于其2/3（1983～1984年的数字）。它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或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比重、肯定

远远高于苏联、日本或者中国。

在军事方面，这些欧洲成员国也决不能被忽视。仅就4个最大的国家（西德、法国、英国、意大利）而言，它们的正规部队的总规模已超过100万人，还有170万后备部队——这一总数当然比苏联和中国的军队少，但是却比美国军队多得多。另外，这4个国家拥有几百艘大型水面战舰和潜艇以及成千的坦克、大炮和飞机。最后，法英两国都拥有核武器以及海基的和陆基的运载系统。这些军事力量的意义和作战效能将在下面讨论；这里要指出的只是，**一旦联合**，总的实力是十分可观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军事力量的费用，大致平均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如果那些国家甚至于整个欧洲经济共同体能象美国现在一样，将国民生产总值总额的大约7%用于国防，那么国防开支总额就将相当于数千亿美元——也就是说，大约相当于两个军事超级大国所花费的数额。

然而，欧洲在世界上所呈现的实际力量和作战效能，却远远低于其本身经济与军事实力应有的水平，其原因就在于不统一。例如，军队不仅遇到语言障碍（德意志联邦的成员决不会有这个问题），而且装备着许多不同的武器，在素质和训练方面有着十分明显的差距——例如在西德和希腊陆军之间，或者在皇家海军和西班牙海军之间。虽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标准化方面有很多打算，但是现在仍在讨论12个国家的陆军、海军和空军的不同价值问题。然而，比起与欧洲外交和防务政策在轻重缓急的安排上出现的政治障碍，那些问题就退居次要地位了。爱尔兰的传统的（不合时代潮流的）中立态度，妨碍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讨论防务问题——即便讨论，也会由于希腊的反对而很快搁浅。土耳其具有实力很大的军队，但它不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并且土尔其和希腊的军队时常互相提防，甚至超过了对华沙条约国家的担心。法国采取独立的立场，（正如下面将看到的）在军事上既

有利也有弊；并增加了在防务及对外政策问题上进行磋商的复杂性。英法两国都沉迷于“本地区以外”作战，并且确实还保持着大量的海外基地和军队。至于西德，压倒一切的防务问题——为此其所有的军队都被调动了起来——是其东部边界的安全。因为每个成员国有着不同的利益和传统，所以在一些问题上，例如对于巴勒斯坦问题乃至对待美国的问题，要形成统一的欧洲政策是极其困难的（而且往往失败）。

在经济一体化以及为了实现经济领域的决议而制定的规章制度方面，欧洲经济共同体显然已远远走在前面；即使这样，作为一个“经济共同体”，它比一个主权国家要疾散得多。政治思想始终影响着经济政策与经济重点。当社会党在一些成员国中当权，而保守党在另一些国家中统治的时候，协调即使不是不可能的，那也是很困难的。虽然在货币方面的协作现在比过去更成功了，但是有时也必须进行重新调整（通常涉及到德国马克改值），这说明各成员国有独立的财政制度和不同的信誉。尽管欧洲委员会提出过不少建议，但是在从全面解除对航线的控制到金融服务等各种问题上，要采取共同的欧洲政策仍然毫无进展。在许多共同边界的地方仍设有海关检查所，进行烦琐的检查，使货车司机们十分恼火。农业是欧洲经济共同体主要经济来源，也是享有“共同市场的少数几个部门之一、尽管如此，农业也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焦点。而且，如果世界粮食生产确有可能继续扩大，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越来越多地进入出口市场，那时要求欧洲经济共同体改革价格补贴制度的压力将不断增长，直至问题再次爆发成为一场激烈的争论。

最后，人们一直担心在经过战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与获得成就之后，欧洲就要开始停滞甚至可能衰退。1979 年石油危机引起的问题——燃料价格的暴涨，对支付平衡的压力，在需求、产量和贸易方面的世界性普遍不景气——对欧洲的打击似乎比对世

界上其他经济大国的打击更厉害，参见表45。

表45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情况（1979～1983年）

（单位：%）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美　国	2.8	−0.3	2.6	−0.5	2.4
加拿大	3.4	1.0	4.0	−4.2	3.0
日　本	5.1	4.9	4.0	3.2	3.0
中　国	7.0	5.2	3.0	7.4	9.0
欧洲经济共同体(10国)	3.5	1.1	−0.3	0.5	0.8

欧洲国家的主要忧虑之一是这种衰退对就业水平的影响——近几年来西欧的失业人数比1945年以后的任何时期都多得多(例如，1978～1982年期间欧洲经济共同体内失业人数从590万人，增至1020万人)，而且丝毫没有减少的迹象——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已经极高的社会支出，致使投资减少。在进入80年代以后，也根本没有象美国（主要在低工资的服务性工业部门）和日本（在高技术和服务性行业）那样大规模地建立新职业。对此，无论人们归咎于缺乏商业刺激、高成本和劳动力市场不活、官僚主义管理过死（右翼分子倾向这样看），还是归咎于国家计划不周和投资不足（左翼分子通常这样看），或不幸两者兼而有之，其结果都是一样。对于许多评论家来说，更令人吃惊的是，有迹象表明，在未来的高技术竞赛中，欧洲正落在美国、(特别是)日本竞争对手之后。因此，欧洲委员会在《1984～1985年度经济报告》中提出如下警告：

在迅速发展的新技术工业能力方面，共同体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日益处于劣势地位，对于这一挑战现在必须作出反应。……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共同体在计

算机、微电子学和设备等领域的世界贸易状况日趋恶化。

“欧洲硬化症”和“欧洲悲观主义”的这种景象很可能描写得太令人沮丧了，因为欧洲在许多其他方面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例如高级小汽车、民用和军用飞机、卫星、化学制品、电信系统、金融服务等。不过，还有两个紧迫的问题悬而未决。欧洲经济共同体由于成员国的社会政治差异，它能够象其海外竞争者那样适应就业方式的迅速而巨大的变化吗？或者说，它打算设法减缓经济变革对无竞争力的部门（农业、纺织业、造船、煤和钢）的影响，因而从近期来看十分人道而从长远来看却损害自己吗？另一个问题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公司规模远不及美国和日本巨人的那样大，并且任何“工业战略”不是由象日本通商产业省之类的机构来制定，而是由关心的问题各不相同的十二国政府（加上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来拟订的，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经济共同体能够动员科学和投资资源以保持在高技术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吗？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个整体暂时转移到简要研究一下欧洲处于领先地位的三个军事—政治国家的形势，就会进一步感到它们的“潜力”正受到“难题”的威胁。大概没有一个国家会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那样对未来抱有矛盾心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遗留的影响以及欧洲目前结构仍然具有的“临时”性。

虽然许多德国人对于他们的国家到21世纪初的经济前景表示担心，但还不是很大的焦虑（特别是与其他国家面临的经济困难相比）。它的总劳动力仅稍多于英国或法国，但国民生产总值却高得多，这说明长期以来它的经济生产增长情况一直很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它是钢、化学制品、电气产品、汽车、拖拉机以及（在英国逐渐衰退的情况下）商船和煤的最大生产者。由于它的通货膨胀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同时劳资争端也很少，尽管西

德马克经常升值它的产品出口价格仍具有很大的竞争力，这使其他国家最后终于认识到西德的经济优势。强调工程与设计是西德管理工作的传统（美国则强调资金供应），所以它的产品质量享有很高的国际信誉。西德经济的贸易收支平衡逐年都有盈余，在这方面仅次于日本。它的国际储备金大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由于日本最近几年发展很快，可能例外)，并且其他国家经常用西德马克作为储备货币。

上述情况说明了使德国人焦虑的因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农业价格补贴制度对于德国纳税人是一个长期负担，这种制度把竞争力最强的经济部门的资源分配给竞争力最差的经济部门——而且不仅在西德国内如此（西德有大量小农场），对于南欧的农民也如此。这种做法虽有明显的社会价值，但与美国甚至日本给予农业的保护相比，负担沉重得多。西德的失业率一直很高，说明西德仍有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分布在老式工业中，这对于经济来说也是一个重大负担，同时使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大一部分要用于支付社会保险金。虽然年青人的失业可以通过提高培训水平和延长学徒年限以及人口的迅速老化而得以缓解，但人口老化的趋势可能是人们最大的忧虑。如果说德意志民族将“灭绝”，显然言过其实，但是，人口的很大比例是领取抚恤金的老年人，而出生率又急剧下降，这种情况对于德国经济将有着明显的影响。除了对于人口方面的担心以外，还有一种无形的忧虑，那就是“下一代接班人”不愿意象在战后的废墟上重建德国的那代人那样努力工作，而且由于工资比日本高，每周工作时间比日本短得多，甚至德国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会比不上太平洋地区。

即使如此，只要德国能够保持低通货膨胀、高质量产品、在新技术方面的巨额投资、高超的设计和销售方法以及劳资和睦等优势，那么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上述问题影响德国经济，那么它们对大多数缺乏竞争力的邻国的

经济的损害将会大得多！）令人更难以预测的是，从40年代后期就已存在的极为复杂、极为特殊的“德国问题”，会不会原封不动地保持到21世纪；这就是说，是否将继续存在被两个敌对联盟分离的两个德国，尽管它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友好；如果东西方关系恶化到采取敌对行动，那么北约组织（西德在其中处于重要地位）是否能在不使西德遭受破坏的情况下保卫德国国土。而且，一旦美国力量削弱并减少其驻欧洲军队时，德国及其欧洲经济共同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主要伙伴是否能相应地替代过去40年来起着良好作用的美国战略保护伞。这些互相有关的问题并没有要求立刻得到解决，但是引起了有创见的观察家们的关注。

当前“两个德国”的关系可能是所有这些问题中的关键。前几章已阐明，至少一个半世纪以来，德国人民在欧洲国家体系中的适当地位问题一直使政治家们十分烦恼。如果所有说德语的人组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正象近两个世纪以来欧洲人的行为规范那样——那么人口和工业能力集中的结果，将使德国永远成为中西欧的经济力量中心。这种情况并不**必然**导致德国成为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军事大国，就象德皇威廉、甚至纳粹时代的帝国主义谋求德国霸权那样。在军事上仍由华盛顿和莫斯科控制的两极世界中，在主要大国的侵略有触发核战争危险的时代，在1945年后“非纳粹化”的一代德国政治家掌握波恩和东柏林事务的情况下，今后德国任何企图获得“欧洲霸主”地位的想法都是时代性的错误。即使它有这种企图，欧洲（更不用说全球）的力量对比也会战胜它。因此，从理论上说，特别是当“西”德和“东”德的人民都日益认为，他们彼此之间比起与其超级大国保护人之间有更多共同之处时，让6200万西德人与1700万东德人重新统一，确实不是什么错误**而且是非常正确的**。

不幸的是，尽管这种解决办法在某种意义上说多么合乎逻辑，尽管两个德国的人民（虽有意识形态分歧）都亟力表示他们

具有共同的传统和文化，但是目前的政治现实不允许这样做，即使有人巧妙地暗示可以采取 19 世纪松散的德意志联邦的模式也不行。因为事实上东德起着苏联控制东欧缓冲国的战略屏障的作用（更不用说也是进攻西方的跳板），同时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仍从帝国主义**现实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倾向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并与之合并），看成是对自己的严重打击。一位权威人士最近指出，根据现有的兵力，一个统一的德国就能够部署 66 万多正规军和 150 万准军事和后备部队。苏联不会对其西翼拥有 200 万军队的统一的德国处之泰然。另一方面，似乎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和平**统一的德国要保持这样大规模的武装力量，这反映了目前的冷战紧张局势。同时，也很难相信，尽管苏联领导人非常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但是他们自己却在宣传德国复仇主义和新纳粹主义（自从维利·勃兰特当政以来已难以推行这类主义）。而且有一点很明显，即莫斯科从来就不愿意从**任何地方**撤退，并且非常担心统一的德国带来的政治后果。统一的德国不仅是一个在自己右翼的令人可怕的经济大国——其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危险地接近于苏联自己，至少从官方美元换算值来看是如此——而且它对于东欧邻国具有强大的贸易吸引力。更带有根本性的一个问题是：苏联怎样从东德撤回而又不会挑起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同样撤回的问题，如果全部撤出，苏联的西部边境将成为未定的波兰／乌克兰边界线，而边界的这一方还有 5000 万乌克兰人。

因此，德国统一问题处于暂停状态。两个德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可能增长（偶而在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紧张时才削弱）；东、西德可能都比它们的邻国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和更多的财富；它们各自都发誓忠实于其超国家的军事组织（北约和华约）和经济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经济互助委员会），同时在它们彼此之间又还有一些特殊的安排。无法预料，如果苏联内部政局不稳发生动

摇，而且正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严重动乱，波恩将会作何反应。同样也无法预料，如果华沙条约组织向西方进攻，"东"德将作何反应。毫无疑义，苏联对民主德国的军队采取了特殊的"控制"措施，每一个东德师都由一个苏联摩托化步兵师进行保护，这说明克里姆林宫无情的领导人物对于"德国人打德国人"十分担心，实际上他们也应担心。

但是，联邦德国当前面临的（事实上是从它存在以来就一直面临的）更实际、更直接的问题是，必须找到一种在欧洲万一发生战争时切实可行的防务政策。从一开始西德及其欧洲伙伴就担心非常强大的红军可以向西进攻而不会遇到多大的障碍，因此只能依靠美国的核威慑作为安全的主要保证。然而，自从苏联拥有用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以来，尽管并未正式放弃上述战略，但这一战略的可靠性已十分可疑了，在苏联对西德北部平原发动常规进攻的情况下，华盛顿果真会开始一场核交锋来回击吗？同时也产生了另一个有关的问题：如果苏联仅使用近程或中程导弹（SS—20）来打击欧洲目标，那么美国会不会对苏联发动战略核攻击呢（同样会招致对它自己的城市的报复）。诚然，曾有不少建议主张建立"可靠的威慑"以防万一：装备"潘兴—II式"和各种巡航导弹系统来对付苏联的SS—20；生产强辐射弹（或"中子弹"），用于杀伤入侵的华约军队而又不破坏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并且——在法国的情况下——依赖由巴黎控制的威慑力量作为靠不住的美国防御系统的一种替换手段。然而，所有这些办法都有它们自己附带的问题；除了它们引起的政治反应以外，每种办法都表明了核武器系统的独特的相互矛盾特性——使用核武器很可能导致所希望保卫的东西遭到破坏。

因此，毫不奇怪，虽然历届西德政府口头上高唱北约的核威慑战略的价值，并且早就发誓要有自己的核武器，但是它们始终把建立强大的常规防御系统放在显著的地位。事实上，联邦德国

国防军不仅拥有北约欧洲最庞大的军队（33.5 万军队以及 64.5 万受过训练的后备部队），而且素质极好，装备精良；如果它不丧失制空权，那么它可以干得非常出色。另一方面，出生率的急剧下降使得国防军越来越难以保持满员，同时政府希望国防开支保持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5～4%，这就意味着武装部队将难以采购满足它们所需数量的新式装备。归根结底，这些弱点是能克服的——就象驻在西德的装备较差的盟国军队那样，只要政治立场坚定，一切不足也都可以克服。然而，这仍然使德国人面临令人不安的（对有的人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困境：在中欧爆发任何大规模敌对行动，都会在它的国土上导致极大的流血和物资损失。

因此，毫不奇怪，至少从维利·勃兰特担任总理以来，波恩政府就把追求欧洲**缓和**放在首位——不仅希望与它的姊妹国东德缓和关系，而且还希望与东欧国家和苏联缓和关系，尽力使它们那种一贯对过于强大的德国恐惧情绪镇定下来。西德比其他所有北约伙伴更加积极参与东西方贸易并且为这种贸易提供资金，它深信科布顿[①]的信条——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可使战争难以发生（而且无疑也是因为西德的银行和工业处于有利于获得商业利润的地位）。这并不意味着两个德国都在走向"中立主义"——正象左翼社会民主党和绿党有时主张的那样——因为这将取决于莫斯科也赞成东德中立，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这件事本身说明，西德在它的安全问题上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于欧洲，并且避免卷入任何"地区以外"的事务——更不用说象法国和英国那样仍旧偶而参与超出欧洲以外的行动了。因此，具体地说，西德不喜欢别人强迫它对于近东或更远的地方的那些（在它看来）分散自己的

①理查德·科布顿（Richard Cobden，1804～1865）：英国19世纪中叶自由贸易派代表，主张和平扩张贸易，自由竞争。——审校者注。

精力、相距很远与己无关的问题表态，这反过来又使它与美国政府的看法不一致，因为美国认为，保持西方安全不能单纯地限于中欧。西德从它与莫斯科和东柏林的关系中以及从处理非欧洲问题中，深感仅仅进行双边外交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它必须考虑到华盛顿的反应（往往还有巴黎的反应）。这也是由于它在国际大国体系中处于困难而独特的地位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如果联邦德国认为对付经济挑战比处理外交和国防政策问题容易一些，那么英国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英国的历史渊源及其地理位置强烈地影响着它的对外政策。但是，正象我们在前面几章中看到的那样，在以前的大国中，英国的经济和社会最难适应1945年后几十年来技术和工业生产不断变化的形势（1945年以前的几十年内在许多方面也是如此）。世界性变化的影响最大的是在工业生产部门，而这是一度使英国赢得“世界工场”称号的一个部门。确实，在世界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工业生产在产量和就业人数方面所占的比例在不断缩小，而其它部门（例如服务性行业）却在增长；但就英国的情况而言，这种趋势下降的速度比其他国家更快得多。它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所占比例，不仅**相对地**不断严重下降，而且**绝对地**减小。更令人震惊的是制造业在英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的突然变化。虽然很难证实《经济学家》杂志以下刻薄的看法：“1983年以来英国在制造业方面的贸易收支一直出现赤字，这还是自从罗马人侵略英国以来头一次发生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即使在50年代末，制造业的出口额仍为进口额的3倍。现在，这种盈余再也不会有了。更重要的是，就业下降不仅发生在比较老的工业部门，而且发生在“新兴”的高技术领域。

如果说英国制造业竞争能力的下降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那么北海石油的发现则显然更加速了这种衰退。虽然它的生产收益

掩盖了有形贸易差额，但是对于将英国货币转换成“石油货币”也有影响，使英磅价值一时上升到与实际不符的高水平，造成许多出口产品失去竞争能力。即使石油开采完，使英国货币进一步贬值时，也很难说这就会在事实上导致制造业的复兴，因为工厂已被拆毁，外国市场已经丧失（也许永久丧失），并且由于单位劳动力费用的增长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影响了国际竞争力。英国转向发展服务业还是很有希望的，不过它的情况与美国一样，许多服务业（从擦窗户到快餐食品），既赚不到外币也不是生产性的。即使在国际金融、投资、日用品交易等不断扩展、赚钱很多的领域，显然竞争更为激烈。在过去30年中，“英国在世界服务性行业贸易中所占份额已从18%下降到7%”。随着银行业和金融业变成一种全球性行业，并日益受到纽约、伦敦、东京拥有大量资本的公司（主要是美国的和日本的公司）控制，英国所占的份额可能进一步减小。最后，电信事业和办公设备的发展前景已经预示，不久，在西方白领职员将可能重蹈兰领工人覆辙。

英国人希望这一切不是预示一场社会大变动来临的先兆，因为世界生产和贸易的普遍增长仍有助于保持英国经济应付自如的能力，尽管英国在世界生产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并且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陆续被从西方的意大利到东方的新加坡等许多国家所超过。如果政府的更迭导致社会开支（而不是生产投资）大大增加、税收更重、商业信誉下降和英国货币流失，那么这种下降的速度会大大加快；如果政府采取不很严格的货币政策，实行首尾一致的“工业战略”并且与欧洲同伴合作进行有销路的（不显赫的）商业企业，则下降速度可能放慢。也可能象一位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英国的制造业现在总的来说结构更加精干、适应性更强、竞争力更大，正在经历着“工业复兴”。但是，英国大转变的预兆并不吉祥。劳动力市场相对停滞、劳力缺乏训练，产品单位成本高，即使最大的英国工厂其规模也比较小，这些都

是十分不利的条件。培养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数量很少。最重要的是，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太少；80年代初英国在研究与开发方面每花费1美元，相应地德国要花费1.50美元，日本为3美元，美国为8美元——而且，英国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有50%是用于非生产性防务活动，相比之下，在这方面德国只占9%，日本更微不足道。与它的主要竞争对手（除美国以外）相比，英国的研究与开发工作与工业需要严重脱节，其费用也很少由工业界自己支付。

用于与国防有关的研究与开发经费的比例很大，这是英国陷入困境的另一个因素。假如英国是一个没有野心、没有名气、孤立而温和的国家，那么它的慢性工业贫血症不过是一件憾事而已，而与国际大国格局无关。但事实是，英国虽比维多利亚女王全盛时期国力大衰，但仍不失为——或自称为——世界上领先的“中等”强国之一。它的国防预算占世界第三位或第四位（这取决于怎样衡量中国的总额），其海军为第四位，空军也排在第四位——可以认为，所有这一切与它的国土面积（只有245，000平方公里）、人口（5，600万）和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中等而且不断下降的比例（1983年占3.38%）都是极不相称的。而且，尽管英帝国主义已日薄西山，但在国外仍有十分广泛的战略承诺：不仅承担对北约中欧前线的义务在德国驻有陆军和空军6.5万人，而且在伯利兹、塞浦路斯、直布罗陀、香港、福克兰群岛、文莱、印度洋等世界各地拥有驻军和海军基地。尽管英国早已多次声明要从这些地方撤出，但迄今还没有一个被遗弃的尼尼微和蒂尔[1]。

---

[1] 尼尼微（Nineveh）：系古代亚述帝国首都，公元前612年被攻陷，其废址位于今伊拉克境内。蒂尔（Tyre）为古代腓尼基最南部海岛，在今黎巴嫩境内。——审校者注。

英国衰退的经济状况与其过分扩张的战略态势之间的这种脱节现象，在所有大国中是最严重的（除苏联以外）。因此，它已意识到特别难以承受的事实是，武器价格正以比通货膨胀还高6～10%的速度上涨，每一种新武器系统都比它欲代替的武器系统贵3～5倍。在国防开支问题上国内政治的龃龉使英国地位更为脆弱；保守党政府认为有必要保持军备开支以减少赤字，而下届政府又可能主张大砍国防开支。除这种政治困境外，英国不久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场重大抉择：要么削减各个军种的经费，使每个军种都处于缺乏作战能力的状态，要么减少英国承担的某些军事义务。

而且，只要这种建议一经提出，障碍就随之出现。掌握制空权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皇家空军的预算优惠），即使新式欧洲战斗机的成本在螺旋式上升也是如此。英国最大的海外承诺是对德国和柏林的军事义务（几乎40亿美元），但现在驻在那里的5.5万军队、600辆坦克和3000辆其他装甲车辆，仍存在供应不足的问题，尽管军队士气很高。然而，对英国驻莱茵的军队作任何裁减，或者采取灵活的策略把驻德英军的一半屯驻在英国，看来都会引起这样的政治反响——德国悲叹，比利时仿效，美国恼怒，所以这种办法是完全不行。第二种办法是削减水面舰队的规模——这是1981年国防部提出的解决办法，但是到福克兰群岛危机时这一方案被推翻了。而且，尽管白厅的权力阶层中大多数人拥护这一方案，但是由于苏联的海军挑战日益加剧和美国越来越强调北约面临着“地区以外”的威胁，所以这种方案看来是不合时宜的。（并且，它肯定与另一种意见相矛盾，这种意见主张加强北约在欧洲的常规力量以削减北约在大西洋护航的第二支最大的舰队。）另一个可行的“削减”方案是，英国减少在福克兰群岛所承担的开支很大（虽然在感情上是可以理解的）、过分扩张的义务。但是即使这样的“削减”可能也要拖几年才作出决定。最

后，决定对于价格极为昂贵的"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系统进行投资，其费用似乎还在逐月上升。由于保守党政府对于建立先进的和"独立"威慑系统的热情很高（认为"三叉戟"潜艇实际上在改变着整个核力量对比），所以关于"削减"的决定看来只有留待英国政府急剧改组以后才有可能，这反过来又会使将来的防务政策产生很多问题。

然而，归根到底，事情难办。正象《星期日泰晤士报》所说的那样，"除非当机立断，否则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将越来越倾向于试图花更少的钱干同样的事，这只能有损于英国和北约。"这就给（任何政党的）政治家留下了两条可供选择的出路：或者减少一些承担的义务，并忍受由此带来的后果；或者仍然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英国国防开支多于除希腊以外的任何其他欧洲北约伙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从而减少发展生产的投资并使其经济恢复的长远前景变得更加渺茫。与大多数正在衰落的大国一样，英国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同样的困难也摆在法国这个英吉利海峡彼岸的英国邻国面前。只不过由于法国国防政策在国内没有受到不断批评并且从50年代以来经济状况相当好（尽管仍然有缺点），而掩盖了这种困境而已。归根结蒂，与伦敦一样，巴黎也必须解决仅仅是一个"中等"大国，却拥有广泛的国家利益和海外义务的这个问题，法国的国防也面临着由于武器成本不断上涨而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虽然法国的人口与英国一样多，但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英国的高。法国生产的汽车和钢也比英国多，并且拥有规模巨大的航空航天工业。与英国不同，法国仍严重依赖于进口石油；另一方面，欧洲经济共同体给予法国大量农业补贴，它的农产品自给有余。在许多重要的高技术领域——电信、卫星、飞机、核动力——法国显示了要保持世界性竞争能力的坚强决心。尽管80年代初（正当它的所有主要贸易伙伴都减少财

政收入的时候）由于社会党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过猛过快，而使法国经济受到严重损失，但是后来实行了较正确的政策，看来已降低了通货膨胀率、消除了贸易逆差并且稳定了法郎，这一切使得法国经济又重新增长起来。

但是，只要把法国的经济结构和前景与其莱茵河彼岸的强大邻国——或者与日本——相比较，它的危险就完全显露出来了。虽然法国在出口战斗机、葡萄酒和谷物方面善于经营，但它“在向国外销售一般制品方面力量较弱”。它的买主很多都是不稳定的第三世界国家，它们订购价格高昂的法国产品如水闸和“幻影”式战斗机，尔后又无力付款；对比之下，外国工业品、汽车和日用电器向法国市场“进口渗透”，表明法国许多领域的产品没有竞争力。它对西德的贸易赤字逐年增长，并且因为法国物价一直比德国上涨更快，所以完全可能导致法郎进一步贬值。法国北部到处都是逐渐衰落的工业——煤、铁、钢、造船——其汽车工业也大都感到十分紧张。虽然新技术似乎给法国带来很大的希望，但是这些领域既不能吸收法国的许多失业者，又不能获得所需资金以便与日本、西德和美国的技术发展并驾齐驱。对于一个经济上依附于农业（心理上希望更大的进口）的国家来说，更值得担心的是谷物、奶制品、水果、葡萄酒等全球性生产过剩带来的危机。如果继续维持农产品价格补贴政策，法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预算就要越来越紧张，如果削减价格补贴，又有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危险。直到前几年，巴黎还可以依赖共同体资金调整农业；但是现在这些现金似乎大部分都给了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农民。所有这一切就使得法国在今后20年内缺乏必要的资金以开展大规模研究与开发工作和促使以高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持续增长。

有必要从确定法国未来事务轻重缓急的安排这一更广泛的范围来探讨一下法国在有关国防政策上的一场辩论。法国近年来的

战略和军事行动在许多方面都是令人瞩目的。由于法国认识到(并断然声明)对于美国战略核威慑的可靠性越来越持怀疑态度，所以它也建立自己的“三位一体”运载系统，以备万一苏联发动侵略时使用。法国把核威慑的每个方面（从生产到作战使用）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坚决主张如果威慑失效就将其导弹力量全部用于打击苏联，所以巴黎觉得它拥有遏制苏联的更可靠的手段。同时，它保持一支强大的地面部队，并且在德国西南部有一支庞大的驻军，承担帮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义务；虽然它不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指挥机构，因而可以对战略问题发表独立的“欧洲人的”看法，但在一旦苏联发动进攻时仍会出于军事需要增援中欧前线。此外，法国还坚持在欧洲以外地区发挥作用。通过偶而的海外军事干涉、在第三世界国家遣派驻军和顾问以及它们成功的军火销售政策成为可以代替苏联或美国的一种力量和供应来源。如果说这样做有时会激怒美国，同时法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核试验也理应引起这一地区的国家的烦恼，那么苏联对法国人表现的各式各样有时甚至难以想象的独立性也不会感到愉快。鉴于法国的右翼分子和左翼分子都支持法国在国外起突出作用，法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和行动没有引起国内的批评，这在所有其他西方国家都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一切使得外国观察家们（当然也包括法国人自己）把法国的政策说成是合乎逻辑的、屈服的、现实的等等。

但是，正象一些法国评论家开始公开承认的那样，这种政策本身也并不是没有问题。法国的政策必定使了解历史的人们回忆起1914年和1939年以前法国国防政策的理论和现实性之间有过的差距。首先，通过冷静的观察看到的事实是，法国的各种独立姿态都是在美国对西欧提供了保护伞以及常规的和核的保证的背景之下采取的。雷蒙德·阿让指出，戴高乐派之所以能够坚持自己的政策，只是由于法国本世纪以来第一次不处于前线。但是，

如果这种安全性消失，情况又会怎样呢？也就是说，如果承认美国核威慑是不可靠的，情况会怎样呢？如果美国逐渐地从欧洲撤回它的部队、坦克和飞机，情况会怎样呢？在一定的情况下，这两种事件发生可能受到人们的欢迎。但是，正象法国人自己承认的那样，他们现在不会表示欢迎；因为从苏联目前的政策来看，苏联正在不断地建设核力量和驻欧洲的常规力量，使之达到非常强大的程度；对它的东欧卫星国进行严格控制；发动旨在诱使西德公众脱离北约联盟、保持中立主义的"和平攻势"。出于对未来的担忧，法国提出所谓"新大西洋主义"——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语调，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中立主义倾向，法德协议在德国前沿部署"快速反应部队"（可能装备有战术核武器），与北约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在莫斯科改变政策以前，巴黎必然为美国从欧洲撤军后（甚至撤军以前）苏联可能入侵西欧感到担忧。

如果可能出现这种威胁，法国实际上会怎么做呢？自然，它可以进一步增加常规部队，建立一支强大的、足以在美军减少（甚至完全撤离）时也能顶住苏联进攻的法德陆军。在赫尔穆特·施密特这样一些人看来，这不仅是巴黎·波恩协约合乎逻辑的发展，而且也是国际趋势（例如美国能力的削弱）的必然结果。要实行这一计划会遇到各种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困难——从将来中间偏左的西德政府的态度，指挥、语言和部署问题，直到法国战术核武器这个棘手问题——但无论如何，这一计策定将由于缺乏资金而触礁失败。法国目前的国防开支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2%左右（而美国为7.4%，英国为5.5%），由于法国经济脆弱，这个百分比不会再有很大增长。而且，法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的独立性意味着其核战略力量占国防预算的30%，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剩下的钱不能满足制造AMX战斗坦克、高级飞机、新型核动力航空母舰、"灵巧"战场武器等等的需要。虽然法国的武装部队可能会有一定的增加，但是不可能满足全部需要。

因此，正象英国的情况一样，法国也面临着棘手的选择问题：要么完全放弃某些武器系统（及其产生的作用），要么把全部经济力量用在武器上。

同样令人担心的是，在技术和（有关）战略上，人们对于法国的核威慑作用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作为法国"三位一体"核武器系统组成部分的陆基导弹，特别是飞机，其性能已逐渐落后，即使耗资加以改进和实现现代化改装也赶不上更新的武器技术的发展。如果美国人的战略防御计划取得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俄国人接着也发展更庞大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得特别尖锐。从法国的观点来看，最令人烦恼的事情莫过于两个超级大国提高它们自身免遭攻击的能力，而欧洲却毫无遮掩，易受侵害。为此，法国也大力建造潜射弹道导弹系统。然而，这个普遍的原则依然存在：先进技术能使现有的各种武器失去作用，同时肯定使行将替代的武器成本更加昂贵。无论如何，法国与所有其他核大国一样，也产生了对核威慑可靠性的疑问。如果法国已认识到美国越来越不可能因为德国边境受到侵犯而冒险与苏联进行一场战略核大战，那么它自己怎么可能为了联邦德国的利益而希望"进行核战争"呢？（西德几乎不相信这一点。）戴高乐派一贯主张把所有的法国导弹射向苏联来保卫神圣的法兰西，这是建立在一个未得到证实的假设之上的：法国人民宁死也不愿（或可能）被常规武器击败。"砍掉俄国熊的一条手臂"这句话说起来非常动听，直到人们想起肯定要被这只熊吞掉，并且俄国自己的反导弹防御可能使它所受的损失有限，于是恍然大悟。显然，法国官方的核战略姿态不会很快发生变化，也许根本不变。但是，人们不禁感到奇怪，如果东西方力量对比恶化，美国的力量进一步削弱，那么法国的核战略还有什么现实意义。

因此，法国的问题就在于它的国家资源有限，而需求又多，压力很大。从人口和结构经济趋势来看，社会保险金在国民收入

中所占份额看来将继续保持很大而且还可能再增加。农业部门不久可能需要大笔资金。同时，武装部队的现代化需要大量开支。然而，所有这一切需求必须要同研究与开发和先进工业生产方面迫切的巨额投资需相平衡而不能挤掉后者。如果不给后者分配必需的资金，那么经过一个时期，就会处于无法支付国防、社会保险及其他一切事业费用的危险境地。显然，在欧洲国家中并不是只有法国才遇到这种困难，不过法国在国际经济和防务问题上最强调特殊的"欧洲"立场，因此最明确地表达了欧洲人的忧虑。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通常总是巴黎率先提出新的政策——加深法德军事联系，生产欧洲"空中公共汽车"和卫星，等等。许多这类方案在法国的邻国中引起了怀疑，认为法国人爱搞官僚计划和抬高自己，或怀疑法国公司可能在欧洲提供资金的项目中获得最大份额。但是，其他一些方案则已经证明是值得实行的或者看来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当然，欧洲的问题除了这里研究的以外还有很多：包括人口老化和工业过时，内地城市中的种族不满，繁荣的北部和落后的南部之间的差距，比利时、北爱尔兰和西班牙北部在政治和语言方面引起的紧张关系。悲观主义的观察家们也有时提到，某些欧洲国家（丹麦、西德）存在着"芬兰化"的可能性，它们会依附于莫斯科。因为这种事态只有在有关国家中发生左倾政治变化后才会出现，因此现在难以估计其可能性。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主要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代表的欧洲看成是全球体系中的一个**强权政治**单位，那么它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显然是上面讨论的那些：如何逐渐形成下一世纪的共同防务政策，这一政策即使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也具有生命力；以及如何在新技术和新商业竞争者提出的极其严峻的经济挑战面前保持竞争力。就本章所研究的其他四个地区和国家的情况而言，可以推测它们目前的地位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将发生的变化：日本和中国在世界

上的地位可能会提高；苏联甚至美国的地位将下降。但欧洲则仍然是个迷。如果欧洲共同体能够真正统一行动，那么就可以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提高其世界地位。否则的话——从人类的本性来看这倒是更有可能的结局——它的相对衰落看来注定要继续下去。

四、苏联及其"矛盾"

"矛盾"一词在马列主义术语中是一个很特定的词，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所固有的矛盾，并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因此，用这同样的词去描述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国家苏联今日的处境，似乎有故意讽刺之嫌。不过，下面将要叙述，在许多绝对关键性的领域里，苏联的目的和用以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方法之间，似乎距离越来越大了。它声言必须提高农业和工业产量，但却用集体化和强制性计划来阻碍其实现的可能性。它断言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是压倒一切，但它自己却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并同"革命的"国家结合在一起（连同其革命的传统），从而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它要求其漫长边界必须绝对安全，但迄今对其邻国关心本国的安全，却采取强硬政策。这使莫斯科同西欧和东欧、中东国家、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恶化，从而使苏联感到"被包围"，安全感更少。苏联的哲学断言，世界事务在技术和新的生产手段推动下，是处于辩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而且必然会引起各种政治的和社会的变革。但苏联一贯的独裁和官僚主义作风，党的领导上层依仗特权，限制信息的自由交流，以及缺乏鼓励个人发挥积极性的制度，这一切都使它在面临爆发性的高精技术的未来时，处于准备不足、难以应付的地位，而这种未来已在日本和加利福尼亚出现了。更重要的是，虽然苏联党的领导人一贯坚持苏联决不能再处于军事上的劣势地位，并且大力呼吁国家必须增加生产，但是却清楚地看到它难于把这两个目的调和起来，特别

是，难于制止把很大一部分国家资财用于军事的俄国传统——其恶果是，苏联削弱了自己在商业上同其他社会竞争的能力。也许可以给这些问题贴上别的标签，但如果把它们说成是“矛盾”，似乎不算不合适吧!

假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存在的**物质**基础，那么，苏联今日面临的主要困难恰恰来自它的经济基础，这一点似乎加倍具有讽刺意义。然而西方专家们收集到的证据——加上苏联领导自己也日益公开承认——无疑地说明情况的确如此。赫鲁晓夫在 50 年代里曾满怀信心地预言苏联将在经济上超过美国，并“埋葬”资本主义，而戈尔巴乔夫先生在 1986 年第二十七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却作了自白，赫鲁晓夫对此有何感受，知道这一点是饶有兴味的:

……在 70 年代，国民经济中的困难开始增加，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了。结果，苏共纲领提出的发展经济的任务未能完成，甚至第九个五年计划和第十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更低的任务也未能完成。为这些年制定的社会计划也未能完全实现。科学和教育、卫生保健和人民文化生活服务的物质基础落后了。……

尽管最近一段时间作了努力，但仍未能完全改变局面。……机器制造业、石油和煤碳工业、电子工业、黑色冶金和化学工业以及基本建设大大地落后了。提高效率的主要指标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这两个方面的任务没有完成。……

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些问题包括近期的和远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内部的和外部的。

可以说，这是一段世界上**任何**政府都可以发表的声明。仅只承认存在经济问题，并不能保证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在全部苏联历史中，经济中最危险的薄弱领域就是农业，如果回忆一下，一个世纪前俄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谷物出口国之

一，就更令人惊讶了。然而自70年代初以来，它每年就必须进口几千万吨小麦和玉米。如果世界粮食生产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那么苏联（和某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将同一些非洲和中东国家一起分享这可疑的盛名：成为世界上近年来由粮食净出口国变为大规模持续进口粮食的进口国的仅有的几个国家。就苏联而言，农业生产量陷入停滞的困境并不是由于不重视或不努力造成的；在斯大林死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催促增加粮食生产以满足消费需求和实现提高苏联生活水平的许诺。如果说生活水平没有提高，那显然是不对的——很明显，1953年时普通苏联人处于绝境之中，而现在比那时好多了，但更加令人沮丧的是，在苏联人这几十年来生活水平已逐渐向西方靠近之后，现在又再度落后了——虽然国家拨给农业大量资金，几乎占去了总投资额的30%（美国为5%），用了20%以上的劳动力（美国为3%）。仅只为了维持生活水平，苏联不得不每年向农业投资约780亿美元。并且还用500亿美元补贴粮食价格——即便如此，看来也还是“离它一度曾是粮食出口国的地位越来越远了”，而且反而要进一步耗费几十亿元的硬通货以进口谷类和肉类来弥补其农业产量的短缺。

苏联农业产量不稳定确有某种**自然**条件的原因，正因如此，它的生产率约为美国农业的1／7。在地理上，人们往往把苏联看成与美国很相似——两个都是横贯大陆，地处北半球的国家——但实际上苏联的位置要靠北得多（乌克兰和加拿大南部是处在同一纬度上）。这种地理状况不仅难于栽培玉米，而且连小麦产区的冬天也要比美国堪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寒冷得多——并更易于遭受频繁的旱灾。1979～1982年的4年中，气候特别恶劣，政府感到十分为难，以致停止公布农业产量的详情（不过它每年进口3500万吨谷物却提供了一个线索！）。就连1983年的“好”年成也未能使苏联达到自给——第二年接着又是一个寒冷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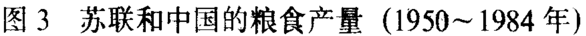
干旱的灾年。此外，开垦"处女地"以扩大耕种面积，增加小麦生产的一切尝试，都因北方的霜冻和南方的干旱而始终受到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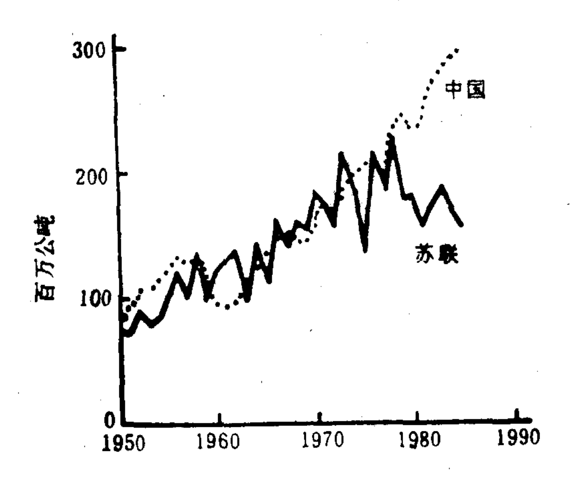
不过，外界观察家们都不相信苏联农业产量低下完全是气候的原因造成的。的确，最大的问题还是由农业的"社会主义化"造成的。为了使苏联人民感到幸福，就通过补帖的办法人为地保持低廉的食品价格，以致"国家要付出每磅4美元来生产按每磅80美分出售的肉类"——这种做法使农民购买面包和土豆来饲养牲畜比用未加工的谷类更便宜。大量的国家农业投资用于大规模的工程如水坝排水系统等而不是用于农民个人的牲口棚或一般农民想要的新式小型拖拉机。有关种植、投资等事宜不是由种田的人而是由管理人员和官僚来作出决定。剥夺农民应负有的权利，不发挥农民的积极性，恐怕就是产量令人失望、效率长期低下和大量浪费的唯一最大原因，虽然由于储藏设备不全和缺乏全年通行公路也造成浪费。"约20%的谷物、水果和蔬菜收成和多达50%的土豆收成因储存、运输和分配不善而（烂掉了）。"如对这种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即大规模地从农业集体化转变为个体农民经营），其结果如何，以下事实就是明证：现有的农民自留地只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4%，但其产品却占苏联谷物总产量约25%。

不管最高层人士如何鼓噪进行"改革"，种种迹象表明，苏联并不打算仿效邓先生的大规模农业改革，达到中国的"自由化"的程度，虽然事实很明显，苏联的产量远远落后于它的富有冒险精神的邻国。

虽然苏联现有的集体化农业效率明显低下，但克里姆林宫是不会公开解释为什么它偏爱这种制度的，对这种顽固的态度，有两个突出的理由可资说明。第一，大规模扩大私人农田，建立更多的私人市场，农业产品价格的上涨，这一切都意味着农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将大大增加——这就有损于忿忿不满的城市居

民，或有损于工业投资。换一句话说，这将意味着布哈林政策(赞成刺激农业）的最终胜利和斯大林偏见的破产。第二，这将意味着指挥苏联农业的官僚和管理人员的权利衰落，从而影响所有其它决策领域。“个体农民根据市场信息，天气的变化以及他们庄稼的情况对农事作出决定，他们的智慧远远超过中央集权化的官僚制度，不管后者计划得多么好，人员多么有才干，”这种情况是确实无疑的，那么，这对“中央集权化的官僚制度”的未来将会有什么影响呢?如果在“社会主义和国民食品匮乏”之间的确是一


图 3　苏联和中国的粮食产量（1950～1984 年)



贯存在着一种令人难堪的必然联系，那么，政治局是不会看不到的。但政治局从它本身的角度来看，与其承认共产主义制度的失败，并放弃对农民这样大的一个社会阶层的控制，还不如维持“社会主义的”（即集体化的）农业，这样会更好些——当然也更安全些，即便这意味着粮食进口会日益增加。

由于同样原因，苏联也难以改进其工业部门。1945 年以来，苏联的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诸如机床、钢、水泥、化肥、石油等等的产量方面已超过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观察

家们就认为没有多大必要来改进工业部门了。但有许多迹象表明，苏联的工业已出现停滞现象，利用制定野心勃勃的产量指标，然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达到指标的比较容易的发展农业的时期——正在结束。这里，部分的原因是劳动力和能源日益缺乏(下面将分别加以研究)。不过，同样重要的是，许多迹象表明，制造业若干过多的官僚主义计划，过分强调重工业，既不能根据消费者的爱好又不能为满足市场新的需要改变产品种类。如果对水泥工业的大量投资是从更需要资金的部门中调拨的，如果水泥的实际生产过程耗能很大，如果最后的成品必需在国内长途运输，使本已超负荷的铁路系统更加紧张，如果把水泥分配给那些经苏联计划工作者批准但从来无法完工的成千上万建筑工程，那么，生产大量水泥就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情了。对庞大的苏联钢铁工业也可以作同样的评价，大量的钢铁被浪费掉了——使某些学者对“消费者贫困而工业上富足的怪事”感到不可思议。当然，在苏联工业中也有效率高的部门（通常是国防部门)，它能支配大量资金并必须同西方竞争)，但总的体制的缺陷是集中生产而不很重视市场价格和消费者的需求。既然苏联的工厂不能象西方那样停产关闭，所以也就缺乏促进高效率生产的最根本的刺激。不管进行多少次的修补调整来帮助工业较快增长，但如果仍保留现在的“计划经济”体制，那就很难相信苏联工业能获得持续的突破。

如果说今日苏联工业效率之低下难以令人容忍（或者，从政府更严厉的口气来看，已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那么，苏联工业体系由于受到三方面进一步的压力而可能受到更大的损害。首先是能源供应问题。越来越明显地可以看出，40 年代以来苏联工业产量的巨大增长主要靠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几乎不计成本的充分供应而取得的。结果，与西欧相比，苏联及其主要卫星国的“能源消耗”和“钢的消耗”数量极大，如表 46 所示。

表 46　创造 1000 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所用的煤和钢（1979～1980 年）

(单位：公斤)

	煤	钢
苏联	1490	135
东德	1356	88
捷克斯洛伐克	1290	132
匈牙利	1058	88
英国	820	38
西德	565	52
法国	502	42
瑞士	371	26

就苏联的情况看，当它的能源供应十分充分而且（相对地）容易得到时，这种滥用“投入”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无情的事实是，现在的情况已完全不同。中央情报局 1977 年关于苏联石油生产将很快达到高峰然后迅速下降这一众所周知的预测也许是为时过早，但无论如何苏联的石油产量在 1984 年和 1985 年的确下降了一些，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次。更令人惊恐的是，剩下的（相当大量的）石油储藏以及天然气埋藏在更深的地层或西伯利亚西部等受永久冻土严重影响的地区。戈尔巴乔夫在 1985 年的报告中指出，在过去的 10 年里，苏联每多采一吨石油，成本增加 70%，而这个问题更可能会日益激化。因此，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苏联采取十分广泛的措施尽快增加核发电量，使其到 1990 年时在总发电量中的比例能增加 1 倍（从 10% 增至 20%）。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灾祸究竟对上述计划的影响有多大，目前要作出估计还为时过早。切尔诺贝利的四个反应堆的

发电量占苏联全部核发电量的1/7，所以关闭它就意味着要增加使用其它燃料储备——而明显的事实是，这样一来就既增加了成本（因为要有附加的安全措施）又降低了核动力工业的计划发展的步伐。最后，还有一件棘手的事情，即能源部门已经吸收了大量资金——约占全部工业投资的30%——而且这个数额还要急剧增加。一份最近的报告提到“只要最近对石油、煤和电力的投资趋势继续维持下去，再加上对天然气增加的投资指标，实际上就将耗尽1981～1985年苏联工业增加的**全部**可动用的资金，”对此，人们似乎难以置信，因为这意味着对其它部门的影响太严重了。然而，总的模式是清楚的：仅仅为了保持经济以较低的速度向前发展，能源部门就必须增加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

从苏联领导人的观点看来，同样成问题的是，在机器人、巨型计算机、激光、光学、电信等等高技术领域里遇到了挑战，在这方面苏联有日益落后于西方的危险。从较狭隘的，严格军事性的意义上说来，“精巧的”战场武器和先进的侦察系统有可能压制苏联武器在**数量上**的优势：如大型计算机可以解析苏联的密码，确定海面下潜艇的位置，掌握快速移动的战斗场景，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保护美国的核基地（如里根总统“星球大战”计划的含义所示）；而尖端的雷达，激光器和制导控制技术可以使西方的飞机和大炮/火箭部队毫无顾忌地搜出并摧毁敌机和坦克——象以色列经常对叙利亚（苏联装备的）武器系统所做的那样。光是跟上这些先进的技术，就需要把越来越多的科学和工程方面的资金拨给苏联有关防务的部门。

在民用工业方面，问题还要大些。假设劳力和资本投资这类传统的“投入”已达到了极限，那么，可以正当地认为高技术对增加苏联的产量是至关重要的。仅举一例为证，大规模地使用计算机可以大大降低在能源的发现、生产和分配中的损耗。但采用这

种新技术，不仅意味着大量的投资（从哪里来呢?），而且也对极端保密的，官僚主义的和中央集权化的苏联体制提出了挑战。计算机、文字处理机、电信器材都是知识密集型的工业，只有在下述社会里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开拓：拥有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民，并鼓励他们自由地进行试验和尽可能广泛地交流新的观点和新的假设。这在加利福尼亚和日本是很行得通的，可是在苏联就有放松国家信息垄断权的危险。甚至到了今天，如果禁止苏联高级科学家和学者们个人使用复印机（复印部门是由克格勃人员任职的），那么，若不大大放松警察控制和检查制度，就很难知道这个国家如何能达到广泛使用文字处理机、计算机网络和电子通信等等。所以，如同农业的情况一样，政府要支持"现代化"并愿拨出追加的资金和人力，但却被它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意识形态弄糟了，而这些正是改革的基本障碍。

所以，苏联日益依赖进口技术和机器——不管是合法贸易的货物，还是从西方偷来的——这个问题仍然是个严重的问题，但比较起来，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工业和科学方面的间谍活动（不论是为军事的或商业的目的），其广泛的程度显然是不能数量来表示的，这看来又是另一个迹象，说明苏联担心自己落后了。较正规的贸易——进口西方的技术（也有东欧的制成品），以苏联的原料作为交换——是这个国家寻求"消灭差距"的传统方式，在1890～1914年期间是这样做的，20年代时也是这样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改变的只是产品的性质更现代化了而已：石油钻探机、辊轧钢、输送管、计算机、机床、化学和塑料工业设备等等。苏联计划工作者应该更加感到担心的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进口技术安装的时间比西方要长。而使用效率也大大低于西方。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得到硬通货来购买这种技术。在传统上，苏联可以进口经互会兄弟国家的制成品来巧妙地加以解决（这样就可以不损失硬通货），但经互会国家的产品日益赶不上西

方的产品，不过仍须接受这些产品以免东欧的经济崩溃。苏联一般是通过易货贸易或直接出售剩余石油来支付大部分西方进口货的，但它（以及东欧）在这方面的前景可能会缩小，因为石油价格不稳，苏联自己的能源需要不断增长，以及由于制造工艺日益复杂化，原料贸易普遍发生了变化。苏联从石油和其他原料（大概天然气除外）所赚的钱减少了，而与此同时，各种进口货的费用仍然很高——这一切可能都会降低可能得到的投资数额。

关于苏联未来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主要担心的原因在于人口问题。这方面的形势十分暗淡，以致某学者在他的研究著作《人口与劳力》一书中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作了如下述说：

无论从哪方面看，近期的或远景的，苏联人口和人力资源的发展前景，在本世纪末以前是很阴暗的。从这个国家出生率的下降到死亡率的惊人增长（超过过去所有合理的预测）；从新加入的劳力供应的减少（加之地区分布又不均匀）到人口的相对老化，面对这些趋势，苏联政府乐观的希望不大。

这些因素都很严重——而且有相互作用——但最惊人的趋势是自 70 年代以来，也许更早些时候以来，估计寿命和婴儿死亡率都始终处于恶化的状态。由医院和一般保健工作逐渐缩减，卫生设备和公共卫生的标准低，酒精中毒的平均数字高得难以置信，所以苏联的死亡率增加了，特别是在男性工人中。“今天，一般苏联男人预期只能活到 60 岁左右，比 60 年代中期少了 6 年。”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婴儿死亡率的增高——这是婴儿死亡率增高的唯一的一个工业化国家——虽然有大量的苏联医生，但比较起来，婴儿死亡率仍达到了超过美国 3 倍多的地步。苏联的人口由于死亡增多比以前下降得快了，而它的出生率又急剧缓慢下来。由于（大概是）城市化，妇女参加工作较多，居住条件恶劣以及其他起抑制作用的因素，人口总出生率已逐步下降，特别在俄罗斯族中尤为严重。这些趋势的后果是国内男性人口几乎根本没有

增长。

苏联领导人对这一切所产生的影响深为忧虑，在此背景下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增加家庭人口，发起严厉的反酗酒运动，动员老工人继续留下工作等等。首先，苏联必须较大的一部分资金用于保健和社会保险，在老年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尤应如此。在这方面苏联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并无不同之处（除了它的死亡率增高之外），但这样又提出了费用应优先用于什么项目的问题。第二，在劳动力的增长率急剧下降的情况下，苏联的工业和军事部门都受到影响：根据预测，1980 年至 1990 年劳动力净增加数“仅为 590 万人，而在这之前的 10 年里，劳动力估计增加数为 2421.7 万人。”至于对军事的影响，留待以后再谈，这种趋势又一次提醒我们，50 年代到 70 年代苏联工业产量的增长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劳动力的增加而不是效率的提高造成的，从现在起，经济发展就不能再依赖制造业中迅速增加的劳动力了。当然，如果有更多的身强力壮的男劳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这种困难，但问题是在斯拉夫人地区过多的青年人已经离开农业到城市去了，而非斯拉夫人共和国中的多余人力则教育程度较低，往往很少懂得俄罗斯语言，需要大量投资培训以从事工业。因此，下述趋势又使莫斯科计划工作者感到不安：中亚各共和国（如乌兹别克）的人口出生率是斯拉夫人和波罗的海地区居民的 3 倍，远景的人口均势正在进行重要的变化。结果，俄罗斯人口的比例预计将从 1980 年的 52%降低到 2000 年的 48%。在苏联历史上将出现第一次俄罗斯族在人口中不占大多数。

上述困难一览表，对某些评论家来说，也许显得太令人沮丧了。苏联有关军事的生产往往给人深刻印象，由于军备竞赛本身的动力，它经常不得不加以改进。据说一位历史学家于 1981 年曾经指出，对苏联的情况不能完全持否定态度，当人们回顾以往

半个世纪以来苏联经济成就时尤其会有此感受；他又说，西方观察家们有个习惯，喜欢夸大苏联某一时期的力量和另一时期的弱点。不过，不管苏联在列宁时代以后有了多少进步，尴尬的事实是，它并没有赶上西方，而且从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后期开始，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竟越拉越大；在人均产量和工业效率各方面都已被日本和某些其他亚洲国家超出；它的缓慢下来的增长率，它的老化的人口，它在气候、能源储备和农业方面遇到的困难，都对苏联领导的要求和主张投下了阴影。

据此，就更能理解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关键"了。可是，撇开自然条件的困难（永久冻土等）不谈，在按中国模式搞"大跃进"的道路上还有两个主要的政治障碍。第一个是党的干部、官僚，及其他社会上层分子的牢固地位。这些人享有特权（依等级而定），缓冲了他们承受苏联艰难的日常生活的压力，并垄断权势。在计划和物价方面实行非中央集权制，把农民从集体农庄控制下解放出来，允许工厂经理有更多的行动自由，鼓励个体企业而不仅号召对党忠诚，关闭老式工厂，拒绝接受伪劣产品，允许进行更自由的信息流通，这一切都被这些掌权视为对他们自己地位的可怕威胁。苏联一方面提倡改革，实行更灵活的计划，提高对多个部门的投资，对酗酒或贪污腐化厉行纪律制裁，另一方面。苏联党的干部却强调指出，一切改革都必须"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框架中"进行，不得作"导致市场经济或私人经营的任何变动。"一个最近的访问者认为"苏联需要它的低效率来维持苏维埃制度"，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戈尔巴乔夫先生关于需要对制度进行"深入改革"的号召，恐怕对增长率的远景不会有多大影响。

第二个政治障碍在于苏联把很大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用于防务。在这方面，使分析家们感到烦恼的是，如何最好地估算苏联军费总额，以及如何与西方防务费用相比较。中央情报局在

1975 年宣布苏联武器的卢布价格为原先估计的两倍，因此苏联国防费用大概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1%～13%，而不是 6%～8%。对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错误解释。但精确的数字（也许连苏联的计划工作者也得不到）却没有下列事实更为重要：虽然 1976 年以后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放慢了，但即使在里根政府加强军备的情况下，克里姆林宫拨给军事领域的国民产值似乎仍是美国的两倍左右，这就是说苏联军队占有了大量训练有素的人力、科学家、机器和资本投资；而这些本来是可以用于民用经济的。根据某些经济预测，并不是说大幅度降低防务费用就会很快导致苏联增长率的迅猛提高，因为哪怕改装一家 T—72 坦克装配厂以生产其他产品，也需要很长时间。另一方面，如果在这个世纪的剩余年代里，由于同北约组织的军备竞赛，苏联防务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目前的 14%提高到 2000 年的 17%或以上，那么，越来越多的设备如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具将被用于军事部门，并把应拨给其他工业的投资资本的份额挤掉。然而，经济学家们虽然都相信“这将使苏联决策者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但所有迹象都表明，防务开支将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得更快，并将对经济繁荣和人民消费产生不良后果。

因此。苏联就象所有其他大国一样，必须在国家资源的拨款上就下列项目作出抉择：(1) 军事需要——这里指苏联内在的能力与其安全需要的关系；(2) 苏联人民对消费以及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日益增长的愿望；(3) 农业和工业部门对新的资本投资的需求，以便使经济现代化，增加产量，同其他部门齐头并进，从而能长期满足国家的防务和社会需要。同其他国家一样，这使苏联有关的决策者在抉择上感到困难，可是人们感到，不管苏联消费者和经济“现代化”的需要多么大，多么迫切，莫斯科历来都摆脱不了对军事安全的忧虑，这意味着已经作出了抉择。除非戈尔巴乔夫政府确实要进行改革，否则大炮总是先于牛油，如果需

要的话，也先于经济的发展。这个特点，同所有其他特点一样，使苏联基本上不同于日本和西欧，甚至也不同于中国和美国。

从历史上看，克里姆林宫是在继承罗曼诺夫沙皇们的和斯大林的传统，希望自己的军事力量相等于（最好是大于）所有其他强国。现在苏联的军事力量无疑是十分强大的。如果试图提供苏联每年的防务开支的真实总数，恐怕多半是不真实的：一方面，莫斯科官方的数字低得不合情理，把大量与防务有关的开支列在其他项目之下（"科学"、太空计划、国内安全、民防、建设），另一方面，由于人为的美元与卢布的比价，由于对苏联预算程序了解有限，由于中央情报局要把苏联武器和人力成本算成"美元成本"是有困难的，又由于制度上和思想上的偏见等等，所以西方对真实总数的估计很混乱。结果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瞎估计"，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来选择。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苏联武装部队的各个兵种，包括核力量和常规军，陆军、海军和空军，都实行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如果人们注意到苏联陆基和海基战略导弹系统的增长，成千上万的飞机和数以万计的作战坦克，海军和潜艇舰队的惊人发展，特种兵的活动（空运和水陆两栖战斗单位，化学战，情报和"反情报"活动），最后会得深刻的印象。苏联防务的实际费用也许有，也许没有五角大楼的经费那样多，但它无疑使苏联已具备只有其超级大国对手美国才能与之匹敌的军事力量。今日苏联可不是一遇到严重考验就垮台的 20 世纪军事化的波将金村了。

另一方面，苏联战争机器也有其弱点和问题，当然不能把它看成是能够高效率地圆满执行克里姆林宫给予的任何军事任务的万能力量。既然本章中也指出了世界其他大国的战略决策者所面临的困境，那么，当然也应该使人们注意到苏联军事政治领导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这并不是要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苏联大概是"活"不长了。

苏联的军事决策者在中期到长期所面临的某些困难，直接来自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人口问题，这一点上面已略加论述。第一是技术困难。从彼得大帝时代以来——再重复一次本书前几章的立论——只要世界上武器技术的发展速度放慢，使俄国得以实行装备的标准化进而达到战斗单位和战术的标准（无论是18世纪的步兵纵队，还是20世纪的装甲兵团）化，俄国对西方就总能拥有最大的军事优势。但一旦武器技术呈螺旋式上升，强调质量而不是数量时，俄国的优势就减少了。显然，苏联实际上已弥合了沙皇时代同西方的技术差距，它的武装部队可以优先得到国营经济的科学和生产资源。但仍有迹象表明，在许多工艺过程方面远远落后。两个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在中东和其它地方发生的代理人战争中，苏联不安地注视着它的武器在质量上多次被美国武器超过。应当承认，北朝鲜、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的飞行员和坦克部队并不是最好的，即使算最好的，也仍有理由怀疑它们是否能胜过具有高级电子设备，雷达装置，微型制导系统等等的美国武器。西方苏联军事问题专家的报告指出，对此苏联作出的反应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提高武器质量，并在几年之后可望制造与美国完全相似的武器系统。但这样做又把苏联引向威胁着西方防务计划的旋涡：越是先进的装备，建造的时间越长，维修的计划越大，武器通常更重而成本则总是更高，但是生产数量都减少。对一个历史上一贯依靠大量武器来完成多项不同的战略任务的强国来说，这不是令人鼓舞的趋势。

苏联对技术上逐渐过时感到不安的第二个标志是同里根政府的所谓战略防御计划有关。在目前阶段，似难以相信美国可完全免遭核袭击（例如，它遇到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是无能为力的），但它可以保护美国的导弹发射场和空军基地，而苏联要生产更多的火箭和核弹头以便单纯从数量上压倒战略防御计划系统，从而加大了苏联防务预算的压力，对此克里姆林宫是很难承

受的。更令人担忧的也许是进行高技术常规战争的影响。一位评论家指出：

能抵御99%的苏联核武器库的防御系统还不能算很好的防御系统，因为残余的武器仍具有摧毁能力……(但是如果) 美国技术上的优势能保证摧毁苏联的大部分常规武装飞机、坦克和船舰的话，那么，苏联在数量上的优势的威胁就减轻了。对于战略防御计划并不理想的技术对非核武器作战却可完全适用。

这种情况迫使苏联更多地对先进的技术如激光、光学、巨型计算机、制导系统和导航等进行投资。换句话说，正如一位苏联发言人所说的，将"在更高的技术水平上进行一场全新的军备竞赛。"1984年，当时的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曾对苏联敌不过西方技术的可怕后果提出警告，从这一点来看，红军对它是否能赢得这场竞赛信心不足。

在另一方面，人口问题对苏联历来的数量优势，即人力上的优势，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如上所述，这是两种趋势的结果：苏联总的出生率全面下降和非俄罗斯人地区出生比例的上升。如果说这导致工农业之间人力分配的困难，那么，对军队征召新兵来说，就更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了。总之，从210万适龄男性中每年征召130万到150万新兵，本不应成为问题，但从土耳其斯坦来的亚洲青年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其中许多人都不是精通俄话的，机械知识水平较低（更不用说电子学了），有时还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有关苏联军队力量的种族成分的研究表明，空军，海军和技术兵种中都是如此。红军第一类（即头等）师大多数也是斯拉夫人，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与此对比，第二类和（特别是）第三类师以及大多数后勤和运输队的人员配备都是非斯拉夫人，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在一次对北约组织的常规战争中，如果第一类师需要大量增援的话，这些"后续"师的效率如何呢?许多西方评论家都把这种偏见称为"种族主义的"和（大俄罗

斯)"民族主义的"，但从严格的军事意义上看来，下列事实更为重要：总参谋部认为相当大一部分的适龄苏联人力不可靠，能力低——这种判断大概是正确的，因为有报告说明整个苏联南部都存在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影响，而且这些部队对入侵阿富汗感到迷惑不解。

换言之，就象80年前的奥匈帝国一样，或80年前的沙皇帝国一样——苏联领导正面临着一个"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能使它们有所减轻。诚然，现在的统治机器比1914年以前更为庞大，人们对诸如乌克兰是不忠的"温床"这类说法也许不能全信。但是，人们对乌克兰人在1941年曾欢迎德国入侵者记忆犹新，读过波罗的海各州不满的报道，知道1978年格鲁吉亚人曾强烈而成功地抗议政府企图使俄语成为格鲁吉亚共和国中的并列第一语言；也许最重要的事实是，成百万的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在中苏边境骑墙观望，苏联与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不稳定的边境之北有4800万穆斯林：这一切使苏联领导人忧心忡忡，增加了他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尤其关心应把越来越少的更为"可靠的"斯拉夫青年放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工农业急切需要补充熟练和忠诚的人手，而能得到的斯拉夫青年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把它们派到军队中去，派到第一类师和其他高级领导机构中去呢?或者是否应不顾对军事效率造成的危险而使非斯拉夫人在红军中的比例日益增加，把俄罗斯人和兄弟斯拉夫人腾出来从事民用建设呢?既然苏联的传统是"安全第一"，那么前一种趋势大概会占优势，但这远未解决困难，不过是两害择一而已。

如果苏联的战略家们所谓的"力量的相互关系"中的经济成分使政治局担忧，那么迅速变化的全球军事力量对比也很难使苏联领导人得到鼓舞。不管苏联的军事机器在外界观察家看来显得多么威武和吓人，但值得把这些军事力量同苏联军人所承担的一系

列战略任务作一番比较。由于明显的理由，在军事力量对比中引起最大注意和最多关切的**项目**，就是各大国手中拥有的战略核武器库，特别是美国的和苏联的，因为它们双方都有毁灭全球的能力。为提供证据，值得将 1986 年“国际战略研究所”对美苏战略核弹头所做的“统计”转载如下。

表 47　美苏战略核弹头估算

	美国	苏联
洲际弹道导弹弹头	2118	6420
潜艇发射弹道导弹弹头	5536	2787+
飞机运载弹头	2520	680
总计	10174	9987+

由于各人的利害关系不同，对上述数字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对那些只关心数字或关心数字有误的人来说，他们会仔细核对表中各类弹头数目并提醒人们注意超级大国还拥有更大量的战术核武器。从许多非官方评论家和普通群众来看，美苏两家武器库中所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和摧毁能力只能说明它们的政治无能或精神失常。这些核武器威胁着地球上一切日常生活，应尽快销毁或大大减少。但另一方面，智囊班子、大学以及国防部门中的一批评论家，则认为核武器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确有能**使用**的可能性，因此，他们贡献出自己的智慧潜心研究双方彼此的武器系统、逐步升级战略和战争游戏，并从正反两方面研究武器控制和检验协定，研究“投掷重量”，“预定着陆点”，“百万吨级当量”，打击目标政策和“第二次打击”方案。

在这本研究五个世纪的书里探讨“核问题”显然是很困难的。核武器的存在——或者不如说，大规模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把传统观点对战争、战略和经济的考虑都变成多余的了，难道情

况不是这样吗?一旦爆发战略核武器战争，那时北半球的人（也许还有南半球的人）再估计核武器在世界事务“变化中的势力均衡”的影响还有用处吗?大国的竞争往往转变为公开的战争这一传统模式是否在1945年就最终结束了呢?

显然，对这类问题是无法作出确切回答的。但有迹象表明，尽管有了核武器，也许用正因为有了核武器，今日各大国可能恢复关于使用武力的传统观念。首先，现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基本处于均势或几年前已处于均势。虽然大家都在议论“机会之窗”和哪一方有可能拥有“第一次打击能力”，但很清楚，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没有任何保证可以消灭对手而不同时也可能遭到破坏，而“星球大战”技术的到来也不能使这一事实有重大改变。特别是，双方都拥有大量的潜艇发射弹道导弹，装置在难以发现的水下潜艇上，这样就不能想象任何一方可以一举全歼敌方的核武器力量。这一事实令人深感恐惧，其程度不亚于对“核冬天”的恐惧，或更加强烈。因此，它将使决策者住手，除非被某种意外引起的逐步升级所驱使。于是双方都陷入了无法退让的核僵局——即实际上超级大国双方不可能不进一步创制核技术，也不可能单方（或双方）放弃拥有这些武器——在核僵局中哪一方也不可能占真正的优势，因为一个大国的新武器系统会受到另一大国的反击或仿效，并因为危险过大而实际上不能应用这些武器。

换言之，各超级大国的庞大的武器库仍将继续存在（除非意外地“扣动扳机”），但是它们十有八九是不会被使用的，因为这与下述自古以来的观念相矛盾：在战争中，象大多数其他事情一样，手段和目的之间应保持一致性。但在一次核战争中，人类遭受巨大损失的危险太大，以致不能用任何战争手段达到任何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或经济的目的。虽然投入大量的智能研究发展一种“核战争作战战略”，但是，却很难与哲维斯的意见辩驳，他说“合理使用核武器战略在词义上讲不通。”第一颗导弹一旦发出，

美国失去它的核垄断地位以后双方陷入的“互为人质”的形势就结束了。核战争的结果可带来极为巨大的灾难，以致任何有理性的政治领导人都不可能首先迈出核门槛。除非由于疏忽发生一场核战争（如人的失误或技术的故障，总是可能的）否则双方都受到威慑而不敢“走使用核武器的道路”。如果的确发生冲突，双方的政治和军事领导都会设法把它“控制”在常规战争的水平内。

两个对抗的超级大国在今后 20 年及其后可能面临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世界动荡不稳的近东、印度次大陆、南非、拉丁美洲等地区国家的核扩散。由于有关国家不是大国体系中的一部分，在此就不考虑它们在某个地区性冲突中有动用核武器的可怕的可能性了。总的说来，可以作出如下结论，即美国和苏联在制止核扩散方面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因为核扩散将使世界政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核扩散的趋势，可能使超级大国重视它们的共同利益所在。

对于中国、英国和法国迅速扩大的核武器库，从莫斯科的观点看来，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几年以前，大家都公认这三个国家在核力量对比中只不过是勉强够格的因素，它们的核战略完全不起作用，因为它们三者都只能对苏联造成有限的损伤，而换来的却是它们自身被原子弹消灭。但迹象表明，这种设想很快就需要修正了。对于莫斯科来说，最使人惊恐的趋势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增长的核能力。过去 25 年来苏联对此是一直担心的。如果中国不仅能发展一种更尖端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系统，而且能发展潜艇发射远程弹道导弹系统（似有此打算），此外，如果双方不能圆满解决中苏争端，那么苏联就面临将来在它的边境上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这可能逐步升级而与它的邻国中国进行一场核交战。按目前的情况看，中国遭受的破坏将是巨大的，但莫斯科不能排除至少有一定数量（在 90 年代，数量将更大）的中国核导弹击中苏联的可能性。

英国和法国建立核运载系统和增加核弹头能力，虽然在政治上不使苏联感到惊慌，但在技术上却是颇为担忧的。到最近为止，这两个强国的武器系统似乎还没有把握能够产生“威慑”作用。它们若卷入同苏联的核交战（这是难以置信的事），而美国保持中立（这毕竟说明英国和法国建立它的系统是对的），那么它们只能用自己规模不大的系统使苏联遭受部分损伤，但要冒全民自杀的风险，它们是不会这么做的。可是在今后的几年里，各中等强国能使苏联遭受的破坏将增加许多倍，因为它们的潜射弹道导弹系统已获得巨大发展。例如，英国获得了载有三叉戟II型导弹系统的潜艇，被《经济学家》杂志戏称为“核导弹中的罗尔斯·罗伊斯”，它使英国具有一种几乎不会使自己受到损伤的威慑力量，能摧毁350多个苏联目标，而现在能摧毁的目标只略高于16个。法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它的新型潜艇《不屈》号载有M–4型多弹头远程导弹，能攻击96个苏联目标，这一数目“超过法国原有的5个核潜艇所攻击的目标总和”——当其他舰艇都重新装备这种M–4型导弹后，法国的战略弹头就会增加5倍，从而使它在理论上具有从几千英里外攻击几百个苏联目标的能力。

当然，英法核武器的实际意义如何，还不可能作出预测。在英国，许多显要人物指出，那种认为他们的国家能**独立地**对苏联使用核武器的想法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同时这些批评者也不为另一种相反的论点而动摇。这种相反的论点认为英国的自杀至少能同时使苏联遭到迄今最严重的损伤。法国的公众舆论以及某些战略评论家们也认为法国宣布的威慑政策是几乎难以置信的。另一方面，完全可以设想对核战争的作战可能性采取认真态度的苏联军事计划者对最近的事态发展惴惴不安。他们不仅要面对4个国家，而不是美国一个国家。这些国家有能力使苏联心脏地带遭到严重或极其严重的损伤，而且如果苏联同其一个强国（如中

国）发生核交战而其他国家则是这种相互突破的中立观望者时，苏联必须考虑世界军事力量对比的后果将是怎样的。所以苏联一再坚持在与美国签订任何全面的《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时，英法核武器系统必须考虑进去，而且苏联必须拥有一定的保留核力量用以对付中国。有理由认为，从克里姆林宫的观点看，做到这一切就可以使核武器在实施合理的军事政策成为不是非用不可的手段了。

在此情况下，如果常规武器成为衡量苏联军事力量的主要标准以及达到苏联国家的政治目标的主要工具，那么就很难相信苏联对国际军事均势的现状感到放心。这似乎是一种大胆的看法，因为在估计美苏"军事均势"时曾大肆宣扬苏联的飞机、坦克、大炮和步兵师的总数比美国的大得多——此外，还经常断言北约组织的力量不能在欧洲大规模常规战争中坚守阵地，不得不很快"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但是越来越多的关于"均势"的最近科学研究报告指出，情况的确如此——即目前形势是"任何一方都仍然没有足够的全面力量来保证获得全面胜利。"得出这种结论既需要进行很详细的比较分析（如美国的军力组成同苏联的坦克师对比），又需要考虑某些较大而无形的因素（如中国的作用，华约条约的可靠性），所以在这里只能对这些论点进行概述。不过，即令论证是大致正确的，也不能使苏联计划制定者感到欣慰。

首先应明确指出的，就是对常规力量的对比作任何分析都必须对敌对联盟进行总的衡量，特别是在欧洲范围内。一旦这么做了，就可以看清楚北约组织中的非美国部分比华约中的非苏联部分重要得多。正如 1985 年美国国防白皮书中煞费苦心地指出的，"欧洲国家提供了现有[北约组织]驻欧力量的主要部分：90%的人力，85%的坦克，95%的大炮，80%的战斗机，以 70%以上大西洋和欧洲水面的主力舰……总动员后的欧洲兵力将近 700 万人，而美国兵力为 350 万人。"自然美国也部署了 25 万人常驻

西德，一旦欧洲发生战争，即准备派遣大批陆军师团和空军中队横过大西洋，进行紧急增援。整体说来北约组织是依赖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和美国的海军力量的。但问题是北大西洋联盟是在一个“拱门”的两根相同的支柱之间取得平衡的，比华约平稳得多了，而华约则是头重脚轻并向莫斯科方面倾斜。还值得指出的是，美国的北约组织同盟者在防务上的费用比苏联的华约同盟者多6倍，而英国、法国和西德每一个国家的费用都超过华约非苏联国家的总和。

某些危言耸听的西方估计的特点就是对这两个联盟的力量作荒谬的删略和附加条件[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双方的整体力量来衡量，就会出现在多数情况下都具有占战略上均势的情景。虽然在一些地方华约占数量上的优势，但看来这并不是决定性的。例如，双方都似乎拥有大致相同的“欧洲的总的地面力量”，它们还拥有相同的“总的地面力量”和“总的地面后备力量”。最精确地说，华约的1390万人（640万“主力军”和750万后备军）并不比北约组织的1190万人（500万“主力军”和680万后备军）多出很多，特别是，华约的总数中很大一部分是由第三类部队和红军的后备军组成的。就是在大批的苏联装甲兵和摩托化步兵师大大超过北约军队的最关键的中央前线上，华约的优势也不是很使人放心的——如果回顾过去在德国北部的拥挤地带进行快速攻击的“运动战”的困难，并且了解到苏联5万辆“主力战斗坦克”都是行将淘汰的T—54型（这些坦克简直会把道路都堵塞住），那么就更加不安了。假如北约组织有足够储存的弹药、燃料、补充武器等等，那它当然比50年代时的情况好得

---

①例如，把苏联的全部武装力量包括进去（甚至包括为反对中国而部署的武力在内），又把法国的武装力量排除在外，就能很容易地显示出华约的极大优势。

多，能更有力地使苏联的常规进攻遭受挫折。

此外，还有无法计算的因素，即军事联盟各自的完整性和内聚力。无可否认，北约组织有许多弱点：从经常发生大西洋两岸的关于“负担均摊”的争端到必须发射核导弹时进行政府间磋商的棘手问题。在从西德和英国到西班牙和希腊的中左政党中可以看到中立主义和反北约组织的情绪，这也是时时令人担心的原因。如果将来某个时候，在华约西部边界上的某个国家发生了“芬兰化”现象（当然特别是在西德），那么苏联就在战略上大大得利，并且经济上也减轻了负担。但是，即令这种方案在**理论上**是可能实现的，也很难与莫斯科现在对它在东欧的“帝国”的可靠性的担忧相提并论。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受到广泛的欢迎，东德明显希望与波恩改善关系，匈牙利人实行“悄悄的资本主义”，经济灾难不仅影响波兰和罗马尼亚而且也影响整个东欧，这一切使苏联领导面临特别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动用红军就能及时解决的，而且一剂“科学社会主义”新药也不能为东欧人提供满意的答案。当然莫斯科最近花言巧语地谈论现代化和重新审查马克思主义经济和社会政策，还是很难看到苏联放松对东欧的许多控制。然而这些政治不满和经济贫困的各种征兆必定使华约中**非苏联**军队的可靠性更成问题了。例如，波兰的武装力量，就不能认为是增加了华约的力量，情况恰恰相反，波兰军队——以及极端重要的波兰公路和铁路线——在战时都需由红军进行严密的监视。同时也很难想象，一旦莫斯科发出号令，捷克和匈牙利的军队就会奋勇向前猛袭北约组织的阵地。东德的武装力量大概是苏联的同盟者中效率最高和最现代化的了，甚至他们在接到向西方进攻的命令时态度也会变化。华约军队的绝大部分（4／5）都是苏联人，在同西方进行的任何一次常规战争中苏联的师必然是先头部队，但对红军指挥员说来，既要指挥这种战争又要监视百万或百万以上的东欧士兵（大多数效率不高，其中有些不大可靠），任

务是不轻的。北约组织甚至可以发动反击作为对华约进攻的反应，比如说进攻捷克，尽管这种可能性极小，也能增加苏联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不安定。

再者，自60年代初以来，苏联还不得不应付一个更加可怕的问题：他们可能卷入与北约组织以及中国的大规模冲突。如果冲突同时发生，那么把增援力量从一条战线转到另一战线，即使可能，其前景也受到严重限制，即便战争只是在一条战线上进行，克里姆林宫也害怕把军队从潜在敌人沿边界驻防庞大武装力量的地区撤出而另作部署，尽管这个地区在技术上并不突出。既然如此，苏联就不得不保持50个师和1.3万辆坦克以防中苏冲突的不测事件；虽然苏联的军队比中国的更现代化并更为机动，但同相当于自己4倍的军队作战，很难想象能保证获得全面胜利——更不用说长期占领了。这一切必然使人们设想，战争仍应是常规的（假定某些苏联人暗示说他们会把中国打得一败涂地，那么这种设想可能毫无意义）；不过如果**的确发生了**一场苏中核交战，那么苏联的决策者就不得不考虑一下在核战中一直保持中立并十分重要的西方面前，他们的国家是否会处于劣势。同样，苏联若同北约组织交战（不论是核战争或是大规模常规战）而遭到严重挫伤，如果它落到“断了脊梁骨”的地步，那么它必然要担心如何去对付中国的压力。

中国幅员广大，苏联除北约外，最严重关切的就是中国，但是不难想象苏联对于整个亚洲“侧翼”都很担心。从广泛的地缘政治意义上说，莫斯科——俄罗斯政策，即对亚洲一贯进行领土扩张的传统倾向，似已停止。中国的复兴，印度的独立（并日益强大），日本的经济恢复——再加上许多较小的亚洲国家要维护自己的利益——确已消除19世纪时对俄国将逐渐控制整个大陆的恐惧心理。（现在苏联总参谋部想起这个念头大概也会惊慌！）的确，这仍不能阻止莫斯科攫取边缘地区的利益，如在阿富汗；但

阿富汗冲突持续的时间以及入侵阿富汗所引起的这个地区其他地方的敌意，只能证实苏联要进一步扩展其领土必须付出无法估计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代价。一个世纪以前，苏联满怀自信地宣布其“亚洲的使命”，与之相比，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现在却要担心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从中东渗入它的南部边境，要担心中国的威胁以及阿富汗、朝鲜和越南的纠纷等等。不管部署在亚洲的师团数量有多少，恐怕是绝不会足够在这样广大的外围上保证“安全”，特别是因为贯通西伯利亚的铁路仍然十分容易受到敌人火箭的袭击而遭到破坏，一旦如此，就会对远东的苏军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苏联政权在历史上一贯关心本土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在海上和海外世界中的能力相对来说是不太重要的，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但这并不否认红色海军在过去25年里已有惊人的发展，并且还建造了许多新型和大功率的潜艇，水面船舰，甚至试验性的航空母舰。也并不否认苏联的商船和捕鱼队的巨大发展以及它们的重要作用。但苏联的海军军械库中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得上美国海军的15支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所拥有的攻击力量。此外，如果不是在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海军之间而是在两个联盟的海军之间进行比较，那么，北约组织中非美国海军的相当大的力量就会造成很大的差异。

如表48所示，“即使把中国排除在外，西方联盟拥有的水面主力战斗船舰也为华约条约的2倍，海军的空中力量为3倍，潜艇数量实际相等。”华沙条约有许多大型水面战舰和潜艇已超过20年，它的侦察敌对潜艇的能力十分有限，红色海军的人员有75%是征召服役的（与西方的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形成对照），如果把这些事实都加进去考虑，那么，苏联在最近的将来是很难有能力争夺“海上霸权”的。

表48　北约与华约的海军力量

华　约

	非苏联的	苏联	总计
核潜艇	—	105	105
柴油机潜艇	6	168	174
水面主力战舰	3	184	187
海军飞机	52	755	807

北　约

	非美国的	美国	总计
核潜艇	12	85	97
柴油机潜艇	132	5	137
水面主力战舰	227	149	376
海军飞机	283	2250	2553

最后，如果苏联海军的新式大型水面战舰的真实目的确实是在巴伦支海上形成一个“海上堡垒”以保护其核导弹潜艇免受北约的袭击——也就是说，如果苏联海军驶向海外的主要意图是为保护其国家的**战略威慑力**——那么很明显它没有多少剩余力量（较老的潜艇除外）来阻断北约的海上交通线。因此，广而言之，一旦同西方发生重大冲突，苏联无法指望能帮助其分散的海军基地和驻军部队。事实上，虽然人们大肆宣传苏联渗入第三世界，但它驻在海外的（东欧和阿富汗之外的）军队是很少的，它仅有的主要海外基地是在越南、埃塞俄比亚、南也门和古巴，而所有这些基地都需要大量的直接财政援助，苏联对此似乎也越来越气馁了。苏联可能认识到，在有中国卷入的战争中，贯通西伯利亚的

铁路是容易遭受袭击的，所以它就有计划地企图建立一条海上交通线，经由印度洋，到达其远东的领土。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这条途经仍然是很危险的。美国（包括英国和法国）的基地以及驻在世界各地的部队和海外舰队比苏联的多得多，苏联的势力范围无法与之相比，不仅如此，现有的少数几个苏联阵地也是无遮掩的，在战时很容易受到西方的压力。如把中国、日本和某些较小的亲西方国家也算进去，那么景象就更加不平衡了。当然，把苏联强制排挤出第三世界，在经济上不会造成严重的打击，因为苏联在这些地方的商业，投资和贷款与西方的相比为数极少，但是这却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苏联不够一个世界强国。

虽然这一切似乎都在夸大苏联在力量对比中的不利因素，但值得指出的是，苏联自己的计划制定者也明显地在考虑分析“最坏的情况”，而且苏联的武器控制谈判代表总是不接受同美国力量相等的思想，争辩说苏联“留有余地”对付中国以保证其安全并考虑它的 8000 哩的边境。任何一个公道的外界观察家都会看到，苏联拥有的武力已超过保证其安全所需要的数量了，而莫斯科却坚持要建立不断更新的武器系统，这只能导致所有其他人的不安全感。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们，继承了军国主义的，往往是妄想狂的治理国家的传统，他们认为在东欧，沿中东的“北部地带”，以及同中国的漫长的共同边界等苏联四周的边界似乎都在土崩瓦解；虽然派出大量的师团和航空中队去稳定这些边疆，但却并没有达到苏联希望达到的固若金汤的地步。可是苏联还害怕从东欧撤退或对中国作边境上的让步，不仅因为这样会表明莫斯科丧失了意志力。克里姆林宫一方面要全力对付传统的问题，即保证它的广大的陆地边界的领土安全，同时在另一方面还要在火箭、卫星武器、宇宙空间探索等等方面跟上美国。这样，苏联——或不如说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制度——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要在世界强国的比赛中接受考验，而苏联是不愿在力量对比之下

处于不利地位的。

如果苏联经济能健康地发展，这些力量对比的差距（或“力量的相互关系”），显然就会得到某些改善，这又把我们带回到苏联的长期问题上来了。经济之所以对苏联军方至关重要，不仅是因为苏联军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仅是因为经济能支付他们的武器和工资，还因为苏联军方认识到经济对持久的大国联合战争的结局具有重要意义。1979 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承认一场全球性的联合战争将是短暂的，如果使用了核武器，那就更是如此了，这种情况可能是事实。“不过，如果考虑到各交战国可能联合起来，而双方都拥有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潜力，那就不排除战争有拖长的可能性。”但如果这种战争确实“拖长了”，那么，还象历史上的大规模联合战争的情况一样，应该强调的又是经济上的持久力。若记住这个假设，苏联领导考虑到下列情况时是不会感到欣慰的：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苏联只占 12%～13%（或约 17%，如果人们敢于把华约卫星国作为有利因素包括进去的话），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上苏联远远落后于美国和西欧，还被日本超过，而且——如果增长率长期继续保持这种速度的话——在今后的 30 年里可能被中国赶上。如果说这是一种离奇的看法，那就值得回想一下《经济学家》杂志所作的冷静的观察了，该杂志说在 1913 年“俄罗斯帝国的实际人均小时生产量比日本的大 3.5 倍，[但它]在近 70 年的社会主义的岁月里却相对地向后滑回去了，大概现在仅及日本的速度的 1／4 了。”因此，不管人们对苏联当前的军事力量作如何的评价，到 21 世纪初它在世界大生产中心里将只能排在第 4 或第 5 位，这种前景不能不使苏联领导忧心忡忡，因为它对苏联的远景力量将产生影响。

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已接近崩溃，同样，也不是说它应被看成是一个几乎具有神奇力量的国家。但这确实意味着苏联面临着棘手的选择。正如一位苏联问题专家所说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

治基石——大炮、牛油和发展的政策已不再是可能的了……即使在乐观的情况下，苏联面临的经济困难比它在60年代和70年代所遇到的严峻得多。”预料苏联将加紧努力并提倡改善经济。但是，即使有一个强有力的莫斯科政权也极不可能放弃“科学社会主义”以推动经济的发展，也极不可能大幅度削减防务费用的负担以致影响苏联国家的军事核心，既然如此，苏联要逃避面临的矛盾，前景是无望的。如果它没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无足轻重了；如果它**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它就会使其它国家感到不安全并损害自己的经济前景。这是一个严酷的进退两难的境地。

不过，这并不会使西方完全高兴，因为苏联的特性和传统都表明它是绝不会温文尔雅地甘愿接受帝国衰落的命运。本书曾研究过的过分扩张的多民族帝国，如奥托曼、西班牙、拿破仑帝国和英帝国等，在历史上确实**没有一个不是**在大国战争中遭到失败之后，才退到他们的民族基地上去的，或者（象1945年以后的英国一样）被战争搞得十分衰弱，以致在政治上不可避免地实行了帝国的退却。那些对苏联现在的困难幸灾乐祸，并期待这个帝国崩溃的人，也许应回想起这种转变通常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而且也并不总是以可以预料的方式进行的。

五、相对衰落的头号大国美国及其问题

当人们转而分析美国目前和将来的情况时，值得铭记苏联的困难，因为这里有两点重要的区别。第一点，可能认为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的衰落，相对来说，比苏联快些，但美国的问题大概远不及它的苏联对手严重。何况美国的**绝对**实力（特别在工业和技术领域）仍然比苏联强大得多。第二点是，美国社会的特点是结构松散，自由放任（尽管有其弱点），但在重

新适应环境变化方面，要比一个僵硬的、受到严格控制的大国条件要好一些。但反过来，这要取决于是否有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他们善于理解当今世界变化的大进程，并能看清美国在适应全球环境变化中所处地位的强项和弱点。

虽然美国目前在经济上，甚或在军事上仍然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它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两大考验，这是对每一个占有世界事务"头号"地位大国的寿命的挑战：在军事——战略领域，要看它是否能在国家认为不可缺少的国防需要与国家为承担义务所拥有的手段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与此密切相关的世界生产结构相对地不受侵害而能保持技术和经济的基础。这是一场对于美国能力的严峻考验，因为它好象1600年左右的西班牙帝国或1900年左右的英帝国一样，继承了几十年前承诺的大量战略任务，当时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使它信心十足，似乎可以左右世界事务。结果，现在美国正在经受着历史学家极为熟悉的以往列强兴衰的风险，也许可以大体上称作"帝国过份扩张"的风险：那就是说，华盛顿的决策人必须面对一个尴尬的、长期的现实，即今日美国国家实力已经远远不能同时保卫美国一切全球利益和承担所有义务了。

同早先那些陷于困境的战略过度扩张的强国不一样，美国还面临核毁灭的可能性——许多人认为，这一事实已经改变了国际强权政治的全部性质。如果真的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核交战，那么美国的前景究竟如何，实难想象，因而这种考虑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即使美国的地位（由于它的防御系统和地域广阔）可能比法国或日本在这样的一次冲突中要有利一些，但情况也仍将如此。另一方面，1945年后军备竞赛的历史表明，东西方之间核武器的相互威慑似导致双方相互不使用核武器——这就是为什么大国不断增加常规力量费用的主要理由。然而，如果一旦有可能大国卷入一场非核战争（或地区性战争，或大规模战争），则今日美

国的战略态势同当年西班牙帝国或爱德华七世时期的英国所处情况如出一辙。作为一个衰落中的头号大国，它们都曾面临威胁，不过不至于危及本土安全（就美国而言，被入侵军征服的前景十分渺茫），但是威胁到了在国外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分布面广，很难同时对它们进行防卫，而且也很难放弃其中任何利益而不致冒进一步的风险。

应该公正地说，美国每一项国外利益都是当时为了某种似乎有理（而往往又十分紧迫）的理由承受下来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应在当地存在的理由也不少；在华盛顿决策人看来，美国在地球某些地区的利益现在可能比前几十年更为重要。

就美国在中东承担的义务来看，情况确实如此。这是一个包括从西方的摩洛哥到东方的阿富汗的地区，美国在这里面临一大堆冲突和问题，若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准叫人吓得目瞪口呆”。这个地区的情况是：中东控制世界大部分石油供应；极易遭受苏联的渗透（至少从地图上看是这样）；美国国内有一个强大的院外集团施加压力，要求毫不畏缩地支持孤立的、但军事成效卓著的以色列；一般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海湾的酋长国）内部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压迫，外部受来自利比亚之流的威胁；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不管内部如何倾轧，共同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所有这一切使这一地区对于美国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该地区亟力抵制任何简单的政策抉择。此外，这也是世界上经常发生战争的地区（至少一些地方如此）。最后，这个地区还包括一块苏联企图以武力征服的领土——阿富汗。因此，毫不奇怪，中东无论从军事上或外交上均被看成是需要美国密切注视的地区。然而，1979 年伊朗突发的崩溃，1983 年注定厄运的黎巴嫩冒险行动，外交上错综复杂的矛盾（如何援助沙特阿拉伯而又不致引起以色列的疑惧），以及美国在阿拉伯人民群众中不得人心等

等，这一切使美国政府很难执行一贯的、长期的中东政策。

在拉丁美洲也可看到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挑战在日益增长。如果世界发生一场严重债务危机，使世界信贷系统，尤其是美国银行受到沉重打击，那么这场危机很可能从拉丁美洲开始。事实上，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不仅降低许多著名的美国银行的信用能力，而且大大减少了美国对该地区的工业品出口。在这里，如同在东亚一样，世界先进的富有的国家不断提高关税以制止廉价劳动成本制成品的进口，而其海外援助计划则越来越不慷慨这种威胁使人们深感忧虑。这一切与拉丁美洲几十年中经济和社会变化十分迅速的情况交织在一起，同时人口激增一方面加大了许多国家资源供应的困难，另一方面对旧的保守政府机构造成了压力。于是爆发了具有广泛基础的争取社会和宪法改革的运动，甚至在古巴和尼加拉瓜激进的现政权影响下要求彻底“革命”。反过来，这些运动招致保守势力的反扑，反动政府宣称必须连根拔除国内共产主义的一切苗头，并为达到这一目的向美国求助。拉丁美洲的社会和政治分歧往往迫使美国在两种愿望之间进行选择：或提高拉丁美洲的民主权利，或击败马克思主义，二者必居其一，同时也迫使华盛顿考虑，仅仅依靠政治和经济手段能否达到目的，或能否必须采取军事行动（如格林纳达事件）。

但是，最令人担忧的形势莫过于在美国的南面，对比之下，这一形势竟使苏联面临的波兰“危机”相形见绌。目前，墨西哥——美国关系的状况简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墨西哥正处在经济破产无法履行债务的边缘，为国内经济危机所迫，每年有几十万人非法流入北方。墨西哥对美贸易获利最大的项目很快将是惨无人道的烈性毒品走私活动，而美墨边界一直是这类非法贩运渗入的通道。

如果说向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提出挑战还为时过早，那并不是贬低今日这一广大地区的重要性。世界人口中最大的部分居住在

东亚；美国在“环太平洋”国家的贸易比重很大并且日益增加；未来世界的两大国——中国和日本——位于东亚；苏联直接地并（通过越南）间接地也在那里。而且这里还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脆弱的准民主国家，它们一方面完全接受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同美国制造业抢生意，从纺织品一直到电子产品。由于早期冷战的结果，美国在东亚还承担了相当大的军事义务。

列举出这些承担的义务，就不得不暴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分布极广的特点。几年前美国国防部试图简要概述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但事与愿违，这段简短的文字却透露了美国战略承诺的毫无止境：美国与日本、朝鲜和菲律宾缔结的双边条约，马尼拉条约（该条约并增加泰国作为条约参加国），以及我国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订定的澳新美安全条约，体现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并通过在朝鲜和日本部署陆军和空军以及在西太平洋前方部署第七舰队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我国连同这一地区的友国和盟国最重要的地区性目标是：

维护我们主要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的安全；保持履行条约规定有关太平洋和东亚义务的能力；阻止苏联、北朝鲜和越南干涉他国事务；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持久的战略关系；支持友好国家的稳定与独立。[①]

然而，这段经过仔细琢磨的话不免潜伏着许多微妙的政治和战略问题：如何同中国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而不致放弃台湾；如何一面“支持友好国家的稳定与独立”一面却试图阻止其出口商品涌入美国市场；如何使日本为西太平洋防务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不惊动其诸邻邦；如何保持美国基地，如菲律宾基地，而不招致当

---

①国防部长C·W·温伯格向国会所作报告，“1984年财政年度预算”（华盛顿，1983年），第17页。

地的憎恨；如何在南朝鲜减少美国军事存在的同时，避免向北方传递错误“信号”……

美国更大的利害关系在西欧，至少从军事部署来看可以这样说，保卫西欧是美国陆军、大部分空军和海军高于一切的战略根本。根据某些秘密材料估计，实际上美国一般任务部队的50%或60%部署于北约，(批评者多次指出)，北约组织其他成员国拨给国防的经费占其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很少，而欧洲的总人口和收入现在比美国的要多。这里不准备对欧洲有关“负担均摊”争论中各种反对论点（诸如法国和西德等国为维持征兵的社会费用），也无需展开讨论所谓一旦西欧“芬兰化”，美国的国防将比目前耗费更大的看法。从美国战略观点看，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苏联的压力面前这一地区是一贯脆弱的，譬如说，比日本脆弱得多，这一方面由于它不是一个岛屿，另一方面在欧洲大陆前沿的另一边苏联集结了它的最大部分陆军和空军，其数量远远超过国内安全目的的合理需要。即使如此，苏联的军事能力似仍不足以横行于欧洲，但是在这种形势下，美国若单方面大量撤出地面部队和空中力量并非慎重之举。西欧这个世界最大制造业生产集中地可能落入苏联势力范围——仅此一项不现实的设想已足使五角大楼相信“西欧安全与美国安全休戚相关”。

不管美国承担欧洲义务在战略上讲多么合乎逻辑，但这一事实本身无法保证美欧之间不出现某些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纠纷从而双方发生龃龉。北约组织虽使美国同西欧结成紧密联盟，但欧洲共同体如同日本一样，在经济上，尤其在农产品市场萎缩的情况下是美国的对手。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欧洲官方政策一贯强调有必要处于美国“核保护伞”下，一般公众对于选择欧洲本土部署美国武器（巡航导弹，潘兴Ⅱ式导弹，载有三叉戟飞机的潜艇，尤其中子弹）可能带来危害普遍感到不安。现在让我们回到前面曾谈过的论点，即假定两个超级大国在一场大规模冲突中避免“使

用核武器”，那么要保证以常规手段保卫西欧仍然存在相当多的问题。首先，常规武器耗资巨大。其次，即使有根据证实华约的地面部队和空中力量可以被克制，并且这一看法能为人们所接受，其前提也必须建立在加强北约现有实力的基础之上。由此可见，无论出于什么迫切理由——经济的理由或为了加强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军事部署——再没有比提出减少或撤出美国驻欧洲部队引起更大的混乱。美国对西欧这一个特定地区就承担了如此庞大的武装力量，所以要实行全球性和灵活性的宏大战略是极其困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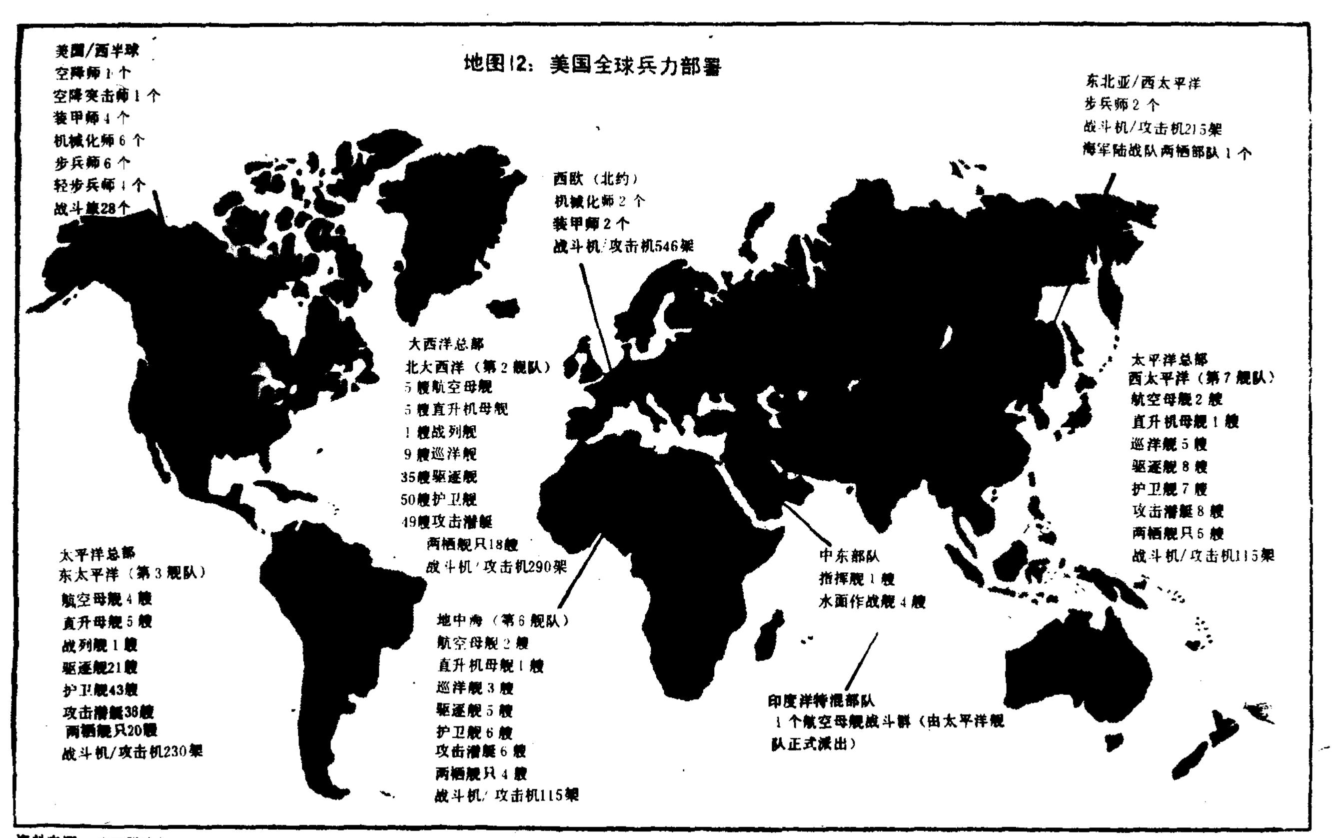
纵观上述，不难理解最担心美国承担的义务与美国现有的实力之间不相称的现象的是军界人士，因为在严峻的战争考验中一旦美国的战略弱点暴露，首当其冲的正是他们自己。因而五角大楼经常提出警告，反对被迫到世界各地执行欺人的勾当，反对每当新的麻烦出现，就把兵力从一个“热点”调到另一个“热点”。1983年底这种情况变得特别尖锐，当时美国增加在中美洲、格林纳达、乍得、黎巴嫩的军事部署引起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大声疾呼，声称美国力量与战略之间是“不相称的情况现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严重”，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已酝酿多年了。有趣的是，在历史家看来，警告美国武装力量在“全面扩张”的《美国全球主要军事部署》地图呈现的态势，与昔日世界强国——大英帝国在其战略扩张顶峰时期占有一系列舰队基地和驻军的情况何其相似。

但另一方面，也不会出现美国必须同时保卫其一切海外利益，并且无法取得一些同盟国援助的情况，这些盟国包括西欧的北约成员国，中东的以色列，太平洋的日本、澳大利亚，可能还有中国。也并不是整个地区形势都对美国防御不利，例如，虽然难以捉摸的北朝鲜随时可能发动侵略，但这种行动不会受到今日北京的欢迎。何况南朝鲜人口已增至北朝鲜的两倍，其国民生产

总值是北朝鲜的4倍。同样，苏联在远东扩张势力引起华盛顿的恐惧，但中国对苏联通往东方的陆上和海上交通线造成日益增长的威胁又大大抵销了美国的恐惧。最近美国国防部长清醒地承认，“我们永远也负担不起购买足够的武器的费用，以便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履行我们所承诺的所有的义务”，这话确系实际情况；但若考虑到世界潜在反苏资源的总和（包括美国、西欧、日本、中国、澳大利亚）远比苏联一边的资源总和大得多，那就不会象最初那样令人忧虑了。

除上述情况足以自慰之外，美国总战略的基本困难依然存在，这就是美国今天承担的全球义务之多，与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大致相当，但那时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制造产业能力、军费以及部队人员编制都比现在要大得多。198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40年和自越南撤军后的10年，美国国外驻军为52万人（包括水上的6.5万人）。这一数字与英帝国鼎盛时期陆、海军平时海外部署相比要多得多。但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一些专家提出了强烈意见，认为数量过于不足。尽管自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国防预算几乎增加了两倍，但“现役部队人数仅增加5%”。根据英国和法国军方过去的经验，一个广泛承担海外义务的国家在“人力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势必比仅维持保卫本土部队的国家要多，而且在一个政治上自由主义、经济上自由放任主义的社会里，征兵不得人心，人力问题就更为突出。

至少自越南战争以来，人们对于制度本身的效率产生了许多怀疑，否则对于世界范围内美国利益与美国能力之间的差距不至于这样忧心忡忡。鉴于其他著作已多次论及对制度效率的怀疑问题，这里仅仅对它们略加综述，也不对热门话题“国防改革”作进一步论证。例如，就军队各部门之间的竞争这个斗争的重要领域而言，这本是一种存在于大多数国家部队中的普遍现象，但在美国制度中却根深蒂固，其原因可能由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权



资料来源：美国国防年鉴1987—1988年



力相对较少，也可能由于主要精力放在武器采办上而不是战略和作战问题上。在和平时期，可能只把这种情况看作极端的“官僚政治”而不予注意，但到了实际作战时，如需要立即派遣包括全部4个兵种的“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部队”时，缺乏应有的协作，则可能遭到致命的打击。

在武器采办方面，据说“浪费、欺诈、滥用权力”等不正之风司空见惯。近年来价格高昂但性能低劣的武器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出现了各种丑闻，究其原因似有多种理由，如缺乏适当的投标竞争，缺乏“军工联合企业”市场因素，武器系统日趋“贵重”的倾向，当然更主要的是追求高额利润。不过，很难把采办过程中的缺陷同正在发生的明显而更重大的事实分开，即新技术进步加强了对于作战艺术的影响。

尽管苏联在技术领域力量十分薄弱，因此可以设想美国武器的质量可抵销苏联武器数量的优势，如坦克和飞机的数量优势，但对于卡斯帕·温伯格称之为“竞争战略”的采办新军备仍然有明显的诱惑力。里根政府第一任内购买新型飞机的费用比卡特政府多75%以上，但飞机数量仅增加9%，这一事实说明了20世纪末骇人听闻的武器采办问题。——由于技术的进步迫使人们花费越来越多的钱去生产越来越少的武器系统，在这种趋势下，在一场激烈的常规战争的最初阶段之后美国及其盟国仍有先进的、价格高昂的飞机和坦克吗？假如在第三次大西洋战役的早期阶段遭受严重损伤，美国海军还有足够的攻击潜艇或驱逐舰吗？如果没有，其结局定是不祥的，因为十分明显，今天的武器结构复杂，不可能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可在短时间内得到补充。

这个困难又因在制定美国国防政策的周密计算过程中的两个因素而变得更为严重。第一个因素是预算限制。除非出现严重的外界威胁，要把国防开支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5%以上，那将需要进行非同一般的政治说服活动，特别是由于联邦赤字巨

大，事实已清楚地表明国家的首要任务应是平衡政府开支。但另一方面，如果国防费用增加的速度减缓或甚至停止，而此时恰巧武器成本不断呈螺旋式上升，五角大楼面临的问题将更加尖锐。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必须准备应付军事上各种突发的意外事件，这一事件对于武器力量及其使用武器都有相同的要求。这在大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例如英国陆军被迫在印度西北前沿或在比利时作战曾经常处于严峻考验之中。但那种挑战较之今日"头号大国"面临的任务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如果美国的关键问题是要保持对苏联的核威慑力量全面升级，则将不可避免地大量投资生产诸如 MX 洲际导弹、B—1 和"潜隐"轰炸机，潘兴Ⅱ式导弹、巡航导弹和载有三叉戟飞机的潜艇。如果同华约打一场大规模常规战争是最有可能的方案，那么资金可能需要用于完全不同的方面：战术飞机，主力作战坦克，大型航空母舰，护卫舰，攻击潜艇以及后勤勤务。如果美苏两家避免直接相撞，而角逐于第三世界，则需要混合使用下列武器，如小型武器、直升飞机、轻型航空母舰，并加强美国海军陆战队使其发挥主力作用。由此可见，有关"国防改革"的许多争议来自对于美国可能应战的作战类型的不同设想。要是当权者作出错误的设想，那结果又将怎样呢？

对于现行制度的效率更深一层的担心表现在进一步怀疑目前的决策机构能否实行正确的总战略，一些要求"恢复"美国实力运动的强烈支持者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一点。这不仅指军事政策应协调一致，以减少关于"海洋战略"与"联合作战"的争论，而且要把美国政治、经济和战略的长远利益有效地结成一体，以取代华盛顿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所特有的许多官僚政治的勾心斗角。在这方面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对于美国在国外应怎样和在哪里使用武装力量以加强或捍卫国家利益的屡见不鲜的公开争论。国务院要求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作出明确坚定

的反应，国防部则不愿（特别在黎巴嫩的冒险失败之后）卷入海外纠纷，除非在特殊情况之下。但是，五角大楼也不乏相反的事例，如在同苏联进行的军备竞赛（如战略防御计划，放弃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倾向于单方面作出决定而不事先与主要盟国协商，这给国务院留下了不少棘手的问题。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尤其是作为国家安全倾向个人所起的作用变化无常。在中东政策上首尾不一，其原因一方面固然巴勒斯坦问题难于处理，但另一方面美国基于战略利益支持保守的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反对苏联对该地区的渗透，但往往遇到本国亲以色列院外集团精心筹划的强烈反对而受挫。关于如何运用经济手段——从抵制贸易、禁止技术转让到对外援款、武器出售、谷物出售——以维护美国外交利益方面，各部门之间还存在争论，而这些外交利益影响着美国对第三世界、南非、苏联、波兰、欧洲共同体等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并有时互不一致产生矛盾。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认为。每个困扰世界的外交政策难题都能一一找到明确而现成的"解决办法"；但另一方面决策体制内部经常出现意见分歧肯定不利于维护美国的长远利益。

这一切情况使悲观的批评家们对于美国整个政治传统产生了疑问，而华盛顿的决策人是必须按照这种政治传统进行工作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复杂的问题，不可能在这里进行深入探讨。但是人们日益认识到，一个国家需要根据世界事务发生的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总战略，而美国的选举制度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这一需要，它每隔两年使外交政策的决策停顿一次。此外，还有种种不利的因素，例如，院外集团、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利益集团就其本身宗旨对各种政策变化必须抱有偏见，它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施加强大压力；大众传播媒介将重要而复杂的国际和战略问题加以"简单化"，因为它拨给这类事情的时间和空间有限，它存在的目的主要为了赚钱，笼络听众、观众

或读者，其次才是报导；美国社会文化中“逃避现实”的思想倾向仍有强大影响，基于美国“开拓边疆”的历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适应今天更加复杂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以及同其他文化和思想体系的协调却是一个障碍。最后，立法权和决策权分立的制度并不一定永远对国家有利，这种权力划分是在两个世纪以前美国在地理和战略上同外部世界相隔离的情况下审慎制订的，那时对于很少的几个确属“外交”政策的问题有充分的时间经过协商取得一致意见，而今天仍要这样做就比较困难了，因为美国已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与受较少约束的国家不同，客观情况经常要求它作出迅速的决定。上述问题中单独的某一个问题并不构成美国奉行一贯的、长期的总战略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然而所有问题堆积在一起并相互影响的结果，就很难对政策进行必要的改变，尤其当这种政策改变损害到特殊利益或正逢选举年时更是如此。因此，美国要在文化和国内政治领域内逐渐形成一个迎接21世纪的有效的全面的政策，还有待于经受最大的考验。

关于捍卫美国全球利益中保持“手段与目的”的适当关系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国家承受的经济挑战问题，各式各样的经济挑战已使国家在决定政策时受到巨大的压力。美国经济的广度和复杂程度非同一般，因此经济各部门发生的情况难于即时总括起来，当经济发出矛盾的信号时尤其如此。尽管如此，前章所述经济特点仍然是主要的。

第一个特点是美国工业的相对衰退，与世界生产对比，这不仅反映在纺织、钢铁、造船和基础化学等较老的工业部门中，也表现在机器人、航空与航天、汽车、机床和计算机所占全球份额方面，尽管后者在工业技术竞争水平上的最后结局眼下还不易判断。美国在上述两个领域里都存在大量难题：在传统的基础工业制造业方面，美国几乎无法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以弥合它同新兴工业国家在工资水平上存在的差距；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一旦在

未来的技术竞争中失败，那将是更大的灾难。1986年末，国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美国高技术产品的贸易顺差从1980年的270亿美元猛跌至1985年的40亿美元，并正在迅速开始出现赤字。

第二个特点是农业的衰退，这是出乎意料的。仅仅10年前专家预测全世界食物需求与农业产量之间将出现可怕的不平衡。有关饥荒和灾害的描绘激发起两种强烈反应。第一种反应是，美国从70年代开始对农业进行大量投资，以期在海外开展空前大规模的粮食交易。第二种反应是，由西方世界筹措资金，广泛调查研究增加第三世界农作物产量的科学方法，这一工作进行得十分成功，以致许多国家成为粮食出口国，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欧洲共同体由于实行价格补贴制度也变成剩余农产品主要生产者，这与上述两种倾向分别进行，并无内在联系，但在时间上相巧合。结果，专家们提出现在是一个"遍地粮食的世界"，它反过来导致农产品价格以及美国粮食出口急剧下降，许多农场主被迫歇业。

因此，毫不奇怪，这些经济难题使得美国许多经济部门、企业人士、工会、农民以及国会议员产生一股保持主义情绪。正如英国爱德华七世时期"关税改革"中的争辩一样，主张加强保护主义的人抱怨外国人的做法不公平，把低于成本的产品"倾销"到美国市场，指责外国对农民的补贴过多，并认为对此美国政府只有取消贸易放任自由政策和制定强硬的反措施作为还击。这里有许多抱怨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日本把低于成本的硅片运进美国市场）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保护主义情绪的出现，是美国制造业从未受到挑战的优越地位下降的一种反映。美国人象维多利亚女王中期时代的英国人那样，在1945年以后崇尚自由贸易和公开竞争，这是因为他们不仅看到这个进程将促进世界的商业和繁荣，而且他们自己极有可能从废除保护主义中得到好处。然而

40年后的今天，这种信念逐渐消失，舆论有可能转而主张保护国内市场和国内生产者。另一方面，正象英国过去的情况一样，一些维护现存制度的人则认为，提高关税不仅有可能使国内产品在国际上减少竞争力，而且会招致各种外界反击，如展开全球性的关税战，打击美国出口，削弱某些新兴工业国家的货币基础，回复到30年代的经济危机。

除上述影响工农业的困难以外，国家财政金融空前动荡。工业品的国外竞争力不强，农产品输出量下降，两者合在一起造成惊人的有形贸易赤字——截至1986年5月，12个月内达1600亿美元，而更令人吃惊的是，美国已不能用"无形"利益补偿亏空，而这历来是发达国家的经济藉以弥补损失的源泉（例如，1914年前的大不列颠）。相反，现在美国得以勉强维持局面的唯一出路是进口前所未有的大量资本，这样几年之内就会把美国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许多批评家认为使这一问题复杂化，或者说酿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本身的预算政策。早在60年代，为了支付上涨的国防和社会福利费用，华盛顿已倾向于依赖赤字财政，而不是增加税收。但是80年代初期里根政府作出决定——大规模增加国防费用以及大幅度减低税收，而不大量减少其他方面的联邦支出——使赤字急剧上升，最终如表49所示，导致国家负债。

表49　美国联邦赤字、债务和利息（1980～1985年）

（单位：10亿美元）

年　份	赤　字	债　务	债务利息
1980	59.6	914.3	52.5
1983	195.4	1381.9	87.8
1985	202.8	1823.1	129.0

人们大声疾呼，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美国到2000年将负债13万亿美元（为1980年债务的29倍）。当然降低利率可减少估计数字，但总趋势仍是很不正常的。即使联邦赤字每年可减少到“只有”1000亿美元，到21世纪初国家债务和付息总数仍将耗费空前巨资。从历史上看，**和平时期**大国如此负债累累的仅有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当时它的财政危机激起了国内政治危机。

现在美国贸易赤字和联邦赤字与世界经济中的一种新现象相互影响，这种现象也许最好称之为“错位”，即国际资本从贸易流向商品和服务。鉴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的贸易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总共每年约为3万亿美元，但现在它已经被源源流入世界金融市场的巨大资本超过了，仅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一家的金额“至少是世界贸易额的25倍”。70年代发生的事件，（如从固定汇率转为浮动汇率，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输出剩余资金）促进了这一趋势，同时美国赤字也刺激了这一趋势，因为联邦政府填补开销与收入之间巨大差额唯一的办法是从欧洲、特别是日本吸收大量流动资金，其结果正如上述把美国变成了世界上迄今最大的债务国。事实上，如果80年代初期**没有**外国资金输入，很难想象美国经济怎样维持下去，当然，这样做带来了美元比值上调和进一步损害美国农业和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不良后果。但反过来，如果撤走大批流动外资而使美元价值急剧下降，难以预料，将发生什么情况，也是难以预料的麻烦问题。

以上种种趋势反过来说明，危言耸听者夸大了美国经济现状的严重性，看不到大部分事态发展的“自然规律”。例如，70年代末如果许多人不以高价和高利率购买土地，中西部农业地带的情况可能要好得多。又如，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正在一切先进国发生的事情，而且应该考虑到美国的制造业**产量**从绝对量来讲一直上升，尽管制造业就业率，特别是兰领阶

层的就业率同时一直下降，不过这也是一种"自然"趋势，因为世界日益从以材料为基础的生产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同样，美国把自己的金融机构变成世界性机构：以东京、伦敦、纽约三处为基地操纵巨大资本流量并从中渔利，这样的金融服务赢利只能增加国家收益，无可指责。有时人们甚至说，如扣除通货膨胀因素，那么每年的巨额联邦赤字和不断上升的国家债务也不算太严重，有的人还存在这样的看法，认为经济将"逐渐自行消除"赤字，或相信政治家能采取一些措施弥合差距，如增加税收或消减开支或二者兼而用之。并且指出，削减赤字过猛还有可能激起大规模衰退。

据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征兆很多，大可令人放心。由于服务业部门的兴旺，美国在过去10年中就业机会的增加比历史上任何和平时期都快，比西欧也快得多。与此相关，劳工流动性大，就业市场上可以灵活地变换工作。此外，不仅美国的加利福尼亚，而且还有新英格兰、弗吉尼亚、亚利桑那以及许多其他地区在高技术方面承诺的商业合同可望使生产空前增长，从而国家财富随之增长（并保证对苏联的战略优势）。确实，正因为美国经济存在大量机会，不断吸引着成百万移民，造就了成千的新企业家；而资本大量涌入美国可进一步用于投资，特别是用于研究与开发项目。最后，如果全球贸易的趋向确实导致粮食和原材料价格下降，即使对美国的农场主和石油企业家特别有害，对于仍需进口大量石油、金属矿石等原料的美国经济应该仍然是有利的。

上述各种观点有许多可能是正确的。鉴于美国经济规模大，多样化，一些部门和地区衰落的同时，可能另一些部门和地区都正在发展，因此要把全部情况归结为"危机"或"景气"是不恰当的。由于出现原材料价格下降，1985年初美元难以维持过高比值而下调以及利率普遍降低，以及这三种动向对通货膨胀及企业

信心产生的积极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有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前景抱乐观态度。

但是，从美国总的战略来看，从作为一个有效的、长期的战略所必须依赖的经济基础来看，前景并非十分美妙。首先，美国自 1945 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承担了一系列军事义务，但目前它能挑起这一付重担的能力明显地比前几十年要差得多，那时它在世界制造业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很大，它的农业不存在危机，它的国际收支情况良好，政府预算平衡，国际上也并非债台高筑。从这个广义上讲，一些政治学家提出今日美国与昔日“衰落的霸主”的地位有某些相似之处。

同时，发人深省的是，今天美国思想界不断增长的焦虑情绪酷似爱德华七世英国时代笼罩一切政党中的气氛。英国当时的思潮导致所谓提高“国家效率”运动，即在全国决策、企业、教育界的精英中开展广泛的辩论，研究了各种措施以改变那种与先进社会相比竞争力日益削弱的状况。在商业经营、教育和培训水平、生产效率、收入标准和（不够富裕阶层的）生活水准、健康状况以及住房方面，英国这个 1900 年的“头号”大国看来已失去优势地位，并意味着未来它的长期不幸的战略地位；因此左派和右派都同声呼吁“革新”和“改组”。这类运动通常都会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改革，但不无讽刺的是，改革本身证实了衰落，几十年前当这个国家占据无可争辩的领先地位时，根本不必激烈议论关于改革的问题。作家 G·K·切斯特顿曾挖苦地说过，强壮的人从不担心身体；只有当身体虚弱时，才开始谈论健康。同样，当一个大国在强大而不受挑战的时候，和它在相对虚弱的情况下不同，很少会考虑履行责任的能力。

严格地讲，如果美国工业基础继续削弱下去，美国的总战略可能要受到严重的影响。假定未来大规模的战争是常规战（因交战双方都害怕引起一场核破坏），那么人们必然提出疑问，若干

年来主要工业部门衰退，兰领阶层就业率下降等等，对于美国工业生产能力产生了什么影响。在这方面，令人想起休因斯 1904 年关于英国工业衰退时该国实力影响的警告：

假如是国家的国防系统最根本的工业受到（外国竞争）的威胁，那么它的地位将会怎样呢？没有钢铁工业，没有大型工程技术行业，一个国家就活不下去，因为在现代战争中，缺乏这些就等于缺乏生产手段和维持一支具有战斗力的舰队和陆军的手段。

很难想象美国工业能力会下降到如此严重地步，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基础比爱德华七世的英国要广泛得多；另一个重要事实是，"有关国防工业"不但因五角大楼连续订货及以支撑，同时制造业从材料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高技术），并将最终使西方减少对重要原材料的依赖。尽管如此，有一些情况，譬如说，很大一部分半导体（或远非半导体的某一产品）在国外组装后运回美国；美国航运和造船工业的衰微；许多美国矿床和油田关闭等等，在一旦爆发另一次长期的大国联合战争时不可能不造成损害。再者，若历史可作前车之鉴，缺乏能工巧匠的支持往往是战时生产"高涨"的最大压力，这不禁令人再度忧虑大批美国兰领阶层（一般为能工巧匠）长期就业率下降的问题。

另一个涉及经济增长缓慢对美国社会、政治舆论的影响问题，性质虽完全不同，对于贯彻正确的总战略同样关系重大。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使大多数欧洲人感到吃惊，20 世纪的美国竟已避免出现明显的"阶级"政治。人们认为，这是由于一系列事实造成的：大批移民逃离各地的严酷社会环境来到美国；美国幅员广大把一些陷于经济绝境的人们容纳下来，使他们"逃到"美国西部，但同时也造成了组织劳力的困难（至少比德国或英国困难）；这片广阔的土地范围内及其提供的企业机会鼓励着这一国家政治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偶而受到左派的攻击）。其结果，美国富人与穷人之间"收入差距"比任何

先进工业社会大得多；由于同样的原因，国家的社会公益服务开支与同类国家相比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较低（除日本以外，日本似以家庭为基础的较强有力的形式资助穷人和老人）。

美国虽然社会经济悬殊，但不存在"阶级"政治，很明显，这归功于美国自30年代以来经济全面增长为大多数人改善个人生活状况提供了美好的前景；以及美国社会1／3最穷的人没有被"动员"成为正式的选民的这一侵犯权利的事实。考虑到美国在种族构成上白色人种同黑色人种及西班牙人种之间出生率的差异，以及各种不同种族的移民涌入美国；经济形态的变化使大量相对高工资的制造业就业机会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大量服务业中收入低微的工作，因此，如果美元价值猛跌，经济增长缓慢，使国家陷入一个持续的经济困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认为美国仍可保持政治经济的主导原则——政府低开支，富人低税收——可能是很不明智的。同时，这一情况意味着，美国增加国防开支以响应国外的挑战，大幅度削减社会开支以应付国内的预算危机的这种政体，可能要冒最终激发政治上强烈动荡的风险。同本章前面研讨的其他大国一样，美国在决定国家优先发展项目中，要解决国防、消费和投资三者之间一贯的紧张关系，也没有简易现成的方案。

这种情况势必使我们考虑到经济增长缓慢与巨额国防费用之间的微妙关系。关于"国防开支经济状况"的辩论争议很大，由于人们考虑到美国的经济规模庞大，种类繁多，数量很大的政府合同刺激经济发展，同时武器研究也对技术产生有利的副作用，因此论证并不简单地倾向于一个方向。进行比较是我们的重要目的。据悉，艾森豪威尔时期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10%，肯尼迪时期占9%，当时美国所占全球生产和财富的相对份额是今天的2倍；特别是，那时美国经济无论传统制造业，还是高技术制造业都不曾面临挑战。如果目前美国继续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7%用于国防费用，而它的主要经济对手，尤其是日本，仅拨出很小的一部分用于国防，那么，事实上后者有更多潜在的资金可“随意”投入民用事业；如果美国继续在有关军事生产方面进行大量研究与开发工作，而日本和西德集中力量从事商业研究与开发；如果五角大楼罗织了全国大多数科学家和工程师，造成设计和生产世界市场商品的人材枯竭，而其他国家的人员则主要从事生产质量优良的民用消费品，这样做的结果，看来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比重将不可避免地不断下降，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增长率比起那些致力于市场生产而不热衷于投资国防工业的国家也一定会低一些。

毋庸赘言，这些倾向长期置美国于进退维谷之地。美国之所以需要相当大的国防力量，只因为它是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承担的军事义务远远超过地区性大国如日本或西德，正象当年的西班牙帝国一样，认为它应拥有远比其同时代国家更大的陆军，也象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样，坚持要有一支规模超过所有国家的海军。再者，既然苏联被看成是美国全球利益的主要军事威胁，而且它明显地在把很大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美国决策人当然担心同苏联的武器竞赛中“失败”。美国某些较明智的决策人也已看出沉重的军备负担正在使苏联经济日益虚弱，如果两个超级大国继续把更多的国家财富投入非生产性的军备领域，很快就会提出这样的关键问题：“与有关国家相比，如扩展中的日本、中国等等，谁的经济将下降**最快**？”对于象美国这样在全世界过份扩张的大国，军备投资少会使它觉得到处易受攻击，而军备投资很多，短期安全虽有较大保证，但会严重危害美国的商业竞争以致削弱国家的长期安全。

有关这方面的历史先例并不令人鼓舞。以往的“头号”大国都曾经历过同样的困境：尽管它们的相对经济力量已在削弱，但外国的对其地位的挑战加剧，迫使它们把越来越多的资源分配给军

事部门，从而挤掉了生产性投资，于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出现经济发展急剧下降、税收加重、经费开支孰优的问题上内部分裂加深、承受国防重负力量减弱等一系列现象。如果这确实是历史的模式，这里不禁想借用萧伯纳极为严肃的一句双关语："罗马衰落了；巴比伦衰落了，要轮到斯卡斯代尔了。"[1]

因此，就广义而言，对于公众一直争论的问题——美国是否能保持它现有的地位——唯一的回答是"否"；——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社会能**永远**领先于其他社会，否则，就意味着自古以来存在的具有差异的各种模式的增长速度、技术进步以及军事发展都凝固冻结，停滞不前了。另一方面，提及历史先例并非暗示美国注定衰落到前领先大国西班牙或荷兰那种默默无闻的地步，或者象罗马和奥匈帝国那样地崩溃；这两种结局之所以都不会降临美国，既因为美国太大，不可能步前者后尘；又因为美国统一，不可能重蹈后者覆辙。目前有些政治科学书籍甚至喜欢把英美也作这样的类比，由于忽视了**规模**的区别，比拟就不恰当了。换句话说，根据不列颠诸岛的地理面积、人口和自然资源，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假定英国应占有大约世界财富和实力的 3%或 4%；但正因为"其他情况"永**不**相同，一系列特殊的历史和技术条件使不列颠诸岛得以扩展并在全盛时期掌握了世界财富和实力的 25%；后来由于那些有利条件消失；英国逐渐恢复到它"本来的"规模。同样，可以设想根据美国的地理面积、人口及自然资源，也许应占有世界财富和实力的 16%或 18%，但由于历史和技术的客观条件有利于美国，1945 年美国的份额高达 40%或更

---

1 此双关语出自《不适当的结合》(1909年)，原文为："要轮到海德赫德 (Hindhead) 了"。据《工业和帝国》第 193 页注，这是明显的嘲笑伦敦以南的一个股票掮客地区，当其他地方经济受到压力时，该地区繁劳起来。此处斯卡斯代尔 (Scarsdale) 系美国地名，意指美国。——审校者注。

多；而我们亲眼目睹的只不过是它从极高的数字下降到比较“正常”的数字的早期阶段而已。美国庞大的军事能力，以及美国资本主义和文化“国际化”的成功掩盖了它的衰退。甚至当美国衰退到仅占有它“本来的”一份世界财富和实力的时候，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由于国家太大，它仍将是多极世界中举足轻重的大国。

因此，今后几十年美国国家领导人面临的任务是认识到正在发生的明显趋势，认识到必须把事情“搞好”使美国地位**相对**腐蚀的过程发展缓慢和顺利，不采取于短期有利于长期不利的政策来加速这一过程。上至总统办公室，下至各级机构，必须充分了解：当前发生的技术变革，从而社会经济变革，速度之快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国际社会的政治、文化多样化也大大超出原来的设想，它们无视华盛顿或莫斯科提出的简单化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经济和生产的力量对比不再象1945年那样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甚至在军事领域有迹象表明，均势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调整，世界从两极体系转向多极体系，在这个多极体系中美国经济和军事综合国力仍将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但不会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内那样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这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基辛格曾经指出，实行以两极世界为出发点的政策有其不利之处；如果考虑到世界实力发生变化对于苏联的影响更大，那就更不是一件坏事了。需要再三强调的是，在对美国领导地位衰落的一切探讨中，所谓衰落，是指的相对衰落，而不是绝对衰落，因此是完全正常的，而对于美国实际利益的唯一严重威胁将来自不善于明智地适应新的世界秩序。

美国既然还拥有相当大的力量，要进行这次外交和战略的重新调整，对于今后多届继任的政府，**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力所能及的，即可以实现沃尔特·李普曼的名言，使“国家的承诺和国家的实力相平衡”。现在还没有一个明显的“后继国家”象40年代

美国取代英国的角色那样，可以接替美国的全球重担。但是，与四面受敌的西班牙帝国、被法、英两面夹攻的荷兰或面临无数挑战的英帝国相比，美国的问题要少得多。当美国走向21世纪的时候，摆在它面前的考验，特别是经济领域的考验肯定是严峻的。如能适当地安排资源，明智地承认美国实力的限度与可能两个方面，那么美国的力量仍然是巨大的。

从某个角度来看，很难说唯有美国才面临这样独特的困境。请问，世界上哪个国家在制定一项可行的军事政策或在大炮、黄油、投资三者之间作出抉择时**没有**遇到过困难？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美国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尽管美国的经济衰退，也许还有它的军事衰退，但用皮埃尔·哈斯内[1]的话说，美国仍然在"每种均势和每个问题中起决定性作用"。因为无论如何它具有很大的实力，它是西方联盟体系的关键和目前全球经济的中心，它**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事关重大，是任何一个大国的行动所不能比拟的。

---

1 系"欧洲与美国政策的矛盾"一文作者，见R·罗斯克兰斯主编《美国——一个普通的大国》（纽约，1976年版）第60~86页。

尾　声

对500年来国际体系中大国的兴衰进行考察之后，现在该用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最后一节来结束了。许多政治学家提出了“战争和相对实力周期”，“全球性战争、公债和长周期”、“帝国的规模与持续时间”等众多理论，进行种种努力试图对全局作出解释，并通常对未来加以推测，作者在本节中拟就这些理论在观点上和方法上进行探讨。本书虽然能为研究战争模式和国际秩序变化的这一学科的学者们提供大量的详尽的事实和评述，但本书毕竟不是一部政治学著作。

这一节也不准备对我们当前的形势作出结论，因为这样就会与本书要旨相抵触。本书认为，国际体系是不断变化的。不仅政治家的日常活动以及政治和军事的消长会引起变化，而且世界力量基础深层的变化届时终究也要显露出来。

不过在结束本书之前，还应提出一些总的意见。本书自始至终都在论证，就国际体系而言，财富和权力或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始终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也应该这样看。既然它们是相互联系的，既然一切社会都处于变化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之中，那么国际力量对比就**绝不会**静止不变，如果政治家作出静止不变的假定，那是愚蠢的。鉴于各国之间的对抗具有混乱和竞争的特性，过去500年来国际事务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或至少是备战史——不管作战或备战都耗费了社会本可为国家或个人其他方面做些“好事”的资金。因此，不管经济上和科学上的发展达到了什么阶段，在各个世纪里都曾展开讨论，争辩究竟应将多少国民财富

用于军事目的。同时也就如何更好地促进国家繁荣富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不仅因为增加财富可为个人带来好处，而且因为人们认识到如果发生另一次国际冲突，那么经济的增长，产量的丰富，财政的繁荣都将影响一个大国的有关前景。本书研究过的各大国之间进行的所有主要的长期战争，其结局的确不止一次地表明了生产性经济力量的决定性影响——在战争期间和在战争之间的时期都是如此，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可使各大国变得相对地更衰弱。1500～1945 年之间多次大规模联合战争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长期以来在经济方面发生的变化情况。因而，每次战争结束后确立的新的领土秩序也反映了国际体系中权力的重新分配。和平的到来并不能制止继续变化的过程；而各大国之间不同的经济发展速度使它们继续相对地不断兴盛和衰落。

在混乱的世界秩序中兴盛和衰落的大国的存在是否总会导致战争，这一点还不能肯定。大多数历史著作都设想"战争"和"大国体系"是紧密相联的。新重商主义和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麦金德认为"历史上的大战……是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但是，这种模式在 1945 年就结束了吗？的确，可能有这种情况，即核武器的出现，使任何交战都受到双方同归于尽的威胁，从而最终结束了以武装冲突来解决大国力量对比变化的习惯方式，而只留用了间接的、小规模的"代理人"战争模式。不过，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况，即双方都害怕核武器，而保证只用常规战争来解决大国之间未来的冲突（如果发生的话），但在拥有现代化战场武器装备的条件下，即便是常规战争，也将是十分残酷的血腥事件。

显然，没有人能够回答这类重大问题。有人认为，人类是不会那么愚蠢地卷入另一次招致毁灭的耗费巨资的大国战争中去的，也许需要提醒这些人：在 19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也都是广泛地抱有这种信念的；的确，迟至 1910 年才出版的诺曼·

安杰尔的书《伟大的幻想》论证了战争对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同样会造成经济上的灾难，它成为国际畅销书，但与此同时，欧洲各国的参谋本部却都在悄悄地最后制定他们的战争计划。

不论各主要国家之间是否会发生核战争或常规冲突，它们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并将以比过去更快的速度继续变化，这是十分明显的。而且，这些变化是在经济生产和战略力量这两个既独立又相互作用的方面发生的。除非过去20年来的发展趋向改变（试问有何理由会导致改变?），今后世界政治的**格局**看来将大致如下：

第一、各国在世界总产量和世界总军费两者中的比重将有变动，即从五个最大的力量中心移至更多的其它国家，但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在最近的将来，没有任何国家可加入目前由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组成的“五头政治”中去。

第二，就五国而言，世界生产力量的平衡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从苏联和美国，也开始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向有利于日本和中国的方向倾斜。但这在经济上并不导致五方面的**均势**，因为美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生产和贸易实力大致相等（虽然前者由于是军事国家而大占优势）；苏联和日本也大致相同（虽然日本经济增长更快），但苏联和日本的生产能力都只及前两者的2／3左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远远落后，不过它发展得最快。

第三、在军事上当前仍然是两极世界，只有美国和苏联有能力相互摧毁，并摧毁任何其他国家。尽管如此，在核武器方面和在常规武器方面，两极状态也许都在逐渐削弱。就核武器而言：或则由于这种武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使用的，或则由于中国、法国和英国各自的核武器库都已大大增加。就常规武器而言：中国的力量不断增强，再加上西德和法国（可能还有英国和意大利）日益认识到，如果真正能够有效地合作，那它们的陆海空军聚集在一起将成为十分强大的力量联合。由于国内政治方面

的原因，这种情况在最近的将来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但存在着潜在的可能性这一事实本身就使"驾驭"体系处于进一步不稳的状态，至少在常规武器方面是如此。比较而言，现在没有人提出日本会变成一个军事大国的问题，但是如果有一天，东京的另一批政治领导人决定把它的经济力量变成较大程度的军事力量的话，那么，凡是了解"战争和世界政治变迁"的模式的人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如果日本的确决定要在世界事务中以更为积极的军事存在身份出现，它大概是会成功的，因为它感到仅仅作为"贸易国家"已不再能保护它的利益了，因而希望加强它的武装力量，把它在国际上的力量和影响提高到通过非军事手段所不能达到的地步。然而，过去500年国际对抗的历史说明只具有军事上的"安全"是绝对不够的。在较短时间内，一个军事强国可以威慑或打败敌对国家（这对大多数政治领袖和他们的公众来说，可以完全感到满意）。但获得这种胜利后，如果这个国家在地理上和战略上过分扩张，如果它虽不够帝国的水平，但却决意把大部分的总收入用于"防卫"的目的，给"生产投资留下的份额较少，那么它就可能发现它的经济生产速度将逐渐放慢，对它长期维持公民消费需求和国际地位的能力将产生可怕的影响。这种情况在苏联、美国和英国发生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西德都在努力避免对军费作过多的投资，因为它们都觉得这样也许会影响它们的长期发展前景

于是我们又回到从古罗马希腊时代以来就使战略家、经济学家和政治领袖们感到烦恼的难题上来了。一个大国——大国的定义是指有能力抵挡得住任何国家的国家而言——需要有繁荣昌盛的经济基础。李斯特说："战争或战争的可能性使第一流国家必不可少地需要建立起生产能力……。"但是进行战争，或将一个国家的一大部分"生产能力"用于"非生产性"的军备开支上，就有削弱

国民经济基础的危险，特别是同一些正在将大部分收入集中用于长期发展生产性投资的国家对比之下，情况更是如此。

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作家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切。那些追随亚当·斯密的人倾向于保持低防务费用，那些赞同李斯特"国民经济学"观点的人则希望看到国家拥有更多的暴力工具。如果他们是诚实的，就会承认这的确是件需要作出选择的事，而且是一种困难的选择。自然，最理想的是，"利润"和"兵力"并行不悖。但政治家们却往往遇到那种进退两难的困境：要么在有真正危险或看到危险的时候去"购买"军事上的安全（这就会对国民经济造成负担）；要么保持低防务费用（但发现它的利益受到其它国家的行动的威胁）。

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就这样不得不尽力去对付以往大国曾面临的两个相关联的挑战：第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使一些大国与其它大国相比更为富有（通常也更强大）；第二，竞争的有时危险的国际形势，这迫使它们在更直接的军事安全和较长期的经济安全之间进行选择。没有什么总的原则可为当代决策者提供普遍适用的行动方针。如果它们忽视提供适当的军事防务，那么当一个敌对强国乘机占去优势时，他们就无力作出反应了，如果他们在军备上花费太多——或者更通常是为履行前一时期承诺的军事义务而维持日益增多的费用——那么它们就会过度紧张，就象一个老年人要做力不胜任的事情一样。"战争费用日益增多的规律"使这一切变得更加艰难。以最常引用的例子为例，在2020年生产一架飞机就能耗费掉美国空军的全部预算，即便真能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但现代化武器费用的逐步升级也是使所有政府——及它们的纳税者——感到危险的趋势。

于是，今日的各个大国——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推理上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就必得竭力对付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国家兴衰的两难处境，要对付生产发展速度的变化，技术创新，国际

形势的变迁，武器费用的螺旋式上升以及力量均衡的变动。这些发展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个人所能控制的。用俾斯麦的一句名言来解释，那就是说，所有这些强国都是在“时间的河流”上旅行，它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指挥”这条河流，却可以“多少用些技巧和经验在河上行驶”。行程的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莫斯科、东京、北京和欧洲各个首都的政府的智慧。上述分析是试图指出所有这些国家组织的各自的可能前景。但这仍然大大有赖于它们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的“技巧和经验”。